

阿拉善往事

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 甲编/朝格图
主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8
ISBN 978-7-227-03539-8

I. 阿… II. 朝… III. 文史资料—阿拉善盟 IV. K29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8631 号

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 主编 朝格图

责任编辑 马若飞 曹巴特

图片提供 朝格图

封面设计 杨清林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银川金利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1 毫米 1/16

印张 40.25

插页 8 页

字数 556 千

版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539-8/K·411

定 价 388.00 元(上下)

目
录

- 阿拉善草原的蒙古部落及其与明朝的战争——明代的阿拉善
 李文志(1)
- 贺兰山名考 丁世雄(9)
- 阿拉善、额济纳旗历史由来 G·朝格图 白晓(13)
- 阿拉善盟的历史沿革 石有田 李正德(25)
- 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史简易 刘洪贵(53)
- 古居延与额济纳土尔扈特之来历
 巴达拉虎 著 青格勒图 朝格图 译校(66)
- 阿拉善本土历史文化名人札记 G·朝格图(69)
- 额济纳旗出土元代纸币 普·那生德力格尔(104)
- 略谈居延汉简的发掘与研究 瀚海杨(108)
- 贝格曼与居延汉简 陈贵敏(112)
- 俄国中校掘走黑水城珍藏 金点强(118)
- 来自西夏王国的绝世孤品——黑水城双头佛 杨剑(120)
- 西夏文明之发现与研究概述 瀚海杨(127)
- 斯文·赫定额济纳探险经过 邢玉林 林世田(137)
- 额日布盖山中的古代文明——岩画调查追记 G·朝格图(150)
-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瀚海杨(153)
- 延福寺概述 杨永忠(165)
- 广宗寺概述 贾拉森(188)
- 南寺第五世喇嘛坦佛教活动略述 贾拉森(217)
- 对阿旺丹增嘉木素晚年活动情况的调查 G·朝格图(227)

- 喇嘛教与宗乘寺(阿贵庙)史记 郭恩布札布(230)
- 阿贵庙与阿拉善旗磴口地区的喇嘛教 白生华(237)
- 敖包至尊巴音筭布尔 李万钰(246)
- 伊斯兰教在阿拉善旗传播发展概况 辛文秀 马怀诚(252)
- 寻访蒙古族穆斯林 李万钰(257)
- 天主教传入阿拉善旗磴口地区述略 宿心慰(275)
- 阿拉善旗磴口地区天主教堂分布状况 赵钟贤(294)
- 阿拉善旗三盛公天主教主教座堂历任教主 郝 威(304)
- 高世格梅林及其《普济杂方》 段贡布甲布(311)
- 范氏十一代行医史简略 范诺尔布扎木苏 著 张学忠 译(314)
- 《阿拉善建旗三百年记》的撰写经过 G·朝格图(320)
- 不容忽视的文史常识 瀚海杨(322)
- 阿拉善旗中学创办简史 戚 涛(325)
- 阿拉善女子小学校简史 G·朝格图(335)
- 塔王包衣章万宝与宝珍照相馆的兴起 赵贵春(339)
- 阿拉善文艺综述 邢 野(342)
- 阿拉善旗戏剧发展概况
..... 魏兆福(布音爱立布吉乎) 记述 聂义声 整理(350)
- 阿拉善印刷史略 聂义声(361)
- 阿拉善蒙古族祭骆驼习俗 李万钰(369)
- 解放前阿拉善妇女生活习俗及政治地位的片段
..... G·朝格图 呼鲁嘎纳(381)
- 阿拉善烤全羊的今昔小记 白 晓(388)
- 阿拉善旗的盐产与骆驼运输业 石有田(396)
- 阿拉善盟境内的绥新路 白·那音太(432)
- 蒙古族的发展与西蒙地区的人蒙古国驼道 白·那音太(451)
- 宁夏至定远营大道 范立宪(494)

宁夏至定远营捷径——苏峪口小路	范立宪(499)
浅议腾格里沙漠中的阿拉善至民勤驼路	李万禄(503)
瀚海长途——包头至武威路	李万禄(511)
话别定远侯与定远营	李万禄(520)
雅布赖盐池及其运道路	李万禄(523)
初谈阿拉善与河西走廊地区的古代沙漠草原路	李万禄(531)
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和定远营至达来库布驼路	白·那音太(540)
巴丹吉林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中的 阿拉善、额济纳两旗路	白·那音太(546)
古代居延与西蒙	李万禄(554)
额济纳驼道考	李 靖(563)
古代居延道路	王北辰(575)
居延南路综述	陆 浩(594)
后 记	(638)

阿拉善草原的蒙古部落及其与明朝的战争

——明代的阿拉善

李文志

蒙古人主中原,于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妥欢帖木尔,共历12帝97年。元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帅师北伐,元顺帝自北平出塞占据开平,从此蒙古由中原还居大漠南北。明成祖曾“三犁虏庭”,终未统一北方草原。这样,北方蒙古和明王朝势均力敌,南北对峙。彼此战争不断,间或互市贸易。

明朝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南进,在东起辽东西至甘肃设九大军事重镇凭以固守。九边之一的宁夏镇东倚黄河天险,以拒鄂尔多斯;西障贺兰险隘,以抗阿拉善蒙古。因此,贺兰山成为蒙古与明王朝的天然分界,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地区,在明代为蒙古民族驰骋之疆场。

一、明代蒙古各部在阿拉善地区的活动

《蒙古秘史》记载,狗儿年秋(1226年),成吉思汗率兵攻打西夏,与西夏大将阿沙敢不在“阿刺筛”激战。阿沙敢不战败,西夏遂亡。此后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草原始为蒙古所居。“阿刺筛”第一次载入史册“阿刺筛”即“阿拉夏”(阿拉善),是贺兰山的蒙语称谓。元末明初蒙古北徙,重操游牧之业,地广人稀的“阿拉夏”又一次成为他们生息的广阔天地。

明朝初年,北元还有足以和明朝分庭抗礼的实力。当时北元的梁王在



云南有 40 多万军队,辽东的纳哈出(木华黎的后代)在辽宁金山一带屯军 20 万,盘踞陕甘一带的元将王保保(扩廓帖木尔)尚存 10 万多军队。三路蒙古军队构成犄角之势,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

为解除西北边疆的压力,明太祖派徐达由潼关出西安,直捣定西。洪武三年(1370 年)四月,徐达军在甘肃定西县北沈儿峪全歼王保保军,王保保仅以身免,由宁夏向北逃至和林(西库伦)。元代阿拉夏地区属甘肃行省管辖,元亡以后,王保保尚控制着陕、甘两省的北部,“阿拉夏”地处陕甘北面,是王保保的后方基地。兵败定西的王保保必然取道宁夏,经阿拉夏境直趋和林。

洪武五年(1372 年),明军 50 万分三路进攻漠北北元军队,冯胜的西路军在甘肃永昌“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刺罕口……进至扫林山……遂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尔全城降”(《明实录》洪武六年六日戊子条)。之后明军又于洪武六年、洪武七年、洪武十二年讨伐北元残余势力。洪武十三年(1380 年)三月,明将沐英平定西番以后,侦知脱火赤屯兵亦集乃路,受命总督陕西军马出征。沐英从宁夏灵武县渡黄河,经宁夏,翻越贺兰山,入阿拉善境,跋涉流沙,行军七昼夜,发现北元平章脱火赤和知院爱足的帐篷。沐英命军队离帐 50 里,分军四路,夜晚进攻,包围脱火赤等,北元军队全部就擒。额济纳(亦集乃)河流域水草丰美,是北元在漠南的主要根据地,因此,明军多次劳师远征,与北元军队在“阿拉夏”、额济纳地区展开激烈的角逐,将额济纳黑城一带变成双方较量的主要战场。

建文四年(1402 年),北元可汗坤帖木尔被鬼力赤所杀,非元裔的鬼力赤自立为汗,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自此以后,蒙古出现“赛特”专政,可汗为其挟制,各部封建主拥兵自重,不服从可汗号令,相互攻伐,蒙古地区形成封建割据状态。鬼力赤的活动地区不在东蒙,而在西蒙的甘肃、宁夏边外,这里两条史料可以证实。《明实录》永乐五年三月甲戌条记载,永乐帝曾敕令宁夏总兵何福及诸边将,将道经边城的鬼力赤之师耳亦赤护送出境。另则鬼力赤欲西向瓦剌开战,又有后顾之忧,故将家属南迁,目的是调解和缓与明朝的关系。且鬼力赤又“数遣人至哈密市马”。由以上可知鬼

力赤的牧地在宁夏边城不远的阿拉善和哈密以东的额济纳。

鬼力赤被杀后,东蒙古的阿鲁台迎本雅失里于别失八里,立为可汗,占踞西套,永乐八年成祖亲征蒙古,本雅失里战败后西窜瓦剌,随之失去这一地区。明军取得永乐八年战役的胜利,迫使鞑靼部众纷纷内徙。经额济纳、阿拉善境至宁夏边塞归降的部众有3万之多,牲畜达10余万。明政府遣使慰劳,并给以妥善的安置。

宣德元年(1426年),阿鲁台立阿台王子(《蒙古源流》称阿岱汗)为可汗,占据凉州、甘肃边外的阿拉夏地,伺机抢掠明边。正统初年,西部瓦剌势力东进,脱欢太师攻击阿台,接着明军又给予阿台毁灭性的打击。岁次戊午年(正统三年),49岁为脱欢太师所杀。打败阿台汗的瓦剌脱欢尽据西北之境,并以西套为前站,开始经略四方,拓展势力。脱欢统治时代,瓦剌(卫拉特)势力颇盛,权势所及西起阿尔泰山南麓,东及兀良哈三卫,南临明边。

天顺年间,蒙古东西各部分乱,各自雄长,争斗不已,内乱颇仍。蒙古鞑靼各部的势力先后西入河套,以及贺兰山阴一带。先有阿罗出入河套,逼近西边。之后蒙古首领孛来、小王子、毛里孩先后入套,并深入贺兰山后。“弘治元年夏(1488年),小王子奉书求贡,称大元大可汗”(《明史》中华书局校点本,卷327、列传215、外国八“鞑靼”)。建立“伊克·蒙兀儿·兀鲁思”(大蒙古国)。

明朝弘治年间的蒙古可汗小王子,就是蒙古民族引以为豪的达延汗。达延汗属乞颜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后裔,号巴图蒙克生于明天顺八年(1464年),7岁即蒙古汗位,治世74年,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80而歿。生活于明代中叶的达延汗,一生战功卓著。他统一蒙古各部,分封子孙,奠定了后世蒙古各部的雏形,可称谓蒙古历史上的成吉思汗第三。

“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王越节制诸边乃率轻兵袭敌于贺兰山后,破之”(《明史·鞑靼传》《明实录》弘治六年元月戊子:“北虏部落被瓦剌杀散,住牧宁夏贺兰山后”)。这次战争是明朝宁夏守军和达延汗属部的一场争斗,战场在贺兰山后蒲草沟,即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明朝嘉靖年间,达



延汗的太师亦卜刺“复驻牧贺兰山后”多次与明朝宁夏守军发生摩擦。另据《边政考》所记,贺兰山后,东近宿嵬口边外为“王子下营处”。这里有“北杏园,北柳沟、蒲草泉、花果园”等处。以上记载又见于明弘治年间王越的奏疏,前后记载吻合。花果园、北柳沟等名称均沿用至今,根据地名可以确定“王子下营处”就在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边政考》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前成书,记载反映了达延汗统一事业由东而西扩展到阿拉夏草原,并一度将水草丰美的战略要地巴彦浩特作为王庭住地。

达延汗死后,由于以俺答汗为首的土默特蒙古的排挤,达延汗之孙卜赤汗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举部10万之众东迁,鄂尔多斯蒙古之一部徙牧阿拉善地。明嘉靖年间,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为鄂尔多斯部长,雄踞河套。在讨伐青海亦卜刺之后,“以10万之众屯贺兰山”。万历五年(1577年)以后,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嫡孙博硕克图济农之弟朝库尔台吉,圪赤圪台吉二人所属之众,住牧甘肃永昌边外昌宁湖一带,即今阿拉善右旗境内。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博硕克图济农次子彻辰济农多次行兵明地,均由“阿拉夏”前往。

贺兰山后住牧者,属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之孙著力兔台古的儿子们。著力兔死后,著力兔次子炒兔黄台吉住牧贺兰山后的长流水,蒲草泉等处,部落500多人,活动范围在贺兰山以西二三百里内,在清水营与明朝互市交换。另有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之孙宾兔一部千余人,在中卫厂互市,其住牧地当在现阿拉善左旗南部境内。《兵略》又载:“贺兰山后长流水,蒲草泉等处,是营名,离边二三百里不等,住牧酋首……炒哭儿即歹成,系丑气二弟,部落约一千有余,生二子,在中卫厂互市……每遇生事,问诸酋借兵”(见《明代蒙古史论集》日本和田清著,转引陈象明《兵略》后记。丑气即丑气把都儿,是吉囊第三子卫达尔玛次子海努克巴图尔诺延)。炒哭儿即歹成,系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第三子卫达尔玛之子阿恰昂都楞岱青,为鄂尔多斯蒙古之属。近百年来,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的后裔,鄂尔多斯蒙古之一部,休养生息在贺兰山后的阿拉夏草原。

明末清初之际,漠西额鲁特蒙古势力向东发展,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后裔徙牧阿拉善,受到卫拉特蒙古压迫的鄂尔多斯蒙古退居河套,形成左右两个后旗,即今杭锦和达喇特旗。清初,康熙帝将阿拉夏地封赐给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和罗理部住牧,并设旗管理。“阿拉夏”(阿拉善)地始纳入清朝版图,阿拉夏始变写为阿拉善之名渐著于世。有定远营碑记为证:“圣心轸念山后一带,切尽宁城,特移厄洛特郡王阿宝部落于西海,渡厄尔多斯七佐领于河东”。碑记不但证实了《兵略》的记载,而且印证了住牧人数。蒙古一佐领一般是150丁,七佐领1050丁,与《兵略》的部落一千有余基本相符。如果每家按三口计算,贺兰山沿山近边人口大约在4000以内。

二、永谢布人的足迹

永谢布人即明代史书中记载的永邵卜或应邵不人,其名初见明正统末年,明朝人的记录里也有亦卜刺是永谢布部长的说法,亦卜刺曾多次驻牧贺兰山后的阿拉夏。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分封子孙的时候,将儿子乌巴伞察分为永谢布的首领,但不久就被侄儿博第达喇所并,史载:“我托汉卜只刺台吉,营名永邵卜,宣府张家口边外正北,离边约二十日程,张家口互市”(《北虏风俗·世袭》明萧大亨撰,万历二十二年刻本),部落四万有余。我托汉卜只刺台吉就是博第达喇鄂托罕台吉,其子恩克跌儿歹成台吉是俺答汗的从子,为永邵卜最著名的大成台吉,在“俺答封贡”时曾受龙虎将军称号,此时永邵卜为蒙古四大强部之一。

正德年间以后,应邵卜万户分为十营,与阿尔秃斯、满官嗔共7万人联合入套,骚扰近边。但是,发展中的永谢布万户受到俺答弟老把都和辛爱黄台吉的制约而退居北部,不久开始由北向西推进,走向甘肃、宁夏边外。住牧东起“张家口大市场边外,西北接甘肃”的狭长地带。《武备志》卷208“镇戍甘肃条”引《兵略》言:“甘镇边外住牧夷人,西海(青海)离边三五百里不等,盘住夷人,酋首永邵卜乞庆黄台吉等,部落二万有余。住牧甘镇边外,在于宣府张家口互市领赏”。根据记载和阿拉夏草原无号发现的遗迹可以断定,永谢布人最早在正德年间以后开始进入阿拉夏游牧。由于势力不如老



把都、俺答、鄂尔多斯强大,只能屈居人下,留居边外不毛之地。总之,明朝中后期的阿拉夏被分为二,沿贺兰山一线边外二三百里以内,是鄂尔多斯蒙古的牧场,其外为永谢布蒙古的牧地。

万历十六年(1588年),永邵卜大举入侵西宁,杀明副总兵李奎。崇祯元年(1628年),永邵卜人丁兴旺,达30万人,势力强盛。清初,青海势力最强的部落就是永邵卜的七庆把都儿。在蒙古林丹汗西迁时,永邵卜本土横遭蹂躏。以后青海的永邵卜残部也被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所并,永邵卜从清初的历史记录中消失了。阿拉夏的永谢布人,一部分慕青海水草丰饶而西迁,余者无力抵抗额卫拉蒙古的扩张而为之所并。

自16世纪初到17世纪前期,永谢布人在阿拉夏草原住牧,足迹所至留下许多遗迹。在巴音诺尔公、台喀木哈达,绍不古尔哈拉到沙不干其的路上,均可见到这些遗存。永谢布人的后代现在仍然生活在阿拉夏境内,不过为数极少。布固图苏木扎海乌苏队的库烈图地方和嘉尔嘎勒赛汉苏木号亦尔乎都嘎就有其后裔。

明代永谢布人在阿拉善分布很广,他们一般靠山居住,有的也住在平地上。以石垒成院落,面积30平方米左右,内置帐篷,中间做灶坑。住房外面另筑有方形棚圈畜养牲畜,住地山上垒着求神拜佛的敖包。永谢布人还从事少量的农业生产,补充畜牧经济生活。石磨是永谢布人必备的生活用品,用来加工粮食、食盐等。丧葬习俗与众不同,死后埋在住屋附近的石板下,靠山者养子山腰的石圈中,贵族诺颜死后葬于石棺中,并有石磨陪葬。

三、明代的巴彦浩特和阿拉善蒙古的经济生活

巴彦浩特原名定远营,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是一座距今258年历史的古城。其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72处之隘口,为朔方之保障,沙漠的咽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早在明代中叶达延汗就曾以此为汗庭,遥控蒙古各部。

据史料证实,明代的贺兰山后,原有一座城,名曰:“大把都城”(《宁夏府志》清嘉庆三年版,卷三)。城的位置在今柳树沟以南,前后西花园以东,

南田蒲草沟以北。其确切位置不详,尚待进一步考证。另有一寺,名曰:“白发寺”。

明代王越奏言:“宁夏贺兰山后,地势旷远,水草便利。六七十年间,兵所不到。七八十里之外,虏得自由生养蕃息,久安乐土”(《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景印版,卷69《王威宁文集》)。明弘治年间,大把都城附近气候温和,风景秀丽,百泉流畅,水草遍野。南园北杏,花果园林。南北二沟,柳树成荫,一幅塞外江南的景色。蒙古首领的帐后“西垒低墙,栽有山果树木,并夜菜根苗”实乃久居之地。

明代阿拉夏蒙古占踞贺兰山下优良的牧地,由游牧走上定居住牧,根据“一时不得齐聚,先上马者约有三百骑”略计,当时常住巴彦浩特者,为一个鄂托克千户。蒙民战马自备,弓矢齐全。上马则备战斗,下马从事畜牧,实行“战牧结合”的政治体制。

“阿拉夏”蒙古“驼马牛畜遍野”,种类有驼、马、黄牛、牦牛、羊等,马、羊数量居多。畜牧业生产已达较高的水平。畜牧生产之外从事园圃式的农林生产,经营果园,种植蔬菜和粮食作物,以供自需阿拉夏蒙古的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由纯牧经济向半牧半农经济过渡。

战争所需要的盔甲、弓箭、腰刀、鞍仗、车辆能够自己生产。永谢布人还可以自制石棺、石磨,手工业生产已颇具规模。交换主要在部落内部家庭之间进行,有时在清水营、中卫厂与明朝互市贸易。

明代阿拉夏蒙古的园林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这在蒙古民族的经济生活中是少见的,反映了蒙古民族社会习俗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和蒙古社会的进步。

四、弘治十一年(1498年)的战役

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南梁坡巴彦浩特镇四校附近居民盖房,在地下一土坑内挖出三四十颗人头骨。据人们回忆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建旗以来,巴彦浩特并未发生如此重大事件。另则遗骨有首无身,不似正常死亡之人。据明代史料证实,距今490年前,这里曾经进行



了一场激战,人头或许是战争死难者的遗骨。

元亡以后,蒙古还居北方,与明朝构成对峙之势。朔漠屏障贺兰山成为阿拉善蒙古和明朝宁夏守军的必争之地。双方在均势之下,又以山为界各自镇守,并固定地界进行贸易交换。当互市受阻双方又借机偷袭,越山骚扰对方,造成紧张的边境局势。

弘治十一年(1498年)秋,明朝都御史总制陕西军马官王越率骑兵分三路,趁夜色从宁夏出贺兰山赤木、黄峡、宿嵬三口,入阿拉善境。历长流水、乱井、王谷堡、臭水井、歇凉亭等处到达南杏园、北杏园、南柳沟、荻芦室、双树儿等处,分兵南北二哨。官军于花果园附近和阿拉善蒙古300骑交战,阿拉善蒙古失利退却。南哨至蒲柳沟和阿拉善蒙古相遇,阿拉善蒙古7人背靠帐篷迎战,结果寡不敌众全部战死,余部突围后退却到西北沙窝边沿。南北二哨合兵追到“大把都”。此时蒙古骑兵分兵三路冲突明军,明军奋力抵抗,蒙古军队料不能后撤而去,明军追至“白发寺”。夜间,蒙古骑兵借沟岸的掩护由北向南偷袭明军,双方在柳树沟激战,这时明军的援军赶到,蒙古骑兵力不能敌,退到柳树沟以北。阿拉善蒙古屡战不利,失去家园,痛哭失声之后放火西去。

这次战役以明军胜利阿拉善蒙古暂时退出巴彦浩特而告终。明军斩获首级43颗,夺取骆驼19峰,马112匹,牦牛4头,黄牛54头,羊860只。旗号、盔甲,弓箭,腰刀、鞍仗,皮袄等物共1802件。

此次战役是明代史书确切记载的一场鏖战,战场在现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阿拉善蒙古战前无备,仓促应战,且“六七十年之间兵所不到……久安乐土”(《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影印版,卷69《王威文集》),战斗力减弱而败北。明军以优势兵力越界偷袭,焚烧帐幕,残杀幼童。使阿拉善草原蒙古牧民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横遭破坏,结束了山后六七十年间无战争的局面。

注:1498年战役参考《明经世文编》《嘉靖宁夏新志》《宁夏府志》《明史》等书。

贺兰山名考

丁世雄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的先民们,先后在贺兰山山后一带放牧定居。他们都曾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用本民族(或部族)的词语为这座宝山命名。由于这种历史的民族的诸多因素,使贺兰山一山而多名。除“卑移山”、“乞伏山”之外,至今较有影响者为“阿拉善山”。古今学者对此多有论及。国家正式出版的辞书,载有“贺兰山,主峰在宁夏贺兰县境内,山丘多青白草,遥望如骏马,蒙语称骏马为贺兰,故名”(见《辞源》第四册 1983 年北京版,第 2960 页)。还有“从平原望去,山脉宛如奔驰的骏马,蒙古语贺兰山就是骏马的意思”(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第 127 页)。读后,思之不得其解。“骏马”意为好马(良马)、快马。而蒙古语好马、快马的语音,都同“贺兰”毫不相干。即使是早期出版的《蒙古文学分类词典》(马匹类),对古籍中周穆王的“八骏”及其各“骏”名称的译音,也都与“贺兰”相去甚远。可以肯定:“贺兰”一词,既不是“蒙古语”,更不是蒙古语“骏马”。

有学者据《晋书》太康八年(公元 287 年)前后,匈奴有“贺赖”部等十九部落入塞,认为“贺赖”即“贺兰”,“兰,赖音转耳”;又据唐杜佑《通典》(766 年~801 年间)突厥条称“突厥骏马为曷拉,曷拉即贺兰。”把相隔 500 多年的两个部落(部族)的词语,一为部落,一为骏马,由于语音相近而等同地“转”为“贺兰”。这可以联系到匈奴语、突厥语有同源词或借词的语言事实,或系同源词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语意转变(部落——马),尚待研究。因为,据同



一部《通典》就有突厥“达官谓马为贺兰”的记载(见《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边防十三、突厥上第 1066 页)。这说明突厥语确有“贺兰”一词,无论是“突厥谓驳马为曷拉,曷拉即贺兰”,或是突厥“达官谓马为贺兰”,却都是突厥语,都是指马(并未涉及贺兰山)。

贺兰山这一名称,见诸史籍最早的是《隋书·赵仲卿传》。赵仲卿,天水陇右人也,……开皇三年(583 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弘出贺兰山(见《隋书》七十四卷,列传三十九第 1696 页)。而后的史书,就把贺兰山同各个时期山后(贺兰山西北一侧,全文同)的居民联系起来。

“蒙古”这一古族名,最早见于唐代史书记载,时称“蒙兀室韦”,两宋、辽、金时,史籍上有“萌古”、“滕骨”、“蒙古里”等不同的汉字音译。可是,这时的蒙古先民们不在贺兰山附近居住(游牧)。到公元 1271 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他们先后“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和肯特山一带(见《辞海》)。试想,蒙古人怎能“不远万里”跑到宁夏来为贺兰山命名呢?再从时间上说,元王朝建立之后,即 13 世纪中叶之后,蒙古民族逐步移牧贺兰山附近,而如上所说,“贺兰山”山名早在隋、唐史籍中就有了。那么蒙古人又怎能在他们到达之日的六七百年前就为贺兰山命名呢?

有元以前,史书记载贺兰山之名,均未与“蒙古”相联系。如《元和郡县志》载:“贺兰山在县(当时为灵武)西北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马为贺兰”(见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关内道灵武县——元和八年,即 813 年成书)。查《辞源》驳马条:(1)毛色青白相杂的马。(2)皮色青白相杂的树木。对此,陆机疏云:“驳马,梓榆也。其树皮青白驳犇,遥视似驳马,故谓之驳马”(见《辞源》3456 页)。这里以马比树,取其颜色之“青白相杂”。至于北人,当为突厥(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时期贺兰山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 年至 983 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载:“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遥望青白如驳马,北人呼驳马为贺兰,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今贺兰姓者皆以此名。”这里,除涉及鲜卑族有贺兰姓氏(也不排除同源词、借词之可能)之外,进而以北人之驳马比贺兰山,

仍取颜色“青白相杂”这一特点。

元、明时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贺兰山首见“阿拉善”之名（见该图集第7册）。这时的贺兰山后游牧氏族为“鞑靼”。鞑靼原为突厥统治下的一个部落，蒙古兴起后，鞑靼为蒙古所灭。元亡以后，明代又把东部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各部称为鞑靼。加之这一时期，贺兰山山前山后多发生氏族矛盾，明朝统治者厌恶少数民族。由于这一复杂的历史原因，故《明一统志》《嘉靖宁夏新志》对贺兰山的记述，均未提及“北人”和“驳马”。

然而，到了清代，贺兰山与蒙古语的关系就明显了。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宁夏府志》及道光九年（1329年）的《平罗纪略》，均记为“贺兰山，在县西北六十里，番名阿兰善山，……山之草树远望青碧如驳马，北人谓马之驳者曰贺兰，故名贺兰……”（见《平罗纪略》上册）。这里第一，承认前人记载的历史事实而又有所创见，“北人谓马之驳者”，着重指出马的毛色为青白相杂，这正是贺兰山苍松翠柏、青石白草、斑驳花杂的特色；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把“北人”同“番”加以区别，又相提并论，这时的“番”，当然是清朝对山后蒙古人较为客气的蔑称。这就明确地指出“阿兰夏山”以及《辞海》（1434页）“贺兰山，一称阿拉善山”，还有《蒙古游牧记》上的“阿尔山或阿拉山”等，统统是蒙古语“阿拉格山”。“阿拉格”本意为青白相杂的花色，也指这种毛色的马（见《蒙古文学分类词典》马匹毛片类）。这一点，还证诸《清实录》的记载，如：“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七（1686年12月27日）理藩院侍郎拉笃等疏言：臣等出宁夏阿喇克山，阅视地形……”（见吴忠礼、杨兴才主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上卷第50页）。这里的“阿喇克”，标准的译音应为“阿拉格”。显见，蒙古人在山后驻牧之后，对贺兰山的称呼，一种可能是他们直接观察山色后，用“阿拉格”这一恰当不过的词为贺兰山命名；另一种可能是他们把先前被称为贺兰（驳马）之山，用本民族词语意译过来，便成了“阿拉格山”（后者更合实际）。

至于“阿拉夏”、“阿拉善山”、“阿拉鄯山”、“阿拉山”等为什么都该是“阿拉格山”呢？这除了蒙古语本身方言土语在语音上的一些小差别外，还



有操汉语各方言的文人,由于对蒙语未经研究而译记有所出入。本来确切无疑的是“阿拉格”,意为“花山或花马山”,亦即“望如花(驳)马之山”,由于“阿拉格”一词在蒙古语里为两个音节,加上“山”共三个音节,而“山”只是一个词尾辅音,常读轻声,汉译时被省略(俗称略音),按汉字一字一个音节的规律,这个“阿拉格山”(清实录“阿喇克山”较为准确),本应译作“阿拉山”的,经“纯蒙化”为“阿拉善”了。再汉译时,为明“山”意而缀一“山”字,即成“阿拉善山”。此实为“山”在蒙汉两种语言互译中的音、意重叠现象。与这种构词形式相同或类似的地名、人名不乏其例。如贺兰山主峰“俄博屹塔”,就是蒙古语“敖包”加汉语“屹塔”。作为一个“山头”的名词,这两个成分是词意相同而重叠的。

还有“阿拉善旗”,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设。先有贺兰山的早期存在,继有蒙古人用本民族语为山命名(或译名),后有由山名而来的旗名。故“阿拉善旗”从来就写作“阿拉格山旗”。不管汉字怎样写,汉语怎样说,而蒙古人则说“阿拉格山旗”。因为,若把“阿拉善”当成纯蒙古语,那就谁也不知其词意了。

总之,“贺兰山”一名,见诸史记较早,使用范围较广,被认定为山之“正名”;而“阿拉格山”从元代首见于史籍,为山名之“又称”。至清康熙年间,它又以行政单位(旗)的名称载入史册了。

笔者历史知识贫乏,蒙古语荒疏多年,由于家乡赋予的责任感和县志工作的需要,斗胆质疑,备陈浅见,谨就教于方家。

阿拉善、额济纳旗历史由来

G·朝格图 白 晓

翻开史籍、档案便可知道,阿拉善、额济纳两个旗的历史由来与四卫拉特的历史有直接关系。清朝初时游移到现在的阿拉善、额济纳的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都是从四卫拉特的故地迁徙出来的。

四卫拉特,就是众所周知的绰罗斯(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等四部。卫拉特原来居住在蒙古高原北面的贝加尔湖地区。

从13世纪中叶起,卫拉特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忽必烈与海都之间的战争骚乱,逐渐移居到阿尔泰山西北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到了明代,他们日益强大起来,与蒙古黄金家族争夺政权之事屡屡出现。到了明朝末期,拥有4万之众的卫拉特部里有好几个部落,他们逐渐分为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大部落。那时准噶尔部驻牧在伊犁一带,和硕特部驻牧在今苏联境内的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一带,杜尔伯特部驻牧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驻牧在塔尔巴哈台附近。这些部落都以畜牧业为生,由部落首领统管,并在部落之间建立会盟以商定各部落间的纠纷和战事。16世纪末、17世纪初,四卫拉特由于人口剧增,牧畜增多,草场不够等原因,经四卫拉特联盟的许可,有的部落开始向外迁移,以扩大版图。

17世纪20年代末,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他的几万户部众,离开原居地塔尔巴哈台,沿额尔齐斯河而上,赴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玛努托海一带游牧。不久,原在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一带的和硕特部



落的鄂齐尔图车臣汗也带领一部分部众迁徙到阿拉套岭以西驻牧,和罗理带所属来阿拉夏山(现在的贺兰山)西北驻牧。和硕特部落的另一个首领图鲁拜琥固始汗,应西藏黄教之邀进军青海,并乘西藏内乱逐步占据了全藏。后来,图鲁拜琥固始汗的后代继承了祖辈的事业,分别在青海、西藏和阿拉夏山以西的西套一带进行统治。

一、阿拉善旗历史由来

清朝对于蒙古,系以盟旗制度为其分化羁縻之主要政策。盟下有旗,旗上有盟,唯本文所述之阿拉善旗则一特殊组织,为不属任何盟之独立旗,前清直辖理藩院,民国则直辖于行政院蒙藏委员会,与其他各盟之旗属于盟之情形大异。

考阿拉善旗为一特殊组织之原因,不得不追溯其历史沿革,阿拉善设旗以前,本为边裔民族游牧射猎之地,飘忽无定,代有播迁,其民族已不可考。

16世纪末、17世纪初,和硕特部首领兼四卫拉特盟长拜巴噶斯诺颜有两子,名叫鄂齐尔图车臣汗和阿巴赖诺颜。鄂齐尔图车臣汗带领和硕特部的部分部众到阿拉套山以西驻牧。拜巴噶斯之弟,即图鲁拜琥固始汗在青海、西藏进行统治。他有十子,其四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称达赖乌巴什。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原来就与其族兄(叔伯兄)鄂齐尔图车臣汗一起在今新疆的阿拉套岭、阿拉格乌拉(阿拉山口)以西驻牧。

17世纪前半叶,准噶尔部在巴图尔洪台吉担任首领期间,由于伊犁河流域水草丰美,畜牧业发展较快,逐渐成为卫拉特四部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1664年,巴图尔洪台吉之子僧格继任为准噶尔部首领。1671年,僧格在内乱中被杀。巴图尔洪台吉另一个在西藏出家当喇嘛的儿子噶尔丹闻讯立即赶到准噶尔故地,凭自己的勇猛智慧,并加之达赖喇嘛的支持,集合僧格旧部,平定了准噶尔的变乱,夺得了政权并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本部落内部统治巩固后,为统一卫拉特,扩张了领地。为此,鄂齐尔图车臣汗大为不满,于1676年,攻打噶尔丹而败,噶尔丹获得了部众和许多财产,并把鄂齐尔图车臣汗带回准噶尔,此后给鄂齐尔图车臣汗分了呼尔东古热庆部

为所属并指定了牧地。过了四年(1680年)以后,鄂齐尔图车臣汗在今苏联境内毕其河仙逝。巴延阿布该阿玉什之子和罗理,号巴特尔额尔克济农(固始汗之孙),为了援固始汗扩大卫拉特版图,经联盟准许,拔起草滩庐帐,带领自己的所属旗民万余人到了青海西藏助战。后来游牧在西套。

和罗理为了得到其地,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派使者向清朝进了贡。1682年,和罗理在他的母亲克楚尔(又写作克础勒)夫人以及和罗理的七弟土谢图罗卜桑分别派使者去京城上书请求牧地,并在甘肃、宁夏的边关互市贸易。当时理藩院以和罗理所属之民有抢劫掠夺行为暂未准许其做买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罗理诺颜请求清朝皇帝授予他官阶印章。清朝皇帝认为他游移无定且不管制自己的部属,故未授予。为此,清政府还派尚书阿尔奈到和罗理的部落去说明以上事由。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罗理诺颜亲自带着780人赴京城(北京)。康熙皇帝降旨,让其200人进了关,其余500人留在归化城(现在的呼和浩特)停候,并用羊和宣化府里的粮食来赏赐。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正月,和罗理到了京城,清廷以卫拉特大台吉的礼仪设宴为他洗尘,并赏给名贵的貂皮衣,清朝廷指定他在阿拉夏一带驻牧,希望和硕特部“相互辑睦,善自安乐”。从此,和罗理与自己的族兄之子罗布桑袞布拉卜丹一起移居到了阿拉夏地区。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的噶尔丹进攻喀尔喀,与喀尔喀的土谢图汗部齐洪道尔吉争牧地发生了战争,和罗理诺颜为帮齐洪道尔吉打噶尔丹而向清朝政府请援兵遭拒绝。其族兄之子罗布桑袞布拉卜丹率兵向喀尔喀进发,途中遇清朝使节官,被制止而退兵。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罗布桑袞布拉卜丹去世。他无子,将其部众交予额尔德尼之子噶尔丹道尔吉(堂兄),仍与和罗理诺颜一块儿驻牧于阿拉夏。此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朝廷派来传谕旨大臣拉都琥,作为奖赏将阿拉夏地区正式划给了巴特尔额尔克济农和罗理。

阿拉善和硕特者,系阿拉夏与和硕特二词组合而成,前者为地域之名称,后者为部落之名称。阿拉夏即贺兰山,亦即阿拉夏,均为语音之转,和硕



特本部,本属天山北路四卫拉特之一,清代称厄鲁特、额鲁特、厄洛特,四而一也。自和硕特部得诏永居阿拉夏后,康熙三十一年,清室遂援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编制佐领。于是阿拉夏和硕特旗之名改为“阿拉善和硕特特别旗”之名由此始立。

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威胁着阿拉夏的边界,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朝廷要将和罗理及部众内迁到归化附近,合并于察哈尔部落。和罗理诺颜久居阿拉夏,不愿迁移,并且率他的部众,掠夺了喀尔喀的丹津额尔德尼的牲畜,杀了其所属。清朝廷让驻防在宁夏的尼雅汉将军加强防守,并让其传谕旨给和罗理要他迁移到归化城附近。为此,尼雅汉将军率军前往,和罗理闻知以为尼雅汉将军率大军来问罪,谎称要在锡拉布尔都接旨,率其部众经呼和布口都,巴丹吉林逃往额济纳河。尼雅汉将军派使者说:“大军之来不是要讨伐你们,而是要你们迁移到归化城附近。”和罗理未从,尼雅汉将军追赶,俘获了他的许多族众和牲畜。和罗理知道自己有了罪,带着自己其余属下两千余户,逃到了叫做明干雅马图的地方。康熙皇帝得知晓谕说:“早先因和罗理来归顺,划分领地安置了他。他不思报恩,反而掠夺喀尔喀。让其移居察哈尔,他却违令远逃。朕向来以仁慈宽恕为怀,丝毫没有杀戮之意。你们想迁移到什么地方,任你选择,只是不得抢劫掠夺。”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派将军玛拉、侍卫阿南达去安抚和罗理。和罗理也请求归附。和罗理随玛拉将军到了宁夏。康熙帝下令让鄂尔多斯蒙古将其送到归化城。和罗理认罪以后宽恕了他,仍让他回到阿拉夏故地。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春,康熙帝亲自率领大军三路进兵讨伐噶尔丹。和罗理随大军在喀尔喀的昭莫多打败了噶尔丹。噶尔丹向四面撤退。为了防备噶尔丹经哈密逃入青海,警告青海和硕特众台吉的同时让梅林章京阿南达向哈密和甘肃的西边派兵设了哨卡。当时和罗理让所属部众在哈拉芒奈图、布朗克尔等地戒备,和罗理自己亲自带领1000兵在阿尔泰山之土鲁图防守。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鄂尔多斯的屯苏海这个地方正式授予和罗

理以朝廷的贝勒爵位以及札萨克印章,管辖其部落之众,并将其部命名为“阿拉善和硕特旗”,其下设佐,还规定此旗不属于盟管辖的特别旗,由理藩院直接管辖。此为阿拉善建旗之始。和罗理则是阿拉善旗第一任札萨克。阿宝为和罗理第三子。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皇帝以“重用”(实际上是人质)的办法命阿宝进京,被封为御前侍卫。同年朝廷赐婚,令其与皇族格格爱新觉罗鹅掌郡主(俗称道克欣公主)联姻,成为朝廷的和硕额驸。从此以后和罗理再也无法对抗清朝政府,完全归降与清朝政府。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和罗理卒。其三子阿宝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继承父王爵位,回到了阿拉善。

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噶尔丹之侄子、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以2000人的兵力攻夺哈密,清廷为加强防守,将从察哈尔、归化、黑龙江、索伦达斡尔、喀喇沁、鄂尔多斯调来的各部兵交予皇族费杨古指挥,驻防在喀尔喀的托河。又任命阿拉善札萨克贝勒阿宝为右卫将军参赞大臣,率本部落的500兵前往托河。同年,清朝皇帝降旨解散托河驻防,并又命阿宝为军机大臣偕同其兄之子辅国公罗布桑达尔吉,与西安的将军席柱一同前往巴里坤,攻打策妄阿拉布坦所占据的乌鲁木齐等地,所向克捷。他们前后在巴里坤等地驻军战斗达6年之久。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冬,西藏的拉藏汗被策妄阿拉布坦派遣的大策凌敦多布所袭杀。为此,清朝两次派大军进藏,征伐策凌敦多布。同时,派都统延信将六世真达赖喇嘛罗布桑嘎拉桑嘉木苏从青海护送到西藏即位。为护送六世达赖,又特任命阿拉善札萨克贝勒阿宝为延信将军的军务大臣,从新疆的巴里坤前往青海。阿宝从青海到拉萨大昭参与军务长达两年之久。雍正元年(1723年),为表彰贝勒阿宝军功,晋封其爵位为多罗郡王,并赏银1万两。雍正二年(1724年),青海的罗卜藏丹津(亦作罗卜桑丹津,和硕特固始汗孙)叛入准噶尔,青海发生了骚乱。阿宝奉旨率领部属从阿拉善迁到青海,平定了叛乱。为此,雍正皇帝将青海贝子罗卜藏丹津遗留下的博罗充科克之地赏给阿宝作为牧地。但他嫌这个地方狭窄,擅自到乌兰穆伦栖居。雍正七



年(1729年),由朝廷治罪,降多罗郡王爵位。但过了不久,雍正九年(1731年)十二月以西路军功复封多罗郡王爵位。阿宝在青海先后住了8年之久后,清朝皇帝念其原来的功绩,让其迁回阿拉善,赏定远营城给他居住。

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降旨给准噶尔的噶尔丹策凌汗(策妄阿拉布坦之子),令他速将逃到准噶尔已有数年的罗卜藏丹津送来,并且为了给噶尔丹策凌汗施加压力,清军分北、西两路向准噶尔进军。阿拉善郡王阿宝也接旨,要他率自己的军队和另拨给他的1000名士兵到新疆的巴里坤与西路军汇合。同时,给阿宝的长子、二等台吉袞布500兵,命他也前往巴里坤军前效命,与大将军岳钟琪的1万兵汇合。雍正八年(1730年),噶尔丹策凌汗让自己的塔布囊(驸马)率2万兵冲进清西路军的胡协图哨长,抢走近5000匹马,1000峰骆驼。清军哨兵力战七昼夜,阿宝之子袞布和鄂尔多斯台吉丁占拉希的军队助战,打退了噶尔丹策凌之子的反清军队,夺回部分牲畜。雍正九年(1731年)阿宝之子袞布从巴里坤撤回全部军队回到了阿拉善。与此同时,西路将军岳钟琪将袞布在战斗中效忠尽力的功绩呈报了皇帝,为此,雍正皇帝晋封袞布以辅国公,奖赏银财,并把此事告知了其父阿宝。雍正十年(1732年)又将袞布从辅国公晋升为固山贝子,赏戴三眼花翎,收为御前侍卫,居住京城。

乾隆四年十月(1739年11月),阿宝去世,次子罗卜藏多尔济袭札萨克多罗贝勒爵位,居于京城。乾隆十五年(1750年),与朝廷皇族格格联姻,成为朝廷的额驸。乾隆二十年(1755年),罗卜藏多尔济从京城回阿拉善时,赏戴双眼花翎,以示恩宠。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拉善札萨克贝勒郡王罗卜藏多尔济接令,率精兵500,准备了驼马粮草,从西路向新疆,到了巴里坤。那时正是卫拉特部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策妄阿拉布坦之外孙)发动反清叛乱的紧急时刻。阿睦尔撒纳活动在博罗塔拉一带。札萨克郡王罗卜藏多尔济和梅林章京爱隆阿兵分两路到了塔尔巴哈台。当时,辉特部的巴雅尔汗利用山势之险逃跑,罗卜藏多尔济紧追6天。途中有200多名哈萨克族兵挡住了去路。

罗卜藏多尔济一马当先率几名骑士勇猛地冲了上去，哈萨克兵心惊胆战，请求投降，辉特部的巴雅尔汗也被罗卜藏多尔济活捉。罗卜藏多尔济在战斗中出生入死，立了军功，晋封多罗郡王，同时还被授予议政大臣。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廷命阿拉善札萨克郡王罗卜藏多尔济与车布登扎布将军一起出发征讨哈萨克。当时罗卜藏多尔济体弱有病，让他离开军队回阿拉善养身，同时乾隆皇帝为他尽忠效力的功绩赏赐了三眼花翎和黄马褂。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罗卜藏多尔济向平定回(南)疆维吾尔上层贵族分子大小和卓木起兵反清叛乱的大军送5000只羊作为军粮。

乾隆三十年(1765年)，根据罗卜藏多尔济对朝廷尽忠效力军功卓著，屡次以少胜多，晋封为和硕亲王，赏给玄狐皮衣和橙色缰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奉乾隆皇帝的命令，率500亲兵到兰州，与清朝大军一起镇压青海循化撒拉族苏四十三领导的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起义军大败于华林寺。对此，乾隆皇帝又下令将其亲王爵位定为世袭。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乾隆皇帝赏赐给罗卜藏多尔济之子，一等公台吉旺沁班巴尔以双眼花翎、黄马褂、紫红缰绳，纳为御前侍卫，让其住京。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旺沁班巴尔接受了银川新城清朝军队的梅林章京、协同管辖额济纳旗的职务。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旺沁班巴尔与宁夏梅林章京一起镇压了甘肃通渭石峰堡回民田五为首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之后，继承其父罗卜藏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是年，与贝勒之子的格格联姻成为旗额駙。格格病死以后再与皇族五阿哥公的格格联姻成为朝廷额駙。朝廷授给旺沁班巴尔之弟玛哈巴拉(又作玛哈巴尔)一等台吉爵位。从此以后直至达理札雅阿拉善的社进入平稳发展。

二、阿拉善旗札萨克王继位时间

1. 第一代札萨克王——和罗理(生年不详，卒于1707年)。即巴颜阿布该阿玉什长子，号巴特尔额尔克济农，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697年~1707年)在位10年。



2.第二代札萨克王——阿宝(约1686年生,卒于1739年10月)。和罗理三子。号孟根阿宝,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四年(1709年~1739年)在位30年。

3.第三代札萨克王——罗卜藏多尔济(生于1734年,卒于1783年8月)。阿宝次子,号博克达诺彦,乾隆四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39年~1783年)在位44年。

4.第四代札萨克王——旺沁班巴尔(约生于1755年,卒于1804年)。罗卜藏多尔济长子,号布尔罕诺彦,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九年(1784年~1804年)在位20年。

5.玛哈巴拉(约生于1760年,卒于1832年)。旺沁班巴尔胞弟,号阿其图诺彦,嘉庆九年至道光十二年(1804年~1832年)在位28年。

6.第五代札萨克王——囊多布苏隆(生于1780年,1844年卒)。玛哈巴拉长子,号葛根诺彦,道光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四年(1832年~1844年)在位12年。

7.第六代札萨克王——贡桑珠尔默特(生年不详,1876年卒)。囊多布苏隆独子,号呼毕勒罕诺彦,道光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年(1844年~1876年)在位32年。

8.第七代札萨克王——多罗特色楞(生年不详,卒于1910年)。贡桑珠尔默特次子,号呼图克图诺彦,光绪二年至宣统二年(1876年~1910年)在位34年。

9.第八代札萨克王——塔旺布理甲拉(1870年生,1931年7月23日卒)。多罗特色楞长子,号乌鲁希叶勒图诺彦,宣统二年至民国20年(1910年~1931年)在位21年。

10.第九代札萨克王——达理札雅(生于1908年1月6日,卒于1968年11月28日)。塔旺布理甲拉长子,民国20年至民国38年(1931年~1949年),在位18年。解放后任旗长、宁夏省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盟盟长等职,于1968年去世。

三、额济纳旗的由来

前面提到的土尔扈特部的首领和鄂尔勒克诺颜带领所属几万户,于17



世纪 20 年代末沿额尔齐斯河而上,到遥远的伏尔加河下游的叫做玛努托海(又作玛呢图噶图勒)的地方游牧。和鄂尔勒克有六子,长子书库尔岱青,次子伊勒登诺颜,三子罗卜藏诺颜(又称罗卜桑诺颜)。土尔扈特部落虽然生活在遥远的俄罗斯地区,但始终未忘记自己的故土。顺治十二年(1655 年),和鄂尔勒克的长子书库尔岱青派锡喇鄂木布为使者,向清顺治皇帝呈表进贡。顺治十三年(1656 年),和鄂尔勒克诺颜的次子伊勒登将锡喇尼和硕齐作为使者派往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 年),和鄂尔勒克诺颜的三子罗卜藏及其子多尔济派遣使者沙克锡布特、达尔汉乌巴什阿巴刺等,以挑选出来的驼、马 200 余匹向清朝进贡,此外还牵马千余匹到归化城开设马市贸易。书库尔岱青的儿子朋楚克、朋楚克的儿子阿玉奇世世代代为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到了阿玉奇这一代,始自称汗。以前,书库尔岱青为其子朋楚克娶了留在故乡的巴图尔浑台古的女儿为妻,生了阿玉奇,并养育在巴图尔浑台吉那里。后来书库尔岱青诺颜到西藏熬茶礼佛,返回时途径准噶尔,将阿玉奇带回土尔扈特。阿玉奇有一姐一妹,姐姐嫁给喀尔喀蒙古的莫日根汗额热亥,妹妹嫁给了和硕特部的鄂齐尔图车臣汗,鄂齐尔图车臣汗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阿玉奇汗的长子沙克都尔扎卜为妻。1676 年,鄂齐尔图车臣汗与准噶尔的噶尔丹宝什格图战乱中,鄂齐尔图车臣汗之妻多尔济阿喇布坦同准噶尔的阿其图曲尔吉和土尔扈特使者一起回到了土尔扈特,靠其兄阿玉奇为生。噶尔丹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叔叔。噶尔丹汗被清朝大军战败于喀尔喀的昭莫多之后,于康熙四十年(1701 年)三月病故;他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为汗,将全新疆纳入其控制之下。准噶尔部的绰罗斯氏本来与土尔扈部有姻亲关系。1698 年,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将其女儿嫁给策妄阿拉布坦为妻时,阿玉奇汗让他的三子散扎布率部众 15000 余人同往游牧。1701 年,策妄阿拉布坦也将自己的女儿达尔玛巴拉嫁给阿玉奇为妻。但策妄阿拉布坦与阿玉奇之间立场不同,有意留住阿玉奇的三子散扎布及其 15000 余人,久久不准回伏尔加河牧地。阿玉奇汗怒,坚决而再三交涉,才将散扎布放回,但尽夺其 15000 余名部众,不让返回。由此,阿玉奇汗和策妄



阿拉布坦汗的关系恶化,矛盾越来越尖锐。

1698年,阿喇布珠尔经叔父阿玉奇之托,与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率领500兵和一部分部众,从土尔扈特的玛努托海出发,到西藏达赖喇嘛那儿熬茶礼佛。阿喇布珠尔一行走得很慢,到西藏大昭拜见了达赖喇嘛,住了近5年之后返回来时,清政府以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与阿玉奇汗结了仇,归途被堵等为由,将阿喇布珠尔留住,阿喇布珠尔无奈,派特使到北京“乞内附”。康熙皇帝为了“笼络”他,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划嘉峪关外的党河、色尔腾、马海一带(今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作为牧地,并封为固山贝子。从此以后,固山贝子阿喇布珠尔就成为额济纳旗的始祖。

阿玉奇与策妄阿拉布坦结仇后,策妄阿拉布坦多次拦劫阿玉奇去清政府的使者,绝其贡路,因而,阿玉奇不得不另觅新的通道。于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派遣萨穆坦等人,带上土特产,假道沙俄的西伯利亚经喀尔喀蒙古的库伦,历尽两年半的旅途艰辛,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才到达北京进奉表贡。为此,康熙皇帝对土尔扈特蒙古的一片忠诚深为感动,也派使团前往,使团成员有: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新满洲噶扎尔图、朱邱及、内阁侍读图理琛。此外,还有阿喇布珠尔派回阿玉奇和他父亲纳扎尔玛穆特处的卫拉特人舒哥、朱斯等人组成。同行的还有3名随从武官,22名家仆,共计32人,使团的首领是太子侍读殷扎纳。图理琛本来不是使团的首领,但由于出使回国后,将经历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异域录》一书,该书问世后,曾驰名中外。因此,后来人们就把这个使团通称之为“图理琛使团”,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公认。

内阁侍读图理琛的使团于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1712年6月23日)从北京出发,前往阿玉奇汗的牧地玛努托海。图理琛的使团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于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一日(1714年7月12日),抵达阿玉奇驻地。阿玉奇汗以重礼迎接了他们。图理琛还会见了阿喇布珠尔之父纳扎尔玛穆特,并说想要将阿喇布珠尔遣回,以便与亲人团聚。阿玉奇汗和纳扎尔玛穆特说:阿喇布珠尔已受重禄,并有了栖居之地,我们是很放心的。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朝为防备策妄阿拉布坦而整军备战,并命土尔扈特的阿喇布珠尔率兵500从军效劳,让其驻防在噶斯(在青海省境内)。不久阿喇布珠尔就去世,其子丹忠袭贝子爵位。

雍正初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嗣立后,也多次发动军事事变,先后两次进袭喀尔喀。雍正七年(1729年),丹忠参加了清政府讨伐噶尔丹策凌的军事行动。是年,丹忠到京,雍正皇帝晋封其为多罗贝勒。雍正九年(1731年),丹忠的部下莫尔根绰尔济叛变,投靠了准噶尔的噶尔丹策凌,丹忠非常害怕,为避免准噶尔部的骚扰,向皇帝请求向内迁移(想移居黄城滩草边),清政府允其所求,派大臣扎拉汗嘎指定阿拉克乌拉、马鬃山一带驻防,可他嫌地太狭窄,再求迁移到了额济纳河一带,为此清政府正式批准其求地。

乾隆五年(1740年),多罗贝勒丹忠谢世,其子罗卜藏达尔扎继位。罗卜藏达尔扎尚幼,由理藩院特派大臣代罗卜藏达尔扎管理其部众。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政府授罗卜藏达尔扎札萨克印,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正式成立。但罗卜藏达尔扎年幼,尚不能处理札萨克事务,仍派官暂时代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于理藩院呈报罗卜藏达尔扎已学会管理札萨克事务,因此朝廷撤回委派的代理官,由罗卜藏达尔扎亲自管理额济纳土尔扈特札萨克事务。

四、额济纳旗札萨克王继位时间

1.第一代旗王——阿喇布珠尔(生年不详,卒于1716年)。纳札尔玛穆特之子,康熙四十三年至康熙五十五年(1704年~1716年)在位12年。

2.第二代旗王——丹忠(生年不详,卒于1740年)。阿喇布珠尔长子,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五年(1716年~1740年)在位24年。

3.第一代札萨克王——罗卜藏达尔扎(生年不详,卒于1767年)。丹忠长子,乾隆五年至乾隆十八年(1740年~1753年)在位13年,乾隆十八年正式命札萨克王至乾隆三十二年(1753年~1767年)在位14年。

4.第二代札萨克王——旺札勒车凌(生于1743年,卒于1812年)。罗卜



藏达尔札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67年~1783年)在位16年。(1783年~1810年的27年中未出继位人)。

5.第三代札萨克王——东德布才仁(生年不详,卒于1812年)。旺札勒车凌次子,嘉庆十五年至嘉庆二十七年(1810年~1812年)在位2年。

6.第四代札萨克王——巴雅尔莽奈(生年不详,卒于1841年)。东德布才仁长子,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一年(1812年~1841年)在位29年。

7.第五代札萨克王——达什车楞(生年不详,卒于1869年)。巴雅尔莽奈之子;道光二十一年至同治八年(1841年~1869年)在位29年。同治八年(1869年)遭马化龙义军杀害,因此其夫人执旗政4年之久。

8.第六代札萨克王——丹津(生年不详,卒于1892年)。达什车楞侄子,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八年(1873年~1892年)在位19年。

9.第七代札萨克王——乌勒哲依巴达尔呼(生于1865年,卒于1925年)。丹津长子,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2年~1899年)在位7年。1899年因叔父桑结之迷惑让位。

10.达什(生于1858年,卒于1930年)。即乌勒哲依巴达尔呼堂弟,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19年(1899年~1930年),在位31年札萨克王。

11.第八代札萨克王——图布新巴雅尔。达什长子,民国19年至民国27年(1930年~1938年)在位8年。

12.塔旺嘉布——图布新巴雅尔四弟,民国27年至民国38年(1938年~1949年)在位11年。解放后先后任旗长,副盟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于1960年病故。

阿拉善盟的历史沿革

石有田 李正德

阿拉善盟成立于1980年5月1日。所辖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1961年前为阿拉善旗)及额济纳旗3个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其行政区划变动甚大,曾分别属于宁夏省(1958年以前),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管辖。在历史上,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又是同属于卫拉特蒙古的两个不同的部落,因此,阿拉善盟的历史沿革,须从两个旗的角度分别述之。

一、阿拉善旗

按:1961年前,因阿拉善旗尚未分开,故历史沿革统称“阿拉善旗历史沿革”,1961年后,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分别叙述。

“阿拉善”是“贺兰山”的音转。贺兰是匈奴族一部落名,或是一种姓氏或也是地名。据《圣武记》(卷三)记载:“阿拉山即贺兰山,皆语音之转,地在河套以西”。

阿拉善为蒙古族和硕特部的居住地,其祖系元太祖之弟哈巴图哈萨尔。元初定都图拉河时,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西,天山以北,设驼、马、牛、羊四大牧场,各置牧官,管理其后裔,繁衍为四部,即: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即史书所称“四卫拉特”或“四瓦特”,也音讹成为厄鲁特四部,各领所部,不相统属。据记载:“和硕特可汗固始汗有子十六人,因避准噶尔之乱,移牧宁夏者十二人,长名和罗理,携帐万余,避居阿拉善”。

阿拉善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曾相继是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



纥、吐蕃、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地。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和罗理率和硕特部迁至阿拉善地区后,遂上表清廷,以示归顺,并请求牧地,清王朝于是将贺兰山以西地方赐给和硕特部为其牧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王朝又将和硕特部落按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编为阿拉善和硕特旗,阿拉善和硕特旗之定名,即是地名与部落名的合一。

置旗后编佐领、赐印授札萨克,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这便是阿拉善王公制度的开始。旗辖8个苏木。《清史稿》中有这样的记载:“阿拉善厄鲁特部,至今京师五千里,东鄂尔多斯,西额济纳,南宁夏、凉州、甘州,北逾瀚海接塞音诺颜,扎萨扎克图盟,袤延七百余里,即贺兰山地驻蒙古”。和罗理的儿子阿宝与孙子罗卜藏多尔济在当时额鲁特部落中战功最著,阿宝曾随年羹尧平定西藏,罗卜藏多尔济曾随军讨平阿穆尔撒纳,故此清王朝对阿拉善旗的优待远远超越诸“卫拉特”之上。雍正皇帝以定远营赐给阿宝居牧以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罗卜藏多尔济尚多罗格格,授多罗额駙,后因功晋为和硕亲王,容其在北京建王府,成为罗王府。罗卜藏多尔济勇敢善战,当时相当有名,故今沙金套海一带尚有从征时受降的哈萨克人的后代,后此部分人虽入籍,不过大部分仍信仰伊斯兰教。

阿拉善和硕特旗成立之初,王府驻在紫泥湖(今锡林高勒公社驻地附近)。

阿拉善和硕特旗直属清朝理藩院管辖。王爷可以自由进出北京皇宫。第四代王爷旺沁班巴尔曾被封为御前行走兼镇守宁夏等处地方副都统。

雍正八年(1730年)置定远营城。雍正十年(1732年),第二代王阿宝将王府迁至定远营。嘉庆二十年(1815年),在8个苏木下设34个巴格,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又增加到36个巴格。

民国时期,阿拉善和硕特旗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管辖。包括达理札雅在内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共历九代十王。

1949年9月23日阿拉善和硕特旗和平解放,成立了阿拉善和硕特旗人民政府。1950年划归宁夏省,成立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辖阿拉善旗、

磴口县。1952年,将带有侮辱性名称的自治区驻地“定远营”改为巴音浩特。1953年将8个苏木合并为6个苏木,36个巴格未变。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后,阿拉善旗自治区划归甘肃省,并改名为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1956年4月3日,设巴彦淖尔盟,驻巴彦浩特(巴盟成立时,改巴音音译为巴彦)。并设巴彦浩特市。同时,巴彦浩特蒙古自治州更名为阿拉善旗,连同额济纳旗、磴口县、巴彦浩特市同属巴彦淖尔盟。1958年盟公署迁址,撤销巴彦浩特市建制,改为巴彦浩特镇。公社化时,撤销苏木、巴格,将全旗划为20个公社,1961年4月,阿拉善旗分划为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两个旗。

二、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旗分划后,阿拉善左旗旗府仍驻巴彦浩特镇。同年进行了社队建制调整,共有23个人民公社。1969年,阿拉善左旗连同阿拉善右旗的5个人民公社一同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1970年阿拉善左旗设3个区,并建立了吉兰泰镇。1971年又成立呼鲁斯太镇。1979年7月1日阿拉善左旗又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80年成立阿拉善盟,盟公署驻巴彦浩特镇。阿拉善盟辖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

三、阿拉善右旗

阿拉善右旗建立于1961年4月,是由阿拉善旗分划出去的。阿拉善右旗成立初,旗府驻地雅布赖。阿拉善右旗辖8个苏木;5个公私合营牧场;1964年划分为12个人民公社,总面积为81400平方公里。

1979年7月,阿拉善右旗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80年5月阿拉善盟成立,与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同归阿拉善盟管辖。不久北部塔木苏布鲁格、笋布尔、阿拉腾敖包3个公社又划归阿拉善右旗,至此,阿拉善右旗共辖10个人民公社,1个镇,2个牧场,总面积为7.52万平方公里。

1965年,旗政府驻地由雅布赖迁至上井子,即今额肯呼都格镇。额肯呼都格镇位于东大山西侧,北靠沙漠,南临岱山,西接巴音高勒滩。额肯呼都格镇东西长2公里,南北宽2公里,驻有旗、镇两级所属90多个单位,人口达6000余人,是阿拉善右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



阿拉善旗历代区域沿革表

(截至 1982 年末)

地区 项目	阿拉善旗(包括今阿拉善右旗)
春秋	北狄牧地。
战国	匈奴牧地。(阿拉善旗地域属月氏)
秦	匈奴牧地。
西汉	匈奴右贤王牧地。
东汉	乌桓、鲜卑、羌、匈奴等族逐牧地。
三国、魏	乌桓、鲜卑、羌、匈奴等族逐牧地。
西晋	秃发、鲜卑牧于阿拉善旗西北部;匈奴贺兰部牧于贺兰山西部,匈奴铁佛部牧于阿拉善旗东部;鲜卑、拓跋部游牧出没于阿拉善旗东部。
前后赵 前后秦 夏	阿拉善旗东部、北部为柔然部游牧地。西南部为秃发、鲜卑牧地。
北魏、西魏、北周	北魏、西魏时为柔然牧地。 北周时为柔然、突厥牧地。
隋	突厥、达头可汗牧地。
唐	唐初、回纥、突厥诸部来此,末期、吐蕃、党项来此游牧。
五代	吐蕃、回纥、党项等杂处。
宋	吐蕃、党项、回纥、鞑靼、阻卜诸部游牧地。
西夏	吐蕃、党项、回纥、鞑靼,阻卜诸部游牧。然地属西夏国兀刺海路;并设有贺兰山坚军。
金	吐蕃、党项、回鹘、鞑靼,阻卜诸部游牧。然地属西夏国兀刺海路;并设有贺兰山坚军。

疆域沿革与民族活动



(续表)

(截至 1982 年)

地区 项目	阿拉善旗(包括今阿拉善右旗)
元	蒙古部落牧地。
明	蒙古部亦卜剌因火筛、月氏、著力兔楂汉胡墩先后占据此地。
清	蒙古卫拉特和硕特部由和罗理率领据此,1697 年清同意建阿拉善和硕特旗,旗府在紫泥湖,1732 年迁旗于定远营,阿拉善旗直属清廷理藩院。
中华民国	民国时期,阿拉善旗直属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
疆域沿革与民族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	<p>1949 年 9 月 23 日阿拉善旗和平解放,成立阿拉善和硕特旗人民政府。1950 年划归宁夏省,成立阿拉善蒙古自治区(兼辖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1954 年宁夏省建制撤销,阿拉善蒙古自治区划归甘肃省,改名为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1956 年设巴彦淖尔盟,并设巴彦浩特市,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更名为阿拉善旗。1958 年盟公署迁址,撤销巴彦浩特市。1961 年 4 月阿拉善旗分划为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两旗。1969 年阿拉善左旗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省。1979 年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80 年成立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均归阿拉善盟所辖。</p>



阿拉善旗(包括今阿拉善右旗)
人民公社化前苏木(区)、巴嘎(乡)名称一览表

苏木(区)和现地址		巴嘎(乡)数	巴嘎(乡)名称和现地址
苏木(区)名称	现地址		
一苏木	巴镇西关	7	巴伦别立、克布那木嘎(通古淖尔公社)、素木图(木仁高勒公社)、宗别立、乌图(木仁高勒公社火炬大队)、布固图(哈拉乌布古图)、厢根达赖
二苏木	察汗布鲁格	7	号依尔呼都格(嘉尔嘎拉赛汉公社)、扎哈道兰(温都尔图公社)、通湖(腾格里公社)、艾尔克哈什哈(哈什哈公社)图兰太(伊克尔公社)、察汗淖尔(伊克尔公社)、察汗布鲁格
三苏木	和屯池	5	巴音布尔都(豪斯布尔都公社)、巴音乌拉(吉兰太公社三大队)、吉兰泰、沙尔布尔都(锡林高勒公社)、库克布尔都(豪斯布尔都公社)
四苏木	雅布赖	5	巴丹吉林(阿拉善右旗、莎尔台公社)、艾力布盖(阿拉善右旗艾力布盖公社)、雅布赖(阿拉善右旗雅布赖公社)、树贵(阿拉善右旗塔木苏公社)、宗乃(阿拉善右旗塔木苏公社)
五苏木	巴拜嘎休	6	拐子(额济纳旗温图高勒公社)、巴伦沙尔扎(阿拉善右旗笋布尔公社)、宗沙尔扎(乌力吉公社)、图克木、红古尔玉林、巴音诺尔公
六苏木	敖龙布鲁格	6	哈鲁乃(敖龙布鲁格公社)、克布尔(敖龙布鲁格公社)沙金套海(现巴彦淖尔盟磴口县沙金套海公社)、道兰素海(巴音木仁公社)、磴口(巴音木仁公社)、巴音套海(现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境内)

阿拉善旗人民公社化初期巴嘎、苏木变更一览表

按：据 1958 年 3 月 4 日旗民字第 52 号阿拉善旗人民委员会“关于规定新巴格名称及撤销原苏木、并将巴格改为苏木的通知”称：

“关于我旗合并巴格以后的新名称问题……由盟人民委员会 1958 年 2 月 17 日盟民字第 0026 号文批准……关于 20 个巴格改为 20 个苏木作为基层一级政权机关问题亦经巴盟人民委员会批准……”

原有 6 个苏木公署，选举工作结束后予以撤销……

新苏木名称	合并后的巴格名称
巴音树贵	乌图、布固图、巴伦别立
宗别立	宗别立
克伯那木嘎	克伯那木嘎
嘉尔嘎勒赛汉	号依尔呼都格、厢根达来
查汗布鲁格	查汗布鲁格、艾尔克喀什哈
温都尔勒图	扎哈道兰、通湖
图兰太	图兰太、查汗诺尔
锡林高勒	沙拉布尔都、素木图
豪斯布尔都	巴音布尔都、库克布尔都
巴音吉兰泰	巴音乌拉、吉兰泰
雅布赖	雅布赖
塔木素格布鲁格	宗乃、树贵
巴音温都尔	巴丹吉林、艾力布盖
乌力吉笋布尔	宗沙尔扎、巴伦沙尔
巴音红古尔	图克木、红古尔玉林
巴音诺尔公	巴音诺尔公



(续表)

新苏木名称	合并后的巴格名称
敖龙布鲁格	科伯尔、哈鲁乃
哈腾套海	沙金套海、巴音套海
巴音木仁	磴口、道兰素海
温图高勒	温图高勒

注:本表 20 个新苏木即为公社化初期的 20 个公社名称。

阿拉善左旗 1970~1980 年区、社名称一览表

区名和驻地		公社数	公社名称
区名	驻地		
第一区	乌力吉	7	塔木素、笋布尔、乌力吉、银根、图克木、阿拉腾敖包、巴音诺尔公
第二区	吉兰泰	6	红古尔玉林、敖龙布鲁格、巴音木仁、乌素图、庆格勒图、吉兰泰
第三区	嘉勒尔赛嘎汉	6	喀什哈、伊克尔、查汗布鲁格、嘉尔嘎勒赛汉、腾格里、温都尔图
旗府属	巴彦浩特	7	宗别立、木仁高勒、锡林高勒、通古淖尔、巴伦别立、厢根达来、巴彦浩特镇



四、阿拉善和硕特部历史概述

阿拉善旗全称为“阿拉善和硕特旗”。而阿拉善系由“贺兰山”音转得名。贺兰山,又名阿拉善山或阿拉克夏山。

阿拉善旗属和特硕部。和特硕部与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统称卫拉特四部。当土尔扈特西迁俄罗斯境内以后,才补以原隶杜尔伯特之辉特。

和硕特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之后,姓博尔济吉特氏,故为台吉贵族。与科尔沁、郭尔罗斯、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扎赉特、杜尔伯特、乌刺特八部均是一个系统。上述八部为哈布图哈萨尔七世孙阿克萨噶勒泰长子阿鲁克特木尔之后,而和硕特部则为阿克萨噶勒泰次子乌鲁克特木尔之后。乌鲁克特木尔七传至固实青桑。自固实青桑又四传至巴尔斯图鲁拜琥,巴尔斯图鲁拜琥因征服西藏有功,于清世祖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被册封为彻辰固始汗。彻辰固始汗俗称格根因始汗,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固始汗。

清朝初年,固始汗据有青海之地,后进兵西藏,在降服西藏诸汗之后,为使黄教得以发展,固始汗将汗印授予五世达赖喇嘛。从而使政教统一,喇嘛教在西藏得到巩固。

固始汗第三子巴颜阿布该阿玉什,号达赖乌巴什。巴颜阿布该阿玉什,共有十六子,长子为和罗理,号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即阿拉善旗的第一代王。

和罗理初和噶尔丹部的噶尔丹博什克图同住一个地方。噶尔丹起兵以后,和罗理率数千户东迁,来到阿拉善这块地方,奏请归顺,清政府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廷援内蒙四十九旗之例,置旗偏佐领,赐授札萨克,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阿拉善旗由此而来。

和罗理之子阿宝,从小居于北京,并为御前侍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尚和硕格格(娶公主和硕格格为妻),授和硕额駙。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和罗理死,康熙四十八(1709)其子阿宝袭职。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阿宝率兵远征准噶尔。复又奉命护送达赖喇嘛入藏,故阿宝先后在青海、西藏统兵居住达8年之久。



雍正元年(1723年),阿宝晋多罗郡王。雍正八年(1730年),在贺兰山以西设立定远营城,以为镇守之地。雍正九年(1731年),阿宝由青海返回,即以定远营赐之(定远营即今巴彦浩特)。

乾隆四年(1739年),阿宝死。当年阿宝次子罗卜藏多尔济袭职为札萨克多罗贝勒(按当时清制,受封者再没有得到“世袭罔替”的优待前,继位袭爵须降一等)。乾隆十二年(1747年),尚多罗格格,受多罗额驸。并奉命从征准噶尔诸部,由于战绩显赫,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晋位为多罗郡王,授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年(1765年),晋爵和硕亲王(俗称罗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诏“世袭罔替”。至此,罗卜藏多尔济时代是阿拉善旗的盛世,为阿拉善旗王中最知名的一位,故后代台吉多取名的音首,以罗为姓。

康熙四十八年(1783年),罗卜藏多尔济死。同年长子旺沁班巴尔袭位。自旺沁班巴尔至解放前阿拉善最后一代亲王达理札雅,共六代七王,若从和罗理算起,则共计九代十王(详见阿拉善旗王位世袭表)。

阿拉善旗除王爵外,受封的还有两个公爵,现分述如下:

其一,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和罗理次子玉木楚木,以其“平准有功”受封为辅国公。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玉木楚木次子罗卜藏达尔济袭职,罗卜藏达尔济因随阿宝远征准噶尔有功,晋爵为镇国公(俗称西公或南公)。康熙六十年(1721年),玉木楚木长子沙毕尔多尔济袭位,雍正元年(1723年),亦因随阿宝入藏以及平策凌有功,晋爵为和硕贝子。乾隆二年(1737年),沙毕尔多尔济从弟(堂弟),袭楚克隆位为辅国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因平准、回有功,复晋位为镇国公。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袭楚克次子多尔济色布腾袭职,后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诏“世袭罔替”。从多尔济色布腾至解放前的最后一位镇国公密格瓦其尔共五代六公,若从玉木楚木计起则为七代九公(详见阿拉善旗公爵世袭表一)。

另一公爵,则为阿宝之后裔。雍正九年(1731年),阿宝长子衮布受封为辅国公,雍正十年(1732年)亦以“平准有功”,晋位为固山贝子。乾隆二年(1737年),阿宝第三子拉尔吉旺舒克袭位。乾隆六年(1741年),以再从弟



索诺木多尔济降袭镇国公(俗称东公或北公)。乾隆三十年(1765年)索诺木多尔济长子乌固尔逊袭位。从索诺木多尔济至塔旺策林共五代七公,若从衮布算起则共六代九公(详见阿拉善旗公爵世袭表二)。

阿拉善旗历代王位世袭表

代序	与前代王关系	袭位人	袭位时间	在位时间	谥号
一代		和罗理	康熙二十五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686年~1707年)	21年	巴图尔额尔克济农
二代	三子	阿宝	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四年(1709年~1739年)	30年	蒙滚阿宝
三代	次子	罗卜藏多尔济	乾隆四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39年~1783年)	44年	博克达诺彦
四代	长子	旺沁班巴尔	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九年(1783年~1804年)	21年	布尔罕诺彦
	胞弟	玛哈巴拉	嘉庆九年至道光十二年(1804年~1832年)	28年	阿其图诺彦
五代	长子	囊多布苏隆	道光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四年(1832年~1844年)	12年	葛根诺彦
六代	长子	贡桑珠尔默特	道光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年(1844年~1876年)	32年	呼毕勒罕诺彦
七代	次子	多罗特色楞	光绪二年至宣统二年(1876年~1910年)	34年	呼图克图诺彦
八代	长子	塔旺布理甲拉	宣统二年至民国20年(1910年~1931年)	21年	乌鲁希叶勒图诺彦
九代	长子	达理札雅	民国20年至民国38年(1931年~1949年)	18年	

说明:

阿拉善旗主位世袭共九代十王。其统治时间从康熙二十五年至民国38年(1686年至1949年),计263年。若从阿拉善正式编旗、封爵算起,则应从康熙三十六年始(1697年),至民国38年(1949年),计252年。



阿拉善旗镇国公世袭表(一)

代序	与前代公爵关系	袭位人	袭位时间	在位时间
一代	(和罗理)次子	玉木楚木	康熙三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三年 (1698年~1714年)	16年
二代	次子	罗卜藏达尔济	康熙五十三年至康熙六十年 (1714年~1721年)	7年
三代	胞兄	沙巧尔多尔济	康熙六十年至乾隆二年 (1721年~1737年)	16年
	从弟	衮楚克	乾隆二年至乾隆三十二年 (1737年~1767年)	30年
	次子	多尔济色布腾	乾隆三十二年至道光三年 (1767年~1823年)	56年
四代	长子	普布尔	道光三年至咸丰二年 (1823年~1852年)	29年
	三弟	萨达布多尔济	咸丰二年至同治四年 (1852年~1865年)	13年
五代	长子	阿育尔扎那	同治四年至光绪三十年 (1865年~1904年)	39年
六代	长子	普勒忠尼萨尔	光绪三十年至民国14年 (1904年~1925年)	21年
七代	长子	密格瓦其尔	民国十四年至民国38年 (1925年~1949年)	24年

说明:本公共七代十公,从康熙三十七年至民国38年(1698年~1949年),计251年。

阿拉善旗镇国公世袭表(二)

代序	与前代公爵关系	袭位人	袭位时间	在位时间
一代	(阿宝)长子	袭布	雍正九年至乾隆二年 (1731年~1737年)	6年
	三弟	拉尔吉旺舒克	乾隆二年至乾隆六年 (1737年~1741年)	4年
	再从弟	索诺木多尔济	乾隆六年至乾隆十年 (1741年~1745年)	4年
二代	长子	乌固尔纳逊	乾隆十年至嘉庆二年 (1745年~1797年)	52年
三代	长子	莽噶拉	嘉庆二年至嘉庆十九年 (1797年~1814年)	17年
四代	子	德勒格尔布彦	嘉庆十九年至咸丰五年 (1814年~1855年)	41年
	次子	沙都尔扎都	咸丰五年至光绪二十二年 (1855年~1896年)	41年
	从子	塔旺诺尔布	光绪二十二年至民国1年 (1896年~1912年)	16年
	再从子	塔旺策林	民国二年至民国27年 (1913年~1938年)	25年

说明:本公共四代九公,最后一公塔旺策林于民国27年(1938年)卒,此后再没续爵。故从雍正九年至民国27年(1731年至1938年),计207年。



五、额济纳旗

额济纳旗,原名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元朝以前,因境内有海,史册中一直称为“居延海”或“居延泽”。历代所置郡县,也都称为“居延”元朝时改为“亦集乃”,明朝时沿用,直到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才开始使用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的名称。

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的名称系由地名“额济纳”与旗名(或称为蒙古部落)“土尔扈特”联合而成。“额济纳”与“亦集乃”音转而成。蒙古语中“额济纳”与“亦集乃”音极相类似,而“亦集乃”或者是由“居延海”转变而来。因旧土尔扈特人曾在俄国境内迁回新疆,后又移居“居延海”后,遂将自己的居住地成为“额济勒”后由音转“勒”为“纳”,才成了今天的额济纳。元朝定都图拉河时,于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以西,天山以北,设驼、马、牛、羊四大牧场,各置牧官,管理其后裔,繁衍为四大部落,即: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和杜尔伯特。现在额济纳土尔扈特即是原土尔扈特部蒙古由新疆迁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后有返回祖国的原土尔扈特部。

额济纳旗为古匈奴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征北方2000余里,路过的居延就是现在额济纳,这是历代王朝进入额济纳的开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强弩将军路博德筑城于居延泽上,以控匈奴势力。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居延到浚稽山,居延一带,这里就是汉兵与匈奴交战的前线,也是汉朝新开的疆土。汉安帝时置居延县,属于张掖节制,居延才正式归入汉朝版图(约在公元107年~公元前25年)。建安时(公元196年~公元220年),改为西海郡,晋朝时沿用西海郡名。南北朝时沦为柔然,隋、唐时属于突厥,宋朝为西夏所辖,曾建立威福军。近人在黑城子宝塔中,曾获得西夏文字经典多册,元时收入元朝版图后,置亦集乃路,曾设立总管府。《元志》记载:“亦集乃在甘洲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连沙碛,乃汉西海郡”。明洪武初(1370年左右),冯腾拔肃州进至扫林山亦集乃路,指的也是这里。后又沦于鞑靼,清朝初又收入清朝版图。雍正七年(1729年),赐给土尔扈特部为游牧之地,属甘州节



制。民国初期,1929年划甘肃的宁夏道与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一起成立了宁夏省。

土尔扈特人初游牧于新疆天山以北,后为避准噶尔叛乱,率30万众迁居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后历经千难万险,回到祖国,为祖国各民族团结、统一作出了贡献。

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后,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受封于清朝,其始祖翁罕的后裔纳扎尔穆特之子阿喇布珠尔被封为固山贝子,赐牧色尔腾。康熙五十五年(1761年)阿喇布珠尔的长子丹忠袭位,被封为多罗贝勒。雍正七年(1729年),传至第九代达什,于民国1年(1921年),晋位郡王衔。最后一代为图布新巴雅尔之弟塔旺嘉布,共传十代十二王。

额济纳旗与阿拉善旗一样,在清朝时直属清廷理藩院,民国时属行政院蒙藏委员会。1928年虽划宁夏区域内,但实际上在行政方面于宁夏省并无隶属关系,后又归甘肃省代管。

初设旗政府时,下设4个巴格,每个巴格下设“达尔伽”若干人,每“达尔伽”为十户之长。

1949年9月27日,额济纳旗和平解放,成立了额济纳旗,属甘肃省酒泉地区管辖。1952年归宁夏省管辖。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由甘肃酒泉地区代管。1956年巴彦淖尔盟成立,额济纳旗属巴盟管理。1969年8月复归甘肃省酒泉地区。1979年归内蒙古自治区,1980年5月1日阿拉善盟成立,额济纳旗归阿拉善盟领导。

额济纳旗人民公社化前，
巴格(乡)、苏木(区)变更一览表

巴格(乡)名称和驻地	改建后的苏木(区)名称
第一巴格 (现青山头一带)	巴音宝格德
第三巴格 (现孟格图大队所在地)	吉日宝拉格
第四巴格 (现赛汉淖尔大队所在地)	色日高勒
第五巴格 (现达来湖波镇附近)	吉日嘎朗图

说明:额济纳旗解放前先后成立 5 个巴格(乡),其中第二巴格(乡)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布利雅特蒙古牧居额济纳旗后成立的,其后随着本部落的迁走而撤销。并把一、三、四、五巴格(乡)撤销,成立了 4 个苏木(区)。



六、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历史概述

额济纳旗全称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而额济纳系由“亦集乃”音转而得名。(元代曾在今额设“亦集乃路”)。

额济纳旗属“土尔扈特部”，并与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合称四卫拉特。当土尔扈特西迁俄罗斯境内以后，方补以原属杜尔伯特部之辉特。

土尔扈特蒙古，是中国西北部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自古以来，他们以“游牧为业，逐水草而居，不事耕耘”。约在16世纪末叶，卫拉特蒙古始分成四部，并形成了卫拉特四部联盟，当时，虽然产生了以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为盟主的联盟，但由于其生产和生活的特点、四部仍旧处于分牧而局，部自为长的状态，分牧于天山、阿尔泰山、巴尔喀什湖的广大地区。

本来，四部联盟的目的，是在“达尔伽”(盟主)的主持下来解决四部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以及联合防御外敌。然而，随着各部人口的增长和牲畜繁殖，在以游牧为业的各部之间，必然出现为扩大牧地而产生的矛盾和争夺。在封建社会里，游牧民族中心必然出现的这类冲突，对一个松散的联盟来说，各统所部之间的实力发展，打破了维持联盟的原有平衡，从而出现了各部实力对比的新变化。

17世纪初，准噶尔部实力不断增长，因而严重威胁着以和硕特部首领作为联盟盟主的地位，威胁着卫拉特其他各部。尤其是巴图尔浑台吉(噶尔丹之父)恃其实力强大，不但目无其他各部，并试图兼并土尔扈特部。为此，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与准噶尔部的巴图尔浑台吉不和，两部关系也随之恶化。为不屈属于准噶尔部而丧失本部的独立与尊严，土尔扈特部终于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率其所部西迁。

土尔扈特部西迁的另一个原因，还来自沙皇俄国扩张的威胁。17世纪初，当沙皇俄国的势力扩张到西伯利亚时，便开始了与土尔扈特等卫拉特各部不断接触，为妄图达到吞并卫拉特蒙古各部及其牧地，侵占中国西北领土，沙皇俄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1607年至1609年沙皇俄国先后两次派代表团到卫拉特游牧部落，以“不入俄国国籍”不准土尔扈特部在额尔

齐斯河流域游牧,对和鄂尔勒克进行威胁,以及要求卫拉特各部“发誓忠于沙皇”。对沙皇俄国的无理要求,遭到卫拉特各部的一致拒绝,并围攻了沙俄的军队反击了沙俄的侵略。为避免与准噶尔部发生冲突和摆脱沙俄的侵略袭扰,土尔扈特部不得不逐渐西迁。大约历经 14 个春秋方越过哈萨克草原,渡乌拉尔河,于 1630 年来到这块水草丰美的广大牧场,打算在这里建立独立汗国。

1642 年,沙俄利用准噶尔部与土尔扈特部之间的矛盾,唆使巴图尔浑台吉与沙俄共同进攻土尔扈特,但沙俄的这一阴谋遭到了巴图尔浑台吉的拒绝。面对沙俄的侵略与威胁土尔扈特蒙古不但没有屈服,而且攻打了俄国重要的城市阿思特拉罕,不幸的是和鄂尔勒克在攻城战中战死。

和鄂尔勒克死后,其子书库尔岱青继位。书库尔岱青对沙俄的态度同其父是一样的,他们公开宣称“永远不当谁的奴隶……,不怕任何人”。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优良传统。

面对难以征服的土尔扈特部,沙皇俄国自然不会甘心,于是,他们从精神上(改变宗教信仰)和加重经济、兵役负担的手段来削弱其力量,妄图把土尔扈特部变为“己属”,然而这只不过沙俄的幻想而已。事实是,17 世纪 60 年代,土尔扈特人积极参加了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领袖拉辛领导的反抗沙皇统治的农民起义,接着又于 1706 年、1708 年两次袭击了阿思特拉罕的各部落以及奔萨斯卡亚和坦波夫斯亚等城镇,沉重地打击了沙俄的统治。

在反抗沙俄斗争的同时,土尔扈特部也更加怀念祖国和故乡,自西迁伏尔加河后一直与清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

顺治三年(1646 年),书库尔岱青,罗卜藏诺颜向清政府进表贡“附名以达”。

顺治十二年(1655 年),书库尔岱青遣使直接同清朝建立联系后,便不断遣使进贡。

顺治十四年(1657 年)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遣使向清朝政府“贡



驼马二百余”清朝政府还根据他们的请求以及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同意他们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进行马匹贸易以及到青海、西藏熬茶供佛。

噶尔丹起事以后,土尔扈特部参与了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阿玉奇“遣宰桑以所部兵千”防守于阿尔泰山之土鲁图,使噶尔丹不敢返回伊犁,噶尔丹死后,阿玉奇遣使“入贡庆捷”。

阿喇布珠尔入藏礼佛,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返回时,其路被准噶尔所断,便“遣使至京师,请内属”,清朝政府即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色尔腾(今甘肃西北部)。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敦罗布拉什(阿玉奇之子),遣使吹扎布等,历时三年艰辛,返回祖国,向乾隆奉献贡品、方物、弓箭袋。乾隆赐宴于热河行宫万树园。并派官员护送吹扎布到西藏礼佛。

从以上事例可以清楚的说明,身在异乡的土尔扈特部虽然远离祖国,但始终没有屈服于沙俄,并一直认定自己是祖国的成员之一。

沙皇俄国对土尔扈特人民残酷的阶级和民族压迫,终于促使他们下定决心,重返祖国。在首领渥巴锡的组织领导下,经过一番秘密筹划以后,终于于乾隆三十六年一月五日(1771年2月19日),开始举行举世闻名的武装起义并踏上了重返祖国的东归征程。数以万计的土尔扈特人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皑皑的白雪在跃马横刀的骑士们护卫下浩浩荡荡前进。随后,他们把所有不能带走的东西烧毁、遗弃,辽阔的草原烈火冲天,浓烟滚滚,愤怒的土尔扈特起义者杀死了居住在他们中间的数以千计的俄国外交官和商人,歼灭了赶来营救的沙俄军队。17万人的东进队伍在渥巴锡组织下只用了8天时间就通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河草原,把尾追的沙俄军队远远抛在后面。然而,在进入哈萨克草原时却遭到了哥萨克的突然袭击,9000名战士在这一激战中壮烈牺牲。二月初,东进队伍在奥琴峡谷再一次与哥萨克军队遭遇,这一次在渥巴锡的亲自指挥和全体将士勇猛攻击下,几乎全歼哥萨克军队,彻底粉碎了哥萨克军队的拦截。之后,又与追兵几经血战,终于于七月初(8月中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行程万余里,及至到达伊犁,17

万人,只剩下八九万人,损失近半。这一罕见的英勇壮举,将永远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见证。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以后,由于长途跋涉,衣衫褴褛,几乎丧失了所有牲畜。对此,清政府给予了妥善安置,在(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中记有:牛马羊 20 万余头,米麦 4 万多石、茶 2 万其封,羊裘 5 万多件,棉布 6 万多匹,棉花近 6 万斤以及毡庐等。并封爵,渥巴锡为卓理克图汗(勇敢、英勇之意),渥巴锡所部是和鄂尔勒克的后裔,旧称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

而额济纳旗亦旧称土尔扈特,但不在十旗之内。额济纳旗为上述东路右旗纳木策凌之后,纳扎尔玛穆特之后裔,纳扎尔抹穆特原游牧于伊济勒河(伏尔加河),其子阿拉布珠尔假道准噶尔赴唐古特(西藏)谒达赖喇嘛,返回时,其路被准噶尔丹所断,只好留嘉峪关外,并遣使京师,请内属,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封阿拉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色尔腾,雍正九年(1731 年),游牧于阿拉克山等处,后定牧在额济纳河,这就是额济纳旗的由来。额济纳旗自清代以来,一直是独立旗。王公世袭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附:额济纳旗王位世袭表)



额济纳旗历代王位世袭表

代序	与前代公爵关系	袭位人	袭位时间	在位时间
一代	纳扎尔玛穆特之子	阿喇布珠尔	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五年 (1704年~1716年)	12年
二代	子	丹忠	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五年 (1716年~1740年)	24年
三代	子	罗卜藏达尔扎	乾隆五年至乾隆三十二年 (1740年~1767年)	27年
四代	子	旺扎勒东凌	乾隆三十二年至嘉庆十五年 (1767年~1810年)	43年
五代	子	东德布才仁	嘉庆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 (1810年~1812年)	2年
六代	子	巴雅尔莽奈	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一年 (1812年~1841年)	29年
七代	子	达什车楞	道光二十一年至同治八年 (1841年~1869年)	28年
八代	侄	丹津	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八年 (1873年~1892年)	19年
九代	子	乌勒哲依巴达尔呼勒	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五年 (1892年~1899年)	7年
	堂弟	达什	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十九年 (1899年~1930年)	31年
十代	子	图布新巴雅尔	民国19年至民国27年 (1930年~1938年)	8年
	弟	塔旺嘉布	民国27年至民国38年 (1938年~1949年)	7年

说明:

额济纳旗自阿拉布珠尔始到塔旺嘉布止共传十代,十二王。自康熙十一年(1704年)至民国38年(1949年)共245年。

七、巴彦浩特镇

巴音浩特镇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古城重镇。位于阿拉善左旗的东部,贺兰山西麓,隔山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相望,四周与布格图公社(1982年成立)相连。地理位置在东经104度44分,北纬38度50分处。镇区面积为30公里。辖5个蔬菜大队,设有8个居民委员会,共有街道小巷58条,镇人民政府设在南大街西侧。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镇共居住31309人。其中:蒙古族4721人,回族3074人,达斡尔族37人,藏族22人,壮族5人,土族3人,满族162人,汉族23279人。

巴彦浩特(原名定远营),汉语意为“富饶城市”。以镇内有“巴彦陶海”之地而地名。据考证,有近300年的历史。雍正八年(1730年),为稳定西北的蒙古组部落,岳钟琪奏请清王朝建坝守城,名“定远营”。据定远营碑文记载:“贺兰山北,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隘口,奏旨特设一营、诏曰定远”。作为清王朝驻军镇守之地,雍正九年(1731年),阿拉善第二代王因功晋为郡王,并招为驸马,以后其子罗卜藏多尔济袭职并晋为亲王,在北京设“罗王府”,并仿照北京颐和园之式兴建了王府、寺院。王公住宅也是北京式的四合院,因而定远营又享有“王府街”,“小北京”的美称。民国时期,定远营是阿拉善和硕特旗王府驻地。1949年9月23日阿拉善和平解放,成立了“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隶属于宁夏省,并于1952年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废除了带有侮辱性的“定远营”名称,决定从1952年10月1日起将地名改为“巴音浩特”。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阿拉善旗划归甘肃省。同年,经国务院批准取消阿拉善旗自治区,成立了,成立了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府驻地巴音浩特。1956年4月3日,国务院关于设立“巴彦淖尔盟”的决定将巴音浩特镇改为“巴彦浩特市”(旗县级),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由巴彦淖尔盟管辖。1958年撤销了巴彦浩特市的建制,改为巴彦浩特镇。1961年阿拉善旗又分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阿拉善左旗府仍驻巴彦浩特镇。

巴彦浩特镇地势东高西低,西北两侧突起,由东向西形成了一个冲积



扇形坡地,三条河沟蜿蜒穿过镇区,平均海拔 1350 米。

巴彦浩特因靠近贺兰山区,得天独厚,气候温和,空气湿润,小范围的水汽循环,优于沙漠戈壁地区。南北走向的贺兰山脉,利于空气抬升,绝热冷却,使西来雨区在山前滞留,形成降水。年降雨量在 216 毫米(1977 年前的平均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阿拉善旗各族人民备受蒋介石、马鸿逵军队的压迫和剥削、民不聊生,街市萧条,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几家小作坊、商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老的“王府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观全城,宽阔的柏油路把西花园和老陵滩连接起来。北起“王府街”十字路口,南至一校门口的南大街,长 680 米,宽 12 米至 14 米,经 3 座桥,连通南梁街,是本镇的主干街道和经济文化中心,建有电影院、影剧院、文化馆等文化娱乐场所。三道桥附近有农贸市场,日用百货、五金等商店,并与西花园街、新华街、王府街相连。昔日的“老陵滩”旧貌变新颜。宽阔笔直的街道,两旁建筑井然有序。东西走向的额鲁特东路,长 2320 米,宽 16 米,连接南北走向的 8 条街道,盟级 43 个单位分设在两旁。

在巴镇镇区内有小学 8 所,中学 5 所(民族中学两所),中等专业学校 4 所,共有学生 9270 人,教师 794 人,专业文艺团体有,盟文工团、阿拉善左旗乌兰牧骑。旗镇两级均有医院、保健站,共有医护人员 262 人,病床 147 张。

镇区内的盟、旗、镇属工厂企业有 21 个,主要生产地毯、毛纱、制革裘皮制品以及水泵、木器等。历史悠久的仿古地毯,原料优良,工艺精湛,富有民族特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还有机械维修、农机器具维修,商品加工,房屋建筑等行业。商业服务网点 57 处,主要有畜产、百货、医药、副食、蔬菜等行业。林业也有较快发展,1981 年造林 124 万亩,育苗 55 万亩,果树面积达 124 万亩。镇区有水库 9 座,涝坝 11 座,蓄水量达 93 万立方米,管道总长 4305 米。因受降雨影响,往往冬春季水有余,夏秋季水不足,干旱年缺水。

多年来,工、农、林、牧各业生产有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1981年农牧业生产总收入222.2万元,人均收入241元。

巴彦浩特交通便利,有通往银川市、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卫市、石嘴山市、青铜峡市的公路,是连接全旗27个公社的交通枢纽,是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党政机关所在地,是阿拉善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阿拉善左旗人民公社、大队名称一览表

公社和驻地名称		大队数	大队名称
公社	驻地		
木仁高勒	水磨沟	12	苏木图、跃进、前进、水磨沟、塔尔岭、巴音塔拉、伊克尔、火炬、二道岭、香池子、东风
巴伦别立	腰坝	7	腰坝、塔塔水、贺兰、红旗、白石头、沙拉库代、哈拉木台
巴音吉兰泰	吉兰泰	7	召素套勒盖、哈大湖都格、图格里、乌足力别力格、苏里图、查汉敖包、巴图尔布鲁格
宗别立	宗别立	7	光明、红旗、富泉、黎明、芒乃、星光、柳树沟
豪斯布尔都	阿拉湖都格	8	陶力、巴音布尔都、沙拉布鲁格、苏海图、和屯淖尔、拉塔图、阿拉湖都格、林业大队
巴音木仁	联合	9	乌兰布和、陶勒格、红卫、中滩、巴音套海、联合、好来宝、巴音树贵、林业大队
嘉尔嘎勒寒汉	头道湖	9	西尼乌素、阿格乌素、查汉鄂木、浩依尔呼都格、巴音布鲁格、乌兰呼都格、艾门高勒、乌兰泉吉、社办林场
巴音诺尔公	巴音诺尔公	6	哈拉毛台、查汉敖包、通格图、都尔勒吉、巴音毛道、伊克布鲁格
温都尔图	温都尔图 (营盘水)	6	德力乌兰、塔本呼都格、巴音温都尔、红旗、巴音布鲁格、西滩社办林场
腾格里	腾格里	5	乌兰哈达、特莫乌拉、哈拉木台、永红、通湖林场
庆格勒	乌兰胡书	7	庆格勒图、敖尔格湖、乌锡勒格、呼和温都尔、巴音布鲁格、查汉温都尔格、社办林场



(续表)

公社和驻地名称		大队数	大队名称
公社	驻地		
锡林高勒	紫泥湖	5	查汉布鲁格、沙拉布尔都、扎哈布鲁格、淖尔套、新井
哈什哈	乔家当铺	3	乌日图霍勒、巴音淖尔、乌尼格图
伊克尔	伊克尔	6	沙拉呼鲁斯、巴音克勒、格丁、图兰太、查汉淖尔、社办林场
查汉布鲁格	查汉布鲁格	5	查汉布鲁格、扎格图、东都高勒、浩图高勒、敖那图
厢根达来	木井子	4	上海、巴音朝格图、巴音温都尔、哈根高勒
乌力吉	巴音毛道	3	巴音塔拉、温都尔毛道、查汉扎德盖
敖龙布鲁格	刺窝子井	5	金星、和平、查汉德尔苏、巴音哈拉、宝特汉乌素
乌素图	乌素图	5	乌兰木头、苏海图、东风、查汉布鲁格、呼日宝日勒格
图克木	巴音毛道	4	西尼乌素、巴音毛道、图克木、淖干塔拉
通古淖尔	通古淖尔	7	特莫图、英格图、贡湖都格、巴音套海、铜格图、通古淖尔林业队
银 根	达兰图如	3	查汉扎德盖、达兰图如、科伯
红古尔玉林	阿德勒阿门乌素	3	德尔图、巴音温都尔、额兰套勒盖
巴彦浩特镇	巴彦浩特	14	东关、西花园、后西花园、西关、南田、春发号、红石头、巴音库岱、柳树沟、扎海乌素、博格图、索海图、金星、巴镇林场

阿拉善右旗人民公社、大队名称一览表

公社和驻地名称		大队数	大队名称
公社	驻地		
孟根布鲁格	呼德胡都格	5	锡林布鲁格、宝日陶勒盖、故日本呼都格、额肯呼都格、呼德胡都格
雅布赖	雅布赖	2	巴音笋布尔、希尼呼都格
莎尔台	巴音诺尔	5	吉日格尔图、伊和呼都格、巴丹吉林、努尔盖、哈日勃热格
艾力布盖	敖伦布拉格	4	乌兰塔塔拉、敖伦布拉格、沙布日台、苏布日格
巴音温都尔	额肯呼都格	3	巴彦勃热格、查干图恩格、苏海图
阿拉腾朝克	吉格德 (沙口)	3	那仁宝力格、查干德尔素、吉格德
努尔盖	高家窑	4	阿拉腾塔拉、呼和乌拉、诺宝宝力格、高家窑
笋布尔	布尔都	4	阿门乌素、布日都、恩格尔乌素、故日本图拉格
塔木苏布鲁格	哈拉布日格	5	呼舒其、布勃克木德格、阿拉腾图雅、乌仁图雅、格日勒图
阿拉腾敖包	查干诺尔公	6	查干诺尔公、吉勒勃热格、贡都赖、阿日嘎朗太、巴彦塔拉、巴彦套核
额肯呼都格镇	额肯呼都格	1	额肯呼都格



额济纳旗人民公社、大队名称一览表

公社和驻地名称		大队数	大队名称
公社	驻地		
赛汉桃来	赛汉桃来	7	赛汉桃来、藏查干、赛汉淖尔、孟格图、巴音塔拉、莹石矿、电厂
古日乃	古日乃	2	乌力吉图、乌兰淖尔
苏古淖尔	苏古淖尔	7	乌兰图格、亚布图、策克、巴音布勒格、布日格德、巴格吉格德、旗党校、良种场
温图高勒	拐子湖	2	巴音高勒、格日格图
吉日嘎朗图	吉日嘎朗图	5	乌苏荣贵、乌仁图亚、乌兰格日勒、那仁宝勒格、额肯查干牧场
巴彦桃来 (农场)	巴彦桃来	10	一连、二连、三连、四连、五连、六连、七连、八连、机务工副业队、砖厂

注：此稿行成于 1983 年，文中所列数据，行政区划均为 1982 年底统计数据，特此说明。



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史简易

刘洪贵

一、部族起源与王公系谱

蒙古族是我国诸多民族的重要一员。明清之际,我国蒙古族大体分成三大部分: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与漠西蒙古。漠西蒙古亦称西蒙古,清代谓之厄鲁特蒙古,或称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是杜尔本卫拉特四部蒙古之一。

土尔扈特作为卫拉特蒙古的一个部族,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根据托忒文资料记载,土尔扈特起源于克列特,直到该部臣服于成吉思汗时,克列特才开始改称土尔扈特。土尔扈特一词与克列特有着密切联系,克列特一词,有“包围”、“警卫”的含义,当客列特部臣服成吉思汗后,大部人曾充任成吉思汗的护卫,因此,客列特便被改称土尔扈特,即托忒文中的“护卫军”之意。

早在9世纪至10世纪,土尔扈特先祖克列特部,游牧于图拉河、鄂尔浑河一带,曾被辽国征服。在中外史籍中,多认为土尔扈特的先祖是克列特部首领王罕(亦作翁罕)。王罕,名叫脱斡邻勒,是忽儿札忽思依不亦鲁黑六子之一。当其父死后,他在与兄弟夺权斗争中,曾得到铁木真和他父亲的支持,得到汗位,因此脱斡邻勒与铁木真父子结成“安答”。到宋庆元二年(1196年),铁木真又随脱斡邻勒汗帮助金国打败了塔塔儿部,于是金国封脱斡邻勒以王位,遂与原有汗号合称为王罕(翁汗)。



土尔扈特蒙古历经元、明两朝代,其部族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史载甚鲜。不过自王罕以下土尔扈特部贵族世系,尚有祁韵士《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其始祖“曰翁罕(王罕),翁罕子阿尔萨兰,阿尔萨兰子阿木胡朗,阿木胡朗子克依祁(奇旺),克依祁子素赛,素赛子巴依尔,巴依尔子马哈齐蒙克。马哈齐蒙克子二:长贝果鄂尔勒克,次翁贵。贝果鄂尔勒克子四:曰珠勒扎斡尔勒克、曰卫袞察布察齐、曰阿兰阿噶勒琥、曰莽海。珠勒扎斡尔勒克子一,曰和鄂尔勒克,为旧土尔扈特部祖”。可见自王罕至和鄂尔勒克,土尔扈特部贵族世系共十代,而旧土尔扈特部始祖,则是和鄂尔勒克,亦即率部西迁第一位首领。

额济纳土尔扈特部世祖阿喇布珠尔,乃是本部始祖和鄂尔勒克二世孙纳札尔玛木德之子,系阿玉奇的堂侄。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阿喇布珠尔陪同其母从俄境回国后,因返回时道路受阻,便臣服清廷,封为固山贝子,游牧于党色尔腾。到雍正九年(1731)年,阿喇布珠尔卒其子丹忠继位后,内迁到额济纳,并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受札萨克印,始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自1731年丹忠率部入主额济纳,到1949年末代王爷塔旺嘉布率部起义投诚,归顺新中国,历时218年,额济纳旧土尔扈特蒙古王公相传八代,有十二位郡王世袭。

二、始祖西迁异域

额济纳土尔扈特世祖阿喇布珠尔,其子丹忠——额济纳第一代王爷,按王公世系年代推断,都出生在俄境伏尔加河下游牧地。他们既没有先人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的经历,也没有参与后人渥巴锡率部回归的壮举。但是额济纳土尔扈特演变史,同其本部历史演变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是这支英雄民族的一部分。

自土尔扈特部归顺元朝、直到明代,其部族发展历史,史料记述甚少。到15世纪初,王罕第四代孙克依祁(奇旺),率部加入卫拉特蒙古以后,土尔扈特的历史,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未加入卫拉特蒙古时,土尔扈特部族是在阿尔泰山以东,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游牧。由于当时东蒙



古势力强大,不断进攻本部,只好从漠北地区向漠西转移,最后融入我国西北地区的卫拉特蒙古,成为杜尔本卫拉特(四部联盟:即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的重要成员之一,游牧于新疆塔城西北的雅尔地区。土尔扈特部虽然早期投靠卫拉特,又是杜尔本卫拉特(四部联盟)重要成员之一,但其军事实力远不如和硕特等部强大,当时在联盟中还处于从属地位。到17世纪初期,卫拉特蒙古各部开始出现危机,每个部落都企图靠损害邻部的利益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当时作为土尔扈特部族首领的和鄂尔勒克,为了摆脱上述危机,遂率部离开原来的牧地,经过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河,来到伏尔加河下游放牧。

和鄂尔勒克来到伏尔加河下游,便把自己的牙帐设在阿图赫巴河畔(伏尔加河支流),在这里他领导部族“置鄂托克,设宰桑”,建立起新的游牧部落。自1630年和鄂尔勒克率部游牧到伏尔加河下游,迄于渥巴锡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举部回归祖国,土尔扈特蒙古在异国他乡生活了141年。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后,给卫拉特蒙古各部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有益的影响。它不仅缓和了因牧场紧张而引起的各部矛盾纠纷,同时也为本部民众在新牧区创造了良好的、更为自由的生存条件。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的举动,表现了一个部落首领的领导才能,同时,也体现出他为卫拉特蒙古的团结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三、本部东归先驱

土尔扈特蒙古部落,能在伏尔加河下游这片水草丰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安居下来,说明这里是个良好的牧场有着优越的生存环境。然而,异国的乐土并不是他们长久的家园,自他们来到这里以后,便受到俄国沙皇的控制、威胁和欺压。所以,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在俄境生活近一个半世纪,几代汗王都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与沙皇地方官员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生存下来而又不辱其民族气节。部首领们,一方面与卫拉特蒙古其他各部尽量改善关系,保持联系,以得到胞族们的帮助;另一方面,与清朝廷建立通贡关系,以加强同祖帮的亲密交往,恃有后盾相援;同时,笃信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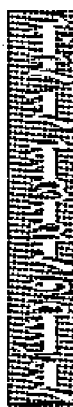


教,不断派人赴青海、西藏“熬茶礼佛”。因为西藏是中国藏传佛教的圣地,到西藏“熬茶礼佛”是土尔扈特王公们笃信佛教的最虔诚的愿望,以取得佛教神权对他们的支持。正是出于这种缘由,康熙三十七(1698年)阿玉奇汗便委派堂侄阿拉布珠尔,作为特殊使者偕同其母率其部分部众,回国赴西藏“熬茶礼佛”。

阿玉奇于康熙九年(1670年)继位土尔扈特部族首领,康熙十九年(1680年)西藏达赖喇嘛赐给他以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封号的大印”。藏传佛教神权对他汗国统治地位的承认和支持,必然提高土尔扈特汗国以及阿玉奇本人的威望。因此阿玉奇对神权更加虔诚,对西藏佛教圣地联系也就更加紧密。于是阿拉布珠尔偕同其母和妹妹率500名精兵及部分属众,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玛努托海(阿玉奇汗驻地)出发,经由西伯利亚,再穿过整个中国,跋涉万里,从东部到遥远的西藏去朝圣“熬茶礼佛”,“并让他们请一些喇嘛而归”。阿喇布珠尔一行到西藏后,在西藏拉萨大昭寺拜谒了达赖喇嘛,虔诚“熬茶礼佛”,习文念经,在西藏住了近5年才踏上归程。当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阿喇布珠尔一行由西藏返回时,阿玉奇与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正为散扎布事件双方构难,因此阿喇布珠尔一行归途受阻,滞留于嘉峪关外。阿喇布珠尔只好遣使至京师,呈请内属。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政府允准阿喇布珠尔部众在嘉峪关外的党河、色尔腾、马海一带游牧,并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至此,这部分人成为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祖帮的先驱,额济纳旧土尔扈特蒙古族的第一世祖。

四、入主额济纳

阿拉布珠尔臣服清廷后,领部众于嘉峪关外一带游牧,繁衍生息27年。这期间,于康熙五十五(1716年)阿拉布珠尔为了效忠朝廷,遂奏请从军效力。清廷下诏让他率兵500人驻守噶斯(屯兵戍守要地),以控准噶尔作乱,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阿喇布珠尔病逝由儿子丹忠继位。在丹忠执政期间,他的下属莫尔根道尔吉背叛并投靠了准噶尔,属地受到威胁,丹忠惧怕,遂再呈请内迁。后经陕西总督查郎阿允准,始得额济纳绿洲为牧



地。其疆界,据清会典载:“东与西套额鲁特旗接界,南与肃州边外地接界,西至瀚海与巴里坤接界,北至瀚海与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接界。”丹忠贝勒驻地,曰威远营,(亦曰威远城),大清一统舆图写作“卫源”,蒙古名“巴里巴拿”,位于弱水西岸,索果淖尔南二十里处。入主额济纳以后,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授予罗卜桑达尔加札萨克印,始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因为当时额济纳既不归内蒙六盟管辖,更不属于外蒙四盟,故称谓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是由地名与部落名合璧而成),直属清廷理藩院。从此,这里的地名也由亦集乃转音为额济纳。

五、额济纳蒙古王公

自1731年丹忠率部众人主额济纳为牧地,到1949年和平解放,阿拉布珠尔后裔作为主体民族,在这里游牧生活了218年,相传九代,有11位先后被封固山贝子、贝勒、郡王。他们是:(1)丹忠,雍正七年(1729年)袭多罗贝勒,在位24年;(2)罗卜桑达尔加,乾隆五年(1740年)袭多罗贝勒授札萨克印,继位27年;(3)旺扎勒策仁,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封贝勒,后诏袭罔替在位43年;(4)东德布策仁,嘉庆十五年(1810年)袭爵继位2年;(5)巴依尔芒来,嘉庆十七年(1812年)袭爵继位29年;(6)达西策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袭爵继位29年;(7)达西策仁夫人巴达玛加布,同治九年(1870年)摄政3年;(8)丹津,同治十二年(1873年)袭爵继位19年;(9)乌力吉巴达拉乎,光绪十八年(1892年)袭爵继位7年;(10)达什,1913年袭爵继位25年;(11)图布新巴雅尔,民国21年(1931年)任札萨克8年;(12)塔旺嘉布,民国27年(1938年)任札萨克,至和平解放在位11年。额济纳十二位札萨克,均为郡王世袭,没有亲王之位。阿喇布珠尔虽然被清廷封为固山贝子,是本旗土尔扈特蒙古世祖,但他不在额济纳十三位郡王之列。因为阿喇布珠尔在本部入主额济纳之前,已经于1731年在噶斯去世,况且,清廷并没有授予他札萨克印。

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十三代王爷,摄政220年,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时期,事主清朝、民国到解放初期,历史背景较为繁杂,对历代



郡王生平事迹史料记载甚少,第六代王爷达西策仁以前的王府档案,又被反清回兵全部烧毁。在12位郡王中,有10位郡王事主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年)丹忠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达西,历时201年。其后两位郡王,图布新巴雅尔和塔旺嘉布,处在动乱的清末和民国19年中摄政。清朝时期,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部的社会生活,基本是稳定的,但到清末却遭到反清回兵的劫难。

民国时期(1912年1月~1949年10月)是个内外交困,动乱时期。额济纳旗虽然人少事简,但却是西蒙边区重镇,不仅国共两党和马家军想控制,日寇、蒙奸德王(即王公德穆楚克栋鲁布)也企图渗透利用。处于这种动乱复杂的时代,额济纳旗何去何从,这个事关本部民族前途发展的重大问题,自然落在额济纳旗后期三位王爷头上。达什是第十代王爷,他既受封于清廷为郡王,又受封于袁世凯为本地王爷,摄政于清末与民国初十几年。这段时期,额济纳旗除了有部分外蒙古人潜入,稍有动乱外,全国大局形势尚未影响到这里,所以他还是按常规当王爷。图布新巴雅尔和塔旺嘉布两位王爷摄政时期,恰逢上述历史背景。图布新巴雅尔是达什长子,继承王位后,由于体弱多病,政治比较幼稚,所以王府摄政大事,多由他的义子苏剑啸和他的兄弟塔旺嘉布协理。图布新巴雅尔这位不谙政事的郡王,在位8年,终于民国27年3月(1938年)病逝在青海塔尔寺。同年9月,民国中央政府行政院第379次院务会议决定,仍承清制,任命塔旺嘉布为额旗札萨克,兼任防守司令部少将司令,署理本旗军政事务,直属中央蒙藏委员会管辖。从此,额济纳旧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进入新的演替阶段。

六、开明郡王——塔旺嘉布

塔王嘉布(下简称塔王)系达什四子,其幼时非常聪明伶俐,因之少年时,其父即令他削发当陶音喇嘛。后因其二兄吉格米德憎格、三兄额尔德尼熬其尔前后少亡,再加之长兄图布新巴雅尔虽曾取两位夫人,却均无子嗣,为了世袭爵位,塔旺嘉布无奈还俗,协理旗政。塔旺嘉布还俗后,迎取本旗德力格尔参领之独女陶森查干为妻,生有四个儿子:长子额尔登格日勒,解

放后曾任额济纳旗旗长、阿拉善盟副盟长(1981年病逝);次子东德布(少年时由图王扶养),曾任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2004年病逝);三子和四子少亡。塔旺加布禀赋颖悟,自幼勤奋好学,精通蒙藏文,在历代王爷中,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开明之士。他为人思想纯正,忠厚老诚而和气,善于人交,诚为额济纳旗王公中最贤惠者。他待人诚恳,性情温和,对事谨慎而认真,深为部属及百姓所敬重。他富有进取心,倾于现代化,英勇果敢,并富有谋略。他深明大义,国家观念浓厚,民族思想正确,不愧是一位爱国亲民的好郡王、好官员……凡所能看到的资料,对塔王的历史评价都很高。

在塔王摄政后第一年,他根据旗小事简的实际情况,为了提高执政办事能力,即对原旗府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第一次改编基层组织,全旗设18个阿尔班,并重新任命了达尔嘎,同时从王府到一般的卡(差使),都重新核定了编制,增强了旗府的活力和职能。经过8年的实践,于1944年又进行了第二次行政机构核编整顿,全旗始设巴格建制,划为巴彦宝格德、伊如布拉格、赛汉高勒、吉尔格朗图4个巴格,将原来的18个阿尔班改称和林。4年以后,于1948年进行了第三次机构改编。经过三次对旗府的改编整顿,进一步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提高了办事能力。在王府官员中,除王公是世袭外,其余均由王爷选任。他们没有俸禄,只是在旗府掌印时,供给伙食。以人少事简,平时官员均不到旗府办公,每两个月轮一人值班,办理日常事务。如遇有大事,则由章京主持召开旗务会议,以座谈方式商讨,然后综合各种意见,呈报塔王核准实施。平时各自在家生活,王爷也不例外,与牧民一样。塔王也亲自去拉骆驼运输粮食和日用品,不计富贵贫贱,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住,同他们畅谈交友,备受牧民敬爱,都称他为“赛音阿哈”。

民国时期额济纳旗人口很少,据1941年官方统计,全旗人口251户,1002人,土尔扈特蒙古部146户,外蒙古部99户,其他6户,其中男513人,女489人。文化落后,识字者仅有40多人。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培养民族干部,在塔旺嘉布还没有继承王位前,就于1936年办起一所蒙古小



学,他亲自当校长,苏剑啸任副校长,开了额济纳旗教育史上的先河。由于当时蒙古人习惯,富家子弟多不读书,尚需以义务性质强迫入校,故在校学生仅有十人,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所小学创办不久就停办了。待塔旺嘉布继承王位后,他更加重视办学育人大事,经过多次请求,终于1943年4月27日,奉令成立了国立宁夏额济纳小学。民国教育部调派国立绥宁师范学校训导处主任孔宪珂为校长,下派3名教员,有学生30多名。到1946年又因内战爆发,时局动乱,教员短缺等原因,开办两年多时间的国立小学也停课了。塔王考虑,办学大事不能停,决意自己开办小学,恢复学业。后经多方努力,于1946年下半年办起了自己的达来呼布小学,这就是现在额济纳旗蒙古族春蕾小学的前身。校长由塔王长子额尔登格日勒兼任,教师有:嘎瓦、赛伯音、吉尔格拉、藏德明、熬肯、丹巴加布、明嘎等人前后担任。高通、东德布、苏德那木、都古尔、宝音图等13名学员,是该校首批小学毕业生。后来这些人都曾肩负要职,为额济纳旗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塔王摄政时期,额济纳旗的社会情况十分错综复杂。因外蒙古政治改革,边防事端增多,稽查甚严;日本觊觎,曾设特务机关于老东庙,进行策反活动;新疆派联络参谋驻乌兰川井,为盛世才独夫民贼收集情报;国民党军事专员公署则设于西庙(二里子河),交通部电台亦设于此。各种势力各有图谋,也都在拉拢王公上层,以达各自的不轨图谋。面对这些各种势力掺杂的局面,塔王既要机警应对,又要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此时塔王突显出了大智大勇、果敢坚强并富有谋略的政治素质和施政才能。民国26年(1937年),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塔王嘉布任少将司令,苏剑啸任上校参谋。塔王以军事将领的有利地位,首先强兵固守,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以壮大军队实力,为我所用。他把原有王府卫队,经过几次改编,由步兵改成骑兵,官兵达187人,武器装备也由火枪换成新式武器。为了提高军事人才素质,适应现代防守要求,又于1941年塔王选派罗虎、马宝德、达木丁加布、巴彦吉尔格拉、大米吉德、小米吉德、嘎林迪、关其格雷德、道尔吉、乔吉嘎瓦、其伦巴图、罗布桑巴拉等12人,到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第十

七期班学习。这批军事专业人才,后来被分配到司令部、专员公署等要害部门工作,发挥了自已应有的作用。

塔王嘉布继承旗王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寇抱着“日满蒙团结”反苏防共的幻想,和蒙奸德王(德穆楚克栋鲁布)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妄图吞并满蒙,脱离祖国,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日寇和蒙奸勾结,不仅在阿拉善旗设立定远营特务机关,修两处飞机场,进行策反活动,而且将魔爪伸到边远的额济纳旗。他们用“反回”和“反苏”的口号,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为诱惑,煽动人心,嚣张一时。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塔旺嘉布(时任王府协理)在苏剑啸的帮助下,经过策划,物色了1名可靠的外来人士名叫唐兀特罗岱,一举烧毁了日寇军火库,给其以沉重地打击。日本特务头子们,给他们的主子谎报说由蜡烛引火而烧毁军火库,才勉强保住性命。日特机关的弹药虽被烧毁,但他们的人员却有增无减,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策反活动。于是,塔王和苏剑啸研究决定,秘密派遣苏剑啸和陶森赴宁夏省府报告日特活动情况,请求围歼。1937年6月,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特派民政厅长李翰园为首的支队,到额济纳旗来围剿日特和蒙、汉奸。在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全力支持下,经过数日奋战,于1937年7月7日,即“卢沟桥事变”同一天,便将盘踞在赛日川吉的日特头目江崎寿夫、大西俊仁、宋本平八郎等13人及50余名察哈尔籍的蒙、汉奸一网打尽,并押送到兰州枪决。又于7月中旬,在古日乃堵截了日特给养队,活捉日特横田等3人,以及其他蒙奸和100余峰骆驼。至此,日特和蒙奸在额旗的一切妄想彻底破灭。

日本特务机关被剿清后,国共两党间的斗争,开始在这里突显出来。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还是随着国民党反革命,再次考验了塔王的政治立场和应对能力。国民党出于对西北地区的战略需要,早在1936年10月8日,就在额济纳旗设立了防守司令部,以图军事控制。第二年,即1937年,国民党中央便在额济纳旗成立了军事专员公署,驻地西庙,一任专员名为李才桂。同时进驻骑兵300余人,分守在巴彦桃来、老东庙等地,对日特机关、地



方部队和蒙方人员进行监控。但是对日本特务机关大肆策反活动,国民党驻地当局并没有什么监控,也没有参与围剿战斗,其中的问题不言而喻。到1938年,也就是日特和蒙奸被清除后的第二年的2月,国民党兰州第八战区,又派遣胡宗南部第四十二军一九一师一一五团进驻旗,开始驻扎在西庙一带,郭子玉、夏玉清为该团的正副团长。不久,这个团扩编为第十八旅,旅长许汝诚,副旅长郭子玉,夏玉清提任为一团团长,全旅官兵多达1700余人。扩编建旅后,夏玉清率一团驻防在布日音哈日波日格(今赛汗桃来)。上述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名义是“加强防御”,实际上是“反苏、防共”,是蒋介石“抗日必先安内”的伎俩。塔王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教育和帮助下,认清了国民党驻地当局的企图,开始逐步摆脱国民党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同盟者。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额济纳旗政治影响,特别是对王公上层的政治影响,主要有3位代表人物,他们是高博泽布、苏剑啸和周仁山。这3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者,既是塔王的启蒙老师,又是他的至交朋友。塔旺嘉布由一名王公贵族喇嘛,世袭郡王,成长为一位深明大义,爱国为民的封建郡王和开明的领导者,与高、苏、周3位老师和挚友的引导、教育和帮助是分不开的。高博泽布(化名李保华)系中共地下党员,于1937年夏来到额济纳旗进行情报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新疆省督办公署边务处驻二里子河联络参谋处中校参谋兼办公室主任。高氏常以商业活动为掩护,深入王府和牧区,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引导本旗和新疆两部土尔扈特蒙古要保持传统的乡亲关系,勿受离间活动影响。高氏虽非土尔扈特人,但利用他的优越工作条件,时常找塔旺嘉布协理洽谈业务,同时灌输进步思想,他们成为好朋友。对于高氏在额济纳旗的工作,塔旺加布也给予了热情关照和鼎力相助。

苏剑啸本是满洲旗人,他和周仁山同是北京朝阳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因为胸怀抗日救国大志,苏氏大学毕业后,由北京来到西北落户于酒泉金塔县。原来,苏氏的父亲苏永格和塔旺嘉布的父亲达什曾

是结拜兄弟,由于这种关系,苏剑啸后于1934年由金塔来到额济纳旗入了蒙古籍,并被图王收为义子,成为塔王嘉布的结拜兄弟和政治上的盟友。苏剑啸来到额旗以后,倡导开发财源,改善民众生活;发展教育,培养民族人才,受到塔旺嘉布协理的赞同和鼎力相助。

周仁山,又名周翔生,他曾两次到额济纳旗做党的地下工作。第一次是1937年8月,由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委派,以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汉文秘书身份,到这里开展地下工作。时间不长便离开额济纳旗,辗转到延安抗大学习,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周仁山在抗大毕业后,党组织了解他曾在额济纳旗工作过,于是又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和中组部组织科长王鹤寿交代任务后,再次以兰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的额旗防守司令部中校秘书身份二进额济纳旗。周仁山两次到额济纳旗,都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所以均由国民党军委会军部委任官职,但他所做的工作,却是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所以驻地专员公署一直在监视他的活动。周仁山第二次在额济纳旗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就受到国民党兰州第八战区一九一师师长杨德亮的警告,限期让他离开额济纳旗,并扬言逼迫他去自首,使周仁山再次身处险境。塔王利用他与杨德亮(长子额尔登格日勒干爹)干亲的关系,巧妙周旋,第二次设法营救好友周仁山。让周氏以蒙民打扮,由塔斯木、哈布特盖查干2人护送出旗,使其再次脱离险境。

塔旺嘉布一次又一次地营救中共地下工作者,使国民党当局不能不产生怀疑,但又拿他没办法。只能软硬兼施,以权利诱导,妄图让他顺从国民党。为了进一步拉拢塔王,蒋介石曾两次召见塔旺嘉布。一次是1940年,国民党中央通知塔王去见蒋总统。塔王率牛顿、阿格敦嘎、苏宝峰、杨焕文等人,赴重庆拜见了蒋介石、何应钦以及蒙藏委员会负责人。塔王向蒋汇报了额济纳旗抗日战况后,又给蒋送了厚礼(俄国毛毯4条、黑滩羊皮筒4件、大小鹿角6个、麦德尔佛1尊),蒋介石也回赠了礼物(薄厚两种呢料2匹,另有武装带、短剑和派克笔每人一套)。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国民党中央第二次通知塔王赴南京去谒见蒋大总统。塔王率苏宝峰、塔斯木和嘎瓦



同路到达。当时,蒋介石只接见了塔王和苏宝峰 2 人,听了简短汇报后说:“你们的具体问题,可以向徐旅长、杨旅长报告。”塔王一行拜见徐、杨 2 人后,汇报了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等困难问题,徐、杨 2 人当面答应调拨汽车两辆、发报机 1 台、手枪 5 支;并提出为了加强防守力量,决定新委派 1 名参谋长到防守司令部工作,声称今后额济纳旗防务上的主要任务是防蒙,实际还是防共、防苏。就在这次蒋介石接见时,塔旺嘉布由少将晋升为中将。然而,也就在这次塔王被蒋接见时,他却别有心计的秘密会见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副主席苏荣扎布,外交部长拉木苏荣。双方坦诚相见,都强调了增进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表达了和平相处的愿望。塔王回旗后,立即派达瓦和东德布到蒙方敖包图正式建立了互通情报的关系。原来,早在 1942 年嘎瓦就和蒙方建立了情报联络站,这次两站合在一起,按着必要的方式方法和时间地点开展工作,掌握了很多国内外重要信息,以利调整王府对策。到额济纳旗和平解放时,与蒙方情报活动才告结束。塔王秘密会见蒙古革命党领导人,又相互建立情报关系,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塔王审时度势,机警应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两次谢绝参加国大代表会。1946 年,南京政府举行首届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全旗选举,塔王当选为国大代表,嘎瓦当选立法代表。根据当时蒙方的情报透露,国民党要通过国大代表会议,造谣生事,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内战。据此,塔王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采取回避政策,遂派牛顿、达瓦以替补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国大会议。1948 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又要举行第二次国大代表会议。当时,塔王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已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南京政府在政治上日益腐败,经济上每况愈下,军事上节节败退,无论召开什么样的大会,都无法挽回摇摇欲坠的局面。为应付差使,塔王仍然派牛顿、达瓦 2 人为替补代表出席大会。

塔王反戈一击,与国民党彻底决裂。1949 年 8 至 9 月份期间,国民党军队在西北战场全线溃败。9 月初,国民党兰州第八战区残部,在河西打了败仗以后,由一个自称马司令的人带领 70 余名残兵,分乘 7 辆汽车,逃窜到

本旗建国营。由于当时正是汛期，西河水很大，汽车通过受阻，匪兵便拆掉民房，用其木料搭桥，才渡过了河。对这股逃兵是阻击还是放行，对塔王而言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关键时刻，塔王再次想到周仁山、苏剑啸等人对他的开导与期待，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消灭这股逃兵，以表明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的立场。就在敌人汽车绕路行走过程，塔王立即命令罗虎、达瓦率领骑兵 200 余人，埋伏在巴彦桃来东京斯图山一带。当敌军汽车走完艰难的沙路，勉强开上新绥公路时，王府骑兵出奇不备，突然伏击，经过一昼夜的相持战斗，打死匪兵 1 人，俘虏 27 人，缴获汽车 1 辆，其余残部夺路东逃。王府骑兵则无一人伤亡，只是罗虎的帽子被打了一个洞。京斯图阻击战虽算不上大战役，但在额济纳旗还没有解放的情况下，塔王能毅然决然地调转枪口，向国民党军队反戈一击，这表明塔王和他的上层王公们，已经开始高举起义大旗，奔向新中国的决心。



古居延与额济纳土尔扈特之来历

巴达拉虎 著 青格勒图 朝格图 译校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额济纳地区变成了北方民族匈奴的领土。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秦时额济纳称为“流沙”或“弱水流沙”,到了汉初叫“居延”。居延地区从西汉到东汉的 300 多年是最为繁荣发展的时期。

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 1 万从陇西出发,经现在的甘肃省山丹县境内的焉支山讨伐在居延的匈奴,收复了河西走廊以南的地区。汉朝打败匈奴,占去此地之后,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与河西走廊以北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汉朝又派戍边军 18 万到酒泉、张掖、居延等地,废止两县机构,建立了“张掖居延属国”,别领居延城。

从延康元年(220 年)到魏晋时期,此地又称“西海郡”。永嘉元年(307 年)以后分别由前凉张贵、后凉吕光、北凉沮渠蒙逊、西凉李暠等相继割据统治。北魏时为凉州所辖地。大约在公元 590 年间分别属甘州、肃州、吐蕃管辖。天宝二年(743 年),唐朝在居延建立“宁寇军”,统管居延军事。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之后,吐蕃贵族趁唐朝内调驻守在沙州、北庭的何龙军队之机,侵占了甘州、肃州、凉州、瓜州、沙州、北庭等地,切断了长安和西域的交通。这条路被切断后,居延地区却成了通往回纥的主要关口。为

此,在北庭、沙州的节度使也都通过居延与长安联系。大历元年(766年)以后,居延地区曾先后被吐蕃、回纥、契丹占领。

960年宋太祖登位,这里的党项人进一步养精蓄锐,不断扩张领土,将该地割据霸占,最后脱离宋朝统治,另立国家。那时居延地区位于它统治的北部边境,因此,景德元年(1004)至景德四年(1007年)完全成了西夏国统治之下,西夏在居延地区建立了“威福军司”和“威福军城”等防守机构。

从1205年起成吉思汗大军先后四次路过居延攻打河西以北地方,1226年2月南征时占领黑城,以武力威胁西夏投降。元世祖皇帝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统一中国后,在居延地区建立了“亦集乃路总管府”,统管居延地区军政事务。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继皇位之后,他的儿子阔端太子在这里建立“开府西凉”府,统辖当时的整个河西以北地区。1235年阔端太子带兵进入四川,他儿子哲别铁木尔继任,新建宫殿永昌府,又称为“汗宫”。

元朝的版图很广大,居延地区在元代时期成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

近代和最近几年从额济纳黑城出土文物中,曾获得诸多泥塑佛像、文律法典及汉文、藏文、回纥文、波斯文、党项文、突厥文著的经典,从而可知居延在西夏和元朝时期是土地肥沃、水草优美、五谷丰盛、买卖兴隆、香火旺盛的地方。

二

元朝破灭,黑城废弃后,明朝历史上没有修过黑城的事例。清代迁到额济纳河驻牧至今的土尔扈特部,是元、明时期在新疆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居住过的瓦剌部的一部分。后来这个部落分为准噶尔、和硕特、土尔伯特、杜尔伯特四部,这就是历史上的四卫拉特。这里面的土尔扈特部就是来源于元朝出现的客烈亦惕部落首领翁罕的后裔。他们驻牧在新疆塔尔巴哈台一带。翁罕的六世孙子马哈奇孟克有二子,长子叫博果鄂尔勒克,他有四子,长子叫珠拉扎干鄂尔勒克,他有一子,叫和鄂尔勒克。当和鄂尔勒克为



土尔扈特部首领时,巴图尔浑台吉是准噶尔部的首领。此时正是准噶尔部的人口增多、畜牧大发展、草场窄小的时候,所以和鄂尔勒克拔起5万毡庐,率领所属20万,迁到沙皇俄国的伏尔加河(土尔扈特人叫伊济勒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上生活。在一路上抢掠俄罗斯弱小国家,使它们顺从。当时沙俄与波兰之间发生战争,无法派兵阻战士尔扈特。在这种情况下,和鄂尔勒克,继续进攻到阿斯特拉罕,不幸的是在攻城战中战死。和鄂尔勒克死后,再也无力入侵,就定居驻牧,也曾给沙俄几次出兵参战有功,所以得到沙皇俄国的特别关照。和鄂尔勒克有六子,长子叫书库尔岱青,书库尔岱青有四子,长子叫彭斯克、次子叫纳木扎拉(额济纳土尔扈特的祖先纳扎尔玛穆特可能是纳木扎拉之子)。彭斯克的儿子叫阿玉奇,阿玉奇有八子,长子叫贡扎布,贡扎布的儿子叫东如布拉西,他的儿子就是渥巴锡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人认为他们是纳扎尔玛穆特之子阿喇布珠尔的后代。土尔扈特部在俄国时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同沙皇的民族压迫和阴谋进行斗争,同时派使者与卫拉特部落联盟,同时与清政府经常取得联系。

土尔扈特人信仰佛教,常进西藏礼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纳扎尔玛穆特的夫人领其子阿喇布珠尔和500多人,从万里之外来到西藏礼佛。阿喇布珠尔在西藏住了近5年以后,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起程返回。这时阿玉什汗和准噶尔之间正在发生战争,回路切断无法继续行程。于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派人到北京求见清朝皇帝,请求牧地,康熙皇帝同意了请求,并册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赏阿尔金山以东、嘉峪关以外的党河和色尔腾之间的土地做牧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阿喇布珠尔之子丹忠继位,因色尔腾距准噶尔近,怕准噶尔的干涉和威胁,禀报清朝政府要求内迁。雍正九年(1731年)清政府赏给额济纳河作为牧地。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式设立旗,名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

阿拉善本土历史文化名人札记

G·朝格图

勤劳淳朴的阿拉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了 300 多年。在这 3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丰碑。也涌现出数不尽的文化历史人物。这里简单介绍部分代表人物,与读者共勉。

拜巴噶斯 蒙古族,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生卒年月不详。成吉思汗弟合撒尔后裔,卫拉特哈尼洪果尔汗长子,固始汗兄。对黄教在卫拉特蒙古地区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在其提倡和影响下各部领主纷纷接受黄教,各出一子当喇嘛。令其义子出家去西藏学经,后成为著名的咱雅班智达,在卫拉特传教。1610 年~1615 年间,被推举为卫拉特联盟盟主。后为土尔扈特部的书库尔岱青(和额尔鲁克之子)所杀。

固始汗(1582 年~1655 年),蒙古族,也写成“顾实汗”,名图鲁拜琥。成吉思汗弟哈撒尔后裔。哈尼诺颜洪果尔之四子,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汗的胞弟。北元后期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他 13 岁时就曾统领军队击溃俄伽浩特的 4 万大军。1606 年卫拉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发生战争,固始汗到喀尔喀部调停,平息了战争。因此,联系蒙古诸部的佛教格鲁派东科尔呼图克图活佛与喀尔喀各部首领们赠与他“大国师”称号(国师,音译为“固始”)。自此,“固始汗”之称号闻名于世。大约于 1635 年,固始汗率部离开原居地乌鲁木齐一带,越过天山,向东南部方向移徙至库库诺尔(今青海湖)一带。1637 年,在喀尔喀内战中被逐的绰克土台吉(又称却土或却图台吉)



援助西藏藏巴汗欲消灭格鲁派。格鲁派代表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固始汗出兵援助,于是,固始汗以先与绰克土台吉交战,1万人的军队打败喀尔喀蒙古绰克土台吉4万人的军队,生擒绰克土台吉,并将其处死,占据了青海地区,取代了绰克土台吉的统治。同时,派使臣前往盛京(今沈阳)表明归附清朝。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应格鲁派首领之请,1639年,率军入咯木(今四川昌都),1642年攻下日喀则,灭藏巴汗,占领拉萨,扶持格鲁派。固始汗以格鲁派护法王身份,与达赖喇嘛联合,取得西藏的最高统治权。并拜罗桑却吉坚赞为师。1645年,尊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博克多,蒙古语音译,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称),实为班禅称号之始。1652年达赖喇嘛入觐。1653年受清封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赐金册印。从此,固始汗作为清廷“屏辅”大臣统治着整个青藏高原,经历顺治、康熙两朝,祖孙四代控制西藏地区长达75年之久,使青藏高原实现了安定统一的局面。1655年1月在西藏拉萨病逝。

和罗理(?~1707年7月17日),蒙古族,是图尔拜虎固始汗之子阿玉什巴延阿布该之长子,号额尔和吉农。1676年之前游牧在准噶尔地界,1676年噶尔丹击败鄂其尔图车臣汗,和罗理率部万余庐帐向东迁移,抵达甘肃边界,最后到达阿拉善地方。

1681年夏,和罗理派使者向清朝进贡。1682年,和罗理与他母亲克楚勒夫人派土谢图罗卜桑为使者进京请求牧地,并在甘肃、宁夏边关做贸易的上书。清廷为准其上书。1685年末,和罗理亲自率领780人的使团赴京,康熙皇帝降旨,准其200人进京,其余人马停留归化城,并从宣化府调来粮食及羊只来赏赐。康熙二十五年正月(1686年1月)和罗理抵京。康熙皇帝视大台吉例,赏宴。在京城和罗理受到康熙皇帝的单独召见,以御服貂裘赏赐,准其住牧阿拉善地方。康熙二十五年(1697年)清廷将阿拉善地方正式划归和罗理住牧,受札萨克之印,受于和罗理贝勒爵位,将其部命名为“阿拉善和硕特旗”,不设盟,自为一部,是属特别旗,直属理藩院管辖。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驾幸西安,和罗理到临潼与会,陪同康熙皇帝视

察驻防官兵,受到康熙的优厚赏赐,这是和罗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觐见康熙皇帝。

和罗理一生当中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率部东迁,避免部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向阿拉善地区移牧,不仅可以减少卫拉特各部之间日益恶化的争夺牧地矛盾,而且能共同向外扩张势力,占据阿拉善地区。二是争取清朝的支持与保护,寻找立足之地,随着阿拉善蒙古的崛起,阿拉善地区与西北蒙古、鄂尔多斯以东蒙古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这对阿拉善地区的发展无疑有着促进作用。三是加强了阿拉善地区与清朝的政治联系,为促进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

和罗理为阿拉善旗第一任札萨克王爷。他为了部众的存亡,东奔西走,积劳成疾,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己亥(1707年7月17日)病故,清廷遣官致祭。他是一位卓有远见的卫拉特蒙古台吉。阿拉善旗的诞生与其地位的确立,在17世纪末期蒙满关系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阿宝(1683年~1739年)蒙古族,固始汗曾孙、和罗理第三子,是清代康、雍时期卫拉特蒙古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继承父辈和清朝皇室的密切关系,参加过清朝前期安定西北的一段军事活动,对当时祖国西北的统一起过一定的作用,因而被清廷封为多罗郡王。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与清廷皇宫联姻,那时,和硕庄亲王博果铎(注:硕塞为太宗皇太极第五子,顺治元年封承泽郡王,八年以功晋亲王,十一年卒,谥曰裕。博果铎为硕塞长子,顺治十二年袭亲王,该号曰庄,雍正元年正月薨,谥曰靖。以圣祖十六子允禄为后。博果铎为玄烨之兄。)女受为郡主,就此,阿宝尚郡主为和硕额附,赐第京师,命御前行走。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圣祖为嘉奖阿宝征战有功,赏银5000两的同时,在北京修建阿拉善王府(地址在今北京地安门外三座桥什刹海后海南岸毡子胡同府头道1号,即恭靖王府的东边)。府内古式四合院、新式楼房和后花园组成的二百余间房屋。成为阿拉善王驻京办事衙门。

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己亥(1707年7月17日)和罗理卒,康熙四



十八年(1709年)阿宝袭多罗贝勒之爵。康熙五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三年(1712年~1714年)阿宝连续三年入朝,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丁酉(1715年1月3日),康熙皇帝在保和殿以岁暮宴朝正外藩蒙古诸王,阿宝受赐列席。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四辛亥日(1715年2月17日)康熙在畅春园内九经三事以上元节赐朝正外藩蒙古诸王,阿宝仍受赐列席。六月十四日戊寅(7月14日),阿宝之夫人郡主和硕格格至行宫请安。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1715年5月),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以2000兵掠哈密,阿宝奉诏率兵500名归右卫将军费扬古统领,赴喀尔喀之推河。7月(六月)准噶尔部又袭哈密,阿宝奉旨率部前往哈密驻扎。八月至十月,阿宝转归西安将军西柱军伍,驻防于巴里坤,袭击准噶尔军于伊勒布尔和硕、阿克塔斯、乌鲁木齐等地,皆均克捷。康熙五十九年正月(1720年2月),阿宝自巴里坤至青海,与公爷策旺诺尔布等同参赞平逆将军军务。二月(3月),又授护军都领噶尔弼为定将军,率北路军进藏。九月(10月),在延信的领导下,阿宝及青海王公一同护送13岁的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从达木起程前往西藏,是年九月十五日(10月16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康熙六十年(1721年)定西将军噶尔弼因病不能率兵前进,其将军印由公爷策旺诺尔布署理,阿宝奉旨统兵驻藏参赞公爷策旺诺尔布军务。同年冬,阿宝上书,请求惩处肆行劫掠行人、盗窃军用马匹的青海郭罗克部落唐古特等,康熙皇帝命四川提督岳钟琪剿抚平定。雍正元年三月(1723年4月),以击败准噶尔大策凌敦多布,西藏军务结束,阿宝奉旨由西藏经西宁返回原游牧处阿拉善。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1月),阿宝因军前效力及护送达赖喇嘛入藏等功,受封多罗郡王,赐银万两。雍正二年五月(1724年6月),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条奏青海善后事宜,指出宁夏贺兰山地势险要,阿宝向俱在山后居住游牧,今竟移至山前,请皇上下令阿宝严飭所属,仍照前在贺兰山后居住游牧,应如所请。这是年大将军平叛以后的善后措施,阿宝只得依从。十月(11月),阿宝上奏谢恩,并乞赐青海旷地游牧,管理青海人等,不致复萌乱心。雍正皇帝下诏以贝子丹衷所遣之博罗充克克牧地,赐阿宝驻牧,

并辖青海族属。雍正三年十一月(1725年12月),额附多罗郡王阿宝及郡主进京请安。1726年春,皇帝下诏给札萨克印,阿宝为阿拉善旗札萨克。

雍正七年四月(1729年5月),郡王阿宝以博罗充克克牧地狭隘,擅自移牧乌兰穆伦及额济纳河界,被清廷议罪削取郡王之爵。雍正八年(1730年),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罗卜藏丹津兵败后,逃匿准噶尔,皇帝计划征讨。北路靖边大将军博尔丹屯科布多,前往准噶尔缉拿。诏阿宝率所部,会西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军于巴里坤。雍正八年十二月(1731年1月),又诏以内札萨克赴调噶斯兵千,听阿宝调遣。阿宝之子二等台吉滚布率所部兵500赴巴里坤,以防准噶尔。正值噶尔丹策凌令其宰桑衮木特至科舍图讯,谋掠驼马,总兵樊廷等以兵2000备战七昼夜。滚布偕鄂尔多斯台吉定咱喇什往援,衮木特败归。阿宝乃自军所归阿拉善牧地。同年,赐筑定远营。

雍正九年十一月(1731年12月),阿宝子滚布,以在巴里坤军前效力,受封为辅国公。雍正九年十二月(1732年1月),亦西路军前效力有功,且带所属兵丁防范游牧等事节,阿宝受到嘉赏并恢复郡王原爵位。乾隆四年六月(1739年7月),阿拉善旗札萨克多罗郡王阿宝因病去世。十月(11月),阿宝之福晋和硕格格献固始汗玉印,乾隆皇帝仍命格格收藏,由阿宝子孙供奉。阿宝继承父祖遗业,一生戎马生涯,驰骋疆场,军功卓著,对清朝前期西北以至全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故清廷封他为和硕郡王,宜乎光耀史册。

仓央嘉措(1683年3月28日~1746年6月26日),藏族,是宗教领袖、著名诗人。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初一(1683年3月28日),出生在藏南门隅宇松地区(今措那县境内)纳拉山下的达旺附近的邬坚林。事先,五世达赖喇嘛为了修造布达拉宫,曾对藏王(藏王即是他的弟子迭斯热德或第巴呼图克图·桑结嘉措)安顿说:若他圆寂时布达拉宫还未修缮完毕,则秘不发丧,直至布达拉宫修成。果然,仓央嘉措出生的头一年,宫殿还未修好,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就圆寂了。不发丧虽然可以,但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却必须寻访确认。当时,西藏地方的执政长官藏王第巴·桑结嘉措,鉴于门



隅地区易受外来势力的入侵,不好控制,为了加强对门隅地区的实际管理,便决定安排达赖六世在门隅中转世,于是,便秘密寻访选中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所以当仓央嘉措稍大以后,桑结嘉措便派了6名知识高深的喇嘛做他的经师,在措那宗棒山口的巴桑寺学经达6年。继而,搬到措那宗的贡巴则寺学经。在措那期间,他常到雪霞地方,那里是屠夫居住的地方。他常与雪霞的屠夫和姑娘们来往、交友,也常回他的家乡。传说在米拉山口还留有他的脚印。仓央嘉措为了表达对家乡的怀念,他亲自在邬坚林植下一棵柏树,这棵柏树至今还存活着。

五世达赖喇嘛圆寂14年后,布达拉宫修建工程告竣,此时,仓央嘉措也已长到13岁,桑结嘉措按照五世达赖的遗愿,才将五世达赖已圆寂,六世达赖已寻访选定的事公布于众。康熙三十六年九月(1697年10月)将达赖转世灵童从藏南迎往拉萨,途经南噶则宗(今浪卡子县)时,事先约好的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会晤,十七日甲午(10月31日)十五时三分拜班禅为他的经师和规范师,班禅为他剃发受戒(沙弥戒),并取法号:罗桑仁钦仓央嘉措。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五时三十分(12月8日),在布达拉宫的司西平措殿举行坐床典礼,成为名义上的宗教领袖。第巴·桑结嘉措仍然独揽大权。

当六世达赖坐床之时,也是西藏政治动荡之时。康熙四十年(1701年),固始汗之重孙拉藏汗继任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为了除掉第巴·桑结嘉措,对五世达赖转世灵童做文章。拉藏汗向康熙皇帝上奏密本,指责仓央嘉措行为不端,是个假达赖喇嘛。并社会上散布第巴·桑结嘉措选定的五世达赖转世灵童仓央嘉措是假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藏王第巴·桑结嘉措与拉藏汗之间的长期矛盾更加尖锐。第巴·桑结嘉措两次企图毒杀拉藏汗未遂,反而,拉藏汗率兵将第巴·桑结嘉措捕杀。同时,召集各大寺院活佛对仓央嘉措进行宗教审判,说他违反教规,不是真达赖喇嘛,必须废黜。但会上意见不一致,多数人说他“行为不检”是“迷失菩提”之故,甚至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游戏三昧,为破戒体”,而无人敢断言他是假达赖喇嘛,废黜之议遂缓。但拉藏汗仍坚持废黜仓央嘉措,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拉藏汗将

仓央嘉措押送北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押送途中从青海贡嘎诺尔逃脱。此后,仓央嘉措周游各地。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仓央嘉措来到阿拉善旗厢根达来巴嘎匝布苏尔乌素地方居住的班子尔札布台吉家,收其子为徒,起法号:阿旺伦珠达吉。并结识阿拉善旗王爷阿宝,与其结成施主关系。仓央嘉措定居阿拉善以后,弘扬佛法,为阿拉善佛教文化奠定了积极的作用。乾隆十一年五月初八(1746年6月26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63岁时,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里的承庆寺(当地人称门吉楞)附近圆寂。十年后,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阿旺伦珠达吉按照师傅遗愿,在贺兰山西麓修建广宗寺,将仓央嘉措的肉身安放在寺中的镀金塔内供奉,尊为广宗寺的第一代格根,俗称德顶格根(即上世活佛之意)。仓央嘉措在坐床后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后被称为《仓央嘉措情歌》,在藏区广为流传,影响极大,成为藏族文学中的瑰宝。

阿喇布珠尔(?~1716年),蒙古族,阿喇布珠尔,系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的堂哥纳扎尔玛穆特之三子。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纳扎尔玛穆特的夫人携子阿喇布珠尔以及500余部众,从遥远的伏尔加河下游之玛瑙涛海地方启程,前赴西藏拉萨朝拜达赖喇嘛,他们在拉萨拜佛达4年之久。之后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从西藏拉萨启程返回时恰逢桑加布事件之故准噶尔部与土尔扈特部结怨,归路被阻无法回去,于是阿喇布珠尔率众内附,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遣使进京觐见康熙皇帝,请求牧地。清帝准其请求,册封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阿尔金山以东、嘉峪关以外的党河、色尔腾、马海一带作为牧地。从此,固山贝子阿喇布珠尔就成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始祖。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清廷为防备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的反清起义,整军备战,命令旧土尔扈特旗札萨克阿喇布珠尔率兵500从军效力,让其驻防噶斯。不久,阿喇布珠尔因患麻疹去世。

丹忠(?~1740年),蒙古族,丹忠系阿喇布珠尔长子。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阿喇布珠尔去世后,丹忠继固山贝子职,雍正七年(1729年)晋封为多罗贝勒。同年,准噶尔部落袭击旧土尔扈特部落牧地,丹忠为避免准噶



尔部的骚扰,请求清廷徙牧于关内,清廷允其所求,丹忠携其部落又徙牧于阿拉嘎乌拉、阿拉腾特博席一带。后因其牧地狭窄,复请求移牧额济纳河流域,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同意丹忠的请求,雍正九年(1731年)丹忠率部进入额济纳草原。从此,旧土尔扈特部落驻牧于额济纳河流域。乾隆六年(1740年),丹忠去世。

阿旺多尔济(1715年~1780年),蒙古族,其父是阿拉善旗贵族班子尔扎布台吉,是阿拉善旗第一任札萨克和罗理侄子,曾任旗协理一职。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仓央嘉措流落到阿拉善,来到班子尔扎布台吉家。认定班子尔扎布幼子为第巴·桑结嘉措(阿拉善称之为:迭斯热德)之转世,收为徒弟,法号阿旺伦珠达尔吉(阿拉善人称:阿旺多尔济),并讲授佛法经文。后又赴拉萨深造,修习显、密教法,精通佛学,造诣高深。

阿旺多尔济在西藏学成返旗,弘扬佛教,讲经说法,兼任昭化寺大喇嘛。大师仓央嘉措圆寂之后,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阿旺多尔济依照大师遗愿,在仓央嘉措生前选定的地点,破土建寺,第二年该寺简称,取名“潘代嘉措林”,意为利乐海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御赐“广宗寺”匾额,俗称南寺。寻访认定阿拉善旗镇国公之子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并亲自担任经师讲授教法,转世灵童8岁时在昭化寺为其举行坐床仪式,取法名图布登嘉木苏,这就是阿拉善南寺的第一世格根(活佛),俗称温都尔格根;阿旺多尔济是创建南寺(广宗寺)的第一世喇嘛坦(是他的尊称)活佛。乾隆五年(1739年)仓央嘉措在阿拉善开立的冬季大愿法会和夏季大愿法会,南寺至今沿用。还举行胜乐、大威德、遍族三大本尊彩粉坛城的盛大祭祀。阿旺多尔济是用藏文写作传记文学作品和佛教经文的第一位阿拉善蒙古族高僧。他著的《仓央嘉措传》是全面记述六世达赖喇嘛一生的唯一文字记载品,这部著作很早就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另一部祭祀阿拉善土地神的藏文著作是《熏香祭》在阿拉善也很有影响,此外,他还撰著了不少佛教著述。

晚年他因寺院利益与阿拉善旗第三代王爷罗卜藏多尔济发生矛盾,将



其囚禁于哈拉格林(现在的格林滩取而得名)里。他虽有人照料饮食,但终因年事已高,不堪忍饥受寒,于1780年在牢中打坐示寂。

罗卜藏多尔济(1734年~1783年8月18日),蒙古族,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年1月),清朝皇帝将多罗贝勒爵位降袭于刚刚6岁的罗卜藏多尔济,居于京城。乾隆十三年(1747年)尚多罗格格,授多罗额驸。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奉命征讨漠西蒙古诸部,擒拿达瓦齐和辉特部巴雅尔。继而在新疆大地上转战南北,以少胜多,降服哈萨克、柯尔克孜诸部,追击阿睦尔撒纳,屡立战功。为此,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1757年8月30日),清廷正式晋封罗卜藏多尔济为郡王。不久又封多罗郡王,并授参赞大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因战功赏三眼花翎。乾隆三十年五月初一己亥(1765年6月18日),乾隆皇帝下诏,因罗卜藏多尔济平息准噶尔有功,晋封额驸罗卜藏多尔济为和硕亲王,赏元狐裘及黄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罗卜藏多尔济奉诏,督兵500,前往兰州,与清朝大军一起镇压青海循化撒拉族苏四十三领导的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起义军大败于华林寺。对此,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皇帝下诏,将罗卜藏多尔济亲王爵位定为世袭罔替。罗卜藏多尔济在执政期间,重新核准划定全旗区划界线,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合理开发金银矿藏,全面开采吉兰泰盐湖。首创登口渡口,将盐水运至包头、绥远以及太原、河南等40余州县,扩大对外联系,发展本旗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783年8月18日)罗卜藏多尔济病故,是年49岁。

阿葛旺丹达尔(1759年~1840年12月3日),蒙古族,阿葛旺丹达尔出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冬季),是阿拉善和硕特旗巴彦诺尔公巴格牧民叶赫辉特氏卫宗宰桑——伊乃之次子。7岁时送来定远营延福寺为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获得升入西藏名刹哲蚌寺继续攻读和深造佛经的资格。他自幼聪慧,又勤勉好学,在苦读二十四载之后,洞悉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等五明学,以超众的学识和惊人的成绩,压到众多竞争对手,领先于全藏大统考、大答辩,被授予经学院学制中最高学衔拉隆巴



(犹如博士)之学位。后于嘉庆五年(1800年)返回故里,被旗王爷旺沁班巴尔封为卓尔济,成为福因寺(北寺)历史上的第一个拉隆巴,也是阿拉善历史上的第一个拉隆巴。阿葛旺丹达尔虽然是位通达佛学的高僧,但也是位有名学者。他一生的全部活动始终未离开蒙藏民族之文化事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主张以世道治理社会,以人道治理民众,专心研究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故及民族语言文字。他的著述包括语言、文学、哲学、辞学、箴言、评论、翻译和古籍诠释在内的很多不朽作品,他的作品无论在内容、风格或手法等诸方面都截然不同于那些庸俗的说教和经义。

阿葛旺丹达尔生活的年代蒙、藏语法尚不规范和系统化,针对这一情况他第一个撰著《详解蒙文文法通讲》(贺楞其木格)和《智者语饰——藏文字词概述》,并以上述著作名扬海内外,引起蒙藏语法研究界的高度称赞。

阿葛旺丹达尔著书立说精神是不朽的,到了晚年他还在不断地进行创作活动,比如以下几部著作,都是他晚年之作。道光八年(1828年),北京松竹寺木刻出版了《浩月辉映词典》(蒙藏词典),道光十年(1830年),72岁的阿葛旺丹达尔用蒙藏两文著述了训戒长诗《人伦教戒喜宴》,还有一部力作于1838年(道光十八年)木刻出版的《千日光明词典》(蒙藏词典)。是时,阿葛旺丹达尔已是80高龄的人了。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十丙寅(1840年12月3日)逝世于北寺。

阿葛旺丹达尔在他一生的82年中,用蒙藏两种文字著述了40余部著作。而被收入《阿葛旺丹达尔拉隆巴全集》的只有36部,在清朝年间,由塔尔寺印经院木刻出版,其中哲学著作14部、文学著作18部、语义学著作9部。关于阿葛旺丹达尔国内外学者都高度评价,并公认他是蒙藏文大语法家、宗教哲学家、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诗人和超越印度班弟达的译师。

罗布桑丹碧关布(1781年~1813年),蒙古族,是阿拉善旗第三代王爷罗卜藏多尔济五子,名曰:葛力格颇勒。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班禅认定为多布藏喇嘛之转世,并上奏理藩院,理藩院确认批准。据说之前已八次转世

于印度地方,因此,在这里无据考证。后活佛到西藏拉萨学习经文数年,学成返寺。嘉庆二年(1797年),理藩院将罗布桑丹碧关布来京,念洞礼经会。此后两次派遣正月值班礼会。

嘉庆十二年(1807年),阿拉善旗王爷马哈巴拉为了皇上的万寿无疆而礼佛,在阿拉夏山阴之巴音高勒地方修建130间寺庙,报请理藩院,准其赐名,于时,皇帝赐名:《福因寺》,并亲笔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题写《福因寺》牌匾。命罗布桑丹碧关布为住寺活佛,因而,他成为福因寺第一代活佛。他为福因寺的兴旺日益操劳,亲自起草寺规、喇嘛们遵循的教规等等。期间,他还撰著了不少著作。至今还在按时念诵的《阿拉善桑》是个典型的一例。嘉庆十八年(1813年)圆寂。

那逊兰保(1801年~1875年),蒙古族,生于阿拉善王府定远营,是阿拉善旗第四代第五位札萨克王爷玛哈巴拉之女,字莲友。大约在1804年随父母到北京定居。7岁入家塾读书。外祖母金樾(字韵香)是很有才华的诗人,著有《绿云轩诗钞》。那逊兰保的老师是名儒陈延芳之女归真道人,她也是很有文才之人,著有《冰雪唐诗稿》。那逊兰保受到外祖母和老师的熏陶,她13岁即通经义,对古典诗歌有浓厚兴趣。她一生当中写了很多诗文著作,直到她去世后,其子盛昱将母亲的诗作搜辑成91首,刻印成册为《芸香馆遗诗》二卷,流传至今。

那逊兰保出生在王公贵族家庭,接受的是良好的封建教育,出嫁以后过的仍然是优裕的贵族生活。宁静安逸的生活产生了恬淡闲适的诗歌作品。晚年的那逊兰保虽然没有遇上颠沛流离生活,但也受到了战乱的骚扰,也经历了国家动荡和亲人离逝的痛苦。可惜的是,那逊兰保晚年的诗歌保留下来的很少。

那逊兰保写过不少咏物诗。她对周围事物观察得深刻细腻,通过咏物诗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在她的《赏雪》是这样写的:朝来大地换新装/压尽尘埃气自芳/竹叶敲余银有韵/梅花著遍玉生祥/拥篲扫径儿童喜/拨或烹茶姊妹忙/樽酒未终明月上/爱他天地一般凉。她的另一个《咏菊》是这样



写的：清标傲骨绝群流/凡卉输君一百筹/似此风姿应爱我/算来心性只宜秋/愁生北地霜千里/梦落东篱月半钩/点缀兰闺成韵事/不辞斗酒为君谋。前者写得通俗明快，后者写得典雅含蓄，但是都是体现了作者崇高的人格和高雅的情趣。

作者的写景诗也有很强的艺术魅力。请看作者笔下的春季：蜂怜露重迟归乎/燕趁风微滴度墙/作画没教衣染墨/折花赢得袖余香（《春日三首》之一）。时原可乐花含笑/春故多青草亦芳/杏苑露浓迷蛱蝶/柳阴沙暖睡鸳鸯（《春日三首》之三）。她笔下的夏季：清簟疏帘静不哗/阴阳夏木罩窗纱（《夏日即事》）。小榻松阴坐午凉/游丝暗冒柳丝长/一晴未觉枪未放/隔著纱窗偶送香（《初夏》之二）。午梦初回昼正长/新蝉学噪韵悠扬/湘帘似水波纹澹/叶幄入云日影凉/心静却缘之事少/身闲又为赋诗忙/增侬兴致连宵雨/嫩助残差已过墙（《夏日》）。在她笔下描写的秋季：极目寥天一望收/西风故故动帘钩/白云有意亲书幌/残日屋檐下画楼/落叶声中怜短鬓/寒鸦店里待清秋/海棠一槛桥无限/似欲邀认为少留（《秋日》）。未寒天气欲寒风/霜染枫林渐已红/五夜乡新生蟋蟀/一年秋色在梧桐/鹤铃雁宇云千里/药径菘畦地半弓/好把酒杯寻乐趣/菊花昨夜放篱东（《晚秋偶成》）。小步意徘徊/西风几□催/淡烟岁暮起/落入促秋来/红叶点高树/黄花压翠苔/晚来秋兴好/虽已过平台（《小园偶成》）。在这些诗中，作者为大自然赋予了生命，充分描绘了大自然的美，既给人以生机勃勃的鼓舞，也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

她有一首《访画》诗：一点春痕透绛纱/新红催得画情赊/晓妆剩有胭脂水/较量枝头作杏花。还有一首《折花》诗：满园春色手亲栽/翌日花前几度来/怪底枝头蝴蝶舞/鬓边信插木牡丹回。这些诗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情操和对生活真挚的爱恋。她还写过一些记游诗。像《游西山》《宿大觉寺》《海淀》都是文情并茂的好诗。“孤青表邀峰/万绿争一壑”、“夹路象实厚/嵌石孤花鲜”赞美祖国的大好山河；“打禾声里丰年乐/疏柳行中辇路平”讴歌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那逊兰保的思想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一些咏物、写景、记游诗中，时时写出一些富有哲理的句子，如

“诗境须从书里悟/机心漫向奕中求”(《秋夜吟》)。“心情自得诗书味/室静时闻翰墨香”(《小斋宴坐》)。“窗豁风先到/庭空月易临”(《处泰堂》)。“松高知宅旧/树老得春迟”(《知止斋》)。可以窥见作者深邃的思想。那逊兰保写过不少酬赠、送别的诗歌,表现了对亲朋师友的挚情。她送仆妇李氏的两首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李氏曾服侍那逊兰保六七年,后来随从作者的大嫂前往沈阳,“料应难惜别/无那总情牵”。作者回想起李氏与自己往昔朝夕相处的生活,“随人千里外/伴我十年前/挑绣资分线/梳妆倩整钿。”主仆情密,近似姊妹。因此“他时我还忆/此去汝堪怜。”作者担心换了主人的李氏的命运,因此谆谆嘱咐李氏,“旧主恩休切/新知礼欲虔。”她特地送给李氏一件“紧身”,希望李氏要“谨慎”(保重自己):“缕缕丝牵别绪真/布衣一袭赠离人/前途冷暖原难料/借得斯名要谨身。”最后,作者对李氏说:“沈阳吾旧里/古迹待归传。”希望将来能与李氏重新聚会。一个贵族妇女对一个仆妇如此情深意厚,是难能可贵的。那逊兰保有很多闺阁挚友。在与这些挚友的酬赠诗作中,作者多次赞扬妇女的才能。“国风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漫言女子贵无才/从古诗人属女子”(《题(冰雪堂诗稿)》)。作者这几句翻案文字确实写得好。“诗歌的起源应该归功于妇女”,这一声呐喊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确实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那逊兰保的送别诗中,最有名的当推那首为其兄瀛俊奉使库伦的送行诗。诗的开头先谈自己家族的由来,“四岁来京师/册载辞故乡/故乡在何所/塞北云茫茫/成吉思有遗谱/库伦余古疆/穹孤十万众/天骄自古强/夕宿便毡幕/朝餐甘湮浆。”表达了蒙古民族的自豪感。“幸逢大一统/中外无边防。”表达了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拥戴。针对她的二兄瀛俊奉使库伦,“故国为殊方”,“乃作异域视”,以至“举家心彷徨”的情况,作者大义凛然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天子守四夷/原为择要荒/近闻颇柔懦/醇俗醜其常/所愧非男儿/归愿无有偿/冀兄加振厉/旧业须重光/勿为儿女泣/相对徒悲伤。”这首诗充满了昂扬的爱国激情,是那逊兰保诗歌中的杰作。

她还有一首酬赠诗,篇幅较短,过去不大为研究者注意,其实是一首有



深刻思想意义的作品,这就是那首《庚申冬寄外,时在滦阳》:漫道相思苦/徒北行路难/烽烟三辅近/风雪一袭寒/去住都误信/浮沉奈此官/亲载三百字/替竹报平安。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作者的丈夫恒恩随咸丰皇帝逃至承德的避暑山庄。“烽烟三辅近,风雪一袭寒。”反映了帝国主义蹂躏京津地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亲载三百字,替竹报平安。”即是祝愿丈夫平安归来,恐怕也含有希望咸丰皇帝能够顺利返京,希望祖国能够得到振兴的意思。这首短诗把家庭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女诗人的爱国精神。

除了近百首诗歌,那逊兰保未能留下其他的著作,然而,这样一位有造诣的女作家,会有自己的文艺思想。“大节千秋定/新诗万古留”(《祝归真师八十寿》)。只有具备高尚的节操,才能写出永垂千古的诗篇。“诗人世每谓多穷/我道穷时诗乃工/请看后世流传者/多在忧愁愤激中”(《题〈冰雪堂诗稿〉》)。这是传统的“诗穷然后工”的观点。诗人又说:“触境生情每言志/一编写尽平生思/不道风云月露词/纯以性灵追六义。”(同上)诗人反对并无真情实感和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至于写作方法,作者也偶尔谈到过:“画意粗能具/诗心最忌平。”(《假山》)这大概是女诗人在艺术方面取得成就的重要诀窍。

那逊兰保的诗歌清丽恬淡,富于浓郁的诗情画意,往往在宁静的画面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诗中少有华辞丽句而富有和谐的大自然的本色美;描写客观事物往往能够体现诗人的情操与个性;这一切形成了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

高世格梅林(1804年~1876年),蒙古族,生于阿拉善旗雅布赖巴格一富裕牧民家。少年时进入阿拉善王府当了练习生,开始读书习文。由于他勤奋好学,掌握了蒙古、汉、满、藏四种文字,成为清代著名蒙医学家、翻译家。32岁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先后在旗衙门任笔帖式、参领、副佐领、梅林等职务。他著有《普济杂方》上下两册,上册(同治十一年木刻出版)、译著有

《钦定万年历择吉金鉴》(同治十二年木刻出版)、《新译玉匣记》(同治十一年木刻出版)、《观音菩萨五枚金钱课》《圣谕广训》(同治十三年木刻出版)等木刻版本。

高世格梅林是阿拉善和硕亲王旗的梅林章京,翻译大师,教书先生,而且是位医学家和文学家。由于他的生活年代已经远离我们 100 多年,知道他的人已荡然无存,文献资料中虽有些可靠的记载,但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对他的生平了解得不十分详细。高世格梅林于大清嘉庆初年,约 1804 年左右生于阿拉善旗(有雅布赖巴格人之说)一富裕牧民家。从少年进入阿拉善王府当练习生开始读书习文,由于他勤奋不懈的努力,掌握了蒙、汉、满、藏四个民族的文字,成为能作文章,解译各种文稿的高手。葛根诺彦囊都布苏隆在位时,即道光十六年(1836 年)被提升为旗政府笔帖式(文书)职务,道光十九年(1839 年)升为昆都·包什嘎。呼毕勒罕诺彦贡桑珠尔默特在位时期,即咸丰元年(1851 年)升副参领,本年秋又升参领职务。由于高世格满汉兼通,而且才智出从,所以经常被派遣前赴京城,为亲王领薪或到理藩院办理其他事务。有时被派到邻近旗县处理解决边境纠纷等公务。在旗政府常翻译办理朝廷各部、处来的各种公文和草拟旗政府各种公文等公务。(高世格梅林之子宝梯撒那拉也是蒙汉文翻译官、协助高世格梅林)他的汉译蒙或蒙译汉的水平相当高,既通顺又译意准确。为此,王爷非常赞赏。同治元年(1862 年)高世格被提升为副梅林。同治二年(1863 年)七月被聘为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之子多罗特色楞等三个阿格教蒙、满文的教师,被封为“巴格什梅林”之称。当时他的月薪水两千贯。据历史档案记载,同治三年(1864 年)高世格以年老为由请求辞职。当时旗政不但不批准,还指示继续培养宝梯撒那拉等人,提高他们的翻译水平。高世格先后长期住京听差。同治五年(1866 年)高世格升为梅林章京,随亲王到北京,在北京王府听差。高世格一身经历清朝嘉庆到光绪五个皇帝执政期,为亲王囊都布苏隆、贡桑珠尔默特、多罗特色楞三代王爷效劳,于光绪二年(1876 年)70 多岁去世。亲王多罗色特楞为纪念自己的先生,光绪二年(1876 年)立记功册,还给高



世格之孙策仁道尔格赏金顶,封“乌尤图·莫日根·宰桑”之号,并下文在本旗境内免缴其一切苛税的特权。高世格梅林的家庭非常富裕。同治九年为平回回之乱。解救人民之苦,高世格从自己家业中一次捐骆驼90峰。从高世格家庭出身和官衔看,他属于封建上层地位,但是他具有守卫家乡不受战争践踏、匪土抢掠和为人民减轻疾病灾难、和平从牧的愿望。所以,他一方面深入学习文化知识,当好差、做好官,另一方面习医学药,不断地搜集民间单方、验方,切脉行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如他在治癣方后这样记载:“此乃保治新旧各种疥癣之方,本人多年亲自经验也”。又如他在胃病方中载:“胎发置瓦片用文火焙后研细粉,酒服则愈,本人多次亲自用而知其效也”。在他的手稿中这样写道:“听说从前有个娃娃脚被蛇咬伤,取麝香麦粒火小咽下,立即止痛消肿。”后来他把这些验方整理出版时将这段话的“听说”二字改为“亲自治愈”字样,可见他是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经验。

高世格梅林对蒙药材非常有研究。他为方便广大蒙医识别真假药材,正确使用蒙药,编写一本蒙汉藏合璧蒙药材表,附在他的《普济杂方》一书后面。他还经商开药铺,经营过药材生意。他的手稿中这样清楚地记载:“我们所开设的药铺就在京城东四牌楼北七条胡同对面便是。”据阿拉善盟蒙古医药研究所名医段·关布扎布、乌苏日乐特二位,于1991年在实地考察证实,现北京市东四街七条胡同对面果然有过叫“天沛堂”的药铺,直到1954年扩建街道时才被拆除。这里卖的叫“光明子金膏”的眼药的确出名。他既然当官又当医生的目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经营一些“在我们蒙古地方容易购到的疗效快的药物来治病,为众人带来小小的益处。”高世格梅林当时成为本地区德才兼备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他为振兴本民族的文化,为家乡人民作出过积极贡献。

桑吉嘉木苏(1871年10月18日-1944年3月2日),蒙古族,出生在阿拉善旗图尔根(腰坝)一带居住的镇国公(南公)家里,排行老二,其父名曰:镇国公阿尤尔扎那。经八世班禅确认为迭斯尔德诺门罕之转世灵童,迎

请至广宗寺坐床,成为广宗寺第五世喇嘛坦活佛。他的法名全称是:敖日察尔山潘普勒忠桑吉嘉木苏,俗称喇嘛坦。29岁入藏学经,精通显宗教义和密宗教法,成为有名佛学家。因此,他与达赖喇嘛和藏区名活佛来往非常密切,常有书信往来,相互切磋佛学难题。1928年,阿拉善旗定远营发生“小三爷事件”,俗称“戊辰事变”,事件被平息后,阿拉善局势仍然很动荡,由于王爷长住北京,旗务无人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应王爷之托和旗府部分官员的推举下,一度出山掌管旗印,参与政务三年之多。除此之外,他一生其余时间集中用于寺院事务和佛事活动之上。他于1944年3月25日(三月初二)在南寺住所“普贤光照佛府”圆寂。享年74虚岁。

他一生中著述甚丰,所作的文集内容以佛教显密教义、仪规、颂词等,计有八帙之多。其中刻板刊印的文集有三大帙外短版一帙,是阿拉善有藏文著作的高僧之中,无论是著作数量还是著述字数,是最多的一个。现在这三大帙文集全套藏在塔尔寺色多公馆和布达拉宫两处。其中第二帙——喀帙在哲蚌寺修过刻板。未曾刻板刊印的著述也不少,但大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散失。其著作目录汉译如下:

第一帙,16部著作。

- 1.《凭依三界法王宗喀巴之道次前行六支加行法——所有加持之源》;
- 2.《妙殷商师法王大宗喀巴之上师瑜伽与献千供合一以轨——成就如一树之穗》;
- 3.《恩德无比的诸至早上师祈愿颂词类一辑——加持速入》;
- 4.《至尊佛王仓央嘉措之上师瑜伽文——加持甘露金妙瓶》;
- 5.《结合世尊本生传的六度回向文——佛子雄者之金刚歌声》;
- 6.《向至尊佛王罗桑仁钦仓央嘉措献千供仪规——如意鬘》;
- 7.《凭依三时胜者顶饰佛王仓央嘉措之丹丸成就仪规》;
- 8.《世尊能仁千供仪轨结合加行法之解说——白色珍珠鬘》;
- 9.《结合〈贤愚论〉故事之回向文——消除众生忧伤之佛子雄者宝梯》;
- 10.《回向文两页》;
- 11.《〈本生百传〉摄颂——行至解脱靠岸》;
- 12.《下士道训诫类略说——解脱引导》;
- 13.《劝说具慧者精进事法之无常训诫——夺心之宝》;
- 14.《〈闻海诗〉之义略解——开启慧眼》;
- 15.《〈百业经〉摄颂——照明取舍之镜》;
- 16.



《结合世尊佛陀慈爱世间者〈三十四本生传〉之回向文》。

第二帙,15部著作。

1.《深道上师瑜伽与如意轮成就法合一诵文——无死甘露妙瓶》;2.《上师如意轮成就法——无死秘诀》;3.《圣白度母如意轮成就法大全——长流甘露水》;4.《如意轮长寿丹丸成就仪轨——无死利乐作昼》;5.《其四曼荼罗仪轨——施胜无死甘露》;6.《其礼赞颂——无死施胜及过去贤者之作具加持力者》;7.《其长寿成就法与千供仪轨合一文——甘露乐宴》;8.《其忏悔文》;9.《其长寿成就法——持乐利他》;10.《其会供仪轨》;11.《其念修法详解》;12.《其念修补全所需简略烧供仪轨——消除有寂忧伤》;13.《其烧供仪轨》;14.《六座上师瑜伽念颂文及其解说——秘诀甘露妙流》;15.《吉祥金刚大威德和白文殊静猛合修法》。

第三帙,10部著作。

1.《站姿无量寿佛长寿咒丹丸成就法——施胜甘露》;2.《吉祥金刚大威德灌顶入我简略仪轨》;3.《凭依上师和大黑护法无别之除障秘诀》;4.《比丘尼华母所传十一面慈悲观音灌顶之诸传承上师起源颂》;5.《自在观世音五尊坛城成就供养入我仪轨大全》;6.《其会供仪轨》;7.《凭依圣慈悲观世音之八龙烧施仪轨》;8.《向秘业大差役瑜伽师战神命主孜玛尔红护法神托付事业文——怀伏时间使者》;9.《凭依无比解救者长寿三佛之祈寿和千供合一仪轨——无死奶海金瓶》;10.《智慧空行狮面母食子驱魔仪轨旁注——天铁烈焰钺刀》。

罗布桑却丹(1873年~1928年)蒙古族,祖籍为阿拉善旗,祖辈来到喀喇沁前旗三台地方,后到阿尔善村定居(今辽宁省凌源市万元店乡热水汤村)。罗布桑却丹的姓氏是:额勒度德,后改汉姓为白。实际上他有几个名字,罗布桑却丹是他的藏文名字,蒙古名宝音陶格塔虎,汉名白云峰。在日本期间取名为罗子珍。他从小好学上进,自学了蒙古文、汉文、满文、日文,到了十来岁时就成远近闻名的文化人。因此,在他17岁时(光绪十六年1890年)就当上了喀喇沁前旗佐领职务,后又任为扎兰章京。

罗布桑却丹是当时蒙古族的较早觉醒者之一。是中国近代蒙古族杰出的进步思想家,著名学者。他在北京雍和宫深造藏文4年,1906年任满蒙高级学校的蒙古文教师,期间,在哲盟考察3年,1917年受聘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任教,1912年受聘于日本京都本原寺佛学院,在那里工作两年。他东渡日本7年,于1914年回国。回国后他在沈阳伏案著述3年,于1918年写完长达50万字的蒙古文巨著《蒙古风俗鉴》被称为蒙古族风俗的“百科全书”,全面反映了当时蒙古族风俗习惯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情况,是蒙古学研究的珍贵文献。由于以上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生活阅历,使他大开眼界,为后来的潜心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成为蒙古民族的先行者。

达西车楞(?~1869年)蒙古族,是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王爷达西车楞贝勒系巴雅尔莽奈独生子,清道光二十年(1841年)达西车楞继任多罗贝勒职。清同治五年(1866年),奉陕甘总督之令,建立起从旗王府驻地衙门查干至甘肃王子庄(今甘肃省金塔县)的信报驿站(相当于邮驿总局)。驿道全长705里,共设12个驿站,进行传递信息工作。每站有站丁1名,从当地牧民中抽派,属义务支差。同治元年(1862年),河西回民军起事,活动于甘、凉州一带,并攻陷酒泉,波及额济纳札萨克旗。同治八年初(1869年),达西车楞组织70名旗兵驻扎其果根波日格和松都拉,防范回民军。由于防备不力,失去联络,70名旗兵尽遭回民军杀害。同治八年三月二十日(1869年5月1日),300余回民军占领旗王府驻地衙门查干,杀死多人,烧毁所有档案。达西车楞率部在巴格洪格尔吉与回民军作战中阵亡,丢失札萨克印鉴。大约到光绪元年(1875年),由达西车楞贝勒的夫人巴德玛加布和台吉乌日图那生主持旗政。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廷重新颁发札萨克印鉴。清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为达西车楞贝勒请恤,清廷追封达西车楞郡王衔,并予恤银1100两。

塔旺布里甲拉(1870年~1931年7月23日)字云桥,蒙古族,1910年继位,据史料记载:1885年,塔旺布里甲拉以豫保长子、公衔头等台吉身份冠



戴花翎。1894年2月在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时加封贝子衔,同年又赏赐紫缰。1895年在乾清门行走。1898年担任御前行走。民国时期,继续保留了蒙古王公制度,塔旺布里甲拉以阿拉善旗札萨克和硕亲王身份长期供职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先后担任要职。民国初期,塔王首任袁世凯总统府的京都翎卫使,为总统咨询蒙旗事务;1914年8月任西蒙宣抚使,代表北京政府慰问蒙旗民众,羁縻蒙古,安慰边民;1916年~1922年,先后当选中华民国首届和第三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22年4月21日,中华民国政府任命塔旺布里甲拉为蒙藏院代理总裁。1924年,出任北洋政府曹锟政权的蒙藏院总裁,1925年因贿选总统曹锟政权的倒台而辞职。此后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是阿拉善历代旗王中行政职务最高的王爷。

塔旺布里甲拉在晚年时期,阿拉善旗内发生的一系列事变。这是他遭受了有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为维护旗政王权和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四处联络,在国民政府上层寻求支持,费尽了心机,经过努力虽然恢复了王权统治,结果是殚精竭虑,已经心力交瘁。加之1931年春次子夫妇死于非命,老王爱子心切,悲痛万分,思念成疾,于同年7月病逝于北平,终年61岁。谥号乌如希叶勒图诺颜,意为“仁慈善良之王”。

段巴图尔(1887年~1970年6月15日)尊称巴特尔巴嘎,蒙古族。1887年出生于阿拉善旗巴彦诺日公巴格一个官员家庭。他12岁入私塾学习蒙、藏文。1904年入旗衙门任文书。1916至1949年先后任旗府文书、档案管理科长、佐领、参领、梅林章京和管旗章京等职。1941年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阿拉善旗第十分部执行委员、书记、旗直属区党部监察委员等职。1946年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报组织。

1949年9月23日,他随达理札雅先生起义。1950年,他任阿拉善和硕特旗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政法委员。1951年任阿拉善自治区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兼审查委员会委员、旗人民法院审判员、宁夏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被推选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前往北京等地参观学习,并见到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

导。1954年被提升为副旗长,1958年提任为旗长。他先后当选为阿拉善旗、宁夏省、甘肃省、巴彦淖尔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兼任过内蒙古自治区与巴彦淖尔盟政协委员、阿拉善旗政协副主席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四人帮”的严重迫害,1970年6月15日病逝于家中,享年83岁。1979年3月,中共阿拉善左旗组织部、阿拉善左旗革命委员会给段巴图尔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

陈爱尔德尼巴图(1897年~1968年)字宝峰,蒙古族。1897年出生于阿拉善旗道兰苏海巴格达木拉(总管)陈芒莱之家。他兼通蒙汉文,略识藏文。1913年进入旗衙门任笔帖式,后逐升苏木章京、扎兰章京、梅林章京等职,1935年提为管旗章京。1936年任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后升少将参谋长。1937年加入国民党。1946年被推选为“国大代表”赴南京出席“执宪国大”会。1947年任国民党阿拉善监委主任。1949年8月,德穆楚克栋鲁普策划成立所谓“蒙古自治政府”,被任为副秘书长。

1949年9月23日,陈爱尔德尼巴图随达理札雅先生和平起义,对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任宁夏省阿拉善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副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是年9月他被推选为旗代表进京参观国庆盛典,并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全委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他积极参与支持土改运动,1952年冬自愿将自己在磴口县的400余亩耕地分给无地的农民。1954年任甘肃省蒙古自治区第二副主席,1955年任甘肃省巴彦浩特蒙族自治州第三副主席,1956年任巴彦淖尔盟第二副盟长。1957年带头参加合作化运动,用自家的110峰驼、300只羊,15头牛及生产工具,组建了全旗第一个牧场——金星牧场。1958年兼任盟政协副主席,1960年兼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常委,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的民主人士。1968年1月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含冤逝世于巴彦高勒市(今磴口县),终年71岁。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和巴彦淖尔盟两级革命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阿木梅林(?~?)全名叫阿木尔巴依斯古楞,蒙古族,额济纳旗人,生卒



年不详。曾任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章盖,后升任梅林,旗民习惯称阿木梅林。1935年,日军特务江崎寿夫(蒙古名:桑杰扎布)、大西俊三、松本平八郎、小野寺、浅野、井之原、柴田岗、翻译伊希玛等人侵入额济纳旗后,武装占据赛日川吉庙(王府驻地),作为据点,日军特务还修筑弹药库和简易飞机场,作为蚕食中国西北的基地。1936年冬,阿木梅林与旗防守司令部中校参谋长苏剑啸以及蒙藏委员会驻旗专员王德淦经过周密计划,派遣信赖的外来喇嘛雷德唐兀特潜于寺庙班丁(小喇嘛)之中,伺机引爆了日军特务的弹药库,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937年7月,宁夏省民政厅长李翰园奉国民政府命令,带队赴额济纳旗驱逐日军特务。当李翰园等50余人乘驼沿额济纳河北进至青山头(宝日乌拉)一带时,阿木梅林奉札萨克旗王府命令,率旗保安大队阻挡。当李翰园晓以大义说明事实之后,阿木梅林与保安大队官兵真诚欢迎国民军到来,并协助国民军逮捕日军特务以及蒙汉奸,分批押送至兰州,接受中国人民审判。

田协安(1895年~1968年)又名田济尔,蒙古名孟克宝音,男,蒙古族,阿拉善旗人,生于1895年。祖先是清室公主下嫁到阿拉善旗的媵户,世代服务于旗札萨克亲王,祖辈初来阿拉善旗时随旗人蒙古籍。他自幼随父亲在王府当差,后又在北京的阿拉善王府侍奉王爷塔旺布理甲拉,得以开阔眼界,兼通蒙汉满三种文字,喜爱绘画,懂晓医术。最擅长画马、人物、花鸟等。1928年4月22日(农历三月初三)曾积极参与本旗贵族德钦一心诺尔布联合外部力量,与国民军姚连榜一同武装夺取旗政的行动,任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蒙古兵第二路司令部参谋长,事败后外逃,先后在宁夏、南京、呼和浩特等地谋生。

根据民国《中央日报》的消息,田协安在南京举办过两期画展。他的首次画展是在九世班禅尔德尼、蒙藏委员会委员黄慕松,还有蒙古政治要人恩和巴图、白云梯、克兴额、伊德钦、包悦卿、乐景涛、诚允、杭锦寿、巴文峻、李永新、吴鹤龄等人的推荐下,于1935年11月20日,在南京市中华路青年会举行“田协安马画展”。此次画展共展出作品70幅左右。开展当天参观

者竟多达 5000 人。这一点完全说明展览成功。关于对田协安及画展,当时报纸报道称:“对于马之各种形态,千变万化,无不惟妙惟肖,活现纸上”,“蒙人画展,此为创举”。1937 年 1 月 1 日,他第二次举办画展,展点仍在青年会。据 1937 年 1 月 1 日《中央日报》文章:“其祖父二代曾服官京师,且均以善画驰誉。当时先生秉承两世真传,孜孜研习,年未二十,艺术登峰造极。不论山水人物,翎毛花卉,无不妙到毫颠,各臻佳境。尤于画马,更所擅长,飞誉西北者三十余年。盖先生生长蒙地,对于马之形状,以及各种神态,观摩领悟,经验极富。故每一动笔,无不惟妙惟肖,不让郎世宁专美于前。”

达理札雅(1905 年~1969 年 11 月 19 日),字锐荪,1905 年生于阿拉善旗定远营王府。青少年时期,达理札雅来到北京,接受良好的教育,接触了新学知识,思想已倾向民主与进步。他天性孝友,性情敦厚温顺,待下宽厚,平易近人,很少有一般贵族子弟的纨绔习气。骑马、打枪、照相是他的三大爱好。1925 年,达理札雅与溥仪的堂妹、贝勒载涛之女金允诚结婚。婚后伉俪情笃,夫妻相敬如宾,先后生下六女一子。金允诚幼读诗书,兼爱绘画,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达理札雅的帮助很大;达对金尤为尊重,事无大小都与她商议而行,起居有节,恶污喜洁。

1931 年 12 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任命达理札雅承袭阿拉善旗札萨克职。他首先团结旗内上层人物和贵族,取得他们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一是撤销旧衙门,成立新的旗政府,选拔了一批有声望、有资历、有魄力而又具有一定工作能力和文化知识的中青年人士任职;废除旧的陈规陋习,缩减王府开支,减轻财政负担;严禁盗匪及一切奸宄小人的不法行为,使全旗人民各安其业。二是为旗政府执行保卫任务和维持地方治安,建立了 8 个保安大队,在武器装备上和士兵待遇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增强了战斗力。三是对外来洋教堂的教案进行清理,收回全部土地所有权,令其向旗府交纳租粮,充实了府库;由西北盐务局经营开采 4 大盐湖,按年向旗府纳税;收回产量大的煤矿,由旗政府派员经营开采;在集镇设立税务股,专司税收工作,使旗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四是举办教育事业,培养出不少



有用人才。由于上述各项有力措施的执行,阿拉善旗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上下齐心协力发展生产,加之几年风调雨顺,牧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1937年秋举办那达慕大会,历时20余日,热闹非凡,盛况空前,成为阿拉善旗繁荣兴旺的标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首先是国民军加紧对阿拉善旗这块边疆要地的控制,建立了各种组织,进行活动,达理札雅对此应付、周旋,以保阿拉善旗安宁。其次是宁夏军阀马鸿逵,从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控制阿拉善旗,他采取的抗拒办法,触怒了马鸿逵,马鸿逵以武力攻打定远营,强迫达理札雅全家离开阿拉善旗,送往兰州软禁达7年之久。软禁期间,达理札雅曾费尽周折,亲赴重庆向国民政府当局申辩并揭露马鸿逵的扩张野心和对他的诬陷。旗内上层人士强烈要求达理札雅回旗执掌旗政,这样才迫使蒋、马同意让其回旗。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准备打内战,对达理札雅由原来的监视、控制改为拉拢、利用。给予达理札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顾问,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议、宁夏省政府委员、中将衔区防司令部司令等高级职务。但是,达理札雅并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而是采取消极应付的对策。其奉行的宗旨是继承祖业、保境安民。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中国胜利进军,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节节败退。面对这样的形势,达理札雅选择了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站到人民这方面来。当他收到老朋友张治中将军的一封信后,更加坚定了达理札雅走和平解放阿拉善旗之路的决心。他派人向彭德怀司令递交亲笔信,彭总看了很高兴,表示热烈欢迎。9月23日,达理札雅以阿拉善旗札萨克的名义,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致敬电。与此同时,又分别向西北野战军彭总司令和19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发出了电报,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阿拉善旗,为和平解放阿拉善旗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1949年10月,宁夏省党委派出工作组到阿拉善旗,从此,阿拉善旗在

中共阿拉善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民主建政和民主改革。

1950年5月,将原阿拉善旗政府,改组为宁夏省阿拉善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达理札雅为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达理札雅曾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并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毛泽东主席、周总理生前对达理札雅十分关心,曾几次接见他,当面教育鼓励他。达理札雅工作积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达理札雅遭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极“左”路线及其在内蒙古追随者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11月18日,含冤去世,终年64岁。

1978年9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呼和浩特市,为达理札雅和金允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达理札雅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金允诚(1906年~1969年)原名爱新觉罗·韞慧,1906年农历11月9日生于北京,满族,系知名人士载涛先生的女儿,达理札雅的夫人。

金允诚,青少年时期,聪明伶俐,喜欢书法和绘画,用英语翻译一些短篇作品,酷爱刺绣,通晓诗词歌赋,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1925年,金允诚同达理札雅结婚。婚后家庭和睦,感情极为融洽。金允诚高尚娴雅的心灵、慈祥和蔼的言行、开明大方的性格、端庄秀丽的容貌,以及诗文,绘画、音乐方面才华,“王孙闺秀”式的风范,对达理札雅耳濡目染,影响颇深。1932年,金允诚定居阿拉善旗后,与达理札雅商议尽力裁减王府内的夫役,节俭起居食用。竭尽全力协助达理札雅整顿旗政,加紧帮助达理札雅学习文化,增强办事能力。是达王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之一。1935年金允诚协助达理札雅在文化教育落后的阿拉善创办了阿拉善旗立定远



营小学。1937年,又创办了阿拉善旗立定远营女子小学,自任校长,并兼代公民,国语,算术等课程,为阿拉善旗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金允诚受新思潮的影响,利用“福晋”的有利身份,在旗内推行了一些新事物。为了让广大妇女从旧礼教解脱出来,她号召妇女们参加社会工作,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给女孩子缠脚,提倡新法接生。1938年,宁夏军阀马鸿逵将达理札雅全家押解银川,软禁8个月后,移住兰州达7年。在这段时光里,金允诚陆续完成《爱吾庐诗草》诗集,出版于1945年。它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精神面貌,歌颂祖国壮丽山河,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是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值得一读。她还参加了兰州书画名流举办的“诗社”,作的诗画很多,并装订成册。这些诗和画,后来都毁于“文化大革命”中。解放战争时期,金允诚跟随达理札雅一起光荣起义。参加革命后,曾任宁夏省民主妇联副主任、巴彦淖尔盟妇联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副主任等职。先后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在妇女工作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69年11月10日,金允诚女士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内蒙古自治区追随者的残酷迫害下,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78年9月23日,在首府呼和浩特市为金允诚女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慰她在天之灵。

塔旺嘉布(1900年~1960年),生于1900年,额济纳旗人。他自幼出家,在旗庙为僧。为传袭爵位,还俗从政。1938年9月,中华民国行政院第379次院务会议议定,王位由塔旺嘉布继承,任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札萨克兼防守司令部少将司令(后晋升为中将司令)。

塔旺嘉布执旗政后,对原有机构进行了整顿和充实,将全旗划为4个苏木、16个巴格。苏剑啸以梅林职委用,周仁山以秘书职留用。这些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对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经过整顿,旗政府组织得到加强,办事效率提高,加紧训练保安队士兵,严密地进行边界巡查与防范,使旗民安

居乐业。

塔旺嘉布精通蒙古文和藏文。1936年亲手创立额济纳旗立小学,并自兼校长,培养人才普及教育,旗政府及防守司令部主要仕官多为该校毕业生。还从青年中挑选一些人送到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受训,改善了军政人员的素质。

塔旺嘉布富进取心,英勇果敢,颇善谋略。在抗日战争时期,周仁山多次个别做塔旺嘉布的工作,讲革命道理,使得塔旺嘉布由一个封建王爷转变为倾向和同情人民革命的开明人士,并积极支持周仁山、苏剑啸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鉴于二人在额济纳旗的秘密活动有暴露的危险,为确保他们两人的人身安全,不思个人安危,几次暗中保护使其脱险,中共党员在额济纳旗的地下活动,未发生过任何损失。塔旺嘉布为人正直,忠厚坦白,嫉恶从善,不分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均能以礼相待,和气交往。在青年时期,他还拉骆驼运过粮食。袭王位后,时常在牧民中间走访,也不计较穷富,碰上哪一家就在那一家吃住,同他们畅谈交友。他不向老百姓大肆征收苛捐杂税,也不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殿,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深为部属及百姓敬重爱戴。

1940年,蒋介石通知塔旺嘉布前去候见,塔旺嘉布赴重庆,拜谒蒋介石、何应钦等,陈述了额济纳旗防守衙门的公务。嗣后与蒙藏委员会及有关官员接洽商谈了公务。1945年秋,再次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国民政府对额济纳旗不放心,委派徐汉襄任参谋长,进一步监视塔旺嘉布。1946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立法会议,塔旺嘉布当选为正式代表,派替补代表前去参加了会议。1948年国民党决定在南京召开全国国代表大会,通知塔旺嘉布出席会议,为应付差事,仍派替补代表前去参加会议。塔旺嘉布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现象,内心十分厌恶国民党及其统治。

1949年9月,塔旺嘉布亲自召集地方军政要员会议,通过了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议。9月27日,通过阿拉善特别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向银川的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转交通电,宣告



起义。新政府维护地方治安,逐出乌斯曼土匪,拦截国民党马家军残部,打击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匪部,平息了骚乱,将潜藏在额济纳旗境内的反革命分子依法逮捕后送酒泉公安机关处理,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塔旺嘉布认真稳妥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参与筹建巴彦淖尔盟;动员其家属入股组建公私合营牧场,诚恳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为满足国防需要,无代价地腾出额济纳旗的一部分草场,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亲自选址并审定旗政府驻地达来呼布镇的建设方案和设计图纸,该镇现已成为额济纳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塔旺嘉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是民主进步人士的楷模。1960年逝世,终年60岁。

罗巴图孟柯(1905年~1952年)罗巴图孟柯,字相丞,蒙古族,1905年生于阿拉善旗,为四等台吉。达理札雅担任札萨克后,极力革新,选拔中青年人士,罗巴图孟柯被任命为旗副协理,1937年任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中校参谋长。1938年至1944年在札萨克达理札雅被软禁期间,他总览旗行政事务,抵制马鸿逵控制和掠夺行径,保持全旗安定。1944年任旗政府协理。1946年任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1949年,罗巴图孟柯派人前往兰州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1949年9月23日,札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公开发表阿拉善旗和平起义声明,并派人前往银川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他是阿拉善旗得以和平解放的核心人物之一。1949年10月,阿旗保安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罗巴图孟柯被任命为总队长,维持全旗地方秩序,清剿散兵土匪。1950年3月,被任命为阿拉善和硕特旗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阿拉善旗保安队派出3个分队包围贺兰山,协助宁夏军区部队围剿郭拴子匪徒,阻止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匪部纵兵抢掠的罪恶活动,保护广大牧民的生命财产。1950年9月,阿拉善旗蒙古族代表罗巴图孟柯出席宁夏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后被递选为省人

民政府委员。1952年1月16日,罗巴图孟柯病故。终年47岁。

罗巴图孟柯一生的评价,以宁夏省人民政府人事厅于1951年10月21日所作的鉴定为结:“罗巴图孟柯工作认真,处事果断、勇于负责,有革命精神,忠于人民,反对伪国民党欺骗压迫政策,拥护政协纲领,并反对官僚主义。个性直爽,有远见,有毅力,言行一致”。

杨富存(1905年~1970年9月17日)杨富存,生于1905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蒙古族,1949年9月23日,随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和平起义,1950年6月改编入伍。历任宁夏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中队长、副总队长、公安大队副大队长,甘肃省蒙古自治州人民武装部部长和巴彦淖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1958年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6月经内蒙古军区批准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70年9月17日含冤逝世。1979年3月26日,巴彦淖尔军分区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杨富存参加革命20多年来,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忠于人民,忠诚党的革命事业,是一个好干部、好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人民统一路线政策感召下,协助达理札雅率部参加和平起义,出色地完成了投诚人员的接收工作,在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和部队改编工作中,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认真改造世界观。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

杨富存对革命事业勤勤恳恳,工作任劳任怨,不怕苦,不怕累,经常深入部队、民兵基层单位,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对部队和民兵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能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光明正大,坚持原则。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深受分区指战员的尊敬和好评。

牛顿(1906年~1988年2月9日)又名宝音德力格尔,蒙古族,额济纳



旗人。生于1906年，是一位民族上层进步人士。1936年，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防守司令部，牛顿任参谋处(室)中校参谋。1938年塔旺嘉布执政以后，牛顿先后任章盖、梅林、管旗章京，曾任国民大会代表。

1940年塔旺嘉布携牛顿章京、阿格通嘎和常驻重庆代表苏宝峰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旗专员杨焕文同赴重庆，拜谒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陈述额济纳扎萨克旗王府及防守司令部公务。

1946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立法会议，牛顿作为替补代表参加会议。1948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南京召开全国国大代表会议，牛顿以国大代表资格参加会议。1949年9月27日，牛顿作出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在塔旺嘉布率领下参加和平起义，为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牛顿历任额济纳旗自治区、额济纳自治旗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巴彦淖尔盟副主席、常委、政协阿拉善盟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政协委员。

1988年2月9日，牛顿在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逝世，享年82岁。

奇俊峰(1915年~1947年)女，蒙古名色福勒玛。1915年生于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的一个贵族家庭里。5岁时随同姑姑诺月朋到达拉特旗西协理家中生活，改称姑父的姓氏，起名奇俊峰。7岁时请家庭教师教授蒙文、汉文和其他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事业日有所进，读书孜孜不倦，阅读了不少课外历史和文艺书籍。

奇俊峰相貌出众，精明伶俐，又有学识。1934年成为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石拉布多尔吉(人称石王)的福晋。1936年9月石王在家中病故。1937年农历3月15日，奇俊峰生阿拉腾敖其尔，因幼小不能亲政，由她执掌全旗军政大权。

1937年末1938年初，日军侵占了归绥、包头。在日本扶植下，德穆楚克栋鲁普派一团蒙古兵驻扎在乌拉山以南的升垣号，一方面防备傅作义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就近监视奇俊峰的行动。

1938年2月,奇俊峰率领10余人,连夜逃到河套,成为第一个从日伪占领区投向抗日阵营的蒙旗王公,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5月间,被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乌拉特西公旗防守司令部司令,授以少将军衔。防守司令部设在五原县城。7月10日拂晓,日军1000余人,集中火力进攻后套的咽喉要地西山嘴,由于奇司令的士兵熟悉地形,密切配合骑七师官兵英勇杀敌,为抗日救国立下第一次战功。1939年日军加紧进犯后套,疯狂轰炸五原,奇俊峰将防守司令部迁到陕坝,在前线配合友军抗战。

1939年9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西公旗护理札萨克,任命阿拉腾敖其尔为记名札萨克。蒋介石决定召奇俊峰到重庆述职。奇俊峰于12月20日从陕坝出发抵榆林,经延安、西安、成都到达重庆,一路受到热烈欢迎和赞扬,尊为中国妇女的表率。1940年6月初,蒋介石召见奇俊峰一行,给予嘉奖鼓励,答应拨给军装和军饷,并命令迅速打回家乡去。1945年8月抗战胜利,17日奇俊峰返回阔别7年的家乡,公布了新的旗政府人员名单,发布了《告全旗人民书》。安排王府事务后,即去归绥看病。1947年7月20日,旗保安司令部一团团长郝游龙为夺取全旗军政大权,杀害了奇俊峰母子2人。奇俊峰遇难时年仅32岁,小王子夭折时才10岁。奇俊峰率师参加抗战,为民族解放而献身,死得其所,杀害奇俊峰的凶手郝游龙等人已受到人民的惩处。壮士于九泉之下,英灵得以慰藉。

达穆林旺楚克(1916年~1986年)达木林旺楚克,蒙古族,字匀庆,1916年农历2月出生于阿拉善旗王府王府,为阿拉善旗第八代札萨克亲王塔旺布里甲拉第二子,幼年生活于北平罗王府,入北平贵胄学堂就读。1933年与杨祉芬女士结婚,与母亲和妻子定居罗王府。1937年上大学,因抗日战争爆发,肄业留住北平,经营家传聚宝斋商行生意。同年,其兄达理札雅亲王改革旗政,提升达穆林旺楚克为旗府正协理,他住北平时,将北平政局之变革形势及时告知长兄,供共执政参酌。

1948年初,他由北平携眷属赶回定远营,辞去挂名旗正协理职务,参加旗“国大代表”的竞选,加入了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政府中央立法委员,赴



南京任职。1949年1月在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煽动下,重返故乡协助筹备所谓“蒙古自治政府”,被德王任命为政务委员。同年9月20日,将结发妻杨祉芬与其所生6个子女留在定远营,仅带小妾乘新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徐永昌抵宁夏督战的座机从银川飞经广州抵达台湾。他到台后终身从政,先后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与中央委员,在中央立法院任职,负责过边政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工作,曾主持起草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专利法修正草案》《公司法修正草案》《农业发展条例草案》及《技师法修正草案》等多种法律章程,是台湾当局经济立法界的显赫人物。达穆林旺楚克虽身居台湾,但他思念家乡和祖国的赤心犹存。1986年2月因患急性心肌梗塞逝世于台北市,享年70岁。

1995年,达穆林旺楚克在台湾子女中的长子达嘉麟遵从先父嘱托,以业务之便由台北前往北京拜见了其嫡母杨祉芬,与在京的5位姐妹全家团聚,实现了达先生十前的愿望。

段塔拉腾岱(1916年~1990年)内蒙古阿拉善旗人。青年时期,受苏联“十月”革命和蒙古人民革命的影响,心存民族大义,胸怀报国之志。民主革命时期,在担任阿拉善旗保安总队中尉分队长和北部防卡队长期间,从事着秘密革命活动,为推动阿拉善地区和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段塔拉腾岱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自治区保安总队中队长、阿拉善旗第五苏木苏木达、甘肃省蒙古自治区州畜牧处处长、巴彦淖尔盟政协常委、畜牧局副局长、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等职。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五届和六届人大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段塔拉腾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亲自率领军民围剿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残部,作战机智勇敢,以少胜多,击退了匪徒的骚扰,把缴获的牲畜、粮食等物品归还给受灾的牧民,保护了牧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深受牧民的赞誉和爱戴。参加镇压反革命斗争、积极支持抗美援朝,参加民主改革运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作了大量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段塔拉腾岱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给他落实了政策。段塔拉腾岱识大体,顾大局,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坚持工作,参政议政,为阿拉善盟的建设事业出力献策,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段塔拉腾岱于1990年2月6日凌晨3时16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5岁。

胡巴图巴依尔(1917年~1995年)蒙古族,1917年10月出生在阿拉善旗宗别立巴格一牧民家庭。1930年被陈爱尔德尼巴图收为徒弟,学习3年蒙古语文。于1933年当旗衙门书记。1935年在旗府任文书,后提任佐领。1940年创办阿拉善旗蒙古完校。1949年9月23日随阿拉善旗政府和平起义,参加革命工作,在旗蒙校主持工作。1961年调入旗教育局,同时兼任文史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下放到吉兰泰苏木参加劳动。1969年被调到“五七”大学农场劳动。1972年受“四人帮”的迫害,被赶回家。1981年恢复其工作,任阿拉善左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先后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经上级批准离职休养。1995年11月28日病故,享年78岁。

胡巴图巴依尔曾长期从事学校教育工作,为阿拉善左旗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培养了许多人才。喜欢书法、绘画、雕刻、雕塑、美术等,多才多艺,并创作许多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花纹图案作品,不少作品在区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文史室工作期间,搜集了100余万字的蒙文资料,编辑出版了《阿拉善史料》(二)等历史资料,在《巴音森布尔》发表了很多作品,为阿拉善左旗留下了有较高参考价值和利用价值的珍贵历史资料。

罗永寿(1921年~1998年8月)蒙古族,蒙古名罗布音特古勒德尔,1921年9月出生于阿拉善旗厢根达来巴格的台吉贵族家庭。幼年入私塾就读,1936年在旗立定远营中心小学学习。1940年前往兰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深造,并加入国民党。1942年6月,分配到旗区防司令部所辖骑



兵保安总队工作,见习一年后,任保安总队中队长,1946年晋升为总队中校副队长兼参谋长。是年旗府决定收回天主教堂租地,他率防卡官兵70余人前往三盛公文量土地,清算地租,收回可耕地4万余亩,分租给当地农民耕种,收回了主权,增加了旗财政收入。1948年,达理札雅提升他为旗府记名协理。1949年9月23日,随达理札雅先生和平起义。1950年,保安总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罗永寿任总队副队长,并任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宁夏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等职。1951年前往西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部深造,1953年毕业后回旗复任原职。1958年,他从部队转业,任阿拉善旗副旗长。1959年调任巴彦淖尔盟文教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兼盟政协常委等职务。“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四人帮”迫害。1977年,巴彦淖尔盟革命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工作。1979年以来,他先后任巴彦淖尔盟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并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第五至七届常委、巴彦淖尔盟第八届政协副主席、兼内蒙古自治区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他先后撰写了《小三爷事件》、《达理札雅》等几十万字的多篇历史资料,为阿拉善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他一如既往地投入到人民政协工作中,坚决拥护政协纲领,为人正派,忠于人民,深受各界人士的好评和尊敬。1998年8月,因病抢救无效在临河逝世,享年77岁。

范额尔登巴图(1927年~1985年6月22日)男,蒙古族,于1927年,出生于现在的阿拉善左旗嘉尔嘎勒赛汉苏木。1949年9月,范额尔登巴图参加革命。解放初期,接受党的领导,靠近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恢复发展生产,对中国共产党开辟阿拉善旗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阿拉善旗畜牧、林业科科长、草原站站长,畜研所所长。1956年任阿拉善旗人民政府副旗长。1978年任巴彦淖尔盟畜牧局副局长。1980年任阿拉善盟畜牧局长、顾问。1984年8月任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范额尔登巴图多年从事牧区工作,在畜牧

部门担任领导,有丰富的畜牧业生产知识和领导经验。特别是调任阿拉善盟畜牧局领导工作期间,立志改革,积极推行了牧业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阿拉善盟遭受连续4年罕见的严重旱灾,积极投入抗灾保畜斗争第一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积极建议。在战胜严重旱灾、保障发展畜牧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优异成绩。1983年机构改革中,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愉快地退居第二线,满腔热情地积极支持新领导班子进行工作。1984年,担任政协副主席后,积极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各族各界人士的团结,日夜不停的征集撰写文史资料多篇。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忘我工作,鞠躬尽瘁,是为楷模。范额尔登巴图于1985年6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终年58岁。

(待续)



额济纳旗出土元代纸币

普·那生德力格尔

一、历次出土元代纸币简况

1.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于 1907 年~1909 年间进行中亚考察活动时到额济纳旗黑城发掘并得到元代纸币 8 张。其中“中统壹贯”1 张，“至元壹百文”，“至元叁拾文”各 2 张等。现藏列宁格勒博物馆。

2.1914 年夏，英国斯坦因爵士率领其中亚探险队，来到黑城又获“中统钞”一枚。

3.1983 年秋，内蒙古文物队在黑城发掘中获元代纸币几张（未撰文公开发表）。

4.1985 年 4 月，额济纳旗吉日嘎朗图苏木牧民苏日特拉图找骆驼途中发现被风所刮出的元代纸币多张。发现地点：西距额济纳旗人民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约 40 公里处的红柳沙丘之中。旗文管所得知，及时派人去遗物现场，但没发现任何遗物及遗址。纸币属三种，下面介绍这三种纸币，以供学者参考。

二、至元贰贯钞

至元贰贯钞版心 270 毫米×195 毫米。横题额“至元通行宝钞”。贰贯两边的八思巴文、拼写汉文，相应的汉字是：“诸路通行、至元宝钞”。四边为草木流水纹花栏。“字料”、“字号”之上的千字文每张都不同。如“暑、笄”，“舟、那”等。正面盖有两个八思巴文朱印，上印 75 毫米×75 毫米，印文：“提举诸

路通行宝钞印”。下印 84 毫米×84 毫米、印文：“宝钞总库之印”。背面加盖贰贯墨印，呈 92 毫米×169 毫米，背面上半部盖有 65 毫米×65 毫米的八思巴文朱印，印文：“印造宝钞库印”。

正面下半部文字如下：“尚书省奏准印造至元宝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宝钞库子攢司。印造库子攢司。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伍定，仍给犯人家产。至元年月日。宝钞库使副。印造库使副。尚书省提举司”。

三、至元壹贯钞

至元通行宝钞。壹贯版心 184 毫米×267 毫米、字料：食，字号：忘。背面墨印呈 169 毫米×98 毫米，金额下边有一串铜钱图案。文字及正背面朱印均与贰贯钞相同。

四、至正伍佰文

中统元宝钞伍百文。规格：272 毫米×188 毫米。外围草木流水纹其内上两旁复八思巴文与九叠汉文各占两行，内两行书八思巴文相应的汉文字是：“中统元宝，诸路通行”与汉文字完全相同。字料：夜，字号：光。中间书“伍百文”三大字。下半部文字：“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元宝交钞库子攢司，印造库子攢司。伪造者斩，赏银伍定，仍给犯人家产。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中书省提举司”。正面上半部盖有 81 毫米×81 毫米的八思巴文朱印。背面盖有 135 毫米×88 毫米的墨印，图案较清楚，外围草叶花栏，上三分之一处“至正印造元宝交钞”排为两行，下三分之二处有“又”字型五串铜钱图案。背面下半部盖有 56 毫米×56 毫米的八思巴文朱印。

五、发行及被遗弃年代

1.因与这批钞一同出土至正钞“伍佰文”。至正十年(1350年)十一月元惠宗(顺帝)诏告天下，发行新中统交钞，背面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墨印。同时又发行了至元钞。壹贯新钞合至元钞贰贯。额济纳旗出土这批钞中只有三种面额，至元壹贯壹张、至正伍佰文三张，其他钞则全为至元贰



贯。那么,三张至正伍佰文加一张至元壹贯,等于贰贯至正新钞,也是四贯至元钞。而额与价值这样吻合,则进一步确立了:“一贯新钞合至元钞两贯”的论点。再说这几种纸币的磨损程度也基本相同。

2.没有发现小面额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才开始印造至元富钞。1287年至1308年是元钞盛兴阶段,同时又出现至元五文、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等小面额钞。发行小面额钞是元朝纸币制度完善化的特定产物。绝不可能产生于纸币制度崩坏,通货膨胀的至正年间。至正年间,小面额钞已失去了货币价值。“杭州米价卖到二十五贯一斗,为正常米价的六七千倍,折成中统钞则上涨了六七万倍。贿赂官吏纸币用车载”(周铭,蒋映光:《我国古代纸币的起源和发展》原载人民日报),所以二三百文以下的小面额钞在至正年间已成无用之物了。

3.壹贯钞背面没有特别任命官员的具名及盖章。“这种纸币的制造,无论在它的规格和认可手续都和真正的纯金币或银币那样郑重可信。因为有许多特别任命官员,不尽在每一张纸币上具名,而且还要盖章。当他们全部依次办完这几道手续后再由皇帝陛下任命的总管,把他那所保管的御印,在银珠中一蘸,盖在纸币上,于是,印的形态,因银珠而留在纸币上,永不褪色,纸币通过这样处理后,取得了通用货币的充分权威和信用”(马可·波罗游记)。自从至元钞开始发行(1287年)到1308年间是元代纸币的发展阶段,无论每张纸币的印造手续都很严格而齐全。因此不可能出现以上漏洞。武宗至大二年(1309)至惠宗至正九年(1349)之间一度停用旧钞,而发行至大银钞和铜钱并用。后来虽然恢复旧钞,但数量很少。元惠宗至正十年(1350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是整个元朝走向崩溃,国内大乱,处处爆发农民起义,外加各种自然灾害,纸币制度混乱,通货膨胀,印钞无量,赏赐无度,民间伪造纸币,使财政经济无法保障,即到了“……物价腾涌、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辘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元史·食货志·钞法)的地步。既然钞币制度到了如此地步,岂能署名盖章吗?所以这壹贯钞



无疑是至正年所印。

4.额济纳旗出土这批元钞时,既没有包装,近处又无遗址,说明这批钞变得“……被视为废纸,互不授受,俱皆不行……”之物了。其中有部分贰贯钞缺少千字文,这又说明当时“每日印造,无可计数”的一个见证。

总之,这批钞发行于至正年,弃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间。以上观点妥否,请海内学者指正。



略谈居延汉简的发掘与研究

瀚海杨

如果说简牍是我国优秀的古文化中难以估价的丰富宝藏,那么,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就是这些宝藏中璀璨夺目的明珠之冠。居延,对于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来说,早已成为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这是额济纳人的自豪,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一、居延汉简的发掘

俄国著名的考古探险家科兹洛夫从 1883 年开始到 1924 年约 40 年的时间里,参加过 6 次对中亚西亚的大规模探险考察活动。其中 1907 年至 1909 年的第五次探险考察期间,他于 1908 年 3 月 19 日带 4 名助手,首次来哈拉浩特(黑城)古城遗址,在哈拉浩特遗址上找到了大量的文书手稿、书册、佛像、塑像、玉器、古钱、青铜器、简牍等。1909 年 5 月,科兹洛夫第二次进入哈拉浩特。这一次科兹洛夫在古城遗址内整整 1 个月的考察和挖掘,收获比前一次更大。1923 年至 1926 年科兹洛夫去蒙古地区进行考察时,又曾到过哈拉浩特进行挖掘,收获也相当客观。科兹洛夫先后几次对哈拉浩特遗址的考察和挖掘,窃取了我国大量的无价之宝,由此给这位俄国人带来了声誉,同时,居延地区也震惊了世界。

1914 年,英籍(1940 年加入英国国籍)匈牙利考察家斯坦因也来到哈拉浩特考古发掘。他先后四次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前三次考察是受印度政府之命,向亚洲腹进行探险。第一次是 1900 年至 1901 年,第二次是

1906年至1908年,第三次是1913年至1916年。就在这第三次考察探险期间,他率一支探险队由酒泉北上,沿额济纳河来到哈拉浩特遗址,又一次进行疯狂的盗掘。他获得的大量珍贵文物中也有部分简牍。

1927年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与当时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商定,共同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决定对西北地区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这个考察团由斯文·赫定和徐旭生共任团长,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袁复礼、考古学家黄文弼等人参加了考察。就在这一年,该考察团到额济纳河流域考察了居延遗址,但由于当时国内军阀割据,考察经费难以筹集而停止。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考古家傅克·贝格曼在这里挖掘出土汉简1万多枚。这在当时轰动了世界。人们把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并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

1972年至197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对破城子、肩水金关和甲渠塞第四燧进行了调查挖掘,获得汉简2万多枚。这些出土汉简最早的纪年为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32年),以宣帝时期的简较多。

1983年和1984年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所联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黑城及周围地区进行考古挖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历代文书档案和其他文物。此外,也获得了一些汉简。另外,额济纳旗文物站也陆续搜集了部分散简。

二、居延汉简的历史价值

居延汉简有新旧两部分简牍组成,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出土的称旧简,1972年以后出土的叫新简。

居延两次考古收获,“居延”成为汉简的代名词。居延挖掘出土的汉简,同全国出土汉简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解放前后在中国出土简牍近40次4万余枚,而居延汉简就有3万多枚,占全国出土简牍总数的80%之多。

居延汉简从历史考古角度讲,它有着很强的原始性和绝对的可靠性。同时,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从而,对历史研



究,特别是汉代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首先,它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北屯戍的历史。对于研究汉代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都有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为研究我国书籍制度和档案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书籍制度在我国大约有 3500 多年的历史,其形成大体有简策、卷轴、册叶等几个发展阶段。其中简策是我国书籍最早的形式,是书籍制度形成的最初阶段。简策在商代就已经使用,到了两汉,简策使用最为广泛,居延汉简的大批出土,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再次,居延汉简是难得而珍贵的最早的墨书真迹。这批汉简书写时间从西汉到东汉延续长达 100 多年,这正是中国书体大变革和多种书体孕育产生的时期。居延汉简和其他汉简相比,书体齐全,数量居首,对研究我国书法史和书法艺术都是极好的实证。

三、居延汉简的研究和整理

居延旧简发现后,于 1931 年,由劳干、贺昌群、马衡、余逊等人分别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1936 年,由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劳干、余逊 2 人的部分释文用晒蓝图纸晒印成册。抗日战争期间由沈仲章、徐森玉等人在香港将居延汉简用手工拍摄照片,交商务印书馆影印,正在制版当中香港沦陷为日军占领区,从而,书版全部毁佚。当时劳干先生手头还保存一部分翻转照片,劳干根据这部分翻转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于 1943 年在四川省南溪以石印版出版。1944 年又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1949 年劳干对南溪石印本略加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

1959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较好,比劳干释文有较大改进,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可惜的是只收入 2596 个简,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一,难以窥其全貌。

1980 年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



片和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了简的出土地点。这使国内外考古、史学工作者以广泛利用居延汉简资料,无疑有助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1987年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本书以《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为底本,凡是《居延汉简甲乙编》释得正确的,一律照录;《居延汉简甲乙编》错释、漏释、未释出的,除极少数不能确认的仍照录《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或者改作一字一“□”符号外,其他一律作了校订。这对研究利用居延汉简又一大贡献。

1988年1月,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一书,此书注释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三位同志,从居延新简中择200多枚进行注释,尽管此书不能全面反映居延新简全貌,但它却能起到尝鼎一脔的作用。1991年5月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原稿是1985年作者应兰州大学历史系之邀,给三、四年级开设《居延汉简通论》选修课而准备的教材。全书共八章三十四节,对居延汉简的调查发掘和汉简内容等进行论述。1997年,李振宏等著《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论文15篇。

此外,国内外还出版贝格曼:《蒙新考古纪行》、波·索墨斯特洛穆据贝格曼原始记录整理的《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额济纳河流域障隧述要〈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57年台北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60年台北重订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7年版、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等几十部研究成果,均从各个角度记述和研究了居延汉简。

总之,自20世纪30年代居延汉简第一批发掘出土以来,尤其是近2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日本、英国、美国、荷兰、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从事汉简研究的人数空前增多,出版的专著、论文、与日俱增,在国际上兴起汉简热正在波及各国学术界。



贝格曼与居延汉简

陈贵敏

沃尔克·贝格曼是瑞典考古学家，在他只有 43 岁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就先后 3 次共 8 年时间在中国西部的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古探险工作中度过。而这 8 年，正是他从 24 岁到 32 岁生命中最壮美的青春岁月。

1927 年，年方 24 岁的贝格曼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不久便进入一家研究机构，一个意外的机遇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瑞典国家古物管理局柯曼博士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放弃国内舒适的生活，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到中国寂寥的西部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考古探险工作。当时，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先生正在组织一次历时最久的中亚探险，并与中国学者一道组建起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中除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外，还需一名外籍考古学者。柯曼博士的电话，正是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考察团。24 岁的贝格曼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然是必去无疑”。这一去，不是一年半，而是 8 年。贝格曼从始至终参与了中国西北最大规模的多国籍、多学科的科学考察，直到日本帝国主义燃起侵华战火，贝格曼才不得不结束在中国西北的考古工作。

作为十分敬业的考古学者，从 1927 年到 1934 年，年轻的贝格曼穿行在中国大西北的茫茫戈壁荒原，行程数万里，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旅途是靠骑骆驼或徒步，有一半的考察地区荒无人烟。在 8 年的考察实践中，他发现



了 300 余处古迹、遗址,并亲自实地考察了其中很大部分,他还收集了大量的古代实物,而他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遗址发现的万余枚“居延汉简”和日后在新疆罗布泊发现的“小河古墓”这两个成就,使这位年青的考古学者名播中外。

1929 年 8 月,贝格曼途经新西伯利亚辗转来到北平,第二次参加仍由斯文·赫定组织的中国西北考察团。10 月初考察团离开北平,在张家口的草原哈登庙聚集。11 月中旬,贝格曼与中外考察队员牵着两匹马和 85 峰骆驼,冒着摄氏零下 40 多度的严寒,艰难地行走在茫茫草原,经过 1 个多月的跋涉,他们再次来到百灵庙,不少队员被严寒冻伤,不得不在这里接受治疗。12 月底,考察团分北、中、南三个分队向西推进,相约三周后在善丹庙(位于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境内)会合。1929 年最后一天,贝格曼与霍涅尔的南分队出发了。1930 年 1 月 10 日前后,贝格曼一行来到了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曼回村(即蛮会镇),村里有比利时传教士所设的基督教传教堂,贝格曼一行住在了传教堂温暖的房屋中。

1 月中旬,他们到达善丹庙,稍作逗留后,贝格曼继续西行,直到 4 月 17 日,与其他队员再次相聚于额济纳河畔的奥龙托依绿洲。4 月 26 日,贝格曼与陈宗器等考察人员来到波罗桑齐,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探寻之中。

波罗桑齐有汉代烽燧遗址,1927 年参加西北考察团时,贝格曼曾途经此地。本不期待在这儿有任何发现,却由一个偶然的小动作引出了一个重大发现。

到波罗桑齐后,贝格曼便立即开始了工作。他在山顶上的烽燧和房屋废墟下面,发现有院墙的痕迹。当他与助手在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他的钢笔掉在了地上,他在弯腰捡笔时,意外发现地上有 1 枚汉代的五铢钱,于是贝格曼便仔细地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又找到一个青铜箭镞和 1 枚五铢钱,意外的收获使贝格曼决定要在遗址旁尝试着挖掘。

4 月 27 日,从墙体遗址的东边开始挖掘,不一会儿就发现一片木简,木简上墨写的汉字依稀可辨,贝格曼激动不已。他知道,在西域探险考察中,



只有斯文·赫定在楼兰古城和斯坦因在陇西及新疆发现过木简。贝格曼与助手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四处寻找起来,很快又找到几枚保存更好的木简。

考察队的其他队员前往额济纳河考察,贝格曼、陈宗器和两名助手留了下来,他们继续挖掘,很快又发现了一些汉简。贝格曼甚至不放过一些在汉代烽燧旁边已经繁衍了几百年的老鼠洞。在一个老鼠洞里发现了碎纸片,贝格曼猜测这是公元前2世纪的遗存,他在《考古探险手记》中这样记述道:“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块拖回洞里,成了一个小小‘图书馆’。”

5月,贝格曼与考察队在1927年秋驻地附近的桑多林察罕安营扎寨。他打算对额济纳河三角洲中的遗址进行清点并编目,从5月14日开始,贝格曼、霍涅尔和陈宗器在三角洲内开始了考察。很快,他们便在一座矮山上的烽燧附近的遗址里挖掘出47枚木简和一些木梳、铁斧、铁针及盒子等生活用具。

贝格曼在三角洲内循着烽燧遗址不停地考察,每一处或多或少的发现都使他激动万分。从5月17日始,从库克成庙、察罕桑齐、伯楼桑齐、桑齐阿莫等遗址挖掘出的“唐卡”、汉简、箭镞都十分珍贵。几天后,他们来到索果淖尔湖和噶顺淖尔湖畔考察,6月底,回到设在毛目绿洲正东的考察团大本营。7月初,贝格曼离开毛目途经金塔前往肃州。

8月底,贝格曼来到肃州后,斯文·赫定给他来信,让他和霍涅尔前往罗布泊进行考古和绘制北返新湖的地图。此时的贝格曼正醉心于居延汉简的寻找与发现之中,尽管贝格曼“十分乐意与霍涅尔联合继续西行进入内陆,但我担心也许会有别的什么人路过额济纳,会无意中收获了我刚刚发现的果实。而一旦到达罗布泊,我不知道还能再返回额济纳我发现的废墟那里去”(贝格曼《考古探险手记》)。当斯文·赫定先生得知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的消息后,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于是立即给贝格曼打电报,重新调

整工作安排,让他静下心来,“按照自己的工作计划专心工作,不再去罗布泊了”。并且安排在新疆的生瑞恒、蒙杰尔和挖掘工靳土贵等迅速乘车驶往额济纳帮助他挖掘。9月16日,贝格曼返回毛目。其后的半个多月里,贝格曼主要是在毛目附近考察,在一个叫拉林金德布林的古城考察,这里有汉代和西夏时期的遗址。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共挖出1500枚木简。

10月7日,贝格曼过河到阿温托胡依德布林古城附近的汉代烽燧挖掘,发现了一些木简和一些小古物。第二天,生瑞恒、蒙杰尔、敦格拉等与他在会合,这是他与生瑞恒自1927年11月分别3年后的首次见面。会合后,大家重新制定计划、编组和分配设备。贝格曼则到4个月前发现大量木简的乌兰德布林古城考察。经过半个多月的辛勤工作,汉简不断发现,这些木简文字记载的内容大多是公元50年左右的事,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器、漆碗和印有文字的丝绸碎片等。

秋天即将过去,贝格曼循河到下游一个叫察合台烽燧附近挖掘,靳土贵挖出了用绳子捆在一起共有78枚木简组成的一卷完整的木简书籍,根据内容判断,书中记载的是公元93年~公元95年的事情,是一卷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同时出土的还有容器、汉币等文物。由于抵挡不了强劲的秋风,他们中断了挖掘,沿着额济纳河东岸行走,经过巴哈德布林、布肯桃来、北乌兰德布到达哈拉浩特附近的大废墟巴兰库额,沿途挖掘路经的烽燧遗址,总是或多或少有所收获。

贝格曼在忙碌中度过了圣诞节。27日,他再次来到穆德布林遗址,遗址位于1927年考察团设立的松杜尔气象站附近,从遗址望去,破碎的瑞典国旗仍在寒风中飘扬着。

穆德布林的发掘使贝格曼处于极度兴奋之中,这也是贝格曼两年来收获最丰的一个时期。近一个月的发掘中,几乎天天有收获,先后共挖掘出约4000多枚木简,除木简外,还挖出了丝绸碎片、青铜器,破损器皿和陶瓷碎片,最有趣的是发现了一枝完整的毛笔。

穆德布林遗址发现的木简中,许多都记有纪年,而且时间跨度也大,最



早记录的是公元前 127 年,几乎一直延续到公元 25 年,时间跨过 150 年左右,也由此证明,穆德布林城堡 150 年间一直有人驻防。

贝格曼在不停地绘制主河道西岸戈壁的线路图。这一带的烽燧都散建在纳林河和木林河之间,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当地人称察罕桑齐、安德干桑齐、塞恩桑齐、穆桑齐和乌兰桑齐。这些烽燧与其他烽燧一道成为哈拉浩特的边防基地,它们位于穆德布林周围十多公里处。

贝格曼决定暂时停止发掘汉代遗址,利用这段时间,专心致志于宋、元遗址的探索,于是在 1931 年 1 月 29 日来到了哈拉浩特——黑城遗址,驻扎在城外东墙附近一处低矮房子废墟中。

俄国的科兹洛夫、英国的斯坦英、美国的兰登·华尔纳都曾对黑城遗址进行过掠夺性的挖掘,贝格曼不是来采集他们的残羹剩饭,而是尝试着探寻废墟是否有汉或唐代的遗迹。通过考察发现,黑城中没有汉的遗迹,唐朝出土的文物也少,由此断定,汉朝驻军撤离后,额济纳地区情况不明,有唐代少量遗物,唐以后,从宋、西夏到元朝末年,一直有人居住,而居住的中心就是黑城,黑城废弃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缺水。

2 月初,贝格曼中断了对黑城的挖掘,返回到波罗桑齐驻地。14 日,挖掘工作进入尾声,队员们都在整理包装文物,之后又返回到奥布顿营地,并在那儿愉快地度过了中国的旧历年。3 月 1 日,贝格曼来到温音桃来,这是在额济纳最后挖掘的一站了。在这里发现了插在皮鞘里的小刀、皮水袋、青铜箭头芦苇箭杆的完整弩箭、木筒和木筒中的一张文稿以及彩色丝绸碎片和一件用草绳纺织而成的雨衣。温音桃来的挖掘结束后,3 月 27 日,贝格曼一行带着文物向东出发,踏上返途。

1931 年 4 月 15 日晚,贝格曼一行到达归化,第二日便乘火车前往张家口,19 日,贝格曼与奥伯格回到了北京。

1 万余枚居延汉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立即进行了粗略分类,刘半农、马衡两位先生与他一同进行整理,最后由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完成分类。6 月 3 日,贝格曼离开中国,途经俄罗斯和芬兰,于 18 日回到阔别两

年的故乡瑞典斯德哥尔摩。

贝格曼回国后,居延汉简继续由中外学者共同进行分类整理,主要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刘半农、马衡及向达、贺昌群、劳干等一同整理,但整理研究工作尚未完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留在上海的简牍照片毁于战火。万幸的是原简由沈仲章、徐玉森等从北京经天津、青岛转至香港大学图书馆。沈仲章再次开始拍照、剪贴、编号、排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简牍照片再次毁于战火,原简由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等协助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1949年之后,在胡适先生的交涉下,原简由美国运交台湾当局,现仍存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外,在这里保存的还有1930年黄文弼在罗布泊获得的71枚简牍和1944年夏鼐在敦煌所获的48枚简牍。现在台湾方面公布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两岸学者都盼望着居延汉简能早日以全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先后发掘出的1万余枚汉简,是建国前短时期内出土最多的一次,居延汉简因此而名播中外。

居延汉简——贝格曼,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俄国中校掘走黑水城珍藏

金点强

黑水城遗址地处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人迹罕至。然而在 900 年前,这里却是我国历史上西夏王朝的重镇。在黑水城,流传着一个故事:西夏末年有一个名叫黑将军的西夏守将在黑水域与敌军交战,寡不敌众,被困城中。绝望中,他杀死自己的妻儿,将府库所藏 80 车财宝深埋井中,率军突围。最终在黑水城外的树林被包围,全军覆没。从那时起,黑将军藏宝的故事流传了下来,而这个故事也引发俄国大盗科兹洛夫的掘宝行动。

1908 年,俄罗斯海军中校科兹洛夫到中国西部“探险”。行前,科兹洛夫就听说黑水城附近“拨开沙土就可找到银质的东西。”于是科兹洛夫一行来到巴丹吉林沙漠。科兹洛夫到达后了解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外国人到此探宝,但都未如愿。当地蒙古族的土尔扈特人警惕性非常高,遇到外国人询问黑水城情况时,不是假装不知,就是故意将那些探险者引向离遗址更远的地方。

1908 年 8 月,科兹洛夫抵达蒙古巴登札萨克王爷领地,札萨克王爷非常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是管辖这地区的清王朝官员。科兹洛夫花很大的力气与代表清政府管辖这一地区的札萨克王爷和其他地方官员搞好关系,登门拜访,亲切交谈,并施以钱财。雄厚的札萨克王爷人终于经不住科兹洛夫的哄骗,将黑水城的秘密和盘托出给这个阴险狡诈的外国文化强盗,札萨克王爷甚至还派遣 1 名熟悉地形的向导给这帮掠夺者引路。科兹洛夫终

于来到了与世隔绝了 700 多年的黑水城。

从 1908 年 4 月 1 日开始，科兹洛夫一行连续在黑水城呆了 13 天，挖掘出大量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共约 160 公斤。由于害怕当地人怀疑，科兹洛夫不敢有任何停留，迅速将这些宝物运往彼得堡。当这些宝物被运到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结果令人吃惊：这些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上的文字就是中国古代的西夏文。这种文字已经消失，而且在当时无人能识，是一种重见天日的死文字。1908 年 11 月，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科兹洛夫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进一步发掘”。

1909 年 5 月，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域，在城内外各处重新展开大规模挖掘行动。令科兹洛夫大失所望的是，这次大规模发掘竟然毫无发现。6 月 12 日，搜寻的工人撬开西城外一座高约 10 米，底层面积约 12 平方米的佛塔的底层，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多达 2.4 万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无怪乎后来俄国人声称仿佛找到了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在之后的 9 天里，他们彻夜不离这个佛塔，拿出件件文献刺绣艺术珍品，偷偷运往秘密营地。尝到甜头的科兹洛夫发现了“伟大的塔”后，挖掘行为变得更加野蛮，几乎见塔就挖。黑水域周围总共被挖掉了 30 多座塔。后人统计，黑水城周围 80% 的塔因为科兹洛夫的疯狂盗挖行为而被毁坏。他们将挖掘的宝物打包，用 40 只骆驼装载这些罕见的文献与 500 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了归途。

黑水城的珍藏是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黑水城出土文献展示了辽、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时期的文化，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迄今为止，在有关西夏考古资料的发现中，黑水城出土文献数量最多、价值最高。西夏地下文物 90% 是出自黑水城，此后出土的文物，在数量、价值或种类上都难以与黑水城这次被盗的文物相提并论。



来自西夏王国的绝世孤品

——黑水城双头佛

杨 剑

制造年代:西夏

类 别:泥彩塑。以黏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揉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制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再着色描绘的作品称彩塑。根据摆放位置与使用范围可分为:石窟彩塑、庙宇彩塑、陵墓彩塑、民俗彩塑。泥彩塑艺术是我国民间艺术品中勾画故事人物的艺术之花。

流失时间:1908年

现 藏 地:俄罗斯冬宫

流失原因:考古学界中臭名昭著的俄罗斯海军中校科兹洛夫,在科学考察的名义下,带领一支武装起来的强盗队伍,专门来到黑水城盗掘传说中的珍贵文物。

一、曲折经历

黑水城双头佛与古代西夏国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

公元1038年,在中国的西北部崛起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王朝——西夏。西夏国先后与同时代的北宋、辽,以及南宋、金两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足200年便迅速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推向了顶峰。然而,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长达20多年的军事征服和突如其来的一场强烈地震,使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190年的王朝在很短的时间

内便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黑水城，一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古城，如今静静地倒卧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戈壁大漠中见证着这段历史。

黑水城为当时西夏王朝重镇，是西夏北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额济纳旗达赖库布镇东南 25 公里的荒漠中。这座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城，曾经是一片绿洲，是一个牛羊成群、五谷飘香的好地方，也是制造出双头佛这样的珍贵工艺品的地方。历史上留下的条条古渠，块块农田，还有成了残垣断壁的座座村庄，似乎都在顽强地显示着它曾经有过的繁荣。

千年之后的今天，辉煌早已逝去。黑水城废弃后，古城及周围的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河流改道，没有了水源，古城逐渐被沙漠所包围，每到风季，常常是狂风呼号、流沙飞扬，黄尘漫天、不见日月，给人以神秘、恐惧之感，因此又称“死城”。然而，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包括干燥的气候和干燥的土壤，才把黑水城的古代遗物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在它无尽的黄沙之下，埋藏着大量的西夏、蒙元和汉、藏文物。令人遗憾的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已有大量珍贵文物被外国的“探险家”们盗掘走了。今天翻开那段被尘封许久的古代文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西夏历史在中国，西夏研究却在海外——我们失去了整整一页耀眼的历史。

19 世纪开始，俄国人科兹洛夫的“探险”队伍到达西夏国遗址，随后，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接踵而至。黑水城双头佛的流失，就与俄国的“科学考察”有关。

1908 年 4 月的一个黄昏，一支驼队幽灵一般出现在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驼铃声穿越大漠、戈壁，朝着额济纳旗传来。这是一支经过清朝政府同意，名义上受俄国地理学会派遣，专程进行“科学考察”的队伍，为首者是在考古学界臭名昭著的俄罗斯海军中校科兹洛夫，这是一支用专业知识武装起来的强盗队伍，他在科学考察的名义下，专门搜刮各地的珍贵文物。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西夏传说中的宝藏。



在此之前,另一个俄罗斯人波塔宁曾经到过黑水城。在黑水城,他听到了一个传说并写进了自己的传记。在西夏末年,西夏守将哈日巴特尔曾经驻守在这里,人称“黑将军”。此人作战勇敢,英勇无比,无奈在保卫黑水城的战斗中,最终因寡不敌众被围困城中。攻城的敌军久攻不下,最后从外部切断水源,使整座城池陷入绝境中。黑将军率军士在城内掘井,掘了数十米深,依然没有水,黑将军彻底绝望了。他杀死了妻儿,将黑水城 80 车财宝全部投入挖下数十米的枯井之中掩埋,随后率军突围,浴血奋战数日,最终全军覆没。这个传说为黑水城引来一批又一批的盗宝者,然而却没有人找到宝物,只有这个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流传着。

科兹洛夫和所有 19 世纪、20 世纪初到达过黑水城的外国人一样,正是冲着这个传说而来。他一踏入黑水城这块土地,就为这里带来了灭顶之灾。

当年来到额济纳的科兹洛夫在寻找黑水城的遗址时,曾被当地牧民一次次地拒绝。牧民们心里清楚,一批批来这里的所谓探险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占为己有,这一点在土尔扈特人看来是极不道德的。最终,有备而来的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什。达什王爷经不起物质的诱惑,不但为科兹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线,而且还加派了向导。

1908 年初春,科兹洛夫终于找到了梦幻般的黑水城。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看着黑水城的残垣断瓦,气势依旧的城墙,科兹洛夫知道这里一定埋藏着他所需的宝物。他率领队伍驻扎下来,开始了在考古名义下的掠夺式挖掘。他在城中心的西夏佛塔内找到了成捆的西夏经卷和元代的至元宝钞,在城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地挖出了十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文物。

经过了疯狂的挖掘后,科兹洛夫的目光盯上了黑水城内大大小小的佛塔,在短短的 9 天里,这个自诩为考古专家的强盗挥舞着他罪恶的锹镐,一口气挖了 30 多座佛塔。在强盗的挖掘中,黑水城颤抖着、怒嚎着。围绕着黑水城的近千年的佛塔百分之八十就这样在一个考古强盗手中毁于一旦,科

兹洛夫也彻底破坏了黑水城——这个堪称西夏博物馆的地方。

这些被挖出来的稀世珍宝最终离开了黑水城，经由蒙古驿站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文物中那些没有人认识的文字和造型独特的佛像让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即作出决定：科兹洛夫探险队放弃原继续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动，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对黑水城展开更大规模的挖掘。

1909年6月，科兹洛夫仅用了9天时间就从青海重返黑水城，对黑水城展开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挖掘。他雇用了大量民工，翻遍了黑水城东街、正街两侧的店铺作坊，挖掘了总管府和全部佛寺遗址。由于这次在城区内收获不大，科兹洛夫便将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墙约400米、位于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为了他首先猎取的目标。当这座佛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这就是后来被科兹洛夫载入书中的那座“伟大的塔”。之后，他又将城外每座佛塔的塔身和塔基都一一刨开，找到了大量西夏、宋、元不同时期的历史遗物。其中有书籍、文书、手稿、佛像，绘画等珍贵文物，西夏的绝世孤品双头佛也在其中。

科兹洛夫一生中，一共三次涉足黑水城，第三次受谁旨意，这在所有有关他的记载中都未曾提到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每到来一次，黑水城就会遭受洗劫一次，这是比地震还可怕的人为灾难。据说科兹洛夫当年除把能运走的运走外，一些大件不便运走的就近埋在了古城的周围，但究竟埋在什么位置，埋了多少至今还是个谜。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挖掘而蜚声海内外，使他从此在考古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当年，科兹洛夫曾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用幻灯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伟大发现，随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们辉煌的战果。

科兹洛夫走后，闻讯而来的还有美国“探险家”，接着是英国人、日本人，黑水城这个在西夏王朝中占据着极其重要地位的西夏北方政治文化中



心，就这样在强盗一遍又一遍的践踏中只剩下了一片碎石砾瓦的废墟，在烈风、骄阳、风雨中残喘。从此，黑水城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几乎全部被搬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和其他众多博物馆的保险柜里和展览台上。

二、国宝内涵

关于双头佛像的来历，早在印度的佛经中有记载：在古代印度的犍陀罗国，有一位穷苦人，经过多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才积攒下一枚小小的金钱，把它交给了一位画工，请他在寺院中为自己彩画一身小佛像，以表达对佛的敬意。一枚金钱画一身佛像是远远不够的，但画工被这位穷苦人的赤诚所感动，就不再谈论价钱了，答应他一定画成。这位穷人刚走不久，又来了一位穷人，也是拿着一枚小金钱要求画佛像。画工就用这两枚金钱，请了一位高手，共同画成了一尊佛像。几天以后，两位穷人不约而同地都来到寺庙拜佛，画工指着那身新绘成的佛像对他们说：“我并没有贪占你们分文，你们的钱全用在这幅佛像上了，但也只能画一身。这要代表两个人的心愿。”话音刚落，佛陀便施出法力，佛像就显出了灵异，渐渐变成了两个佛头共处一身的奇妙画像，像是双胞胎挤在圆脖子里，并且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两个穷人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对佛教的信仰。

西夏王国大力提倡佛教，僧人颇受照顾，境内修建了很多寺庙和佛塔。西夏人在佛塔中放置了这件形象传神的泥彩塑双头佛，就是寄托他们对佛祖的忠诚信念。

三、国宝价值

在冬宫和距离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不远处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藏有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放置在馆内首要位置的就是这尊彩塑双头佛。双头佛非常精致，是佛教中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除了史书上的记载，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古代双头佛像作品，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件。

四、回归难题

双头佛像的泥塑作品,人们所知的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件,所以异常珍贵。同其他被盗的国宝一样,西夏双头佛的回归亦希望渺茫,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与俄方协商“借”俄藏西夏文物来深入研究,让更多的西夏文化传播开来。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特别是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历时3个多月对早已是千疮百孔的黑水城做了首次全面的发掘考察。据记载,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黑水城的两次挖掘中,共清理出西夏文献3000多页,但大多以残页为主,这和当年科兹洛夫的所得相比,简直无法同日而语。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当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站在东方研究所内,站在黑水古城被盗文物、文献面前时,他们的心颤栗了。这里有西夏文文献8000多个编号,其中不同版本的佛经近千种。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在距离东方研究所不远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同样藏有黑水古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当来自故乡的学者们在俄罗斯守卫们警惕的目光中走近这些成就于中国大地上的灿烂文化时,那种揪心的酸楚让每个人都感到窒息。把俄藏全部西夏文物整理出版,弥补中国历史的缺憾,是每一个中国西夏学者的梦想。

1992年,史金波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与俄方接洽,联系出版事宜,合作协议于1993年达成。此时的中国学者们清楚,他们所能做的只有利用有限的时间和难得的机遇,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项历史工程。在前后4次,累积约1年的时间里,专家学者们整理登记、拍摄了差不多四分之三的俄藏黑水文献,这些大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目前,已编辑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14辑。

五、同类国宝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千佛洞),西千佛洞和榆林窟。有时也将其中最大的莫高窟称为敦煌石窟。敦煌彩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是在我国数千年雕塑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融会了外来艺术,从而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彩塑艺术。

现存的 2000 多身彩塑,无不闪烁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古代工匠们以纯熟的技巧、高度的概括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把泥塑和彩绘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了许多造型优美、神态生动的艺术形象,为研究我国的雕塑艺术和继承民族艺术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晋祠圣母祠中的代表作“侍女像”是宋代彩塑,以真人为依据,真实自然,具备凡人气质,缩短了人与神的距离,进一步体现了人神统一的风格。这是晋祠圣母殿中十身侍女像之一。殿内共有 43 尊泥塑彩绘人像,这些塑像造型生动、姿态自然,尤其是侍女像塑造得更好。这些侍女像的身材比较适度,服饰美观大方,衣纹明快流畅。一个个性格鲜明,表情自然。加之高度与真人相仿,更显得栩栩如生。在技巧上,工匠们相当准确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解剖关系,手法纯熟,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这些塑像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双林寺雕塑。在山西平遥双林寺千佛殿四周的墙面上,有成百上千的壁塑,是圆雕、高浮雕和浅浮雕结合而成的。“童子参观音”即是其墙壁上的一组雕像,风格独特,形象生动,富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是该寺彩塑的精华。观音,是佛教中的菩萨之一,佛经中称其能解救苦难众生。这组是明代的作品,塑、绘技艺高超,形象带有安详和荡的情味,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达到了“传神”的意境。

这种双头佛像,在印度的佛经中有记载。传说有两个穷人,他们都想请一个画家来画佛像,但是又没有钱,结果这个画家就画了一幅双头佛像。除了这个记载,我们所知道的双头佛像作品,只有黑水城出土的这一件,所以它非常珍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史金波

西夏文明之发现与研究概述

瀚海杨

一、西夏王国的消失

西夏是 11 世纪初崛起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新兴王朝，它为羌族的分支党项族所建。1038 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夏。西夏的活动区域一度东临黄河、西抵玉门关、南迄萧关，曾与宋、辽成三足鼎立之势，雄踞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的大部分、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的大部，以及陕北的部分地区。

由于境内党项、汉、回纥、吐蕃、蒙古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西夏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均得到相当发展。畜牧业以盛产骆驼著名，羊马亦多，手工业主要有织毯、兵器、印刷、陶瓷等等。西夏最强盛时，其帝李元昊曾令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造西夏文。到了 1039 年，西夏文字自成体系，史称蕃书或蕃文，通常与汉字并列使用。西夏文记录的是党项族语言，属表意体文字，使用传播的范围曾遍及中国西北地区，历时长达近 200 年，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创仿汉文字使用期最长的一种。

13 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蒙古各部，势力强盛，多次发兵征讨金国和西夏。西夏在最后的 23 年中，先后遭受蒙古军 5 次进攻，其中，两次发生在安全执政时期。1219 年至 1223 年，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远征中亚。1224 年，西夏李遵頊让位给次子李德旺。李德旺想乘成吉思汗西征未归的机会，联合漠北蒙古部落共同从后方袭击蒙古汗国。留驻华北的蒙古军得知西夏



这一阴谋,立即调兵攻破陕北银川。西夏军战死数万,人口、牛羊被掠走数十万,守城主将塔海被俘杀。李德旺又只得表示愿遣人质请降,蒙古军暂时退兵。

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胜利返回漠北。次年春,成吉思汗以西夏拒绝出兵帮助西征,并且不纳质子为由,向西夏讨伐。这回是东西两路夹击。西路蒙古军由西域东进,兼用攻坚和诱降两种手段,连克西夏右翼沙、肃、甘诸州。成吉思汗亲率东路10万军从漠北南下,三月攻克黑水、兀刺孩等城,乘胜直驰贺兰山。西夏大将阿沙敢卜战败被俘。七月,蒙古两路军队会合攻克凉州,西夏守将斡扎篾力屈投降。继西夏帝位仅4年的李德旺惊悸而死(46岁)。李德旺侄子南平王继位,他是西夏的末代皇帝。

1226年八月,蒙古军越过沙陀(今中卫县西),抢占黄河九渡,攻克应里,这时城中“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骑兵驰过冰封的黄河,猛攻灵州。西夏遣嵬名令公率10万大军到灵州,支援主将德任,西夏军全力抵抗。这次战斗之激烈,为蒙古军战史上所罕见。灵州终于陷落,德任被杀。十二月蒙古军攻克灵州后,四出搜杀西夏军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无一二,白骨蔽野”。蒙古军乘胜包围了中兴府。

1227年初,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军队继续围城外,自率主力南下攻克金国的积石、临洮、西宁等地(今甘肃和青海两省境内)。六月,成吉思汗回六盘山避暑,遣千户察罕赴中兴府招降。这时中兴府已被围困半年,曾率军坚守孤城的西夏右丞相高良惠已积劳病死。城中粮尽援绝,当月间又发生强烈地震,瘟疫流行。末主李睨只得遣使请降,并求宽限一个月,以便迁移民户和准备贡物亲自朝见成吉思汗。七月,李睨亲领大臣李仲谔和嵬名令公等,带着贡物黄金佛,金银器、童男童女以及驼马等,南下六盘山投降。这时(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刚病逝于清水县(今属甘肃省)西江(牛头河)流域曲河之哈喇图行宫,蒙古军谎言他有病,令李睨等在帐外行礼。3个月后,随蒙古军北上,蒙古将领依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将他杀死。这个实际在位仅一年的末代皇帝成为西夏王国的殉葬人。西夏经历190年(1038年~1227

年),10个皇帝,至此灭亡。蒙古大军进占中兴府,顽抗蒙古军的西夏军民大遭杀掠,少数遗民流离失所,逐渐融合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中,西夏文字亦遂告消亡。

元朝建立后,朝廷设馆监修宋、辽、金等国国史,但唯独对立国近200年,拥有自己语言文字及系统典章制度的西夏国置于不顾,就是先后攻打5次,均有反抗不想归顺之缘故。由此,使得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西夏文献尽遭亡佚,湮灭殆尽。

由于在宋、辽、金等三国历史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西夏王朝,因而,后人得以窥见西夏在立国以来所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文化。甘州(现甘肃省张掖)卧佛寺的大卧佛,体形魁梧,仪态庄严,佛像身长34.5米,这就是西夏雕塑艺术的杰作之一。既然这样,分别记载在《宋史》《辽史》《金史》中的西夏文献毕竟过于支离破碎,使西夏王朝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始终是一段难以弥补的空白。元、明之际,有关党项人的活动踪迹,便已经完全绝于史籍。

清朝嘉庆年间,甘肃籍考古学家张澍在凉州(武威)清应寺发现一座古碑,碑文题铭为“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系汉文与西夏文合璧,自此,这种无人识读的古代仿汉文字,才首次在中国重新露面。

二、俄国探险者之黑水古城的发现

科兹洛夫是沙俄帝国受沙皇尼古拉二世器重的探险家,他曾5次到过中国,先后在西藏、新疆、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活动。有关西夏黑城情况,因史载阙略,过去一直鲜未有人予以关注。1907年春,当他准备第4次来中国前,忽然接到通知,沙皇将要在冬宫接受他的觐见。科兹洛夫喜出望外,拜见了沙皇。沙皇对科兹洛夫在中国的活动勉慰有加,不仅从国库拨出3万卢布给他的探险队作活动经费,而且还赐给他一批步枪、左轮手枪及大批弹药。

科兹洛夫越过中国边境,直奔额济纳旗。他首先拜见了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王爷,以步枪、手枪和留声机作拜见礼,讨得了达什王爷的欢心,然后



编造出为当地牧民寻找水源的诺言,获取了在这一带四处活动不受阻碍的特权。其实,科兹洛夫此番前来,是专为寻找黑水城打掩护的。几年前,有个名叫波塔宁的俄国人在这里找到一座被称作黑水城的古城堡,自他之后,虽然先后有几拨俄国人试图到黑水城“探宝”,皆因受当地牧民坚决抵制空手而归。此次,科兹洛夫以重礼买心,甜言蜜语编造谎言,使达什王爷相信了他的谎话,得到自由活动的特权,而且还派出向导给其带路。当科兹洛夫见到一座座大沙包环护下的黑水城墙时,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

1908年6月12日,是考古史上一个值得记载的日子。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那座10米高的佛塔中,发现大批保存完好的西夏文献。由此,使中世纪时期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消亡了古代王国——西夏,首次在国外揭开神秘的面纱。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现大批西夏文献,其中包括《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音同》《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西夏法典)在内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数千种,其编号高达8090件。此外,还有汉文、藏文、回纥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古文等书籍和文稿。其他历史文物,更是不计其数。例如那些绘在丝绸、麻布和纸上的佛教绘画、青铜镀金佛像和泥塑佛像(其中有绝世孤品双头佛)等等,他如获至宝,当即席卷而归,珍藏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和东方研究所内。消息传开后,英、美、日等国垂涎不已,但沙俄帝国视其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从而使西夏文献在国际上声望陡增。

三、国人对西夏学的研究

我国国内研究西夏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为清代,这个时期是搜集整理汉文文献时期。第二步为清末民初,这个时期是注重西夏文字文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是研究西夏史时期,这是第三步。

我国学者对西夏历史的注意始自清代中叶。据我所知,在这个时期主要著作如下。

周春(1729年~1815年)的《西夏书》;洪亮吉(1746年~1809年)的《西夏国志》;秦恩复(1760年~1843年)、王昶(1762年~1817年)、徐松(1781

年~1848年)3个人的《西夏书》;无名氏的《西夏志略》;陈昆《西夏事略》;吴广成《西夏书事》(42卷);张鉴(1768年~1850年)的《西夏纪事本末》;张澍(1776~1847)的《夏书》(被毁)、《凉州府志略考》附《西夏纪年》;王仁俊(1866~1914)的《西夏艺文志》1卷、《西夏文缀》2卷、附《西夏文逸目考》1卷,这三种书收入他的《辽文萃》中,光绪三十年铅印线装本。

这些著作有的没有完成,有的虽然已经成书而未付梓印行,或已佚失,幸免存世者只有那么几本。以上这些基本上是以搜集排比西夏史料为主的西夏史料著作,对后世的研究有一定影响。

这里顺便介绍一位识读西夏文字的清代学者鹤龄。鹤龄字九皋,其生平不详,据古钱币学家翁树培记述,鹤龄官刑部时曾对翁说:他旧日在清字(即满文)经馆供职之际,闻绥远城山顶古庙塔圮,得经一函,瓷青纸、金字,共8册。他据经名对译出经名与卷数名,即西夏文《佛说妙法莲华经》。后来西方人法国学者毛里斯(M.G.Morisse)以所得泥金字西夏文《妙法莲华经》首次解读西夏文字取得成果,当得益于此。

清末民初的这个时期,是介绍和研究西夏文字、文献方面较为突出,这方面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苕父子几人。1913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寓居日本,在一位俄国汉学家那里,发现一部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与西夏文对照的双解语词集《蕃汉合时掌中珠》。他后又发现一部俄文、藏文、西夏文对照编印的文字书《音同》,喜出望外,设法誊抄翻印,由此,引起不少人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个范围不大,但颇有成效的“西夏学”热潮。

罗氏父子之后,继起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是王静如。西夏史著述最重要的有清朝进士、清史馆窜修纂修、四川开县人戴锡章。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字学者是甘肃省临夏人邓隆(1884年~1938年)等。他们的著述有:

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1914年)、《西夏国书类编》(1915年)。罗福苕《西夏国书略说》(1914年)。戴锡章《西夏纪》(1917年撰成)28卷,1924



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线装本、还编撰《西夏丛刊》10余卷及《西夏地理考》，这两本未见传本，另有《西夏纪凡例》单独一册抄本。邓隆《西夏译妙法莲华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入法界品考释》《西夏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应塔碑后》。罗振玉、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西夏文汉文对照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1927年)、1935年抄写刊印西夏文字驰《音同》。罗福苕、罗福颐分撰《宋史夏国传集注》(罗福苕始撰，稿未过半而早逝，后罗福颐续撰完成)14卷；罗福颐撰《西夏文存》1卷(1935年)、《外编》1卷(1935年)。王静如《西夏研究》共3辑。卢前《西夏文化轮廓》，朱希祖《西夏史籍考》，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贾敬颜《关于西夏国名二三事》，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等等。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俄国汉学家陆续发表专著与论文，向外界披露黑水城西夏文献的部分藏书内容。作为中国古代裂土分疆的一个封建王朝，西夏史的研究中心竟出现在国外，这一事实足以使国内不少学界人士痛心疾首。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开始注意了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但是作为历史上已消亡的民族与国家政权如党项族与西夏国历史的研究工作，还未列入议事日程。这种情况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有所改变，到了1979年以后，西夏学无论是研究方面还是文物考古发掘方面，均有了蓬勃发展。解放以来发表的比较重要的著述有：韩儒林《西夏史》(1952年)，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1955年)，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1959年)，王忠《论西夏的兴起》(1962年)，章巽《夏国诸州考》(1963年)，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1964年)，罗球庆《宋夏战争中的番部与堡寨》(1967年)等。

20世纪50年代初，四川大学吴天墀于1955年完成《西夏史稿》初稿，直到1980年才出版，从完稿到出版整整搁置了23年(期间对此稿进行了两次修改)。西安的曹颖僧撰《西夏文史荟存》三部(未出版)。香港学者林旅

芝用4年时间完成40万字的专著《西夏史》，于1975年出版。1977年出版了史筠等人的《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简史》。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分6册出版（1979年），这部通史中首次把西夏放在专章的地位。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1979年）。罗福颐、李范文《西夏官印汇考》（1982年），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1983年），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年），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1册（1983年）。李范文汇集的《西夏研究论集》（1983年）、《同音研究》（1986年）。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1984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1985年），罗矛昆《西夏史话》（1986年）徐庄、李萌《西夏故事》，史金波《西夏文化》（1988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1987年），白滨《元昊传》（1988年）、《党项史研究》（1989年），史金波《西夏佛教》等等。

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批批西夏文物被重新发现。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和安西榆林万佛峡石窟中保存有西夏壁画，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药方残页等对于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7月，文物工作者在甘肃皋兰县宏佛塔内，发现10余尊西夏彩绘泥塑头像、10幅彩色绢画以及大量西夏文雕刻版印刷的木质残版，更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消息，被国家文物局列入这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紧密协作下，承担起《俄藏黑水城文献》多册出版计划。至此，在宁夏方塔废墟发现的西夏文献，将与黑水城文献双壁合一，充分展示西夏文明的奥秘。

四、西夏古方塔，又一次重大发现

1990年11月28日，中国大西北“丝绸之路”上传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西夏古方塔，不幸毁于盗掘文物的不法分子之手！塔身已被炸塌，断壁残砖，满目狼藉，令人惨不忍睹……这件突发性案件，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自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各界人士纷纷呼吁：一定要迅速组织破案，尽快将这一伙心狠手



辣、罪恶滔天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这座方塔位于贺兰山腹地贺兰县金山乡境内的拜寺沟,高约 30 多米,为 11 层密檐式实心结构,它历时近 900 年,保存完好,如今竟毁于一旦,这怎不叫人万分痛心。

1991 年 9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年近花甲的研究员牛达生主动挂帅出征,带领一支小分队来到方塔所在地,对已经封闭保全的废墟进行清理性发掘。废墟中抢救出的中心塔柱,依然坚硬如初,它全长 4 米,上面书写着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的题字。这些文字字体清秀,笔画规整,核桃般大小的百余个文字,记载着西夏王室当年修建此塔的敕命诰书。在塔基下清理出来的文物,除了麻绳、丝绵、钱币、铁钎、印花与绣花丝织品之外,还有一个双面三角形彩绸连缀而成的舍利子包,其四周散布的模制泥塔婆和小佛像等,佛及饰物,竟达 5000 多个。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里发现的汉文和西夏文书写的文献资料,多达 20 余万字。经考古界确认,这是继本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掘黑水城古城堡以来,古西夏文献发现最多的一次。

牛达生研究员从方塔废墟中发现的 9 册总计 10 万余字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该册,不仅文字清晰、装帧完善,而且还是世界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木活字印刷品。这一发现,将我国木活字印刷术的使用时间,提前了 100 年!

五、西夏三号陵中的重要发现

1998 年 7 月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局的组织和西夏陵区管理处配合下,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杜玉冰副所长主持,从 8 月 5 日开始,对西夏陵区三号陵西碑亭(东碑亭已于 1987 年发掘清理)遗址进行历时 35 天的发掘,已发掘出三尊人像石碉碑和近 400 块西夏文碑石残片。

西夏陵被誉为“东方金字塔”,位于银川市西 25 公里处,分布有 9 座西夏帝王陵和 208 座陪葬墓,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西夏文化遗址。1988 年 1 月

13日,西夏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号陵位于西夏陵区二区的东部,整个陵园由角台、鹊台、碑亭、外城、月城、内城、献殿、陵台等组成。碑亭位于鹊台与宫城之间,碑园中轴线西侧,东西两座对称排列。三号陵因其高大雄伟更是备受瞩目,是旅游者必到之地。位于三号陵陵区之内的西碑亭,由于年代久远,从外表上看仅存砖土堆积的高台,并无特别之处。考古发掘人员在清理中发现,碑亭基座平面呈正方形,底座边长20米,上部面宽16.5米。夯土台高2.2米,夯土台四面原用砖包砌成阶梯,亭台南面建有登台道。亭台之上多种建筑遗迹清晰可辨,亭台铺设的砖许多完好无损,排列有序的20.5个柱洞历历在目。亭室内外所铺砖也有区别,室内为圆形多用梯形砖,而室外基本都铺方形砖。亭外还铺有廊道。

此次发掘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堆积物以砖块为大宗,约占覆盖物总量的90%以上,出土的瓦类不及1%;有柱洞无柱础石,有灰坑而无木结构烧毁遗留物。最引注目的是三尊人像石雕碑础座的出土。考古发掘者在清理中发现,碑厅碑础座原有四尊。一尊已毁为一堆碎石,一尊上部略有损伤,两尊完好无损。这三尊有两尊雕像完全相同。从这点我们可以断定,已毁的一尊雕像应与现有的单尊相同。这三尊石雕人像碑础与以往在陵区出土的碑造型大体相近,但形体略大,面像也有不同,面部上有彩绘的墨迹,均可定为一级文物。这三尊碑座与中原汉族地区多用龟石驮碑有所不同,西夏陵出土的碑座却雕成人像,但这些人像,像人非人、像兽非兽,人像或双手拄地或双手托天,突出的双角,肥硕的乳房,都有象征意义。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碑座里蕴涵着西夏党项族的精神寄托和审美情趣。从拄地托天中可以看出,有顶天立地之意,硕大的乳房,表现生命的力量。整个造像表现党项族的勇猛、顽强、坚毅,象征自立、自强,忍辱负重的精神和所崇尚、尊奉的图腾。

这次发掘中如此之多的西夏文碑石残片的出土尤其令人惊喜,这在以往从来未有过的。残片上面字数不等,少有一字,多有十几字,还有两块最大的残碑上面不仅有龙和花草的浮雕,而且西夏文碑文背为描金字,更是



首次发现。这两块残碑正是碑首。因此,拼对完全可以推测计算出原碑的宽度等尺寸。过去考古学者们根据西夏陵区陵墓的排列顺序推测,三号陵可能是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之陵,但一直未找到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这次出土残碑的拼对、翻译,很可能会找到确定陵主人的证据,揭开许多历史之谜。

目前,海内外学界面对西夏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专学。中外学者将通过对西夏出土文献的考证、解读,充分了解和探索西夏王国的历史文化,以补救当时战乱所造成的严重创伤,从而为世界文化史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斯文·赫定额济纳探险经过

邢玉林 林世田

斯文·赫定(1865年~1952年)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少年时代读了许多探险家故事的书,对探险家传奇式的冒险生涯羡慕不已。1880年4月24日,16岁的斯文·赫定目睹了斯德哥尔摩张灯结彩,欢迎北冰洋探险家诺尔登斯居奥德经历长期冰困脱险而归的场面,立志做一名极地探险家。中学毕业后,校长介绍他前往俄国巴库担任家庭教师。途中,他对亚洲迷人的自然景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次年,他游历了波斯西部的名城、大刹,参观了两河流域古代巴比伦时期的遗址,从此与亚洲结下了不解之缘。5个月的游历生活,是他成为著名的中亚探险家的一个契机。1886年回国后,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地质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后入柏林大学,师从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攻读地理学。1890年,他以译员身份参加瑞典王廷派赴波斯的使团,受到土耳其皇帝和波斯国王的接见。在使团完成任务准备回国时,斯文·赫定决心实现到亚洲大陆中心探险的梦想,因此打电话向瑞典国王请示,国王准其所请,并向他提供了经费。于是,他单独留在波斯,从此踏上了亚洲腹地探险之路。

斯文·赫定在新疆、西藏的探险使他成为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是,他渴望领导一个网罗有关专家的大规模考察探险队,到中亚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考察。

1925年9月5日,斯文·赫定与容克(Professor Hugo Junkers)商定:驾



驶三架飞机从德国到中国；容克承担所有经费。到中国后，斯文·赫定有权支配两架飞机供考察之用。不料，1926年的财政困难，使容克被迫取消该项计划。而德国航空公司早就意欲开辟德国与中国之间的中亚航线，该公司同意承担经费和由斯文·赫定组织、领导航空技术和探险工作。

1926年9月15日~24日，斯文·赫定赴柏林与航空公司商讨有关探险的组织、成员、装备、经费等问题。商定结果是：(1)以瑞典的名义探险，探险队在中国探险期间受瑞典使馆的庇护；(2)德国成员包括飞行员、气象学家、摄影员及记录员，瑞典派两名科学家参加；(3)在北京与迪化之间设立4个航空站并附设无线电台、气象测候站；(4)探险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派驼队沿计划路线考察，选择合适的地点作为航空站；派驼队运输汽油；从柏林首航。另外，规定斯文·赫定垄断通俗游记及考察报告的著作权，其余人员的回忆只能在两年后出版。整个探险在1928年结束。

1925年10月31日，德国飞行专家钱默满(Major Eduard Zimmermann)陪同赫定离开柏林，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经哈尔滨、沈阳，于11月20日抵达北京。一到北京，斯文·赫定便立即拜会了瑞典代理公使莱呼福特(Baxon Carl Liijonhufvud)和德国公使博奕(Dr.Boye)，他们答应尽力给予协助。五天后，安德森教授(Prof, J.C. Anderson)与斯文·赫定拜访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他们共同草拟了探险大纲，斯文·赫定希望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所有的古生物学考察成果要在中国杂志上发表。翁文灏所长建议，斯文·赫定给外交部打个报告，请求吸收两个中国专家并期望获允。

1926年北京的北洋政府风雨飘摇，谣传国民党要从南面进攻北京。显然，在政治斗争、权力纷争变幻莫测的形势下，进行大规模的探险并非明智之举。翁文灏陪同斯文·赫定拜访了外交部总长顾维钧。外交部总长听取了斯文·赫定的报告后指出，政府会同意驼队旅行，但航空飞行会被军事当局所阻止。

1926年12月24日，斯文·赫定与公使拜访航空部部长，部长对建立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极有兴趣，提议中国官员参加试飞，并提醒他们在冯

玉祥将军的势力范围之内要小心谨慎,以免冯将军加以阻挠,他最后说,在第一步驼队旅行结束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否则捅到报界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斯文·赫定出于政治的考虑,听从了他的建议,取消了在中亚建立无线电台的计划,也因此节省了一笔经费。30日,赫定又拜访了外交部次长王荫泰。此人是斯文·赫定的知心朋友,他向斯文·赫定透露,政府很快就要批准考察的申请。果然,1927年1月1日,政府批准驼队探险的报告转到瑞典使馆。1月3日,收到航空部长的答复,他同意航空飞行,但建议在驼队探险结束后讨论这个问题。斯文·赫定得到上述答复后,立即给德国航空公司发报,请德国、瑞典队员到北京。驻京的外国领事及安德鲁斯的中亚探险队员非常惊讶这样快地获得批准。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凡尔赛和约取消了德国在中国境内的治外法权,受中国法律制裁。当时,中国从南到北掀起一股排外风暴,瑞典、德国均不在冲击之列,其次在于斯文·赫定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且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1926年12月30日,盘踞北京的军阀张作霖会见了斯文·赫定,答应从各个方面支持驼队探险,并给新疆军阀杨增新打电报,告诉他探险队抵达的时间和目的。不久,转给斯文·赫定电文抄本及介绍信。

斯文·赫定不仅要负责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而且还要在北京筹备科学考察团。郝德(Waldemar Haude)是考察团中的气象学家,他希望借助于气球测量内亚高空的气流,以填补气象研究工作的空白。航空公司考虑从欧洲运输氢气筒路途遥远且风险大,请斯文·赫定在东亚求购,斯文·赫定遂从日本购到氢气,租用小船运到天津。斯文·赫定向航空公司提名拉尔生(F·A·Larson)担任考察团的驼队队长。拉尔生是斯文·赫定的同胞和朋友,他在亚洲生活了35年,非常熟悉亚洲的道路和民族,精通蒙古语、汉语,有娴熟的驭马和驭驼技能,还担当过蒙古政府的顾问。拉尔生负责雇佣中国仆人、炊事员、牵驼夫及给仆人们发放薪水等一切具体事务。并提名丹麦人哈士纶(Henning Haslund Chfistensen)做他的助手。哈士纶曾在中国北方生活4年之久,会讲蒙古语,特别是此时他受雇于英美烟草公司,使这家烟草



公司白白送给考察团 30 万支香烟。在冯玉祥从包头撤走,张作霖的军队控制包头时,拉尔生、钱默满在包头租了 1 个房间,购了 11 顶帐篷、羊皮袄、羊皮睡袋等物之后,两人又赴天津购买设备和豆、奶粉、黄油、乳酪等食品。

1927 年 2 月 6 日,5 位德国团员抵京。斯文·赫定即派两人往天津帮助拉尔生。12 日,3 位瑞典科学家抵京,他们是地质学家那林(Erik Norin)、医生赫默尔(David Hummel)、考古学家贝格曼(Folke Bergman)。与此同时德国气象学家郝德和两名飞行员也到北京。不久另一名飞行员、制片员李伯冷(Herpaul Liberen)、会计米纶威(Herr Fritg Muhlenweg)也来了。至此,所有欧洲团员已齐聚北京。斯文·赫定日夜与外交部、军事当局、运输部门协商考察团的护照、持枪证、货物运输问题。最后商定每个团员可以携带 1 支来复枪、1 支手枪、800 发子弹。考察团还获允带 7 只猎枪。斯文·赫定申请两节车厢和一节客车厢,以供从北京到包头的旅行。此外,北京协和医院的斯第文逊(Paul Sterenso)辅导赫默尔和其他团员测量人体、头盖骨的知识并提供测量仪器。

1927 年 5 月 8 日,斯文·赫定到英、美、德、丹麦、挪威等各国使馆递从辞行名片,向翁博士、拉格保博士、安德鲁斯^①(Roy Chapman ArdFews)道别。当晚,斯文·赫定和赫默尔在瑞典公使艾威尔勒夫(Oskar Ewerlof)家庆祝考察团获准出发。

1927 年 5 月 9 日中午,斯文·赫定的欧美朋友、北京大学师生、考察团理事会成员齐聚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站前,每人手里都有一份周肇祥写的热情洋溢的诗篇。火车启动了,繁华的北京逐渐在眼帘中消失,代之以重峦叠嶂的群峰、碧绿的田野、绿树掩映的村庄,宛如苍龙的长城。尽管原是装运牲畜的车厢,污秽不堪,团员们仍欢声笑语。10 日到了归化。前行,北望阴山,南见遥遥闪光的九曲黄河,黄昏时到达包头。斯文·赫定吩咐赫默尔押着牛车把银币送到总部。自己骑着骆驼同其他人从南门先行人城。包头的夜市灯火辉煌,守城的阎锡山的军队来往不绝。

此时,另一组的那林、华志(Majir Walz)、马学尔(reherr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 还在归化购买食品,他们准备从归化把食品用骆驼运到百灵庙,哈士纶和李伯冷已到张家口北的哈龙乌苏的瑞典圣公会取安德鲁斯卖给考察团的 65 峰骆驼^②。

晚饭前,所有队员都会聚在会议室中听斯文·赫定和徐炳昶演讲。斯文·赫定说,在贵国内战正酣时我们将要到贵国边疆进行科学考察,离开北京前,所有的欧洲朋友都怀疑同贵国学者合作能否成功,他们认为中国人安土重迁,留恋故土,未到边疆时他们都溜光了。我们将证明欧洲人、中国人能够和睦生活、协同工作。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在我们团里决不允许存在民族歧视,大家都是朋友,中国人欧洲人享有同等的权利。我希望诸位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各尽职责,最后祝愿考察团一帆风顺,成绩斐然。

租赁的 250 峰骆驼放养在旅程外的草原上,18 日才能赶到包头,斯文·赫定一行还得再等九天。

赫定派马森伯、米纶威带 1 万元随同蒙古商人购买骆驼,6 月 16 日,他亲自审查先买到的 33 峰膘肥体壮的骆驼,以后的几天骆驼越来越多,总数共达 270 峰。

1927 年 7 月 1 日,斯文·赫定委派那林带海德·马森伯、丁道衡等人带 2 个仆人、2 个蒙古向导,1 个厨师向北出发。这一小队带着 6 个星期的粮食,任务是在大队的北面沿途采用三角形测量法一直测量到嘎顺淖尔,扩充原来的路线图。海德负责三角形测量,那林在三角形内填满风土琐闻,帮助海德测定定点及地质考察和地质绘图;马森伯绘山画水,贝格曼绘制考古图。与此同时,徐炳昶提出由中国团员组织一队风土考察团向南距中路 10 公里处与大本营平行前进。南队由袁复礼率领,4 日出发,队员有白万玉等,2 个仆人,2 个蒙古向导,带 4 个星期的粮食,15 峰骆驼。斯文·赫定每天通过骑快脚骆驼的蒙古人得到两侧翼的消息并传达命令。5 日,接到丁道衡的来信,报告在白云鄂博(富神山)发现巨大铁矿,信中说:“矿质虽未分析,全山皆为铁矿所成。此矿为交换作用所成,前为石灰岩,后经潜水中含有铁质者交换而成。又经岩浆冲出,其他杂质皆气化而去,故其质体极纯。以衡



推测,成分必在八九十分以上。……全量皆现露于外,开采极易”^③。同天,贝格曼报告说,靳士贵发现一片大规模的石器时代遗址,收集了 1000 余件器物,多半是石刀、石斧、还有不少陶片。9 日傍晚,一贯平静的拉尔生兴冲冲地报告冯考尔、生瑞恒、哈士纶回来了,并带回 5 峰强壮的骆驼、北京和包头的邮件以及考察团所需经费和急需的电池。斯文·赫定每天利用闲暇时间向徐炳昶、黄文弼请教中国古史,他们给斯文·赫定讲汉代时期的额济纳河及其历史演变。通过长时间的与中国学者合作,愈益觉得合作对双方都有重大意义。南面的中国队也捷报频传。11 日,袁复礼的信中说:“尊敬的斯文·赫定博士,白万玉在距大本营 18 公里处发现石器和化石。我的风土调查成绩显著”。16 日下午,黄文弼南行考古调查归来,便同徐炳昶向斯文·赫定报告发现秦长城和当地名为钟鼓楼的城池。傍晚,赫默尔向斯文·赫定报告其所在地的百灵庙考察团胜利归来,拍摄了 1100 米长的买达尔圣节的庙会底片及八种测量和血液检查,并购买了 7 峰上等骆驼。半夜里李伯冷、哈士纶才赶回营地。

1927 年 7 月 14 日,斯文·赫定一行到达阿鲁希林乌苏泉,泉被沙漠围绕,泉水清澈。继达沙漠绿洲敖伦陶来,这里约有 200 余株大胡杨树。斯文·赫定雇了一个患麻痹症的老人作向导前往额济纳河。沿途沙漠之中随处可见怪柳。途经萨拉布龙,在苏齐(Sutsch)泉边安营。21 日到达萨尔扎格(Schardjaky)泉。22 日午后,在穿过沙丘的途中遇见来自古城的商队,最后到达苏棒布鲁克(Schubung-buluk)泉宿营。附近有 20 平方米的沙夫根奴尔(Schavugin-nor)的小沼,深约 10 米。斯文·赫定从附近的喇嘛那里买来两只羊。继续率团经过苏才牙克(Sotschein-jarb)泉到达宝尔川吉(Borosuntsohi),黄文弼在营地正西高约 35 米的沙丘上发现了汉代陶器碎片和一段残垣断壁。斯文·赫定在萨尔湖里泉附近过夜。前面不远处就是哈拉浩特(“黑城”)遗址,它是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处于额济纳河支流纳林河东面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1906 年科兹洛夫首先发现黑城遗址。斯文·赫定到达黑城时,早先到达的团员已各自展开工作,测量、绘画、

拍照、制图。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 434 米,南北长 384 米,黄土夯筑的城墙高约 9 米,有东、西两城门。城墙内有许多残垣断壁及土台,有一座覆钵式喇嘛塔、一座伊斯兰教堂。该遗址内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如《番汉合时掌中珠》等。热衷于追寻前人未发现的空白点的斯文·赫定,在黑城仅停留两个半小时便继续西北行,穿过两堆草堆构成的大门,进入雅丹地质,处处可见或死或活的怪柳,途经一颈垣,斯文·赫定将驻地安在广漠的平地上。他准备下一步实施测量额济纳河和苏古淖尔的计划。

斯文·赫定穿过峡谷向西北偏北方前进,路左有一所房于的废墟和两座尖塔,再往前穿过 5 座尖塔后,西北方浮现起一片胡杨林,穿过树林映现出额济纳河的一条宽仅 20 米的支流,通过支流不久即可到达主河道。拉尔生在河对岸挥着帽子欢呼着。额济纳河宽约 140 米,深 1 米,河水混浊,流速甚快,约每秒一米。骆驼小心翼翼地穿过河道,到达飘扬着瑞典国旗的营地。这里绿树成荫,青草和芦苇丛生,干木柴足够一年的燃料,斯文·赫定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块营地,决定在此驻扎 1 个月。大本营共有 16 顶帐篷。驻地长 180 米,宽约 80 米。斯文·赫定的帐篷离河 40 米,郝德和狄德满的帐篷边是气象室,河上修一小桥,为测量河水涨落、温度、流速提供方便。在这里,斯文·赫定做的第一件事是由拉尔生陪同视察了蒙汉仆役的帐篷,并向每个仆人表示问候。第二件事是把自己打算测量额济纳河的下流及嘎顺淖尔、苏古淖尔的计划公布于众,并请拉尔生赶制一只船。第三件事是宽恕阿蒲干。在所有人员都聚集在会议室后,斯文·赫定令蒙古人将盗窃犯阿蒲干带上来,面对阿蒲干斯文·赫定说:“我们真心地相信你才雇你为考察团工作,然而你辜负了我们的厚望,盗窃了考察团中两峰最好的骆驼,骆驼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这点你是清楚的。按照中国的法律,应把你送去坐牢。我们原打算把你送到毛目县法庭,但我们决定对你实行宽大,恢复你的自由。派 2 个蒙古人把你押送到 60 里外的森林,然后你愿意去那里就去那里,我们给你头几天的粮食”。阿蒲干向大家磕了一个头,感谢斯文·赫定的宽厚仁慈。当蒙古人在 60 里外的森林释放他时,他冲着蒙古人的背影喊



道：“当心你们的骆驼！我还要回来”！

拉尔生、马学尔、米纶威和许多蒙古仆人整天清点粮食，发现他们必备的食物将要告罄，尤其是米、面、糖。斯文·赫定的第四件事是请拉尔生去毛目采购备齐，另外派人向附近的土尔扈特人求购牛、羊、奶。拉尔生将粮食分成三部分；在额济纳河的第一座气象测候所需要的粮食；考察团在额济纳河逗留一个月的粮食；考察团到哈密所需要的粮食。斯文·赫定在大家聚集在篝火边娱乐时宣布了工作任务和分工。不久，斯文·赫定又参观了“造船场”。米纶威坐在独木舟中，离岸仅两米远就落入水中，冯考尔尝试了一次也落入水中。拉尔生对斯文·赫定说再造一只独木舟，将两只连接起来试试。

1927年10月初，大家分别执行着赫定布置的任务，赫默尔、哈士纶、塞拉特奔赴嘎顺淖尔和苏古淖尔考察旅行，搜集植物和昆虫标本；黄文弼带着5峰骆驼的队伍到嘎顺淖尔和居延海考古调查；同时派1名蒙古仆人到宝尔川吉寻找马达喇嘛，他带着16峰骆驼在那里休息；韩普尔、钱默满沿河向东北出发。5日晚，斯文·赫定走访了中国学生的帐篷。马叶谦因被留守在这里的气象测候所而一直郁郁不乐，别的人也都希望随团到新疆，谁也不愿意留守在额济纳河。斯文·赫定向他解释这座气象测候所对整个考察团的意义。斯文·赫定根据郝德的提议，在包头设立一座气象测候所，他把这重任委托给崔鹤峰。让他先回北京与理事会和中央观象台取得联络，然后于次年3月1日到包头设立气象测候所。

1927年10月8日和9日，斯文·赫定与徐炳昶商谈筹备国庆事宜，令蒙古人拾柴火，预备篝火，以志庆贺。10日上午10点半庆典开始，会场中央放着两只箱子作为讲台，上面铺着白布，置绿叶、鲜花，会场上面悬挂着中华民国国徽，右边是纸画的瑞典国旗，左边是德国国旗，两侧张贴标语，徐炳昶到台前宣布大会开始，首先向三国国旗行礼，唱国歌。徐炳昶登上讲台发表演讲，最后向为中国科学文化事业之进步而作出卓越贡献的赫定致意。接着，请斯文·赫定、额济纳河气象测候所所长钱默满、学生代表刘衍淮演讲。午饭后，开始各种角技运动，如百米竞走、拳击、摔跤、单腿跳远、三级

跳远、水中竞走等,尤以摔跤和水中竞走最为激烈。晚上六点开始晚宴,餐桌上摆满烟、酒、糖果、点心、茶、咖啡、排骨肉、粉条炖肉、撒定鱼、米饭、绿豆粥等等。饭后点燃篝火,斯文·赫定向团员们颁奖。所有欧洲团员都把奖品让给没有得奖的蒙古仆人。火光中欧洲人和蒙古人进行拔河比赛。蒙古人轻易的战胜对手。之后或歌或舞,一直到晚上10点。

1927年10月13日,赫定派马学尔带着学生马叶谦、刘衍淮,1个马夫,7峰骆驼到离驻地223公里外的毛目县邮局取回从北京寄来的邮件,给北京理事会和杨增新发的信件。在给杨的信件中简述了考察团的目的,并报告了考察团的行程,希望杨增新予以配合。狄德满在额济纳河每天从事经纬测定,根据脑恩时报初步测定气象测候所的地理位置是北纬 $101^{\circ}6'36''$ 。空闲时间绘制水彩画。额济纳河上的第一座气象测候所,每天施放一个气球,经过一年半后的测量其结果更接近实际。华志从额济纳河出发往迪化。华志是运动健将,精力充沛,非常高兴地接受到迪化的重任。此行要走2千余公里,还要经过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华志按斯文·赫定规定的线路,带上专门为他精选的8峰骆驼和仆人,经巴里坤到古城,留下一蒙古仆人和8峰骆驼,然后带上中国仆人骑马或坐车到迪化,亲自拜谒杨增新,取到银款、报纸后,由他自己决定如何输送。斯文·赫定预计华志从10月15日出发,于12月15日在迪化办完事后到达哈密。因此,斯文·赫定决定考察团11月15日从额济纳河动身,12月15日同时到达哈密。

华志走后,斯文·赫定和哈士纶坐着晒干的船试航一里多后,发现这种平底船在额济纳河上不适用,船体太重,入水太深。斯文·赫定让拉尔生去掉顶篷,船舱再往深里挖,用以减轻重量。拉尔生夜以继日地工作,再不能等待了,河水开始降落。船经过改进,船前安着一块箱盖作为绘图和写字的桌子,中部加一木板当椅子。哈士纶坐在后面的木板上,试航效果很好。16日深夜,斯文·赫定向大家宣布,他的乘船探险方案:他在河中探险时,陆上徐炳昶、拉尔生、李宪之率一小队在左岸跟着船走,带着粮食、日常用品。大家在同一地点宿营休息。韩普尔、钱默满要求单独率一小队到两湖,绘制额



济纳河西面的支流鄂博因河的地图。该河注入嘎顺淖尔湖，与额济纳河的支流东都尔河汇合。归途绘制昆都仑河的地图。

1927年10月17日，赫定和哈士纶带着罗盘、绘图板、表、铅笔、望远镜上了船，哈士纶只带一件皮背心和游泳裤。水上、陆地两支探险队同时离开驻地，约定三天后在土尔扈特王府附近相会，不久分道前进。船顺着额济纳河缓缓而下，两岸金秋尽收眼底。时而冲过急流，时而搁浅于泥滩，哈士纶总是跳下船将船牵入深的地方，斯文·赫定需要快速地绘制地图，河流不断地迂回曲折、变换方向。河岸上的土尔扈特居民向他们热情招手。中午时分，拉尔生的队伍浮现在左岸，赫定上岸用餐。下午，斯文·赫定到达额济纳河的支流鄂博因河和东都尔河的分水处。鄂博因河注入嘎顺淖尔河，东都尔河注入苏古淖尔湖。斯文·赫定决定先测绘东都尔河，故拉尔生、徐炳昶需涉过鄂博因河到达东都尔河的左岸。船顺流而下，东都尔河越来越窄，水流越来越急，船行愈来愈快，1个多小时后与岸上的队伍会聚。次日，河越来越窄，两岸陡立，绿树成荫，芦苇、柽树丛生，野鸡、野鸭、野鹅、鹰在河上飞翔。拉尔生的篝火在河面上映辉。19日测量的温度是3℃，温度几天来逐渐升高，河水又降落了几厘米。20日，拉尔生也上船负责测量水深。下午景色骤变，成荫的树林不见了，代之是平铺的草丛，据岸上队伍报告，土尔扈特郡王府就在附近。21日午后，徐炳昶写信给郡王的长子，谈及考察团是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科学考察组织，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傍晚，在篝火旁，斯文·赫定谈他入湖探险的计划，徐炳昶极力反对他冒险：“这有什么意义呢？测量湖深、考察湖的形状与大小，钱默满都可以轻易地做到。想一想你对你的家庭、你的祖国和考察团所负的使命，不要奢谈你曾在西藏的湖上探险，那时你年轻，精力充沛。风和日丽时，独木舟是不危险的，但当泛舟湖中时，暴风骤起，那您将怎么办？”斯文·赫定奋力力争说：“我们将扯起帆，用力划向岸边。”徐炳昶请他想一想，出发前再好好谈一谈，徐炳昶对斯文·赫定的关心、忧虑溢于言表。

1927年10月22日晨，土尔扈特王子来访，斯文·赫定将王子请到帐篷



中叙谈。王子剽悍强壮,然而彬彬有礼。徐炳昶来到帐中,寒暄之后,王子说:“假若你们非要见王爷,我们欢迎,不过他病了,只许内眷和仆人在身边”。斯文·赫定说:“我们只想向他说明来意并表示问候,决不想惊扰王爷”。王子诚恳地表示欢迎他们来到这里,想到那里都可以去,想呆多长时间就呆多长时间,若有什么要帮助的有尽管吩咐。斯文·赫定表示想租一辆牛车将船从苏古淖尔送到嘎顺淖尔,再运到森林中,想到那里去拍电影。王子答应车在那里等候你们,表示这是应尽的职责,不收钱。斯文·赫定表示一定要给他们赔偿,还赠给王子一架望远镜。若对气象测候所热情一点,还将得到别的赠品。王子走后,斯文·赫定、哈士纶又跑到河边,驾船顺流而下,左岸怪柳稀疏,右岸河水刚退,满是沼泽。不久,东都尔河分成两支,左支全是泥坑,右支狭窄而弯曲。拉尔生在右岸前面走给他们示警,他从芦苇中跑出来向小船喊道:“站住!站住!前面是瀑布!听到瀑布声了”。拉尔生抓住哈士纶抛给他的绳子,把小船拖到岸边,他们爬上岸,寻找可以通过的路。瀑布高约3米,水声雷动,两岸峭立,摇摇欲裂。侦察后,把船上的东西都搬上岸,拉尔生和哈士纶拽着绳子,斯文·赫定用杆撑住船,使船顺流而下,坠入瀑布之下。把船拉到岸边后,将船中积水舀出,继续前行,拉尔生在岸上与船平行前进。船行不久,左支河水不断注入,河身从原来的2米~3米宽扩到12米~20米宽,深约1米。河岸逐渐变低,现在只有半米,岸边有牛马及蒙古包。再往前走就是不毛的荒漠。苏古淖尔湖像镶在荒漠上的翡翠。前面河水又分成众多支流,船行中流,不久搁浅,只得将船拖回。拉尔生、李伯冷疏通一条河道,船得以通过。黄昏临近,斯文·赫定只能草草地测量了湖的形状、周围的山峰。次日晨,斯文·赫定继续在湖中探测。船行不久,微风初起,哈士纶用斯文·赫定的手杖挑起皮坎肩作船帆,船行湖中,风声咆哮,浪尖拍击船边,湖水涌入船内,斯文·赫定一边测量一边舀水。湖面上还有成群的天鹅,苏古淖尔湖很浅,最深处只有2.9米,最浅处只有1.2米。风大也无大险,近傍晚,到达东岸,哈士纶背着斯文·赫定到70米外的干地,燃起篝火,蒙古族仆人带着铺盖、斯文·赫定的毛靴、哈士纶的衣物来到篝火旁,



还为他们带来一盆渍鱼,他们喝着湖水。第二天,风和日丽,船驶向拉尔生的营地,测得湖水最深处 4.12 米,下午到达拉尔生为斯文·赫定设立的“码头”。此地沙质松软、不平,牛车不易从这里直接到鄂博因河,而在西南偏南几公里处更合适。斯文·赫定和哈士纶仍走水路,其他人跟着牛车沿岸边走,天黑后到达营地。

1927 年 10 月 25 日,斯文·赫定一行到达鄂博因河。沿途随时可见沙海中的怪树丛。他们未在湖上探险,只是从岸上高地领略湖光。斯文·赫定到湖的东南岸的山冈上绘制嘎顺淖尔和北部远山的地图,后折回营地,酝酿新的计划。27 日赫定率队沿着鄂博因河,穿过莽莽森林南行,又通过结冰的河面、丛林、草地、沙丘,望见了大本营上空飘扬的瑞典国旗和新建气象测候所前飘扬的德国国旗。

那林、海德、马森伯、贝格曼、生瑞恒、丁道衡于 10 月 23 日已到达大本营。斯文·赫定审视了那林画成的 23 幅大地图,从善丹庙到额济纳河的道路图 14 幅;海德向斯文·赫定展现他用三角测量绘制的概览,马森伯绘制的谷径和道路的风土测量。

北队的贝格曼和靳士贵沿途发现 20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 1.76 万件器物,大部分是石刀、石斧。斯文·赫定对此表示祝贺。一是祝贺他们取得的成绩,二是祝贺他们平安归来。原来北队在沿途中,先被说成是一团全副武装的军队,准备占领土尔扈特人的领地,后又说在黑城发现许多宝藏。因此,很多土匪纠集起来,准备抢劫。袁复礼的南队和马学尔到毛目的队伍均无音讯。斯文·赫定等不及了,袁复礼向斯文·赫定建议由他率支队伍取捷径尽快赶到哈密,建立第二座气象测候所。这一队作为中路,带着 24 峰最好的骆驼于 10 月 31 日出发。哈士纶被任命为先锋队的统帅,韩普尔、李宪之测绘路线图,狄德满掌勺,另外还有蒙古、中国仆人各 1 名。那林、贝格曼继续走北路,赫定准备率队走南路。

1927 年 11 月 1 日,拉尔生带回一个新颖别致的小帐篷,这是请土尔扈特人为斯文·赫定特制的。3 日,马学尔的队伍从天而降,他们用了 9 天到达

223公里的毛目。毛目周围河渠纵横，城墙四周边长为200米，东西各一门，城内仅住300户汉族人，有三家商店。4日，斯文·赫定宣布考察团于8日出发，马学尔、钱默满、生瑞恒留守气象测候所。7日，崔鹤峰离开营地向东进发，先到北京，后到包头设立气象测候所。斯文·赫定查看仪器、设备、存粮，令定做四顶土尔扈特式的蒙古包以供过冬。还令钱默满在明年的春天继续在河上探险，每月要经毛目邮局向他报告。一切安排就绪，等待出发。

1927年11月8日，斯文·赫定率领拉尔生、海德、赫默尔、徐炳昶、黄文弼等39人，127峰骆驼的队伍向浩瀚的沙漠进军。美丽的额济纳河在他们后面消失，代之以不毛的沙漠。

注释：

①安德鲁斯：美国著名探险家、动物学家、著作家。1884年1月26日生于威斯康星州贝洛伊特，1906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1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服务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是世界知名的研究鲸鱼权威，1916年率探险队到中国西南部和缅甸山区；1919年率探险队到华北和蒙古。1921~1931年率队到中亚探险，这一次成果显著，发现了喜马拉雅山脉以北地区的恐龙化石。在北美以外地区发现第一批雷兽遗骸及哺乳动物“俾路友善”的部分骸骨及断定旧石器时代人类曾在中亚生活的证据，这次探险报告以《中亚自然史》为题出版，共12卷。1935年任博物馆馆长，其主要著作有《在中国的宿营及行踪》《穿过蒙古草原》《中亚新征服》《探险事业》。

②安德鲁斯1927年4月到北京，由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反对而未能到中亚探险，因此，他将把他放牧的在张家口北的骆驼低价卖给赫定。

③那林在7月3日信中说：“神山，巴廷博克图，名副其实，整个南半壁都是纯粹的矿石，铁和猛，矿苗的地面一直扩张到察罕鄂博庙(Tsagcm Obasuma)，这已由我绘画下来，是贝格曼首先发现的。”

④额济纳河土尔扈特人的坟地，东至苦尔尼，南至毛目县，西至戈壁，北至替山山脉，只有97户，隶属甘肃省。



额日布盖山中的古代文明

——岩画调查追记

G·朝格图

雄伟壮观的额日布盖山,宛如一座天然的屏障,横亘在龙首山中部,我的家就座落在其山之中,那里我生活了 20 多年。在最高海拔 3000 多米的山乡,山势陡峭,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山巅上白雪皑皑,山麓下绿草成茵,撒满珍珠似的羊群,在山涧山坡上自由自在地食草。在这山山沟沟大大小小的平板岩石上似乎都有一些凿凿刻刻的痕迹。这就是岩画——额日布盖山的岩画。

岩画是世界性的一种古代文化现象,是人类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创造的古代艺术珍品,它通过直射或折射地表现了永不重复的远古现实,展示了人类的太古文明和中古文明,为艺术史、史前史、原始宗教史及人类学、考古学、美学、民俗学、畜牧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形像化资料。因此,岩画那古朴、粗犷、凝练而又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堪称想象宏丽、言情浓烈、造型生动简朴、意境深邃的无声史诗。

我对这个无声的古代史诗人迷了。于是从 1976 年至 1981 年前后近 6 年的时间。利用在“驼背小学”任教过程中和读大学的寒暑假时间,东起额莫勒齐格山。西至魁生陶勒盖的 20 多个山山沟沟进行过断断续续地实地田野调查。

这里(龙首山脉在内)的岩画丰富多彩而富有情趣,反映了古代游牧社



会中一幕幕的生活画面。比如奔马、马群、骑马、追马、人立马背等与马有关的画面,活现了马背民族与马的关系以及马在游牧社会中的重要性。又如与狩猎有关的画面,有拿弓箭的猎人、骑猎、围猎等画面,说明在游牧社会中,狩猎的对象有野羊、野猪、鹿、狼、虎、豹、鹰等。画面中出现的家畜有绵羊、山羊、马、牛、骆驼、驴、狗等。也有战争的画面和少数的大鸟及在北方已消失的大象。还有表现心态活动的面具、蹄印、符号等。

在遥远的古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先民们,为什么长年累月花费那么多心血去凿刻这些岩画呢?欲想弄清岩画的文化内涵,必须从作画时代的经济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中去探寻答案。在我的研究结论是反映一个部落的经济势力及其领地的所属标志。

额莫勒齐格山下柯克乌祖尔并到伊赫高勒的大量岩画被地质矿产勘探中被炸毁,现仅存岩画 59 处。一处陡峭山壁上有一幅巨象,周围有狩猎图、牧羊图、骑马图、狗、狼、虎、鹿、牛、羊、驼以及骑马相互打仗等图。

从这往西伊尔盖图、赛力克图、阿如库布、巴音呼都格、查干川吉等地分别有马、羊、狗、鹿、牛、驼及骑马者、狩猎者等图及居住群和舞蹈图。对这里岩画的据不完全统计有近 400 幅。其中,巴音胡都格河槽上游好依尔呼都格主要“羊为主岩画 100 多幅。

宝格达山下的山沟中有一大一小的人足印画及马蹄印图。对此,在我家乡流传有很多神奇的传说,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他如马、牛、羊、骑手、狩猎等岩画有几十处。

坤贷图、考克胡都格、诺木齐、豪依尔胡都格、贷日图等 5 个山沟中内容大体同上的岩画 100 多处。

伊克布日尔、彩克尔、道布图、夏日布尔、魁生陶勒盖等 5 个山沟中岩画达 208 处之多。岩画类别上有羊群、牛、马、骆驼、鹿、蛇、鹰、狼、老虎、狗、蛇、鹰以及其他动物;有居住群和及舞蹈动作等场面;有男女交媾的图像及日月星辰等天体崇拜岩画;有祭祀内容的如:树木、日、月、生殖器、兽类、飞禽等图腾图画,也有祭祖崇拜、神像崇拜、印迹等崇拜岩画。值得一提的是,



道布图的一幅蒙古文地名凿刻,其年代不过七八百年。在这5个山沟中岩画达600幅。另外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对上述20多山沟中岩画的照片我于1985年连同文字材料一式两份分别向内蒙古文物研究所和阿拉善右旗文物站提供。因此,这里无法将原图一一介绍。

以上这些岩画,记录了人类童年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最生动、最直观的感觉。有些作品在构思、技法、形象设计上,表现了惊人的艺术才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原始艺术永恒的魅力。

在岩画制作手法上以硬质工具敲凿而成。一般来说,地势开阔,石面光滑者多用凿刻技法。

在岩画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常采用夸张手法,使作品富于表现力。比如对某些动物的角、尾的夸大,对男性生殖器的加长等。作画者将对象的主要特征加以强调,让欣赏者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使作品产生诱人的艺术魅力。

我家乡的岩画,是一种积淀着蒙昧时代文化心理或特殊内涵的原始思维形象。它所显示出来的任意想象、荒诞感觉以及孕育其中的象征性、超越时空的自由联想,形成了原始艺术特有的审美观念,使得岩画艺术不仅在考古学体系,而且在美学领域均占有一席之地。

从岩画研究的意义上说,额日布盖山岩画是人类童年时代到原始部落生存故事的连续性篇章,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历程的生动图解。它像一个观察古代人类历史与文化的万花筒,从中可以窥见古代人类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意识等各个方面。通过这些散发着古人生活气息的幅幅画画,可以被时代烟雾吞噬的历史再现出来。

我所调查的这些岩画,认为最早的大约可以追溯到太古时期,多数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所作。倘若将这些岩画按照时代顺序排列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个个长长的岩画链,从用石头武装起来的原始人,到使用弓箭的狩猎人、游牧人,以至金属的使用者,一直到近代的蒙古人,岩画组成了历史学和艺术史的最早篇章。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瀚海杨

罗桑仁钦·仓央嘉措(1683年~1746年,以下简称仓央嘉措),是西藏历史上一位特殊人物,是西藏六世达赖喇嘛,又是一位出众的诗人,他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一生周游四方的经历和种种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国内外国学者中引起了很大兴趣。

仓央嘉措于藏历阴水猪年(癸亥)三月初一,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3月28日),出生在藏南门隅宇松地区(今错那县境内)纳拉山下的达旺附近的邬坚林。父名扎西丹增,母名才旺拉姆。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相续修持密宗的家庭,他的曾祖父白玛领巴就是一位有名的修持密宗红教喇嘛。在他们的十二辈祖先中。曾经出现过一位有名望的内氏翻译大师,父系和母系的七辈之间,种姓纯正,品德高尚,聪明贤良,学识渊博,精通工巧明和宗教哲学。

特别是仓央嘉措的母亲,她温顺善良,聪明而又有胆识,具有做母亲的各种美德。仓央嘉措是她的长子,全家人对他爱如珍宝,他出世一年多都不让外人知道。

原本他家是住在门隅夏日错所属的派嘎地方,怎么又到了达旺附近的邬坚林呢?这里有一段插曲。虽说是他们家族“种姓纯正,品德高尚”。但就



家族里出了个贪财无度的舅父顿巴和姑母，夺走了他父母所有的财产和房屋，无法在此生活下去，便迁居到邬坚林，住在邬坚林寺旁边的一座小房子里。不久，仓央嘉措就在这所小房子里诞生了。据说，仓央嘉措被选为六世达赖以后，在派嘎地方塑有他的卧像一尊，邬坚林寺旁边的那所小房子至今还存在，供奉的人们络绎不绝。

仓央嘉措的童年是在门隅派嘎度过的。6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仓央嘉措便随母亲生活，当放牛娃，自小就和劳动人民广泛接触，和家乡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仓央嘉措思想奔放，性格开朗，在同乡亲相处的日子里，耳濡目染，学到了许多民族民间文化。

二

传说五世达赖为了修造布达拉宫，对第巴·桑结嘉措说：若他死时宫殿尚未修建好，则秘不发丧，直待宫殿修成。果然，仓央嘉措出生的头一年康熙二十一（1682年），宫殿没有建好，五世达赖就圆寂了。不发丧虽然可以，但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六世达赖却必须寻出。当时，西藏地方的执政者第巴·桑结嘉措，鉴于门隅地区易受外来势力的入侵，不好控制，为加强对门隅地区的实际管理，便决定安排达赖六世在门隅地区中转世，于是，便秘密寻访，选中仓央嘉措。所以，当仓央嘉措稍大以后，第巴·桑结嘉措便派了6名知识高深的喇嘛做他的经师，在错那宗棒山口的巴桑寺学经达6年。继而，搬到错那宗的贡巴则寺学经。在错那期间，他常到雪霞地方，那里是屠夫居住的地方。也常与雪霞的屠夫和姑娘们来往、交友。他在错那期间，也常回他的故乡。传说在米拉山口还留有他的一个脚印；仓央嘉措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怀念，他亲手在邬坚林植下一棵柏树，这棵柏树至今还活着。

五世达赖圆寂14年后，布达拉宫的修建工程告竣了，六世达赖也已长到13岁，第巴·桑结嘉措才将五世达赖已圆寂，六世达赖已寻访选定的事公布于众，众皆不信，又见六世达赖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更加怀疑是假的。因此，对第巴·桑结嘉措非常不满。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即火牛年九月,第巴·桑结嘉措将六世达赖灵童从藏南迎往拉萨,途经南噶则宗(今浪卡子县)时,事先约好第五世班禅罗桑益喜在此会晤,十七日十五时三分 1697年10月31日拜班禅为教师和规范师,剃发受戒(沙弥戒),并取法名为罗桑仁钦·仓央嘉措。当时参加受戒仪式的有比丘江央扎巴、色伦多吉、洛桑曲扎、江央曲培等人。同年十月二十五日(12月8日)五时三十分,在布达拉宫内的司西平指殿举行坐床典礼。以后就跟随班禅罗桑益西和他的根本师比丘江央扎巴、促陈达杰、格列绛措、第巴·桑杰嘉措等学习佛教经典,《甘珠尔经》传承受过三次,一次是在第巴·桑结嘉措,一次是在江央扎巴,另一次是在德敦日丹。给他讲经说法的喇嘛,有信奉红教的,也有信奉黄教的。所以仓央嘉措从小就广泛地接触了西藏喇嘛教各派的教义。仓央嘉措从小就非常聪明,他除了学习佛教的经典外,还学习哲学、诗歌和历算。这可能为他后来成长为诗人打下了学识的基础。关于这段时间的生活,在《妙音天界琵琶音》也有译作,《六世达赖喇嘛传》中这样记载着仓央嘉措对阿旺多尔济说的一段话:“那时我年幼无知,第司强横,专门派比丘江央扎巴对我严加管束,在三年中,要我像长流不断的恒河水一样,一年四季无休止地听讲经卷帙函,我如果稍站起来走动走动,我的根本师江央扎巴就手捧经书,追逐于后,苦苦地哀求我说:‘求求您坐下来听我讲经吧!不然,第司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听了他的话,我只得坐下来继续听他讲经,于是他就高兴地给我叩头作揖”。仓央嘉措讲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他一边用拳头猛击着自己的头,一边说:“今天我走到这个地步,全怪我当时让讲师为我操心,这个罪过现在由我来尝还是对的”。

关于六世达赖坐床一事。康熙皇帝虽对第巴·桑结嘉措事先不报朝廷而立新达赖,甚为动怒,但出于大局,当时仍予以承认,并亲派章嘉呼图克图参典。史书中记载:“康熙皇帝亲派章嘉呼图克图等至藏,迎至布达拉宫坐床,御赐珍物甚多”。从这一点足以看出,这时康熙皇帝及蒙古汗等是承认仓央嘉措的正式转世身份的。



三

仓央嘉措坐床后的政治气候,表面看来较平静,而实际上在西藏历史上是为风云变幻的时期。仓央嘉措出生以前,西藏是噶玛王朝统治时期,黄教正处在迅速兴起和强大的阶段。代表噶举教派(俗称白教)利益的噶玛王朝,“嫉视黄教,几欲根本灭除”,对黄教采取压制摧残的政策。与此同时,甘孜地方的白利土司永顿多吉率领大军西进,占领了德格、邓柯等一大片地方,声言要消灭黄教。这两股势力东西夹击,对于处在中部地带的黄教集团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具有雄才大略的黄教领袖五世达赖第巴·罗桑嘉措,抱着发展黄教势力、统一全藏的目的,同正在青海地区扩展势力的和硕特蒙古部落联合,订立密约,邀请和硕特部进驻西藏,作为黄教在军事、政治上的支柱。康熙二十四年(1639年),和硕特首领固始汗首次率领蒙古骑兵进入甘孜一带,在东面消灭了白利土司,康熙二十六年(1641年),固始汗应达赖之邀,再次率兵入藏,又向西以武力推翻噶玛王朝。依靠蒙古部落的军事力量,五世达赖建立起以黄教为主体的噶丹颇章王朝,确立了黄教集团在西藏300多年的统治,达赖喇嘛也就成了西藏至高无上的政教领袖。这时候,明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农民大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具有政治远见的五世达赖料定明朝必然灭亡,为了巩固黄教集团初建的统治地位,就和实力更强大、但还未入关的清王室拉上了关系。康熙二十七年(1642年),五世达赖派遣特使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注:伊拉古克三呼固克图是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之子,清太祖元年(1616年)出家,并去西藏学佛,被尊为呼图克图),于次年抵达盛京(即沈阳),朝见皇太极,受到清室隆重的优礼接待,黄教集团就找到一个更大的施主,更有力的靠山。清军入关,清朝在全国的统治确定之后,利用和扶持黄教,稳定蒙藏地区,进一步推进统一全国事业,顺治帝屡邀五世达赖进京,固始汗也极力推动这一重要政治活动。五世达赖于顺治九年(1652年)亲自进京,谒见顺治皇帝。清廷为了借重喇嘛教安抚各蒙古部落的人心,巩



固清朝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地位,也极力笼络黄教集团。五世达赖进京之前,清廷于北京赶修成金碧辉煌的黄寺,供达赖住宿,又专门修建天桥,作为达赖进入京城的特别通道,以别于世人。达赖进京之时,顺治皇帝借打猎的名义,亲自到南苑迎接。达赖离京返藏途中,又特派礼部尚书和理藩院侍郎为专使,赶赴噶代地方,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金册钝金印,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以示优隆。同时又遣使前往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册文曰:“作朕屏辅,辑乃封圻。”从此,清政府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综理黄教的地位和固始汗在西藏的政治权限。经过这样一番努力,西藏黄教集团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得到有力的保护,又受到和硕特蒙古部落的强力支持,黄教集团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但是,与此同时也就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和硕特蒙古入藏之后,赖着不走,有当雄八旗重兵驻防,首领固始汗除了掌握强大兵权之外,还实际上操纵着噶丹颇章王朝的政权。五世达赖除了征收13万户赋税、坐吃俸禄、率领教徒拜佛诵经,安富尊荣于教主地位之外,政治上大有成为傀儡之势。五世达赖不甘心受制于人,企图排挤蒙古部落势力出西藏;和硕特蒙古亦不甘心失去在西藏的既得权益,尽力控制噶丹颇章王朝。这样,在西藏上层统治者和蒙古部落上层统治者之间种下了权力之争的祸根。这种斗争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到了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世达赖年事已高,为了预防自己死后噶丹颇章王朝的大权旁落,就在这一年,他任命桑结嘉措为藏王,这就是史书上称的第巴·桑结嘉措。果然3年之后,五世达赖圆寂,“桑结欲专国事,秘不发丧,伪言达赖人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之命以行”(《西藏通览》)。这时候,固始汗已死,第巴·桑结嘉措掌了大权,进一步排挤和硕特蒙古部落势力,他和固始汗子孙之间的权力之争达到了更加尖锐的程度。仓央嘉措就是在这种上层统治阶级权力斗争的形势下出生、坐床、废黜,最后在解送京城途中逃走,从此,他周游各地,终其一生。

仓央嘉措在进宫之前,第巴·桑结嘉措扶持一个真死假活着的五世达



赖镇慑人,实际上由第巴·桑结嘉措独揽大权,仓央嘉措仅仅是个备用的工具。进宫之后,有达赖之名,无达赖之实,居达赖之位,而不能行达赖之权,大权仍旧归第巴·桑杰嘉措,他还是个傀儡。第巴·桑结嘉措兴建后苑龙宫,让仓央嘉措在这里安心地修习和安歇,限制他过问政事。徒拥虚位的仓央嘉措感到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又厌恶上层集团的争权夺利,便向班禅表示情愿放弃黄教法王的尊位,只求保留教主的世俗特权。仓央嘉措由于政治上不得志,而犯宗教戒律的行为,这就给和硕特部落的统治者以把柄。康熙四十年(1701年),固始汗之重孙拉藏汗继任和硕特部落首领,为了把他的政敌第巴·桑结嘉措搞下台,首先向第巴·桑结嘉措拥立的仓央嘉措开刀。拉藏汗向康熙皇帝上奏密本,指责仓央嘉措行为不端,是个假达赖,达到搞垮第巴·桑结嘉措的目的。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第巴·桑结嘉措与固始汗之重孙拉藏汗的长期矛盾尖锐化,第巴两次企图毒杀拉藏汗未遂,拉藏汗反率兵将第巴·桑结嘉措捕杀,同时召集各大寺活佛对仓央嘉措进行宗教审判,说他乃违犯教规,不是真达赖。但会上意见不一,多数人说他“行为不检”乃是“迷失菩提”之故,甚至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游戏三昧,未破戒体”,而无人敢断言他是假达赖,废黜之议遂缓。但拉藏汗仍坚持废黜仓央嘉措。

康熙皇帝怕仓央嘉措继续担任达赖喇嘛,引起西藏的内乱,乃与和硕特首领拉藏汗宣布废黜仓央嘉措。同时还向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宣布,不承认仓央嘉措是五世达赖的转世,不承认他是六世达赖喇嘛。这样,仓央嘉措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

四

康熙皇帝深知蒙古倾心归向达赖喇嘛,一旦仓央嘉措被准噶尔领袖策妄阿拉布坦迎去,西域、蒙古等地则从此多事。因此,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乙巳(1706年11月25日)命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去藏,任务是封拉藏汗“翊法恭顺汗”,拘押六世达赖赴京(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七,页二

四)。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仓央嘉措被押解去北京,行至拉萨西郊,遭到哲蚌寺众僧的武装袭击,将他抢进寺内。押送卫兵乃与哲蚌寺僧众开战,杀死喇嘛多人,复将仓央嘉措抢出,继向北京解送,行至青海湖(贡嘎诺尔)边,仓央嘉措寻机逃走。

据《六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拉藏汗向清朝皇帝呈报,否认大师乃真达赖转世,皇帝遂派人赴藏辨识,钦使至拉萨将大师脱光衣服置于宝座之上,四面观之,曰:“是否真达赖转世,一时虽难断定,但观此人有圣者福相。”说完顶礼而去。之后,战火越烧越烈,皇帝复派恰纳喇嘛和阿南达赴藏调解,钦使尚在途中,拉藏汗已杀第巴·桑杰嘉措,钦使至藏,拉藏汗越加凶横,只得于藏历火猪年(1707年)秋,将25岁的大师迎请到内地。行经羊八井至青海的堆如措拉时,皇帝圣旨至,责两钦使办事不周,内斥:“你等将大师迎至内地,安置何处?如何供养?”钦使担心自己性命不保,不知所措,遂对大师曰:“今有两条路可供你选择,一条路是死,一条路是弃位逃遁,不然我等将要人头落地。”大师曰:“你等当初与拉藏汗如何合谋,今已如似,如不将我解至皇宫,面见皇帝,誓不罢休。”众惊惧,欲害大师,大师有所闻,复对众人曰:“我出家人,绝无伤害你等之意,如若让你等受罪,不如我先死在前。不过先看看我的缘分如何。”于是插一帐棚杆于地下。第二天果真长出青枝绿叶。又叫当地老人,问其姓名,答曰:“阿尔萨朗”,再问当地地名,答曰:“贡嘎诺尔”。把地名和人名联系起来,意思是众生热爱的宝贝狮子,遂以为吉祥,故于一个风雪之夜,只让他的知宾和司膳以及两名钦使知道,孑身遁去。

仓央嘉措从贡嘎诺尔逃出来,遇见了一伙去安多的驮队,他先向他们讨点东西吃,然后就和他们结伴同行,先到了安多一个名叫阿惹的地方,然后沿着安多去西康的路南下。于藏历土鼠年(1708年)七月,到了脱格,那时康区正流行天花,仓央嘉措不幸传染上了这种病,他的脸和全身发肿,眼睛也睁不开,身子也不能动弹,又没吃没喝,白天忍受烈日的蒸烤,晚上受着寒风的煎熬,又饥饿难忍,这时,一只乌鸦丢下一块肉,他拣起来吃下后,身体稍有好转,于是爬起来,依靠一根拐棍前进。后来他看见一棵树上结满了



红色果子,摘了一些,吃下后又不幸中毒,差点身亡。最后他摘了一些野葡萄充饥,病势稍见好转。他又继续南下,到了康定,认识了一位名叫白巴娃的人,谈起峨眉山的秀丽风光,一下把仓央嘉措吸引住了,于是他放弃了立即回西藏的打算,决定和白巴娃结伴去朝拜峨眉山,当他们到达峨眉山下的县城时,白巴娃走失了,他只得独自登上峨眉山,参观了山上的泉眼和美景,朝拜了佛像、佛塔,受到了山上寺庙和尚的热情款待。他在那儿住了几天,又原路折回,经理塘和巴塘,来到康区和西藏的交界处,遇到了几个土匪,将他仅有的一点糌粑全部抢光,幸而没有受到伤害。藏历土牛年(1709年)四月,经嘎玛如返回拉萨,先到色拉寺后山,当时在山上闭关修持的格勒嘉措知道他来到的消息后,立刻走出禅堂相迎。他见仓央嘉措孤身一人流落异乡受苦,心中无限悲伤,即劝仓央嘉措留住拉萨,为了遮人耳目,将他隐藏在禅堂深处,装着闭关的样子,杜绝一切会见,吃食全从一个小洞里递入,就这样住了一个多月,仓央嘉措感到长此下去,会使格勒嘉措年迈的身子累垮,因此谢绝了他的挽留,离开了拉萨,带着比丘吾珠向山南进发。在山南,他们朝拜了桑鸢、昌珠、娥嘎、梅多塘等圣地。藏历金虎年(1710年)到达匝日,跟迦居派得道喇嘛麻波修持密宗,比丘吾珠这时返回,他一个人身着布衣,断绝烟火,认真苦修了几个月,获得了一定成就。藏历金兔年(1711年)七月,他到达桑丹林寺(注:桑丹林寺,在山南浪卡子县境内),拉藏汗知道后,立即派人追捕,在达孜县将仓央嘉措围困数日。有一夜,天空出现了金刚大威德白色身像,接着寺庙门窗突然打开。他那时完全可以趁机逃走,但他没有逃走。过了15天,藏王旨谕至,令将仓央嘉措解送拉萨。于是捕快将他置于一牦牛上,由12人押送启程,行至谷嘎拉丁,突然狂风大作,天空中飞沙走石,押送的人个个冻僵。趁此机会,仓央嘉措逃出了虎口,直奔尼泊尔的方向逃去。途中遇到两条大狗,仓央嘉措打跑了它们,由此结识了狗的主人鲁尔加,鲁加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并表示愿同他结伴去印度朝圣。他们同行数日,一天,来到一处密林,林边有条小河,当他们正在趟水过河时,发现了两头像人一样的怪物,最初仓央嘉措以为是佛经中说

的会吃人罗刹,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鲁尔加时,鲁尔加立刻吓得昏死过去。仓央嘉措无法,只得背着鲁尔加逃跑,他们翻了几座山,还是摆脱不了怪兽的追踪,后来看清楚是两头人熊,仓央嘉措将大石块推下山去,把大的一头人熊砸死,小的一头惊慌逃走,他们才算脱离了险境。藏历水龙年(1712年)冬,他们到达了尼泊尔,得到了尼泊尔国王和王妃的布施。藏历水蛇年(1713年)四月到达印度原释迦牟尼讲授《般若波多密多》的灵鹫山,朝拜了圣迹,然后经原路返回西藏。木马年(1714年),先到聂拉木和定日,经过门隅、工布,到达了塔波寺(注:塔波寺,据说在今藏南朗卡子县境内),在那里住了下来。在这期间,仓央嘉措一下由万人之上的达赖喇嘛跌落为一个靠化缘乞讨度日的游方僧,历尽了人世间的千辛万苦,但他仍然十分乐观潇洒,他经常在塔波寺附近的河边洗澡,有时也和一些扎巴一起,半夜跑到附近的寺庙,敲击寺中所有的钹和饶取乐。

五

仓央嘉措于藏历木羊年(1715年)秋,化装成乞丐再次返回拉萨,正遇到哲蚌寺作法会,他被扮神的巫覡认出,巫覡向他表示敬意,仓央嘉措怕被众人识破,赶快转过脸去,示意巫师不要泄露秘密。大概是仓央嘉措预感到在拉萨无法存身,因此带着十几名扎巴,离开了拉萨。仓央嘉措于藏历火猴年(1716年)秋,到达青海,先去西宁附近的色科寺(注:蒙古语称色尔科格寺,距西宁70公里),同年到达阿拉善,通过《六世达赖喇嘛传》作者的父亲班咱尔加布台吉,又结识了阿拉善蒙古的阿宝王(注:指阿拉善旗二代王爷阿宝),藏历火鸡年(1717年)他来到了阿王的衙门,与阿王结成施主关系,这年秋天,又随阿王的福晋到达北京,游览了北京的名胜,朝拜了以檀香木做成的佛像和各佛教圣地。当时,第巴·桑结嘉措的长子阿旺仁青、次子麻索次仁、幼子阿旺增珠和第巴·桑结嘉措的女儿连同近臣仆役共23人,被拉藏汗解送北京。一天仓央嘉措从安定门向一座城堡走去时,正遇到他们被解送去堆西门,这时,他们从西藏带来的一只狗,远远地发现了仓央嘉



措,便飞跑过来,含住仓央嘉措的衣服欢蹦乱跳,仓央嘉措见此情景,无限感慨。以后,第巴·桑杰嘉措三个儿子的下落,他无从打听,只是第巴·桑杰嘉措的女儿,曾托人将一枚戒指转交给他,请为她死后的亡灵超度。

在这期间,皇帝的近臣阿老爷交给他一卷帙经函和一个宝瓶,说这是他供养的喇嘛第穆呼图克图被流放到察隅时留下的。第穆临走时说:“我走后,会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喇嘛来这里。他的名字叫仓央嘉措,将来你自会知道的。他来时烦将此交给他。”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到,拉藏汗杀死第巴·桑杰嘉措之后,不仅斩草除根,抓走他的儿女,废黜了他选定的达赖喇嘛,而且对待不同政见的西藏上层喇嘛也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西藏、蒙古、青海一带的上层喇嘛甚至清朝政府内部也有些官员是同情和敬仰仓央嘉措的。例如上面所说的阿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和仓央嘉措曾经有过一段对话:

阿老爷:“喇嘛!我认识你,今天特地来,有两言奉告。”

大师:“你请讲,看我是否能办到。”

阿老爷:“喇嘛的底细我全知道,如果您愿意做达赖喇嘛,我可以呈请皇帝,让您复位。不然,做法敕喇嘛(注:由皇帝亲自任命并发给盖有玉玺执照的喇嘛)。也行,现今法敕喇嘛已圆寂,正好缺额,如果您愿意,我也可以呈请皇帝,让他心中留意。”

大师:“这两个差事我看都不错,不过我一样也不能选择,我是个朝山拜佛的游方僧,不需要什么名位。”

阿老爷:“皇帝要是降旨下来,不管您在天涯海角,都是可以把你召来的。”

大师:“皇帝和你扣留得了我的身,却拴不住我的心”。听完仓央嘉措的果断回答,阿罗笑着站起来向他顶礼说道:“喇嘛!你真是一个直言的人,但今后可不能这样,如果您不愿要高位,那你明后天就离开这儿为好。倘若你还要暂住一段时间,也请您深居简出,我今后也只能晚上来看望您了。”

另一个是为皇帝看病的御医,西藏喇嘛贡桑,因为听说仓央嘉措在来

北京的道上圆寂，长期忧郁成疾，仓央嘉措见到他时，已是奄奄一息，但当他听说来到他病榻前的就是仓央嘉措时，立刻翻身下榻，晕厥过去，苏醒后，他对仓央嘉措说：“对俗人来说，像你这个样子来到这儿，还不如死去的好，可是你是圣人，圣人的德行是超乎凡夫的想像的，这一点你是深知的。”

还有一个是大通脱桑达吉林寺的鲁家夏仲，最初听说仓央嘉措来到蒙古的消息，他还有些不相信。有一天，他在路上和仓央嘉措相遇，当他认出是他久已崇拜的第六世达赖喇嘛时，立刻滚鞍下马，像一棵树被砍倒一样晕倒在地，苏醒过来后，他在地上打滚，一边失声痛哭，一边顶礼来到仓央嘉措跟前。仓央嘉措见此情景，安慰地说：“你不要悲伤，西藏众生命苦。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就让我一个人承受了吧！你不要把这事看成是一件坏事，而应当把它看成是教化众生的好事，因此，你应该高兴才是。”

仓央嘉措是一位佛教徒，讲究牺牲自己，普度众生，在《六世达赖喇嘛传》中反映他帮助别人，救护别人的地方比较多。

例如，他去峨眉山朝圣返回西藏，经过巴塘时，见一个12岁的女孩和一个9岁的小男孩正在出天花，他们的母亲因出天花已经死去多时了，他见此情景，不忍心离去，先帮他们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远处，扔进山谷，回来后又熬糌粑粥一勺一勺地喂两个孩子吃，直到孩子的舅舅来了，他才离去。

藏历火猴年(1716年)秋天，他和15名扎巴仆役横渡黄河时，一个名叫陶克的扎巴被水冲走了，他立刻脱下衣服，舍身相救，结果，人是救出来了，而他最宝贵的舍利却被水冲走了，他心疼得欲拔刀自杀，幸被众人劝住。才算平静下来。除此他还从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救出过落水的汉族兄弟。他去青海、蒙古后，和人民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经常走家串户，为百姓乞福禳灾，求子、超度，所以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说“格萨尔王的故事多，百姓嘴里念的佛语多，仓央嘉措跨过的门槛多”。青海、蒙古一带的藏、蒙、汉、满等各族人民对他也非常信仰和崇敬。当他从色科寺到卡绒来时，寺庙的喇嘛和附近部落的人都来迎接，人们用欢迎第五世达赖的礼仪欢迎他，请他住进当年为第五世达赖特制的帐篷。在欢迎他的会上，还举行了赛牛和摔跤比



赛。在青海、蒙古一带,有的人送给他成千上万种东西作为供养,有的人几十头几十头牛羊献给他作为布施。

藏历土狗年(1718年)春,仓央嘉措随阿宝的福晋从北京回到阿拉善旗,在阿旺多尔济家住了两年。于藏历金鼠年(1720年)五月去色科寺,他预感到青海将要发生叛乱,当年就返回了阿拉善。藏历金牛年(1721年),再次去色科寺。藏历水兔年(1723年),果然青海罗布桑丹增王起兵,皇帝派兵平乱,并放火烧了色科寺和嘉格隆寺。那时仓央嘉措已经回到了阿拉善。藏历火羊年(1727年),仓央嘉措开始修建嘉格隆脱桑达吉林寺,该寺汉语叫石门寺。该寺从雍正五年(1727年)修建至乾隆八年(1743年)竣工,前前后后共花了16年的时间。在修建过程中,遭到了当地官员的刁难,他们今天修好的殿堂,第二天就被捣毁,甚至砖瓦也被扔掉了。看到这种情景,仓央嘉措十分痛心,他放声痛哭,为了寺庙能继续修建下去,只得给官吏跪下求情,又送去成百上千种东西作为贿赂,才算避免了这场灾祸。当寺庙修成时,清朝皇帝对宗教的政策有所改变,下旨说凡是被年总督(川陕总督年羹尧)毁坏的寺庙,均可按自己的意愿修复,同时派岳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将已毁坏的寺庙全部修复。为此,西藏、康区比较安宁,佛教像后宏期那样昌盛,皇帝对嘉格隆脱桑达吉林寺的250名喇嘛以及仓央嘉措本人,也按等级发给一定的布施。藏历金狗年(1730年),岳钟琪将军邀请仓央嘉措为他率领的部队作法事,祈祷战神,保佑他们在战争中获胜。藏历火龙年(1736年),阿拉善人奉旨迁居青海湖。仓央嘉措也由阿拉善迁居到摠尖勒。在那里住了9年,担任过13个寺庙的堪布。

这13个寺庙是:大突寺、主骨寺、强仁寺、加册寺、色尼寺、加亚寺、娥尔寺、出寺、夏玛寺、嘉多尼寺、霍寺、于青寺、直贡寺等。

藏历木牛年(1745年),仓央嘉措又奉旨返回阿拉善旗,不久染病,于藏历火虎年五月初八(1746年6月26日),在阿拉善的门吉林庙圆寂,这个寺庙,后来就是广宗寺的属庙之一承庆寺,终年64虚岁。

延福寺概述

杨永忠

延福寺坐落在阿拉善盟驻地巴彦浩特镇,即原来的定远营城内亲王府西侧,寺庙与王府连成一片,是一个气魄宏大的古建筑群。据内蒙古文史资料说:延福寺是在唐朝修建的罗汉堂基础上扩建的。其实,准确的说,定远营城是在雍正八年(1730年)由侍郎臣通智与川陕总督岳忠琪奉皇上旨意修建的兵营驻地,目的是遥通哈密、巴里坤及两狼山等要地的联络,以保边疆的安谧。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皇帝将城赐给阿拉善和硕特札萨克驹马多罗郡王阿宝驻守,此后才逐步修建了王府及王爷家庙,即延福寺,它并非唐朝所建。

1.概况

据明史载和硕特部落由新疆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前,定远营地方由鞑靼蒙古各部占据差着;在此游牧。当时,定远营依山傍水,草场茂盛,葡萄泉及三条小溪,由东向西横穿而过,是一个环境幽雅的好地方。那时,贺兰山的一个佛教寺院在定远营建有一个属寺,内供三世佛及十六罗汉塑像。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和硕特部首领和罗理授封为贝勒爵,赐札萨克印,允其驻牧阿拉善地区;和罗理府第曾设在巴音乌拉和沙尔布尔都地方。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将新建的定远营城赐给阿拉善第二代王阿宝(额駙、郡王)驻守,阿宝在寺庙东侧建起了王府,该庙变成了王爷的家庙,由阿宝从西藏(一说是三川)带来的玛尼喇嘛阿旺丹增旺吉勒当主持;此及



延福寺变为喇嘛庙之始,它也是阿拉善旗最早的喇嘛寺,谷称王爷庙或大庙,藏语称“格吉楞”。传说:定远营建城前,当地就是一个小集镇,除有佛待外,还有名气较大的样泰隆商号,故民间传说:“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先有御马圈,后有王爷府”。

后来在三世殿的前端增建了三间藏式门庭,变成汉藏合建的玲珑壮观的大殿。乾隆十年(1745年),阿拉善第三代札萨克王罗布桑多尔济时期,在三世殿后修建了49间藏式三层朝克沁多根(大雄宝殿),而积1280平方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御赐匾额“延福寺”。此乃延福寺正式延生之时,此后,陆续增建了转经楼及其他殿堂属庙。

嘉庆十年(1805年),阿拉善第五代王位后,为纪念先亲五功德,在大雄宝殿东西两侧兴建了阿格巴殿、观音殿及药王庙等。民国11年(1922年),延福寺葛根甘珠尔巴格西兴建了东科尔殿。阿拉善第十代王达理札雅袭位后,为迎接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来旗,出资整修了延福寺,并为班禅准备了八宝嵌龙狮子宝座(原物在“文革”动乱中被毁)。

延福寺在牧区有7个属庙(子庙),即:沙尔嘎庙(诺尔公)、额尔布海庙(艾力布盖)、吉兰乃庙(巴丹吉林)、宗乃庙(夏尔套勒盖)、库列图庙(树贵)、巴尔达湖庙(乌达巴仓布鲁斯台)、阿贵庙(哈鲁乃)。传说:唐朝时,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到西藏传播密宗教义时,曾在阿拉善的阿贵山洞(今属磴口县)修炼一年多,并在当地收留了弟子,此后便形成了阿贵庙,是阿拉善唯一的一座石窟庙,也是唯一的“宁玛巴”(红教)派喇嘛庙,清廷赐名为宗乘寺,其意同西藏的“布达拉”,含有观音菩萨的道场之意。

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来到阿拉善,居住了30年;期间,曾到延福寺作过佛事活动,并取得了王爷和福晋的崇敬;他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圆寂后,遗体装在八宝灵塔内,供奉在阿拉善的广宗寺(南寺)。同治八年(1869年),回民造反时,破坏了广宗寺密宗殿,僧人将抢出后,送到延福寺药师殿供奉多年;光绪年间,南寺第五代达格布呼图克图嘉拉森旺吉尔,将灵塔请回广宗寺供奉。民国2年(1913年),旗衙门施

11斤黄金,重修南寺六世达赖灵塔祀殿,增装了鎏金殿脊。六世达赖生前,曾为阿拉善神写了《阿拉善祈供》,此后,各寺庙在向阿拉善神祈祷时,均诵此祈供词。

延福寺的仓(学部)有:阿华尔(却伊拉)扎仓(学哲理经论);丁科尔扎仓(学天文、星象、占卜等);满巴扎仓(学医药);能乃(卓德巴)扎仓(学密宗教义)。本寺不进行学位资格考试,晋升“格西”等学位时,可去参加广宗寺的辩论法会,经考试取得学位。

延福寺的管事机构是“卓干代”会议,由十几人组成。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卓干代”由12人组成,计有3个达喇嘛、加上朝格沁温测特、朝格沁格斯贵、阿克巴喇嘛、满巴喇嘛、格伊克喇嘛。各1名和4名负责和王府联系的鄂木博喇嘛。寺内所有的大事情都由会议议决,重大事情报由甘珠尔巴格西定夺。现时,该寺仍设有延福寺管理委员会,由1名专职主任负责日常行政事务。

全寺喇嘛人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有253人;新中国建立时尚有百余人;解放初,大部分喇嘛回牧区参加生产劳动,留寺的喇嘛约20人左右,组成喇嘛试验田(农业互助组),僧人参加劳动,自谋生活。现有喇嘛30多人,住寺的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1986年5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将延福寺定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寺主活佛

延福寺的主活佛有两个,最早的称玛尼喇嘛,爵位是“沙布隆葛根”;他的由来,未找到佐证史料,传说已有八代。现仅将一些传说记述如下:原新疆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被准葛尔部的葛尔丹击败后,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迁徙到青海游牧;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部分部众,由首领和罗理率迁到龙头山以北的阿拉善地区定居,同时带来了一个玛尼活佛,他是阿拉善地区最早的喇嘛教活佛之一。

玛尼活佛死后80年,从喀尔喀(今外蒙古)来了一个喇嘛,名叫鲁布森



隆德勒,在阿拉善巴丹吉林地区给牧民看病念经,颇有影响。后有一个地方官员到青海塔尔寺拜佛,向甲依格活佛诉说了该喇嘛的情况,甲依格活佛说,鲁布森隆德勒就是阿拉善玛尼喇嘛的转世化身,并给这官员开具了“嘎西格”(最高级的确认活佛的证明)。这位官员回旗后,在巴丹吉林修建了寺庙,名为嘎尔登彭次格阿尔布吉林,尊鲁布森隆德勒为“沙布隆玛尼活佛”,时间约在道光年间。

第三代玛尼喇嘛是那旺丹增旺吉勒,光绪五年九月六日(1879年10月20日)由旗政府赐文(嘎西格文书)让其为延福寺玛尼喇嘛,光绪二十三年(1879年)到延福寺任达喇嘛,两年后去外蒙古未归。

最后一代玛尼活佛名叫鲁布生图登旺喜格,出生在阿拉善旗牛尔格图地方,于民国8年(1919年)转世,在延福寺坐床。民国42年(1931年),广宗寺活佛阿旺丹增被旗衙门协理等官员诬为“红党”(共产党)进行迫害时,据说,玛尼活佛也受牵连,而被彻除一切尊号,发配到库列图庙上服苦役。民国30年(1929年),旗王爷下令恢复了玛尼喇嘛一切尊号,又回到延福寺,1990年前后在青海塔尔寺圆寂,此后,再未传世。

延福寺的另一个活佛葛根,称“甘珠尔巴格西”,爵位是沙布隆,他的由来有几种传说。据国家民委于1958年在阿拉善旗调查材料中说:延福寺第一代甘珠尔巴格西,原是阿拉善广宗寺第二代葛根罗桑图布丹嘉木苏(注:俗称温都尔葛根,他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转世化身,生于乾隆十三年(1747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圆寂)的经师,阿拉善王爷为给福晋治病,将他请到延福寺念《甘珠尔经》,进行祈祷,并让他当了寺的主持。他死后,温都尔葛根经西藏达赖喇嘛确认,从青海请来第二代甘珠尔巴格西。

另一种说法是:甘珠尔巴格西的前世是青海三川地区拉泽关布庙的法师,名叫布增罗布生图布登旺舒格(又译为伊藏罗桑多登旺舒格),他圆寂后,由西藏达赖喇嘛确认的“呼毕勒罕”(转世化身)是甲木英黑都布却吉嘉木苏,由阿拉善广宗寺温都尔葛根从达喜达尔琪林寺迎请到延福寺受戒坐床,他13年后精通各类经法,很有名望;道光八年(1828年),因给阿拉善亲

王玛哈巴拉的夫人治好了病，皇上赐给“崇师坎布”称号，此乃延福寺第二代甘珠尔巴格西。

第二代甘珠尔活佛圆寂后，经西藏达赖喇嘛认定，吉布增罗布生嘎拉森达尔吉（又译吉藏罗桑嘎桑多吉）为其第三代“呼毕勒罕”，遂请到延福寺坐床。

第四代甘珠尔巴格西阿旺却吉嘉措，于同治十二年（1876年）出生在塔尔寺扎以格唐地区，经班禅大师确认为“呼毕勒罕”，他曾在拉萨哲蚌寺深造，精通经法，还拜见过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他于民国55年（1944年）圆寂，享年72岁。

第五代活佛，民国56年（1946年）出生在阿拉善巴伦别立地方蒙古族家庭，由青海塔尔寺安嘉斯活佛确认其为甘珠尔巴格西的转世“呼毕勒罕”，并赐法名为阿旺图布登尼玛，民国58年（1948年）迎请到延福寺坐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于1958年开始到阿拉善旗蒙校及中学读书；1970年参加了工作；1981年到天津中药学校学习，回旗后，在阿拉善盟医药公司任副经理，后到广西高等经济学院进修；1994年后，任阿拉善盟政协副主席、盟宗教协会主席等职。2003年任内蒙古自治区佛协秘书长。

3. 山门和天王殿

延福寺门前，原来是一个举行查玛庆典活动（跳布踏）的广场，传说：藏王朗达玛禁佛教，杀僧侣，毁寺庙；喇嘛贝居多吉借跳布踏之机，用袖剑刺死了藏王；后来就把跳布踏当成驱邪逐秽，战胜外道的宗教仪式。查玛舞的扮相有二十八星宿和十二地支（十二天女）及鄂不更（寿星老）、神鹿王、哈什哈（紫微星）等。广场东侧有十间廊房，有一门通王府，是王爷及眷属观看跳舞（即查玛，或跳鬼、祈福）的观礼台；西侧有一门可通寺庙吉萨，这些设施早已无存。现在的广场，整修后加了围墙和门庭式大门，变成延福寺的前院；大门内有两个高约三丈的玛尼杆，在举行宗教活动时，也是悬挂大型佛像的地方。

进了外院，即可看见延福寺的山门，也叫三门。一般寺庙坐落于山坡上，人们常把庙门叫山门。其实，按佛教之原意是叫三门，意思是进了庙门，



即谓人的身、语、意三个方面，都皈依了佛教。延福寺的三门确实是三个门，即：中门为天王殿门，东门通寺内膳房，常人不走；西门是经常出入的通道。近年整修后，将东西门及前围墙完全拆除了。三门前有两头石狮子，表面看是个平常的装饰品，佛门对它还有释意，一是说：释迦牟尼初出生后，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状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故曰：寺前的石狮子，象征佛门独尊之意。二是说：释迦牟尼的弟子阿难陀，在摩柯迦叶召开的辑经会上，传说佛经的声音如狮吼雷鸣，石狮是象征佛法威如狮吼。又说石狮是象征政权之威。

三门的中门即天王殿的南门，门楣上有仿乾隆御书字体的砖雕“延福寺”三字。天王殿是三间汗式歇山硕建筑，南墙有两个砖雕窗户，北墙有通向内院的大门。殿内东西相向供奉着英武雄威的四大天王塑像。

四大天王之说，源于印度神话。传说须弥山腹有四天王，各护一方天，故称谓护世天王。佛经里说：释迦牟尼出家时乘马而行，四天王捧马足逾城而去，太子才能得以修道成佛；后人为纪念四天王的功德，将其塑像供在寺内。又说，四大天王是帝释的外将，各守护一方天的平安等。

延福寺的四大天王塑像均为坐势，坐垫铺虎皮，左腿下垂，右膝稍曲，身着盔甲，足蹬朝尖鞋，一派武士形象。西南方是东方持国天王，名叫提多罗咤，白色皮肤，手抱三弦琵琶，头盔上有鹰头饰像，他的任务是护持国土。西北方是南方增长天王，名毗琉璃，蓝色皮肤，头盔是大象鼻形，手持宝剑，意在令人增善。东南方是北方多闻天王，名毗沙门，黄色皮肤，右手持宝幢（伞），左手托灰鼠，象征保护民财。东北方是西方广目天王，名毗留博叉，红色皮肤，右手向上托一白塔，左手缠一白蛇，怀中有一绿色大蟒，怒目远视，象征净眼观察。

四天王手中之物。各有不同的解释。汉地佛教说：宝剑示风，琵琶示调，伞盖示雨，龙蛇示顺，加起来是风调雨顺，表示吉祥。喇嘛教说：四物是代表“地、水、火、风”四大劫，表示四大皆空之意。民间把四天王说成四大金刚，其实不是一回事。在延福寺大雄宝殿前廊墙壁上也绘有四大天王之画像。

最近,天王殿的四天王像已拆毁,正在把他改成站像,脸色和手持宝物都进行了调换。

天王殿后即为寺的内院,正中有阿拉善旗第三代王爷和福晋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敬献的六角亭式三层铸铁香鼎,上书铭文曰:“贺兰善山札萨克和硕亲王多罗额(駙)罗卜藏多尔济郡主多罗格格虔敬献,敕赐延福寺。大清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度铸”。

再后是八角形双层飞檐转经楼,里面装有丈余高的八菱形转经轮,轮中装有清朝出版的藏文《甘珠尔》大藏经。解放前,在城外广场上,也有与此楼相同的转经楼,可惜后来被拆毁了。

转经楼的东西两侧,分别是两层四角飞檐钟楼和鼓楼,这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由阿拉善第四代王爷和福晋捐资建造的。铸铁大钟上的铭文曰:“御前行走镇守宁夏等处地方将军兼管旧扈尔固特(即额济纳旗)旗务事贺兰山(即阿拉善)和硕特厄勒(厄鲁特)札萨克和硕亲王多罗额駙壹级纪录壹次旺亲班巴尔同王妃多罗格格郡主诚造”。下书“大清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十日吉日造”。

4.三世殿

转经楼北面是三世佛殿,它与后面的大雄宝殿及前面的天王殿、转经楼,都在一个南北中轴线上,殿的形式系汉式建筑,外观分前后两截,前半部分是三间门庭式两角飞檐拱形歇山顶,是后来增建的;前墙是三个木制门面,东西侧墙各为木格页窗;后半截是五间汉式歇山顶建筑,小巧玲珑,这是乾隆十年(1745年)由第三代额駙亲王罗卜藏多尔济所建。殿内前梁上悬挂着乾隆十六年(1760年)乾隆皇帝用蒙、藏、满、汉四种文字御书钦赐的“延福寺”匾额,上书“大清乾隆岁次庚辰捌月拾陆日”。殿内正堂供奉着三尊金色塑佛,趺伽端坐,身披黄袈裟,右臂袒露,面情慈祥端庄。中间坐约是现在佛释迦牟尼,右臂自然下垂在右膝上;也是国王之子,是佛教的创始人,被奉为世界之尊,称世尊,藏语称“布尔红”。他的宝座前下方,共奉着一尊阿拉善神塑像,白脸八字胡,头戴五佛冠;据说他是从“甲各拉”(古印度)



请来的地方保护神,每年正月初三都要祭祀他,在祭文中赞唱他想念家乡的情感。世尊西侧宝座上是过去佛迦叶,藏语叫“桑杰敖斯仑”,佛经里说他是释迦牟尼成佛前世之师,他曾预言释迦牟尼将来必定成佛,他的愿心已了,故称过去佛。在世尊之东侧坐着弥勒佛,汉意是慈氏,蒙语称“迈达拉佛”,藏语称“强巴佛”;按佛经说,他的前世是个国王,名弥勒,后为世尊之徒;释迦牟尼曾预言:他(释迦佛)圆寂后,经过天上四千年,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弥勒才能下生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故称未来佛,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救度众生的责任由地藏菩萨担任。

在三世殿内的东西墙边,各有九尊神态各异的塑像,相向而坐,名为十八罗汉。罗汉是梵语摩柯阿罗汉的略称,是佛教小乘宗中的最高果位,寺庙中常见的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之分;一般多见的是十八罗汉。他的来历,据说是释迦牟尼在传教时,感化了十六个婆罗门外道门徒,使他们皈依了佛教,并证得阿罗汉果位;受佛祖之托,常住人间传播佛法;后人为纪念他们的业绩而塑像供在寺中。在中国五代以前,只供十六罗汉,后来有人把著《法住记》介绍十六罗汉的作者庆友和翻译《法住记》的唐玄奘也列入罗汉行列,而出现了十八罗汉之说;还有的是加上道教里的降龙、伏虎而成十八罗汉;还有的是加上自己教派的祖师和布袋和尚;有的是加上赤胆忠心的比干和不为名利的介子推;有的是加上痛斥邪恶、不畏权贵的疯僧济公和传说中的刘海等等。延福寺中的十八罗汉中除加了布袋和尚外,另一个加的是谁?无人说得清。

阿罗汉的本意有三:一是杀贼(贼者烦恼也),即断除贪、嗔、痴等烦恼;二是享受众生供养;三是再不受生死轮回。佛教的小乘宗主张自我解脱,修炼的结果,即可得到阿罗汉果位。大乘宗主张不仅要自我解脱,而且还要普度众生,其结果可得到更高层的十地菩萨果位。关于五百罗汉的来历,有多种传说,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释迦牟尼塑像右侧座上,供着两尊小型“白老翁”塑像,他的作用,如同西藏人的“才仁长寿神”、“干布喀布”(即白箱子神),汉人的“布袋和尚”、

“寿星老”，日本人的“寿老人”和欧洲人的“圣·尼古拉”长胡子老人一样。他的形象是白须、白发、白装，浑身素白，手持盘龙拐杖，很像萨满教的魔杖。据说蒙古人崇“白老翁”的年代早于信仰佛教的年代；喇嘛教把“白老翁”接受为万神殿中之神后，“白老翁”的形象即在寺庙中出现。

“白老翁”的起源传说：绿色陀罗向“白老翁”说：你本生仅是一个普通的祖师，来世将被称为“智翁”佛陀而生活；以白色老人形象出现，作为二十四位地神和水神之主，手执盘龙杖，作为花果山之主，而控制人和畜。蒙古信徒向“白老翁”的祈祷经文中说：有一日，金色佛祖与阿难陀、化缘僧和菩萨们，在花果山散步。发现一个须发灰白，身穿素服，手执盘龙杖的老翁，便向其问道：你为何独自一个深居此山？老翁答曰：我作为地神和水神，担负着护善驱恶的重任，住在此处。佛陀赞曰：出身高贵的孩子，请对我发誓，你要永远救度众生，扶善除恶。由此，民间传说“白老翁”是受佛之托，充当保护神，他如同阎王，不时找出犯罪孽的人，施给罪人一百种不同的灾难，作为惩罚；他还支配人生寿数和贫富；说他每月的初二日和十六日，从他居住的“皑皑白雪山”上的花果园来到人间，接收人们对他的祭祀和惩罚罪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左右，内蒙古的贤禅师睿智喇嘛画的“白老翁”形象，增加了高额头，还为他添了一只鹿为坐骑；此后，即被纳入蒙、藏喇嘛教跳查玛舞蹈的扮相内。

5. 吉祥天女殿和白哈五王殿

吉祥天女殿和白哈五王殿，分别坐落在三世佛殿的东西侧，各为五间汉藏结合式建筑。吉祥天女殿原来叫骡子天王殿，解放后改称中国母殿，白哈五王殿原来称藏红殿，它是延福寺密教修习场地，殿内没有塑像，所供神灵都是画轴（唐卡），正堂（坐西向东）中间供奉着白哈五王画像，蒙语叫“塔本汗”，藏语叫“甲勒本·古文阿”。他的形象是一身白色，骑着一头血口大张的白狮子，右面三只手，一手执降魔杵，一手执宝剑，主臂拉弓弦；左面三只手，主臂执弓，另两臂拿法器；腰缠虎皮和一串人头，头戴西藏贵族大沿黄色帽，背影是火焰；画的四角上有四个骑马、骑象的神像，都戴西藏贵族帽，



背后都是火焰；正中上方画有宗喀巴佛像；整个画卷的衬底是蓝天白云，高山猛虎。据该寺喇嘛说：白哈五王可能是三国时的曹操，又说是战神白马王子达尔浮，不知是否属实。其实，从画面神像的装束分析，可以认定这是西藏的山神或叫保护神格萨尔汗。在藏文史诗中说：格萨尔汗把长有十九颗头颅的巨人西来廓勒部国王杀死；说他有三百六十位武士和三十三位先锋英雄。喇嘛教崇拜他为西藏地方的保护神和战神；说他能保佑军人和牧人的平安，使作战能得胜，狩猎能获利，人们能长寿；他能把敌人、盗匪、邪恶、猛兽驱向远方；他是住宅的栋梁和车辆的辕杆。传说格萨尔是金翅鸟的化身，是天子，他控制着一切腾格里天神；他居住在高耸入云的白色山崖之顶，栖身于雾中的仙宫。有书说，1614年藏文史诗译成蒙文后，蒙古人也开始崇拜格萨尔王，说他和财神及四种护世战神是兄弟姐妹，他即是财产、畜群的守护神，也是战神。

白哈五王侧供奉着白色腾格里战神，即藏达拉，王道德，他骑一匹白色宝马，身着金甲，披红斗篷，头戴成吉思汗金盔。战神两侧，各有四个装束不同的骑白马的武士；画的正中上方是蓝、绿度母像，背光是火焰。画的衬底是蓝天、绿地、高山、河流，上有日、月、雄鹰，下有猎犬。

战神就是腾格里战神、代苏德腾格里、或代沁腾格里，这都是守护神的意思。战神包括苏勒德腾格里神，达伊德苏勒德腾格里和格萨尔汗三种成吉思汗苏勒德战神。《元朝秘史》中说，成吉思汗的身体内有苏勒德，意思是有吉兆和尊严的特殊精神，这个苏勒德藏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上，每个王公都有这样一面苏勒德战旗，也是王公们的风马旗，它即是死者的守护神，又是后裔们的保护神。不管他叫什么名字，这都是信仰者精神上的依托。

战神画在军旗上，当他被喇嘛教吸收入万神殿后，也成了寺庙供奉的画像。卫喇特史诗说：喀尔喀部的硕垒乌巴什于公元1587年入侵卫喇特时，用战俘祭祀腾格里战神（军旗），祈祷词说：仁慈的腾格里战神，请享用吃喝吧！满洲实录说：1620年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把满族使节杀死祭旗。1804年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也是用战俘祭祀腾格里

战神。1911年外蒙古独立时,也用汉族战俘祭军旗。

延福寺所供的战神画像,即是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腾格里战神或苏勒德腾格里;所以,在解放前,每年正月十五日前都将它挂在旗杆上,进行隆重的祭祀活动。这个祭祀是在王府后面的山顶上举行,那里搭起宽大的帐篷,架起挂佛像的旗杆,上挂腾格里战神、白哈五王(即格萨尔王)、阿拉善神(即地方神或山神)及延福寺的前世活佛甘珠尔巴达木坚的画像,王爷亲临主祭,王公官员也参加,由喇嘛们诵经祈祷完备后,即庄帐篷里欢乐吃羊背子。这纯是为地方祈福的宗教活动仪式。

蒙古人崇拜山神和地母的时间,早于崇信佛教以前。成吉思汗崇拜儿哈勒敦山,每天都要跪拜,并说子子孙孙都不忘怀。以后有了各地不同的祭祀对象(名山),列出30座祭祀的名山,其中阿拉善山(贺兰山)被列入祭祀,这可能就是阿拉善神的来历吧!山神和地神(那契海、地母)的作用,据说都是为人们提供庇护、保佑、援助和守护。

吉祥天女殿供奉着该殿的主尊神像骡子天王,即吉祥天女,藏名叫“班达拉姆”,这是阿拉善旗第二代札萨克王阿宝请来的画像,至今已有270年的历史。传说她原来是古印度婆罗门教中掌管命运和财富的女神,喇嘛教尊他为救度佛母,她是密宗诸护法神之首,是众佛之母;说她能保护佛教,普度众生,给人以智能和幸福,是善良吉祥之神,也称她为“三界荣耀妃”,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呼毕勒罕(转世灵童)转生出世,都先在吉祥天女像前祈祷占卜后才确定,所以,也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的保护神,每年除夕要设供祭祀,向她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吉祥如意。

吉祥天女的形象,分平和式和威猛式两种,延福寺内两种像都有;平和像是蓝色面孔,三只眼,身着红袍,头戴藏式大檐帽,侧骑骡子,背影是火焰。威严形的女神像是,红发上指,表云道法高超;头戴五骷冠,表示生死无常;三只眼,龇牙咧嘴,獠牙外露,形象凶猛,表示道法高超;侧骑骡子,身披人皮,左手托嘎巴拉碗(用人头颅骨作的碗),右手执降魔杵,腰别曲角板,记录世间的善恶之事;项上挂着50颗人头项链,表示被他降服的罗刹(妖



魔),又说是代表五十个梵文字母,意为一切经法都齐全;脐间为太阳,表示神通广大,能飞天入地;身后的火焰,表示法力的威严。

吉祥天女殿内还供奉着密宗修炼密法的主尊神大威德金刚、上乐王佛、密集金刚三位神的画像,他们都是欢喜佛,喇嘛教各派都信奉。公元六七世纪,印度佛教衰亡时,逐渐密教化;到了唐代,天竺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先后来中国创立了密宗,号称开元三大士,在唐玄宗后的四位皇帝扶植下,有很大发展。由于密宗法师是单传,最后一位法师是日本僧人空海,他将密宗法带到日本,予以发扬,即现在的“东密”。公元八世纪,天竺僧人莲花生将密宗法传入西藏,并与西藏原始苯教的神祇、仪轨相结合,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密宗,故称“西密”,这是佛教界仅存的两个密宗。

在密宗寺庙里,供有各种形象的双身像(即欢喜佛)、佛母、明妃、金刚等。他们的形象有很多种,主要的有:大威德金刚,藏名叫“吉杰多吉”,牛首人身,三只眼,头戴五骷颅冠,双脚踏在公牛身上,呈右弓左蹬步状,右手上举降魔杵,左手下有一被降的魔,身上挂着被降伏的妖魔头颅,公牛腹下有一赤身躺着的女人,整个背影是火焰,画像左右下方,各有一尊小形不同形象的画像,均是大威德。据说:大威德神像,常见的有三头、六臂、牛首人身、单体或双体像;也有九头、三十四臂、十六足、拥抱明妃的双体像。经云:他有伏恶之势,谓大威;有护善之功,谓大德,是密宗修法的本尊神。

上乐王佛:藏名“德木巧多吉”,又称胜乐金刚,三只眼,四张脸,两层头(下层头上是三面脸),十六只臂,四只足,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裸体,表示清净无染。画像的四角,另有四尊乐王佛,有坐、有立、有单体、有双体不同姿势小画像。

上乐王佛是大日如来的法身,代表智能,佛母代表禅定;喇嘛教认为,“定慧兼备”才能成佛;双身结合是修密法(即通过“方便之门”、修习上瑜伽密)修炼成佛缺一不可的条件,他如鸟之双翅,车之双轮,否则即不合仪轨。

密集金刚:藏名称“桑堆”,三头六臂,双手拥抱明妃,呈坐式;亦有半坐式的单身像,双足四臂,手持法器,头戴五骷冠,身挂妖魔头,面目狰狞



可畏的画像。

6.大雄宝殿

延福寺的大雄宝殿坐落在三世佛殿北面，是全寺最宏伟的汉藏结合式古建筑；外观是三层楼阁，下半部分是藏式建筑，上有裙带装饰，中有挑檐式盲窗，分上下两层，很像两层楼，楼上是平顶。第三层是汉式重檐、挑角、歇山顶庙宇式建筑，琉璃瓦盖顶，山墙上有木雕装饰，角端有吉祥兽头；庙脊正中用琉璃瓦砌一宝塔，以莲花座分为三层，意在表示地狱、人界和天界。

大雄宝殿的门庭是藏式子顶，上有三件塑物，与二楼顶上的塑物相同，即：法铃上连法轮，法轮周边似佛光，两边各有一只鹿，相向而立。其意是：佛法如车轮，常转不停，佛光普照四方，佛音永传开息；两鹿是以佛祖在鹿野苑的故事为背景，意思是信徒一心向佛，静心聆听佛祖说法。

大雄宝殿有左中右三个门，门庭前壁上绘有四大天王像；大殿内，即大经堂，称朝格沁；大庭内有 36 根包毯红木柱，中间天井部分的四根柱子，直通三楼顶部，第二圈的十六根柱子直通二楼顶部；顶棚装有木板，上刻藏文六字真言符号；真言，即密宗的明咒：“唵嘛呢叭咪吽”，以此代表佛心部、宝部、金刚部、莲花部和业部，其译意是向佛敬礼，一心皈依。采光主要来自楼顶窗户，殿内设有六排僧人诵经坐床，有学位喇嘛座位前设有小桌，上有金刚、宝瓶等法器。殿内梁柱上挂着各种伞盖及卷轴画，画的内容是密教经典中的仪轨行为和所崇拜的神灵故事，这种绢画一般称唐卡或宝幢幡，这些都是近些年新填制的；因为延福寺在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遭受了严重的浩劫，寺内的法器、铜佛、僧袈、地毯等物，几乎被洗劫一空，寺庙变成了木器加工厂，文物被毁者甚多，一片狼藉，惨不忍睹；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才逐渐整修恢复到现在的规模。

殿内供桌自西向东，第一组佛龕内供着大威德等红、蓝颜色的三尊护法金刚塑像。佛经里说，金刚手是普贤菩萨的化身，藏名称“伊德木”。

第二组佛龕内供奉着宗喀巴师徒三尊，宗喀巴是喇嘛教格鲁派（即黄教）的创始人，青海省西宁附近宗喀地方人，生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年);7岁出家为僧,拜团柱仁青为师,受了沙弥戒;17岁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到西藏求法学经;29岁(1385年)在雅隆南甲寺拜楚臣仁青为师,受了比丘戒。

宗喀巴在36岁前,广学多闻,闭关长修,一切经论已通达。45岁时明惠帝三年(1401年)开始著作黄教经典《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

宗喀巴一生,在弟子甲槽杰和克珠杰的帮助下,创立了喇嘛教的格鲁派(即黄教);他于公元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圆寂,享年63岁。后人把他们师徒3人,当作黄教师祖而供奉在寺庙内。

大殿第三个佛龕内,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塑像,他端坐在莲花座上,头顶为朴实的塔式发髻佛祖左侧莲花座上端坐着大弟子摩柯迦叶,汉译“饮光”,他左腿内盘,右足外伸,呈吉祥坐势;他年高德重,为佛教三十三代祖师之第一世祖,称“头陀行第一”;佛死后,是他召集佛的众弟子,集结在一起,将佛祖生前所讲说的各种经论,汇集成经、律、论三藏文字经典,并接受了佛祖的正法眼委托,将佛教继续弘扬广大。

佛祖右侧站立着第二大弟子阿难陀,汉意“欢喜”、“庆喜”,是佛祖之叔斛饭王之子。他跟随释迦牟尼出家为僧,为佛祖侍从25年;他博闻强记,在大迦叶召集的集经会上,文字经典多是根据他背诵佛祖之教而形成的,被称为“多闻第一”。迦叶死后,将佛教的衣钵传递给阿难,他即成了佛教三十三祖的第二位世祖。

殿内第四个佛龕内,供奉着三大士菩萨。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简称,佛教说:凡是抱有宏大志愿,护持所有的人进入佛国,而后自己再成佛的人,既可成为菩萨。大士者,是对辅助释迦牟尼弘扬佛教、普度众生者的尊称,其意是慈善勇猛的意思。

据说,延福寺的三大士菩萨铜像,是阿拉善第三代驸马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从北京雍和宫请来的,这就不光是宗教问题,而且还有祖国统一,蒙满团结的政治意义。三大士都坐在莲花座上,居中的是观世音菩萨,亦称观



自在；经云，他能以三十三种不同形象出现；此处的观音有四只臂，主臂双手合十，表示尊敬佛祖，副臂手持莲花和法器，表示帮助世人救灾救难，大慈大悲。经云，观音的道场在普陀山，坐骑是朝天吼。

观音像之右是文殊师利菩萨，汉译为“妙吉祥”，是如来佛的左协持，盘腿坐在莲花座上，头戴宝冠，双手在胸前呈密法式，手上搭一条“哈达”。“妙吉祥”之意是表示智能，故称“大智”；他的道场在五台山，坐骑是青狮。

观音之左是普贤菩萨，汉译为“遍吉”，是如来佛的右协持，佛经说他的愿行广大，专司理，故称“大行”；他的道场在峨眉山，坐骑是白象。

第五个佛龕里供着三方佛，即主管中方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主管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主管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佛，亦称东方三圣之主尊佛。

延福寺大经堂内还有一个木质的方形三层阁楼，高近3米，宽约1米，下层是分阶座基，上层是塔式宝顶，中层为曼陀罗（坛城），平时供奉着药师佛的八个药葫芦，在念经时还要供“五供”、“七供”。这8个药葫芦，是代表药师本愿经中所说药师作菩萨时，曾发的解救众生病苦的十二项大誓愿中的主要誓愿。

第六个佛龕里供着长寿三尊；中间是无量光佛，双手捧宝瓶；东侧是白度母；西侧是租各得尔那木吉尔神，三只眼，六只臂。

中间的佛龕是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于1935年在延福寺举行大法会时坐过的佛榻（后来仿制的）。

1934年，九世班禅由内蒙古的百灵庙到南京参加达赖的追悼会，同时就任了国民政府委员职；国民政府派赵守金为护送班禅喇嘛回西藏的专使。1935年3月，班禅向蒋介石提出了回藏方案，开始由内蒙古出发返藏，1936年到达阿拉善旗，并在延福寺举行了大法会（班禅在内地还举行了十次较大规模的时论大法会）。

九世班禅返藏，英帝国主义操纵西藏噶厦（政府）提出种种难题，不准带汉蒙一官一兵入藏，致班禅滞留在青海玉树不能前进，终于1937年11



月4日圆寂,享年55岁。

延福寺内九世班禅的坐塌前,供奉着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亦烈伦珠确吉坚赞遗像。

在九世班禅宝座东侧的佛龕内,有两个宝瓶式喇嘛塔,据说是延福寺第四代甘珠尔巴格什的灵塔。佛教认为,塔是象征佛陀法体的小僧伽兰(小寺庙)。喇嘛教里的塔,有好多种解释,一般来说,宝瓶式塔由三部分组成:方形的基座,代表欲界;圆形塔身,上有佛龕,代表色界;圆锥形的塔顶,代表五色界。单独的塔,一般是为储藏佛经,储藏佛舍利祭祀等。舍利就是佛的遗尸,它分为三种:白舍利是指骨类,红舍利指肉体,黑舍利是指毛发类,全舍利即全尸,例如供奉在阿拉善广宗寺内的达赖灵塔就是全舍利。解放初,巴彦浩特镇市区尚有五个喇嘛塔,一个在城内西北山坡上,名叫大呀塔,是喇嘛进行密教修炼的地方,一个在鹿圈山东端,一个在营盘山北侧,两个在塔儿沟,据说这都是为纪念亡灵而建的。

喇嘛教的塔群也较常见,有四塔、五塔、八塔各为一组等形式;排列形式有一列式,或以东西南北中式排列。对五塔(含四塔)的解释有几种,一是说:五塔象征密宗的风、火、水、地、空五行,分别代表密宗世界四大部州,即东方胜神州,南方瞻部州,西方牛贺州,北方俱卢州。另一说法是:五色塔代表喇嘛教的五智如来(五方佛),即:黑色塔饰金刚杵,代表大圆镜智,示南方宝生如来;红色塔饰莲花,代表妙观察智,示西方阿弥陀佛;绿色塔饰宝剑,代表成所作智,示北方不空成就如来;白色塔饰法轮,代表法界体性智,示佛部大日如来。第三种说法是:五色塔代表西藏喇嘛教的五个派别,即黄色代表格鲁派,白色代表噶举派,红色代表宁玛派,绿色代表萨迦派,黑色代表笨波派。

八位一组的塔群,排列方式有八卦形的和一系列形的,如阿拉善左旗达尔肯庙的八座塔就是按一字排的。卷轴画(唐卡)上的塔,又是一种排列方式,如阿拉善盟黑城遗址中,被柯兹洛夫盗走的300多幅卷轴画中的“八大灵塔圈”的排列方式是:中间为释迦牟尼像,左右各有三座塔,上下方各有

一座塔,并在每塔边用汉文和西夏文标明佛祖功德成就的八个里程,即释迦如来生处塔,菩提树下成道塔,鹿园法轮福转塔,降伏外道祥名塔,佛从天下宝陞塔,耆阁崛山乘塔,庵罗林会维摩塔,拘尸那城涅槃塔。

7. 观音殿

观音殿在大雄宝殿西侧,坐西向东,是三间歇山顶出廊汉式庙宇,殿内西墙上有泥塑须弥山景,殿中间有两个红漆木柱,上有两条悬雕盘龙,形态生动,很像沈阳故宫演武场的两条龙。

观音殿中央供奉着两尊十一面观音菩萨,(菩萨,藏语称“贡布”),他坐在莲花座上,有五颗头,八只臂,手持不同法器,主臂双手合十,表示尊敬老师,五个头面颜色不同,由下到上分别为白色、绿色、红色;最下面的头表示法身,第二层头表示应身,状似爆笑,表示教化事业要有极大的威严和意志,才能无懈而成就。第五层头是观音之师阿弥陀佛,即无量光佛的化身,示一切成佛的方便。据说,该殿原来的一尊十一面观音塑像,在“文革”动乱中被毁,现供的两尊塑像,是从青海请来的。十一面观音五颗头像中的下三层,各有左中右三个面目,左面三张面目是喜悦相,右面三张目是怒目直视相,加起来即是十一个面孔,故称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观音的左侧是绿度母塑像,右侧是白度母塑像,据说都是藏王松赞干布赞普的两个妃子,即白度母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化身,绿度母是尼婆罗的尺尊公主化身。度母即佛母、多罗母、救度佛母,又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是喇嘛教的保护神。

一般观音像的左右两侧是观音的弟子善才和龙女,而这个殿里没有见到。该殿内两堵侧墙上的镜框内,还有磬磬佛约 700 多尊。

8. 阿拉善神殿

阿拉善神殿是近期重建的庙,坐落在大雄宝殿的东侧,过去的阿拉善神殿,曾于抗日战争时毁于火灾。殿内供奉着阿拉善神塑像,他是阿拉善旗的地方保护神,不仅宗教职业者崇拜,牧民群众也普遍信仰。

延福寺作为阿拉善王爷的家庙,其专声誉之大是远近闻名的,它不仅



自身建筑宏伟,而且在巴彦浩特市区还有十几个属庙,在牧区也有七个属庙,清嘉庆二年(1797年)延福寺的大弟子,罗卜藏多尔济王爷之子罗布藏丹必关布,将寺内禅僧院和60名喇嘛,带到贺兰山北端,新建起阿拉善地区名居第三位的大寺——福因寺。

9. 属庙

延福寺在市区的属庙,城内的有城隍庙、关帝庙、马王庙、孔庙、奶奶庙、南龙王庙、东龙王庙、雅儿庙、药王庙、鲁班庙、老君庙等。

对关帝的信仰,大约始于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关帝即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字云长,号关公),他被公认为是忠君报国、赤胆忠心的大英雄,明朝把他奉为神灵祭祀;到了清朝,被乾隆皇帝封为掌管蒙古地区及京师所有喇嘛教大权的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乳贝多吉活佛(1717年~1786年),在皇宫与高级喇嘛官吏们制定了《祭祀护法神关老爷的全部仪轨》及祭祀祈愿文,并以蒙、藏、满、汉几种文字散发,把关公宣布为“中国皇帝的大守护神”,把他与黄教中占重要位置的集密金刚、胜乐金刚、大威德金刚列在一齐。

嘉庆十二年(1807年)出版的蒙文占卜手册,把道教的占卜术移植到关公身上,信徒到关圣帝庙宇中占卜,祈求战神对来年吉凶兆给予预言。据史书说:由于朝廷由国库出资修建寺庙,到清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在满洲各地及蒙、藏、新疆、甘肃等地,就建起关帝庙约66座。此后,关帝即成了国家的守护神和战神,逐渐把关公、格萨尔王、腾格里战神的形象融合在一起。阿拉善的关帝庙修在城墙上,王爷每年要把他与阿拉善神一起祭祀,向他祈福,而且常在夏早之季,由农民在关公庙前跪香求雨,历时7天,并伴以唱大戏,也算是一项娱乐活动吧!

城隍庙坐落在延福寺西侧约200多米处,建在城内后山西端的山包上,坐北向南,因山建庙,气势轩昂。该庙前门台阶甚多,门前约50米处有一木质牌坊。东便门是城隍爷出府之门。此庙是汉式建筑,分前后院,后院有大殿、侧殿、偏殿等共7个,其规模次于延福寺,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

被造反派拆毁了,就连建庙的石碑也散落在民间。庙里的主神是城隍爷,每年正月十五日要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进庙烧香上供的男女信徒络绎不绝;这天,由兵丁抬着城隍爷出府郊游,信徒们都趴在地上排成长队,让城隍爷从自己身上走过,以求平安吉利。

据考证,城隍庙的建庙时间是雍正八年(1730年)农历七月,比建定远营城的石碑早1个月。建庙者是清朝派到阿拉善督理修建定远营城的钦差侍郎通智大理寺正卿史在甲。其依据是嘉庆丁丑年(1817年),阿拉善第五代亲王乾清门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札萨克加一级玛哈巴拉率其长子囊都布素隆(即第六代亲王)次子刺模素隆所刻立的一块碑文为证。其碑虽残,但文字基本尚明,大意是:侍郎通智奉旨筑城于贺兰(即定远营),维持社稷,感动神灵向其托梦修建土地祠,据此通智便在城内建庙,并书之石碣,以“灵昭万事”。其文曰:

“……先一夜梦有八九人送交一处,内有浅黄……,脸短红须者,自称判官……牢二童子二鬼使一即此处土神,乞皆……祠,问土地神何在?一人曰此是也……形年甚少,无须,戴一长翅乌沙着一雀……黄色无领,两手握带,自上而下立于中庭,对余言曰:吾辈唐人也,守此土数……今得立庙无城隍处,土地即与城隍职等。言毕,则向东西北三跃加官,袖内飞……钱金光,余乃悟,夫阴阳一理,此地建城设兵,福庇保护大有赖焉!爰如其相貌……而塑之,以示来者!长白通智雍正八年庚戌秋七月吉日立”。

位于东郊的雅尔庙(藏语)是藏式建筑,殿堂不多,主尊佛是释迦牟尼,该庙主要是为纪念佛祖灭度,每年四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一日在庙内设祭并诵经百日。

玉皇庙建在定远营(巴彦浩特)南郊,是三间汉式建筑,门前有两棵塔松,此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庙内的主尊神是释提桓因,道教称其为玉皇大帝,金色面貌,头戴帝王冠,手持护板。

从延福寺的属庙看,它不仅兼容了道教的老君庙和玉皇庙,同时也兼容了儒家的孔庙,佛、道、儒三教共容,即是中国式佛教和喇嘛教的一大特点。



10.敖包

敖包是蒙藏地区民众普遍尊崇朝拜的偶像，一般认为敖包是路标之意，这只是从客观作用效果上的理解。其实，在喇嘛教兴起以前，蒙藏游牧民族就有朝拜敖包的习俗。据说：敖包是山神、水神、地母、苏勒德战神等等一切保护神上挂着藏文六字真言等经符。近半个世纪已不再祭敖包，敖包只剩一堆石头遗迹，当日的威仪景象已荡然无存。

今年在那达幕大会时，由政府出资，在巴彦浩特那达幕会场修建了约10米高的敖包，据称，它的规模比阿拉善建旗初的额肯衙门（旧衙门遗址）的敖包还要大，谕为阿拉善旅游的又一景点。

11、佛事活动及法会

延福寺的佛事活动及法会，主要的有以下项目（均按农历日期）：

正月：

初一日：全寺喇嘛诵《吉祥天女经》，给甘珠尔巴格什拜年，名叫“图规”，呈献哈达、供礼，并在庙上喝年茶。

初二日：念《白哈五王经》，举行“古勒腾木”招神仪式。

初三日：念《阿拉善神经》，招祭阿拉善神“古勒腾木”。

初七日——十五日：赞颂三十二位佛祖，并诵念各佛祖的赞经。

十五日：招迎曼德勒佛（弥勒佛），全寺喇嘛都参加，仪仗队举着“好日老”（法轮）、“乃尔布”（宝盖）、“自母”（娘娘）、“仑布”（皇帝）、“朗吾”（大象）、“大目其各”（马）、“玛布昏”（将军）以及乐队等，由寺院出发，经活佛的“拉卜楞”门前、城隍庙前、再上后山，经娘娘庙和王府门前返寺，然后举行“查玛局尼”（小形跳鬼），扮相有十二个（内有五个回民扮相）。晚上举行狮子、龙灯、旱船、烟火（铁水花）活动，僧俗共庆元宵节。

十九日：举行大形查玛庙会，扮相有三十二个，计有：“贡布”（观音）五个，“却尔吉”（地藏）九个，“塔母或拉母”（吉祥天女）七个，“博古”（鹿王）、“沙尔格”（鹰）等，并到城门前的转经楼送“巴令”，焚烧彩供面塑。

二月：

初一——初三日：举行“古尔特木”招神仪式。初一：祭“塔姆”（吉祥天女），初二：祭白哈五王（塔本汗），初三：祭阿拉善神。全寺喇嘛和王府的代表都参加，期间要占卜本年祸福吉祥和年景好坏的预兆。

三月：

初一——初四日：在啊哞（阿格巴，密宗扎仓）念《桑兑经》。

初七——十七日：在东科尔扎仓（天文、星象学）念《东科尔经》；用酥油藏粍彩粉捏塑“巴楞岑”三道坛城，并跳“萨其格查玛”舞，扮相有五个。

四月：

初一——初八日：在观音殿念《塔尔巴钦布经》，纪念释迦牟尼。

初一——初五日，在迈巴殿内诵经：上午念《敖特切经》（药王经）；下午念《贡布经》（观音经）。同期，在罗汉殿念《吾素塔克勒经》，并献千盞水供和素食，名为“拉玛巧特巴他克勒，曹格乔得”。

初一——十七日：诵《能乃经》（即观音经），并食素，意在纪念佛祖释迦牟尼。

初七——十六日：念《玛尼经》（南无阿弥陀佛，嗡嘛呢叭咪吽），天数不等，按施主要求定。

五月：

初一——初五日：诵一百零八部《甘珠尔经》（由几十个喇嘛分头念）。

六月：

初一——初四日：在朝格沁（大雄宝殿）举行“宗乃约尔勒”法会，诵《桑兑经》（集密）、《德木其格经》（胜乐）、《萨其斯木经》（大威德），赞颂佛祖生程。亦称“依德木”（金刚）或“冒勒木”法会。期间，亮晒迈德拉佛，举行大形“查玛”舞会，扮相中有五个回民。

初八——初十日：阿华殿（阿格巴，密宗）诵三天《德木其格经》。

十三日：祭营盘山敖包，念白马王子等八部佛经（达勒巴）、《阿拉善经》和《将阿勒擦布森》经。



十四日——八月初一日：在雅尔庙纪念释迦牟尼，诵《拉牟巧特布经》和《敖特其经》（药王经）。

七月：

初七日——初十日：诵《本科尔经》。

十三日——十五日：满巴扎仓诵《古尼格经》；十五日，城隍爷出巡，由兵丁抬着城隍塑像到城外巡游一圈，僧俗共庆，热闹非凡。

八月：

初一日这天是雅尔庙纪念释迦牟尼诵经法会的闭幕式，僧俗共庆，并举行赛马、射箭、摔跤等那达慕活动。

九月：

十五日：“曹恭兑（卓干代，寺庙行政组织）例会。推选新格斯贵（达僧官）、格依给（二僧官）、恰布里（乐手）等候选人，并报王爷审定。

十五日：黎明前开始跳“萨格尔查玛”舞，扮相有十三个鬼神；同时开始摆制“依德木曼荼罗”（坛城），供“道尔木巴灵”（小面人，十八日前完成）。从当日下午开始诵五天经，内有《鸦门达尔格经》（大威德伊得木）、《却尔吉勒经》（地藏经）等。

二十二日：宣布王爷审定的卓干代会议新任人名，亚跳小形“查玛具尼”舞蹈，有十二天女扮相，以示庆贺。

二十四日：法会结束，拆除曼荼罗，并把用酥油糌粑作的巴灵等彩塑，送到城门外的转经楼前，烧掉一半，另一半送到东龙王庙。

十月：

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朝格沁都格（大经堂）法会，在“高勒家”（中间座）诵《桑兑经》；在“宗家”（东座）念《古尼尔格经》，为三十二个佛祖及亡灵祈祷；在“巴伦家”（西座）诵《阎曼德迦经》。

二十五日：举行“祖拉呼尔勒”庆典活动，纪念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

十二月：

二十三日：开始进行“举德尔”活动的准备工作，计用八十斤酥油、奶

酪、白糖、冰糖、糍粑等,在每个佛前供献,并作彩粉酥油花。

二十六日——二十九日:进入“杂子尔”(塔尔寺的名称)法会议程,称“胡亲呼尔勒”,即辞旧岁之意,诵经三天,内容是念:《贡布经》(观音经)、《却吉经》(地藏经)、《萨姆经》(吉祥天女经)、《达德玛居尼经》(十二仙女)、《那木斯尔经》(财神经)以及《巴伦佛经》和《甲木斯楞佛经》等。最后,将面做的三个“臊尔勒”等,送到城门外的转经楼前焚烧,意在驱走一切邪秽。

三十日:清晨开始念《采岭格经》(阿清,骡子天王经),进行迎新春法会,整夜吹奏乐器,主要是吹“咆尔”(大号)、“嘎尔甲木”(锁呐)、“嘎令宁萨”(铜管号)等。

除上述活动外,还有一些固定活动:每月初二日,诵经祭祀白哈五王。每月二十九日,诵经祭祀吉祥天女等八尊佛(内容同腊月底的活动)。每年正月初八日至十五日,择吉日在城内后山上祭祀“图格”(战旗和战神),并有娱乐活动。每年春季由王府择吉日,祭祀三个敖包(城北的东敖包、城内的五爷敖包、城南郊的将军敖包)。每年的四月八日是娘娘庙会,僧俗共庆。每年五月十三日,王府官员祭祀关公。



广宗寺概述

贾拉森

一、历史沿革

广宗寺藏语名“葛丹旦吉林”意为“兜率广宗洲”，俗称“南寺”，是阿拉善历史上的第一大寺，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贺兰山西北侧，有一群山环抱的宽阔地带，地势高低错落，属今巴伦别立镇管辖。

广宗寺建在贺兰山山谷里的一个很宽阔的地方赛音希日格，过去，中间是“朝克沁多根”、“参尼特多根”、“黄楼寺”，即供奉六世达赖真身之处，庙用黄琉璃瓦建成而得此故名。葛根、诺颜、喇嘛坦三拉卜楞（俗称葛根等三府），周围是“阿格巴”、“栋科尔”、“满巴”、“赞康”，（俗称红庙，因庙墙红色而得名）、“迈德里”、“金刚亥母殿”、“三族佛殿”各庙及“阿拉善山神鄂博”，庙与庙间配以吉萨、僧房，高低参差。加以山地树木成荫，溪流如带，风景十分优美，当地人以名胜视之。

广宗南寺建造年代之早，寺院建筑规模之大，僧侣人数之众，在蒙区和藏区佛教界的影响之大，博得信教群众的向往和虔诚之深，所供奉的神灵（六世达赖肉身）名气之大，学经制度之完善，法事、法会习俗之隆重在阿拉善是首屈一指的。

广宗南寺所处的地带为十六罗汉被迎请至汉地时做过夏安居之地而被记载于有关经书中。五世达赖的《十六罗汉礼供》，六世达赖的《阿拉善神

祈供》以及章嘉国师若必多杰为南寺所写的寺规《三学昌盛之日光》(现藏广宗南寺)中都记载着十六罗汉在此地做夏安居和达磨达赖为十六罗汉做布施的情景。广宗寺第二代葛根(活佛)图布丹嘉木苏在他《瞻仰山熏香祭》的前言中更是具体地写到“早在有法术的和尚将十六罗汉尊者迎请至汉地时,在贺兰山做过夏安居和在此地由居士达摩做施主的历史载于五世达格宝所作的罗汉礼供圆满中。班禅一切知曾亲口作预言,那时罗汉作夏安居之地是现在的噶丹旦吉林的所在地,并明示达摩居士也是诞生于此寺沟内。据老人们说在特布克山(广宗寺附近一座小山名)顶罗汉足迹,果然至今清晰可见”。据《六世班禅传》(现藏广宗寺)中记载,图布丹嘉木苏(即温都尔葛根)于嘉庆元年(1769年)谒见过班禅巴丹益希,并受过经文传承(《六世班禅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汉文版,第238页)。上述引用的话,很可能是两人交谈时班禅所讲。这是广宗南寺作为圣地而名扬佛教界的一个原因。

再者,广宗南寺是六世达赖的寺院,寺中供奉着六世达赖灵塔是远近信教群众虔诚地向往它的最重要的原因。

达赖喇嘛是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时的最高统治者。六世达赖喇嘛罗桑仁钦·仓央嘉措被拉藏汗废黜,另立达赖,藏人不承认,局势更加混乱。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仓央嘉措被送往北京,次年走至青海湖时逃走,押送人员谎报仓央嘉措在途中病逝。朝廷顺势批准拉藏汗所立之达赖坐床,一场公案,乃告结束。但只身遁去的仓央嘉措却化名为阿旺曲扎嘉措,游历印度、西藏、四川、安多、蒙古诸地十年后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初次来到了阿拉善,成为被当地人信奉的上师,并同阿拉善第二代札萨克阿宝王建立了供施关系。据说他为寻觅寺院、弘扬佛法的宝地而各处游走,最后于康熙五十六年(1719年)找到了现在的广宗南寺所在地赛音希日格。传说中说他首次走进这个沟口遇见了两个人,问其名,一曰沙格达尔,一曰达木丁,是藏语金刚手和马首金刚两个菩萨的名字,心想是两个菩萨变成人的模样来迎接我了。现在的广宗寺入口处两侧石壁上雕刻着数十尊佛像,刘家驹



曾赞它“危岩夷石面上镌有各种像,五彩斑斓,巧夺天工”即指此处。其最外侧两尊佛像就是根据当年六世达赖遇见的两个人的名字雕刻的金刚手和马首金刚两个佛像。六世达赖通过狭长的入口,来到赛音希日格。此地原有供奉无量寿佛和弥勒佛的一个小庙外居住叫巴雅吉呼(富裕)、阿日毕吉呼(昌盛)的两家牧民。仓央嘉措来到他们家时,一家把锅里沸腾的热奶献给了他,另一家则把刚缝制出来的坐垫铺在家中,请他坐。种种吉兆使他非常满意。再观其四周,只见周围群山呈现吉祥八徽,地如八瓣莲花,天似八辐金轮,犹如走进自己长年修习的本尊胜乐金坛城一般。心想如此瑞兆圆满之所再也难以找到,就选定此处作为他建造寺院、宏法利生的基地和自己的归宿点。此后近30年间他奔波于阿拉善和安多之间,致力于佛教事业,但终究未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在此地建造寺院之宏愿。

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初来阿拉善后从一开始就认定做自己心传弟子而收为徒弟的阿旺多尔济尚在年幼,成年后又把他派去西藏深造。因此想委以建寺重任的人还未成长。再者,他本人在此期间担任安多13座寺院的堪布,还忙于重修甘肃天祝的石门寺。阿旺多尔济从西藏回来后仓央嘉措又派他去建造青海省乐都县境内的马营寺。这是仓央嘉措对阿旺多尔济的一次考验。仓央嘉措把建南寺的遗嘱留给阿旺多尔济后,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圆寂。同年阿旺多尔济遵其师父嘱托再次入藏做善事,并受了七世达赖授予的“阿日路克桑额尔德尼诺门汗”的封号和布达拉宫顶朗杰札仓的堪布称号(《七世达赖喇嘛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汉文版,第334页)。回来后选认了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并做了10年的准备后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开始破土动工,把原来的弥勒庙扩建成9间,在阿日毕吉呼家的地基上修建了49间大经堂,在巴雅吉呼家的旧址上修建了庙仓。第二年从现在的超格图库热地方把潘代加木措林寺全盘搬来这个新的寺址,并把六世达赖的灵塔也请到这里,专门修建一座大殿供奉,同时,把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11岁的罗桑图布丹嘉木苏请来新的经堂里坐床,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从此,在蒙区和藏区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博得信教

群众的向往和虔诚供奉之地。这就是南寺的由来和创建的经过。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廷为该寺赐名“广宗寺”,授给镌有藏满蒙汉四种文字寺名的乾隆御笔金匾。此匾的落款为“大清乾隆岁次八月十六日”从此南寺有了这个正式名称。此后章嘉国师若必多杰应阿旺多尔济的请求为南寺制定了寺规。该寺规的前言中说“按我等导师铁猴年诞生的说法推算,导师将色身收入法界后 2636 年,第十三胜生叫做自在的火牛年(1757年),新建了潘代加木措林寺,即文殊大皇帝赐名为广宗寺的大聚僧寺院”。

广宗寺拥有藏区大寺院必须俱全的四大札仓,即学习和修持不同佛经内容的四个学院式僧院。它们是法相僧院(藏语称参尼扎仓),密宗僧院,也称续部僧院(阿格巴札仓或叫居德巴札仓),时轮僧院(栋科尔札仓),医药僧院(满巴札仓)。它们分别学习佛教哲学和逻辑等显宗教义、密宗教义、天文历算和医药学,并举行相关法会。南寺的四个札仓各自有自己的名称,分别是“妙音善说洲”,“两次第伏藏洲”,“不变大乐洲”,“无死持明洲”。

广宗寺在发展和扩大过程中得到过旗札萨克强有力的支持和广大施主群众的大量资助,他们为广宗寺捐献的资财和能工巧匠所付出的劳动是无法估量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南寺的庙宇僧舍只有 197 间,而经过 100 余年同到同治八年(1869年)时候已达 2859 间,据说僧侣人数也增加到了 1500 名。从下面一些具体事例中可以看出旗府和施主对广宗南寺的支持。

道光八年(1828年)阿拉善第五代札萨克玛哈巴拉一次拿出 1 万两白银,为广宗南寺修建 81 间的大经堂和 49 间的密宗僧院大殿,并在密宗殿中修造 1000 尊贤劫千佛镀金铜象。同治二年(1863年)乔尔吉·楚勒图木献出 310 峰骆驼、200 多只羊、5000 贯铜线、4 间房子,设立了尼仓房。同治四年(1865年)旗衙门文书巴雅斯古楞等人献出 100 只羊和 1 峰骆驼,设立了普格仓。同治五年(1866年)旗衙门发公函,将巴丹吉林巴嘎的卓洛固图盐湖和雅布赖盐湖的三年税收收入全部拨给南寺,支持该寺的法事、法会活动。民国 2 年(1913年)修缮、扩建六世达赖灵塔祀殿的时候,旗衙门派人来



用 11 斤(旧制)黄金,做成了镏金的屋脊。后来,阿拉善末代札萨克达理札雅,也为六世达赖灵塔殿的修缮捐献过 2 峰骆驼,200 元大洋。

广宗寺在同治八年(1869 年)回回叛乱时曾遭受过一次重大损失,叛军放火焚烧了除时轮大殿和金刚亥母殿以外几乎所有的庙宇,抢去了大批财物。在此事件中,商卓特·图斯都布、道尼尔·巴拉丹勒格都布等人带领部分喇嘛,冲进火海,把六世达赖肉身,金刚亥母象,《甘珠尔经》等抢救出来,搬到山崖险处隐藏起来,之后,由于殿堂被烧,把达赖肉身等送至衙门医药殿暂时供奉。

这次事件之后,从光绪年间开始逐步修复和重建了寺院的殿堂、庙仓,恢复了各种法会活动。但衙门有人主张把全旗最神圣的灵物六世达赖遗体应在延福寺内造塔供奉,不让再送往南寺。此时已还俗娶妻的南寺第五代葛根(三爷葛根)、阿拉善第七代札萨克贡桑珠尔默特之三子嘉拉参旺吉勒据理力争,强令六世达赖遗体迁去南寺供奉。

此后在该寺第五代迭斯尔德呼图克图(俗称喇嘛坦)桑吉嘉木苏的亲自主持下,建造了 81 间带有阁楼的大经堂,请甘珠尔上师开了光,接着各僧院大殿和大小庙宇相继落成。民国 2 年(1913 年)桑吉嘉木苏喇嘛坦修缮并扩建了六世达赖灵塔祀殿。72 间带有阁楼的这个大殿具有镏金的正脊和四条垂脊,有黄琉璃瓦的屋顶,周围墙基用绿色琉璃砖砌成。大殿前墙外侧镶有用黄色琉璃材料烧制的佛本生故事浮雕。殿内隔扇上有雕刻的唐僧取经故事。雕梁画栋,刻雕精细,四周飞檐下几十处画有《山海经》中的形天、帝江等神的形象和珍禽怪兽。环绕大殿的转经长廊内设有 100 多个筒式转经轮,内装一亿嘛呢经及《回向王经》,供朝圣者转动。整个大殿显得威严壮观,金碧辉煌,曾经可为蒙区寺院建筑中盛极一时的庙宇。南寺大经堂规模宏大,有 64 根金龙盘绕图案的柱子,全堂的雕梁两侧书有铂金梵文书有《佛说正论圣文殊师利梵名经》全文。

广宗南寺在“文化大革命”前,有六世达赖灵塔殿——黄楼庙、弥勒殿、金刚亥母殿、三族佛殿等佛殿四座;大经堂,小经堂(法相僧院)、密宗僧院、



时轮僧院、医药僧院等聚会诵经的经堂五处；另外还有持斋庙，上护法殿，下护法殿（赞康）、法轮殿、吉祥斋等大小殿堂数座；活佛公馆两处；大小庙仓等公共场所多处；僧院、僧舍上百处。

各处殿堂中佛像、佛经不计其数，在此择其最主要的略作介绍如下。六世达赖灵塔是1丈多高的镀金铜塔，塔门镶嵌着各种宝石，塔顶上曾放有3寸高的赤金无量寿佛像。大经堂正中为镀金铜制的释迦牟尼像和泥塑的宗喀巴师徒三众塑像。两侧为十六罗汉和四大天王像，堪称佛教艺术的珍品。小经堂正中是文殊师利巨像，两侧是大于普通人身量的印度八大佛学家六严二胜的塑像，栩栩如生。小型佛像有在弥勒殿和葛根的公馆两处，有1000尊1尺高的宗喀巴泥像。密宗殿中有1000尊1尺高的贤劫千佛铜像。夏季举行法相僧院例行法会的“法园”内有1000尊1尺高的救度八难绿度母泥像。医药殿中有1000尊1尺高的白度母泥像。各殿堂公馆都供奉和藏有绘制极其精美的佛像“唐卡”，不计其数。最主要的有释迦牟尼的《三十四本生传》2套上百轴，《神变十五》1套15轴，反映宗喀巴本生和传记的《八十宗喀》3套上百轴，《仓央嘉措秘传》1套十几轴。还有两轴用彩色锦缎制而成的宗喀巴和弥勒的宽4丈、高6丈的巨大的佛像、分别在农历五月和七月展示。南寺经卷藏书也非常丰富。曾藏有北京版108卷的藏文《甘珠尔经》一部、藏文《丹珠尔经》两部，西藏版100卷的新版《甘珠尔经》一部。另外宗喀巴师徒三众的全集几套上百帙、五部大论及其注疏，名活佛、名高僧的著作无所不有。南寺有两处版库，所藏的经卷刻版和佛像刻版数量也相当可观。解放时注册僧人550名。

广宗南寺周围的瞻卯山、额尔德尼召和距寺较远的道布吉林（北比寺附近）三座小庙是由南寺管理的。另有子庙或属寺有昭化寺（超格图库热）、承庆寺（门吉林）、妙华寺（图克木）、沙尔子庙、查干高勒高庙，以及甘肃天祝的石门寺（嘉格隆）等。它们的堪布（法台）有的由南寺喇嘛担任，有的由本寺提名后由南寺任命。大喇嘛，格斯贵等主要僧职均由本寺提名后由南寺批准任命。



二、寺主呼图克图

广宗寺有葛根、喇嘛坦两位转世活佛,是该寺的寺主,他们对寺院的一切宗教活动和其他事务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由于活佛地位崇高,而且法事活动繁忙,有时腾出好多时间来坐关念经,有时致力于佛学理论的研究或忙于著书立说,因此他们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他们一般是通过曹贡堆会议对寺院事物进行管理的。曹贡堆会议由大喇嘛、德木其(二)喇嘛,格斯贵(三)喇嘛以及三个商卓特等组成,有时扩大到格斯贵,卸任喇嘛等参加,卓干代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僧职人员的任免,财物管理和其他事情。

这里所说的僧职有大喇嘛等三个喇嘛,各庙仓的商卓特、第巴,各僧院的大小堪布,格斯贵,葛根侍从人员,各经堂和庙殿的高尼尔等几十个职别。其中三个喇嘛和大格斯贵的任命是必须获得旗衙门的批准的。被任命为任何僧职的人员接到曹贡堆会议通知后到葛根处领受护身结(藏嘎)才算最后生效。

葛根还可以通过格斯贵对法会活动和学经制度进行督促和管理。格斯贵是管理法会纪律和监督僧侣们遵守寺规及戒律的僧职,任期1年。自从五世达赖制定寺规——“加伊格”以来,格斯贵作为执法人,形式上很有权威。无论什么人,包括大喇嘛,在寺院转经路以内遇见他时应回避,如果没有披上袈裟,还应躲藏。所有僧人,包括活佛离寺外出时都要向格斯贵请假。这样做是对寺院纪律的尊重。

曹贡堆会议从腊月十八到正月十八大祈愿法会期间,在相传为青海固始汗之宫帐的叫“达赖查干”的具有4根柱子、12个哈那的巨型蒙古包里议事,十月的五供祈愿法会期间在普格仓议事,其他时间一般在葛根仓议事。活佛不参加卓干代会议,只是在自宅里召见大喇嘛或格斯贵,听取汇报,做出指示。

广宗寺的两个活佛分别是从小选定建寺地址的六世达赖喇嘛和亲自建寺的第巴·桑结嘉措的化身阿旺多尔济开始以活佛转世的形式传下来的。

第一代葛根是六世达赖罗桑仁钦仓央嘉措，(译言善慧宝梵音海)曾用化名阿旺曲札嘉措(语自在法称海)。他的传记有国内外研究家们非常注目的阿旺多尔济用藏文写作的《妙音天界琵琶音》。有南寺(广宗寺)和西藏两种版本，内容相同。民族出版社已出版藏文全文和庄晶的汉文摘译本。因此关于六世达赖的生平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六世达赖的卒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即 25 岁时在青海病逝和 64 岁时在阿拉善圆寂。松巴堪布·依希班觉，《蒙古政教史》的作者达木却嘉木苏，汉族高法尊大师，以及现代著名学者才旦夏茸教授，却太尔教授，多识教授等历代学者都支持后一种说法。在阿拉善流传的很多有关仓央嘉措的传说，南寺曾藏有的他的一些遗物，以及阿拉善人把他当作全旗的福田供奉 200 多年的事实，也可以看作是支持后一种说法的一个证据。

仓央嘉措曾留下很多优美的诗歌，是藏族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后期的作品有《大悲观音祈愿词》《阿拉善神祈供》，为连城大寺写的《白莲妙树寺志》等。前两个著作有南寺木刻印本，后一作品已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他生活的年代是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初一(1683 年 3 月 28 日)至乾隆十一年五月初八(1746 年 6 月 26 日)。但广宗南寺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他灵塔前举行大法会供轮仪式，庆祝六世达赖诞辰的。

第二代葛根是罗桑图布丹嘉木苏，俗称温都尔葛根。他生于乾隆十二年四月初八(1747 年 5 月 16 日)，是本旗镇国公贡楚克和夫人布拜之子。由阿旺多尔济确认为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并亲任经师。5 岁时迎请至原潘代加木措林寺坐床。潘代加木措林寺 1757 年迁到新的寺址广宗南寺后又把他请到广宗南寺坐床。他曾入藏学经，受密宗传承，受到班禅额尔德尼授予的“伊拉古克桑班迪达贡卓诺门汗”的封号。也曾进京参加洞礼年班，授封为“大格布呼图克图”。

他绘制佛像的艺术水平是很高的，广宗寺及其于庙曾供奉过他亲手绘制的七轴护法女神拉姆唐卡。在瞻卯山人工凿出的金刚菩萨洞内曾有过他亲手绘制的多种神佛形象的大型画。还创作大量的宗教音乐，据说他也曾



对阿拉善民歌谱曲多首。他的著作有根据阿旺多尔济的《秘传》改为偈颂体的《传记祈祷颂》《哦字格言》及其他零散著作。南寺版库曾保存过他的佛像刻版。他于嘉庆十二年二月十七日(1807年3月25日)61岁时圆寂,后人修造成人身量大小的镀金铜像,内藏他的灵骨,在大经堂阁楼上供奉。

第三代葛根是却达尔嘉木苏,嘉庆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08年10月16日)生于青海曲藏地区。他是嘉木央敦珠和卓玛的三子,从班禅额尔德尼受戒,6岁时迎请至广宗南寺坐床,13岁和18岁时两次进京参加年班。道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1828年8月8日)前往安多途中圆寂,舍利在甘肃天祝的石门寺造塔供奉。

第四代葛根是伊希楚勒图木达尔吉嘉木苏。道光九年六月初六(1829年7月6日)出生于阿拉善旗额尔客哈什格巴嘎,叫策策格图淖尔的地方一个牧民家里。父名巴达荣贵,母名木合来。经雍和宫金瓶掣签确认后道光十四年(1834年)受戒并坐床。13岁时进藏学经,于道光五十五年十一月初六(1850年11月9日)圆寂,是年21岁,舍利在图克木庙供奉。据说他主寺时期是广宗寺的鼎盛期。

第五代葛根是贡萨勒永恰布,因他是王爷贡桑珠尔默特之三子,所以一般称为“三爷葛根”,俗名嘉拉参旺吉勒。生于咸丰元年十月初四(1851年11月4日)。16岁时迎清至广宗南寺坐床。光绪二十七年(1889年)39岁时经旗衙门批准,弃戒还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49岁时病逝。在他主寺时期以他的名义制定的天祝石门寺的寺规仍保存在该寺。他的遗体安葬在离今巴彦浩特周家田以南不远,银巴公路东侧某处。他还俗后曾从拉卜楞寺请来一小喇嘛替代第五代葛根,名吉格米德嘎拉僧嘉木苏,少年病逝。

等到三爷葛根病逝后按宗教习俗寻访认定的第六代葛根是阿旺丹增田来嘉木苏。他于光绪二十七年腊月三十(1901年2月18日)出生在阿拉善旗通胡巴嘎的查拉嘎尔河畔,父名毛道尔格,母名乌达巴拉。7岁坐床,曾赴藏学经。朝佛印度后经加尔各答、上海、北京等地回到旗里。他思想激进,不满旗政,因而同旧政府发生矛盾,也有过一些当时的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举动。在形势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拜访师父老喇嘛坦,向他秘密辞行后,以去巴音森布尔祀祭敖包为名带两人出走,一生再没有回来。1987年阿拉善盟政协文史委罗福喜、朝格图两位同志根据有关线索前往镶黄旗等地调查核实,证实他于1957年秋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病逝。并带回葛根亲自制作的佛事木范一件、葛根用过的经卷两部等遗物,交给罗步云让其转交广宗寺。阿旺丹增嘉木苏是广宗寺末代葛根。

广宗寺葛根是阿拉善最大的葛根,其各代转世大都受达赖、班禅授予的“伊拉古克桑班迪达贡卓诺们汗”和朝廷授予的“达格布呼图克图”封号。还有一个尊号叫“嘉勒色来”葛根。达格布呼图克图名称的由来是六世赖在游历各地时,曾在达格布寺(塔布寺)住较长时间,后来他以达格布夏仲著称,其各代转世的封号就来自这个称呼。蔡志纯、黄颢编著的《活佛转世》一书中称“达克布呼图克图”为“阿拉善旗广法寺”的葛根。大家知道在阿拉善根本就没有叫“广法寺”的寺院。蔡、黄说法显然是以讹传讹地抄自妙舟法师的《蒙藏佛教史》。

广宗寺另一位寺主活佛迭斯尔德呼图克图,一般被称做“喇嘛坦”。他的第一代就是六世达赖确认为第巴·桑结嘉措的转世灵童的阿旺多尔济。第巴是五世达赖的宠臣,选立六世达赖的主持人,也是扩建布达拉宫的组织者。他精通各科学问,著述宏富。后来他在同拉藏汗的争斗中败给了对方而被执杀,他所立之达赖仓央嘉措遂被废黜。据说隐姓埋名出走的仓央嘉措来到阿拉善时第一个就在第巴转生的家里做客,并听见那家婴儿的啼哭声就认出了第巴的声音,就决定以阿拉善作为自己的归宿点。

阿旺多尔济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生于阿拉善旗厢根达赖巴嘎的匝布苏尔乌素,父名班咱尔加布,母名那木宗。从小跟随仓央嘉措出家为僧,曾赴西藏学经数年。关于他的生平,没有找到详细记载,但从《七世达赖传》《六世班禅传》《章嘉若必多杰传》《安多政教史》等史料中偶尔发现他活动的记载。建立广宗寺、安置保存六世达赖遗体,选认六世达赖化身广宗寺葛根图布丹嘉木苏等是他的主要事迹。晚年他因寺院利益与阿拉善第三代



札萨克罗卜藏多尔济发生矛盾,王爷听信阿在念咒经的传言,将他囚禁。他虽有人照料饮食,但终因年事已高,不堪忍饥受寒而在牢狱中打坐圆寂,是年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关于他的事迹,见1994年第一期《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贾拉森文。

他是精通显密教法的佛教人德,在藏区以拉尊班迪达著称。他是在阿拉善出生的第一个转世活佛,也是用藏文发表著述的第一个阿拉善蒙古高僧。温都尔葛根和第一代多布藏呼图克图的前身都向他受过经文传承。他的著作有六世达赖传《妙音天界琵琶音》。土观却吉尼玛曾说他有多种作品,但因王爷查禁他的著述而大都失散。广宗寺曾供奉过他的银制灵塔,其内是否藏有他的舍利,无人知晓,也许是象征性的依托物而已吧。他还有个作品是叫《轮回》的蒙语歌曲,内容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说教,流传至今。

他另有一个名字叫“伦珠达尔吉”。因他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受过七世达赖喇嘛授予的“阿日路克桑额尔德尼诺们汗”封号,所以也被称作“达尔吉诺们汗”。他圆寂后,王爷曾下令不许寻找其转世灵童,但后来还是寻访到了他的转世。这个第二代喇嘛坦诞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是安多藏人,据说是土观活佛外甥,名伦布达尔吉,未能迎请至广宗南寺坐床,9岁夭折。

第三代喇嘛坦是丹增忠乃达尔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生于阿拉善巴伦别立巴嘎。他是本旗镇国公道尔吉萨布旦之第七子,也是温都尔葛根的侄儿。他还有一个称呼叫温都尔喇嘛坦。他在南寺设立了参尼札仓,即法相僧院,这样奠定了南寺学经制度的基础。他有一些用藏文写作的零散经文流传至今。约在咸丰七年(1856年)圆寂。

第四代喇嘛坦,是阿旺丹巴达尔吉嘉木苏,咸丰八年(1857年)生于阿拉善旗厢根达来巴嘎,为协理台吉那仁达来之子。迎请至广宗南寺坐床后不久圆寂。

第五代喇嘛坦是敖木察尔山潘普勒忠桑吉嘉木苏(译言神奇利他殊胜

佛海),别名仓色来夏特比多尔吉,拉尊那木吉勒道尔吉等。他于1871年(同治十年十月十八日)生于本旗巴伦别立巴嘎图力更,是镇国公阿尤尔扎那的次子。经八世班禅确认为迭斯尔德诺门汗的转世后迎请至广宗寺坐床。29岁时入藏学习,精通藏语藏文和显密教法,成了阿拉善近代史上的大佛学家。他同藏区名活佛来往密切,尤其同第十三世达赖关系甚密,往来信件有一捆曾存广宗寺。其中宣统二年(1907年)达赖给喇嘛坦的复信内容载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上。他还征得达赖同意后将十三世达赖所作的《宗喀巴千供仪规》一书收入自己文集第一帙——噶帙中,书后记载着这样做的原因经过。他请达赖重新制定过广宗寺寺规,达赖、班禅都授予他“阿日路克桑班迪达额尔德尼诺门汗”封号的法诏,达赖还给他授予过布达拉宫顶朗杰札仓的全则德学位,赠给他堪布服饰和其他珍贵礼品。

桑吉嘉木苏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进京参加喇嘛年班,受封迭斯尔德呼图克图。据有关记载,民国3年(1914年)大总统曾确认这一封号。

在民国39年(1928年)发生的“小三爷事件”被平定以后,阿拉善局势仍动荡不安,应该管理旗政的王爷塔旺布鲁克吉拉(史料记载为:塔旺布里甲拉)留恋都市生活长住北京。在这样的情况下桑吉嘉木苏喇嘛坦应王爷之命和衙门部分人的共推出山掌管旗政近4年。塔王病故,其子达理札雅继位。等到年轻的达理札雅从京回旗接受旗印后,才回到寺里。他在掌印期间的的作用不论被如何评价,都说明了如下两点:一是当时旗政的腐败无能已经到了求救于神佛的程度;二是喇嘛坦在僧俗广大群众中德高望重,是个身不由己地被推入政治漩涡的人物。

第五代喇嘛坦对广宗寺的发展作用极大。他主持盖建新的大经堂和扩建修缮六世达赖灵塔大殿,派众多僧人入藏学经而提高了广宗寺佛学研究水平,主持迎请、接待九世班禅,应十三世达赖之命设立五供祈愿法会并规定每日念诵上述《宗喀巴千供仪规》,给僧人受戒,讲解教义,传授密法等,不一而定。

他著述甚丰,内容有佛教显密教义、仪规、颂词等,刻版刊印的文集有



三大帙,是阿拉善有藏文著作的高僧中的最多者。现在这三帙文集全套藏在塔尔寺色多公馆和布达拉宫两处。其中喀帙在哲蚌寺修过刻版,未曾刻版刊印的著述也不少,但大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失散。

他于民国33年三月初二(1944年3月25日)在广宗寺拉让贡桑敖德巴尔(普善光照公馆)以狮子卧姿势圆寂,享年74岁。

迭斯尔德呼图克图第六代转世是阿旺罗桑丹比坚参(译言:语自在善慧教法胜利幢),现取“坚参”二字作名字,并按蒙古式读法,译写作“贾拉森”。他民国34年十二月十三日(1946年1月15日)生于甘肃省天祝县,俗名拉嘎旺,父名巴玛才让,母名云吉。按宗教习俗寻访,逐渐缩小范围,就要最后确认到一名男童时发现名册上弟兄两个男童的名字和年龄被互换了(也许无意中写错),无法确定。遂将改正后的只写弟兄两个男童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的名单送去塔尔寺,请9岁的十世班禅认定。班禅于民国35年九月二十二日(1946年9月6日)天降节在弟弟的名字上盖上戳子,最后认定,并赐名阿旺丹比坚参。这样他3岁时被迎请至阿拉善,5岁受出家戒并坐床,开始学习藏文和背诵经文,9岁赴塔尔寺学经,并受沙弥戒。在12岁时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进入小学学习。后来一直念到1981年研究生毕业,并于1983年~1985年留学日本。现从事蒙古语文研究和教学工作,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了多篇学术论著并任自治区政协常委、并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近年来已发表多部论著,同时任全国、内蒙古、阿拉善盟的佛协组织中分别担任着理事,常务理事和副会长。

三、法会习俗和学经制度

广宗寺的法会,从规模上讲,大的需要全寺几百名僧人参加才能完成,小的以某个僧院的范围举行。还举行零散的数目繁多不成其法会的小规模的诵经、禳灾、祭祀等法事活动。在持续时间上讲从一天到月余,长短不一。详见南寺喇嘛组织系统与法会时间表。



朝格钦法会统计

表一

	时 间	法会名称	地 点	参加人数	经费承担者
1	一月初三~十八日	* 冬季祈愿 (传召)法会	大经堂	全体	格根仓
2	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 却尔加宝木塔尔	大经堂	全体	格根仓
3	二月二十五日	达日克宝木塔尔	大经堂	全体	喇嘛坦仓
4	三月二十五日	依格加宝木塔尔	大经堂	全体	
5	四月十二日~十六日	* 玛尼法会	大经堂	全体	玛尼吉萨
6	五月二日~十八日	* 夏季祈愿法会	大经堂	全体	葛根仓
7	五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 拉姆宝木塔尔	大经堂	全体	葛根仓
8	六月十五日~八月初二	雅尔乃法会	大经堂、额 尔德尼召、 塔尔巴卓越 格三处	比丘僧	葛根仓
9	七月初二	敦比日格达法会	大经堂	全体	各卸任琪布
10	十月十二日~十一月初二	* 王供祈愿 (然灯)法会	大经堂	全体	喇嘛坦仓
11	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 年终祭护法神法 会	大经堂	全体	葛根仓
12	十二月三十日	祭吉祥天女法会	大经堂	全体	葛根仓

* 为朝格钦七大法会,日期为农历



表二

黄楼庙主要法会统计

	日期	法会名称	地点	参加人数	经费承担者
1	每月初十或二十五日	会供轮法会	黄楼庙	全体	各仓、吉萨
2	四月初一到十五	四月水供法会	黄楼庙	全体	不用经费
3	五月初八到十五	夏季祈愿法会	黄楼庙	全体	不用经费
4	六月初八	千供(东乔德)	黄楼庙	全体	黄楼庙
5	六月初十	五部行空母歌舞会供法会	黄楼庙	全体	喇嘛坦仓
6	六月十五到七月初一	六月水供法会	黄楼庙	全体	不用经费
7	十一月二十五日	巴雅尔会供法会	黄楼庙	全体	格斯贵康
8	常年	孟和能乃(持斋)	黄楼庙	自愿	能乃吉萨
9	不定期	千供(东乔德)	黄楼庙	全体或部分	施主个人

表三

各札仓主要法会统计

	札仓别	法会日期	地点	经费
1	法相札仓	二月初四~十七日 三月初一~四月初一 六月十五~二十六日 七月初五~二十六日 八月十六~九月初七 十月初一~十五日 十一月初一~十二月初一	小经堂	参尼吉萨
2	密宗札仓	二月初三~初七 六月初三~初七 八月初三~初七 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初二 十二月初三~初七	密宗经堂 小经堂	黄楼庙
3	时轮札仓	三月初三~十七日 六月初三~初七 六月十九~二十二日 冬至前三日	时轮经堂 格斯贵康	能乃吉萨
4	医药札仓	四月初一~十七日 六月初三~初七 九月十九日~二十三日 十月初三~初七	医药经堂	喇嘛坦仓

注:日期为农历



朝格钦法会,即全寺范围的法会,有7个。冬季祈愿法会是六世达赖在乾隆四年(1739年)初次在阿拉善按照拉萨传召大法会的习俗设立的莫拉本法会的延续,正月举行。四月举行“嘛呢法”会。五月举行夏季祈愿法会,进行胜乐,大威德13尊和普慧3个本尊彩沙坛城的修习仪规,并进行其他活动,这是阿旺多尔济为纪念六世达赖忌辰而设立的。十月份举行五供祈愿法会,也叫燃灯会,这是桑吉嘉木苏喇嘛坦为纪念宗喀巴大师的忌辰而设立的。正月、五月、十二月的下旬分别举行法王十万酬补、拉姆十万酬补和众护法神酬补仪规法会。上述7个法会虽说是全寺性法会,但有些法会参加人数较少,寺方也不强求僧人每会必到。

以僧院范围的法会来说,法相僧院的法会最多,每个季度和季度之间都举行例行法会共8次,每次持续1个月左右。该僧院的法会直接与五部大论的学习有关,因此特别受到重视,全寺学经期的僧人几乎都参加。

其他3个僧院,每年要举行一两次法会,主要的有六月份密宗僧院举行密集本尊彩沙坛城的修习仪规;三月份时轮僧院举行时轮金刚彩沙坛城的修习仪规;四月份医药僧院行大悲观音五尊佛彩沙坛城的修习仪规。

除了上述一些较大的法会以外,大小不等的法事活动是几乎整年不断的。佛教的每个节日,寺主两个呼图克图的圆寂日子,都要举行纪念法会。每月初十或二十五都要在六世达赖灵塔前举行供轮法会,每年在本寺和瞻卯山、额尔德尼召三个地方从六月十五至八月初一举行较长时间的夏安居法会。每月初八有罗汉礼供法会,十五有“索炯”等。有人曾统计过,如果不算每天的“君加”(意为常茶)法会和各殿堂的高尼尔的念经活动的话,南寺不举行法会的天数累计只有两个月左右。

这样多的法会活动要有较大的财力来维持,有的法会每天放18次僧茶,两次斋饭,还要准备很多的供品和散发布施的资金。这些花费由各庙仓按规定承担。有的法会的费用由某些僧职人员负担。考取学位的格西、将要卸任的堪布及其他僧职人员也要承担部分僧茶、斋饭、布施的费用。

广宗寺的学经制度比较完整,进入寺院当僧侣的人,首先向某一高僧

受出家戒,取得法名、然后拜一僧人为师,向他学经。寺院学经活动的初期阶段不像学校教育那样实施集体教学,因此不论有无学问,每一个僧人都有机会有一小喇嘛为徒弟。想让自己的孩子当喇嘛的父母,可以把孩子送到寺院,交给自己相识的喇嘛或亲戚中的当喇嘛者为弟子。有师徒关系的僧侣们中,有叔侄关系、舅甥关系以及其他亲属关系者不少。

学经是从学习藏文字母开始的,但基本掌握字母表和简单拼读方法以后很快进入经文的背诵阶段。背诵经文从《皈依经》《忏悔经》《兜率百天经》开始,法会上念诵的经文都要背熟。像广宗寺法会多,念诵的经文种类繁多,因而需要背熟的经文量也是非常之大的。背20年也背不完。背熟法会念诵的基本经文以后就要进入却伊拉札仓,即法相僧院,开始漫长的五部大论的学习过程,同时继续背诵各种经文。在蒙区寺院中学习五部大论是非常少见的。

藏区较大寺院所设有的法相僧院却伊拉札仓,在阿拉善只有南寺、北寺、图克木等三个寺设有。广宗寺(南寺)的法相僧院是第三代喇嘛坦迭斯尔德呼图克图丹增忠乃达尔吉按照西藏哲蚌寺、果芒札仓的习俗创建的,这也是显宗教义之大成五部大论及其注疏的有系统的学习和考取学位的一整套制度在阿拉善的初次设立。学习五部大论的过程是个非常繁琐、严格而且漫长的过程。

僧人学经几年以后集体加入法相僧院,同一年加入的人们自然地组成1个班级,叫“曾达”。每个曾达由1名精于五部大论的格西任教。有些藏区寺院采取相似于学分制的办法而缩短升级时间,而广宗寺则规定两年升级一次。不实行留级制度,两年后集体升级。曾达这个班级组织,从最低年级一直延续到高年级,然后曾达自然地解散,但曾达的上下依然是成为考取学位的顺序和担任重要僧职时的先后排列依据。

从最低一级的“辨颜色”曾达到最高一级的“噶然巴”曾达,共有13个曾达,都有各自的曾达名称。按五部大论的学习,把13个曾达可以概括为5个等级,即摄类学(堆拉)5个曾达,般若(帕尔钦)5个曾达,中观(乌玛),俱



舍(早德),戒律(都勒巴)各1个曾达。

五部大论的著名注疏很多,广宗寺遵从嘉木央夏特巴的“依格查”。五部大论是指:(1)印度大论师法称陈那所著《量释论》及其注疏,内容有摄类学、因类学、心类学等因明学的内容。经过对它的学习,训练逻辑思维方法,掌握辩论,理解深奥的佛学道理的思想方式和模式。广宗寺法相僧院规定分5个年级用10年时间学完《量释论》内容。这期间的学习,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功训练,如果不掌握这个辩经格式和严格的逻辑思维方式,就无从谈起其他各部大论的学习,难以分辨各种复杂的佛学理论的统一性和区别性。(2)学完《量释论》后,接着进入学习弥勒所著《现观庄严论》及其注疏。最著名的注疏有宗喀巴的两巨帙《善说金珠》,它的内容属于经藏,是大乘佛教所讲的般若的理论,即初发菩提心到经福德、智慧两资粮的积累,达到佛位的整个过程的学说,它分5个年级用10年时间修完,完成般若学习以后举行一次大的庆典,曾达里的部分人考取全则德学位,法会上做布施,宴请同届学友,叫“帕尔钦”。“帕尔钦”两年举行一次,有帕尔钦之年,法相僧院的各曾达都可升入上一个曾达。(3)学完帕尔钦就升入乌玛曾达攻读月称论师的《人中论》及其注疏。学习中观之学,两年修完。(4)接着升入早德曾达,攻读世亲论师所著《俱舍论》及其注疏。它主要讲界、根、世间、业果、智慧等论藏内容,也用两年时间学完。(5)然后进入最高的一个班级噶然巴曾达,开始学习大论师功德光、释迦光《律经根本》等著作及其注疏,即律藏方面的内容。这个曾达是没有结业期限的,因为再无其他高的班级可升入。

一般来讲升入这个班级时年龄都会超过30岁,然后就等待考取多然巴,莫兰拉布金巴等学位。广宗寺每年有两人考取莫兰拉布金巴学位。考取学位的人一年内不许缺席一次冬季祈愿法会和法相僧院的所有8次例行法会,并作为会前会后辩经活动的答辩人,回答各个层次的高僧们提出的五部大论中的各种疑难问题,总答辩在冬季举行,叫“誓愿辩经”(达木加),用两天时间,在法相僧院堪布的主持下,各个曾达、尤其是帕尔钦以下曾达的人必须一个一个地在大会上站出来向答辩人提出自己所学大论内容有



关的疑难问题。这不但是对答辩人的考验,也是对学经人辩经才能的锻炼。考取学位之人还必须向法会发放僧茶、斋饭、布施,其经济负担也很重。他们最后在正月十五日大法会上取得座次。考取莫兰拉布金巴学位的两人中一人必须是前一年的五供祈愿法会上取得多然巴学位的人。

多然巴学位的考取办法和莫兰拉布金巴大致相同,只是没有那么隆重而已。多然巴隔年考取一次,其誓愿辩经,即总答辩在秋季举行,十月二十五在五供大法会上发放布施取得座次。

广宗寺还设有噶布居学位,据说该学位曾经是宗喀巴师考取过的学位,因此由已当过莫兰拉布金巴的老者来考取,它的考取程序和办法同于多然巴,秋季举行誓愿辩经,五供祈愿法会上发放布施,取得座次。他的座次实际上是他考取莫兰拉布金巴时已取得的座次。

多然巴和噶布居学位隔年轮流授予。

除了法相僧院设有学位外,密宗、时轮、医药各僧院分别设有阿格然巴、孑然巴、曼然巴等学位。取得该三种学位之人在大经堂法会上的座次在当年的莫兰拉布金巴之下,次年的莫兰拉布金巴之上。就是说不论什么学位,都按取得的先后来决定座次。按理说学位应该是给精于某种经法的高僧授予,但在事实上照顾成分多,不大重视学问,尤其是阿格然巴。真正精通密宗义理的密宗师极少,但是为了对一些致力于寺院事务的人给予座次而不经答辩授予阿格然巴学位的情况不乏其例。孑然巴、曼然巴虽然也不经答辩而授予,但总得知道一些历算和医学知识的人才授予。

僧人进入拉然巴曾达以后一般可以向密宗的学习和修炼方面发展,由于广宗寺僧人从年轻时开始可以同时参加几个僧院,参与几个僧院的法会,因此对一般密宗的仪规、诵经等活动是熟悉的。只是在学习五部大论期间不允许侧重于密宗。当然对历算、医药方面允许较早开始学习。至于闭关修习本尊、主持密宗方面的法事则是取得学位以后的事了。

除了考取学位而获得座次以外,当四大僧院堪布(法台)都能获得较高的座次,比有学位者高,法相僧院的堪布(必须有学位者担任)最高,下来依



次是密宗、时轮、医药僧院的堪布。卸任后大经堂里的座次在新任堪布之上。当堪布后在朝格钦法会上要披黄斗篷,座次高于披红斗篷者。全寺僧人的斗篷是红颜色的。当堪布需要有学问和主持较多法会、法事的本领,因此不可能所有老喇嘛都能充任。为了照顾无学问、又不胜任堪布之职的老喇嘛,对其授予黄斗篷,这样他可以越过有学位的喇嘛而坐于其上首,这对他们来讲,是调整座次的最后一次机会。但下面的人当堪布披上黄斗篷的话,又要越过他们而坐于上首。广宗寺有披黄斗篷资格者,最多时也就20多人。

僧人最高的座位是低于葛根狮子法座,而高于普通僧人座位的有靠背的方床,叫坐“梯”。全寺能坐这种高位者仅有公认的高僧或葛根经师等几个人而已。

一些僧人从小不好好学经,后来专当仓房的帮手,管理人,继而升为某一吉萨(小的庙仓)的第巴或葛根仓房的商卓特,甚至担任大、二、三喇嘛,参与寺院的最高掌权机构,成为显赫的人物。这些人的特点是戒律比较松弛,交结面广,办事能力强,对寺院事务尽力。这并非说掌权的喇嘛都是无学问的或无学位的喇嘛。但这的确是无学问的喇嘛们的一条出人头地的路。

另一些僧人从小背诵大量的法会上念诵的经文,而且嗓音洪亮,这样的人可以加入“噶达瓦”的行列,后来发展成为领腔师(又译领诵师、经头等),即翁则德。广宗寺设有大法会和4个僧院,3个小分寺的8个领腔师之职。

还有一些僧人从小被培养成为吹鼓手和乐师。会前会后以及在法会上需要吹奏大号、唢呐、螺号,以及其他吹奏乐时由他来吹奏。这一部分人在学经方面一般都长进不大,但待他们老的时候寺院方面设法给予照顾。

在经堂里聚会时座次是一定要遵循的。对一些无座次的老喇嘛,不至于坐到比他较年轻的有座次的喇嘛的下首而难堪,就让他们坐到经堂中间两排座位两侧的排坐上,但仍须按曾达的高低入座。对一些不懂经文而一生致力寺院事务,但因财力、能力等因素而不胜任充当商卓特、大、二、三喇嘛者们,为了表示关怀,就让他们参加“滚敦玛”,即葛根随从。经堂里备有

他们的专门座位,法会上他们不披斗篷,随葛根鱼贯而入,迟到早退而享受布施。

广宗寺在其发展阶段上培育过精通五部大论的格西多人。也出现过精于密乘义理,修习得道,主持仪规活动的密宗师和精于时轮历算,天文地理、名声较高的历算师(一人曾当过北寺活佛历算学老师)以及名医。一些佛教界高僧大德曾来广宗寺朝圣,除九世班禅外,二世嘉木央两次来广宗寺。土观活佛也曾来广宗寺,并修建了赞康庙。十三世达赖经师华日格西来广宗寺居住,并担任过法相僧院堪布。20世纪40年代色多活佛和乌兰葛根联袂来寺朝拜六世达赖喇嘛灵塔。

四、现状

广宗寺作为全旗最大的寺院,也作为信教群众向往、信仰的地方,聚集了大量有历史的珍贵的佛像、佛经和佛教文物、佛教艺术品,也聚集了精通佛教显密二宗教义教规的高僧大德。当然也聚集了无法估算其价值的以金银珠宝为材料的大批的法器、供器等。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的3寸高的纯金无量寿佛像和20世纪50年代初用500两白银制作的大悲观音的立体坛城。

解放前葛根和庙仓还拥有大量的牲畜、土地、房产和属民,聚集和佛教教义不相容的大批的资产。这是对佛教和佛教寺院的一种封建化的污染。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宣传教育下,逐渐废除了寺院、葛根、庙仓的封建特权。牲畜和土地都实行了集体化,对本寺以外的房产进行了改造。20世纪50年代末已停止了向施主化缘的做法,并对寺院的法会规模和费用规模进行了大量的压缩。组织喇嘛们办了文化学习班,制定了固定的政治学习日制度。把小喇嘛也送到学校上学。广宗寺僧人在护林防火、植树造林、参加社队生产劳动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广宗寺僧人自觉改造不合理的制度,接受文明与进步,得到过上级的表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闯入广宗寺,首先捣毁了六世达赖灵塔,强迫僧侣们破坏六世达赖肉身,并焚烧,同时大量的佛像、佛经被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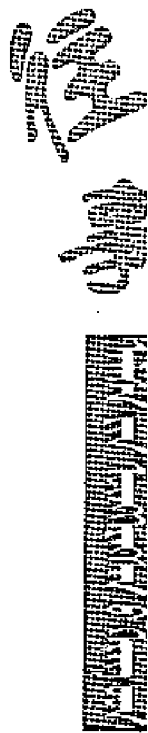


坏殆尽。他们还把守寺的少数喇嘛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批斗后赶出寺院，一些无家可归的僧人被赶到附近社队劳动改造。党的宗教政策遭到了严重的践踏。

广宗寺除一部分金银铜器被有关部门用车拉走以外，其余各种物品失散严重。在长年无人管理的情况下盗贼四起，无所不偷，庙宇殿堂已开始坍塌。1971年经有关领导批准签字，将广宗寺的庙宇全部拆除，木料用作他途，财产由有关部门低价变卖处理。广宗寺变成了一片废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以落实。全旗的部分僧人聚集到当时唯一能够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延福寺里举行法会。1981年广宗寺部分僧人来到原寺址盖顶蒙古包和帐篷，举行了夏季祈愿法会，并由罗卜桑宁吾、尚巴丹达尔、丹比宁吾等人出资出力，在原葛根仓房的遗址上盖建了15间平顶佛堂，把桑吉拉布坦精心捡起收藏的六世达赖骨灰重新造塔供奉。还塑制了宗喀巴师徒三尊泥像，为达尔吉诺门汗，温都尔葛根、桑吉嘉木苏喇嘛坦各造灵塔一座。后来从四川请回《甘珠尔经》一套，罗卜桑夏都布献给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一套。这期间僧人和施主向南寺献给各种物品、供器多件，在僧俗信教群众的资助下，备置了法会所需要的各种法器。内蒙古佛协将他们在“文革”前收存准备办展览的一批极珍贵的佛教文物都还给了广宗寺。其中有甘丹赤巴的斗篷，内地名僧玄奘法师的铃杵，六世班禅所赐的银壶，章嘉国师制定的寺规，光绪皇帝封送斯尔德呼图克图时给的御赐蟒袍、朝珠、玉如意，班禅所赐封号法诏，各种大小印章及其他多件物品。

在旗人民政府批准下成立的以罗·尚巴仁钦为首的广宗寺管理所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广大信教群众的要求和支持下，开始筹备盖建新经堂工程。由10名僧人自告奋勇，筹措资金，这样从1989年开始在迭斯尔德拉卜楞(公馆)的原基上新建了有歇山式屋顶的30间殿堂。本寺画家希拉布嘉木苏、罗卜桑拉布坦等完成了全部油画工程。按当年大经堂的风格，16根柱子绘制了金龙盘柱图案。柱头间的横梁两侧都用铂金兰札文书写着六世达



赖梵名咒,天花板的图案为蓝底金字梵文。大殿正门两侧用八思巴文书着“福兆似海集奇观,吉祥如意落大殿”的对联,此语取自五世达赖的《大昭寺志》。侧墙上写着本寺高僧罗卜桑夏都布所撰写的寺赋回文诗,诗中从四角往中间以 X 型排列着四个札仓的名称。新殿盖成后六世达赖灵塔等全部搬进殿内。由罗卜桑沃德斯尔出资,却达尔缝制的《达尔吉诺门汗本生》十一轴彩色锦缎推锈唐卡挂到殿堂后使新殿更加生辉。施主罗步云一人出资修建了小巧玲珑的山门。

1990年7月初举行新殿落成典礼。在三大寺活佛都莅临的情况下由夏仲嘉木央丹培尼玛、拉然巴格西强巴沃德斯尔等近300名僧人诵经3天,举行了开光仪式,盟旗党政领导前来祝贺,近3000名善男信女和观光客观礼了这个庆典。

1999年又在六世达赖灵塔原址上,重新修建了10.5米高的六世达赖纪念塔,并进行开光。

2000年5月又开始动工修建赞康和黄楼庙,10月5日落成开光。

据最新统计,现在广宗寺有注册僧人约百名,常住守寺僧人近20名。除大殿外还有赞康、三族佛殿、庙仓、施主及游客接待处。有僧舍几十间。本寺附近的瞻卯山洞也盖起一些庙宇建筑,恢复了香火。广宗寺在各佛教节日都举行法会,基本上满足了信教群众的朝拜需求。

五、广宗寺属庙

大经堂 大经堂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广宗寺时修建的第一个歇山式殿堂,是全寺僧众聚会诵经的地方,当时兼做六世达赖喇嘛灵塔殿。寺主活佛贾拉森专写一篇《兜率广宗寺记》碑文,简述盖庙经过及其功德。该碑文全文如下:

据经史记载,南寺原基乃十六罗汉尊者歇夏加持之地,亦系达摩达喇居士诞生之所。六世达赖喇嘛罗桑仁钦仓央嘉措为寻找建寺弘教之处曾云游北土,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来至贺兰山中阿日毕吉呼、巴雅吉呼家,



适逢家主人新坐垫缝制方成,鲜牛奶釜内飘香。仓央佛盘坐新垫,品尝鲜奶,环顾四周,但见胜景非凡:圆山巍巍,松柏葱葱,布谷鸣啼,泉溪长流,地似八瓣莲花,天如八辐金轮,具胜乐金刚坛城之形,实属弘法利生之圣地,遂择定此处建寺。后其心传弟子诺门罕阿旺多尔济遵其遗嘱於第十三胜生火鼠年(1756年)破土动工,次年建成殿堂,并造六世达赖喇嘛肉身灵塔,将利乐海寺迁来新址,此乃南寺之初创缘由。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朝廷赐予藏蒙满汉四种文字携刻之广宗寺匾额,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制定寺规,从此南寺名扬佛教界。藉僧俗信众之布施与能工巧匠之功德,专院逐年扩大,其建筑规模之宏,雕刻工艺彩画装饰之精,佛门宝物收藏之多,世所罕有。解放后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本寺僧人积极参加政治文化学习与劳动生产,主动接受文明与进步。“文革”中这座闻名遐迩的重要寺院被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再次得到贯彻,南寺弟子罗卜桑宁吾,尚巴丹达尔,丹毕宁吾等在原寺废墟上重筑房舍,恢复香火。经旗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以莫兰然金巴尚巴仁钦为首的寺管所在上级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下新建了三十间歇山式殿宇。画家领诵师希拉布甲木苏和罗卜桑拉布坦完成了油画工程,金龙盘绕的殿柱之间的横梁上用梵文写的六世达赖名咒闪烁金光,大殿正门两侧用八思巴文书有福兆似海集奇观,吉祥如意落大殿的对联,壁上留有本寺高僧莫兰然金巴罗卜桑夏都布所撰寺赋回文诗。全则德桑吉拉布坦保存的六世达赖骨灰造塔供养在大殿正中,其侧为阿旺多尔济纪念塔。殿内还供有内藏宗喀巴法体碎粒的宗喀巴师徒三尊塑像,曼然巴罗卜桑沃斯尔敬献的迭斯尔德呼图克图本生传堆绣唐卡以及佛祖真经甘珠尔全册和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等。第十七胜生阳铁马年(1990年)七月初,夏仲嘉木央丹培尼玛、拉然巴强巴沃斯尔等三百名僧众举行了开光大典。语自在善慧教法胜利幢应施主哈斯巴根等出资立碑者之劝请特作此记,愿此寺永为一切有情聚积福慧二资粮之所依。

黄楼庙 黄楼庙是六世达赖喇嘛灵塔殿,是广宗寺最重要的建筑,它的修复重建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宗教事务局的批准和专项拨款。它建于原葛

根公馆——大乐光照喇卜楞的旧址。新修复的黄楼庙，砖混结构，黄琉璃瓦盖顶。依山建造，气势宏伟，集蒙藏汉寺院之大成。占地面积 870 平方公尺，庙房 81 间，庙高约 20 公尺，分 4 层，入庙台阶 74 级。殿内所供奉的仓央嘉措镏金灵塔为全寺之尊，塔身高 3 公尺，塔门上镶嵌着各种颜色的宝石；内藏六世达赖喇嘛真身舍利。近年来政府拨款，信士集资，使殿宇重辉，金塔焕彩，展现了历史、文化、佛教氛围和广宗寺的独特魅力，也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伟大。该殿于 2000 年 5 月 11 日奠基，2000 年 10 月 5 日落成剪彩，并举行了开光仪轨和佛海观音供养修习法会。

六世达赖喇嘛荼毗塔 六世达赖喇嘛，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1683 年~1746 年），西藏诗人，宗教领袖。25 岁时拉藏汗诬他非达赖真身，送往内地。途中只身出走，游历各地，朝佛修行，最后来此弘法。据载，他法相英俊，清秀而端庄，慈蔼而威严，体味芬芳，嗓音优美，善即兴赋诗吟唱。64 岁时他吞服一颗佛舍利子后以菩萨跏趺坐姿口诵无量寿经而圆寂。其时从左肘流下各色透明油质液体达 19 天。虽时值酷夏，但法体丝毫未腐烂。弟子门将其安置于灵塔内供奉。后因时乱曾几度从塔内取出装入木龕转移，直至 1966 年历经 220 载，多人目睹肢体内脏仍完好无损。

“文化大革命”中六世达赖喇嘛法体在庙旁火化，僧众检骨灰另造塔供奉。为了残余灵骨灰不被人畜践踏，造此荼毗塔，施主陶德芒来等捐资修复装饰。塔内装藏佛像经卷外六世达赖喇嘛用过的牦牛皮褙一件。

此处是六世达赖大起大落经历的一个终点，故值得一记。信众可从中彻悟无常真谛而发虔心（荼毗是梵语火葬意义的荼毗之讹）。

佛海坛城塔 此塔建于六世达赖喇嘛灵塔原址，因传说其基座地底深处用彩色方解石粉修有胜乐金刚坛城，故起名曰坛城塔，又在塔名前冠以“佛海”二字，象征十方三世诸佛智慧永驻此塔。

该塔高 10.5 公尺，合市制 315 寸，象征六世达赖喇嘛诞辰 315 周年时建造。于 1998 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本寺寺主迭斯尔德活佛，北寺多布仓活佛，延福寺甘珠尔上师以及卫藏喇嘛，达日克夏仲等高僧大德在塔前聚会



诵经,举行了开光仪式。次日整天喜降甘露,沐浴了久旱干枯的草地,功德明显。

塔内装藏有:释迦牟尼像 10 万张,宗喀巴师徒三尊像 10 万张,莲花生大师像 10 万张,三族佛像 20 万张,马头明王像 10 万张,龙尊王佛像 10 万张,四臂观音像 10 万张,具光佛母像 10 万张等佛像类和《甘珠尔经》1 套 108 卷,《解脱经》三部,《菩提道次第广论》1 部,宗喀巴传、米拉日巴传、六世达赖喇嘛传各 1 部,《俱舍论》《现观应严论》各一部,六世达赖梵名咒十万遍,护法神咒十万遍以及六字真言等经咒类。还有伏藏瓶,各种矿石、器具等均按规定备齐后由本寺年龄最长者 88 岁的罗布桑策仁喇嘛主持诵经加被后装入塔腹。

该塔建造总负责人:曼然巴嘎拉桑道尔吉,协助人员:苏依拉,达西德勒格,嘎拉桑敖都布,阿旺叶仁培勒等。关怀指导的有阿拉善左旗民族宗教局僧格局长,本寺管理所希日布所长,退休干部图布吉日嘎拉等。

双白塔 位于黄楼庙和大经堂西北隅的一双白塔是广宗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是唯一一座经“文化大革命”而有幸残存下来的藏式双塔,堪称古迹。其上首较高的为菩提塔,较低的为尊胜塔(根据造型辨认),两者之间有一小本康,菩提塔前是一个上有天然形成的藏文‘嘛’字的大石头,是属罕物。据说初建广宗寺时该双塔为广宗寺的北边界线,寺院的转经路就经过塔下。后来寺院规模扩大,双塔位置就靠近寺院中心了。

金刚亥母殿(多吉帕姆庙) 建在广宗寺最高处的金刚亥母(多吉帕姆)殿是供胜乐金刚明妃多吉帕姆的殿宇,过去曾供有一尊一尺多高的多吉帕姆,一说为肉身,一说为化石,不知其详。但确实远近闻名,是和六世达赖喇嘛肉身、瞻仰山并列的具有殊胜加持力的广宗寺三个圣物之一,慕名前来朝拜的信众络绎不绝。现在的殿宇是 1998 年本寺僧人元旦培力杰出资修建。规模、样式完全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赞康殿建在南寺入口处不远、坐西朝东、面对寺院的悬山式殿宇是供奉护法神白哈五王的庙宇,叫赞康,相当于塔尔寺的小金瓦殿。它的正对面



是广宗寺最高的时轮峰，山脚下正对着赞康有一用石头垒起来的巨大的“唵”字，是白哈神种字。护法神白哈五王也称乃琼，因有身、语、意、功德、事业五种化身而得名。凡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必设有赞康，每月初二举行祭祀护法神的法事。据说温都尔葛根(六世达赖第二代转世)和土观活佛却吉尼玛斗法取乐，在土观活佛返回安多故里途中温都尔葛根做法下大雨，把土观活佛的牲畜和驮子全冲走了，土观活佛以打火镰烧掉广宗寺的赞康来回敬。他师傅松巴堪布责备土观活佛烧毁人家寺院的赞康为不当，叫他重建。土观活佛应师命亲自前来，在现在赞康的位置上为广宗寺修建过第二个赞康。它在回乱中被焚毁以后也重修过一次，“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广宗寺恢复以后本寺僧人根敦敏珠尔等在原址上先于大经堂也建过一个简陋的赞康。现在新建起来的赞康为广宗寺的第五个赞康。这样拆来盖去成了广宗寺盖建次数最多的殿宇。此次重建以前原建筑破损严重，几乎倒塌，有很多施主提议重建，并捐款资助，使这一庙宇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艺术品。

瞻卯山(塔尔巴卓格) 广宗寺北几公里处有一处单独耸立的山，有人说它从远处看形似毡帽而谓之毡帽山，因嫌其不雅，改叫瞻卯山。平常叫“塔尔巴卓格”，藏文原意可解释为“解脱山”，也可解释为“解脱阁”，曾有过一块雕刻藏蒙满汉文的金字匾额(残块仍在保存)。该山是十六罗汉尊者赴汉地时做过夏安居之地而远近闻名的圣山。南面半山腰上有一天然形成的山洞，几十名僧人可在洞内并排就座诵经。当年六世达赖喇嘛从广宗寺南山坡上看见吉祥天女出入洞内，因此，后来在洞内供养吉祥天女。从洞口延伸出来的巨型岩石能发出清脆的声音，称它是罗汉用过的鞞稚(集合僧伽的响器)。洞口外修有台阶和僧舍。其东侧稍高处有一人工凿出的山洞，因洞内有温都尔葛根亲自画的金刚菩萨为主的众多上师、本尊、护法像，故称金刚菩萨洞(多尔色木宗)。山脚下曾有过经堂、活佛居室、仓房、僧舍等，夏季举行夏安居法会。在恢复瞻卯山的过程中本寺弟子桑吉拉布坦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他修通了从广宗寺到瞻卯山的能走小型汽车的土路，又从广宗寺拆庙



废墟中捡出砖瓦、石料、木材，背到瞻卯山，修复了台阶、盖起了僧房，洞口安装了门窗。有人说他是广宗寺的“愚公”，虽是戏称，但也有几分相似之处。

瓦其尔巴尼口子 瓦其尔巴尼口子是广宗寺的入口，因路北侧岩石面上携有瓦其尔巴尼佛像而得名。这里也是广宗寺石刻佛像、经文最集中的地方。民国46年(1935年)为迎接九世班禅而专修的定远营至广宗寺的公路由杨达呼藏吾监工修通。正月十五日班禅莅临南寺时经此口入内，随行记者刘家驹看到岩刻赞叹不已，写道“五彩斑斓，巧夺天工”。这里岩石上现存浮雕佛像19尊，画像17幅，石刻经文50条，是内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佛教石刻。其中北侧的瓦其尔巴尼、绿度母、无量寿，南侧的金刚大持、马头明王、具光佛母等刻雕精细，表情生动，身态自然，线条流畅，是广宗寺艺术一绝。尤其是路北的绿度母及十相自在图、金刚百字明等堪称藏传佛教石刻艺术的珍品。这里岩石坚硬，不容易被风沙侵蚀，也不易受人为破坏，因此完全保存了古有风貌。

据说六世达赖喇嘛1719年顺此山口进去，便遇见了两人，问其名，一曰沙格达尔(瓦其尔巴尼的藏语)，一曰达木丁(马头明王的藏语)。他心想这明明是二个佛名，莫非他们指点我建寺弘教的好去处？进得沟来，果然找到了八瓣莲花般八座山环包的殊胜净地。现路南北两侧对称有佛龕的两个佛像就是当年六世达赖遇见两人的地方据他们的名字雕刻的瓦其尔巴尼和马头明王。

海螺山 海螺山原为广宗寺的天葬台，位于寺沟人口外约1公里路北侧，因其形酷似海螺而得名(从河对岸看更一目了然)。密续中称凡无上瑜伽续部本尊坛城外围必有八大尸林，系密咒师修炼得道之所。显密合修的蒙藏地区黄教寺院据此必设有天葬台，而形如海螺者，仅此一处。海螺乃佛教八瑞相之一，是佛乐之冠，僧众闻其声而聚会诵经，谓之“法螺”。故此处被视为以己身喂食肉食味者，完成此生善业之处，亦系灵识随螺声升入佛界之净地。是号称胜乐金刚坛城的广宗寺所独具的天然景观之一。

南寺第五世喇嘛坦佛教活动略述

贾拉森

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历代转世并列为南寺寺主的喇嘛坦，从六世达赖喇嘛来到阿拉善后将班子尔加布台吉的幼子确认为第思·桑结嘉措的转世灵童开始，以活佛转世的形式传了几代。

桑结嘉措曾出任第巴之职，辅佐五世达赖喇嘛，管理西藏政教事务。他的一生有功有过，但总的来说，政治上他继承五世达赖喇嘛的既定政策，依靠清朝，做了一些符合西藏人民愿望、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事。他对西藏佛教格鲁派的发展，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有过贡献。他扩建布达拉宫，整理和纂修西藏的医药、天文、历算、文学、传记和历史著述，发展了藏族固有文化，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他的医书《蓝琉璃》《兰塔布》等已被译成蒙古文，成为蒙医药学的重要文献。

就是这个曾经权重一时的政界和学界两栖名人，与和硕特蒙古的拉藏汗争斗不休而被杀的西藏第巴转生在蒙古地区，恰恰让因受其株连而被废黜后隐姓埋名出走的六世达赖喇嘛来到阿拉善时给辨认出来并收为徒弟。他就是亲手创建南寺的第一世喇嘛坦阿旺多尔济。土观·却吉尼玛称他是“在阿拉善创建了多阳等供养几种续部仪轨坛场的寺院，著有关于幻轮、铁堡伏魔法和烧施等多种作品的拉尊诺门汗阿旺伦珠达吉”（《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汉译本，第337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他后来因寺院利益和王爷发生冲突而被关押致死。



他的第二世出身藏族,叫伦珠达尔吉,未能正式从床,这和其前辈同王爷发生矛盾而禁止其转世有关,幼年圆寂。第三世喇嘛坦生于南公家,法名忠乃达尔吉,人称温都尔喇嘛坦。据说他是第二世葛根——温都尔葛根的侄儿。他对建立不久的南寺的进一步完善,做了很多工作。最主要的是他在南寺初次设立了法相僧院——“妙音善说洲”。法相僧院是藏传佛教寺院里僧侣们学习佛教显宗三乘教理之集大成——量论、般若学、中观学、对法藏、律经的一个最大僧院。南寺法相殿(小经堂)里第三世喇嘛坦的塑像供奉在六严二胜八大论师塑像的上手,以示对该院创建人的尊崇。可以推定,至此南寺四大僧院已经俱全,寺院的规模和地位在全旗已数一数二了。因为阿拉善寺院中设有该僧院的仅有南寺、北寺、图克木庙等三四家。第三世喇嘛坦虽然著述不多,但从他着手设立法相僧院这一事情中可以看出他曾是一位重视佛学研究的高僧。第四世生于本旗一个台吉家庭,名达尔吉嘉木苏,少年圆寂。

本文简略地谈一下第五世喇嘛坦的主要佛教活动,从这一特定侧面对他作一粗略的观察。

第五世喇嘛坦同治十年十月十八日(1871年11月30日)出生于阿拉善旗图力更(今巴伦别立镇)镇国公(南公)家里,剃度受戒时起的正式法名叫“敖木擦尔善潘普勒忠桑吉嘉木苏”,义为“神奇利他殊胜佛海”。这个很长的名字的最后部分与西藏第思·桑结嘉措的名字相同。关于他的确认有以下情节:康区大活佛拉布香根仁波且(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第四世香根·巴登多吉活佛的前世)驾临阿拉善时喇嘛坦的父亲阿尤尔扎那抱着孩子去磕头,拉布香根仁波且从孩子的哭声认出是第思的转世,作了预示。当时正在寻找第四世喇嘛坦的转世灵童,因此这个孩子遂被进入预选名单,后来由八世班禅额尔德尼确认为南寺第五世喇嘛坦。南公原来答应把这个孩子抱养给阿巴来台吉为子,因为可能是活佛转世,遂托辞没有给,等到喇嘛坦的弟弟出生后把他抱养给了阿巴来台吉。拉布香根仁波且还为第五世喇嘛

坦写了《足莲永固祈愿颂》，他坐过的坐垫现在仍保存在南寺。

喇嘛坦的父亲阿尤尔扎那、哥哥普勒忠尼色尔以及侄儿米格瓦其尔都是正式承袭爵位的镇国公。除他哥哥袭了爵位外，其余五个弟弟：三弟香巴却东、四弟达西尼玛、五弟巴拉吉尼玛、六弟图布丹确藏、七弟麦德日达尔玛都在南寺出家为僧。五世喇嘛坦在一生中除了1928年~1931年间在年轻的达理札雅亲政前一度出山掌管旗印、参与政务外，他的所有活动都与主持寺院事务和进行佛事活动有关。

他是阿拉善政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名活佛，是清朝廷加封的迭斯尔德呼图克图，是曾掌管旗印、一度行使王爷职权的大人物。他也是佛学和藏文造诣极深的高僧，是阿拉善历史上作品最多的佛学家，是僧俗弟子遍布阿拉善的上师喇嘛。

他于1944年3月25日(农历三月初二)在他南寺常住的普贤光照佛府，即拉让贡桑敖德巴尔的一间挂满佛像的宽敞明亮的卧室里以侧身安卧，右手垫于面颊下的姿势圆寂。这种姿势在经书中称之为“狮子卧”，表明非常安乐、吉祥。

当年他虽已74岁高龄，但春节和正月的冬季祈愿大法会的法事仍由他亲自主持；正月初四、初八、十四的“颂却”上他三次为僧侣们讲解菩提道次和佛本生故事，也谈及他身后的事，嘱咐僧侣们一心事佛；十五日亲临莫兰本法会主持诵经；十六日为数以千计的善男信女授无量寿佛的长寿灌顶。此后，有一次他走过自己卧室窗外时因脚下的烧炕洞盖板突然折断而摔倒，从此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经调养后又所恢复。二月二十五日的白度母十万供养法会时又亲临主持诵经，这是他圆寂前七天参加的最后一次法会。

他是历代喇嘛坦中，乃至在阿拉善的历代诸活佛中名气最大者。

20世纪40年代有人提到他时曾写道：“在阿拉善旗喇嘛教中，声望地位甚为隆重，蒙民对之信仰极深”。其所以如此，不外乎人们普遍信教和他有当活佛的宗教地位等一般原因外，他本身具备了能博得信教群众为之拜



倒的特殊条件。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佛教活动家。他的佛教活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著书立说

五世喇嘛坦在显密二宗方面造诣极深,可谓阿拉善学僧中的佼佼者。因此,他的著述数量也是最多的。他在一生中所作的文集计有八帙之多。其中已刻版刊印的有噶、喀、嘎、短版(刻版长度比普通版稍短者)共四帙。原普贤光照佛府内部小版库所藏刻版,全是五世喇嘛坦文集前四帙的木刻版。已有木刻版的文集原来刊印较多,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刻版、印本均遭毁坏,在阿拉善很难找到一部完整的文集了。在塔尔寺色多公馆应藏有一部五世喇嘛坦的文集,因为南寺曾赠送过一套。西藏布达拉宫也藏有一套,其收藏编号为01001~01003。恐怕幸免被毁的仅此一、两部了。除了这四帙,属于机密的手抄文集有两帙,其中一帙全是作者亲笔在藏纸(用瞻波伽花做的一种纸)上用藏文无头草字眷写的。所谓机密,就是只允许传授于小范围或本寺范围内的有关某些法事的做法、修持法及各种仪轨方面的经文。除了这两帙,还有为南寺的各子庙,如妙华寺、承庆寺以及甘肃天祝的石门寺等写的规章和其他一些零散著述收为一帙,全是手抄本。当然它们似乎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据我所知,从这一帙中只留下来一部写在黄缎子上赐给石门寺的《法台章程》,“文化大革命”中由该寺马旦曾隐藏下来,现在珍藏于石门寺。

五世喇嘛坦写作时用“散板儿”。它由约十块5毫米厚的木板组成,形状如经卷,比刻印本的经卷较短,每块板的两面呈凹形,把它染成黑色。用时两面都抹上一层油、其上面撒上一层灰,使灰贴于其表面,在它上面用削尖的竹笔打底稿。底稿出来后托人工整地缮写成经卷。然后擦掉再用。因此,根本没有留下手稿之类的东西。另外五世喇嘛坦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藏区的其他活佛的书信,有一箱子,曾保存在普贤光照佛府,是有一帙之多。读到这儿,也许有人觉得奇怪,不禁要发问,给人发出去的信,怎么都保存在自己家里呢?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过去的藏文书

信的格式。信一般都是在半开大的纸上用行书或草书写成。写给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特别是请求对方给予回答的信,在对方的称谓下面,书信正文前面留下较大的空。对方回信时便在那个空处写好退回即可。这样,所发出去的信及其回信都在一张纸上,回到原发信人手里。五世喇嘛坦的那些来往信件的内容都和宗教活动有关。其中有请求护佑上至六世达赖喇嘛法体大宝永固,下至全旗僧俗百姓平安的,有询问寺院僧众政教事务吉凶如何的,也有探讨佛教学问的。有求于他人者有之,应答他人所求者亦有之。比如五世喇嘛坦曾为布达拉宫朗杰札仓和哲蚌寺、桑耶寺送去成百上千平方公尺的阿拉善裁绒长条坐垫和带有在北京定做的精美的镀金装饰的幢幡。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通信中可知达赖喇嘛是曾提过要求的。有人告诉过我十三世达赖的来信,如在上方面画有一大弧线,即暗示达赖亲笔所书,非仲益(秘书)代笔。这种画有弧线的达赖亲笔信,也保存过不少。藏区的有些活佛曾写信给五世喇嘛坦,托他从北京买带闹钟的好马蹄表,有的还写信托他弄一个好哈巴狗设法送来,等等。五世喇嘛坦曾按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来信要求,托他的堂弟策林那木吉勒给在塔尔寺暂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送去哈巴狗。当然,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信件全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对它们的内容,除了上述仅有的记忆外,不能再进一步说什么了。

第五世喇嘛坦青少年时期的求学、治学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了。但从他的著述来看,无疑是对大小五明有较深造诣的大学僧。可以想象他的学问大部分是在南寺学成的。因为很早以来南寺学经制度严密,学习内容完整,高僧辈出,培养僧才方面自成体系,而且僧院设置俱全,学位授予制度完善。南寺在这方面即使在藏区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其他蒙区的过往僧人慕名而来,终生居住下来的也不在少数。五世喇嘛坦还赴藏深造过,精通藏语文。十三世达赖喇嘛经师之一的有名学者华瑞格西在南寺居住期间,五世喇嘛坦从他学习过声律、修辞、辞藻、韵律等学问,并受了他赐给的“仓赛夏特比多杰”的学名。他更精通于内明,真正做到了佛学家应擅长于讲、辩、著三事的治学要求。



作为一个寺主活佛，五世喇嘛坦的著作内容涉及佛教显密二宗的很多方面。其中有关各种仪轨和礼赞诗居多。比起阿拉善著名学僧阿葛旺丹达尔的著述来，专门阐述佛教哲学或因明、文法、修辞问题的纯学问性质的著述不多。他的渊博的佛学和语文学知识是融合在他所有的大量的经文里。

二、主持寺务

五世喇嘛坦主持南寺事务的几十年间，可谓是南寺的鼎盛期，同时也可以说他主寺的后期是南寺开始逐渐转向衰败的初期。这个期间内发生过对南寺的佛教事务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大事件。如南寺大经堂的盖建竣工和黄楼庙即六世达赖喇嘛灵塔殿的扩建；第六世葛根的确认为、迎请及坐床；九世班禅莅临南寺；喇嘛坦的普贤光照佛府的重建；派出一批批僧人赴藏深造佛学教理教义，取得学位，学成回寺。这些事情都是在五世喇嘛坦的亲自主持指导下进行的。他还在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的忌辰设立了五供祈愿法会（也叫燃灯节，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举行的法会）；医药僧院里设立了事部（佛教密乘四续部之一）本尊大悲观音的彩沙坛城的修持供养人我仪轨。

南寺虽有两寺主活佛，而且喇嘛坦的地位次于葛根，但五世喇嘛坦在几十年间一直是一人专权。这里可能有各种原因。从宗教内部来看的话，喇嘛坦博览佛教经典，通晓大小五明，受封迭斯尔德呼图克图，获得过布达拉宫朗杰札仓的全则德名号（荣誉学位），广交西藏佛教界的名活佛，道高德重，学问声望远远超过了葛根。而且葛根是喇嘛坦的徒弟，他的选认、坐床、学经、以至赴藏向十三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等事都是在五世喇嘛坦的亲自安排下进行的。喇嘛坦是有恩于葛根的。因此，他们的师徒关系决定了寺院事务上葛根必然对喇嘛坦百依百顺。把自身的上师喇嘛视为集佛法僧三宝于一身的导师而崇敬是藏传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可以在任何一个大呼图克图的头上用手摸顶，可以直呼其名。但对自己的经师或受戒、受经法传承的堪布，即使是普通的僧人，也绝对不敢用手去摸顶，也不敢叫他的名字的。三思（显宗指授戒、传经、讲经三事，密乘指灌

顶、讲密法、传秘诀三事。具备其中之一者，即成恩师。)根本上师对佛教徒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宗喀巴大师在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把顺从上师定为佛教徒的最基本的道德和入菩提之道的前行法。如果说，在动荡的阿拉善局势中，葛根曾在某些人的挑唆下不慎冒犯过喇嘛坦，那么葛根后来自责而感到无地自容，可能是他出走不归的原因之一了。这正是他以亲近善知识的教诲自省的可敬之处。本人从来不赞同以世俗的观点对此事所做的猜测和结论。

由于五世喇嘛坦在主持南寺事务期间的努力，南寺在佛教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大大加强。南寺本来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的条件。六世达赖喇嘛选中，后由阿旺多尔济喇嘛坦建寺的这个地方，周围有巍峨耸立的高山。东有时轮峰，南有三尖峰，北有瞻卯山，西边是寺沟的入口处。路两旁的岩石面上镌雕着数十尊神态各异的佛像和梵、藏文的六字真言，十相自在图，金刚百字明咒等，20世纪30年代随九世班禅大师来过南寺的刘家驹先生曾赞它“五彩斑斓，巧夺天工”。真可谓贺兰山中之一绝，使人入山者顿觉身临佛境。章嘉国师若比多吉赞颂南寺的天形似八辐金轮，地形如八瓣莲花。奇山怪石象征吉祥八徽。周围山上几处有天成的大自在天的男根石，据说密宗师在其间修持本尊，必能得到成就。温都尔葛根在他的《瞻卯山薰香祭》的前言中引经据典，称现在的南寺所在地就是十六罗汉的夏安居之地，是达尔玛达喇居士的出生地。

五世喇嘛坦亲自主持扩建的六世达赖灵塔殿—黄楼庙，具有镏金的屋脊和黄琉璃瓦的屋顶，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刻雕精细，四周飞檐下几十处画有珍禽怪兽和各种传说故事。笔者仅仅记得，在其南檐下画有一些非人非神的怪物，后来才知那是《山海经》中的刑天、帝江等与佛教无关的怪物的形象。殿中的隔扇上雕刻着唐僧取经的故事。黄楼庙曾经是蒙区寺庙建筑中最好的一座。南寺大经堂规模宏大，金龙缠绕的64根柱子之间的雕梁两面有铂金的兰札体梵文经，全堂的连接起来，是一部《圣称诵文殊师利名号》全文。非常珍贵，梵文此经现在蒙区连写在纸上的都难以找到了。殿中



的十六罗汉和四大天王的泥塑像,堪称佛教艺术的珍品。据说雕塑家是从四川请来的一位法师,塑完了十五尊以后不辞而别,喇嘛坦派人追他送去了银两。后来传说他是十六罗汉之一亲自来塑像,唯独没有塑自己的像就走了。缺少的一尊是后来补上的。小经堂有喇嘛坦的弟弟达西尼玛所塑的大于普通人身量的印度八大佛教哲学家六严二胜的泥塑像,栩栩如生,讲经辩经时的问答、思索等各种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世喇嘛坦对佛像的塑造、绘制,增加佛经藏书量,非常重视,大力倡导。南寺建寺初期,温都尔葛根是绘制佛像的好手。到了五世喇嘛坦时期,他的亲弟弟是塑制佛像的巧匠。南寺主要大殿都有他塑的佛像。另处,建在南寺最高处的弥勒殿和葛根的公馆两处,合起来有一千尊一尺高的宗喀巴的泥像。密宗殿中有一千尊贤劫千佛的镀金铜像。夏季聚会辩经的“法园”内有一千尊一尺高救度八难绿度母泥像,医药殿中有一千尊一尺高的白度母泥像。各殿堂公馆都藏有绘制极其精美的、不计其数的佛像——“唐卡”。其中最主要的有释迦牟尼的《三十四本生传》两套上百轴,《神变十五》一套十五轴,反映宗喀巴本生和传记的《八十宗喀》三套上百轴,《仓央嘉措传》一套十几轴等。最大的要算在夏季祈愿法会和七月晒佛节上展示的用彩色锦缎缝制而成的宗喀巴和弥勒佛的宽四丈高六丈的巨大的两轴佛像。这些佛像中有一部分是在五世喇嘛坦时期制作的。有的是五世喇嘛坦从西藏请来的。

南寺经卷藏书也非常丰富。有北京朱字版一百零八卷的藏文《甘珠尔经》一部、藏文《丹珠尔经》两部外,五世喇嘛坦从西藏请来的名僧喜饶嘉措等人参与校勘的一百卷的新版《甘珠尔经》一部。另外宗喀巴师徒三尊的全集几套上百帙和其他名活佛、名高僧的著作无所不有。这些使南寺几乎成了佛像的海洋和经卷的海洋。

南寺的如此鼎盛经过了 200 余年时间。其中多少个能工巧匠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聪明才智,多少个僧俗信教群众,虔诚地奉献出自己的资财和劳动。当然五世喇嘛坦主持搞的大小项目,无疑给全旗人民带来过

较重的经济负担,消耗过较大的人力和财力。

三、法事活动

作为寺主活佛和虔诚的佛教徒,也作为精通教理教规的高僧和密宗师,五世喇嘛坦的法事活动,名目繁多,一年四季不断。其中有定期和临时之分。

定期的如正月的冬季祈愿法会,五月的夏季祈愿法会,十月的五供祈愿法会等,都需要他去参加主持。冬季祈愿法会期间,他还得去给僧侣们说法,讲解菩提道次和佛三十四本生传。正月十六要给善男信女传授无量寿佛的祈寿灌顶。南寺每年举行无上瑜伽续部本尊密集、胜乐、大畏德、时轮,瑜伽续部本尊普慧和事部本尊观音等六场彩沙坛城的修习仪轨。这是密宗方面的最高一级的法事,其中有的是建寺初期设立的。五世喇嘛坦据说有时候也参加这些法事。临时的是寺院规定的以外,他自己认为有必要进行的某些法事。如祈祷某一件事,为寺院和众生搞一次禳灾法事等,有时托其他人主持进行,有时自己主持进行。

据说五世喇嘛坦每年要用一至两个月的时间闭关(即闭门不会客)念经,修习本尊。

应他人的要求,为僧侣们授戒或者为僧俗教徒传授灌顶、随许(灌顶、随许都是传授密乘的仪式。)等是常事。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他曾在南寺为数千名善男信女传授时轮大灌顶,为数百名善男信女讲解阿旺多尔济所作《仓央嘉措传》数次。最后一次他为全寺僧众传授无上瑜伽续部本尊佛海观世音的四种圆满灌顶。

他主持的一些和寺庙有直接关系的法事,都有一个特点,都是为寺院和佛法的昌盛平安做祷告的。据说他每年要临时决定祭祀求福护法神,并大搞禳灾法事。他规定每月初十或二十五,在六世达赖的灵塔前搞会供轮(以各种饮食品供上师、佛三宝及自身的一种仪轨)一次,并将有须弥山和四大部洲的曼扎和身语意三种所依(即佛像、佛经、佛塔)奉献给六世达赖喇嘛灵塔前、请求灵塔平安无事,永做本寺和本地圣教众生的依怙。六月会



供轮时的五部行空母的舞蹈,是他亲自指导编排的。表现五个行空母献上五色的哈达,要迎请六世达赖喇嘛法体到他们的地方,但哈达被退回,请求被谢绝,他们最后叩拜而归这样一个情景。据说,僧侣们中间原来就流传六世达赖喇嘛法体,将会以水、火、地震等灾害的形式被行空母请去做他们的福田,而且这事的发生日益逼近的说法。五世喇嘛坦规定搞的这个仪式,显然是想以此来阻止或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

五世喇嘛坦生活在南寺从鼎盛到开始衰败的转折时期,看到政局动乱,佛法事务每况愈下的局面,心中自然感到岌岌可危。因此,他采取一些超越宗教自身发展规律的方法,即搞一些法事,希望避免寺院和佛法的衰落。他虽然操了很多心,搞了很多祈祷活动,但到他的晚年,南寺的宗教事务从发展的顶端渐渐趋向衰落。他一圆寂,旗政府就开始抓喇嘛兵,很多年轻喇嘛为逃避当兵,在家中藏匿或外逃流浪。

五世喇嘛坦正如上面所介绍的,是一位道高德重的活佛和佛学家。而且他被清廷册封为迭斯尔德呼图克图,受了皇上赏赐的蟒袍衣料(曾存放在普善光照居室),曾赴京值过洞礼年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授予过“阿日鲁克桑班迪达额尔德尼诺门汗”的称号。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阿拉善局势较为动荡的时期,有人想利用他的声望、地位,把他硬拉进政治的漩涡,让他管理旗政。把全旗的政务交给一个喇嘛管理,可见当时的旗政混乱到了何等地步。这件事,对五世喇嘛坦来讲,是对他一心致力的佛事活动的一大干扰;对阿拉善的旗政来讲,是对它腐败无能的一大讽刺。至于他参与政务,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题目和本文无关。

笔者根据自己的所闻,概略地介绍了第五世喇嘛坦的主要的佛教活动。也许文中有的地方与事实有出入。分析欠妥,提法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们阅读时注意更正。

对阿旺丹增嘉木素晚年活动情况的调查

G·朝格图

我和生格同志于2001年4月24日至30日前往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对阿旺丹增嘉木素晚年活动情况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在当地政协的全力支持下,收获非常大。

我们先后走访了13位知情人士,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49岁。据这些人提供:阿旺丹增嘉木素是1943年到镶黄旗西尼乌素的。来的时候骑一匹铁青骡马,骡马还领一小马驹。此外没有什么其他财产。当时他称自己是蒙古国的贺德根寺毕喜热勒图·呼图克图。当地牧民称他为:“毕喜热勒图·巴格喜、毕·玛摸、毕喜热勒图·喇嘛、散尤喇嘛(不吃荤的喇嘛叫散尤喇嘛)、阿给巴格其格”等不同尊称。他在与人处世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但对贫苦人非常同情,常救济这些人群。因此,在牧民当中威信相当高。在佛事方面,他从来不去寺庙念经,牧民们请他到家里念经供佛时,有时去念经,有时不去。他还会打挂算卜,算的很准,有时有人得了疑难病症或瘕病向他求治时,他说:需要多少多少银两。但治愈后,却分文不取。有时从生活富裕人家里要些食物,救济贫穷人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活动。至于他为何不说真实身份问题,是因为怕暴露自己身份惹麻烦。直到解放后才说明了自己真实姓名和原籍。说他是阿拉善旗广宗寺达格宝呼图克图,俗称巴润葛根(南寺活佛),名叫阿旺丹增嘉木素。还说自己对新生事物比较感兴趣,思想比较开放,容易接收新事物,因此,当时阿拉善旗执政者对他有了



看法,怀疑是“红党分子”被管制起来。之后,于壬申年八月初三(1932年9月3日)程机逃出来,隐姓埋名游历各地至今。

在采访时,我们对当时见过阿旺丹增嘉木素的所有老人,拿出不同时期、不同人的几张照片进行辨认,他们在这些照片中都辨认出阿旺丹增嘉木素,说“这是年轻时的照片,来这里的时候比这老多了,就是这个人,没有错”等等。

据乌力吉、贡其格苏荣等人回忆,到了解放时,阿旺丹增嘉木素的个人财产除了几匹马和几头牛(1953年的白灾中牛全部死光)以外没有其他财产,1955年,我们这里建立学校,动员全旗人民捐款捐物,他捐了两匹马,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捐物。他去世时在别人的一间小土房里,除了他日常用品外(基本上是一些佛事用品和佛经),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和钱物,按现在的收藏眼光看,他的比较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十来公分长的翡翠烟嘴了吧。

他在世时,和他比较友好的人和来往密切的人有朝格吉勒淖尔布、葛力格、那木斯赖等人。去世的时候就住在葛力格的小土房里。

关于他的去世、安葬的时间地点问题,所有被采访的人士意见是一致的。他去世的地点是琿登,去世的时间是1957年农历八月中旬,是在巴音恩格尔的陶古如木地方(巴音恩格尔是个公墓)天葬的。当时由朝格吉勒淖尔布、葛力格、苏德木仁沁、昭格森嘉布等人一起去发丧的。据僧格、代拜、乌力吉等人回忆,安葬地是由死者自己选定的。据代拜之母(现年83岁)讲,她的第二个儿子是丁酉年八月十五(1957年9月8日)出身的,就在这一天毕喜热勒图喇嘛谢世了。从这一点看阿旺丹增嘉木素去世的时间是不会有错的。

据都古尔嘉布、丹巴、乌力吉、贡其格苏荣等人回忆说:我们这里听说阿旺丹增嘉木素遗物有一顶帽子、手鼓、佛经、马鞍和一个翡翠烟嘴。此外,没有听说其他遗物。佛事用品和佛经在葛力格一直保存着,但不知这些东西现在是否还在很难说。



以上情况外,对阿旺丹增嘉木素的生活习惯方面、法术方面,在当地流传着很多的传说,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总之,这个毕喜热勒-巴格喜就是南寺活佛阿旺丹增嘉木素。

2001年5月8日



喇嘛教与宗乘寺(阿贵庙)史记

郭恩布札布

一、内蒙古喇嘛教

喇嘛教是清朝统治者及内蒙古封建主政权的可靠支柱。喇嘛教是清朝统治者在征服蒙古后,深知蒙古人性情强悍,唯有借着宗教才可使其化勇敢尚武为懦弱驯服。故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时代,特别提倡喇嘛教。在多伦诺尔、热河、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地建立了许多雄伟壮丽的寺庙(内蒙古全境至清末统计约有寺庙 1000 所)。其中以归绥为最多,“殿宇雄壮,比拟佛国”。清廷封各大寺庙主持者为“呼图克图”(活佛)普通寺庙主持者由“大喇嘛”担任。这些活佛皆由蒙古人担任,此外又从西藏迎来章嘉活佛(呼图克图),使其主持内蒙古喇嘛教。清朝皇帝对喇嘛设定种种奖励办法,凡当喇嘛的,除豁免其一切赋役外,并得享受种种特权。喇嘛教受清廷皇帝的支持和提倡,其势力便日益膨胀。蒙古平民平日备受蒙古封建主的压迫和蔑视,但一旦当了喇嘛(喇嘛原为高僧的称号其后对普通蒙古僧侣亦以喇嘛称之,以示尊敬之意。清时喇嘛之名成了蒙古僧侣的概称)不但受人尊敬,而且可以豁免赋役,吃穿无虑。因为他们除了施主的布施外,寺庙也占有大量牛羊牲畜可孳生为利,是供喇嘛的一生衣食。为此,一般贫穷的蒙古人,特别是随丁总是尽可能使他们的幼龄儿子出家当喇嘛。在内蒙古境内,几乎每一阿勒巴特牧户都有人当喇嘛。由于内蒙古人民不断出家当喇嘛,造成内蒙古封建主的阿勒巴特及随丁的人数剧烈减少了。清朝统治

者除了这一招外,还顾虑此事会影响内蒙古阿勒巴特所担负的兵役及其他义务。因此,清朝皇帝又颁布了关于阿勒巴特未经本旗王公准许,各寺庙不准招收喇嘛的法令,而当喇嘛的,必须得到理藩院的度牒,凡持有度牒的喇嘛,称为“度牒丁”,没有度牒的称为“黑徒”。

内蒙古的喇嘛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佛爷喇嘛(呼图克图及呼毕勒罕。前者有封号印信,后者没有),札萨克喇嘛(掌政教二权,有自己的旗下,一般都冠有大喇嘛称号);寺庙喇嘛(德木齐以下);在家喇嘛(善男信女在家修行,着喇嘛服者)。内蒙古喇嘛教的最高领袖是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他常驻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康熙时造),往来于北京及五台山,掌管内蒙古的寺庙事宜。在内蒙古境内,凡喇嘛道行崇高的称为呼图克图,有些呼图格图由清廷赐为国师及禅师名号;次为札萨克大喇嘛,副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大喇嘛又次为大喇嘛,副大喇嘛,苏拉喇嘛。其次为格斯贵管理教务,执行戒律。德木齐管理庙内庶务及会计,尼尔巴管理财政。格隆喇嘛中受戒者,班弟小喇嘛司役使者等,喇嘛群众(普通喇嘛)为“沙比”、“诸沙比”。

内蒙古喇嘛分为上下两层:即上层喇嘛和普通喇嘛(沙比)。上层喇嘛通常都由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及少数由阿勒巴特出身的大喇嘛所组成。大喇嘛主持每一寺庙事务,有些小喇嘛因得喇嘛群众推戴而上升为大喇嘛,但大部分都由俗界封建主充当。例如,当台吉没有出路去当喇嘛时,便可得到大喇嘛之位,大喇嘛进庙时不许随带奴才,因全庙皆是他的奴才。下层喇嘛有些刚会行走时就开始受到无条件服从上层的教育,他们是上层喇嘛的盲目而柔顺的工具,上层喇嘛利用下层喇嘛去影响阿勒巴特群众。

俗界人士信奉喇嘛教者,由上层喇嘛授予“乌巴什”善男或“齐巴罕察”信女的称号,并令其接受五戒。其后因各旗人口减少,壮丁缺乏,清廷遂下令禁止蒙古各旗人民,除年老残废者外,男不得私当“乌巴什”,女不得私当“齐巴罕察”。

喇嘛在内蒙古草原上颇有威望,蒙古人每年为赴寺庙礼拜,甚至还有一些封建主,有不远千里而来的。富者往西藏大召寺庙礼拜。王公呈递哈



达,必附布施银两,有多至十余万两的。贫者无力布施,则守候寺庙外,甚至守至月余,以一见活佛为荣。活佛出门,蒙古人民争先罗拜,所过之处,争以哈达铺路,将车轮辗过的哈达,捧而顶礼之,以为可以“减罪”。活佛侍者持筐而至,蒙古人争先布施。

寺庙除拥有大量牲畜以剥削属下沙比那尔外,并将所获得的布施银两放债于蒙古王公及平民,以收重利。由于喇嘛及寺庙占有大量牲畜(封建主布施牲畜给寺庙时,允许寺庙的牲畜在其牧地上牧放)而形成了封建领地,在盛京法库门外养息木河(现养畜牧河)上游,有个锡呼图库伦喇嘛旗(由清廷划定旗界),此旗由锡呼图库伦喇嘛任札萨克,统治着属下的沙比那尔(蒙古人民)。此旗的札萨克也如内蒙古各旗札萨克一样,由清廷授以封爵,并得世袭(徒弟继承)。札萨克公署在小库伦。境内有四个大庙,全境共有僧侣约4000人。自清末招垦荒地后,并有汉民约700户。除此以外,章嘉呼图克图在多伦诺尔境内也领有游牧地。

寺庙内下层喇嘛与上层喇嘛之间,由于财产占有的不平衡,僧侣封建主(上层喇嘛)对沙比的掠夺及剥削,而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

清朝统治者及蒙古封建主通过喇嘛来压制爱好自由的和英勇尚武的蒙古人民改善生活和愿望,使他们丧失反抗力量。由于大多数蒙古青年当了喇嘛,使劳动力减少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从而使蒙古文化和经济陷入十分落后的境地。

二、喇嘛教与宗乘寺

宗乘寺(阿贵庙)位于骨顶鸡山脉(乌拉山脉)东麓,占地100公顷,海拔约1500米,始建于嘉庆八年(1803年),初名为骨顶鸡庙,光绪年间清政府理藩院改称宗乘寺。这个庙的修建由来是:据传说,很早很早以前,庙的原址有个大山洞,叫扎嘎尔桑布。经常出没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妖魔,到处残害生灵,闹得民不聊生。正在此刻来了两位大喇嘛,一个叫鲁布恩巴达玛,一个叫桑布巴,用佛法神灵,把这个妖魔赶进山洞镇压下去。为了使这个妖魔永世不得再现,就在这个洞址上修建了骨顶鸡庙。依山势从山门至

寺顶共五进院落,三大殿,修建别致布局严谨。宋代木雕斗拱,清代石雕盘龙,活灵活现。其中达尔克仙女洞可能为何仙姑或观音菩萨。洞正中庙内挂有身着白、绿衣服的女神画一幅。庙右侧有扁平岩穴洞一处,其面积约8平方米左右,呈扇形状。其间有一女外阴部、臀部、腹部显露逼真酷像自然石形成。腹部上敷有黏汁,游人多置硬币其上,以示留念。左侧亦有一岩穴洞,分两室,均呈扁平倾斜扇形。左室面积20平方米左右,游人可卧可坐亦可散步。右室面积不大,10平方米左右,岩穴极处有一泉池不外溢,水清如镜,清凉无比,沐浴之,浑身分外舒适,据传为“仙女池”。此洞由川底攀登而上,蜿蜒迂回,时东时西,路窄如履,陡峭处70度左右,险处腾空架石,达顶约400米之距。洞门面东,山势惊险与洪羊洞遥相对峙。极目底川,晕眩欲坠,仰视山顶,乱石穿空,云天蔽日。仲夏,清风徐徐,岩蝶翩翩;山坡,绿草成茵,野花烂漫;石阶,杂草铺路,芳香扑鼻;此刻游人忘返,叹为观止,实为阿贵庙第二胜景之一,好一避暑胜地也。

这些古代雕塑家们雕梁画栋,留下了许多珍品。他们还不肯空留一石一木,即在撑方与榫角之中,也布满了他们呕心塑造的各种形象与故事:女娲炼石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达摩东渡,铁木真骑马射雁……这些传说中的远古英雄与历史传奇人物,赫然显现在这样一座充满宗教色彩的庙宇里。布满阿贵庙的雕塑壁画,千姿百态,目不暇接,然而最令人振奋的还是那些逼真的浮雕龙。

这里,里里外外都是龙,越是显眼的地方,就有龙在盘旋与翻腾。这里的龙雕,最为刚拔,最具有形态与风骨,这真是一座龙的迷宫,龙的世界。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昔日盛况,已成烟云。1984年开始又在振兴恢复旧观,但是原来的雕塑怕也是难能再现。

宗乘寺是一座富有天然景色的山林寺庙,山高林密,重峦叠嶂,层林尽染,环境清幽。四季风光各有特色。隆冬,踏雪赏景,“西山晴雪”为磴口胜景之一。阳春,山花烂漫,芳草萋萋,为春游的好去处。仲夏,荫郁清凉,为避暑胜地。深秋,黄栌换装,漫山红遍,骨顶鸡山的红叶尤为游人所向往。



前殿供有释迦牟尼和达赖喇嘛塑像,还供有如来、维摩诘、伽南神、菩萨、文殊、罗汉、四大金刚、目犍连、夜叉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小铜佛数百尊。中殿供有四天王,古印度神话称须弥山腹有四天王,佛教也取用其说,四天王各护一天下。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执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执绢索;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执宝幢。因称“护世四天王”。

前殿东壁绘有释迦牟尼生前事迹。中殿西壁绘有法云寺《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撰,是北魏时流传至今的一部文史名著。《洛阳伽蓝记》以记载洛阳各寺的兴废沿革为纲,先从城内开始,次及四门,并表列四门新旧名称,按远近次序,各分为一卷,提纲挈领,体例明确。内容虽以记佛寺为题,然实际着重记载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和传闻故事等。故凡宣帝以后的皇室变乱,宗藩废立,权臣专横,阉宦恣肆,艺文古迹,苑囿建筑,以及民间怪异,外族风俗等,无不备述。认为是与郦道元《水经注》相媲美的文学作品。该庙所绘的主要法云寺部分情况。后殿两壁绘有极乐世界和转轮王图。

这个殿是喇嘛们诵经静坐养神的处所。喇嘛由 200 余人,后逐渐增至 400 人。清晨喇嘛们听到铜号声。身披袈裟手执法器,在蒲团上结跏趺坐,在掌管教务纪律格斯贵喇嘛的指挥下,摇动法器,以诵经调音节。喇嘛中如发现不专心致志的念经或对初学的人,常不问情由,即给以一棒,或大喝一声,要对方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以考验其悟境。所念的经书大体有《甘珠尔经》《法华经》两种。《甘珠尔经》《丹珠尔》,藏文大藏经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为世界知名的佛教丛书。“甘珠尔”意为佛语部(包括显密经律),有书 1108 种,“丹珠尔”意为论部包括经律的阐明和注疏密教仪轨和五名杂著等有书 3461 种,各卷均为(德格版)两部分,都以译本为主,仅《丹珠尔》中刻版印刷,印版今已不存,后来有藏人撰述释藏文本,部分在西藏奈塘寺。喇嘛念的《甘珠尔经》主要用的藏译本。

阿贵庙主持的活佛都是所谓转世而来的,第一世为拉亦札木苏(编者

注：伊都布道布登来加木苏)，二世为朝札拉桑（编者注：罗布桑却吉嘉拉森），三世为阿格旺朋苏格，四世为根齐格札拉僧（编者注：丹毕嘉拉僧），五世为班地德（编者注：堪沁班迪达），六世为根齐格札拉僧（编者注：阿格旺万楚克嘉拉僧），七世为阿右王沙地日布（编者注：阿格旺夏梯布丹毕尼玛）。其中五世班迪达活佛，道行崇高而且精通医道，经常给牧民群众治疗各种疾病。

阿贵庙也仿照金瓶掣签的办法，在庙内进行，通过占卜降神等活动，寻找当时出生的男婴，从中选定一个作为他们的转世继承人。他所转生的“灵童”确定后，设坛举行坐床仪式，须经过升座仪式，才能成为正式的继承者，这种仪式，名为“坐床”。

阿贵庙每年夏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生日。举行浴佛节，用香水灌洗佛像，取法神话中“龙王以香水灌洗太子”的故事，以纪念佛的诞生。这个日子里许多善男信女驮着蒙古包，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聚集在山庙周围，星罗棋布。喇嘛们按照宗教习俗跳布札扮成神佛鬼等诵经跳舞。据说为了驱鬼除邪气也叫打鬼或跳神，“布札”藏语（即恶鬼）。当日盛况不可一世。

阿贵庙每年也招收沙比（徒弟），还要举行剃度灌顶戒教仪式，然后再教给合十，又称“合掌”，喇嘛普通礼节，两手当胸前，十指相合，表示敬意故名。

三、揭洪羊洞之谜

阿贵庙的附近有五个大山洞，扎嘎尔桑布、鲁布齐、洪羊洞、嘎尔布、达尔克。其中洪羊洞闻名于蒙藏地区，但其由来传说不一，据喇嘛们说，此洞通达西藏拉萨。据阿拉善旗已故旗长段巴图尔老先生说，此洞早年是大泉眼长流不息，经山形变化，泉源枯竭，形成岩石洞，作者采用其说。还有许多群众认为是安葬宋将杨继业骸骨的洪羊洞。据《宋史》《辽史》中记载，他是兵败被擒，不食三日而死，其骸骨安放幽州洪羊洞（今辽西绥中县山海关北山北20里山谷中）。只有寥寥的几句话，在小说故事中却大加虚构和夸张，演出了杨继业碰死李陵碑的情节。因此，也就使这一死具有了更加悲壮激烈的感情色彩，使它在现实生活中起了更加有力的鼓舞作用。宋、元、明三



代,民族矛盾非常尖锐,这就是汉地群众热爱杨家故事,而又在这些故事的广泛传播和不断再创作中倾注了更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原因。应该说这一爱国的主题,是杨家故事中最可宝贵的思想内容,是他的闪闪发光的钻石。

四、土城子(保尔浩特)

在阿贵庙的东北边约 50 里外有古城——土城子(保尔浩特)。对这个城的历史说法不一,有看过中国历史的同志说,这是李华所写的吊古战场文的古战场所在,还有的同志说这是宋朝双龙会金沙滩。这些说法都不一定可靠,金沙滩即今山西省五台县五台山西约 10 公里处。

据《汉书》载,朔方郡县有十,即三封、朔方、修都、临河、呼遒、麻浑、渠搜、沃野、广牧、临戎。而十县之中,麻浑县即今磴口县内的土城子(保尔浩特)。古城——汉麻浑县遗址废墟。这座古城是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前 127 年)修建的。麻浑县城,是一座很小的,形状不规则的土城,而外城比内城大约有三倍之大,旧墙轮廓尚在。从土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垣设计和城内遗物看,都显示出当时是一座重要的城垣。但土城子是否麻浑县城旧址,因手中缺乏汉武帝时代的地图,有待于再考证。

阿贵庙与阿拉善旗磴口地区的喇嘛教

白生华

一、喇嘛庙与山洞

喇嘛教主要教派有：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等。其中宁玛派(红教)由僧人索穹巴、卓浦巴等创立，他们奉8世纪到西藏传播密教的古印度僧人莲花生为祖师，该派喇嘛戴红帽，故称“红教”。红教派除信守黄教的信条以外，还有其独特的规定：(1)用酒、肉、葱三种祀斋供神，缺一不可。(2)没有受过“真言”戒者不能诵咒祭神。(3)信守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将法术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吃肉喝酒娶妻等。阿贵庙属红教，除正殿中供奉释迦牟尼外在阿贵洞中供奉莲花生，奉莲花生为祖师，奉“马头金刚”为护法神。

莲花生，印度叫：巴达玛·仲尼。西藏叫“巴达玛·桑布巴。蒙古叫：洛本钦布。汉叫：莲花生，也叫：乌金大师。古印度僧人，乌丈那国(今巴基斯坦境内)人。娶云琴道尔吉帕格木为妻。据载：公元747年因吐蕃赞普犀松德赞之请夫妻到西藏传播密教，公元802年回国。到藏后同寂护2人用3年时间建了一座雄伟寺院——桑耶寺，该寺保存至今。莲花生曾去洛阳伽南和五台山，返回途中于宝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编者注：774年11月3日)来到阿贵庙，当时这里没有庙宇，只有山洞，相传这五个洞中居住着一母之五个少女，即一母之五个杭瑞玛(仙女)。她们在这五个洞里分别于九月二十五日招待了莲花生及其随行人员。以后将每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定位迎



接莲花生祭神日。次年即宝应十年七月初十日(编者注:775年8月10日)莲花生一行离开了阿贵洞,此时四周的民众集会欢送莲花生等人。于是七月初十、九月二十五日两次大型庙会就从这时开始的。相传莲花生在此居住9个多月的时间里,把这里的妖魔鬼怪全部利用法术镇压下去,并亲手塑有二尺五寸高的莲花生像。并说:“你们每每见到这尊塑像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切妖魔鬼怪不会再伤害生灵了”。给当地民众消灾除了难。莲花生等在接受杭瑞玛们的欢送时还说:“我们西方有个‘乌日斤杭瑞’地区,你们这个阿贵可叫‘亚吉拉,杭瑞玛阿贵’”。杭瑞玛阿贵也从此得名。当时在这山沟里还居住着叫:柯宝日·达日克的老两口,有个儿子叫:洛本赞达日。莲花生对他说:“接他为徒弟,将密教传授给他,并要他传递下去”。洛本赞达日接受了这个旨意。但此教必须“真实”言教,学到咒术才能为百姓除害,于是洛本赞达日历经千辛万苦到印度萨齐巴地方学经,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受授了法术,学到了秘咒,回到阿贵庙后成了第一个传徒接代的师傅。

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经过600百多年的盛传而阿贵庙则传教1200多年,尤其在清朝统治阶级的扶植下,逐渐变成蒙古全民族信仰的宗教了,在当时盛兴喇嘛教的潮流中阿拉善旗磴口地区的广大牧区当然不会例外的,这里有闻名遐迩的阿贵庙和阿贵庙所辖的小庙。

儿驼庙:位于敖伦布鲁格苏木所在地西南边,相传嘉庆三年(1798年)就开始宗教活动。这里的峭壁上远看有峰儿驼向南站立,到冬季骆驼发青的季节,此驼嘴上也有吐有白沫很像在发潮,据说:母驼在阿尔巴斯山(海勃湾山)上向北站立,隔黄河相望。这个地区骆驼很多,是这两峰神驼繁衍下来的。所以每年到此地祭一次儿驼,儿驼近看时是石缝。这里有十多间房和一个十间左右的小殿,平时住有四五个喇嘛,念经时也有十多个喇嘛。1956年以后拆毁。从此没有什么宗教活动了。

固实庙:始建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开始叫:巴尔达呼庙,原位于四坝乡,海子沿村的南边,现在的海子沿五社处,地名至今叫召滩。此地的海子蒙名叫巴尔达呼淖尔,为祭祀这个海子建的庙,故名叫巴尔达呼庙,

1921年迁到温它亥坑南,即现在的巴音套海农场西南,搬迁改名固实庙,即国师庙。有喇嘛100多人,殿堂两座,400多间房子,没有活佛,解放初同儿驼庙合并,1958年后拆毁。磴口县土改前,有庙地4000余亩,收入供庙上使用。

麻尼图庙:始建不详。1927年合并于儿驼庙,位于现在的四坝乡红旗村所在地,现在的麻米图渠即此名而叫的,红旗村西坑里有个敖包就是此庙遗留下来的,1969年塌毁,该庙原有喇嘛20多人,一座经殿,搬迁时拆毁。

苏布日格庙:从查苏山沟向里进十多里有一“红石柱”形似塔,故叫苏布日格(即:塔)。在这塔石顶端曾有过一块古藏文石碑,谁取走不详。《红塔的历史沿革》一书中有详细记载。此庙同阿贵庙同一时期建成,是阿贵庙的下属宗庙。1958年后拆毁,当时这里有经殿两座,20多名喇嘛。

阿贵庙:即宗乘寺。位于阴山山脉西部,额勒斯太沟和格日敖包两山口中,有阿贵山口,山沟正中有座蒙古包形状的宝心石,向里弯弯曲曲行程8公里处有占地1000亩左右的雄伟壮丽而结构紧凑的藏式建筑群,这就是享有盛名的阿贵庙,据载,唐朝年间就开始有了藏传密教活动,截至现在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殿堂庙宇始建于清朝嘉庆三年(1798年)。后由清廷理藩院改名为宗乘寺,并给过“满、蒙、藏、汉”四种文字雕刻的“宗乘寺”字样大匾一块。从此宗乘寺被列为阿拉善旗八大寺庙之一。最盛时期喇嘛有400多人,解放初有喇嘛240人。阿贵庙以自然形成的五个奇观山洞驰名中外,其中最壮观的还数阿贵洞(阿贵即山洞)。

嘉庆三年(1798年)也就是阿贵庙第五代活佛韩钦·班迪达在位时,由外蒙古莫日更王旗的查汗乌拉庙的第五代诺颜呼图克图(活佛),名叫阿格旺·洛布生丹津·拉布生,他乘给阿拉善旗第四代王爷旺沁班巴尔念经之机向他索地建庙,王爷说:我旗东北边界有个叫“哈入纳阿贵”,此地可让你建庙。当时诺颜呼图克图来到山洞查看地形,并决定在此建庙。此人领导建庙事宜很认真,住了两年后才回外蒙古。过两年后又来观看建庙情况,并带来《甘珠日经》,即藏文大藏经,此经包含1108种,108部;还有跳鬼面具10



付、5尺高佛塔一尊,塑5尺高“莲花生”神像一尊,将神像安放在阿贵洞中央。从这以后施主大增,山沟里建筑群四起,一步步繁华起来了。

阿贵诸洞在莲花生来此时叫“杭瑞玛”阿贵(吉祥天女窟),后来由于人们口音的关系,演变成“哈入纳”阿贵。嘉庆三年(1798年)始建庙时定藏名叫“拉西仁布·嘎定林”阿贵。清廷改为“宗乘寺”。

阿贵庙五大石窟。

阿贵洞 顺大殿后面宽大的台阶往上约300米处有一洞门,上写:大阿闍梨窟。阿贵闍梨即轨范师。洞内约200平方米,正中供主神“莲花生”塑像。红教派喇嘛们设坛、供养、诵咒、灌顶(传法仪式)就在这里举行。蒙古人叫:洛本钦布阿贵。

扎嘎日生布窟 生神“上乐金刚”。藏传佛教密宗本尊神,其像为双尊,上乐金刚有三面脸,每脸三目,十二臂,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余臂持物,裸体,下持骷髅珞婴,双足踏人,塑像为上乐金刚与明妃金刚亥母相抱形。

达日额柯窟 主神双尊,藏传佛教女神,是观音化身的救苦救难本尊。该洞有白救度佛母和绿救度佛母塑像,以上两尊为藏王松赞干布所取的两位公主。白救度佛母是尼泊尔国王的犀尊公主,绿救度佛母是唐太宗的文成公主。度母以颜色区分,现为二十一相,以白、绿度母最为常见。

额尔等珠窟 主神,迦楼罗神,即吉祥天女窟,是天龙八部之一,是守护佛教的第六天神迦楼罗(金翅鸟),藏传佛教以其为财神,印度教的命运、财富、美丽女神,有“大公德”于众,也叫“公德天”。

桑布嘎日布窟 主神为护法神,即伽南神,守护寺院神的通称,共有十八神。

阿贵庙林茂山险,百鸟和鸣、洞窟奇特、巧夺天工,环境十分幽静。五大窟中阿贵洞最为出名,因莲花生曾在此讲法,做过法场。如前文所说,此地有妖魔伤害生灵,闹得民不聊生,后来由莲花生使用佛法,神灵把妖魔鬼怪赶回来镇压在深洞里,为了使妖魔永世不得显出,洞口上塑了莲花生神像,



由于莲花生用法降妖,诸神也频繁活动于各洞,度母洞前光滑岩石上有一个女人脚印,洪洋洞下有一个男人左脚踏下的脚印。相传是仙女及莲花生神在此隐居、修炼、降妖时行走的圣迹。

阿贵庙念经供养祭祀时必须要有四个以上经过口授“真言”密戒的喇嘛才能诵法,否则都不得念此经文。祭品中必有酒、肉、葱之类,诵经结束时酒可以当堂分喝,而黄教则不允许在殿堂中喝酒和用酒肉祭品的,所以阿贵庙是内蒙红教派保留下来的唯一活动场所。现已被内蒙古自治区列为十二个重点寺庙之一,本庙的史料曾被日本人偷去部分,剩余部分在“文革”中烧毁一空。

社会上对洪洋洞传说种种,高山洞穴,闻名中外,洞深莫测,引人入胜,当你登上洪羊洞以后自然会感到另是一种境界。顺大沟下行 500 米左右处的东山腰间有条崎岖盘山小道,从羊肠小道盘旋而上,真如登“天梯”,行约 400 多米处在陡峭的壁间有一山洞口,便是洪洋洞。即迦楼罗天神的供养处。据传这里有杨业存尸、孟良盗骨,等等许多传说。一进洞口几米处分上下两层,上进下出,进里面下个台阶,据传,阶下有深洞,有大石板盖着,可是没有人考证过究竟有多深,“通藏”是对深洞的夸大。人从石盖上过去再行 20 多米才能走到大洞的顶端,但里边漆黑,人不掌灯引路是走不成的,洞里有“红土”,也叫红光土。信徒们往往取而治病,蒙医常用的药材之一。

阿贵庙是有独特景色的山林寺庙。从北向南流向的两条弯曲山沟,将这座名山切成三块,山谷汇集成一的三角点上,按山形布局的古刹群。正中是九九八十一间的“大雄宝殿”,主供释迦牟尼,上有“宗乘寺”大匾。左右有陪殿,小山沟西侧是红教派本尊达木仁养生殿,即:马头金刚殿。马头金刚神为宁玛派最崇拜,所以香火最盛。是慈悲观音的化身,又传:妖魔被莲花生征服后变为他的守护神。东西两沟间有大吉沙(招待所)十三处。喇嘛住房千余间,东沟有古岩画群,西沟有文冠果林(木瓜)。高入云端的群峰重峦叠嶂。顺沟的山榆林和坡上的奇花异草形成一片葱绿,十分清静,真是:“山间小屋石作邻,幽间修行仙留地”。



这里隆冬赏雪,阳春观花,仲夏清凉,秋叶换装,四季风光各具特色,尤其是洪洋洞以其盛名招引中外香客游人,成群结队的在这里同结香火因缘,成了磴口名胜之一。

二、阿贵庙及其宗教事务

阿贵庙的宗教活动自莲花生来此地接受第一个信徒洛本赞达日开始的,即公元775年。从洛本赞达日师傅到最后的活佛阿格旺·西达日布·旦比尼玛止共二十五代传承弟子,他们是:

第一代师傅:洛本赞达日。

第二代弟子:依西嘎拉生丹津。

第三代弟子:洛布生丹津。

第四代弟子:洛布生丹比拉。

第五代弟子:朝阳那木达格。

第六代弟子:冈齐格·旦比尼玛。

第七代弟子:依西道布敦。

第八代弟子:苏那木尼玛。

第九代弟子:苏那木扎木苏。

第十代弟子:嘎拉生旦金。

第十一代弟子:道布敦尼玛。

第十二代弟子:阿格旺旦金。

第十三代弟子:洛布生·西达日布。

第十四代弟子:洛布生·冈齐格。

第十五代弟子:玛日布·劳金·日·劳扎布

第十六代弟子:旦比道尔吉·宝地·沙地

第十七代弟子:彭斯格·玛仁巴。

第十八代弟子:查汗地扬齐。

从查汗地杨齐1694年死后,开始“转世相承”的方法,他的第一代活佛于1654年接来5岁小孩,阿贵庙从此开始活佛转世制度。查汗地扬齐的第

一代活佛也就是洛布赞达日师傅的第十九代弟子。

第一代转世活佛：依西道布敦·老来扎木苏。

第二代转世活佛：洛布生·却吉·扎拉生。

第三代转世活佛：阿格旺·彭斯格。

第四代转世活佛：旦比扎拉生。

第五代转世活佛：韩钦·班地达。

第六代转世活佛：阿格旺·冈齐格·扎拉生。

第七代转世活佛：阿格旺·西达日布·旦比尼玛。

阿贵庙在寺院管理上同其他寺庙一样，有一定的僧职人员即管理权限。

葛根：转世大活佛，是寺庙的最高首脑。经金瓶掣签，上呈照准后举行座床大典，才能成葛根活佛喇嘛。

沙布仁喇嘛，仅次于葛根的转世活佛，同样经过上述手续，中小寺庙的首脑。

(一)大喇嘛(一般由活佛兼任)掌管寺庙佛事以外的一切政务，需经旗级以上寺庙任命，或王爷府任命。是终生职。

(二)德木齐(俗称二喇嘛)，管理全庙行政事物，有处罚权，一般任期3年。

(三)格斯贵(俗称三喇嘛)，掌堂师，管理殿堂内僧众的纪律，手持方形空心铁棒或木棒，维持秩序，违寺规者不论何人他都有权处罚。任期3年。

以上3人称为国之三喇嘛，是处理一切事物时最有权威的3个喇嘛。

(四)地博：全庙殿堂内诸佛事的总管。

(五)苏格钦、温则德：念什么经文等的管理者。

(六)吉沙德木齐：某一吉沙(招待所)内日常事务的管家。

(七)苏格钦、格斯贵：管理佛事活动中的秩序者。

(八)苏格钦、格亦格：格斯贵助手、执法者，格亦格下有两个查巴瑞，具体办事员。

除以上8个主要人物外，再聘请德高望重的12人共为20人组成苏贡队(即寺庙管理委员会)总揽一切重大事务，大事要事召开全体会议裁决。



对本庙喇嘛行使吊打等各种封建刑法权。

丹生达:会计长,下有毕齐格齐2人,即会计2人,共3人总揽收支等与账目有关的诸事。

高尼尔:某一殿堂内佛事活动及殿堂管理者。

拉僧喇嘛1人。

拉僧格斯贵1人。

拉僧温则达1人。

以上3人为陪殿,拉僧殿内念经时管理诸佛事活动人员。

温则德:领经者。

皂道尼尔:管钱的。

竹木扎:念经值日的。

尼日巴:保管员。

巴翁:活佛侍卫者,俗称:管家。

格伦布:管灯油的。

宁沙钦:共6人,其中两个大号手,两个喇叭手,两个吹法螺手,给神奏乐晚安,早起的吹号手。

夹木:做饭的,炊事员。

寺庙都有几百人或几千人一起做饭的大锅,能盛几千斤粮、肉、油、糖等一次放进锅内,将几块大锅盖对好盖紧封起来,锅底放好早准备的准确的一炉烧柴,点燃后封炉口、锁门、第二天用饭时经管理人员检验封条后开门开锅,这时已成一锅风味的硬粥,向施主们和喇嘛们散食。吃后洗锅时锅内放几个梯子,用大扫帚几个人同时刷锅才能洗净。

受戒仪式:

阿贵庙除活佛更替时举行隆重的座床仪式外,每年招收沙比(徒弟)时还要举行剃度灌顶受戒仪式。剃去头发接受戒教的一种仪式。剃度后的徒弟叫班地。佛教宣称剃发出家是度越生死之因,灌顶是佛教密宗的仪式,初入佛门必须经师傅用水灌顶,并接受师傅授予的藏密戒律。有五戒、八戒



等,一般受给 20 岁以下者,这叫格斯宁戒,即勤策男,也叫沙弥。

格斯勒戒:受于 20 岁以上者,即比丘戒,阿贵庙受以八戒: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眠坐高广华丽床座。(七)不涂饰香鬘及歌舞视听。(八)不食非时食等斋戒条律。

格隆戒:受大戒、具足戒、戒品具足,品类很高的托体僧,必须遵守二百五十三条戒律,佛教认为这样的戒条是完全充足的,故名:“具足戒”,阿贵庙同样受此戒,但为数不多。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喇嘛教徒进行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遵守法纪的教育,从而团结了大多数喇嘛及信教群众。历来靠施舍过日子的寄生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变,绝大多数青壮年已经摆脱宗教的种种束缚,有的还俗成了家,信教不信教都有了真正的自由。

1984 年 12 月



敖包至尊巴音筭布尔

李万钰

巴音筭布尔敖包,位于广宗寺(南寺)东南的巴音筭布尔主峰,是阿拉善数以百计的敖包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巴音筭布尔敖包是全内蒙古海拔最高的敖包。巍峨壮观,美丽峻岫的巴音筭布尔,以它美丽的传说,丰厚的文化,奠定了在阿拉善众多敖包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阿拉善的影响最大,规格也最高,是敖包中的尊贵,历来是阿拉善蒙古族民众祭祀的主要敖包之一。

关于巴音筭布尔敖包的历史有三种说法:一是始建于阿拉善第二代王爷阿宝时期(1709年~1739年)。二是罗布桑多尔吉王爷时期(1739年~1783年)。三是建于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时期(乾隆十一年后)。然而,遍查手头汉文资料,关于巴音筭布尔敖包的建立时间,并未见有翔实记载。从广宗寺的建寺史料可见,比较准确的时间,应该是广宗寺的始祖阿旺多吉从西藏回到阿拉善,广宗寺建成后才建立的敖包,距今260多年。

盛夏7月,阿拉善大地骄阳似火,一年一度的祭敖包活动又将在巴音筭布尔举行。也许是被贺兰山那沁心的凉爽所吸引,我们满怀兴致参加了这次规模很大的群众性自发活动。前一天晚上,我们便住宿在寺庙,因早晨最晚也要凌晨4点行动,否则就赶不上活动的正点。住在寺庙,正好创造了采访条件。

据广宗寺席列喇嘛道尔吉介绍,巴音筭布尔敖包是依附广宗寺才建立

起来的,要了解敖包先要大概了解寺庙的情况。当年,德丁格根(六世达赖在阿拉善的尊称,意为上上活佛)选定赛希拉克郭勒地方作为广宗寺的庙址,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据《仓央嘉措秘史》(西藏人民出版社)记载:六世达赖喇嘛在阿拉善生活了近30年,除在甘肃,青海等地的十几座寺庙讲学传教外,大部分时间在阿拉善左旗南部的昭化寺度过(现阿拉善左旗头道湖庙)。一次,他看到贺兰山中的赛希勒格(现南寺沟)地方经常祥云缭绕,瑞气升腾,便前往观看。刚进山沟便遇到两个人,“问其名:一曰沙格达尔,一曰达木丁。是藏语金刚手和马首金刚两位尊者的名字,心想是两个尊者以人的模样来给指点建寺之所,六世达赖通过狭长的入口,来到赛希勒格,观其四周,只见周围群山呈八徽,地如八瓣莲花,天似八部金轮,犹如走进自己常年修习的本尊胜乐金刚坛城一般。心想如此瑞兆圆满之所,再也难以找到,就选定此处作为他建造寺庙,弘法利生的基地和自己的归宿点”(贾拉森《缘起南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南寺沟内,山形貌似莲花盛开,整个山体呈莲花叶片状环绕四周。山涧水流潺潺,终年不断,山后松柏茂密,层峦叠嶂,一如仙境。达赖喇嘛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梦寐早日把寺庙建起来。然而,六世达赖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已圆寂。他去世后,他的心传弟子诺门汗喇嘛——阿旺多吉,依据达赖的遗愿,建起了广宗寺。

在寺庙建筑群中,最大的庙是格根殿,又名黄楼寺,这是专门为达赖喇嘛修建的。寺庙建成后,全体僧众在诺门汗喇嘛的率领下,从嘉尔格勒赛汗的门吉林寺,将六世达赖的肉身迎请到广宗寺,安放在黄楼寺灵塔内。据说诺门汗喇嘛本是第思·桑结嘉措转世,两岁时就与佛结缘,被六世达赖纳为心传弟子。他多次入藏做善事,接受七世达赖的封号,因此被尊为广宗寺的第一代活佛,他的第六世就是现在的喇嘛坦。

广宗寺定址建寺,始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破土动工,完成于乾隆二十二年,主要建筑和殿院竣工,历时11年之久。巴音笋布尔山峰,是南寺沟的



最高峰,象征阿拉善神的至高无上。寺庙建成前后,民众便在此祭地方神。

巴音筭布尔敖包,在历史上以广宗寺举办的祭祀活动为中心。他们把只有王爷、喇嘛坦出席的祭祀称为“小祭”,把民众和王爷、活佛都参加的祭祀叫“大祭”。小祭又分两次:每年农历正月初三,是广宗寺的庙祭,全体僧众内部祭祀,喇嘛坦参加。农历三月初三,是由庙仓组织的祭祀(庙仓是寺庙的内设机构,数量依寺庙规模而定,广宗寺有六个庙仓),王府衙门要来参加,有时王爷还要亲自来祭。敖包就在寺庙北面的小山上,传说是达赖和阿拉善神相遇的地方,寺庙的僧人在此筑起敖包以纪念。大祭则是农历六月初三,在巴音筭布尔敖包举行,也是阿拉善地区规模最大的祭敖包活动。所说规模最大不光是参加人数多,而且仪式内容也复杂繁多,寺庙和地方各界都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

巴音筭布尔山峰在广宗寺东南约 15 公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登顶也需 5 小时才能到达。山高路险,陡峭曲折,森林茂密,崎岖难行。现今已有公路通到查斯台乌拉(汉语,雪岭子)山脚下,大大方便了祭祀民众。人们坐车先到这里,然后步行上山,能省去很大一段路程。

在寺庙休息了一夜,凌晨三四点钟,数以百计的朝拜者便向巴音筭布尔进发。我们跟随着涌动的人群,开始向松林深处攀爬,一向寂静的山沟顿时沸腾起来。

经过 3 小时的攀登,我们来到天然驿站牦牛塘。这里山呈平顶,地势豁然开阔。牧草茂盛,凉风习习,让人心旷神怡。在森林中爬行了几小时的人,到这里都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需要进食补水,再续精力。大家围坐在山顶的青草地上,任清风吹拂汗湿的衣衫,享受大自然的爱抚。

牦牛塘后面的山路变成了羊肠小道,大部分地段只许一人通过,很难超越前人,大家只能首尾相接,一字长蛇。

此时,云雾已环绕脚下,沟深万丈让人目眩,山风吹过不禁使人寒栗。距顶峰约 400 米的地方,坡度已超过 70 度,几乎快要垂直了。雾气升腾,脚下湿滑,攀爬队伍中手足并用者已不是少数。随海拔增高缺氧,我们呼吸困

难,心跳加速,除不停的大口喘气外,唯一的动作就是不断擦去流淌的汗水,每进一步都十分困难。

也许这正是巴音笋布尔敖包的雄伟和庄严所在吧。难怪它在人们的心目中那样圣洁和高尚。置身峰顶下抬头向天,敖包巍峨屹立天际,崇敬之意油然而生。

阿拉善境内大小敖包数以百计,但王府祭祀的敖包只有4座,分别是巴音笋布尔敖包,巴音乌拉敖包,紫泥湖敖包,嘉尔嘎勒赛汗敖包。自1746年巴音笋布尔敖包建立后,王府的祭敖包活动就大多在这里举行。王府祭敖包,一般都是王爷亲自去,如遇特殊情况王爷无法参加的,才委派专人做代表,贡送祭品,参加祭祀活动。由于没有翔实资料考证,无法准确统计王府祭敖包的次数,老喇嘛都说王爷参加的肯定有几十次之多。广宗寺的庙史和庙帐有多处记录,明载王府所捐银两数目。此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近几年巴音笋布尔恢复大祭以来,祭众人数以数千之计,不时还有地方政府官员参加。随祭祀规模逐年增大,同时吸引了许多经商和观光旅游的人群,组织者还增加了摔跤比赛等内容,使祭敖包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更加多样丰富。

巴音笋布尔敖包的祭祀活动,由广宗寺的“祭司”(音译,汉语称“庙仓”)负责主持操办。庙仓是专门负责寺庙内部杂项事务的机构,根据寺庙规模大小,内部事务的多少设立若干庙仓,其职能相当于现在机关的科室。祭敖包时,庙仓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有的搭建帐篷,接待牧民,安排食宿;有的制作“巴灵”(一种供奉在敖包上的祭品),摆放祭品,拴绑祭众送来的哈达和“达尔茨格”(音译)。庙仓在整个活动中起组织和核心作用,除制作巴灵,负责祭众外,还有一项任务是念经。

在祭祀活动中,制作巴灵是首先要进行的一项工作。祭祀活动一般在上午十点左右开始,制作巴灵的喇嘛必须提前到达准备。由于巴音笋布尔敖包地势险峻,登顶费时。因此,制作巴灵的喇嘛前一天晚上就要离开寺庙上山,当晚住宿山顶。祭祀活动开始前,必须要把巴灵制作完成,摆放在敖包上,祭众上山后可直接开始焚香祭拜。



巴灵共分 10 种,表示巴音筭布尔敖包所供奉的 10 个神位。各个神位前摆放的巴灵,形状和数量都不相同,但坯料是一样的。配制坯料的原料主要是糌粑、酥油,配加五谷杂粮面、珍珠宝石粉以及檀香、灵芝等 13 种药材。把这些原料用鲜奶、酥油、冰糖汁调和成能捏成形的面团。所用原料必须是白色的,做成的巴灵也不加任何颜色。面团揉制好以后,还要捏形、刻花、雕花,在表面刷上酥油,然后呈放于贡盘内,供奉于敖包之上。

各种巴灵合计 60 个,数量最多的是“吾宁”巴灵(译音下同),有 21 个;“达利夫”巴灵 9 个;“麻沁”巴灵 13 个;给阿拉善神做的巴灵是 9 个。另外,还有“希布德格”、“塔本罕尼白哈五王”、“大神灵”、“达目江”“泽木勒”和德丁格根的神位。巴灵的含义不是单纯的供品,有的用于敬神,有的用来驱邪,还有的是把人的灾难厄运带走,把平安吉祥送来。

在供献巴灵的同时,摆放在敖包上的还有香烛、水碗、酥油灯、白酒、水果、奶食品、羊乌叉等。在已经点燃的香炉中撒上用柏树枝干燥后制成的粉末,此时,敖包上香烟缭绕,鼓号齐奏,“咚”声大作(用海螺做的号),经声阵阵,把所有祭祀民众的意念推向最高境界。

此时此刻,一切杂念都抛开了。虔诚向佛是敖包给人们营造的由衷。

巴音筭布尔敖包的经文很有特色,专门有一道念给“阿拉善神”的经,叫《塔本嘎斯特》经。这道经在阿拉善其他敖包都没有,唯独巴音筭布尔敖包有供奉地方神的神位。诵经仪式开始后,众喇嘛分坐在帐篷两侧,敲击鼓镲,分段吟诵。经文按神位的顺序逐个吟诵,每个神位的经文都不相同。分为《吾宁》《达利夫》《麻沁》,一个神位的经念完后,中间要穿插一段《达特哈勒》,接下来为另一位神念。此外,还有《刚布》《全勒吉》《哈目》《塔本罕》等不设神位的经。祭巴音筭布尔敖包,有一个很务实的内容——求雨。如此之多的经文最主要的是念给阿拉善神及广宗寺活佛的《德尔吉斯金》和《额日沁满达》,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

祭敖包是一项十分庄严的活动,人们怀着极其崇拜的心情,绝对体现着无与伦比的神圣,表现着祭祀者的衷心和虔诚。在神的面前生命是平等

的,似乎在突然间,人类的本质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人回到之初,性本来和善。敖包前的短暂能否唤回现实中的长久?

祭拜者开始把“桑”撒在香炉内,把各自带来的祭品摆放在敖包上,把酒、奶、酥油洒在神位前和敖包上,把从山下带来的石头垒砌在敖包上,把“开茂勒”抛撒空中,把圣洁的哈达和“达尔茨格”拴在木棍插上敖包,把凡是能表示心意的物品(也有钞票)塞进敖包四周的石缝里……民众的祭祀大多表达的是自己的美好祝愿,他们面向神位双手合一,双目微闭,心中默念,向神祷告。基本都是风调雨顺,祛病消灾,五畜兴旺,平安健康,幸福长寿等。

其实,我并不认为这完全是愿望,同时也是一种心灵净化后的自我激励。如果一个人能在这种向往美好的心境的驱动下得以持久,追求真善美就能变成行动。再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地,自觉地去实现这种愿望,持久的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做善事而不做恶事,那样一种人人都主动参加,共同创造的社会谐景谁能描绘?真是佛法无边,功德无量。

祭祀者手端白酒,鲜奶,酥油,围着敖包顺时针方向转圈,不停地向空中,向敖包主体祭撒。人们首尾相接,围转成了一个大圆。这个圆包含了人们圆了梦想,圆了意愿。在响彻云霄的祝赞歌声中,主祭活动接近尾声了。在新的一年里,他们各自怀着祝愿和期盼,将用自己的实际去圆追求美好生活之梦。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发展史。敖包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已成为蒙古族祭祀,信仰,寄托美好愿景的标志之一。在不同文化共同繁荣的今天,敖包文化的内涵在不断丰富。虽然敖包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也有深刻的人文内容。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加深民族感情,密切民族关系都有重要作用。

年长者说:巴音筭布尔是阿拉善神的象征,它能给草原带来吉祥。年轻人说:巴音筭布尔就是人生的理想。它的神圣和崇高,是年轻人永远的追求。

我们心中的巴音筭布尔,愿你把吉祥撒遍阿拉善大地,祝愿你香火旺盛,精神得到永续和光扬。



伊斯兰教在阿拉善旗传播发展概况

辛文秀 马怀诚

一、伊斯兰教传入阿拉善旗的经过

伊斯兰教是在民国初年传入阿拉善旗的,到现在已有近 80 年的历史,阿拉善旗原来并没有回教居民,清朝时代只有回教商人来阿拉善旗巴彦浩特经商。他们主要来自宁夏的银川、同心、贺兰、平罗、黄渠桥一带地方。来阿拉善旗的回民主要是拉骆驼搞运输业,在巴彦浩特镇经营旅店业,开设饭馆,贩卖牲畜等,也有在牧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年长日久,在巴彦浩特定居者日众,为了过宗教生活,举行礼拜,就必须建立清真寺。

巴彦浩特最早的清真寺,位于三道桥南端原万盛店内,这个店是同心县回民马金虎开的,专门接待回民旅客,三道桥北还有一家汉民开设的旅店,店主人姓徐,因面麻,人都叫徐麻子店,也接待回民旅客。店门南边有一汉民郝四虎,开设一个清真饭馆,接待来定远营的回民商旅,这个郝四虎子虽是汉民,但他熟悉回教的生活习惯,供应的食品都是按照真清教规制作。很合回民口味,因而生意兴隆。有一天郝家馆子来了一位平罗县的顾客,名叫马魁拉,是一位伊斯兰教的阿訇,是来定远营经商的。在郝四虎子饭馆吃饭时,与郝四虎子谈及来定远营经商的回民日渐增多,而回教规定肉食必须由阿訇宰杀才能吃,郝四虎子便请马魁拉阿訇留在定远营,为清真饭馆宰杀牲畜,以遵守教规,发展营业。此时的马魁拉阿訇因经商亏本,不能返回平罗,曾在三道桥南路东的义盛店佣工。因此便留在定远营,这便是定远

营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教长。

那时由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发生战争。阿拉善亲王忠于清朝皇帝,参与了镇压回民起义战争。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曾率众攻打阿拉善旗,杀伤了很多蒙古人及喇嘛,占领了南寺,围攻定远营,曾攻入西花园王府,经过多次战斗,白彦虎战败退走。由于这种原因,阿拉善旗王爷及蒙古人,对回民有些不信任,不准回民在阿拉善境内居留。但在实际生活中,蒙古牧民是离不开商人的。畜产品的出售,日常生活生产用品的购入,都要经过商贩才能满足需要。因而,回汉商民,与阿拉善地区的往来,是旗衙门禁止不住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交往日渐增多,因此,回民在定远营定居的逐年增加。到民国初年,定远营市内的回民约有10多户。为了过宗教生活,需要有个做礼拜的场所。便由马金虎、马魁拉等人提出建立礼拜寺。因怕旗政府反对,不准建寺,他们采取隐蔽办法,秘密在万盛店内腾出一间房子,略加修理,作为穆斯林的礼拜堂。这是定远营最早的清真寺,也就是现在巴彦浩特下寺的前身。

清朝时期阿拉善旗蒙古族与回族之间的关系不和,是由各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到了清末,由于回教中的官僚马福祥和阿拉善亲王塔旺布里甲拉,结为金兰之好,马福祥出任宁夏护军使,双方公私交往频繁,从而改变了蒙古人对回民的片面态度。蒙回关系渐趋融洽。这是伊斯兰教得以在定远营站住脚的一个根本因素,以往对回民的戒心和不信任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不但前来经商者增多,定居者也在逐年增多。到民国18年(1929年),定远营的回民已有50多户。原有的礼拜寺已不敷应用。便于民国20年(1931年),将原来一间房子的礼拜寺,加以扩大,在万盛店院内,正式建立起一座清真寺,有房屋26间,能容纳400人做礼拜。并设了净身沐浴的澡堂,也叫水房子,内部设有汤瓶、吊罐,设施齐全,这就使定远营清真寺的规模日臻完善。于民国18年(1929年),请了开学阿訇,吸收了20多名学生,向青年们传授经文,培养了很多“满拉”等宗教职业者。

马魁拉阿訇无常后,继任是金万明阿訇,人称哈哲爷,以后的几位阿訇



是,马牙、马才、诚万贞、王穆穆,最后传至现在的教长杨生茂阿訇。

伊斯兰教在阿拉善旗大发展是在民国20年(1931年),马鸿逵当宁夏省主席后开始的。马鸿逵统治宁夏后,连年征兵,征粮、征税,残酷压榨,使宁夏的回汉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为了避马鸿逵无止境的剥削压榨,宁夏同心、惠农、平罗、贺兰、银川等地的回民大批移入定远营。到抗日战争时期,定远营市内定居的回民,已达400余户。他们大都从事运输业,开旅店、开饭馆,搞行商、牧养牲畜。那时定远营街上有回民旅店7家,回民饭馆7家,回民商号5家。

由于穆斯林人口不断增加和教派的不同,万盛店内的一座清真寺,已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民国30年(1941年),由丁义昌、马殿礼等人,在南梁顶东沿,选定地点,增建一座清真寺,请来的阿訇是王孟德。这座寺有房屋30间,能容纳600多人聚礼。这就是现在俗称的上寺。现在的掌教阿訇是王维智。

对土地问题,阿拉善旗政府只有规定,凡外来的回汉人,不能有土地所有权、如要购置土地,建造旁屋者,必须随旗,就是入旗籍当蒙民,新阿訇丁义昌办了随旗手续,成了蒙民,这才申请了土地,建立了上寺,并请领了坟地。由于回民人口继续增加,到现在为止,牧区已建立了两座寺,一是腰坝镇清真寺,一是吉兰泰清真寺,腰坝清真寺的阿訇是马生礼,吉兰泰清真寺的阿訇姓名不祥,古拉本煤矿也建立起一座回民教坊。

现在阿拉善旗地区的伊斯兰教的派别是虎夫耶和伊赫瓦尼派。下寺为虎夫耶,上寺为伊赫瓦尼。

二、阿拉善旗的蒙古回回

在阿拉善旗的蒙古族牧民中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穆斯林。他们散居于阿拉善旗北部的吉兰泰、磴口、沙金套海、巴音套海、哈腾套海,哈鲁乃、科布尔、红古尔玉林等地,这部分蒙古穆斯林在阿拉善旗形成的历史最早,在科布尔和吉兰泰曾建有两座清真教坊,设有伊玛目,领导教民过宗教生活,他们的语言、文字都使用蒙文蒙语,从事畜牧业生产,只是在宗

教信仰方面信奉伊斯兰教。

关于这部分蒙古族穆斯林的来历,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阿拉善旗第三代王爷罗卜藏多尔济随清军讨平新疆准噶尔部落叛乱时,抓来的俘虏。另一说是清乾隆年间,哈密的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克等穆斯林商人,来阿拉善旗经商,贩卖葡萄干等土特产品,而留居下来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切。笔者从阿拉善旗的历史档案中找到了可靠依据。据清光绪三年(1877)十月二十六日,宁夏将军库奇勒巴图鲁克致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的咨文中写明,这部分蒙古回回,确系阿拉善先王阿宝,于康熙年间从青海带领部众,迁移来阿拉善大草原时,随带来青海西宁一带的缠头回回100余人。先是在克卜尔滩,集中居住,游牧为生。至光绪年间已发展到近百户。这些蒙古回回,原来究竟是什么民族,已无从查考,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他们已属于蒙古民族了,然而其宗教信仰,却还是伊斯兰教。很久以前就在科布尔和吉兰泰建立了清真教坊,聘请伊玛目主持教务。于是在清朝时期,阿拉善旗就把他们编入丁口册内,和其他蒙民一样服兵役,能力强的人,都可在旗衙门担任官职。如解放前镇守阿拉善旗东部的马二里、杨富存、布图格齐等人,都是蒙古穆斯林中颇有名望的官员。

三、阿拉善旗伊斯兰教现状

阿拉善旗和平解放时,定运营的穆斯林,看到国民党政权与宁夏马鸿逵即将覆亡,都积极参加达理札雅所领导的和平起义。那时在骑兵保安总队任职的杨富存、马怀章、马目萨、杨殿华等都积极参加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

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正确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这两项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阿拉善旗的回族也同全国各少数民族一样,得到了翻身解放,首先在政治上得到了平等待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都选出一定比例的回族代表,在各级人民政府中都任命一定数目的回族人士担任领导职务,体现了各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当家作主的民



主权利。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这种友好团结,共同建设祖国的进程中,却遭到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极“左”路线的摧残,和其他喇嘛寺庙一样,清真寺也被破坏了,清真寺的房子被占去了,阿訇被批斗,游街示众。宗教活动陷入停顿状态。回民教众都不敢上寺做礼拜。许多年老信徒,也只能暗在家中做礼拜。宗教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光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了落实,阿拉善旗的伊斯兰教,获得了新生,落实政策时,首先退还了清真寺的房子,于1980年,国家宗教事务部门,拨款1.1万元,对清真寺进行扩建和维修。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应有的尊重,上下两寺都已整修一新,庄严肃穆,两寺都恢复了经文学校,现在下寺有学生数名,由杨生茂阿訇主讲,上寺有学生数名,由王维智阿訇主讲。

除经文学习和宗教知识的传授外,对普通科学文化知识等教育事业,也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旗人民政府已将巴镇第一小学改为回族小学,增加回族老师,提高了回族群众的科学文化和知识水平,大大地改变了回民文化落后的面貌。

写于1986年7月4日

寻访蒙古族穆斯林

李万钰

在阿拉善左旗东北部的广大地区,生活着一个独特民族群体,他们住蒙古包,穿蒙古袍,通用蒙古族语言文字,是地道的蒙古民族。但他们却有别于蒙古族对喇嘛教的信仰,而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不念喇嘛经,而念《古兰经》。这一族群被学者们称做“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穆斯林”,当地人称他们是“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

据有关史料记载:蒙古族穆斯林在阿拉善定居繁衍的年代久远。历史长河的沧桑巨变,改变了他们穆斯林祖先本来的生活环境,把他们融合到蒙古民族的大家庭。他们基本的生产生活习俗已完全蒙古化,唯一保留至今的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对安拉的虔诚。尽管他们是蒙古人,但穆斯林的民族特征始终较为完整的在传承。在蒙古族和回族的族群中,他们都没有被视为异族,而是和睦相处,水乳交融,各自的风俗习惯都能得到尊重。

近年来,对这一特殊群体深入调研的学者不乏其人,在国内相关媒体上发表了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学术和调研论文,有的则著书立说,使人们对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渊史有了基本了解。

一、历史来源

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在建国前,属阿拉善和硕特部落,居住在阿拉善草原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蒙古通史》介绍到的蒙古部落中,是唯一信仰伊斯兰教的。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他们怎样与蒙古族融为一体?这与



阿拉善的历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据《阿拉善盟文史》记载:阿拉善和硕特蒙古族是清卫拉特四个部落之一。广居于内蒙古西部和新疆、青海、甘肃部分地区,16世纪中后期(清顺治年间),这里民族矛盾尖锐,战乱四起,百姓不得安宁。到康熙年间,少数民族部落间纷争再突,准噶尔部落兼并了卫拉特其中三个部落后,势力强盛。他们勾结沙俄制造分裂,成为康熙大帝的心腹之患,清廷不得不派重兵驻守嘉峪关,已御外侵。时年,成吉思汗的后裔和罗理帅众1万余人围攻嘉峪关,势均力敌,久攻不下,进退艰难,故派轻信与康熙皇帝谈判和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根据和罗理的要求,同意其居住阿拉善草原,贺兰山西,龙首山以北。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又赏其“札萨克”印,将其部改编为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阿宝世袭王位,成为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二代扎萨克王爷。阿宝年轻力盛,才智过人,“早年就在御前行走”。在康熙、雍正二帝授权平定青海叛乱,抵御新疆入侵的战斗中屡建战功。雍正十年(1733年),清朝政府赏贺兰山西麓的“定远营”城(今巴彦浩特),世袭罔替。阿拉善和硕特旗王府从青海宝尔重克(原阿拉善和硕特旗府暂住地)迁回定远营,历经九代十王,直到全国解放。

在阿拉善和硕特旗建旗前,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区,因地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以北,古称漠北。历史上地广人稀,没有政权机关统辖,也很少有文字记载。随着阿拉善的这段历史变迁和政权建设,关于蒙古族穆斯林居住于阿拉善的历史渊源,开始有了文字记载。

蒙古族穆斯林学者安孟和先生所著《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蒙古族》一书中,考证蒙古族穆斯林的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1)元治元十七年(1280年)四平王阿南达的15万士兵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2)阿宝王爷从青海带来少数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赐居克伯尔地区(现敖龙布拉格,罕乌拉、巴音毛道等苏木一带)。(3)第三代王爷平息准噶尔叛乱后,从新疆带回200余信众。(4)由于各种原因,青海、宁夏、甘肃等地穆斯林来到阿拉善,入蒙古籍。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教授丁明俊在《中国穆斯林》撰文,进一步考证蒙古族穆斯林历史来源。重点调研探讨了四种观点:(1)阿拉善第三代王爷从新疆带回的200多名哈萨克、维吾尔人。(2)范长江认为的新疆哈密“缠头回回”一支。(3)元明时期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清朝初年迁居这里。(4)和罗理迁徙阿拉善时,由哈尔顾特依玛目和黄扬阿訇率领信徒随迁而来,居于沙金套海(即克伯尔,今敖龙布拉格、罕乌拉、巴音毛道苏木一带)。

在阿拉善和硕特旗建立之前,可供查阅的历史文字资料少之又少。这些史料说明,蒙古族穆斯林的发展是与阿拉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的。我们所推荐的这些重要观点都有据可查,至少这一族群的发展壮大是在阿拉善建旗之后。

1983年,以陈德淦先生为首的中国伊斯兰协会考察团,专程到克伯尔地区,调查了这些蒙古族穆斯林的情况,并在当年《中国建设》杂志阿拉伯文版第九期上载文:“据依玛目尤奴素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新疆哈密来的,也有从青海来的……”笔者有幸参与了考察团的部分活动。时隔20多年,我们在伊协考察团访问过的另一户牧民尤素福家,见到了女主人麦丽扎,遗憾的是尤素福已去世。麦丽扎今年也是八旬老人,但她健康矍铄,耳聪目明,而且很健谈。忆起20多年前的事她记忆犹新,她说:“当年北京来的人住在我家,问我们穆斯林的生活情况,还给我们讲了《古兰经》。邀请我的丈夫去北京参观,在清真寺礼拜。但是他1989年就过世了。”麦丽扎老人很善良,是地道的蒙古族,她也信仰伊斯兰教。丈夫去世后,她遵照遗愿,埋进了集体坟墓,她的子女们每年去上坟,请阿訇念经。我们看到她家的墙上挂着圣地麦加迪德清真寺全图。

这个家庭是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访问过的两代人,他们的家庭生活及变迁情况是蒙古族穆斯林在克伯尔地区繁衍生息的一个缩影。现在麦丽扎老人和她的两个女儿仍生活在敖龙布拉格苏木的查汗德日斯嘎查。现住巴彦浩特的斯琴高娃(经名阿西)是麦丽扎的四女儿,她的爱人



布音达来,也是蒙古族。她们1995年结婚,生育一个女儿,回忆起父亲,她们姐妹无不深念。她们一直生活在穆斯林之家,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宽厚、仁爱和孝道在她们身上充分体现。老父亲去世后按伊斯兰教规和习俗,埋葬在距家40多公里的阿尔苏公墓,她们请来阿訇,在家进行洗礼后送到阿尔苏,斯琴高娃未能参加父亲的葬礼,今天说起来,她仍忍不住流下眼泪。现在她每年都去上坟,时间是农历五月第二个主麻日。

二、服饰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按说这个时间并不是草原上最好的季节,但是欢聚在一起的蒙古族穆斯林一样给查汗德日斯草原带来了欢腾。2006年7月的第二个主麻日,我们来到了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区,敖龙布拉格苏木的查汗德日斯嘎查(苏木和嘎查是阿左旗牧区乡村政府的蒙语名称),负责举办蒙古族穆斯林生活习俗展示活动的谢巴特尔家。

谢巴特尔先生今年54岁,担任这个嘎查的支部书记10多年,现卸任在家放牧,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主动请缨举办这次活动,旨在抢救即将失传的一些蒙古族习俗和技艺,完善和准确穆斯林的风俗习惯,使这一独特群体的生活方式得以传承和光扬。在这次民俗展示会上,嘎查牧民组成的民俗服饰模特队十分抢眼。从3岁的孩子到70多岁的老人,共展示了30多套独具蒙古族穆斯林特色的各式夏装。

蒙古族穆斯林的服饰总体看去是蒙古族袍,似乎和蒙古族相同。但在整个蒙古族服饰中,却有很大差异。我们专门请内行介绍,他们说,阿拉善的蒙古袍和内蒙古东部区相比,有瘦长的特点,不像东部区以宽大为主要款式。阿拉善男式蒙古袍穿起来修长精干,不显臃肿,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轻巧方便,同时又不失蒙古汉子的雄壮和剽悍。蒙古袍的面料一般是带有圆形图案的绸料,高档的有缎面、织锦以及柔似绸面的羊皮料,袍长在1米到1.5米之间,领口、袖口、襟边、下摆都有各种花边。花边以金黄色为主,配什么面料都很和谐,光彩耀眼,十分美观。蒙古族穆斯林的袍子外观特点是,男袍类似旗袍两侧开衩,而女式袍则不开衩,这也许是为乘骑骆驼方便

和需要而设计的吧。

男子服饰的搭配物主要是帽子和马靴，与其他蒙古族戴帽子不同的是，在戴蒙古帽的同时，还有一顶同回族一样的白帽子。在过去，他们不戴这种纯白的帽子，而是像蒙古包一样形状的花边花顶圆帽，可是这种帽子现在已买不到了，也没人能做，主麻日只能戴白帽子。配饰主要是腰带、褡裢、蒙古刀和鞭子。腰带大都是黄色或粉色，浅蓝色的单色绸子，一般无花，有花也是本色暗花，长度为4米~6米。系扎时顺长度折叠成一拃宽，然后顺时针缠绕在腰间，把布头塞紧。蒙古男子佩带在腰间的饰品主要有两件，左边是褡裢，右边是蒙古刀。蒙古人的褡裢用途很多，用以装饰时，显示妻子巧妙的手艺，除此外还有衣兜的作用，里面装有精致的鼻烟壶，流通货币等随身贵重物品。蒙古刀更是男子不可缺少的随身物，用途更大，随时都可能用以防身或作为工具、用具等。蒙古刀由刀和鞘组成，刀柄大多用牛角、象牙等制作，柄端包裹铜或银皮，有钱人和上层人士还镶有珠宝。刀鞘基本都用铜或银皮包裹，镶有宝石、珐琅等，这些都象征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显示他们的阔绰和富有。蒙古刀鞘还有专门插筷子的两个孔，筷子一般都是象牙或者纯银制成的。与刀鞘相连接的是取火用的打火镰，火镰由合成铁和火石构成，摩擦时产生火花。这种东西不怕风雨，极易燃火，野外取火十分方便经济。刀和火镰都挂在腰带上，挂扣件用银圆或玉石、翡翠制作，取戴很方便。谢巴特尔告诉我们，如果加上乘骑的大骆驼和骏马，鞍革毡银蹬，一个男子出门的装束大约是100只羊的价值。

蒙古族穆斯林的服装，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与阿拉善蒙古族已很接近，主要不同点表现在妇女的头饰方面。她们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蒙古部落，在阿拉善土尔扈特、和硕特、额鲁特几个部落中也很独特。阿拉善的蒙古族妇女一般梳两根辫子，装入发套直接垂吊于胸前，外面有坎肩包裹。穆斯林妇女的发辫戴上发套后，垂在背后。辫子梳好时，先用黑色头纱把头发盘起来，在头发根部也就是头面后面，拴两颗如乒乓球大小的红色珊瑚珠，连接两根已装入辫子的发套，后垂于背。黑纱的两端用银簪和头发别在一起，银



簪露出的一头,垂吊着珠宝珥琅等装饰物。前额的饰物是在用铜和银做成菱形底座上,镶嵌各色宝石,底座是镂空的各种图案,边呈花纹状,富贵人家的额饰底座都是镀金的,用黑色纱绸固定在额头上。两鬓各有三串珠子,每串8~10颗,共计48~60颗状若蚕豆的珍珠,每串珠子的中间两颗用翡翠或绿松石制作,红绿相间,垂于两边,配以各式耳环、耳坠,盘好的发型给人以珠光宝气、光彩照人的美感。

蒙古族穆斯林妇女的发型,除美观外,还有区别婚否的作用。姑娘时只扎一根发辫,不戴发套,到结婚时,才把辫子分成两根,戴上辫套。发套是娘家人用单色黑缎子根据女儿身高做的,大都是女儿自己缝制刺绣。姑娘从小就开始学习刺绣,到出嫁时,女工水平已经很高了,自己的嫁妆一般都不用母亲帮助就能完成,同时向外人和婆家展示她的心灵手巧。在过去,蒙古族穆斯林妇女的头发是不能让婆家人和外人看见的。整个都包裹得严严实实,配饰整齐有序,不得紊乱。媳妇到了婆家后,每天很早就起床梳洗,无论如何不能乱了头发。头蓬则面垢,难于见人。每天打扮整齐,定能体现个人的精神面貌,表现出自己的精干。妇女外出时都用长围巾遮脸包头,只留双眼,防风吹日晒,防抛头露面。在谢巴特尔家,我们拍摄到大量的裕褸和发套刺绣图案的图样,也拍到了过去遗传下来的刺绣原件,图案之美,手工之精,着实令人叹服,细微之处,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

蒙古族穆斯林的服饰,在蒙古民族的服饰文化中有其独特的一面,也丰富了蒙古族服饰的内涵。尤其是她们把穆斯林妇女的发式习俗融于蒙古族的头饰中,可称为创造性的。有位学者问:为什么她们的头饰与其他蒙古族部落表现不同?我想穆斯林妇女对于头发的梳妆要求,与蒙古族妇女头饰相结合,这就是蒙古族穆斯林妇女的头饰。这是几百年来民族习俗融合的结果,也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因。无论是否来源于此,她们独特的装扮,已成为民族服饰的一支奇葩。

妇女的配饰十分昂贵、讲究。在蒙古袍的襟扣或坎肩扣上,佩带缎绣图案的鼻烟壶套,装精致鼻烟壶。手指饰带金银或宝石钻戒,耳坠大多为金银

制作,大耳环则串有珊瑚、翡翠珠。未出嫁的姑娘不戴头饰,但媳妇却必须戴,只有守寡和戴孝期间例外。我们询问穆斯林妇女头饰及饰品价格时,她们说,按现行最低价也在万元以上,好的要几万元。

三、饮食习俗

蒙古族穆斯林的饮食习俗更是丰富多彩,他们取其他民族的饮食之长,精做出各种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味的美食。这些食品根本用不着去格外表现,历史上的饮食习惯已使之必然。他们大量吸收了蒙古族的饮食文化,牛羊肉、奶食品是他们的主流食品,也是他们特别喜食和不可或缺的食品。“羊乌叉”(蒙语全羊席译名)、手扒肉、炒米、奶茶、奶酪以及“古勒岱”等,都是风味食品。客从他乡来,他们定会倾其全部技艺,盛情款待,让您大饱口福,乐不思蜀。

“羊乌叉”是蒙古族宴宾待客的特色大菜,在牧区属最高规格。阿訇完成宰牲仪式后,男女主人便大显身手分解全羊。观看蒙古人分解羊体时的用刀准确和敏捷,无异于观看一场才艺表演,蒙古刀在他们手中简直能玩出各种花样。锋利的刀刃能直接插入羊体的各个关节。在我们看来羊关节到他们手中,缝隙似乎宽了许多,刀尖在肥厚的羊肉中翻转几下,一侧肋条就齐刷刷的被切割下来。主人告诉我们,最难卸块的是羊脖子,原因是骨骼结构复杂。尽管这样,您大可不必担心羊肉中出现碎骨头,哪怕是豆粒大的碎骨也不会有。分解能手可以做到关节上不留刀痕,我们着实为此惊叹了许久。煮“羊乌叉”时掌握火候十分重要,否则羊肉将会不合口,出现咬不动或太黏糊的现象。标准是要脆而不硬,软而不烂。煮羊肉很少添加其他的调料,只是在肉色变白后加适量盐就可以,能充分体现原汁原味。“羊乌叉”既是最高待客规格,因此在食用时也就有了很多讲究,当然这些讲究主要是为了表达喜悦之情,崇敬之意,烘托气氛,把客人的地位推向更高,把胃口调至更好。“羊乌叉”上桌后,主人要在肥大的羊尾上划出刀痕,以示客人可开刀品尝了。由于“羊乌叉”是把全羊都献给客人食用的,主人一块也不留,因此客人在食用之前,要由长者代表客人取出颈椎和软肋部分,回赠主



人食用。客人食用时,主人不在现场,以示让客人不必客气,不受拘束,尽情吃喝。盘中的全羊肉由主要贵客和德高望重者逐人分赐,拿到客人手中的肉块大小,已经可以直接入口了。在吃羊肉时,忌讳双手抱着骨头,用牙齿撕咬。除赐肉者手中执刀外,餐桌上还分摆着很多利刀,自己切割羊肉也很轻松。吃“羊乌叉”时,有两样肉必须要吃,即先板肉(肩胛骨,蒙语叫“达楞亚苏”),有不可独食的意思。因此必须(大亚勒)分而食之,不分老幼每人一块,不得有漏。另一样叫“色勒亚苏”,蒙古语称为“色目勒吉伊德”必须由长者用手撕开分给大家吃;吸羊尾最有讲究,吸食者不可咀嚼,要把切成一指宽的羊尾条,长短不限,吸入咽喉,囫圇吞咽下去,吸食成功者可得赏酒。在宴席上,唱歌祝酒是十分热烈而欢快的场面。据阿拉善民歌协会普查,蒙古族穆斯林自己的祝酒歌就有 100 多首,而且还在继续搜集整理中,他们男女老幼几乎都是民歌手,人人都能唱,而且不重复。唱歌敬酒一般都用银碗,敬酒者手捧哈达,斟满银碗,高唱着充满友好和祝赞内容的劝酒歌,定让您仰颈痛饮后才认为您豪爽真诚,否则他们的歌声是不会停下来的。即使您平时很少饮酒,此时您喝下去,醉意也会姗姗迟来或不来;甚至连您自己也会怀疑,为什么自己的酒量会陡然猛增?其实,欢快轻松的场面和兴奋激昂的情绪,早已把美酒绑在歌声中,飞出了身体外,撒向空中。有时的酒宴上,还喝自己酿制的奶酒,这种酒是用鲜酸奶酿制的,酒精度较低,口感醇绵,酸甜中略带酒香,您可以视作饮料,尽情畅饮。

除传统饮食外,生活在蒙古族地区的穆斯林还结合当地食物原料,制出许多独特风味食品。

“古勒岱”既是羊杂的新鲜吃法,又是储存吃法。它很像广东、四川的腊肉肠,味道鲜美,口感劲道。古勒岱的制作采用刚宰杀的羊内脏,用洗净的油肠做包装,将胸膈肌肉,羊肺先切割成长条,同小肠一起装入油肠内,装至一半时顺势将油肠翻套过来,整个填充物就包裹在油肠之中,最长的可达 2 米以上。新鲜古勒岱,现做现煮,味道十分鲜美,油而不腻,绵软适口,余香持久。古勒岱还可以风干,熏干,储存食用,也别具风味。



奶食品是草原牧民的饮食特点,在奶上也吃出了许多花样,以羊奶为原料做成的民族特色食品非常多。最简单的是煮奶茶,加工而成的有酥油,奶皮,奶酪,奶饼以及奶酒、酸奶,“毫里麻格”(蒙语译)等,食用方便,充饥解渴。仅奶酪就有几十种形状和口味。方便食品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种面食叫“棋旦子”,蒙语叫“豪日海包布”,它是用羊油、羊奶和成的面团,切成手指头大小的颗粒或条状,放进油锅炸成。吃起来干脆酥香。久放不变味,加上炒米、奶酪,切一些煮熟的羊肉,用奶茶冲泡,是牧民日常必备食品。

四、人生礼俗

蒙古族穆斯林的人生礼俗基本同于回族,主要的“人生之节”如诞生、满月、生日、结婚、寿礼等都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宗教色彩。尤其是他们的婚礼,在大量融合了蒙古民族的习俗后,更显得异彩纷呈,热闹而庄重神圣。

蒙古族穆斯林基本不与其他民族通婚,娶嫁的对方必须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很少把女儿嫁于其他民族,娶进的媳妇和招赘的女婿都要举行入教仪式。在历史上阿拉善克伯尔地区人烟稀少,婚嫁矛盾也比较突出,因此在穆斯林群体中也有部分其他民族进入。他们入乡随俗,入教承宗,不但壮大了族群,也继承和丰富了蒙古族穆斯林的文化,促进当地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

蒙古族穆斯林的婚礼和当地蒙古族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在婚礼中增加了“尼卡”,与回族婚礼也不尽相同,称其为“蒙回结合,礼仪参差”,较为恰当。婚娶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求婚、订婚、结婚,也有叫“会晤酒”、“订婚酒”、“喜酒”。

“五根阿日克”是蒙古语见面、商谈、求婚的意思,一般是男方主动在先,看准谁家的姑娘后,由男方家请一名能言善辩的外人(充当中间人或媒人的角色)带着礼物到女方家,用巧妙委婉的语言表达求婚意图后,便开始给姑娘的父母敬酒。如果女方父母接过酒,证明并不反对,如果不接酒则说明不同意。这一切虽在不言之中,却不会造成对方尴尬。无论接酒与否,做媒之人都须极力撮合,尽最大努力促成,也有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男方只



能作罢。女方父母答应此事后,要征求姑娘的意见,如姑娘基本同意,再看双方孩子的属相八字是否相克,最后商议什么时候喝订婚酒。如果是“娃娃亲”,则订婚和结婚的日子无法确定,须等孩子长大以后再商定。实际上,订婚是在女方家亲戚中开展的一系列礼仪形式,也是男方家认亲识属的过程。还有敬红纸、献哈达、唱祝酒歌敬酒等内容,最后讨论结婚日期,商定结婚所用的礼品、服装等事宜。

结婚是人生的终身大事,也是婚姻全程中最隆重、最神圣的表现形式,礼仪习俗繁多。男方举行婚礼的当天很早开始,被邀的客人便陆续赶来,他们有的骑马、骑骆驼,现在有的骑摩托,有的开车,距离最近的也有十几公里。一路风尘前来的客人到家,进入蒙古包前先说“色俩目”问候语,再交换鼻烟壶敬酒,待客人进家人座后再一次敬茶敬酒,唱敬酒歌。客人为示祝贺,也要回敬茶酒,唱敬酒歌。敬酒歌必须是三首,回敬时也唱三首。如果来的客人多,这歌声便全天不断,即使是开饭正点,也互不影响,吃饭和敬酒都在同时进行。快到傍晚时,男方父母便向“阿哈拉奇”(首领)和“勃勒根”(娶亲陪新娘的嫂子)敬酒,互换鼻烟壶,表示把娶媳妇主持婚礼的重任全部交给他们。当夜幕降临时,娶亲队伍一路唱歌,赛马赛驼向女方家出发。蒙古族也有“挡门”的习俗,女方家的亲友会明知故问:“你们是哪儿来的?”“你们有什么事?”有时也即席用改编的歌词唱歌发问,形成“对歌”。之后,双方互致色俩目问候,才可进入蒙古包。此时蒙古包里正煮好热腾腾的奶茶,摆放着各种面食和奶食品,分宾主长幼而坐。男方阿哈拉齐和勃勒根按年龄辈分逐个互换鼻烟壶,互致问候,并把带来的礼品呈送给主人。

在蒙古族穆斯林的婚礼中,请伊玛目或阿訇为新人念“尼卡”,在当地是一种独特现象。据老人讲“尼卡”是念给安拉的,如果在结婚时没有念“尼卡”,两个人的灵魂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蒙古族穆斯林学者安孟和先生著书说:念尼卡前,男方勃勒根要把女方父母和全体亲戚请来庄重入座,阿訇问清新人的经名,给他们念尼卡和祝福。伊玛目以及女方的父母要用十分严肃的宗教仪式,吟诵祝辞。尼卡结束后,女婿再向客人逐个敬鼻烟壶,有

的亲友在交换鼻烟壶时就把贺礼送给女婿。与其他民族相比,尼卡把一对新人的境界一下推向神圣的顶峰,成人和婚姻的庄严,让他们从此挑起必须给对方带来幸福的重任。尼卡结束后,姑娘的发辫便梳成两根,盘起美丽漂亮的头饰。女方家的“羊乌叉”摆上饭桌,歌声再起,敬酒祝颂,直至凌晨。送亲队伍同娶亲队伍合为一体,组成或几十人或上百人的驼马大队,一路欢歌来到男方家。在男方家待客的过程基本相同,也需五道茶三道饭,再吃“羊乌叉”,全天饮酒唱歌。深夜交更前,新人入洞房后,有些来客还要继续欢宴到第二天黎明才结束。

婚姻是青年人的幸福,婚宴则是亲朋好友的欢聚。娶媳妇的一家待客时间长达两天一夜,甚至两夜,完全实现了酒足饭饱,也绝对体现了隆重热烈。

在人生礼俗中,葬礼是一生中最后一次礼仪。当地蒙古民族一律实行火葬。但生活在阿拉善的蒙古族穆斯林却严格遵循着穆斯林的习俗,实行土葬。在以敖龙布拉格苏木为核心的聚居区,辐射了罕乌拉、巴音木仁、巴音毛道等苏木镇,共同建起了公墓。葬礼仪式完全同于回族,请阿訇为亡者念经净身后,葬入公墓。由于阿拉善地广人稀,他们居住的地区一般户间距离在10公里以上,因此他们自行商定了一个公祭日,共同请来阿訇集体上坟,分户念经。公墓建立在克伯尔地区的阿尔苏(蒙语地名),距敖龙布拉格、巴音毛道等苏木都在50公里以上。据传说早年的一个夏天,有个人用骆驼驮着亡人去清真寺,走到阿尔苏以后,亡者尸体突然掉在地上,无法再走了,此时来了一队人马,其中有一个阿訇,得知亡者是穆斯林后,便开始诵经,并令所有人给他下扎那子(扎那子,阿拉伯语,意为挖坑埋葬)。后世人逐渐开始在此安葬亡者,形成了公墓。现在看来这个选址也很科学,它充分照顾到东西南北分散居住的各家牧户。尽管如此,由于路途遥远,各户举行祭奠活动仍十分困难。除为亡者举行安葬礼仪时,大家集中以外,各家的祭奠都分散举行。蒙古族穆斯林对亡者遗体的保留时间一般不超过24小时,也不守灵。洗礼后开帆裹身,开帆内还写有经文。安葬前,由阿訇边洗边念《托哈》至洗完为止,入葬后由阿訇念《古兰经》。亡者的祭日分第三天、三



七、七七,要请阿訇在家念经祈祷。生活在牧区的蒙古族穆斯林,逐渐迁居巴彦浩特地区(阿拉善左旗首府所在地)。在巴彦浩特有占地100亩的回民公墓,极大地方便蒙古族穆斯林亡者的安葬问题。据巴音清真大寺的阿訇马建军介绍,目前回民公墓共安葬蒙古族穆斯林60多人,仪式和习俗全部与回族相同。只是他们的墓碑上增加了用蒙古文雕刻的碑文。每逢礼拜日,蒙古族穆斯林便来到巴音清真大寺做礼拜。

在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和当地蒙古族因通用蒙古语言文字,长期共同生活,在迎宾待客相互往来等方面的习惯,已基本相同。蒙古族素以淳朴、直爽、好客而闻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有客人来家,主人都要亲自出外迎接,口称“阿木勒呼”(蒙语问好的意思)。在过去一般都要接过客人骑乘的驼或马,帮助拴好,恭迎进蒙古包,以示热情和欢迎。穆斯林相互见面时双手掌心向上,问候“安色拉玛来混”,“尔来鸿色兰目”。

在蒙古包里座位有宾主之分,一般主人在右侧,宾客在左侧。现在大部分人家盖起永久性砖木房,又有客厅,宾主座位已不似过去讲究。宾客入座后,才开始正式问候,代表形式是交换鼻烟壶,互致祝颂辞,互祝牲畜兴旺,牛羊膘肥,水草丰茂。接下来才开始自由漫谈。我们访问的牧民家几乎都有沙发、茶几、方桌等家具,也有住蒙古包的。牧民敬茶忌讳空茶和白水,必须在客人前摆放一些食品,如炒米、奶皮、奶酪、“棋子”等可食之物,供客人长途奔波后缓解饥饿,体现他们对客人关心入微,让客人感到朋友的真诚,家的温暖。

蒙古族穆斯林几百年来,过着游牧生活,特殊的生产生活环境,在丰富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一些习俗。上述的主要大型活动中的传统风俗,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还未涉及。但不论从丰富或改变的角度讲,都始终没有改变的则是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忠贞和信仰。

五、宗教习俗

伊斯兰教是从新疆、青海传入到阿拉善的。现在的阿拉善蒙古族信仰

伊斯兰教的可查文字史料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他们严守教规,信仰穆罕默德胡达,前往圣地麦加(蒙语“海吉”)是终生的夙愿。日常做拉玛子和礼拜,都朝海吉方向磕头,就连埋葬亡人时也把脸朝向海吉方向。

据阿拉善左旗民族事务局统计,目前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人口已达 3000 多人。文史记载:大约咸丰二年(1852 年),在克伯尔巴格的沙巴格图地方,穆斯林建了一座简易沐浴室,成为后来“莫其德”(清真寺的蒙古名称)的原型。到光绪十六年(1890 年),克伯尔的伊玛目主管为了弘扬教法,建了一座清真寺,当地称南清真寺,也就是现在的“豪勒宝清真寺”。1920 年,经阿拉善王府同意,又在克伯尔巴格的伯格特建了一座清真寺,称为“伯格特清真寺”,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被毁。1986 年,虽然国家援助重建,但其工艺、规模及外观已大不如前。现在穆斯林聚居区的敖龙布拉格的这两座“莫其德”,已成为穆斯林群众过节、主麻、做拉玛子和礼拜的场所。

据马布音吉日格勒讲,他今年 70 岁,到阿拉善已经六代,他的父亲马图门乌力吉早在 20 世纪的 30 年代,克服重重困难,自费到沙特阿拉伯学习阿文和《古兰经》1 年多时间,是蒙古族穆斯林中唯一到圣地朝觐回来的“哈吉”大伊玛目。他回来后培养了许多学生,把他的 4 个儿子也都培养成了阿訇。因此,他们一家深受当地穆斯林的拥戴。

敖龙布拉格地区总面积 2 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宁夏自治区的面积,人口居住非常分散,除“古尔邦节”、“开斋节”等大型节日外,这里的穆斯林集体主麻、礼拜是很困难的,他们因地制宜创办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清真寺”,与“马背学校”、“驼背电影院”十分相似。有 4 人组成,就可以在家过主麻、做礼拜。每逢祖辈逝世的纪念日,虽然上不了坟,但是都要请阿訇在家念《海达》和《托哈》。

在谢巴特尔家,我们还看到一种习俗,请阿訇念《巴格塔目》(求福经)。念经时,主人拿出一个用哈达包裹着的大木盘子放在阿訇前的桌子上,里面装满五谷杂粮和过去的铜钱银币,还有新中国建立后发行的各套人民币



纸币和硬币,点燃香烛后开始念《巴格塔目》。这个木盘已经传了好几代,每次诵经都要往进投放一些钱币和粮食种子。其意思是为祝福全家平安,祈求真主恩赐。我们问他:“这样长久下去,包和盘子需要多大?”他回答说:“每次投放种子和钱币只是象征,数量很少,也不能多投。当然传世越多,包裹越大,福气也就越大。”念这道经文时,全家不分男女老幼,均要参加,同时还要在室内供放全羊,并要求我们不得拍照。念完经要给阿訇放“哈迪亚”。

蒙古族穆斯林的另一个集会日,是每年农历五月的第二个主麻日,大家集体到阿尔苏过“都巴”(集体上坟,与汉族的清明节相似),这也许是他们当地人自己创造的节日。阿尔苏这个地方没有清真寺,只有在空旷的沙地草原上堆起的一个个坟堆。这可能是每家请阿訇上坟念经太分散,存在阿訇忙不过来的问题,于是大家协商共定一个日子集体上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个节日。每逢这一天,各家不用通知,都自动前往。他们来时几乎每家都带有蒙古包和帐篷,以便吃住之用。我们此次并未能赶上这个节日,根据他们介绍,在阿尔苏过都巴,也十分隆重而热闹。集体做主麻,诵经祈祷过后,便拿出各家带来的羊肉、白面等食物交给主管人统一炖肉、炸油香、做“哈里巴”,然后每人一份,分装共餐。久别重逢的人们,茶足饭饱后开始亲切交谈。如果年景好,牛羊肥壮,自然还要开展一些那达慕活动,举行摔跤、赛马、赛骆驼等娱乐比赛。

蒙古族穆斯林的信仰是坚定的,整个蒙古族对喇嘛教的信仰,并没有影响他们对真主的虔诚。阿拉善史志资料统计,阿拉善左旗境内共有 24 座寺庙,知名的就有八大寺庙。解放初期共有 3000 多喇嘛,在蒙古族中影响广泛而巨大。以贺兰山广宗寺、福因寺和延福寺为代表的喇嘛庙,香火旺盛,活动频繁,几乎覆盖了境内全部蒙古族的宗教信仰。但是蒙古族穆斯林却从不参加庙会,即便偶尔伙同朋友邻居前往,也仅以旅游者的身份,不烧香,更不磕头,足见他们对于真主的信奉之心。现在有学者撰文说,蒙古族穆斯林也祭敖包,应该是佛教文化的遗存,但他并未肯定祭敖包就是同时

又信仰了佛教。我们认为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慎重。当我们问及穆斯林老人时,他们说:祭敖包是祖先传下来的,主要是祈求雨水,水草丰美,人畜兴旺,与信仰伊斯兰教无关。

蒙古族穆斯林群体在阿拉善形成之初,是由少数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人、东乡人和汉人,他们带着祖先的信仰,来到阿拉善地区,开始定居生活。然而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极大不同,令他们在饮食、婚丧等习俗上常常显得格格不入。有的人家身为牧民却很难吃到羊肉,其原因就是没有阿訇宰牲。近几十年来,当地通过各种渠道邀请或培养阿訇,这种状况才逐步得到改变。我们提到的马布音吉日格勒,便是100多年前,祖上从宁夏平罗来到阿拉善的,至今已第六代传人,族别在早年就成为蒙古族。现在敖龙布拉格地区,除马布音吉日格勒外,较为知名的本民族阿訇还有策仁道尔吉、布白等,都是蒙古族穆斯林中土生土长的阿訇。伊玛目、阿訇、满拉的人数之多与过去已无法相比,尤其是曼拉,每户都有。他们自己有祖传家规,只要是生下男孩都送清真寺学习,或请阿訇教学阿拉伯文、念古兰经。这个规矩啥时传下来的,谁也说不清楚,现在年龄最大的老人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奉若祖训一直延续至今。他们一般不允许家中出现“俗人”(蒙语叫哈日空),成年男子中抽烟喝酒者很少见,而作为曼拉轮流住清真寺的在册人员就有30多人。这些宗教人士在方便牧区经济生活、尊重穆斯林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宗教人士也深受尊重和爱戴。

六、保留至今的传统生活

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先进技术、产品不断进入牧区,但蒙古族穆斯林依然保留着许多民间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手工技艺。传统生活方式集中体现了他们民族习俗的独特性。它主要反映在传统生产技艺、传统仪器技艺、传统娱乐竞技三个方面。

历史上的游牧生活,培养了他们的皮毛加工技艺,也造就了浓厚的民族和地方特色。骆驼毛和羊毛是牧区每年大量收获的主要畜产品,纤维长、韧性好,是制作各类绳索和毛口袋(盛装物品的包装袋)的上等原料。在牧



业生产中,这两样东西的用量十分巨大,无论是骑乘和役用的牲畜,缰绳和驮具都不能缺少。毛绳柔软结实,特别耐用,而且对人畜都无损伤,最广泛用于骆驼缰绳和捆绑驮物的绳索。在过去,每户牧民都有10峰左右的役用骆驼,专门驮运生产生活用品,每峰骆驼的鞍具要用8平方米口袋片,50米毛绳,共计用原料毛几百公斤。牧民布和介绍说,他捻毛线织口袋的技艺是父辈传下来的,父亲就是这一带的能手。这种产品过去和现在都买不到,只能自己做。尽管现在科学发展快,但是能代替这种毛织品的驮具原材料还没有。虽然毛口袋外观粗糙,却非常适合骆驼身体,具有很好的通风透气功能,便于长途负重的骆驼排泄汗液和热量,其他材料都不好用。他还为我们演示了捻毛线、织口袋、拧毛绳的手艺。

毛的用途广,皮也不例外。经过熟制的皮张,在各种用具中的用途同样广泛,凡是用以连接、需要结实的都用皮子,就连蒙古包的“哈那”(蒙古包四周竖立的围墙),都是用皮条连接固定的。别看这种原始落后的材料和手艺,却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使用起来既坚又韧,完全克服了脆、硬、锈、蚀等弊端,有些用品甚至可以祖辈传用。有一牧民家的祖传马鞍,使我们大开眼界。前后捎绳、肚带、鞍带、夹垫、马革酋、马绊、吊蹬带等,全都是用熟制的上等牛皮做的。马革酋上有印压的花纹图案,画笔细如发丝,十分精致。吊拴马蹬的是两只百岁黄羊角,外前棱呈白色,十分罕见。鞍轿用银和铜制成的泡钉装饰,铜条镶边。加上马脖子上套挂的几十个铜铃,奔跑起来马蹄嗒嗒、苍朗有声,尽显威风。马主人打扮心爱的乘骑,不亚于现今爱车族的投入。一匹良驹仅鞍具的费用,现行价也在万元以上,何况在远古。对此鞍具,他视若至宝,他说这是百年传物,给多少钱也不能卖。

蒙古人对皮毛等畜产品有独特的加工技巧,是为了生产之需,他们对于食物的加工和储存技艺更令人叫绝。蒙古族穆斯林居住在草原上受宰牲限制,对肉、奶等食物的储存尤为重要,否则他们经常会因为不能及时请到阿訇而断了羊肉。

如果您到草原,总会被一种称作风干羊肉的食品所吸引。如果您亲口

品尝过的话,相信您一定还会回味它的余香。这便是蒙古族穆斯林传统中对羊肉储存、加工的一种技艺。羊肉的保鲜期很短,如果在夏季的炎热天气中新鲜羊肉甚至过不了一天就会变味。长期的游牧生活使他们总结出了风干的经验。晾制风干羊肉看似简单,其实道理很深奥科学。取新鲜羊肉透凉后用刀切成一寸粗细的长条,撒盐搓揉均匀,挂在通风阴凉处,自然干燥。待肉条能敲出声音时,装入布袋,悬挂在蒙古包的天窗上。此处柴烟外出,自然驱赶蚊蝇,又会产生烟熏的腊味,产生独特香味,能长期保存而不变质。日常食用,存取自如。蒙古族的风干羊肉特色浓郁,这几年也从牧区发展到了城市,在巴彦浩特的街头,已有几十家以经营干羊肉为主的餐馆,蒸、炒、涮、煮、撕样样都有,如果您有机会一定要去品尝。

除对羊肉有储存诀窍外,奶食品也是牧区的特色食品。牛、羊奶液的储存食品有酸奶、酥油、奶酪、奶皮、奶酒等等,用炒米、奶茶冲泡,醇香四溢、回味无穷。

在当地蒙古族牧民中,穆斯林还有自己的特色食品叫“哈拉巴”(蒙语译名),制作时在香油中加入白面翻炒,面炒出香味时再加白糖和其他配料。此时锅内面成软团,“哈拉巴”就做成了,食用时圈夹在油香中,“哈拉巴”类似饴糖,滑润柔韧,又不粘手粘牙,配以油香十分好吃,也是蒙古族穆斯林待客的首选食品。

因为居住分散,生活也许是枯燥单调的,在久远的游牧历史中,他们祖祖辈辈也习惯了这种独处的宁静生活。偶尔向天高喊一声,那声音便会毫无遮拦地响彻青天大地。同时也意外练就了他们的高亢歌喉。内蒙古的长调民歌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草原深处,悠扬的歌声到处都能听到,阿拉善不例外,蒙古族穆斯林居住的克伯尔地区也不例外。在谢巴特家举办的民俗展示会上,主人摆起了四个“羊乌叉”的大宴,可供100多人同时就餐,让我们切实感受了一次歌声不断的现场。这一带素有民歌故乡的称号,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克伯尔民歌》,共收录该地区民歌500多首,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唱,而且曲目也很多,是蒙古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在宴席中,他们不但歌声不断,歌曲也不重复,否则将会被罚酒。在几个小时的宴席中,几乎每局都旗鼓相当,不分上下,只得共饮。因此,酒宴也始终在欢乐中进行。

和他们交往,友善、顽强、豪放的个性给我们留下了美好难忘的记忆。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创造了过去的灿烂,也收获了今天的文明,使这里的人文沉淀更为厚重。在他们的体内涌动着蒙古族的粗犷彪悍和热情,体现着回族人的勤劳、善良和坚韧,这就是蒙古族穆斯林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们是蒙古人吗?他们是回族人吗?他们到底是谁?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他们将和各民族兄弟共同走向美好的明天。

天主教传入阿拉善旗磴口地区述略

宿心慰

一、传入之由来

为了比较完整系统地记载天主教传入阿拉善旗磴口地区的历史,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天主教传入内蒙地区之梗概。因为天主教传入磴口,是由内蒙古之中部、东部地区而逐步向西发展,乃至传入内蒙古西南部边外的后大套三道河子(磴口三盛公)一带,并以三盛公为中心,进行了长期的传教活动,直至现在,已有 114 年的历史。

据《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王学明所写《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一文中说:“河北省张家口西湾子天主教出版的《圣教源流》记载,公元 1700 年间,察哈尔西湾子地方,有张根宗者,已领洗入教,他是那里的第一个教友。同时,当时西湾子有了第一个小堂。”上海土山湾出版的《拳祸记》记载:“公元 1724 年 1 月 2 日,清雍正皇帝出谕‘禁止传教’。1839 年,京中禁教尤严,教士无匿迹地,赴蒙古西湾子居住,教友随之者殊伙。”

1838 年 8 月 14 日,罗马教廷划满洲里、辽东、蒙古三地方为一教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1840 年教廷派四川方主教为此地代牧。此后,这个教区又归法国遣使会(味增爵会)管理。

1846 年,内蒙古教区已有三大教堂:(1)中为西湾子教堂。(2)西为小东沟教堂。(3)东为苦柳图(在原热河省)教堂。

据常非神甫所写《缓远教区简史》记载“圣味增爵会士,奉命在内蒙传



教者,人数不多,而应巡行传教之地区,则非常辽阔。当时传教之目标,多集中于内蒙古之东部,而西部则自感鞭长莫及。唯此内蒙古之西部,并非无教友之踪影。一则以山西、陕西之教友,或经商,或移垦,渐向北而迁徙,乃达侨居于是;一则以教难之频仍,而教友之畏惧,逃避于深山背巷,辗转流徙至此者,亦俱有人在。”

1844年,在内蒙古传教之胡克与额贝二位司铎由热河出发,用蒙古族教友沙当金巴做向导,经归化城(呼和浩特)、萨拉齐(土默特右旗),西南行直奔拉萨。二位司铎之计划,乃在劝化其中心人物皈依圣教,以求蒙古人望风景从之奇效。其计划未能成功,而其旅行笔记,实有益于后人者不少。

从1848年至1865年为止,前后来归化城区域传教之司铎只有四位,即吴味增爵、谢司铎、樊味增爵、达味。当时司铎来是方者,采取游击形式,因无教堂之成立,故无定居之点。常以教友所在之地,为其寄宿之处。今日在此,明日在彼。所有各乡之教友,每年必轮流看望或授以当领之圣事,或教以当知主教义。当时教友,虽得闻司铎之教导甚少,而大体说来,其信仰之坚,诚实属可嘉。司铎在周行一圈后,即回西湾子总堂休息,然后再游行,亦如上述。

据当时其他方面之记述,得知吴司铎应行照料之教友散居之处所,东至二十三号(兴和县),西至归化城,北至后坝(四子王旗),南至岱海滩(凉城县)。各村虽有教友亦不过三家两户。

1865年,在内蒙古约共有教友5000余名,其散居之宽,则东自黑水,西迄归化城,南抵长城,北达大戈壁。而传教司铎只有白、戴、谢、达味、凤及赵、郑二司铎共7人。尚有五品张弥厄尔、四品郝保录。1866年秋,内蒙古所有之味增爵会士,皆相率东去,或居北京,或去正定。此处教务已由“圣母圣心会”接管(以上摘自王学明所写《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

圣母圣心会是比利时和荷兰两国天主教传教士所组织的修会。1861年,比利时天主教司铎,以南怀仁为首,上书比利时国王和罗马教廷,要求批准成立一个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得到罗马教廷许诺,遂于1862年,在



首都布鲁塞尔的近郊史勾特村,成立了“圣母圣心会”。然后通过比利时政府和教会,向罗马教廷请求,将法国遣使会(味增爵会)在中国的蒙古教区,让给圣母圣心会,作为传教区。那时清朝皇帝已颁发上谕:“准予传教。”而法国天主教遣使会因忙于北京教务,无暇顾及蒙古教区,故上书罗马教廷,请将蒙古教区另交他会管理,借此罗马教廷便将蒙古教区,划归圣母圣心会接管。

1865年12月6日,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仁司铎,率领韩默理、司神父、郎神父、及林修士共5人,同时由比利时到达北京,向法国遣使会办理交接手续后,来到蒙古教区察哈尔西湾子教堂,由白振铎代权司铎正式接收了蒙古教区的传教事务。南怀仁被任命为本区副主教。当时,教区教友2700余人,散居在26个村庄。南怀仁为同清朝地方官员搞好关系,提高自己声誉而便于传教,他们也穿上长袍马褂,脚蹬马靴,头结假发辫子,积极学习蒙古语,熟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力求衣食住行的“蒙古化”,出门骑马,四处奔波,在遣使会原有教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传教事务,数年之内,成绩显著,遂被调往热河承德,开发新的传教区。于1868年2月23日,南怀仁积劳成疾,病死在东蒙古热河老虎沟天主堂。其副主教之缺,由司牧灵接任。1869年司神父被调回国,又由韩默理代理教务(韩后来调往甘肃任主教)。

1871年5月14日,罗马教廷又正式委任巴耆贤为副主教。

1873年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札萨克贝勒扎纳格尔德,去北京觐见清朝皇帝返回,与阿拉善和硕特旗六代第七位王札萨克贡桑珠尔默特偕行,路经兴和县西营子时,西营子巍峨壮丽之教堂,甫经落成,一时引动二王观瞻好奇之心,随会见该处外国传教士德玉明和费尔林敦,教士设席款待,会谈良久。阿王因伤风感冒,甚为困乏,司铎立即以发汗药治愈。二王心甚喜悦,当面即请司铎等分身西来传教,并表示必加以保护帮助。嗣后德、费二司铎计议,西赴传教,乃联名上书巴主教,请准西去鄂尔多斯、阿拉善旗等处传教。时巴耆贤主教正在岱海滩巡视教务,接得德、费2人之信,适中其怀,便立



即应允。

德、费 2 人得准后,于 1874 年 2 月,便由西营子登程西来,仍由老向导沙当巴金随行,途经归化城、托克托县、河口。2 月 27 日到达准格尔旗王爷府。德玉明等蒙该王爷厚礼相待。3 月 6 日又到乌审旗王爷府,亦蒙热烈欢迎。4 月 7 日来到城川,又转至宁条梁,该处早已有若干教友,而未见司铎者已八年之久。时至 7 月,在城川建成雏形之教堂一座,有如设于旷野之中,然每遇主日、占礼,四方来念经者顿如集市,亦奇观也。

德玉明西行之顺利,与蒙古王爷情感之融洽,大有益于传教之进行,遂留费尔林敦游行于宁条梁、城川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而德玉明一人,乃东归西湾子,向巴耆贤主教面陈一切,并请增派助手,壮大传教队伍,发展教务活动。巴主教听了德玉明之汇报,对其传教之计划深表赞同,并在人力物力上给以大力支持,即命杨广道、步世明二司铎,前往准格尔旗传教,又命桂德贞及司福音二司铎随同德玉明西去阿拉善旗传教。故五位司铎奉命于 1874 年 12 月 13 日,由归化城出发,奔赴目的地开展传教活动。

德玉明一行 3 人,向西而行,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于翌年 1 月 10 日始抵阿拉善旗王爷府定远营(巴彦浩特),投客栈歇脚,次日整备衣冠,三人同行,请见贡王,奈王爷卧病在床,未能接见。只好耐心等待,再行拜访,时光如流,一连居住数月,曾多次亲临王府,但贡王病势日趋沉重,终未得见。德玉明等闷闷不乐,不知所措,后从王府管家口中得知,阿拉善旗所属三道河一带地方,乃阿拉善旗最佳之地带,土壤肥沃,水草丰盛,实是传教之妙地。故 3 人计议,决定司福音、桂德贞 2 人赶赴鄂托克旗,帮助费司铎传教,学习蒙古语。德玉明独自东返三道河子(以上参阅王学明所写《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简史》,段云《天主教传入河套简史》稿件,磴口县政协所藏阿拉善左旗有关档案资料抄件)。

那时,阿拉善旗在磴口地区、共设磴口、道洛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 4 个巴格。磴口巴格所属克布尔滩、二子店、贝子地、磴口、傅家湾、上江等处。道洛素海巴格,所属二十里柳子、金沙庙、兴盛扬、双和成、三盛公、毛

脑海(渡口)等地。哈拉和尼图巴格,所属天兴泉、营管牛棋、锦恒西(东堂)、红盛义、哈拉兔、补隆淖、协成丰、陶来兔等地。陶来兔以西、海子沿、四坝、公地等处均归沙金套海巴格所管。其4个巴格的总管名叫阿木尔吉日嘎拉(人称安九大人)并兼任边卡带兵。

德玉明来到三道河子一带,做了一番认真考察后,欣喜若狂,果然名不虚传。沿河柳子丛密茂盛,形成一道天然围墙,红柳、芨芨、白茨,更是密如蛛网,人行无法通过;锁阳、甘草等药材遍地皆是;蘑菇野味不时可采,这里狐兔出没其间,雉鸡啼鸣遍野。且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属蒙古边陲地带,政府权力难能所及。德玉明决心在此大干一场,开发传教新区,于是便在锦恒西搭起临时帐篷,开始布道。居住数月,当地蒙民却无一人信教,乃东返归化城,向巴主教请款,以资传教费用。

二、初期教务之发展

清朝初年,阿拉善旗地方禁止开垦土地。从娥掌公主下嫁阿拉善王之后,要求清廷准予开垦种菜,从此磴口、四坝开始垦种。后在嘉庆元年至道光三年(1796年~1823年),在磴口、道洛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以及黄河沿岸多处,开垦成熟地1190顷67亩。同治年间,回民造反扰乱,佃户逃徙,地遂荒芜,仅有熟地400余顷。这些土地都是由外地人租种,以晋、陕两地人为多。当时阿拉善旗规定,每年签订一次租种合同,租种地户,春来秋归,不准常居。阿拉善旗上至王爷下至庶民百姓,不得出卖土地,只有使用权、转让权,而没有出卖权。

1876年,德玉明从归化城来到锦恒西,首先向本地蒙民租赁了部分土地,并向春来秋归之佃户买下房屋、木植、农具等项。未经旗府许可,便开始了传教活动。这年阿拉善旗贡王病故,乃由其次子多罗特色楞袭位,为七代第八位王。因阿木尔吉日嘎拉发现德玉明传教情况向王爷汇报,王爷立即又向清朝理藩院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宁夏蒙汉事务衙门呈报这一情况。上面责成阿拉善旗立即派人前往三道河子一带进行检查,查明德玉明之护照系理藩院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发,并未有滋生事端之情节。从此外国



传教士德玉明在磴口地区传教取得了合法的地位。1878年,德玉明购买了陕西朝邑县人王相林子和康六儿之奎元号房屋19间,及其木植、农器等,作价260千钱;又买了山西平遥县人梁姓之红盛义房屋、木植、农器等项;又向山西晋州人王姓买下锦垣西房屋32间,及其木植、农器等项,作价白银180两。还买下陕西府谷县人苏玉贵之自盛隆房屋12间,及其全套农具,作价830千钱。遂将跟随德玉明从山西、包头、归化等地来的汉民男女240人,分别安置在锦恒西和奎元号两大院内,并在此两处建起小经堂两座。

1877年,德玉明开始从凉城岱海滩大抢盘、兴和县西营子等地,移来教民500人,陆续又从察哈尔、土默特、鄂托克、杭锦、乌审等旗,移来蒙古教民百余人。同年伊克昭盟尔架马梁一带连年荒旱,灾情十分严重,人民无法生存,杨广道神父带领30多户教友,计有107人,逃荒到达三盛公。上述几批移民、灾民,便是天主教在磴口地区的第一批基本教民。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德玉明于1879年,又租种了兴盛扬、景宁泰(下江)、三盛公三处地方的土地几十顷。在三盛公、自盛隆又建起小堂两座,并将该处土地分拨给无地之教友耕种。此时,哈拉和尼图、道洛素海两个巴格的7个地方(奎元号、锦恒西、红盛义、兴盛扬、景宁泰、三盛公、自盛隆)计土地52顷32亩,全部由德玉明所租种,教友已发展到千余人。由贾大、李希发、徐维、胡理、郭志计、李召贵、张二奎子、常商人、孙章俊等人,相继担任会长或管家,这就形成了7个教民村庄。其所以传教之迅速,成绩之显著,是教会占有大量土地后,用土地作为传教的唯一手段,谁想种地谁入教,不入教者不得种地。同时教友在生活上有困难,生产上缺耕畜,缺籽种,教会便给以救济,以小恩小惠,吸引人们加入天主教,这种传教方法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晋、陕等地灾民,纷纷来此种地,加入天主教,以解燃眉之急。所以人们用顺口溜来形容当时天主教的传教情况说:“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里拨地呀?噢来!红盛义去种吧!”又说:“你为什么进教?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是为了黄米三升”。

1883年,巴耆贤主教来三盛公视察教务,任命闵玉清为第一任本堂神

父,并在圣母堂举行了大礼“弥撒”,给教友行了“坚振圣事”。后在平罗召集会议,宣布罗马教廷手谕,将蒙古教区划分为东蒙古教区,包括热河代牧区和大同代牧区两省教区;其中蒙古教区包括察哈尔代牧区,西南蒙古教区包括宁夏代牧区和绥远代牧区两个省教区,荣升德玉明为西南蒙古教区第一任主教,座堂(主教府)设于三盛公。

1884年,宁夏平罗所属红崖子,五堆子、下营子一带遭灾,本堂神父桑桂仁,雇用大船两只,将自愿来套的教友40余家搬到三盛公,后将一部分教友又迁至河套大发公、玉隆永一带居住。此时,磴口地区教友已增加到1500余人。

1884年,租种天兴泉土地19顷。同年,德主教赴北京参加主教会议,后来又回到罗马教廷述职,而后回到比利时本国,以开办婴孩院及其他慈善事业为名,募捐了一大笔资金,于1886年又来到中国,继续担任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居住在三盛公教堂。

三、三盛公教堂之建立

1888年,开始准备修建三盛公大教堂,抽调荷兰人兰广济神父绘图设计,专门负责此项工程。所有木石等原材料,全靠兰州有个林大人,由甘肃、银川等地购置,从水路转运而来。此人正是原初跟随南怀仁来中国的林修士,后来在岱海滩娶了一个姓高的姑娘为妻,便离开内蒙古而到甘肃谋生,因为在兰州盐务上弄了个官衔,所以人称林大人。天主教利用这种关系,请他代办材料运输事宜。正在筹建伊始,德主教于是年5月“圣神降临节”那天,偶患急症而逝。次年,由甘肃调来韩默理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8月间来到三盛公就任,委命罗明坚神父担任本堂,将闵玉清调往小桥畔担任分会会长职务。韩到任后,建堂工程仍按原计划进行。从1891年开始破土动工,到1893年竣工落成,大堂宏伟壮观,在当时当地是绝无仅有的建筑。同时修建了主教府房屋数十间。1894年又在南粮台、天兴泉兴建教堂两座。

1895年动工修筑城堡,方圆约3华里,墙高一丈五尺,由兴盛扬王双全监工,部分教友住宅在内,天主教占用面积约二分之一。



从 1888 年至 1900 年,西南蒙古教区,总共有中外司铎 26 名,其中三道河子分区就有 9 人,在三盛公居住的有戴天录、冯学源、司怀智、郎国安、包海容 5 人。

1900 年春,韩默理主教将总堂由三盛公迁至二十四顷地。此时义和团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各地,蒙古地区人民纷纷响应,揭竿而起,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杀洋人,烧教堂,惩办贪官恶霸,声势浩大,所向披靡。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韩默理,闻得风声紧急,即命二十四顷地之外国传教士 6 人,迅速西行,逃到三盛公避难,而韩主教却独自一人留在二十四顷地。7 月 22 日城破,韩被义和团抓获,带到托克托城烧死。三道河子一带的外国传教士 5 人,还有下营子逃来 2 人,乌兰别鲁克逃来 2 人,以及二十四顷地逃来的 6 人,总共 15 人,集中于三盛公城内,闻讯深感不安。为避祸乱,决定逃回本国,本堂神父戴天录便修书一封,遣会长贾大、张二奎子前往总管处请求。信中说:“现在中外开衅,恐拳匪骚扰此地,趁匪徒未来之前,我等速归本国,恳求体恤我等并抚养所遗教民,将大经堂一座设法照旧存留,离此二三十里之几处小经堂;不但不能兼顾,且恐义和拳匪乘间前来栖身,杀害万民,因此恳将小堂既行拆毁,一总保护而杜祸萌”。后又遣人送信说:“现在临行收拾能用之际,有居民窃取在外牲畜,在内物件,以至能用不济,恳祈助给路费……”等语。总管阿木尔吉日嘎拉,照其恳求,将所有小堂拆毁,并立即派兵丁 20 名,代为看守教堂院门,一面设法助给骆驼 24 峰,驼鞍 24 四副,白面 400 斤,皮靴 5 双,铜锅 1 口,大布帐篷 1 顶,路费白银 27 两 6 钱,总计价值白银 1138 两 6 钱。于 7 月 25 日将兰广济、雷中和、贾明远、魏怀仁、费怀勇、吴兴国、王万福、梅步桂、步世明、胡际昌、戴天录、冯学源、司怀智、郎国安、包海容一行 15 人,由准格尔旗人马希和汉人张二奎子带路,同时选派蒙兵 20 名护送起程,于闰八月十二日到达大库伦(乌兰巴托),十四日由俄罗斯人转送回国。

四、大兴土木扩大传教范围

庚子年后,天主教如愿以偿,更多地占有大量土地,于是积极向外发展教务,原于 1900 年逃回外国的传教士,除 3 人未返中国外,其余 12 人又陆

续回归西南蒙古教区。闵玉清主教为发展教务,将逃离时其他外籍神甫嘱咐拆除的三盛公附近小经堂,重新一一修复后,又于1903年在渡口新建教堂一座。1904年建起补隆淖教堂。将三盛公附近村庄居住之教徒,一部分迁往上述两地。移居渡口堂的有武四(武慕安神父之父)、魏金柱(魏明哲修女之祖父)、段成有(段云神父之祖父)、高二(高志清修女之祖父)、樊二(樊光临修女之祖父)、李三(李枝荣神父之父)以及张爱,李连枝等户。迁往补隆淖的有刘王正、何启俊、赵存马、王光正、李三三、赵全小、武根在、魏保成等户,于是又发展了两个教民村。这两处地方,由于传教顺利,人口逐渐增加,农牧业发展很快,许多买卖商号亦随之而来,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磴口地区较大的村镇。渡口堂教友由最初的30户发展到2500余人,补隆淖约有教友1000人左右。这里的人民,经过辛勤的劳动,年种年收,生活大有改善和提高,正如人们所说:“烧红柳,吃白面,好不自在”。

闵玉清主教在磴口地区传教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又派兰广济神父去二十四顷地,重新修建主教府、会长府、修道院、婴孩院等项工程,并筑起城堡,共费银1.3万两,于1905年二十四顷地新大堂落成,虽不如庚子年前的大堂华丽,但其宏大,仍为全教区各堂之冠。二十四顷地重新修建完毕后,闵玉清便将总堂又由三盛公迁往二十四顷地,小修院也由小巴拉亥迁到二十四顷地。由此三盛公仍为三道河子分区区长神父所在地,管理河套所有各堂教务。

闵玉清在此传教期间,总结了一条经验,传教必须占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土地就无法传教。当建立了渡口堂、补隆淖两个教民村以后,便认为磴口地区的传教已臻完善,无法扩大。因为补隆淖以下地带,早已被地商所占有,协成丰有沈朝品,四坝、公地有双和成、隆盛和、永成泰、大生号、发盛公、德茂堂,以及哈、袁、徐、汤、马等地商所占,就连渡口的大滩、上滩等地也同样被袁、吴两家所占,所以这些地方天主教已无插足之处,因此乘庚子赔款之机,借故曾在达拉特旗修建教堂,被蒙人赶走监工人员赵四拗子,烧毁木料等因,单独向绥远当道提出赔款条件,要求赔跟14万两。而绥远当



道与当地蒙旗,不知底细,既不做调查,也不敢拒绝,便贸然答应赔款条件,遂将达特拉河沿河地带,全部估计 1400 顷,做抵赔银 14 万两,就这样天主教在河套地区轻而易举又占有大量土地。几年以后,教堂渐次林立,除原有大发公、玉隆永、中公尔堂外,又陆续建起蛮会、陕坝、乌兰淖、黄羊木头等教堂,这样一来,三道河子分区的传教重点,便由磴口地区而转向河套地带并逐步扩大其势力范围。

教区、历任主教及其总堂的变迁

所属教区	姓名	在任时间	教内职务	总堂变迁时间及地址
西南蒙古教区	德玉明	1883~1888	主教	三盛公
西南蒙古教区	韩默理	1888~1900	主教	1900 年春迁于二十四顷地
西南蒙古教区	闵玉清	1901~1916	主教	1901 年迁回三盛公 1905 年迁于二十四顷地
宁夏教区	费达德	1922~1931	主教	三盛公
宁夏教区	石扬修	1931~1946	主教	三盛公
宁夏教区	王守礼	1946~1952	主教	1947 年迁往陕坝
河套教区	傅亭维	1953~1956	代权司铎	陕坝
河套教区	孙雪帆	1956~1958	代权司铎	三盛公
河套教区	徐声波	1958~1962	代权司铎	三盛公
河套教区	郝威	1980~1989	代主教	三盛公

备注:从 1962 年起河套教区范围,即巴彦淖盟地区所有各堂口。

前面已经提到,天主教传入阿拉善旗磴口地区之初,这里纯属牧区,虽有几家地商富户,也是屈指可数,他除租种阿拉善旗土地外并经营日用百货,皮毛作坊等。其他佃户均为春来秋归之农民,本地居民尚无一人信教者,除了移来一批基本教友外,绝大部分新教友是通过用土地、钱粮、耕畜、婴孩择配成家等办法而吸引来的,这些教友有的是为了种地,有的是为了成家立业。总之,在很大程度上,许多人都是为了感恩报德,养家糊口,以为权宜之计才进教的。所以这部分人对于“天主、天堂、地狱”等抽象的概念茫然丝毫没有认识。这一点外国传教士也很清楚,从天主教的教义来讲,这叫“信德”不坚固,在特殊的环境下,还会背教的。因此在传教初具规模后,外国传教士便不失时机地加紧对教友进行精神方面的教育及文化教育,以使成年教友信仰巩固,并为争取第二代信徒奠定基础。

首先在各堂村庄成立《要理问答》书房(短书房),因陋就简,只请一位有文化的老教友当先生,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教徒参加学习《要理问答》,该书一册四本,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概括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比如“十诫”,即一钦崇天主于万有之上。二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占礼之日。四孝敬父母。五勿杀人。六勿行邪淫。七勿偷盗。八勿妄证。九勿愿他人妻。十勿贪他人财物。其总纲是,爱天主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四规”一凡主日(星期日)及一总罢工占礼之日,该望“全弥撒”。二遵守圣教会所定的大小斋期。三该妥当“告解”并善领“圣体”,至少每年一次。四当尽力帮助圣教会的经费。“七罪宗”骄傲、吝啬、迷色、愤怒、嫉妒、贪饕、懒惰。以及七件“圣事”等等。用此来约束每个教徒的思、言、行为,使他们服服帖帖做一个天主教的忠实信徒。

同时又实行每年要对全体教徒进行一次考核,这是一次天主教友专务神修生活的大集会,天主教把这种集会叫做“下会”。一般利用农历正月农闲时间进行。首先以堂口为单位,将该堂所属教友,普遍进行登记,小孩不包括在内,每人发给一小纸单,上面写着名字,这叫“神功单”。在下会期间,拿着此单抽时到神父跟前做“告解”,并将神功单交给神父,便于核对。每日



早晨和上午,均到教堂礼拜听讲道,如此七天,下会结束。这种正常宗教生活的集合,是要求教友总结过去一年中所犯过的大小诸罪,在下年中决心改正,做好教徒应尽的本分。下会诸事完毕,神父便按所收回的神功单进行复查,这样就知道谁没有参加下会。对于不参加下会的教徒,根据平时表现,给以不同处罚,轻则批评教育,进而在教堂内当众检讨,这叫“喊堂”,如果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而影响极坏者,则收回土地或拆去房顶,甚至将全家赶走。这种办法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步消失。所以在当时天主教势力范围内,只有外国传教士说了算,教徒唯命是从,不敢违抗,唯恐收地拆房,不得安生。

在抓紧成人教徒学习教规教义的同时,也不放松对青少年一代的宗教教育,除了开办修道院,培养未来神父外,又在各教堂村,办起了男女全日制小学,人们称这类学校叫常书房,凡人学学生黎明即起,进堂念经,课前念经,放学念经,学经、念经成为教会学校的中心任务,当然也兼以文化学习。其办学目的就是为争取第二代信徒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为给修道院输送修道生,这部分小孩子叫“奶子教友”,就是他们在吃奶时就授洗入教了。天长日久,施以宗教教育,使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教书”。潜移默化,很自然地成为忠实信徒。直到1942年以后,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形势所逼,教会学校才有所改革,尽量减少学生宗教活动,增加新学制课程。阿拉善旗磴口地区教会学校也采用了新学制课本。当时教会学校有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所明正中心小学(男女分校)和天兴泉、东堂两所初级小学。

五、磴口籍神父名单

籍贯	姓名	祝圣时间	祝圣地点	祝对主教	现在地址
渡口乡城东村	段世忠	1911	绥远	闵玉清	已故
粮台乡城关村	康景东	1920	绥远	葛崇德	1966年歿于银川
粮台乡城关村	王文昌	1921	绥远	葛崇德	1927年歿
粮台乡城关村	孙学帆	1927	三盛公	费达德	1958年后歿
粮台乡城关村	冯进源	1929	西湾子	兰主教	1957年歿于三盛公
渡口乡天兴泉	白祥	1929			歿于台湾
渡口乡永胜村	周其智	1931	三盛公	费达德	1971年歿于家中
渡口乡城东村	段云	1931	三盛公	费达德	现陕坝本堂
补隆乡友谊村	宋显	1933	三盛公	石扬修	歿
渡口乡城东村	樊永一	1935	三盛公	石扬修	现三盛公副堂
粮台乡城关村	董阴南	1935	三盛公	石扬修	歿于陕坝
渡口乡永胜村	李枝荣	1937	大同	蔡宁	1978年歿于家中
粮台乡南滩村	常建春	1937	大同	蔡宁	1939年歿于渡口堂
粮台乡永进村	冯进毅	1942	绥远	穆清海	现在包头
粮台乡永胜村	刘静山	1942	绥远	穆清海	现在银川本堂
坝楞乡东堂村	郭正基	1942	绥远	穆清海	现在三盛公教堂
渡口乡城东村	武慕安	1942	绥远	穆清海	1983年歿于东堂
渡口乡城西村	李文枢	1950	渡口	王守礼	1987年歿于三道桥
渡口乡城西村	张静源	1950	渡口	王守礼	现在家养病
粮台乡北滩村	李之义	1951	罗马		现在新加坡
粮台乡南滩村	李化民	1952	北京	德主教	现任一中教师



六、磴口籍修女名单

籍贯	姓名	入会时间	现在住址	备注
渡口乡城东村	武文济	1932		已故
渡口乡城东村	武金花	未入会贞女		已故
坝楞乡东堂	朱玛利亚	1932		已故
粮台乡南滩村	郭亚加大	1932		已故
粮台乡兴盛扬	裴德华	1932		已故
渡口乡城西村	陶培贞	1935		已故
粮台乡	张广文	1938		
渡口乡南滩村	张淑安	1934		已故
渡口乡永胜村	周广信	1938		已故
渡口乡城东村	武依撒伯尔	1938		已故
渡口乡南滩村	张淑冰	1940		已故
渡口乡城东村	武耀宁	1940		已故
粮台乡	李广信	1940	杭后	退休教师
粮台乡城关村	李文清	1940	磴口	
粮台乡城关村	陈国贤	1940	杭后	
渡口乡城东村	武美纳	未入会	五原	
渡口乡城西村	攀光临	1941	磴口	退休
渡口乡城西村	李德蕾	1941		已故
渡口乡南尖村	高志清	1942	后旗	退休医生
渡口乡永胜村	武文宣	1943		已故
渡口乡城东村	樊永华	1940		已故
粮台乡城关村	李云清	1948		已故

七、包租土地及收回之经过

庚子赔款后,天主教在磴口地区更多地占有土地,便积极兴修农田水利,继续开垦荒地,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到1931年,已占有土地300余顷,这时土地由无偿发放而变为出租,用土地吸引教徒成了天主教的唯一方

法,而且地租又成了天主教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实现了“以地养堂”。

1931年12月13日,阿拉善旗札萨克王位由达理札雅承袭,是为九代第十位王爷。为废止庚子赔款合同,派人与天主教协商,重新签订了租地合同,租期为4年,每年交银洋1300块,米5石,期满另议。1935年合同期满,阿拉善旗派陈爱尔德尼巴图和陈那笋巴图2人到三盛公与石扬修主教面议,拟对天主教所占阿拉善旗土地,进行彻底清理,但当时阿拉善旗和马鸿逵因磴口问题,双方进行斗争,遂对天主教所占土地未予清丈,并允许继续耕种,双方又签订了5年为期的租地合同,每年交银2000元,粮食20石,到期另议。但据三盛公天主堂收租账目统计:1921年收租粮食556石;1929年遭灾歉收,收租286石;1939年收335石;1944年收542石。渡口堂、补隆淖每年收租粮食数量更多。

天主教在阿拉善旗磴口地区向农民收租的办法,叫“分股子”每年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夏田收割时,由佃户将庄稼割倒、晒干、捆好。然后教堂派专人前往,分片包干,到田间逐块进行“点个子”(数捆子),每百捆抽三十,这叫“三七股子”(三七分成),然后由农民套车装好,送到天主堂场面交付。由场上负责人逐个点清上垛,给一收据。每日分股人与场上负责人进行核对,如有未交清者继续催交,直到交清为止。第二次分股,是在秋收以后,办法和夏收时一样。这种分股子办法,是以夏秋作物青苗为标准,种什么分什么,不种则不分。

1941年合同期满,双方协定,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个堂。所占土地不论多少,每年交租银5000元,粮食30石,合同期为4年。

1944年,阿拉善旗在营管牛犊设办事处,营管牛犊、东堂、红盛义等处,取消包租土地办法,实行以顷为单位(百亩),每顷地收租银200元,由佃户直接向办事处交付。

1945年,天主教向阿拉善旗租地,合同期满后,阿拉善旗发布训令,其内容有三条:(一)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处耕地与天主堂承担契约规定业已期满,本府认为有续租之必要时,仍另外商议。(二)唯查该等处地向



未清丈,殊与政府法令不合,自应遵照实行清丈,以资清理,而符法令。(三)至该地亩实行清丈以后,如天主教堂接洽续租,本府应予以优先之权,但承租及纳租办法,须与本府租地规定统一办理,以昭划一,而免歧异。

陈那笋巴图根据上述精神,前往三盛公天主教堂协商,天主堂不同意丈量土地,提出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处地方之土地,按 60 顷计算,每年交租银 12400 元(旧币)但为两家和好只交 7000 元。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1946 年 8 月 14 日,阿拉善旗又发布训令,其训令,原文如下: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训令(35)秘字 195 号

事由:为派该员等前往三盛公等处办理租地事宜令仰遵照由
令本府主任陈那笋巴图

副主任罗永寿、白诚喜、夏格都尔吉布

查三盛公天主教堂承租本府公地,历年均不照章纳租,匪为影响本府租收,抑且有违承租规定。现查租期已满,该教堂所租公田,另外转租。又查本府公地出租,原为鼓励农民增加生产,所有承租公地者,向自种为限,不得转租牟利,剥削农民,早经本府规定在案。近查仍有好利之徒,私将公地转租,坐享其成情事发生,如不查明制止,不独农民直接受其苦害,即本府爱民之意亦间接由其破坏,影响所至,殊匪浅显,实属痛恨已极,自应查明制止,而符规定,如有故违情事者,着即收回另租,合行令仰该员等前往该处,切实办理,并将办理情形报府备查,乃关要政,慎勿徇情为要。此令。

札萨克达理札雅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一训令下达后,便由梅林章京陈那笋巴图、白诚喜、副处长罗永寿、夏格都尔吉布为正副主任,组织磴口、四坝总管、四坝防卡“达木尔”中队长杨富存以及巴格边官,防卡官兵,共 70 余人,组成丈地收地工作团,前往三盛公与教堂主教王守礼、本堂神父樊静安、渡口本堂郝鹏翰等举行会谈。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本堂神父向工作团交代了教会占地范围及其耕地面积,但多以隐瞒少报,不切实际。遂分组到各堂口开始清丈土地。其丈量方

法是用骑马拉绳的办法,盐碱地、草边地、沙边地不计入耕地数内,除其三处地方,共丈量耕地面积达400顷左右。教会提出要求留给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土地30顷,以维持自耕度用,经报请达理札雅王爷同意后,如数留给教会。将其余耕地全部收归阿拉善旗所有,然后租给农民耕种。阿拉善旗收租委托给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代收,即由渠商人收,集中送交蒙古亭子。阿拉善旗这一果断措施,使阿拉善旗收回了土地权,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天主教在磴口地区的势力。

这年正是王守礼主教到任之初,这一收回非法占地措施,实是非同小可,王见势不利,便另谋他途,将其传教发展计划转向河套和银川。1947年先将主教府迁于陕坝,积极投靠傅作义,又亲自赴银川结联马鸿逵,在傅、马的协助下,相继办起了陕坝普爱中学和银川明正女子中学。并选派郭正基、马仲牧、万斗轩、王甫田、孙仲贤等人,去北京辅仁大学进修深造,输送一批女学生到归绥公教医院学护士,拟在短期内经罗马教廷批准,带领所有外国传教士到宁夏另行成立新教区,河套地区单独成立国籍教区,由此磴口地区的教务,遂处于停滞状态,而王守礼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磴口县开展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天主教堂被实行减租减息,土地不得出租,农民所种教会土地,谁种谁收。1952年实行土地改革时,教会除留有自耕田,及其菜园、果树园外,其余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分给农民耕种。磴口境内,所有外国传教士,陆续遣送回国,从此再无外国传教士的足迹。

八、各个时期教堂变化情况

解放前 庚子年天主教在磴口地区所建七座小堂被拆毁后,又重新依次修复并增设渡口堂、补隆淖两教堂。1911年,磴口地区哥老会兴起,因三盛公居民王广肿纠集教民枪杀哥老会员10人而结下冤仇。为此哥老会声称,誓与洋堂血战到底,遂聚众百人,在磴口地区打家劫舍,烧毁天兴泉教堂及民房,杀死白保子夫妇,继而又焚烧锦恒西天主教堂,然后到渡口堂骚扰,但此地居民已提前逃往大滩寨内避难,幸免遭殃。哥老会大队转移,只



留数人点火焚烧渡口教堂,因情况发生变化,时间仓促,匆匆点燃,便迅速离开渡口堂,经教民及时扑灭,未酿成大火,只烧损堂内大木柱一根。事后又将天兴泉、东堂建起。

1927年以后,费达德主教在任期间,认为三盛公一带,教堂布局过于集中,且距大堂甚近,既分散财力,又浪费人力,大堂又不能充分利用。遂命三盛公会长兼本堂神甫狄文治(因他耳聋,人称聋狄),将三盛公大堂附近之小堂,除粮台教堂而外,其他小堂全部拆除。

自阿拉善旗收地以后,教会经费来源不足,外汇不济,上海房租费,分配缩减。为维持现状,减少开支,便将天兴泉、东堂、粮台三教堂,改为送“弥撒点”,不再设常住神甫。粮台、天兴泉由三盛公代管,每周由神甫送弥撒一次。东堂归渡口堂代管,每周由副本堂神甫去送“弥撒”,或行其他圣事。直到全国解放后,磴口境内尚有粮台、三盛公、天兴泉、东堂、渡口堂、补隆淖六座教堂。

解放初期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男女信徒仍一如既往自由进堂礼拜祈祷。但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一时无力修建政府部门用房,而天主堂此时人员大减,闲房甚多,于是中共磴口县委占用了三盛公主教府全部房屋,县人民政府占用了三盛公女校全部校舍,渡口堂大部房屋被三区人民政府所占用,补隆淖天主堂房亦被四区人民政府占用。

1957年常西满神甫任渡口堂本堂时,因教友进堂人数逐渐减少,原有大堂已不适应当时情况,故重新翻修,缩小面积,并将原堂内中间五大本顶柱、男女分隔七色花栏杆、讲道台等取消,所余原材料全部出售,以弥补翻修费用之不足。

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 1958年大跃进期间,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等六座教堂的住堂神甫有的被捕,有的下放农村劳动,有的被管制,无人进堂念经,此时各作业区集体食堂化,天兴泉、粮台两教堂被作业区用为食堂,后又改做库房。

“文化大革命”期间,磴口县境内,所有教堂均遭浩劫,所有行祭物品及其堂内装饰洗劫一空,一些较贵重的物品也被砸损焚毁,亦有被占为己有的,钟楼拆毁,大钟无踪,除三盛公教堂保存了很少一部分祭衣祭品外,其他诸堂,财物荡然无存。三盛公教堂被公社改做小工厂,主教府房屋被公社拆毁改建其他用房;渡口教堂改为影剧院,所有房屋于1968年翻修改建为公社办公室;东堂、补隆淖教堂,均被拆毁,改建它用。所有各教堂之果园、树园,砍伐殆尽。大部分神甫、修女被打成牛鬼蛇神,游街示众、揪斗、挨批、“群专”、刑讯逼供,随之而来,身心健康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最后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中共三中全会以来的教堂情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宗教政策,1980年12月25日(圣诞节)磴口县首先开放了三盛公教堂,当时因红卫公社小工厂尚未腾出,暂时在巴盟天主教爱国会办公室举行圣祭、主日、占礼,男女教友从四方来此“做告解”、“望弥撒”、“领圣体”,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1981年巴盟天主教爱国会,拨款2.2万元,将大堂修复,于1982年4月20日(复活节)正式开祭,由郝成神父举行了大礼弥撒,参加教友约2000人左右。

渡口堂也于1986年8月17日正式开放,由郭正基本堂神甫做了大礼弥撒,参加盛典的教友约2000多人,除本地教友外,还有来至杭后、临河、五原以及乌海、银川等地的教友。弥撒完毕,还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会上由中共磴口县委统战部部长宿振民和巴盟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郝威、本堂神甫郭正基分别讲了话。

近几年来,由于宗教政策的不断落实,广大神长教友,心情舒畅,再无后顾之忧,在各条战线上充分发挥了主动性、积极性,为四化建设,做出可喜的成绩,许多教友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好家庭,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从而得到人们的称赞。

写于1989年仲夏



阿拉善旗磴口地区天主教堂分布状况

赵钟贤

天主教于 1875 年传到磴口地区时,该地区还属于阿拉善和硕特旗辖地。民国 15 年(1926 年)冯玉祥设兵站,近而策划设县。当时这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多系晋、陕、冀、鲁、豫等省的贫苦农民,春来秋归在这里租地垦荒种地。地貌是一片荒漠原野,遍地丛生的河柳、红柳、芨芨、白刺和稀疏可见的水桐树(胡杨树)。茂密的白刺沙蒿覆盖了沙丘,不少地名至今仍以此种特征得名。如古勒半宿亥(三棵红柳)、冬青梁子、东柳子、北柳子、南柳子、南、北沙湾、茨湾、二十里柳子。或以商号、人名命名者,如祥太东、大盛永、红盛义、永兴镇、天兴泉、三盛公、富太奎、王恒太圪勃、燕家圪旦、丁家圪旦、杨喇嘛圪旦(东地)等等。这里蒙汉杂居,互通婚姻,友好相处,放牧垦殖。

当天主教堂的神职人员“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们,于 1875 年 1 月 20 日来到这里后,目睹这一辽阔无垠之地,既有黄河水灌溉,又有土质肥沃的平原,耳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政权鞭长莫及,欧洲各列强正在争夺沿海地区和中原内地,还没来得及觊觎这块塞外宝地。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块传教布道的理想圣地,便征得罗马教宗及比利时王朝的批准和内蒙古绥远教区——西湾子主教府的同意,由比利时、荷兰两国陆续向这里派遣男女神职人员,开辟“边疆公教事业”的传教活动。传教士们一到此地后,遍踏了磴口地区的全境,熟悉了风土人情,掌握了政权形势,分析了各方面的因素,便确定了这一地区的布点蓝图。传教士们很清楚,要想在这里久踞,必须要

把教堂的据点摆布适中。并且选择地区既有聚集重点,又有附属网点,所以把蒙古地区1个总教区划为3个代牧区,又设有主教宗座府,下有领堂(主堂)弥撒点,每一府、堂、点设有会长、管账先生,掌管会务、财会、土地、渠道以及民团武装、教育、卫生,居民管理等事务。而这一切又集权于本堂神父一人,下属人员只能唯命是从,无权擅作主张。在磴口地区很长一段时期掌管各级堂务的主权,悉为外籍神父,国籍神父只是属于被支配地位。

宁夏教区及磴口地区的传教布道点先属于西南蒙古教区,后来改为宁夏教区。它原先包括绥远二十四顷地以西(后以包头以西为界)西至宁夏全境,黄河南岸伊克昭盟全境,陕北安边、靖边、定边,全属于宁夏教区所管辖,主教宗座府就设在磴口的三盛公。这是这一地区权力最高,机构健全的首府,主教即住在这里,指挥着全教区之行政、教务、外事等事务。

各教堂地点多设在交通要道和人口较聚居的村落镇地,内蒙古西段的河套地区,选择了三盛公、补隆淖、渡口、东堂、黄羊木头、乌兰淖、陕坝、三道桥、王良滩、大发公、圣家营子、玉隆永等地。在宁夏省银川北选择了平罗县的五堆子、红崖子、下营子。这些地区文化不发达,人民处于愚昧状态。清末民国以来,灾荒频仍,盗匪崛起,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命财产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天主教传入之后,略事施舍救济,加以组织便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天主教在这个地区鼎盛一时,以致这个地区的人民只知有天主教、梵蒂冈、罗马教廷,而不知当朝执政者为何人。显然这里已成为天主教王国。兹就磴口各教堂分布和建立情况叙述如下。

一、三盛公教堂

初建于1880年,它坐落在黄河北岸,辖区西临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北至黄土档,地处河套平原西端,为绥宁走廊水旱两路必经之地。旱路由原绥远、包头、前旗、五原、临河、杭后途经三盛公黄河北岸,西经粮台、二十里柳子、上江、傅家湾子、磴口(现在阿拉善左旗巴音牧仁苏木原磴口县府所在地)官地、稗子地、乌兰木头、乌达(原三道坎)、二子店、石嘴山,直达宁夏的银川市;水路由包头逆流而上,贯穿整个河套,与伊克昭盟隔河相望,穿宁



夏全境,而进入甘肃。在三盛公河岸的巴拉贡门子设有渡船,若取道伊克昭盟西赴,可从此乘渡过河,途经喇嘛庙萝卜召、百眼窑、棋盘井、拉僧庙,渡河到达石嘴山,取道旱路可达银川。因此三盛公为当时磴口各商号、甘草场、蒙汉贸易、人口聚居的重镇。主教府设在这里居中心地带,可以囊括后套、伊克昭盟、陕北三边、宁夏银川以北地区,是传教布道的理想之地。从阿拉善旗磴口地区地理环境来看也居于中心区,所以“圣母圣心会”的比利时籍传教士德玉明、桂德贞等到此不久,便选择了这里为“长治久安”之地,安营扎寨,设点传教。经几度春秋,几度寒暑的苦心经营,教务发展大有成效,遂决定修一规模宏大的教堂,以拓展这一地区的教务。

1888年,德玉明主教设想另行建一座宽敞雄伟的高大经堂,地址选择在离旧堂二里许的一个大土丘上。德积劳成疾病故,由荷兰人韩默理继任,委派谙熟于建筑技术的兰广济神甫设计了图纸,于1890年先行备料,一切木石用料都取自宁夏兰州水上运来,就地招聘土木技工,廉价雇用逃荒饥民破土动工,历经3年多时间,完成了此一在磴口地区极其宏伟高大的建筑物。

圣堂面积占地1亩多(675平方米),成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根基深挖近两米,底部用经久耐用的大块炭作基础,炭上铺着有规格的条石,石条上砌着横平竖直的精制砖。堂高3丈(10米)堂顶用铁瓦覆盖,窗上镶嵌着五色花纹的玻璃,室内布置得整齐美观,有各种神态严肃庄雅的画像,设有祭台一座,小祭台4个。祭台下面圈有3间大的墓穴一处(外国教士尸体寄于此处),堂院大门口上建一钟楼,高3丈许,上悬两口铜钟,敲起晨钟远在10里之外亦能听到声响。大堂内能容纳善男信女3000余人颂经祈祷。在极盛时期这一教区的虔诚的教徒从四面八方云集在三盛公城里,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特别在逢四大瞻礼或庆祝大典时,于凌晨开始顶礼膜拜,跪在堂内院内的信徒唱经声朗朗动听,奏乐声悠扬嘹绕,充满堂内,让人叹为观止,留连忘返,可谓这一地区盛况空前之聚会。

大堂东侧建有男校一所,设有教员室、教室、学生宿舍。距大堂300米



处的东北角建有小修道院一处,布置有小圣堂一座,正中间为院长办公室,修道生的寝室,一边有自修室,并有课堂两座和图书室,另一边亦建有修生的寝室。校院宽敞远离其他房舍,独占一院以示离开俗间,超然尘世;大堂西侧建一女校,另辟一院,其间有修女室,女学生寝室,自修室几间,课堂几间,还有如早在 1888 年以来收容的男女弃婴开辟的育婴院;大堂北侧正中间处建有主教小堂,主教办公室、卧室、神甫住房、会计室、藏书室、灶房、餐厅等。

三盛公教堂既为主教府所在地亦为这一地区的主堂(领堂),它的半径管辖圈内,西有金沙庙、南粮台、兴盛扬、富太奎、西南有双合成、旧地(1886 年建)、圣母堂(1887 年建)、东有南套子,东北有天兴泉。其中南粮台建于 1886 年,经堂面积 200 平方米,当年贝清明在此任本堂。天兴泉建于 1886 年,经堂面积 250 平方米,胡司铎曾任此本堂。1927 年之后,迭因兵荒马乱,土匪蜂起,上述一些地区改为日常送弥撒点,逢大型瞻礼、庆典,教徒都来三盛公颂经祈祷献仪。

围堡 建立围堡巩固教务。1896 年磴口地区以三盛公教堂为开端大兴修筑围堡工程之举,一为防范出没无常匪徒之骚扰;二为管理教务之便利。所以,大肆招募工人进行建筑。三盛公围堡建成后周长达 3 华里之许,留有东西两门,墙高两丈,宽五尺,墙顶端有六尺高的隐身墙,四角建有守卫炮台,民团武装值勤人员可以在城顶部巡逻放哨。堡内以东西门通衢为界,北部区悉为教堂所占,北墙内植有桃、李、杏、枣等果树。菜园内栽培着葡萄,自行酿造葡萄酒,并雇有园丁种植食用蔬菜,南部一半为教徒居住区,约百十户之多。

历任主教

1. 西南蒙古——绥远宁夏——呼和浩特教区

德玉明	主教	1883 年~1888 年
韩默理	主教	1889 年~1900 年
闵玉清	主教	1901 年~1915 年



葛崇德	主教	1916年~1937年
穆清海	主教	1938年~1951年
王学明	主教	1951年~1989年

2.宁夏教区——三盛公——陕坝

费达德	主教	1922年~1930年
石扬修	主教	1931年~1944年
包恩波	临时代理	1944年~1946年
王守礼	主教	1946年~1952年
傅亭维	副主教	1948年~1955年
孙雪帆	代理主教	1956年~1958年
徐声波	代理主教	1958年~1962年
郝威	代理主教	1962年~1989年

闵玉清、方司铎、石扬修、贝清明、罗明坚、狄司铎、吕文化、文海迪、樊静安、韩斯廉(均为外籍神父)

谢久敬、常西满、孙雪帆、徐声波、王世彬(均为中国神父)

1982年至目前先后有石玉安、郭正基为主教。

二、渡口教堂

渡口堂为磴口仅次于三盛公教堂的第二大堂。渡口总面积 17 万多亩，在三盛公之东。东南邻黄河北岸，与伊克昭盟之杭锦旗隔河相望。西靠大滩渠与磴口县原第三乡交界，南毗邻东地之杨留柱圪旦(东柳子)，在旧社会属磴口县第四乡。全境土地平坦肥沃，居民集中，人民生活富庶，除了个别回民户，山西保德县人外，其余悉为天主教徒。最初有教徒 800 余人，最多时达 2500 余人。渡口这一名称是由一摆渡蒙古人——毛脑海而得来的。

渡口堂于 1902 年建立(亦说 1903 年建立)，当时的渡口堂全境还是一片茫茫原野，遍布红柳、河柳、白茨、芨芨等灌木杂草和沙丘。人行及车辆来往还得绕着棘草空隙沙丘两侧行进。建堂伊始由梅禄曼神甫(比利时人)主持，从开始教务较早的三盛公信徒中发动了一批强壮劳力，自带口粮早出

晚归,斩棘削荆,铲高垫低,开辟了一条由渡口通向三盛公的便道。并由老教区——现凉城县岱海滩移来的教徒中动员了十八户定居在渡口垦殖。这批人的后裔,如胡三喜、段二、武四、高从礼、高从智、刘四圪旦、韩克罗、胡宽子、张宣、武元仁、张爱、胡正义、张进为、张福寿、张三海、张义子、邢寡妇、邢虎般、潘寡妇等。其后人健在的,目前还住在渡口。

渡口堂于1957年翻修缩小,即现在的经堂,长35.6米,宽12.4米,计441平方米。经堂坐落在城北端,堂门口有两株高约34.5米,粗围约2.85米的钻天杨。经堂后侧建有神父修女住宅,分隔在两侧。厨房、饭厅、储藏室,育婴室应有尽有。一所完全小学建在堂院东南端,女校在西南侧,书房一所,附设有诊疗所一处。1929年本堂神甫吕文化修起东西宽1360米,南北长1700米,周长约三里许的小围堡,将天主堂、神父住宅、男女学校,两个花、菜园以及部分教民住宅包围在内,初占地约100市亩,后邓德超第二次任本堂,扩建城垣,于1930年动工,1931年竣工,又修起较大的城堡,将小围堡和村内居民全部包括进去。建堡费用曾按居民占地多寡摊付一部分外,不足部分由天主堂支付。城堡东西宽280步,南北长386步隐身墙高6尺,城垣墙基铺底8尺,高1.2丈。扩建后的大围堡周长约2公里,四角建有碉堡炮台。1926年左右由马神甫(比利时人)组织起民团武装四五十人,可在上面巡逻放哨守卫。留有东、南两处城门,西、北各留有小门,城门紧闭,出入行人得经侦询。城垣北外侧辟有大树园一处,用地50亩,种植的杨、柳、榆树,杂草茂密没膝,雉鸡野兔奔窜其间,为神甫们持枪狩猎游兴之好去处。垣内辟有5亩大的菜园两个,种植的葡萄每年酿造葡萄美酒供祭祀和神职人员享受。另辟出较大的菜园一处种有各种蔬菜,所以这一教堂(领堂)到1946年人数之多,地域之大,收入之丰,权力之高为磴口其他教堂之冠。城内有南北街一道,南门直对经堂,东西街一道,南北街两侧有小型商店数处,食品干货店两处,大烟馆两处(庞富、王全福),绒毛商有天义盛一家,这些商号多与伊盟克昭境内,陕北神木商贩和驻扎军队中之军商打交道(教民在教堂之禁令下不得吸食种植大烟)。并有私人开设的碾磨坊数



处,大榨油房三处(天义圣、武元仁、高从智),范三眼、徐存才、赵仓等人开设漏粉坊三处,药铺一座。

为了灌溉方便,1903年马神甫入主教堂之时开挖了一道新干渠即渡口渠,由南向北贯穿全境。此处政治、经济、水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一揽于教堂之手。国民党政权虽在此设有乡公所一处,辖保两个,甲20个,而乡保人员悉为忠实的教徒所担任,所行事务需与神父或会长、先生协商办理,才得以顺利进行。

渡口堂历任神甫有比利时人梅禄曼,荷兰人邓德超,还有吕文化、马神父、邓德超(二次)贝清明、郝鹏翰、文海德。还有国籍神父常西满、石玉安。

渡口教堂历任会长有魏金柱、张太、段拉万、燕二树、徐四牛、李九合父子二人,吕来栓、张永清、李枝秀、樊五、朱福贵。

1928年前渡口区域内只在杨留柱圪旦、骆驼脖有八株柳树,之后在天主堂的倡导下,开始营造林园。继之有武元仁、任二虎、段文廷、周三喜、李喜智、张永清等富户营造有林园,目前这里林木丛丛,每到夏天,渠堤道旁林木成荫,一片好风光。

三、东 堂

为传教士先驱者德玉明、桂德贞等三司铎1875年来西套时落脚之处。原建有经堂一处,面积250平方米,并建有男女校舍。1933年在原断壁残垣的基础上,复修小城一座环城大约三里许。东堂西侧有菅官牛棋,北侧有红盛义,南端有丁家圪旦、温家圪旦,东南五华里处有韩家圪旦,东有郭家圪旦,为原国民党时期之第三乡二保区域。这里曾住有神甫修女。

四、补隆淖天主堂

是磴口境内第三座大教堂。1904年由比利时籍神甫郎国安修建,经堂面积350平方米。它位于磴口出境处前往杭后、临河边境之乌拉河西侧,为磴口第五乡所在地。它的区域为西至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之沈家河右侧,南端至坝楞乡之红盛义;东部靠总干渠,北至艾家湾子两苗树,总面积5500余亩。境内居民多为信天主教者,少部分人信奉佛教。土地权分掌在天



主堂和地主袁、吴两家之手。沈家河插西部边缘而流入今协城乡境,经堂坐落在绥宁公路西侧。1929年由戴德超神甫修建起围堡1座,周长二里许,经堂、学校,男女神职人员住所,诊疗所均包括在围堡内,居民围住在围堡的南、北、西三侧,马路(公路)西侧居住着回民若干户。补隆淖教堂次于三盛公、渡口两堂的规模,但它是连接临河、杭后各教堂之纽带。解放前阿拉善旗磴口虽与临河、杭后跨省在政治上分省管辖,各不相关,但宗教事务的联系与管理并没有因此而受阻。补隆淖半径之内管辖的召滩堂就座落在临河境内,这里也建立过简易经堂,迭因河槽改道,杨家河、乌拉河平口引水之变迁,教徒居民不多,而改为补隆淖教堂之送弥撒点。补隆淖教堂自建立起来后,就常住有神甫、修女、教书的先生,就地选用了会长、管账先生。历任本堂有外籍神甫郎国安、于广义、梁明善、戴德辉、高明道。中国神甫有郝若旺、孙雪帆、李枝荣、武慕安、冯进礼、李文枢。教徒发展到1000多人,而召滩一处另有教徒400余人。这个堂的特点是中外神甫人数各半,大概是此处教堂经济来源不大,教务又不繁忙所致吧。1972年拆毁。历任会长刘王正、掌柜赵二愣、先生何起俊。

以上四个教堂——三盛公、渡口、东堂、补隆淖的布局基本上囊括了磴口县四个乡——二、三、四、五乡全境,及阿拉善旗之磴口地区4个巴格——磴口、道劳素亥、哈拉霍尼图后改为巴彦套海、沙金套海的一半之地归属了天主教堂。特别在庚子教案割地赔款之后,这里成了天主教王国,各教堂的掌权司铎也悉为外籍神甫,住在主教府所在地三盛公的外籍男女神职人员,权限高于国籍神职人员,不平等条约给国家蒙受了灾难,给中国天主教也带来了屈辱。如从甘肃调来的外籍女神职人员要教徒称呼“姑奶奶”,住在上院,而本国修母就被呼之为“修女”,住下院。外籍男女神职人员趾高气扬,而国籍男女神职人员俯首听命,自尊感、民族感受到了损害,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屈辱,这是特点之一。天主教自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经利玛窦传入中国,到1946年,一切教制不能走上正轨,常是代理性的。例如教区名称,从一开始就称“蒙古教区代牧区”,意即代替罗马教皇在内蒙



教区执行任务的区域。以后虽称为“绥远教区主教”，但按教会公文写法，仍然是代牧，而不是地方性的自立自主的主教，与欧美独立国家的天主教区主教名称不同此其二也。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订有传教士们在各地传教自由和受到保护的条文，因此，传教士们身带武器遍踏中国各地，比之中国人在国内行动迁址还要自由得多，遇有外事交涉不是以法国为首的各国使馆出面支撑，就是胁迫清廷总理衙门饬令各地依从外籍传教士们的“要求”。这些有辱国格不平等行文在阿拉善旗档案中存有大量的资料，外籍传教士们为传圣教而采取的这些手法，给宗教蒙上了政治色彩的阴影。居心所在昭然若揭，此其三也。不经当地政府批准，擅自移民开渠垦殖，建教堂、筑围堡，拥有民团武装，虽说抵御匪患，但亦属特权之表现。对磴口地区，马鸿逵入主宁夏政权后又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和控制，这就使当时的阿拉善旗执政的札萨克达理札雅等上层官员们忧心忡忡，不得不加重对这一地区的防范，这样就形成了磴口地区的特殊环境——马鸿逵、天主堂、阿拉善旗互相角逐的三股政治势力的局面。磴口的人民自然也就俯首在这三种政权下生活，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结束了这一地区的特殊政治局面。

五、教堂民团武装之建立

清末民初以来，盗匪蜂起，散兵游勇横行乡里，殃及人民，生命财产难以自保，这种祸患在口外地区尤盛。自马化龙造反，义和团农民起义，哥老会以来，边外这块政权鞭长莫及的地区，就成了土匪随意出没的地带，不少传教士和教徒死于匪难者日有所增，为了防范不得不建立围堡、武装。那么各地区的围堡相继建立起来了，就得组织武装，因此各地天主堂就从当地教徒中选拔青壮年日夜轮流放哨。平时每堂口约十几人，有事召集，无事回家生产，是一种不穿军服的自卫队，任务是侦察来往陌生人，不知底细者，不准进入堡内，这是武人的由来和运用。

有了武人，就得有武器，二者不可缺一，才能保平安。天主堂的武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筹集而来。庚子年以前外籍传教士来华时都自带有自

卫枪支和猎枪。庚子年以后,经过教案处理,从官府领回一部分自卫枪械(180支),如“二人台”、“火枪”、“老毛瑟”等分给了三盛公30支,一部分是从散兵游勇中购置而来,多为教徒所拥有。1915年马福祥任宁夏镇守司令,马与邓德超交往深厚,马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时路过渡口,邓率领教徒远出欢迎,接待在堂内,盛情之下邓向马索要了20支枪和部分弹药。其他教堂多向散兵游勇手中购置而得。天主堂有了围堡,有了武人,有了武器,就有了自卫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教徒,安定了社会秩序,一度使磴口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安心生产,生活得以好转。加之当时的阿拉善旗的保安队能随时追剿匪患,维持社会秩序,使这一地区一度呈现和平景象,生产生活水平有所上升。

写于1988年11月



阿拉善旗三盛公天主教主教座堂历任教主

郝威

“庚子赔款”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外国订有不平等条约。传教士就以这种条约作为护身符，长驱直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比利时、荷兰的“圣母圣心会”受罗马教廷的派遣，来内蒙地区开拓传教基地。“圣母圣心会”曾于 1865 年正式接管了原“遣使会”代管的内蒙古宗座代牧区。当时的蒙古宗座代牧区，共划分为 3 个代牧区，即西南蒙古代牧区，中蒙古代牧区，东蒙古代牧区。西南蒙古代牧区，包括宁夏代牧区和绥远代牧区两个省教区；中蒙古代牧区，包括有西湾子代牧区和集宁代牧区两省教区；东蒙古代牧区，包括有热河代牧区和大同代牧区两省教区。

1923 年罗马教廷正式批准建立宁夏和绥远两个代牧区。1929 年罗马教廷又批准西湾子代牧区和集宁代牧区的建立。同年罗马教廷也批准建立热河和大同代牧区。从此蒙古代牧区才有了固定的省教区划分了。

三盛公教堂是 1865 年以来蒙古宗座代牧区开创的重点教堂之一。1875 年阿拉善王爷在察哈尔某地与传教士相遇，得悉他们有志到草原开垦，就在这一年有两个教士德玉明(teros)、桂得贞获得阿拉善王爷之许，先在现磴口县东堂支起毡包作为临时传教点。两年以后，从阿济尔玛移来 200 多人，随又由岱海等地移来 300 多口人建立了圣母堂、旧地等小村子，作为传教的根据地。

1878 年教会买下了三盛公字号的旧油房一处，这是三盛公教堂的雏

形。1883年闵玉清为三盛公教堂的第一任本堂神甫,1892年华北地区年景不好,逃来三盛公的难民很多。借此闵玉清即向罗马要来了修建大堂的款项,由兰广济神甫监工,于1893年大堂落成。

三盛公教堂定为主教座堂,是由比利时人德玉明在1884年由罗马委任为西南蒙古的第一任主教开始的。同年5月18日,德在西湾子祝圣主教归来,定三盛公为主教府。德玉明于1888年7月21日亡故,由比利时人韩默理(Hamen)在1889年2月13日接任第二任主教。到1900年春,义和团起义运动风靡全国,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韩默理命令巴拉盖和二十四顷地的外国神甫火速逃到三盛公避难。并准备了一些马匹、骆驼于8月29日启程;从山后逃往大库伦。当时在三盛公聚集的外国神甫共15人,到库伦后转乘西伯利亚火车回国。韩默理坚持留在巴拉盖和二十四顷地。1900年7月24日义和团起义后,安九夫人在二十四顷地捉到了韩默理,带到托城(今托县)被点了天灯。

1901年春,反洋浪潮平息,外国传教士又回到自己的岗位。1901年4月15日比利时人闵玉清(Freming)被罗马任命为三盛公的第三任主教。在位14年,于1915年2月16日死在缸房营子。1915年秋,比利时人葛崇德(Dyckan)接第四任主教。1921年葛崇德调任绥远教区主教,1922年3月8日荷兰人费达德(Fredrix)任三盛公第五任主教。起先号称西南蒙古代牧区,主教由他开始为宁夏教区的第一任主教。费达德于1930年因年老多病,辞职休养。1931年12月15日选圣,比利时人石扬修(Schotte)为宁夏教区第二任主教。石上任后首先于1922年成立了“圣母修女会”,任命了裴德华修女为第一任圣母会修女会院长。石扬修在任时曾亲自带领我们修道生植树造林,现三盛公完小西墙外,人们都叫“主教园子”,这个园子,就是他创办经营的。原来的面积只有七八十亩地,植有杨、柳、榆等树,其中还植了不少的杏、李等果树。现红卫城关一队张多多的父亲,当时就是看园子的工人。石扬修主教对培育中国的神甫修女是比较认真积极的。他首先选送了陈宽明神甫、万斗轩神甫和郭正基神甫上辅仁大学深造。之后,又派遣魏明



哲、李德蕾、王睿明、张淑安等女学生到银川师范上学。这些做法在教会来说是史无前例之事。石经常巡视宁夏、三边、河套三个分区的教务，积劳成疾，终于1944年患病死在三盛公主教府。当时我是五年级的修道生，修院院长樊静安，让我给石主教油画过棺材。

石扬修主教去世正在抗日期间，宁夏教区的教务暂由比利时人圣母圣心会会长包海容代理。

1946年4月罗马教廷委任比利时人王守礼(ranmelckeke)为宁夏教区第三任主教。当时王是呼和浩特市公教医院院长，5月2日由穆清海主教祝圣后，随即到三盛公接任。王守礼到后三盛公本堂和修道院共同举行庆祝主教就任的活动。修道生排演了古经故事剧“古圣若瑟”。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当时的三盛公村来说，可谓之热闹非凡的盛会，观看演出的是有千余之众。

王守礼上任后，随即召开了主教议员会议，会议决定将主教府迁往陕坝天主堂，因为当时的陕坝在河套地区是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城镇。

王守礼到陕坝后，计划在陕坝修建一所较大的医院，地址也选定在陕坝天主堂的南门外的树园子，并备料修盖陕坝天主堂和扩建普爱中学。王守礼在任3年作了不少计划，也选送了韩进恒、马仲牧等人到辅仁大学深造。还选派了一批女学生如邢建忠等到呼和浩特公教医院学医。1949年全国解放，王守礼的计划亦告结束。

由1949年解放至1952年的3年时间里，政府对天主教的神甫修女曾作了不少的说服教育工作，但王守礼等外国神甫，始终抱着和共产党敌对的态度，并采取对抗的行动，尤其王守礼在1950年派李世芳神甫到北京学习“圣母军”的组织经验。李世芳回来后，王守礼马上让李把“圣母军”组织推广到河套各教堂，成立了堂口的“圣母军”支部（也叫圣母慈爱祈祷会）。我记得陕坝堂是徐声远为该会的指导司铎，候允希为普中的指导司铎，三盛公樊永逸为指导司铎。我没有参加过他们开的会议，但“圣母军”的章程上规定采取直线联系办法，专门拉拢进步青年学生，使之免受共产主义思

想影响。到 1951 年底，“圣母军”的活动可说是在河套天主教范围内是盛极一时的了。天主教的神甫修女以至于修道生，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是抵触对立、格格不入的。到 1952 年政府下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对首要者绳之以法，对胁从者给以教育为主的办法，对外国传教士采取驱出境的措施。从此王守礼等外国神甫被驱逐出境离开了中国的国土。外国人控制了 100 多年的磴口地区天主教会，从此才归还到中国神职人员的手中。

外国的主教神甫虽然被赶出了大陆，但他们控制中国教会的思想影响还留在中国，留在磴口地区。在王守礼临走以前就安排了他的磴口地区教区的继承人。其名单排列是：傅亭维、孙雪帆、李世芳、周其智、孙仲贤、刘静山、冯敬礼、徐声波 8 人。并有留言：“一旦为首的被捕，应按以上顺序马上接任主教职务”。1952 年以后河套的代理主教，一职都是遵照这一安排执行的。

河套第一任代理主教就是傅亭维神甫，他完全按王守礼的部置办事，终于 1956 年被捕，按王守礼定下的顺序孙雪帆主动宣誓就任。孙在位两年，更是忠于王守礼的嘱托，虽然于 1956 年 5 月成立了河套教区“爱国会”，政府让孙雪帆任主任，郝威任秘书，同年选派孙雪帆出席了北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一届成立大会，但终于在 1958 年犯错误被捕。

现在按王守礼提名的 8 个人只剩最后 1 人徐声波了。按教会接任手续，1958 年春，徐声波当了代理主教。徐当代理主教，记取了前任教训，接受政府政策，能跟上形势。同年 6 月召开了巴彦淖尔盟天主教爱国会改选大会，会上改河套陕坝教区，命名为巴盟教区。改河套教区爱国会，为“巴盟天主教爱国会”改代理主教为教区长。会上选徐声波为巴盟教区爱国会主任，郝威为副主任，王世彬为秘书长。又选徐声波为巴盟教区教区长，郝威为副教区长，从此河套教会才真正的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

1958 年秋天，巴彦淖尔盟教区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进行了堂口规划，把河套 12 个堂口合并为陕坝、三盛公两处教堂作为重点，其他堂口一律为送弥撒点。教会为了配合人民公社化的新形势，组织神职人员参加社会服



务事业。陕坝的神甫万斗轩参加了医务,段万科、李文枢神甫和张凯清、武文新、张淑安等修女都参加了公社办的园地和缝纫组。

1958年秋天巴盟爱国会根据会议的决定,搬迁到磴口三盛公巴盟公署所在地。在这里集中的神甫修女人数最多,神甫有:徐声波、郝威、王世彬、李化民、石玉安、刘仲明、樊永逸。修女有:李广信、周广信、李德蕾、李云卿、李文清、贾斌利、樊光临、王睿明。

1959年,巴盟政治学校成立,杨子荣任教育长,教会的神甫修女自己寻找职业,郝威在磴口县服务总店钟表门市部工作,1959年夏天调回政协综合服务厂任厂长,王世彬任副厂长。修女除李广信、王睿明教学外,李云卿在供销社工作,樊光临在政校任校医,其他人都在综合服务厂工作。当时的神职人员和修女年龄都不太大,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自食其力的号召,都投入到综合服务厂的第一线工作中去。任务和工作还是比较紧张的,我记得我们厂经常在政校杨子荣同志的鼓舞下,多次放过“卫星”,得到政协和有关领导的表扬。

1959年春天徐声波神甫患了胃癌,组织上派我随同徐声波到北京治疗,在北京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帮助下,先后在北京肿瘤医院,北京中医院治疗了半年,经过确诊,病已是胃癌的后期,才返回三盛公休养。

1962年4月,徐声波因患胃癌病逝世。同年5月在政校召开了全盟爱国会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选郝威为巴盟天主教爱国会主任和巴盟天主教教区长,王世彬为秘书长,兼综合服务厂专职副厂长,郝威兼任厂长,从此郝威成为搞爱国会工作的专职人员了。

1962年秋,郝威出席了北京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委员。同年冬天银川市的刘治国神甫、武慕安神甫来磴口商谈银川、陕坝、三边和巴盟教区划分问题。对教会原有的经济按当时实有的人数比例分划。经过充分协商,最后三方作出了经济分配协议书,并签了字,河套、银川、三边教会的经济由此截然分开了。

从1962年到1965年的几年中巴盟爱国会专门搞了河套传教史的编

写工作。派王世彬、万斗轩、高志清下乡采访了各堂的知情老人,于1964年基本写出了初稿共计有4万字左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此项工作终止,神职人员和修女等被打成黑帮,整天挨批受整监禁审查,嗣后被遣派农村劳动,接受改造。天主教堂和厂子的财物一律上交磴口县财税局处理,家俱实物都由财税局,分给了磴口县的各个公社。

1972年9月2日巴盟统战学习班成立,郝威被吸收为学习班学员,在此期间我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温暖和照顾。

1977年统战学习班解散,巴盟政校恢复工作,我们学员又都成了政协的成员,1978年12月27日巴盟统战部在盟委礼堂召开的“关于给齐文魁等十名爱国人士平反决定”大会上才给我们摘掉了“牛鬼蛇神”的帽子,恢复名誉,落实了政策。

1982年6月22月到26日巴盟召开了六届政协委员会。会上郝威继续当选为常委。1980年5月10日到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天主教第三届代表大会,会上选举郝威为委员,同年8月10日至21日内蒙古自治区也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和内蒙古自治区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以省和自治区划分教区的决议,选出了自治区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的领导班子,爱国会主任王学明,副主任张徽敬、艾世钧、郝威,教务委员会主任:王学明主教、副主教艾世钧、郝威、乔占英、常世纪、胡儒汉,秘书长田维耘。自治区以下各盟为分区,由各盟的副主教分管。1981年6月10日巴盟分区也召开了巴盟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会议和巴盟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选举郝威为主任,副主任有李文枢、王世彬、刘静山。秘书长石玉安,教务委员会也是同一领导成员。自爱国会第二届会议以来,根据工作的需要,巴盟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的机构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因此在1984年6月13日至20日召开了巴盟天主教两委扩大会议。与会神职人员、修女、教友共50多人欢聚一堂,会议传达了中央文件和中央首长讲话等材料,通过一系列文件的学习,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心情舒畅。此次会上增选了新的领导班子:主任郝威,副



主任郭正基兼秘书长,副主任李文枢、王世彬、李化民兼副秘书长,副主任石玉安。教务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相同,会议结束后马上召开了常务委员会,会上任命郭正基为三盛公教堂的本堂神甫,樊永逸为三盛公教堂副堂神甫,石玉安为住堂神甫,任命李文枢神甫继续任陕坝本堂,段云、段万科、王甫田为陕坝住堂神甫。通过会议和学习文件精神,大家很受感动,一致表示今后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爱国爱教的精神准则,当好领头羊,让中国天主教徒,必须为祖国的建设作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写于1984年7月12日

高世格梅林及其《普济杂方》

段贡布甲布

高世格梅林乃 19 世纪蒙医学者之一，我们虽然对他的生平知道得不那么十分详细，但是通过他的著作可以看出，19 世纪末他已经是一位老者了。他是“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亲王旗下梅林章京”，通晓蒙、汉、藏、满四个民族的文字，又能相互翻译四种文字，是当时阿拉善旗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一生不仅为振兴本民族的文化勤奋学习，为国效劳，而且对人民群众的疾病痛苦都给予严肃认真的治疗。他搜集整理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著有《普济杂方》一书，对解除人民群众的病痛，对蒙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生活在清朝咸丰、同治年代。阿拉善旗被清朝承认以来，喇嘛教大规模地传人，阿拉善旗王公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政治上空前的封建化。当时疾病蔓延，牧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高世格梅林的《普济杂方》就是在同治十一年（1872 年）在北京木刻出版的。他所收集、整理的药方是以解除人民大众的痛苦为出发点，以“在蒙古地区容易购到的药物为主编著的。《普济杂方》序言中有如此记载：“多次转世之活佛，在阿拉善旗内，享誉维宗沙布隆者，明智喇嘛有言：选译汉译良方，杂病速效易治，编著蒙文医书，京城木刻出版。病人得知药方，解除疾病痛苦，此恩必有好报，享福如同海洋。”

由于以上序言的记载，对《普济杂方》产生了几种误解，造成了众说不



一的现象。一说高世格：不是《普济杂方》之作者，而是译者；二说《普济杂方》之作者是维宗沙布隆；三说高世格不是医人。还有一种说法，说高世格是医人，且《普济杂方》就是他所著，笔者同意最后这一观点，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普济杂方》中确有一部分汉医方(中药方剂)，是选译了汉族民间单方为主的，但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是搜集、整理了蒙古民间流传而未记载的单方、验方，如《女病速医方》中写到：“凡女人生产，铺红马皮或双手攥乌布吉伯皮或者是飞鼠石(一种鸟化石)则快生易生，此秘诀也”。“胞衣难下，将其发稍入口中使欲呕即下也”。“灶心土二钱，用水搅拌灌给，则治胎位不正或胎死腹中，甚至难产昏厥”。这些都有明显的蒙古地区民间单方特征，类似治疗方法记载甚多。所以，笔者认为《普济杂方》绝不是个译著，而是撰者。

(二)《普济杂方》序言中也没有说过维宗沙布隆所著，只是说维宗“有言”，是用其所名，为什么借用维宗之名？当时由于喇嘛名气雄厚，所有著书立说的人必须通习藏文“五明学”，所以一般庶民之作难以在社会上传播，尤其当时阿拉善地区学用藏医，以藏文《四部医典》为准，不便发表民间蒙医单方或汉医简方之著。因而，在他的著书中不得不用“福因寺”活佛维宗沙布隆之大名。但是笔者不否认作者当时与维家合作的可能。这个维宗沙布隆可能就是三世维宗沙布隆伊喜丹金。

(三)高世格无疑是一个医人。他通习四种文字，虽当了梅林章京，可精明医理，积极坚持从事临床，与病人接触，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在治疗癣时说：“这对各种新旧癣、疥之最良方，本人多次亲验得知也”。在治疗胃病的方中说：“婴儿胎发隔瓦炮制研末，用酒服之……此乃本人多次试探获得”。由此可见高世格梅林是一位医著学术水平很高的医生，别具一格，有见解，不同于汉、藏医学，所以，应该评价他是近代蒙医药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普济杂方》只有 9600 余字，是属于小型医疗书籍，内容包括了五官、妇、幼，五脏六腑之病及外伤、皮肤病等 16 个章节，记述了 280 多种单、验

方,其数量之大使人感到兴奋。《普济杂方》的特点是语言精炼,内容丰富,小方治大病、贱药救人命,因而是珍贵的医药学宝库。除有防病治病的内容外,还有绝育等内容。《普济杂方》不仅对今天的临床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蒙医药学的发展史提供可靠的原始资料。所以,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普济杂方》成书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承受了历史的考验,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了,据我们所知道的,除有北京木刻版外还有藏文旁注手抄本,藏文书写体手抄本等。《普济杂方》不仅有它医学方面的价值,它还为研究和准确运用阿拉善方言的文学格式及文字沿革学方面提供了原始资料。

作者高世格梅林的著作不仅《普济杂方》一书,还有许多译书。如:翻译了《钦定万年历及择吉金鉴》(同治十二年出版),《新译玉匣记》(同治二十一年出版)等。

总之,高世格梅林一生为人民大众的健康而献出力量,为我们留下了《普济杂方》这样的宝贵医籍,是对蒙医药学的历史贡献,我们不仅应该纪念他,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民族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要去学习应用,研究探讨其《普济杂方》。



范氏十一代行医史简略

范诺尔布扎木苏 著 张学忠 译

道格龙是清朝康熙三十年代的阿拉善旗第一个蒙医大夫。

道格龙于 1672 年出生在青海科克特旗宝力格乌素的古尔巴图家。他幼年就进科克特旗阿拉腾寺的门巴拉僧(藏医学院)习经文学藏医,以阿拉泰医师的名著《秘本释义》为典,精读《四部医典》等医著,学识大为提高,被授予满然巴(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因生活困窘,37 岁时带侄子巴达尔虎,离开家乡到青海省临夏藏族聚居区札格荣贡巴附近地方行医。就在此地给侄子巴达尔虎娶了媳妇。由于在这地方生活到 45 岁,所以,已经习惯于藏族人的生活。就在这时候,他听到阿拉善和硕特有所景气的消息,就带侄儿、侄媳长途跋涉过了长城,于 1705 年来到了阿拉善西部地区定居。巴达尔虎也有了三子。他们来到这里,求医者日益增多,道格龙名声大扬,人们逐渐称他为神医佼尔吉道格龙。由于叔父年迈,加之巴达尔虎跟叔父学医多年,基本掌握了叔父的本领,就接替叔父就医,日渐成了医道高明的名医。巴达尔虎娶藏民之女为妻,故其子姓为嘉格德格,后汉译为范。

始祖医师道格龙 66 岁去世。巴达尔虎开始给长子安巴传授家传医术。他 82 岁去世。

安巴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虽然毫无遗漏地继承了家传医术,但为了精通医学,他就去祖父学医过的阿拉腾寺学习藏文藏医。学习 5 年,在这 5 年中学了《四部医典》的全内容,刻苦掌握医疗技术,对药物的辨认和配剂方

面已相当通晓,于是返回了家乡。他的医术逐渐高明起来,就医者也很多,名望也就大了。因此旗府衙门封他参领职,主持扎哈道牢巴嘎的事务。安巴医生的独子叫迈玛,父亲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把全部祖传医术教给了他,同时还招收当地和外地很多学徒,进行训练。因此安巴医生的医术广泛传播,称他巴嘎什艾木其。

安巴于78岁去世之后,迈玛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医学知识渊博,诊断准确,疗效高。为此阿拉善、乌拉特、鄂尔多斯等地常来人请他看病。由于他的牧畜逐渐增多,当时也可以算得上富户,他为了管理好这些家财,先后娶妻3人,分别各生5子,他让第八子(二妻次子)奥斯尔当喇嘛识读经文学习医法。为了让其继承祖传医术,把他留在了身边传授医道。奥斯尔到了15岁时,被送往青海阿拉腾寺学医深造。奥斯尔学了7年,圆满结束学业返往家乡,他在返回途中,在青海腾格里大坂西部的马营寺住了一年多,主要辨认药物,配制方剂和临床应用等实习性工作。24岁时才返回家乡行医。

年迈的迈玛于75岁去世。嗣后,奥斯尔医生刻苦钻研,对“七种奇脉律”方面造就很深,切脉特别准确,治疗也非常仔细。为此被人称为“额吉艾木其”。奥斯尔在世时,阿拉善王爷葛根诺彦患了伤寒病,体弱力衰,病势加重。从旗内外请了许多被认为是赫赫有名的郎中,诊断结果都是一样,说王爷身体虚弱而已,为此只能用一些最好的补气滋身的饮食和药物治疗。虽然多次医疗,但还是无明显好转,反而病情日益恶化,王爷的生命处于垂危之中。无奈只好请奥斯尔医生试一试。奥斯尔来王府给王爷号脉说,王爷大人被误诊为体虚,因而病情越来越加重了。建议让王爷多吃素食,严禁高营养饮食,用印度地丁草配制了八味地丁散进行治疗,果然病情好转直到痊愈。为此,王爷深怀感激之情,赏冬季用的带绸面的两对皮药袋和夏季用的蟒缎面的两对皮药袋,并以官方名义给他下“名医奥斯尔”的诏文证书,封旗医之称号。他随同阿拉善旗王爷到北京治愈了很多京都大臣,于是名气更大了。在晚年他回家乡,传授医术,为家乡培养了许多好医生。他将大兄的独子道格曾奈吉收为徒弟,教给了全部祖传医术,于87岁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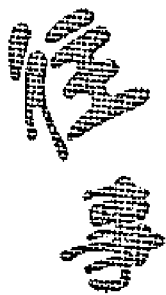


道格曾奈吉在他叔父在世时就已经被誉为医治有方的好医生。由于享有盛名,所以旗衙门下达了印有旗府章印的“神明的贤医佼尔吉·道格曾大夫”的王爷诏文并授予他旗大夫的称号。道格曾奈吉医生对学习医学非常有兴趣,并在这方面有着他的天资,精通针灸等5种疗法,亦能治疗脑震荡、脱位、骨折等病,特别对难产处置更有独特的疗法。他从23岁起行医,直到77岁去世。

阿给医生是道格曾奈吉的侄子。幼年在朝格图呼热庙当喇嘛,拜读经书。虽然他弄通《四部医典》等医学书籍,但未外出行医,而当了庙宇的朝格庆·乌木吉德(意为大雄宝殿的领诵喇嘛),即使如此,他对一般的病情和伤风感冒、腰腿痛等病的治疗是一把好手。阿给医生对祖先遗留的宝贵药物标本和器具以及重要书籍珍藏起来,交给了他的侄子贡其格达勃哈。阿给医生于68岁时去世。

贡其格达勃哈从小跟随叔父阿给医生在朝格图呼热庙当喇嘛,熟记了藏医的《四部医典》。20岁时赴青海塔尔寺的门巴拉僧专心学医。在那里他拜科尔沁旗的名医师,首次获得五行学说朗然巴学位的学者伊希札木苏为师,学了5年广义注解莫卜舍楞,语句注解琉璃温勃和根本医典、论说医典中补充的3种基本秘诀、360种基本手法等医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任务。从此后,来到科克特旗阿拉腾寺住了两年,根据晶珠本草纲目来辨认药草,考核成绩优异。学习期满之后,取得了满然巴学位称号。27岁时回到阿拉善旗开始行医,名望大盛,成了旗医。他掌握了蒙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并把理论同具体疗法结合起来,对内脏病、后遗症、慢性病的治疗有着独特的手法。由于通过多次探究而发现的卓绝的七脉律,使他把季节和自然气候的变化同切脉联系起来,这样更是脉脉心领,诊断出的病情极为准确。总的来讲,他不但善于理论联系实践,而且对藏译蒙等方面也是出色的。贡其格达勃哈医生把自己的医术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所以,从他那里培养出了很多有才能的徒弟。

1958年阿拉善旗举办了蒙医进修班,贡其格达勃哈应医师受聘,以旗



医的身份除将根本医典比作树木来讲授之外，还将论说医典的三十章、十一要点内容也比喻成树木，授之为四根、八十二干、三百六十枝、四十五亿一千九百二十六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叶，通过这些讲授，进一步提高了全旗蒙医者的医学水平。为了使自己的世传蒙医医道不中断，就把他的侄子牢狄藏吾、巴勒登吏格西德、拉布吉三个人从小领到庙里，留在自己的身边当喇嘛。虽然教他们念书诵经，熟读了《四部医典》等医学书籍，但唯有牢狄藏吾当了医生，继承了先辈的事业。

牢狄藏吾虽然完整地继承了叔父的医道本领，但心里不满足，于22岁时去山西省五台山，与曾是他叔父贡其格达勃哈医生的导师科尔沁旗的伊希札木苏正在那里诵经拜佛时相逢，于是在他身边当了3年徒弟。重新让他教了一遍《四部医典》的所有内容。此后，从这里离开抵达北京，在北京西医医院义务性地做护士工作，学习汉语文和西医学，初步掌握了西药用法和输液等技术，这样就成了对治疗十八种瘟疫病、各种热性病和心血系统、黄疸等病有特殊手法的医生。他治疗内脏和其他热性病时主要采取针灸和用泻药的方法；对治疗寒性病时主要采取温针、热灸、热敷等方法。除此之外也会做些简单的手术。在阿拉善旗首先使用西药的蒙古族医生便是牢狄藏吾。他29岁时回到家乡，日后，当了阿拉善旗骑兵治安部队的少尉军医。解放之后在旗蒙医院当医生。在叔父72岁去世几年之后，牢狄藏吾医生也在“左”倾路线的摧残下含冤而死，享年61岁。

贡其格达勃哈的侄子图布新宝音的次子将我本人亦从小送进朝格图呼热庙当喇嘛念经，跟老医师贡其格达勃哈和叔父牢狄藏吾医师学徒，在舂药和包药的过程中学习藏医，继承了范氏祖传医道。让我更进一步地深造医学，当我14岁时送青海省皇中县塔尔寺学习藏文理论，同时在门巴拉僧学习，以德希若得的根本医典注解的蓝琉璃，索卡年每多杰根本医典注解的莫卜舍楞，汗钦却吉杰布根本医典释义等典籍为范本，学习了一年根本医典，又学习了两年论说医典莫卜舍楞，蓝琉璃，色尔吉图尔玛等三部医书。还学习了三年满·阿·兰塔布、策热勒·兰塔布、满·嘎尔吉玛、金钥匙、嘎



力、蓝琉璃补释的秘诀原理,学习了两年,以蓝琉璃、多杰都德、杂都巴尔希拉为后续医典的360种疗法之解。与此同时,以塔尔格丹晶朋斯格的晶珠本草为标本,每年夏季的3个月里,按塔尔寺医学部药植物的拉莫亚格进行认药实习。为了对研究藏医有助起见,我还学习了藏语语法,梵教哲学、天文地理、历史,蒙文语文,藏蒙翻译等必修内容,以优异成绩结束了10年的学业。毕业时,在3500余人参加的评审会上,与近200人提出的各种问题答辩被誉为是出类拔萃的优秀成绩而获得了当时的敖玛·岭西热·嘎究的学位。我24岁时返回家乡以范氏祖统的医术和经验继续行医。

1960年到1961年期间我在内蒙古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1961年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赴巴彦淖尔盟蒙医院工作,先后培养出了近300名医务工作者。我用蒙文翻译了80多万字的近20篇藏文文章,继续研究藏医学,使很多人起死回生。1980年经过考核评为蒙医主治医师的职称。我为了使范氏传统蒙医继承下去,把侄子吉热木图带在身边,传授自己的医道知识,使吉热木图医生有了独立看病的能力。

附表

范氏十一代医生的生活年代表

名 字	生活年代	终年岁数
道格龙	1672年~1737年	66
巴德尔虎	1685年~1766年	82
安 巴	1718年~1795年	78
迈 玛	1761年~1835年	75
奥 斯 尔	1789年~1875年	87
德格曾奈吉	1812年~1888年	77
阿 给	1855年~1922年	68
贡其格达勃哈	1892年~1963年	72
牢狄藏吾	1906年~1966年	61
淖尔布扎木苏	1931年~	
吉热木图	1953年~	



《阿拉善建旗三百年记》的撰写经过

G·朝格图

1997年阿拉善左旗举行建旗300年的大型纪念活动,为此在营盘山上树立一个纪念碑,旗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城建局。当时,其木德策仁同志从阿拉善左旗人大常委会提任到阿拉善盟政协当选副主席时间不长,旗城建局领导委托其主席找一个知道阿拉善历史的人,起草一份碑文。就此,其主席找我说:阿拉善旗建旗300年了,阿拉善左旗要搞一个纪念活动,这件事意义重大,你能否写一份碑文给阿拉善左旗。当时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就答应了其主席的要求,开始起草碑文的准备。考虑到阿拉善旗建旗300年了,究竟如何来表达300年的历史经过,思索了三四天后完成了整300字的碑文,交给其主席,他阅后表示赞同。就这样交给了阿拉善左旗城建局,旗里的领导看后同意,并拍板定下来了。最后在石碑上刻字的时候,一些文字有了变动,撰写人也变成了凿刻者的署名。因此,我在这里把原碑文附后,供读者参考。

阿拉善建旗三百年记

(1697-1997)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乃哈布图哈撒尔之后裔。原游牧于天山北路。一六七七年和罗理为避噶尔丹侵袭鄂齐尔图车臣汗战乱,率部众万余东迁至嘉



峪关。一六八六年清康熙皇帝赐牧阿拉善地，一六九七年，授和罗理札萨克印，建阿拉善和硕特旗。和罗理及子孙为西北之稳定鞠躬尽瘁，先后授封贝勒、郡王、亲王之爵。一七八二年，诏其亲王爵位世袭罔替，直至第九代第十位札萨克达理札雅。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达理札雅率全旗军民和平起义。从此，阿拉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新阿拉善勤奋努力，功绩卓著。尤其为改革开放后，社会进步，人民富强，各行各业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纪念勤劳慧智的阿拉善各族人民三百年来所创造的辉煌与爱国、统一、创业之精神，谨立此碑。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不容忽视的文史常识

瀚海杨

色·玛希毕力格同志的《苍茫戈壁》出版近3年了。最近,我拜读了该长篇两次,首次拜读了蒙文版,二次拜读了汉文版。同时也看了几篇关于《苍茫戈壁》的评论文章。不难看出作者为撰写《苍茫戈壁》下了很大功夫,成功的方面很多。但是由于作者在文史知识有关的细节描写中没有认真细致对待,出现了不应出现的失误,多多少少影响了全文。因此,成一个好作家,必须了解文史知识。

小说中出现了“章京”升任“协理”职位。这是失误之一,在阿拉善历来协理是由贵族(黄金家族之“台吉”)来担任,章京是由贵族之外的庶民来担任,庶民到了章京级职位就封顶了。因此,贵族之外的庶民是不能就任协理。在《苍茫戈壁》170页“头戴蓝晶顶子”、蒙文版394页、汉文版395-396页中“就撤掉伦都格的公王顶珠花翎”、“伦都格挺胸而出……说着摘下插有四支金翎的顶戴官帽放在马海成的面前,拂袖而去。”花翎只有一支,没有四支翎的,这是失误之二。以上两点是不应出现的错误。此外,如吉布宗丹巴(应为:哲布尊丹巴),《希那迪斯特蒙特》的第三章《玛德的喜讯》(应译为:《新约》之《马太福音》第三章),副章京以上的各路大臣(应写为:副章京以上的各位官员)等等,这里不一一例句。就对顶戴花翎和补服做一简单的解释,供参考。

清代以帽子上的顶珠色质和花翎以及补服来区分官品的标志。在清

代,区别官职品级等差,主要是看他帽子上的顶子、花翎,以及在补服上所绣的纹式色彩来区分。因为清代乃满族人住,其官服形制与历代大不一样。

顶戴:就是官员们所戴的帽顶,清代官帽,在它的顶部都要装上顶珠。朝冠的顶子共有三层:上为尖形宝石,中为圆形宝珠,下为金属底座。金属底座则分金和铜两种。顶珠按所用的材料和颜色,以区分官员品级的高低。据《清史稿·舆服制二》顶戴的具体区分是:

- 文官、武官一品为红宝石;
- 文官、武官二品为珊瑚;
- 文官三品为珊瑚、武官三品为蓝宝石;
- 文官、武官四品为青金石;
- 文官、武官五品为水晶;
- 文官、武官六品为砗磲;
- 文官、武官七品为素金;
- 文官、武官八品为阴文镂花金顶;
- 文官、武官九品为阳文镂花金顶。

另外,举人顶为金雀,生员顶为银雀。可叹的是,自从帝国主义入侵后,清末国势日衰,珍宝外流,从此官员们所戴的顶子只能用不同颜色的玻璃代替了。

花翎:在清代,官帽后有一根像香烟嘴粗的翎管,管内插一根孔雀尾的翎羽,这也叫做孔雀翎,尾端有像眼睛一样极其艳丽的一圈,叫做眼,有单眼、双眼、三眼花翎之别;没有眼的叫蓝翎。

花翎本以三眼为最贵。据《清续文献通考·陆心源翎顶补服考》载:“贝子、固伦额附戴三眼孔雀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附戴双眼翎,此爵翎也。其任职之戴翎者,领侍卫内大臣、侍卫、銮仪卫……品官功高者,亦得特赐双眼花翎。”

总之,六品以下的官员赏给蓝翎;五品以上的官员赏给单眼花翎;双眼花翎非大官不能得;三眼花翎是赏给亲王、贝勒等皇族和立有特殊功勋的



大臣。在清代后期的汉人中,李鸿章曾被赏戴三眼花翎,并曾得赐方龙补服。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就曾被赏戴双眼花翎。特别是清末以来,花翎、蓝翎都可以花钱买官得到,使原来由内廷颁发变为由自己置办之物;到了光绪年间,又有用花翎线扎成的翎,远看像花翎,已不如先前那样名贵了。

补服:在官服的前胸和后背,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鸟兽的形象,这是官僚等级的标志。据《清会典事例·冠服通例》和《清史稿·舆服志》载:文官绣鸟,武官绣兽。文官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鹄。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牛、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此外,御史、按察使、提法使等均绣獬豸。

阿拉善旗中学创办简史

戚 涛

原“阿拉善旗中学”是今“阿拉善左旗第一中学”前身,解放前是原阿拉善旗最初创办的唯一的一所中学,1947年10月成立,距今已整整40年。她诞生在苦难深重的旧社会,成长壮大在光明的新社会;她曾惨遭封建军阀的沉痛迫害,也经历过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幸福。数十年来,她为新中国、新阿拉善旗、新阿拉善盟培育出数以千计的有用人才,成绩显著,贡献巨大,誉满全旗全盟,以致她一直是共产党的宠儿和人民政府的娇子,得到党和政府母亲般的抚爱和支持。

回顾40年前的阿拉善旗,是一个幅员辽阔,人烟稀少,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民生疾苦,文化落后,加以反动军阀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民族歧视,妄图对阿拉善旗进行并吞,因而阿拉善旗处在奄奄一息难以存活的境地。在这样糜烂不堪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阿拉善旗要创办一所中学,确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1947年7月,原阿拉善旗旗立定远营(今巴彦浩特)中心小学应届毕业生约30人,毕业后无处升学。远道去外省就学自身经济条件不允许,旗政府补助又不可能。当时的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人,根据学生的请求和旗政府秘书主任李宪的建议,决定集体保送“国立伊盟中学”。因为该校是“公费学校”,免收学费并有伙食和服装等补助,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出资办理,可以免除学生自费升



学的困难和减轻旗政府的负担。旗政府特派中心小学校长赵国治率领学生(女生除外)20余人,在艰难的交通条件下,由阿拉善旗启程赴伊克昭盟。但因该校经费也不充足,同时名为伊克昭盟中学,以招收伊克昭盟学生为主,阿拉善旗学生入学不符合规定。此外,学生年龄最大的也只十四五岁,远离家庭,生活上困难很多,家长都有顾虑,学生本人在伊盟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也不愿在伊中读书,因而赵校长不得不又把学生集体领回。经旗政府再次会议研究,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初中预修班”,先使莘莘学子不致失学,以俟提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直接补助一部分教育经费,由阿拉善旗政府自行设立一所正规初级中学。这是导致创办阿拉善旗中学最初的原因。

初中预修班设班主任一人,由李宪兼任;教导主任一人,由赵国治兼任。课本采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订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发行的初中正式教科书。但由于办学经费十分困难,聘请专职教师尚不可能,只得由赵国治率领旗立完小教师五、六人按时前来兼课,待遇则按授课时数,发给少量“钟点费”。就这样,初中预备班在没有一个专职管理人员及专职教师,且除桌椅外也没有其他任何教学设备的情况下,终于在1947年10月中旬正式成立开课了。男女学生共计30人,校址设在定远营城内延福寺前,旗政府与王府之间的一所大院内,与蒙文学校在一起。

但至次年(1948年)春,只开课一个学期,因李宪离职无人办理,预修班又陷于停顿。此时学生要求维持预备班的呼声十分强烈,复经旗政府会议研究,决定指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旗协赞专员戚涛接任班主任,同时兼任旗政府教育处主任及蒙文学校校长,统筹各校行政事宜。初中预备班仍由旗立完小教师兼课,另配备专职生活指导员一人,由兰州后期师范毕业生李明德担任,暂时维持现状,又继续办理一个学期。

直至1948年夏季,旗立完小又有一批学生毕业,要求升学、初中预备班欲罢不能,继续办理不但不伦不类,而且教师经费都有困难,因而得到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人的支持和赞助,由戚涛出面,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求对阿拉善旗直接拨发教育补助经费,成立正规初级

中学一所。所持理由为阿拉善旗是直辖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独立特别旗，旗之上不设盟，更不归宁夏省辖属，“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补助经费，（即所谓蒙藏教育经费）应当直接拨给阿拉善旗，但该教育部坚持直接派员前来阿拉善旗创办一所“国立中学”，拒绝由阿拉善旗自任校长，自聘教师和自行管理学校；而阿拉善旗则因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对阿拉善旗进行歧视、欺骗和压迫，“中央政府”所派人员往往骄横跋扈，滋事生非，况民族教育大权也不愿落在国民党政府手中，故而坚决拒绝由该教育部派员前来办学，双方坚持不下。嗣经迭次交涉，阿拉善旗政府作出让步，同意由该教育部派遣教导主任1人及数理、英语教师2人，其余校长及教师由旗政府聘任，并可接受该教育部派遣“督学”，定期或不定期前来检查或督导；交换条件是，“开办费”包括兴建校舍、桌椅、及教学设备由该教育部一次拨给，此后全体教职员薪资及办公费等由教育部和旗政府各分担一半。可是，即使这样的妥协方案，该教育部也不接受。此外，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全力进行内战，全国各中等以上学校均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军事教官一人或多人到校授课，对学生进行“预备役军官教育”，并以“军事管理”学生日常生活为名，监督学生的思想言行。对此旗政府深恶痛绝，坚决抵制；而该教育部则以“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阿拉善旗不得例外”为借口，对派遣军事教官一节拒不让步。结果交涉中断，该教育部对阿拉善旗自办中学分文不予补助，理由是阿拉善旗人口少，“无此必要”，阿拉善旗学生可由旗政府保送该教育部设立的宁夏石嘴山“国立职业学校”，或保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边疆学校”就读。然而，这种办法旗政府早经考虑，由于学生年龄小，路途远，问题很多，该教育部实际是强人所难，借以拒绝补助阿拉善旗创办中学。由此可见，当时在教育问题上，阿拉善旗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也存在深刻的政治斗争。达理札雅十分气愤，为了使他的女儿及本旗仕官、黎民子弟不致年幼失学，他毅然决然要“争一口气”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责成戚涛立即筹备创办一所中学，经费不足即使由他私人捐助也坚决要办。戚与达私



情较好,得达的信任,在兼任旗政府教育处主任的职权范围内,按当时的实际条件,因陋就简,调整了旗立完小和旗立蒙文学校的人员配备,由旗政府秘书处聘请熟谙蒙文蒙语的秘书二人兼任蒙校教师,另选拔本旗原有的知识分子数人充实完小而将完小和蒙校中有“后期师范”(高中师范)程度的优秀教师四五人调升为中学专职教师。教导主任一职聘请前来阿拉善旗避难(逃避国民党政府征兵)的山东烟台中学老教师张琦庭担任,并兼语文教师,数理教师王主宝兼总务主任;英语教师抽调完小教导主任秦文尧担任;这样的教师阵容虽然是七拼八凑,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也是难能可贵的了,较之其他省市并不逊色。于是初中预备班改称“阿拉善旗中学”,戚涛自任校长。戚自任校长的原因,是由于他的身份可以出面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及蒙藏委员会直接呼吁,先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予承认;而且他是国民党政府派驻地方官员,以他的资格主持阿拉善旗兴办中学是职责所在,更具“合法性”;另一面由于戚在阿拉善旗与旗政府上层关系较好,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支持,筹措办学经费较为便利。然而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自办中学仍不满意,虽然并无理由勒令停办,但拒绝予以经费补助,经多次交涉,也只由该教育部复文“准予备案”,总算承认了阿拉善旗中学的成立。后又经阿拉善旗选出的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达穆林旺楚克(达理札雅之弟)及监察院委员王枕华(达理札雅好友、曾任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书记长)两人的力争,该教育部才不得不拨发阿拉善旗中学简单的理化实验仪器一套,借以表示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办学。但装箱启运后正值解放战争紧张时期(1949年春),北平宣告解放、平绥路(北平至包头)火车不通,该项仪器滞留北平达1年之久,直至阿拉善旗解放后,1950年始由北京人民政府发运抵达阿拉善旗。这是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中学唯一的一点补助,言之令人寒心。

阿拉善旗中学自1947年预备班时期起,直至解放后1951年,陆续增设班次,计自初一至高一共4个班,学生120余人,女生占四分之一,大多数为本旗各小学输送而来,间有宁夏、绥远等地学生前来就学。全体学生包

括蒙、满、回、汉各族子女,家庭成分上自王公贵族,下自穷苦牧民,一律收容并无限制。待遇免收学杂费,校方供给课本,由兰州统一购回分发,上一班使用后,交下班继续使用,故第一班学生每学期都可领到新课本,其他各班则均使用旧课本,依然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订的中学教科书。至于文体、娱乐及理化、生物等教学设备都十分简陋,不值一述。由此可见,解放前的学习生活,是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死啃课本罢了。教师没有教学参考书,学生没有课外读物,甚至连报纸也付阙如。那时的阿拉善旗没有书店和图书馆等社会文化设施,学生除在校接受教师的传授外,在社会上没有任何获取知识的来源,且在宁夏军阀的淫威压迫下,也不可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所以那时的学生实际上与社会隔绝,对于校外世界,包括阿拉善旗社会及国内外大事都一无所闻,甚至连国共内战的进展情况也一无所知,可谓“不问外间事、自家死读书”,看来似乎很用功,而实际是舍此不能有所作为,无可奈何而已。

不过阿拉善旗中学的学生沾染国民党教育毒素则是微小的,由于旗政府的抵制,军事教官始终未经设置。后来为了掩人耳目,以使学校“合法”存在,虽曾一度聘请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参谋担任名义上的军事教官,实际则是体操老师,并不讲授法西斯军事课程,也不进行所谓的“生活管理”。其次阿拉善旗中学不设《三民主义》课程,甚至连“总理纪念周”也很少举行,(总理纪念周是为纪念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而设的每周一次的党课教育,当时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都须按时举行,不论党员、非党员都须参加)。仅校院内竖一旗杆,平时悬挂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以示阿拉善旗中学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早晚升旗、降旗仪式全体学生必须集合参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阿拉善旗中学内没有三青团和国民党的活动。三青团是因为在阿拉善旗中学成立之前,于1946年已经撤销,合并于国民党内,叫做“党团合并”,所以阿拉善旗中学内没有三青团的组织 and 活动;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书记长王枕华,于1948年秋曾表示要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以扩大党的组织,国民党中统局阿拉善旗情报组长王君惠,也于同年曾要



求来校“征求党员”，他的目的是要在学校内发展中统特务组织，但该两人都遭到学校当局的拒绝，理由是学生年龄都在20岁以下，不具备入党资格。所以阿拉善旗中学的同学们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没有一个曾经加入国民党。这都是原阿拉善旗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进行抵制的结果，也是一种微妙的政治斗争。综上所述，旗中学生在旧社会受国民党反动的政治熏陶较少，思想品质较为纯洁，为其他省市国民党控制较严的学校学生所不及，这是难能而可贵的。

解放前最初两年，威胁阿拉善旗中师生生存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经费方面的困难。旗政府财政处仅能勉强按月发放教职员薪资，办公费连购置文具纸张都不够用，添置教学设备及体育文化用品更不可能，学校随时有因经费不足而停办的可能。为了维持学校的生存，减轻财政处负担是必由之路。采取的办法是，设法使教师在区防司令部挂名兼职。即身为学校专职教师，而不给薪资待遇；名义上则是区防司令部政工室职员，而不实际上班，只在司令部领薪。因为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属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辖，官兵粮饷，被服均由该公署按时拨发，因此采取这样的权宜办法，可以减轻旗政府财政上的负担。好在区防司令就是达理札雅本人，戚涛则是政工室主任（也在司令部领薪），有权决定在政工室内长期保留两个少校级空缺，专供旗中教师张琦庭和王主宝顶名领薪。此外对学生方面，虽然免收学杂费并供给课本，但那时的学生大都家境贫寒，不但供给学生衣食有困难，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有些学生还须辍学在家从事劳动生产。对此学校教师对家长和学生必须进行说服安慰的工作，促其忍耐坚持、尽可能完成学业。对少数特别清苦的学生，有些教师还以私人的名义赠送少量文具和纸张，对个别远道就学的学生，甚至偶尔赠送少量零花钱。由于得到教师们的鼓励和支持，学生和家都很感动，师生关系十分亲密，情谊十分深厚，甚至教师与家长也有私情往来，犹如亲朋好友，以致教师授课态度诚恳，学生受业真挚热烈、成绩普遍优良，纪律严肃，校风纯正，团结友爱，这是阿拉善旗中学创办初期的一大特色，因而那时阿拉善旗的学生一直没有

发生失学恐慌和无故中途退学的现象。威胁阿拉善旗中学生的第二个方面是来自宁夏军阀省政府的政治迫害,主要是征兵的威胁。那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全国性的内战,各地军阀纷纷征兵扩军,随着内战规模逐渐扩大,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兵源枯竭,征兵日益紧张,甚至随时抓兵充当炮灰,阿拉善旗中学的学生自然也难逃厄运,许多男生都有被抓的可能。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在定远营设立一个“办事处”控制保甲组织,专事征兵、征马、征驼,并得宁夏伪军驻定远营工兵营的武装协助,每年要在阿拉善旗征兵一次。所谓征兵,就是由保甲长挨户捕捉适龄男丁,凡年在十六七岁至五六十岁的所谓“壮丁”都在被抓之列,阿拉善旗中学的学生有许多都在保甲长的黑名单中被列上名字。因而每届抓兵之际,学生即大起恐慌,昼夜躲藏在校院内不敢外出,天色傍晚校院大门即行禁闭。好在这是“王爷”的学校,保甲长尚不敢公然进校捕人,可以躲避一时。然而那时的学校,没有学生宿舍和炊事设备,学生都须走读,在校逃避兵役的学生必须趁机匆忙来去回家就餐,有时不慎就会被保甲长捉去,一旦解送宁夏即成生离死别,永无再还之日。因而学生凄惶,家长悲苦。为了免除生存危机,使阿拉善旗中学不致中途夭折,凡遇此种情况,即由达理札雅支持校长戚涛出面与该办事处进行交涉。戚为“中央政府”驻旗专员,且为王爷的使者,办事处主任不得不多少给点“面子”。戚据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兵役法规定:18岁以下或独子及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在校学生可免服兵役为理由,与办事处力争,反复交涉,最后均得一一释放回校。然而也有一次僵持不下,甚至该办事处主任朱效孔采取对戚避不见面的办法,羁留学生数日仍不释放。达理札雅大发雷霆,扬言要对该办事处主任进行报复(向省政府告发该主任贪污舞弊情事),几乎酿成省旗之间的政治事件。最后该办事处主任始妥协让步,将抓捕学生送到阿拉善旗政府稽查局(公安局),转送学校,以示对戚仍不买账。不过学校当局虽觉把学生视为“罪犯”,羁押后解送公安机关实属可笑,但学生无恙,学校得以维持,也认为解决了问题。

经过此次挫折,旗政府曾一度拟议发给学生每人一套剩余军装,佩带



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士兵符号,以示学生已正在服兵役,借此避免宁夏省政府继续在学生中抓兵,可以一劳永逸。但是后来又恐宁夏军阀借口阿拉善旗创办军事学校与省方对抗,则将导致更大的灾难,因而此议未果实行,作为罢论。由上述可以想见,在旧社会,学生进校读书是何等艰难。

阿拉善旗中学的发展壮大是在新社会,解放后就迁到了西花园新校舍,得到宁夏省和阿拉善旗自治区两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拨发了充足的经费,加强了教师队伍,逐步添置了数学设备,充实了教学内容,面貌焕然一新。回忆1949年9月23日,原阿拉善旗在达理札雅先生率部下通电光荣起义后,阿拉善旗中学的师生就和各族人民一道,首先在南梁欢迎了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经常来校为同学们宣讲国内外时事,教唱《东方红》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两首歌曲,就是由阿拉善旗中学的同学们首先在定远营唱起来而后传遍阿拉善旗的;同年10月1日,阿拉善旗各族人民走上街头游行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首先高举五星红旗,大扭秧歌,大唱革命歌曲;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也是阿拉善旗中学的同学们;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即1950年元旦,阿拉善旗中学的师生们共同努力,精心排练,连续三天演出大型古装革命话剧——《李闯王》,其布景壮观,化妆优美和演出的规模,都是阿拉善旗空前未有的,当时轰动定远营,得到各族各界人士的普遍好评,连中共阿拉善旗工委的首长们观后也大加赞扬,认为这是阿拉善旗破天荒头一次演出的革命文艺节目,在古老的阿拉善旗收到了鼓舞人心的良好效果。回想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初期,同学们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欢呼全国解放,欢呼劳动人民翻身等许多热烈情景,确是激动人心的。因而可以说,同学们自一开始就是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好儿女,得到党和人民政府不同寻常的爱护和照顾。和全国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同学们也是在解放后得到了翻身,摆脱了苦难的命运,而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幸福大道的。

解放后阿拉善旗中学和蒙文学校一道,同时开始接受党的教育,中共



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先生、云祥生先生、宣传部长王汝贤先生等好几位首长,都曾在阿拉善旗中学教授政治课,通过热烈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著作,师生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深刻意义,向往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同时也懂得了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而付出巨大的牺牲,全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过上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而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亲自来校授课,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同学们的特殊关怀、爱护和寄予莫大的希望。此外在道德品质和革命意志等方面,同学们也在首长们的亲切谆谆教诲下,得到大力培养,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思想就是这时在同学们的心中扎下根的。记得曹书记对同学们的第一次政治课测验题目就是“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试根据你的认识说明你的态度和理由”,同学们的答卷都得了满分,曹书记大加赞扬,称誉同学们“比干部的觉悟还高”。云书记和王部长的口头和书面测验题目如“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刻苦学习?为什么说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组织观点和劳动观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在哪里?”等等,同学们的答案也都是十分优异的。毫无疑问,解放后同学们都是如饥似渴地热烈接受党的教育,因而牢固地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养成了宝贵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是阿拉善旗培养的第一代革命接班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阿拉善旗教育事业也突飞猛进,先后陆续建立了许多中小学和其他各类专业学校,原阿拉善旗中学的规模逐年扩大,并改称“阿拉善左旗第一中学”,迁到了现在南梁的更加宽敞,更加完善,环境更加优美的新校院,成为阿拉善旗甚至阿拉善盟的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共有学生 2000 多人,100 多名教师。数十年来,这所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直接精心培植下,设备日臻完善,教学内容日益改革充实,教学方法日益研究改进,教师队伍逐步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历届



毕业生数以千计,经过开学深造,或在工作岗位上锻炼,如今都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其中出类拔萃,成就卓越的也大有人在,包括专家、教授、学者、工程师以及盟市、处、局、科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大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愿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包括党、政、军、工、农、牧、商和科研、文教,医药各部门,分布的区域有北京、呼市、兰州、包头、银川、乌海以及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各地及其他省市,可谓桃李满天下硕果累累,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了力量。这是第一中学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现尚在校和已经离校的全体师生万分光荣的事。

阿拉善女子小学校简史

G·朝格图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阿拉善和硕特蒙古迁居阿拉善地区,迄今虽则300年,但正式在该地区设置旗政却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事。阿拉善旗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旗王先后袭位九代十王,受清朝封建统治250多年,相继又遭受国民党残酷统治达数十年之久。

当时,在这18万多平方公里的阿拉善土地上,4万多旗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特别是阿拉善旗的妇女,在长期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歧视下,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女子读书被视为异端而遭到种种非难。“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读书于朝政不吉利”等封建说教及陈腐偏见,剥夺了广大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的正当权利,造成了旗中识字妇女稀少的可悲局面。因此,对当时的阿拉善旗来说,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已成为关系到拯救民族,振兴地方的一个紧迫的政治问题。

阿拉善旗第九代十位旗王达理札雅的夫人金韞慧(又名金允诚,系宣统皇帝溥仪的堂妹)女士,自幼生活在京城贝勒家庭中,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加之曾受辛亥革命的一定影响,她本人很推崇国人文化教育事业。

1931年底,达理札雅袭任旗王后的次年夏,金韞慧女士由北平首次前来阿拉善旗定居。当她目睹这里的落后状况,尤其是看到目不识丁的妇女在社会各阶层中比比皆是,有心改变这种愚昧落后状况,遂向旗府提出应在定远营建一所女子学校的建议。当时旗府虽采纳了她的此项建议,但果



真兴办一所学校谈何容易,面临的困难不少。一则由于封建陈腐思想的束缚,人们不愿将女孩送往学校读书,二则校舍、教员、课本等还全无着落。

达理札雅、金韞慧两人,为早日开办定远营女子学校,把王府东院的5间房子腾出来当校舍的同时,从本旗文人中物选和聘请教师,又拨一笔款项购置桌椅板凳及课本等。此外,还以旗府的名义发布通告,要求定远营城里的学龄女孩进校读书。经过达理札雅夫妇的几年努力,于1937年4月15日,“阿拉善霍硕特旗立定远营女子小学校”得以正式开学,学校印章正式启用,在开学典礼上,达理札雅偕夫人金韞慧女士莅临,旗府一些官员及城中男子学校教师也纷纷前来祝贺。驻定远营的基督教传教士包某某(女,系外国人)也应邀参加了典礼。

女子小学校的校舍就设在旗王府东院里,校长由金韞慧女士担任。正式教师共5名(含校长),兼职教师3名,另聘请传教士包某某任英语教师。招学生计46名,其中最小的7岁,最大的14岁,平均年龄为11岁。校方根据学生的原有文化程度,设半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等四个班,分在两个教室里上课。上课时,两个学生共坐一条长板凳。学生所用课本均免费发给。当时,还免费发一些笔墨纸张(金韞慧将自己每月36元的薪金全部捐给学校以作公用)。学生在校期间,一律穿由学校统一发的校服,分冬、夏装。

课程设置如下:女子小学设有国语(含毛笔练方)、蒙语、算术、社会、自然、体育、音乐、图画、卫生、公民、劳作、英语等十二课程。国语:主要学习《四书》《三字经》《百家姓》,并练习毛笔字;算术:学加减乘除运算及算盘;蒙语:从字母(蒙文正字详解语饰)开始学,掌握读和写的基本知识;社会课:以学社会常识为主;自然课:学自然常识和有关经济、地理方面的一些常识;体育课:以学体育为主,其中包括队列训练;音乐课:学唱歌曲及学舞蹈;图画课:学一点绘画基本知识;卫生课:学卫生常识;公民课:学一些如何做人的道理;劳作课:学刺绣、剪纸、编织技巧;英语:从字母开始学。

金韞慧校长兼教公民、练字课,有时还代教国语、英语。



虽说女子小学校设施简陋,条件较差,但因执教严而有方,学生成绩提高很快,故获家长们的好评。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阿拉善旗于1938年横遭不测,该校被迫解散,以后再也未能得到恢复。

阿拉善旗女子小学被迫停办的大致经过是,1938年2月末,宁夏军阀马鸿逵诬陷阿拉善旗王达理札雅私通日本人,他一面调集重兵围攻定远营城,一面进行政治欺骗,迫使达理札雅就范。随后,他将达理札雅“接”往银川,不久后又移至兰州变向软禁近7年之久。由此,阿拉善旗方面不但蒙受奇耻大辱,而且旗政也陷于瘫痪而处境凄惨。当时,旗内人心浮动,加之金韞慧校长也在兰州被软禁,无人问津校务。阿拉善旗女子小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停办解散的。

1939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定远营开办“国立实验小学”并委派薛公武出任校长职,当时,旗府针对这一情况,特下通知告旗人说,旗属女子小学校与男子小学合并,望本旗学龄儿童勿往“国立实验小学”报名。旗府通知中虽提及女子小学校,但这时女子小学校已名存实亡了。

1940年,达理札雅从兰州派李阴国出任阿拉善旗“男女混合小学校”校长。但该校的女子班一直拖至1941年才正式开课。在校内男子班和女子班是被隔离的,分别单独上课,互不往来。1941年,该校第一届女子班得以毕业。

阿拉善旗女子小学校,开办不久就夭折了。但是,不管它命运如何,它确对阿拉善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重要推动作用。它的出现,使得广大女子冲破封建束缚,争得接受文化教育的平等权利。女子小学校培养出了一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妇女,解放后,她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并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注:编写此史稿时,除参阅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有关资料外,还走访了曾就读于女子小学校的罗桂芳、魏冬桂、杨淑兰、王淑敏等10多位同志,谨表谢意)。



定远营女子小学校正式教员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文化程度	教学科目	职务
达金蕴慧	女	31	北平	汉文优长	公民 卫生	校长
金幼臣	女	19	北平	初中毕业	算术、劳作、美术、音乐	班主任
刘延庆	男	42	阿旗	中等文化	国语、体育	教师
谢尚德	男	33	阿旗	中等文化	社会、自然	教师
俞世珍	男	58	阿旗	中等文化	蒙 文	教师
包某某	女	50余岁	瑞典	大 学	英 语	特邀教师

定远营女子小学校学生名册

姓名	年龄	民族	入学时间	姓名	年龄	民族	入学时间	姓名	年龄	民族	入学时间
达倩芬	12	蒙古	1937.4.15	王俊英	15	汉	1937.4.15	达芟芬	11	蒙古	1937.4.15
王淑敏	14	蒙古	1937.4.15	罗桂芬	14	蒙古	1937.4.15	张素纹	14	汉	1937.4.15
陶凤霞	14	蒙古	1937.4.15	罗彩琴	12	蒙古	1937.4.15	俞桂芳	12	满	1937.4.15
魏冬贵	10	蒙古	1937.4.15	罗慧芳	12	蒙古	1937.4.15	薛兰香	11	满	1937.4.15
罗彩雯	14	蒙古	1937.4.15	刘淑卿	12	满	1937.4.15	金少琴	13	满	1937.4.15
赵连端	13	满	1937.4.15	刘俊霞	13	汉	1937.4.15	赵从嬛	12	汉	1937.4.15
金小琴	11	满	1937.4.15	席素馨	11	汉	1937.4.15	于培锐	11	汉	1937.4.15
王秀蓉	12	汉	1937.4.15	达亚男	7	蒙古	1937.4.15	王玉蓉	11	汉	1937.4.15
赵连娥	11	满	1937.4.15	杨霭英	9	汉	1937.4.15	达书萤	7	蒙古	1937.4.15
何秀华	11	汉	1937.4.15	杨淑兰	8	蒙古	1937.4.15	郑希珍	13	汉	1937.4.15
王承贞	10	满	1937.4.15	李冬林	11	汉	1937.4.15	王承淑	9	满	1937.4.15
郝跟凝	11	汉	1937.4.15	李丽容	9	蒙古	1937.4.15	郝菊香	10	汉	1937.4.15
沈玉梅	8	满	1937.4.15	朱镜心	13	汉	1937.4.15	金佩纹	8	满	1937.4.15
玉维娜	14	汉	1937.4.15	王菊英	11	汉	1937.4.15	王存香	11	汉	1937.4.15
李月英	11	汉	1937.4.15	张香兰	10	汉	1937.4.15	程秀菊	8	汉	1937.4.15
王波英	9	汉									

塔王包衣章万宝与宝珍照相馆的兴起

赵贵春

银川摄影技艺是由一个叫罗广文的广东人传入的。罗于前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来银川从事照相业。那年头一般平民百姓是照不起相的。照相的都是达官贵人,富商豪绅。他们照相时,就把摄影师请到家中住下,设酒席招待,俟风和日丽时,在其院内拍照。照的都是12寸的。他们照一次相,费时数日,花费白银数十两至百两之多。罗照相收费没有固定的价格,视顾客的地位经济条件而定。

当时照相技术还比较落后,用的都是进口的玻璃底板,金水药液洗相法,也叫晒相。就是把洗出的照片放在阳光下照晒,使其逐渐显影,呈现浅褐紫色,当时人们对此感到新奇。

一、宝珍照相馆的由来

由于罗广文将摄影技艺传入银川,宝珍照相馆就应运而生了。

宝珍照相馆的创业人为章万宝,字藏珍。章是阿拉善旗塔王——塔旺布里甲拉的下属包衣(仆人)。他聪明精干,谦虚谨慎,为塔王所喜爱,叫他当贴身侍卫。

章在清末随塔王到北京觐见,当时北京已有无声电影,塔王觉得新奇,就购买了一部电影放映机,派章藏珍学习放映技术。章学成后,回阿拉善旗,为王府内外人士放映,放映之日,轰动了贺兰山前后。但因影片不多,放映时间一长,塔王看厌了就把放映机送给章藏珍叫他作为谋生的工具。



民国9年(1920年)章藏珍和他大儿子章文焕携带这部电影放映机离开阿拉善旗来到银川,在小庙、黑虎庙、七真观、承天寺、海宝塔、新华街等地放映,观者众多,轰动一时,这是宁夏人民首次观看电影。

1929年冯玉祥将军的部队转入西北,章藏珍父子随刘郁芬(甘肃省主席)到兰州放映。上映影片不过是一些“洋人喝酒”、“醉鬼闹街”、“洋人卖花”、“洋人闹市”、“洋人摆手”等以外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题引人发笑的玩意。

二、宝珍照相馆的创建

章藏珍喜爱音乐,擅长月琴、琵琶、扬琴等乐器,又会放映电影,出于对艺术的喜爱,意识到照相这门艺术有发展前途,于是与北京宝记照相馆商定,将其子章文焕送到该馆学习照相技术。章文焕在北京学艺半年,于1923年回到阿拉善旗开设宝珍照相馆。1926年到了银川,在柳树巷(现复兴南街)租赁门房,并从北京聘来技术人员,于1935年9月6日银川宝珍照相馆正式开张营业,章文焕自任摄影师。

当时照相业在银川尚处于襁褓时期,所以使用的底相纸、药水全是进口美国的“柯达”材料,后来才使用进口胶卷,洗相药水也用化学药品了,价格也便宜多了。

宝珍照相馆的设备,在当时是第一流的,拥有座机、外拍机、转机等。

宝珍照相馆在技术和质量上都要求很严,如对底板精心修理,洗出的每张相片经过仔细整修,不到家的地方要重修,不合格不出门。

宝珍照相馆对顾客热情接待,服务周到,所以深受顾客的欢迎,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为了扩大营业,又于1927年在柳树巷原址将租赁改为购买并修建一幢两层楼房(现宝珍照相馆),商人盖楼房这在当时的银川是罕见的。

三、宝珍照相馆的发展

章藏珍事业心很强,在全力经营宝珍照相馆的同时,又着眼于钟表修理业,于是与当时银川市修理钟表技师朱建逊协商,将次子章文华送去学习修理钟表技术。文华学艺期半年,宝珍照相馆新楼也建成,即在相馆内附



设钟表修理部。三子章文杰也学习照相洗相等技术。

宝珍照相馆为了业务的需要,对门面的装饰、室内、庭院的布置也很讲究。为此,请了两名花匠在新城西南墙角开辟了花圃,培育花木为美化照相馆,招徕顾客服务。

章藏珍不但事业心强,而且乐善好施。他在晚年参加万字会,给灾民施粥、衣服等善举。章有时为京剧票友演出时弹月琴助兴,过着悠闲的生活,享年 86 岁,寿终正寝。

1950 年春章文华偕其弟文杰。到内蒙古包头市东大街设分号“宝华照相馆”,经营了 2 年,生意也很兴旺,但因费用大,两地不能兼顾,遂停业回银川。

四、公私合营

1956 年章藏珍积极响应公私合营的号召,率子章文焕、章文杰、章文华及其店很多人参加了公私合营。章藏珍仍为私方经理,后转为国营。宝珍照相馆于 1966 年更名为银川市新影照相馆。

现章文焕已去世,曾任银川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银川市政协委员;章文杰也年逾古稀,退休安度晚年;其子孙都娴熟于照相修表技艺,堪称摄影世家。次孙章兴乐 1962 年继承父业技术 22 年,于 1984 年调任银川市工商联副主委。现任自治区政协常委、银川市政协副主席、银川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



阿拉善文艺综述

邢野

自然地理以草原和沙漠为主,主要经济来源以小畜和骆驼为大宗的阿拉善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里有为当地蒙古族人民喜闻乐见的阿拉善民歌(尤以阿拉善八大民歌称著),有回族人民喜欢的花儿,有从宫廷乐队中传来的古筝(雅托克)和扬琴,有从新疆传来的弹拨乐器陶布旭尔,有从甘肃传来的民勤秧歌,有京剧,有晋剧,有秦腔,还有南寺与北寺的宗教音乐。再往远些说,早在200多年前,京城的皮黄腔就曾随着下嫁的公主流传到这广袤的草原上。眼下,乌兰牧骑的歌舞,又为阿拉善人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所有这些,构成了阿拉善盟音乐文化的体系。本文拟就民歌、秧歌、戏剧、乐器四个部分简述之。

一、民 歌

阿拉善民歌,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与地区特点。它的唱词质朴无华,通俗易懂;曲调简洁流畅,不善修饰。就体裁而言,有辽阔壮美的长调民歌,如《神圣的阿拉善》《高高的阿拉善》《查干套海》《赛西雅勒跃日勒图》等;也有节拍整齐,结构方整的短调民歌,如《银德日玛》《比它更要甜》《召庙之北》等。就题材内容而言,有赞歌和颂歌,如《乌日斯颂歌》《富饶辽阔的阿拉善》等;有思乡歌,如《想念》《父母之恩》《回家去》等;有赞马歌,如《花白马》《棉花般的纯白马》《枣骝马》等;有嫁女歌,如《嫁女歌》《出嫁歌》《今日去他乡》等。有情歌,如《夺走了我的心》《多情的眼睛》《等待》;有酒

歌,如《欢乐的酒宴》《轮番酒之歌》《敬酒歌》;有风俗性民歌,如《四季歌》《十二属相》《老汉和小鸡》;有讽刺歌,如《无可奈何的乌审》《大走马的筛铃》有宗教性歌曲,如《前世喇嘛的佛教》《报应》《戒律》等下面举出两首民歌为例,以佐正文。

富饶辽阔的阿拉善

1 = D $\frac{4}{4}$ $\frac{5}{4}$

慢、深情地

6 $\dot{1}$ - - | 2 3 5 - 5 6 $\dot{1}$ 1 | 6 1 - - | 5 $\dot{1}$ - 2 3 5 |
富 饶 (啊哈嗒 啞) 辽 阔 (啊嗒

6 - - $\bar{5}^v$ | 3 5 6 $\dot{1}$ | $\dot{1}$ - - $\bar{6}$ | 2·3 2·3 2 3 $\bar{5}$ | 5 - - - \bar{v} |
啞) 阿 拉 善 (啊 嗒)

5 5 $\dot{1}$ - 2 3 5 | 6 $\dot{1}$ - 2 3 5 | 6 5 $\dot{3}$ 5 6 $\dot{1}$ |
是 我 们 难 得 的

5 - - $\bar{3}^v$ | 2 5 6 $\dot{1}$ $\dot{3}$ · 2 | 6 $\dot{1}$ - 6 $\dot{1}$ 6 $\dot{1}$ | 6 1 - - ||
(哟) (啊 嗒 啞)

附歌词:

富饶辽阔的阿拉善,	是我们难得的故乡。
漫漫香火是虔诚的信仰,	太平美满是我佛的祥光。
廉洁理政是今朝的美德,	勤奋努力是为民的规章。
坚定的信念是我们的支柱,	群集的密林是树根的屏障。
漫言长语忌讳的是轻薄,	酒歌盛宴期盼的是欢畅。
千言万语需要的是简略,	众多亲友难忘的是忠良。
尽情讴歌凯旋的欢乐,	群起迎颂雄健的少壮。
太平欢乐是今朝的恩赐,	万众共享这无穷的安康。



因寰宇世道常变故， 望我佛保佑福无量。

(思沁巴图 赵良成 搜集整理 魏巴特尔 翻译)

这是一首古老的阿拉善民歌，堪称“阿拉善八大历史民歌之首”宽广的音域(6—5共达14度)悠长的节拍，伴以五声音阶构成的旋律，形成了这首民歌独特的韵味。这首民歌虽然标定的节拍是($\frac{4}{4}$ $\frac{5}{4}$)，但实际上还是一首节拍自由的长调民歌。如下例：

十二属相

1 = G $\frac{2}{4}$

中速如述地

6 5̣5̣ | 1 1̣2̣ | 3̣·5̣ 5̣6̣ | 1 - | 6̣ 5̣6̣ | 1 1̣2̣ | 3 3̣5̣ | 6 - |

草 滩 丘 梁 身 上 驮 ， 高 山 峻 岭 头 上 擎

5 · 1̣ | 6̣ 6̣1̣2̣ | 3̣5̣ 3̣2̣ | 1 · 2̣ | 3 5̣6̣ | 1 1̣2̣ | 3̣5̣ 5 | 6̣ - ||

身 软 个 小 太 可 怜 威 力 却 使 神 鬼 惊

附歌词：

- 一 草滩丘梁身上驮，高山峻岭头上擎，身软个小太可怜，威力却使神鬼惊。
要问名字怎样叫？人生一世常念叨，十二属相排第一，白鼠神在牙如刀。
- 二 两角能把云撕来，草滩沙漠任意踩，力大无穷翻大地，一生无比献粮奶。
要问名字怎样叫？人生一世常念叨，十二属相排第二，黄牛成神也应该。
- 三 为王在那高高山，一身披挂黑斑斑，下山出林毛色变，一身威风全不见。
要问名字怎样叫？一生一想心也玄，十二属相排第三，猛虎神通在山崖。
- 四 草丛深处居洞穴，红灯一双照四周，若闻风吹和草动，白光一道捉不住。
要问名字怎样叫？遥望月宫有玉树，十二属相排第四，嫦娥怀中抱玉兔。
- 五 九天万里任来去，耕耘播云润寰宇，腾云驾雾下凡来，也是人间帝王驱。

要问名字怎样叫？人生一世常思议，十二属相排第五，飞龙神通自如意。
六 一身好本领，草尖上飞行，弯曲似草绳，看见胆也惊。

要问名字怎样叫？三年以后不安神，十二属相排第六，花蛇又名称小龙。
七 水草野滩任它走，见得人儿四蹄飞，鞍鞴齐全有多美，走起碎步如流水。

要问名字怎样叫？来到草原还问谁，十二属相排第七，骏马千里一日回。
八 好似白云铺地下，粪蛋粒粒满地撒，男婚女嫁不可无，宾客临门全靠它。

要问名字怎样叫？必须来到牧民家，十二属相排第八，绵羊声誉满天下。
九 相貌似人本多枝，性同烈火不可欺，机警灵巧世无双，穿山越林如平地。

要问名字怎样叫？它和你我论兄弟，十二属相排第九，金猴敢把玉皇欺。
十 满地禾谷贵似金，一粒不少全扫清，日月东升又西落，天天不误常报名。

要问名字怎样叫？门前额吉点头笑，十二属相排第十，金鸡独立姿娇娇。
十一 忠心不变好伙伴，把门守家常叫喊，人来人去如流水，迎客送宾它在先。

要问名字怎样叫？你先看看大门前，十二属相排倒二，黑狗又称啖天犬。
十二 污泥浊水它喜欢，齷齪脏脏更不管，摇摇晃晃乱哼哼，人人见了人人嫌。

要问名字怎样叫？你看贪吃木槽边，十二属相为殿军，脏猪又名猪八戒。

（思沁巴图 赵良成 收集整理 魏巴特尔 翻译）

这首民歌，旋律紧凑，结构方整。从唱词的内容方面看，显然又具有农区生活劳动的一些得点。

笔者在牧区采访时，还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即把流行于汉族地区的一些民歌填词演唱。如将流行于陕北的革命民歌《解放区的天》填上祝酒歌演唱，并将个别腔节作一番更改润色，自是别有一番风格特点。曲例从略。

二、秧歌

阿拉善秧歌，非本地蒙古族人民之特有。而是因草原放垦时由甘肃、宁夏等地的移民带来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且以民勤秧歌为主，后逐年沿传，发展至今，并主要流行于巴彦浩特（现阿拉善盟府所在地）。

旧时每年正月，定远营各商号都要筹款组办秧歌，就连王爷府也不例外。秧歌主要是高跷与旱船。高跷一般为12人表演，着彩装，化妆，按照一



定的故事情节分别扮演某个典故中的人物,如小二哥、渔婆、俊锣、轿夫等。而且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固定唱词,另外两只旱船也有专门的唱词。高跷与旱船表演时,可走街串巷表演,也可在某家院内或字号(商店)前定点表演,加锣鼓打击乐器。

下面是几段扭秧歌时唱的词,附之以飨读者。

小二哥唱:

谁说我小二哥性情骄,手提上花篮脚蹬高跷,
秃头和尚傲,傻公子高老撮子飞眼,扭嘴子漂。
渔婆本是英俊女,渔翁好比姜太公,
打柴的樵夫是忠孝第一,卖膏药的先生能治百病消。
俊锣丑锣是女中贤册,二花鼓他本是英俊豪杰,
如若不信你来看哎咳,哪一个不是梁山好汉哥。

渔婆唱:

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莺莺红娘,
三请张生来赴宴,四鼓无人跳过花墙,
五更天明老夫人知道,六花瓣拷打莺莺审问红娘,
七擒问出交情事,八月中秋莺莺降香,
九月张生去赶考,十里亭哭坏了莺莺叹坏了红娘。

俊锣唱:

墙里栽花墙外开,对对蜜蜂采花来,
蜜蜂见花双展翅,花见蜜蜂搂抱怀,
蜜蜂好比男儿汉,花儿好比女裙钗,
二人正在交情处,西北之雾降雨来,
打得蜜蜂团团转,打得花儿落尘埃,
若要夫妻重相见,除非是蜜蜂重生花儿再开。

(布音爱立布吉呼 口述)

旱船歌

东指东洋东大海,西指两天老龙潭,
南指南海普陀岭,北指北冰林荫坡。
要知此船是谁造,王母娘娘下凡来。
天上棱木做船底,地下楠木做船舱,
九天仙女雕成画,珍珠玛瑙玉栏杆。
八洞神仙船里坐,王母娘娘掌舵来,
要问此船那里去,漂洋过海到西天。

(布音爱立布吉呼 口述)

三、戏剧

京剧的传入 京剧在阿拉善的历史,要算最长了。早在阿拉善第三代王爷罗布藏多尔济时代(清乾隆二十二年以降),罗王被朝廷封为世袭亲王,福晋就曾从北京带来了由汉、满艺人组成的簧腔班娱乐,每逢佳节喜庆、百岁寿诞、婚丧嫁娶之日,都要请这些艺人们表演一番。到第八代王多罗特色楞时代(清光绪三十一年以降),京剧已经首先在北京形成,并在北京的戏剧舞台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从小在京城长大的多王、福晋及其随从们,也很喜爱京剧。他们不远万里地把艺人从京城请到草原来,并购置了全套衣箱(戏装)。这些京剧艺人在定远营居住了一年多,而且挣了很多钱。后来,终因生活,不习惯,各自散场了。民国7年(1918年),爱好戏剧的五爷(多王的五弟)组织府内的奴婢们办起一个自娱班演唱京剧,但没多久也散了。那个时候,经常上演的剧目主要有《彭公案》《施公案》《包公案》《清风亭》《薛仁贵征东》等。艺人已多不得考。

山西梆子在阿拉善 民国12年(1923年),北公爷塔旺策林从外地请来了擅长山西东路梆子的宝三旦、李富贵、李天贵三位艺人,并在本府内挑选了三十几名相貌端正、手脚灵便的奴婢学戏,他们白天侍奉主人,各务其事,晚间集中习艺“打戏”。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就凑和着能演戏了。因为这个戏班是北公爷用以自娱的,并不公开营业演出,所以称其为“自演戏班”。



但有时在庙召公演,任人观看,不收费。

这个晋剧班的演员虽然功底浅,但生、旦、净、丑行当俱全。其中以司鼓王兴、二保、板胡张作兴,演员舒哥、金阿哈、王万友等小有名气。经常上演的剧目如有《五雷阵》《摩天岭》《黄河阵》《麒麟山》《黄鹤楼》《甘露寺》《伐子都》《灯棚失子》《牧牛圈》《明公断》《盗九龙杯》《三岔口》《草船借箭》《八大钹》等。

“新华剧社”始末 阿拉善汉族人多为甘肃民勤人,爱好秦腔。民国31年(1942年),定远营镶牙匠张作兴云集了一批秦腔艺人及爱好者,在定远营组办了一个专唱秦腔的戏班子,取名“新华剧社”。他们还自筹资金,在二道河西头修建了一处能容纳400多人的戏园子,兼作为剧社的下脚处。

这个剧社是班主制,演员按技艺高低打分,衣及其他设备也入股分红。而且,剧社还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该剧社中有部分艺人曾是甘肃、宁夏等地“新民社”、“觉民社”、“尚友社”等班的科班子弟,个人业务水平较高,所以这个剧团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小有名气者女晴衣吕金叶,花旦张金兰,武旦李花婷,须生汪风鸣、小生吴玉中,花脸王常福、朱志九、小丑白干板,司鼓刘三成,板胡高正明、魏四秀等。经常上演的剧目,其中成本大套的“连台戏”,如《蝴蝶杯》《玉堂春》等,能演40多天(场)。其他经常上演的剧目还有《五雷阵》《刀仙阵》《黄河阵》《朱仙阵》《绝龙岭》《兵发岐山》《渭水河》《出五关》《火烧棉山》《回荆州》《祭东风》《虎牢关》《五典坡》《南天门》《打镇台》《闯宫抱斗》《纣王降香》《杀妲己》《烙碗计》《苏获进女》《文王访贤》《姜子牙封神》《姚黎刺庆》《于让刺袍》《荆轲刺秦》《吴越逃国》《卧薪尝胆》《雷炮行兵》《草船借箭》《舌战群儒》《三请茅庐》《凤仪亭》《夜战马超》《玉虎坠》《大报仇》《访宁夏》等。

该剧社演出的旺季是每年冬春。冬季进戏园子,春季由各商号或王府约请剧社唱庙戏或会戏。每个庙戏唱3天,酬金100元,由东道主负责吃喝接送。夏季是演出淡季,艺人们无事可干,三五结伙去外地搭班短期演出,深秋返回,年年如此。

民国34年(1945年)底,为了给马鸿逵祝寿,将此剧社调往宁夏唱堂戏。后因内战暴发,此剧社再也没回来。但此剧社在定远营扎根4年,已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业余爱好者和基本观众,并为将后秦腔在阿拉善和河套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乐 器

流行于阿拉善的乐器,就使用范围与流行情况而言,主要分两大类,一是流行于民间的乐器,如陶布旭尔、雅托克、胡拨斯、四胡、马头琴、扬琴、笛子等,其中雅托克(古筝)和扬琴是由第二代旗王阿宝的福晋艾力根公主从京城带来。另一类乐器是流行于寺庙中的乐器,有大号、伊肯、噶策、唢呐、宁萨、令布、笛、三弦、笙、扬琴、雅托克、管子、四胡、缸令、九音锣等。

铜笛以黄铜铸成,全长35.2厘米,直径1.6厘米。

本文的纂写,曾蒙朝格图、魏兆福(布音爱立布吉乎)同志给予热情帮助,特此致意。



阿拉善旗戏剧发展概况

魏兆福(布音爱立布吉乎)忆述 聂义声 整理

阿拉善的戏剧发展史几乎和阿拉善旗建旗的历史一样久远,有 200 年的历史。在文学艺术这个意识形态范畴内,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很多领域。但戏剧却是其中最精彩,最复杂,涉及艺术领域最多的一枝文艺奇葩。它是由歌、舞、剧三者有机结合的一种文艺表现形式。对于一个地处大西北的蒙古民族地区来说,能在 18 世纪就产生和发展戏剧,这是一种很稀奇的文化现象。既是在整个内蒙古自治区 100 多个旗县中,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内蒙西部独此一家。但它却发生了、发展了,并曾产生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效应,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序 幕

阿拉善和硕特旗正式编旗封爵,是从大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开始的,到全国解放时是九代十王。阿拉善戏剧的产生是第三代王罗卜藏多尔济和第四代王旺沁班巴尔时期,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和嘉庆四十年(1835 年)之间,因阿拉善王爷为大清国家稳定、边疆安宁立过汗马功劳,所以它的王爷爵位是世袭制不说,其中九位王爷还是清朝的驸马王,这么多的清廷公主从京城远嫁来到阿拉善,同时就将北京的建筑艺术、服饰艺术、语言文化、饮食文化等带到草原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戏剧艺术了。

京剧:乾隆时期,四大徽班进京演出,吸收了湖北汉调,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长处,相互影响,兼容并蓄形成了国粹——京剧。这是大清社会文化领

域的一大奇观。而远嫁阿拉善的公主们,从小在京城、皇宫里听惯了京剧,深受其艺术的感染。来阿拉善也不甘寂寞,就从京城搬来了“二黄”戏剧。由同时带来的满、汉仆人表演。后来就组成了戏班,住在定远营王爷府,长年给王爷、福晋、公爷演唱。每逢王爷、福晋、公爷和阿哥的寿辰、生日或有重大庆典活动时,都要演唱,以此来助兴、庆贺。从此“二黄”戏在阿拉善定居了,成为阿拉善王爷府的官方戏剧。

二、发展时期

清宣统年间(1909年),阿拉善第八代王塔旺布里甲拉时期,阿拉善的戏剧演出显现出兴旺发达的态势。塔王从北京引进了京剧,从山西引进了晋东梆子,从陕西引进了秦腔。并从北京购置了全套历史戏剧服装。各种戏剧班子在阿拉善王府所在地定远营王爷府公开演唱,现出一派百花齐放形势。这些外地戏班子每年来阿拉善演唱数月后,就将他们送回原籍,全部费用由王府的霍硕厢支付。由于塔王特别爱好戏剧,王府的大小官员都形成了看戏的习惯和爱好。而单靠外地戏班的不定期表演,已不能满足王府的需求了。在民国七八年间(1918年、1919年),由塔王的五弟(人称五爷)自己组织王府内的奴婢人员演唱京剧,这个戏班子叫“自演戏班”。从此,阿拉善就产生了自己的戏班子,可常年在王府演唱。

那时演唱的剧目都是宋、元、明、清各朝代的历史戏剧,有《清风亭》《包公私访》《彭公案》《施公案》《薛仁贵征东》《大舜传》《甲午战争》等。

晋剧:又称山西梆子,山西梆子按地域不同又分为晋东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蒲州梆子等。晋东梆子的曲调接近于河北梆子。

民国12年(1923年),塔王的八弟塔旺策林(人称北公爷)亲自组织领导了一个戏班子叫“自乐戏班”。从山西请来唱晋东梆子的三位艺人,名叫李富贵、李天贵、保三旦。由他们主持在北公爷府内培训了公爷府内的役使人员和一部分当地的蒙、满族演员共有30多人,由此组成了北公爷府内的晋东梆子戏班,“自乐戏班”常在王府内公开演出,城外的一般老百姓可自愿到王府看戏。



“自乐戏班”是个很正规的戏班，有教练，演员有生、旦、净、丑、须生各种角色，司鼓、胡琴、箱官、后台管理人员，一应俱全，现排列如下：教练：李富贵、李天贵、保三旦。司鼓：王兴、二保。板胡：张作兴、尉关。演员：王万有、王万才、张继德、刘延庆、舒哥、张光泰、田满贵、张光海、俞光焕、张三三、徐恒瑞、金阿哈、张玉宝、张俊麟。

演唱的剧目如下：《黄河阵》《灯棚失子》《牧羊圈》《五雷阵》《麒麟山》《明公断》《盗九龙杯》《三岔口》《黄鹤楼》《甘露寺》《草船借箭》《摩天岭》《八大锤》等。

演员每天给北公爷府内理事完，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戏剧，不定期演出。由北公爷支付生活费用。每人每月30斤米面，再发五百铜钱小费。

北公爷领导的这个戏班子在定远营兴盛了很久，一直持续到1928年（民国十七年），北公爷逝世后，戏班随即解散，从此再没人组织演唱过，这个剧种在阿拉善失传了。

秦腔：秦腔流行于陕西及邻近省份。明代中叶以前在陕、甘民歌基础上形成，发展中受昆腔、弋阳腔、青阳腔等剧种影响，形成音调激越高昂，以梆子按节拍，节奏鲜明，唱名基于七字句，音乐为板腔体的一个剧种。

1942年，定远营城外戏剧爱好者、板胡演奏家张作兴，以私人自筹资金的方式组织起一个秦腔剧社。剧场在二道河沟最西头修建了一座简陋的戏院，能容纳观众400多人，剧社起名《新华剧社》，由于是一座戏院，就开始卖门票。

新华剧社的演员大都来自陕、甘、宁三省的易俗社、尚友社、新民社、觉民学社这些西北很出名的专业剧社。演员大部分是科班出身，有一些是半路出家，还有一部分是青年学徒。他们是演艺水平很高的艺人，文戏武戏都能演。这些演员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青帮、红帮，江湖义气很重，十有八九吸鸦片。剧社是一种凑合戏班子，人员不稳定，流动性较大，原则是能维持生活就留下来，生活不行了就到其他剧社搭班子。

剧社的经营管理方式是自食其力，自负盈亏，盈余分红制，每月按个人

的演艺水平评分支付工资，其中扣除箱主私人的服装折旧费和其他费用。剧社每年有三、四个月淡季，生活就十分困难，就由箱主张作兴拿出资金支付，等到旺季再扣回。

新华剧社的编制：该剧社下设领财箱主、正副社长、派戏的班主任、导演、编剧、前台管理、后台管理、大衣箱官、二衣箱官、帽子拐杖箱官、外出联络人员。每人都有明确职能，各负其责。如：正副社长管理经济收支、业务工作和生活；编剧要编写新的戏剧；导演、教练要安排演员每天的练功和晚间的演出。

剧社的演员名单如下：剧社有 60 余人，按照戏剧的组成，各种角色行当一应俱全。

须生：任凤鸣、陈化礼、丁振华、霍振川、康正中。小生：吴玉中、余新民、杨觉民。大花脸：王常福、冠银川、苏金荣。二花脸：朱老九（文阳）、杨益民。小丑：白玉板、年金铭（陕西人）。武生：宋乐民。大净：田德年（西安人）。武须生：朱华民。青衣旦：吕金叶（少亭）、关玉忠、张国金。小花旦：张金兰、俞金凤、田小兰、钱森、孟玉和。二花旦：俞金花、田慧卿（田德年之女）、刘锁（万镒）、武旦：李花婷（陕西人）。司鼓：刘三成、刘万金、俞沙锅、尹殿科。板胡：高正明、李三、魏思秀。前台：石生玉。后台：龚长命。售票：徐思成。剧社上演的剧目如下：

该剧社有 40 余本历史剧，其中封神榜戏有：《纣王降香》《苏护进女》《闯宫抱斗》《渭水河》《文王访贤》《兵发岐山》《黄河阵》《绝龙岭》《诛仙阵》《万仙阵》《杀妲姬》《姜子牙封神》。三国戏有：《桃园三结义》《虎牢关》《凤仪亭》《示五关》《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祭东风》《回荆州》《夜战马超》《大报仇》。其他戏有：《烙碗计》《五雷阵》《姚黎刺秦》《于让刺袍》《专诸刺僚》《伍员逃国》《卧薪尝胆》《雷炮行兵》《火烧锦山》《玉虎坠》《五典坡》《南天门》《蝴蝶杯》《玉堂春》《全家福》《杀释》《打镇台》《访宁夏》等。

1944 年秋，由陈化礼编导的唐朝历史大本戏《拾万金》，整整演唱了一个月。还编导了四本连续剧《孟丽君》。



演出活动的范围：新华剧社的演出有旺季、淡季之分，冬春是旺季，由地方商会组织演唱各寺庙的会戏，依据当地的习惯由各行业筹办经费，和剧社商定各寺庙的会戏，每个庙会都演三天，每天支付演出费 100 元纸币。伙食由商会管理供应。夏季是淡季，演出活动很少，剧社的演员们就 3 人 5 人一伙分散活动，外出活动的地区就是陕、甘、宁地区，到秋冬季又回来集中活动。

由于宁夏的马鸿逵对阿拉善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治和封锁，新华剧社在 1945 年底以给马鸿逵祝寿的名义被调到宁夏银川，再没有回来，从此阿拉善旗的戏剧又消失了。

阿拉善人不甘寂寞，出于调剂文化生活需要，加之长时期受到各种戏剧的熏陶，于是在学校中兴起了演秦腔的热潮。特别是简易师范班的学生，在三青团的鼓动下经常演唱秦腔，学生中十有八九都会唱几句秦腔，由于没有专门团体，他们只演唱一些小折子戏，如《南天门》《三回头》《柜中缘》《断桥》《杨氏婢》《别窑》《杀庙》等。在这个阶段，原阿拉善旗保安大队的一些戏剧爱好者，和学生们共同演了几折戏，效果很好，这就给保安大队办戏剧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高潮时期

阿拉善霍(和)硕特旗骑兵保安总队组织秦腔俱乐部，把阿拉善戏剧演出推向了高潮，具体情况如下。

1946 年秋，旗保安总队副队长罗永寿，中队长罗步云，副官范立宪，军需主任于培根，号长王鸿钧、魏兆福发起组织了总队部司号班业余秦腔俱乐部。聘请原新华剧社老艺人张金国、石生玉 2 人担任教练，进行演员培训，在当地招收了七八名青年学生，经过半年多训练，就可登台表演一些小型折子戏，如：《柜中缘》《南天门》《拾玉镯》《赶坡》《别窑》《算粮》《藏舟》《二堂献杯》等。1947 年，秦腔俱乐部已发展到 30 多名演员，而且在舞台艺术上，表演技巧上，武功训练等方面都有所提高，已能演出 20 几本大本戏，除给王府、军队慰问演出外，还在各种庙会上公开演出，到冬季就在蒙校礼堂

售票演出。

演员的状况：演员都是贫苦家庭出身，平均年龄 19 岁，其中有 6 名蒙古族，其他都是汉族，有一大部分演员是主动参军，因当上了保安队的兵，国民党的保、甲长就不能再抓他们去当兵了，所以，那时的保安总队就成了阿拉善地区汉族青年避兵的保护伞，总队副罗永寿把他们都编进司号班，让他们精心学练戏剧技术，为发展阿拉善的戏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演员的角色如下：须生：宋永山、王学义、范立宪、魏恒忠。大净：高永水。二净：王敬忠、邢遂义、贺鸿禧。青衣旦：焦锁、贺万华、岳万兴。小旦：刘光山、杨大成。彩旦：黄朝金、夏全志。武小生：潘蛟其、梁武善、丁有福。小丑：杨志义、张二虎、杨二成。老旦：徐恒瑞、姬鸿喜。其他配角演员有：王成义、任奎、杨金和、王生华、王福华等人。教练员：张金国、石生玉、丁振华、夏全志。服装：郭安忠、彭福寿。司鼓：年秉中、任兴武、刘海山、刘万金。板胡：魏兆福。二胡、笛子：王能、聂保（聂有胜）、李文茂、罗保福。

这些演员经过几年的培养、学习和实习，对秦腔戏剧都有了全面的掌握和提高，所演剧目逐渐增多，做到了 20 天内不演重戏，又增添了新戏装，更增强了演员的信心，所演剧目受到老百姓的喜爱，自此，秦腔在旗府定远营深深地扎下了根，产生了广泛的良好社会效应。

四、剧团的新生

1949 年 9 月 23 日，阿拉善旗和平解放，1950 年将阿拉善旗保安总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并将原司号班的全体演职员编为总队政治处文艺宣传队。仍以演秦腔为主。1951 年定远营改名为巴彦浩特。

文艺宣传队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面向牧区广大群众宣传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活跃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每逢南、北寺的庙会，宣传队全体人员身背行李，步行几十里路，到贺兰山沿山一带宣传政策并演出。为共产党的工作委员会开辟基层工作，为阿拉善旗的群众文艺工作做贡献。



1952年上级曾下文,将阿拉善蒙古自治州文艺宣传队定为国家事业单位,其中16人为国家干部,演员按文艺级别套级。1953年底,由于宣传队的工作性质不适宜在部队,政府将宣传队转为地方单位,归旗政府文教处领导,名称为民族文艺工作队。此时文艺队是旗上的正规事业单位,转为地方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发了转业证,北京军区发了起义证书。自此以后,就为更进一步开展群众文艺戏剧工作开辟了新领域,走上了新道路。

1953年民族文艺队领导和演员情况如下。

协理员:杜世亭。队长:魏兆福、副队长:陈化礼。会计:李长生。下设三个分队:一分队队长:高永水、二分队队长:刘光山、三分队队长:焦锁。演员:贺万华、贺鸿禧、邢遂义、杨大成、杨二成、梁武善、黄朝金、王学义、丁有福、潘蛟其、王玉魁、任奎、年金铭、年秉中、宋永山、徐恒瑞、王福华、吴小武、张二虎、沈登元。司鼓:年秉中、任兴武、任奎、徐恒瑞。板胡:魏兆福、李文茂。二胡、笛子:王能、罗保福、王玉魁。服装:郭安忠、彭福寿、曾强。

1954年,在当地招收了一批蒙、汉族女演员:乌日娜、米德格、都玛、徐瑞君、孔润凤、甄淑珍、张玉珍、赵英瑾等10人。又在外地请来男演员6人,总人数达到50多人。

演员们大部分是当地人,他们家庭贫穷,文化程度低,思想单纯,事业心很强,学习业务认真刻苦。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练功,八到十二点排戏、背台词、演习戏剧。下午两点继续排戏,晚间七点上台演出。那时各方面条件很差,不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困难都很大,主要是经济条件差,设备也落后。如下牧区演出,连续20几天都是步行,大家都毫无怨言,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演出宣传任务。

为了尽快与社会发展的形式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文艺方针相适应,使文艺工作队全面发展,提高业务水平,旗政府批准文艺工作队到宁夏省歌舞团学习了2个月,又在甘肃民族学院歌舞团学习。主要学习音乐简谱、歌唱、现代舞蹈和现代戏剧,经过学习,文艺工作队除了能演原有的30余本历史剧外,还能演现代剧,主要剧目有:《梁秋燕》《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



《翻天覆地》《穷人恨》《血泪仇》《刘胡兰》《小二黑》等。在舞蹈方面能演出蒙古舞：《牧马舞》《鄂尔多斯》《挤奶舞》《盅碗舞》《筷子舞》《射箭舞》《赛马舞》《马刀舞》《剪羊毛舞》《羊山道舞》《锡伯族舞》《丰收舞》《红绸舞》《哈达献给毛主席》。还自编自导演出《建设大西北》等蒙古族舞蹈。

演出歌曲有：《小黑马》《不落的太阳》《小青马》《乌兰特勒海》《美丽的阿拉善》《黑缎夹袄》《小乖乖》。马头琴独奏：《阿斯尔》，其他节目还有：三弦独奏，器乐合奏，二重唱，男女小合唱等。

总之，这个文艺队由原来只能演秦腔发展到能演话剧、歌剧、梆子剧、舞蹈、歌唱、器乐演奏等多种表演形式。这在阿拉善来说是一个大突破，一个创新，所演节目深受阿拉善各族人民的喜爱。

演出活动范围：文艺队原来只在巴彦浩特演出，同时有下牧区演出和宣传。从1954年开始，打破了这种局限，文艺队到宁夏银川、平罗、贺兰、石嘴山，内蒙古磴口、陕坝、乌拉特前旗、临河、五原、包头等地演出。每到一地演出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如1956年到陕坝演出了15天，每场都是观众爆满。演出结束后，县文教科召开了座谈会，科长赞扬说：“你们的演出很成功，水平很高，不论是舞蹈还是戏剧都有一定的艺术素质，而且节目多种多样不重复，非常丰富。另一方面，你们的舞台纪律、生活作风都很好，我们感谢你们，欢迎你们再次来演出。”演出结束后，赠给文艺队锦旗一面。1957年10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参加文艺调演，文艺队演出了自编的《捉拿五仁义》，获戏剧一等奖、导演、剧本奖。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乌兰夫、杨植霖、奎璧及布赫亲自接见并合影，布赫在颁奖大会上结论为阿拉善秦腔是自治区的一枝花。1959年，甘肃省白银市成立，文艺队到场祝贺演出，受到好评。自此，文艺队每年有半年时间到外省、县、农村宣传演出，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同时给本队增添了舞蹈服装、乐器等设备，为文艺队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五、辉煌时期

1956年4月，阿拉善地区归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在巴彦浩特成立了



巴彦淖尔盟,下辖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和巴彦浩特市。

此时民族文艺工作队人员增至 80 人,阵容强大。但在演出形式上分为明显的两个派别。在此形势下,于 1958 年将文艺队改编为两个团队,其一是将演秦剧的演员编为秦腔剧团,其二是把演舞蹈、歌剧、音乐、歌唱的演员编为乌兰牧骑工作队。

1958 年 7 月,巴彦淖尔盟从阿拉善旗搬迁至三盛公,即巴彦高勒市。乌兰牧骑工作队随盟迁走,孟秀英、郭开贵、刘子玉、张玉珍、徐晓波、王同花(徐瑞君)、王大海等 20 多人随队到巴彦淖尔盟筹建歌舞团。秦腔剧团留在阿拉善旗。1961 年 5 月 13 日,阿拉善旗被划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秦腔剧团成为阿拉善左旗秦腔剧团。驻地由东关大院迁到 1951 年建成的位于南大街中心地段的大礼堂里。演出除了外出到内蒙西部巡回演出外,都固定每晚在大礼堂演出。这时是秦腔剧团的鼎盛时期。巴彦浩特爱好秦腔的中老年人晚饭后带着孩子,花几毛钱买张戏票,看 2 个多小时自己喜爱的剧目。散戏后,在回家的路上,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津津乐道剧情和演员的演技,10 几年间乐此不疲。这是当年巴彦浩特的一大景观。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

1956 年~1971 年,阿拉善左旗秦腔剧团领导和演员的情况如下。

团长:陈化礼、杨林学。秘书:王莘。总务:李长生。会计:刘光山、杨永兴。伙食管理员:苏秉文。炊事员:徐乐年。

演员:生角(老生、武生):李增厚、袁立中、郭忍孙、赵天喜、王秀芳、王学义、陈益民、齐佐民、梁文艺、雷顺成、石文辉、齐俊民、白玉印、张兴民、郭喜彦、张德国、杨在海。旦角:杨荫贞、王秀清、康秀玲、蔺秀娥、陈爱梅、仲秀英、王凤英、董兰英、郭文芳、王亚玲、栗引芹、陈玉兰、韩秀芹、余段贤。净末角:任玉才、高永水、赵寿山、张兴良、王醒民、马兴中、贺鸿禧、李汉香。丑角:刘志中、刘悦、王振中、马民全、年金铭、杨文选。文武乐队:年秉中、崔福来、段志亮、李全山、李培洋、陶力农、栗生溪、徐辰生、司雄娃、徐恒瑞、王益民、何瑞亭、张有吉、杨登科、刘忠仁、张志勇、潘存义。服装:刘健和、郭安

忠。美工：宋国钧。

演出的剧目：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秦腔剧团演出的戏剧基本上是旧剧本老秦腔，在此就不重复了。到60年代随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越拧越紧，很多旧戏剧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停止演出了，只能演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戏剧。如：《铡美案》《王宝钏》《玉堂春》。到了1965年前后，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剧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秦腔剧团就自编自导演出一些反映战争体裁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戏剧。如《夺印》《芦荡火种》《自有后来人》《收租院》《三滴血》《三打白骨精》等。阿拉善左旗一中教师霍蕴夫编写的反映阿拉善抗旱救灾的现代秦腔《乌素图》，由秦腔剧团在全区汇演中演出并荣获了大奖。

六、落 幕

1969年，阿拉善左旗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管辖，1971年宁夏各旗县秦腔剧团奉命撤销。阿拉善左旗秦腔剧团也被撤销。其中年轻的功底深的演员被调往陕西、甘肃、宁夏各有关剧团。调动情况如下。

调往宁夏秦剧团的有：王振中、余段贤、赵天喜、王秀清、李增厚、郭忍孙、王凤英、陶力农、陈爱梅、李培洋、张有吉、杨在海、张德国。调往宁夏京剧团的有：刘忠仁、张志勇。调往宁夏石嘴山京剧团的有：潘存义。调往宁夏固原地区秦剧团的有：陈益民、郭喜彦、张兴良、梁文益、齐佐民、段志亮、王益民。调往甘肃庆阳地区秦剧团的有：齐俊民、任玉才、张兴民、刘悦、崔福来。调往西安的有：栗引芹、郭文芳、王亚玲、王醒民、雷顺成、马兴中、马明权、康秀珍、蔺秀娥。调往内蒙巴彦淖尔盟的有：仲秀英。其他演职员被分配到阿拉善左旗各有关部门单位，改行从事其他工作。

至此，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兴起的在阿拉善地区经历了序幕、发展、高潮、辉煌，活跃了200年的京剧、秦腔戏剧就正式落下了帷幕。

改革开放后，形势好转了，留在阿拉善左旗有关单位的原秦腔剧团演职员都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为了丰富阿拉善广大中老年秦腔爱好者的文化生活，近几年在谢文彬、袁立中、齐俊民带领下，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余



热,和一些原来的老票友不定期的登台演出老秦腔折子戏。让我们勾起了对往昔巴彦浩特小城里秦腔戏剧从艰难创业走向辉煌的不尽思念。

以上所述是我个人的一些回忆,其中大部分是我本人的经历,一部分是我走访了当地从事或参与过此事的老年人而作的纪录。后面部分是整理编写人员聂义声走访了原秦腔剧团演员潘蛟其、杨在海等人,在内容上给予了补充和完善,在结构方面进行了增删和调整,对文句给予了修改和润色。

因历时长久,资料不全,有些情况可能和实事有出入,有误漏,欢迎批评指正。

阿拉善印刷史略

聂义声

一、起源(1943年~1950年)

1943年春天,阿拉善和硕特旗王爷达理扎雅,大协理罗恩和巴图,小协理罗巴图孟柯,财政处李布音达来(李福海)4人合股投资在北京买了一台石印机,经热河人王振华介绍,雇请了北京印刷师傅田子洋,搭乘给北京罗王府送年贡的驼队返程回阿拉善旗。当年即成立了石印局,当时的石印局属旗政府管辖,设在旗政府理事官厅后院,田子洋是领导,当地人魏文锦,包头人吴六斤是印刷工人。主要印刷业务:名片、请柬、税票三大项。用蒙汉两种文字印过年送礼单、贺信,税票为草头税、过路费。每年印刷收入为银元200元~300元。

石印局的成立,揭开了阿拉善印刷事业的第一页,填补了阿拉善印刷业的空白,使阿拉善的工业、文化事业有了崭新的局面。

1946年,魏文锦、吴六斤辞职,董福宝进石印局。

1949年,石印局搬迁至城内头道巷十字街西边靠街门面,辞去董福宝,田子洋从北京带来年仅8岁的庞玉森当学徒。王爷三弟的仆人刘明章在石印局入了股,将石印局命名为“明显石印局”。

1950年,明显石印局脱离旗政府,成为私人手工作坊式的石印局,地址搬迁到城门口大树底下转经楼南面北的邻街门面,此时石印局由田子洋、刘明章、庞玉森3人经营。



二、走向正规(1950年~1958年)

1950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轨道,表现在基层的新生事物就是成立了供销合作社,把关系到基层农牧民和城镇居民的吃、穿、用统一管理起来,这是新中国在商业流通领域的一大改革。由此阿拉善旗成立了供销合作总社,该社需大量的账簿、表册。由供销社干部师耀明和董福宝牵头成立了供销社印刷室,主任为董福宝,厂址在城门口大树底下永盛和院内,由供销社出资购买了石印机等设备,开了张。印刷室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发20元零用钱,45斤粮,还有冬夏衣。这和当时中共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一样。印刷室主要业务是给供销社印帐、表,不承印其他社会印刷业务。

1950年,“中共阿拉善旗工委”、“阿拉善和硕特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设政务委员会,下辖6个处,处下设科。旗政府的工作全面走向新阶段,需印发大量文件材料,由此供销社印刷室划归旗政府,由政务处第三科科长郑立凡领导,印刷室负责人董福宝,工人有梁泽栋、彭秀林,主要业务就是给工委、政府印文件、材料、报表等,每人每月发工资50元。

1951年初,政府将印刷室又划归供销社,调进会计冯树声,使印刷室的财务管理工作走向正规。

1953年7月,供销社以印刷是工业,不适宜在商业单位为由,将印刷室分出自立门户,命名为印刷小组,同时把石印机、手工切纸机等印刷设备及价值1万元的纸张等材料划归印刷小组。梁泽栋、彭秀林留供销社。

1954年下半年,印刷小组改名为“地方国营阿拉善旗印刷厂”,归旗政府工业局管辖,厂址迁到南大街兴泰隆院内。此时厂内人员为:厂长董福宝,会计冯树声,工人刘鸿儒、王尚惠。

1956年,工人曹永祥进厂。

1955年1月1日,阿拉善旗成为甘肃省的蒙古自治区。作为蒙古自治区工委报的《牧民报》创刊,该报是阿拉善地区的第一张报纸,四开四版蒙文报。社长原丹,编辑有吉格吉德、达力克等8人。

1956年阿拉善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在巴彦浩特成立巴彦淖尔盟，下辖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和巴彦浩特市。此时《牧民报》是盟委机关报，印刷任务由地方国营阿拉善旗印刷厂印刷。直至1958年5月23日，巴彦淖尔盟搬迁至三盛公，《牧民报》停刊。

1956年秋天，随着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的实施，阿拉善旗开展了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对手工业、工商业进行合作化改造，此时，把田子洋的私营石印局合并到阿拉善旗印刷厂，承揽大量的社会印刷业务。厂长董福宝，技术顾问田子洋，会计兼誊写冯树声，工人庞玉森、刘鸿儒、王尚惠、曹永祥。

1957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以“左”倾路线为标志的各种政治运动从此开始。巴彦淖尔盟盟委派干部冯玉佩进厂整风，董福宝被免去厂长职务，王尚惠、庞玉森被指定为印刷厂负责人。

三、发展和壮大(1958年~1969年)

1958年，全国大跃进，印刷厂增加了印蒙文的业务，东北蒙族青年巴根、那音太、秦本太进厂，业务扩大，又增加工人张淑真、王彩霞。

1959年旗工业局派杨恒山来当厂长，加强了印刷厂的领导力量，又收进魏淑兰、聂凤英、姚淑兰3名家属当工人，刘鸿儒调小松山金矿。

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印刷厂派庞玉森、魏淑兰等人到巴盟(三盛公)报社印刷厂学习印刷、装订技术，以此来提高工人的业务技术水平。

接着从内蒙报社买回了四开平台机1台，手摇铸字机1台，八开圆盘机1台，开始了铅印。这是阿拉善在印刷技术方面的一大进步，一个质的提高，使阿拉善印刷业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阿拉善印刷业的第二次飞跃。此时的印刷厂规模大改观，有了铅印后，印刷厂在原有石印、装订基础上又增加了排版、机印、铸字3个车间。石印分两班，每班3人，两块石板，轮流生产。

1960年，收进工人张林、李有才、任月英，王彩霞调出。

1958年，阿拉善工业大跃进又放卫星，在头道湖成立了旗造纸厂，在高度缺水的阿拉善却办起了需大量用水的造纸厂，虽然造出了一些粗麻纸，



但成本高数量少又无用处。1961年头道湖造纸厂与旗印刷厂合并成立《地方国营阿拉善旗造纸印刷厂》，造纸厂工人王殿基、夏明强、张登甲、张建儒、樊汉朝、马增贤、周占武等15人合进印刷厂，造纸关门后这些人都调到其他单位。

1960年，国家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加之给苏联还债，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反映在阿拉善印刷业方面的变化就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规定》的文件精神，将地方国营的印刷厂转制为《阿拉善左旗印刷生产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归属阿拉善左旗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领导。

1962年，调来白银茹担任厂长，狄有帧任会计兼管业务，原厂长杨恒山、会计冯树声调走，招进郝世华为铸字工，开始练铅铸字。

1963年，从地毯厂调来唐秀珍任会计，又招进工人刘菊英，蒙古族工人金花、那生，增加了蒙文排版，此时印刷厂是蒙汉两种文字铅印。同年7月，印刷社和刻字小组合并，成立《阿拉善左旗印刷刻字生产合作社》，刻字小组张子俊、董春泰、王兴科、郭振林、闫子荣、张桂兰、李秀珍、魏鸣等人进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印刷行业成为运动的纸张供应、刻章、印袖章单位，社会上大字报、小字报、传单、海报用纸大多来自印刷厂，各个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的公章都在刻字部刻制，红卫兵、红小兵、造反组织的袖章和旗帜都在刻字部印制。

1969年，印刷厂顺应“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形势，印刷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党的建设》，获自治区优质产品奖。厂址从南大街迁至西花园，原旗中队大园，即现址。是年厂里又购进万年铸字机1台，四开平台印刷机2台，对开全自动裁纸机1台，在这个大四合院内，南边是印刷车间5间，在西边建装订车间4间和库房4间，原工字型房为排字车间和厂部管理人员办公室。

是年，李有才调至芒硝厂，张子俊、董春泰、王兴科、李秀珍、张桂兰

调走。

四、全新发展(1969年~1980年)

1969年,阿拉善左旗党委宣传部成立了译编组,编印蒙文《学习材料》《学习与批判》,每月编印两期,译编组进印刷社办公,印刷就由印刷社承担,译编组负责人乌伦赛、包和希格图,编辑斯琴图、孟柯巴依尔、高香玲、额尔敦巴依尔 1971年~1974年又增调编辑苏木雅、色布力玛、萨仁图雅、娜仁、贺希格、扎木苏。为加强蒙文排版车间力量,1970年招收工人汪那生、李有才(小),从内蒙调来技术工人冬月,负责蒙文拣字排版。1970年下半年招收工人董继增、聂义声、刘中恩 1971年招收工人高玉荣、李卫东、赛其木格、裴俊林,刘中恩调出。

1972年1月,阿拉善左旗印刷刻字生产合作社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名为阿拉善左旗印刷厂,归属旗工交局管辖。同年购进四开平台印刷机1台,手摇打样机1台。1973年调进工人李翠花、孟柯、师铎、巴格那、巴图达来、乌恩、佟桂荣、李其木格。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邓小平复出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各行各业开始大力整顿,国民经济出现复苏气象,阿拉善的各项事业呈现一派生机,在落实少数民族各项政策的大趋势下,印刷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在阿拉善左旗译编组和印刷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阿拉善左旗报社,印刷厂改名为报社印刷厂,报社在印刷厂办公,报社是阿拉善左旗党委宣传部管辖,社长由旗委宣传部部长乌伦赛兼任,副社长先后有格日勒图、白银茹(兼厂长)、何全布勒、叶图们担任。

1975年1月1日,《阿拉善左旗报》蒙文版出版,为中共阿拉善左旗委机关报,先后调进编辑和工作人员白楚伦巴特尔、哈达、包莲花、高斯琴、包宝音、乌云其木格、乌日娜、魏巴特尔、乌力吉宝音、曹布音图、红峰、谢萨仁图雅、史金福、斯斯琴、罗恩克巴图、萨仁其木格、杨巴特尔、杨在海、斯布音。同年副社长白银茹调宁夏银川,唐秀珍调工交局,聂义声继任会计。

为了加强蒙文报排版印刷力量,同年又招进工人张那生、陆那生、吉仁



泰、捌拾宝、刘塔勒腾、秀仁其木格、包斯琴、巴图楚鲁。

1975年~1978年调进工人汪清同、陈学仁、何秀花、张兰、孙玉兰、王玉梅、王东德。

在报社的基建方面,建铸字车间4间,汉文排版、蒙文排版车间9间,职工宿舍、食堂10间;在人委家属巷建家属房5排25间,安排新调进人员10户。

1978年,社长格日勒图、编辑斯琴图、孟柯巴雅尔调宁夏,是年购进对开印刷机1台,全开自动印刷机1台,铸字机1台。

此时,报社汇集了全旗优秀的蒙文翻译编辑人员20余人,所印阿拉善左旗蒙文报四开四版,每周2期,每期2000份,它是阿拉善的新生事物,为全旗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科技、文化知识,传输国际国内最新动态、信息起了重要作用。

五、走进新时代(1980年~1999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克服了“左”倾思想,纠正了“左”倾路线,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阿拉善的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0年5月1号,成立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报社被转为阿拉善盟报社。同时,报社印刷厂也改名为阿拉善报社印刷厂。报社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部门,盟委行署调整健全了报社领导班子,增加了编采印刷人员,投资新增了机器设备。由于工作需要叶图们、何全布勒留旗,格日勒图从宁夏调来任副社长,白楚伦巴特尔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印刷厂厂长,白银仓任副厂长,编辑部调来刘子宾、曹翔云、杨斯琴、马金花。新安排工人王建萍、王亚玲、张富香、孙跃华、杨劲松、彭祥瑞、敖荣、梁图雅、李翠娟、李玉梅。

同时,购进四开平台印刷机1台,八开方向机1台,全自动切纸机1台,铸字机2台,手摇打样机1台,卧式照相制版机1台。

此时的报社及其下属印刷厂是一个单位,两套人马,报社是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下属印刷厂是企业,实行企业管理,收支自负,还有盈余,

成为利润。

《阿拉善报》成为盟委的机关报,从1980年5月1日起出版,四开四版蒙文报,每周从两期增加到三期,印数2500份。

1984年7月1日,报社出版汉文版《阿拉善报》。盟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玉泉任报社书记,原有副社长格日勒图,调进副社长韩燕南,新提副社长哈达。成立汉编部,汉编部主任邓安平,编辑刘子宾、董培勤、姚思泰、史金福、聂义声、巴依尔。汉文排版新增工人王凤梅、赵艳、曹海颖、李桂琴。盟报汉文版的问世,开创了阿拉善新闻事业的新天地,该报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报道社会各界动态,传输国内外重大新闻,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主要文化阵地。出版期数从周三期到周五期,至2006年1月1日阿拉善盟蒙汉报成为《阿拉善日报》,版面从四开四版到对开四版,汉报印数从3000份到5400份,蒙报印数2500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级大报。

此时的印刷厂既印蒙汉阿拉善报,又承印社会印刷业务,全报社人员达100多人,设总编室、办公室、汉编部、蒙编部、采通部、印刷厂。印刷厂年年有盈余,每年上交利税8000到1万元,是印刷厂的鼎盛时期。姜桂英进厂。

六、改制(1999年)

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

1985年,企业第一轮承包来到报社,经过竞争,印刷工人师铎当上了印刷厂厂长,金花任副厂长,调来电修厂工人闫子荣任副厂长。

1986年,阿拉善盟报社与阿拉善盟印刷厂分离,盟报社搬迁至老陵滩(新浩特),阿盟印刷厂交盟经济处管辖,仍然是国营企业。阿拉善盟报社又成立了一个印刷厂,先是专印盟报,后来也承揽社会印刷业务。

1986年分家后,阿拉善盟报社印刷厂组成人员:

蒙排车间:金花、李其木格、佟桂荣、杨其木格、秀仁其木格、高娃。汉排



车间:(成立了盟委机要印刷室,任月英在印刷室工作)李桂琴、曹海颖、闫新春、石凤兰、李翠娟、梁图雅、李艳波。铸字车间:汪那生、尉勇、王亚玲、马仲敖。印刷车间:张兰、王建萍、贾宝铭、邱金明、杨劲松。装订车间:张富香、姜桂英。制版车间:王玉梅、张浩、周占忠。发行:敖登司机:达来、张那生、李新明。

此时在巴彦浩特已有四家印刷厂,除阿拉善盟报社印刷厂、阿拉善盟印刷厂外,还有阿拉善左旗教育印刷厂,巴镇印刷厂。体现了印刷业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现象。

1988年,盟经济处调来杨发良任阿拉善盟印刷厂厂长,杨淑霞任书记。私人承包暂时结束。1989年,盟印刷厂在临街门面建起五间门面三层办公楼。

1990年,阿拉善盟成立了全盟印刷协会,有阿拉善盟报社印刷厂、阿拉善盟印刷厂、阿拉善左旗教育印刷厂、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印刷厂、阿拉善右旗印刷厂、吉兰泰盐厂印刷厂7个单位参加,选举产生会长杨劲松,理事杨发良、欧安民、神硕侯、安传松、李晓宏、彭祥瑞。协会每年召集一次会议,研究、协商、交流印刷方面的一些事宜和信息。

20世纪90年代初阿拉善盟报社在报纸的印刷方面,实现了第三次飞跃。1992年,电脑排版代替了铅字排版,纸版、PS版代替了铅字版、铜锌版,微机传输代替了邮寄函、信件。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印刷业的一些旧设备、旧工艺被淘汰,新机械新工艺日新月异,表现在工作中的改变就是印刷人员减少,报纸印刷被集中在大报业集团手中。

1999年的企业改制使很多行业,主要是工业企业、商业服务等流通领域的企业彻底私营化,阿拉善盟印刷厂改制为私营企业,厂长为辛耀辉。至此,阿拉善巴彦浩特地区出现了10几家私人印刷厂,这些印刷厂几乎就是私人作坊,但其印刷设备已远非旧日可比,电脑排版、树脂版、PS版、小型胶印机等新型印刷设备体现了轻便、快捷、高质量的时代特征。至此,印刷业由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枝独秀变成市场经济下的百花盛开局面。

阿拉善蒙古族祭骆驼习俗

李万钰

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广大牧区,蒙古族牧民中世代传承着一种古老的祭骆驼习俗。这是蒙古族集宗教信仰、传统生产、人文思想为一体的民间活动,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色。蒙古族祭骆驼同其他民族的祭灶、祭火、祭土地、祭龙王一样,有其悠久的历史。但蒙古族祭骆驼有所不同的是,祭骆驼不以神灵为主,而是以自己饲养的骆驼为对象,把骆驼实体作为神的化身和使者以祭拜。

蒙古族祭驼的内容非常丰富,由祭公驼、祭母驼、祭驼群等活动共同组成,每项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相同。这种独特的传统习俗,在骆驼产区的蒙古族牧民中影响深远而广泛,文化积淀也非常厚重。

据史料记载,北美洲野骆驼进入欧亚大陆后,依其习性特征,自然定居黄河流域及西北以阿拉善为中心的荒漠戈壁。“家驼生塞北河西……其种大抵出塞外”。此地非常适合骆驼生存繁殖,是人类驯养双峰驼最早的地区之一。在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中,骆驼在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成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和伙伴。人们崇尚骆驼的忠诚友善和耐劳精神,历来视其为珍贵之奇畜。远古时期的牧驼人就把最好的骆驼挑选出来,敬献给天地、山神,不使用不宰杀,终身供养。

大量史料证明,汉唐开始,从宫廷到民间都有供奉骆驼雕像的习俗。古人崇敬骆驼,广制驼像,用以祭供。西安出土的唐三彩就是骆驼作为祭供用



品的历史实物。牧驼人家不仅用骆驼实体来恭敬神灵,在家中也雕制驼像,从陈列供放到焚香祭拜,历代传袭,不断丰富内涵,逐渐形成习俗。随养驼之风大兴,祭驼习俗也大兴。

蒙古族祭驼在骆驼产区流传极广,家祭活动遍布阿拉善各地。祭骆驼活动除阿拉善盛行外,同时还辐射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的部分旗县,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蒙古族聚居的地方,以及蒙古国的部分地区。总之,在骆驼饲养地区的蒙古族中,都有同样习俗,其内容和形式也基本相同。

蒙古族祭驼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活动,更不是纯粹的迷信活动。而是信仰和务实的结合,包藏着朴素唯物的内容,是牧驼人的精神寄托。祭驼活动所展示的人性化内容,孕育了当地蒙古族忠厚善良、坚韧不拔的骆驼精神。祭驼活动所产生的“功臣驼”、“骆驼赞”、“祝颂词”、“劝奶歌”等大量拟人文化,隐含着温柔敦厚、知恩图报、弃恶扬善的朴素哲理,已成为民族凝聚和人文传承的载体。抢救保护这一文化遗产,不仅有助于研究民俗民情,在研究骆驼文化和自然传承的民族心理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蒙古族祭驼的内容非常丰富,每年要分三次举行,每次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相同。一是祭儿驼。祭儿驼又分“家祭”和“庙祭(公祭)”,“大年三十夜,各家祭儿驼,天地同迎春,人畜呈吉祥。”这是举行家祭的时间,也是祭儿驼活动要表达的思想;农历二月十五日,在儿驼庙及其他寺庙举行祭儿驼集会,也叫庙祭或公祭。祭儿驼以种公驼为对象,主要体现骆驼体格健壮,良种永续的祈愿。二是各家牧户以共用水井为范围,在居住相对集中的几户人家中分户祭母驼。在此活动中以母驼为祈愿主体,多产良羔的“英雄妈妈”受到敬拜,“妙龄少女”也会备受青睐,祭母驼是祝愿它们百母百子。三是在秋季,由牧户各自祭驼群,象征收获金秋。本次活动要请众多亲朋好友参加,充分体现丰收的喜悦。人们身着民族盛装,扶老携幼从四面赶来,其形式类似节庆。现在,随着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牧户都以家庭那达慕的形式进行。

蒙古族祭驼以阿拉善双峰驼为对象,在阿拉善蒙古族牧户中普遍举

行,牧驼户无一例外。在阿拉善广大牧区,祭驼活动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和庞大的崇信人群。

阿拉善素有“骆驼之乡”的美誉,全盟骆驼数量最多时达到25万峰,占全国骆驼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阿拉善草原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荒漠戈壁占80%。牧草种类以“扎干”(梭梭)、珍珠、红砂、柠条、沙拐枣、沙蒿等29种灌木和半灌木牧草为主,是骆驼主要采食牧草。正是阿拉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植被,选育和造就了骆驼这种耐干旱、耐粗饲的优良畜种,使草原和畜种相得益彰。历史上这里以生产骆驼闻名,因此,也无可置疑成为蒙古族祭驼的发源地和盛行区。

蒙古族祭驼活动的分布区域虽然广大,但最集中的地区在阿拉善左旗的乌力吉、银根、吉兰泰、敖伦布拉格;阿拉善右旗的塔木苏、筓布尔、努日盖;额济纳旗的温图高勒、古日乃等在历史上均有“万峰驼苏木”之称的地方。这些地方骆驼数量大,养驼户集中,祭骆驼活动也主要在这些地区的蒙古族牧民中举行。其他各苏木及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的部分旗县,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蒙古国的部分地区,养殖骆驼的牧民家虽有相同习俗,但其规模和影响已远不如万峰驼苏木之大。

蒙古族祭驼源于上古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接受萨满教之前,对山神、树神最原始的信仰。《辞海》注解:萨满教是通古斯语的音译,是一种原始宗教。早在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公社时代,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已经把骆驼驯化,称骆驼为奇畜。据《逸周书》“伊尹为县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骆驼,野马……为献”的记载,当时骆驼在内地确实属稀有动物,故“北蛮人”当作珍贵的礼品用以供奉和进献。考古学也证明:大约距今100万年~50万年间,双峰驼就进入黄河流域。在这漫长岁月中,游牧人有无信仰呢?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豸豸、犂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可见人类历史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在原始宗教还未进入北方游牧民族,人们就开始对骆驼产生了朴素的敬仰之情。

1587年叩见达赖喇嘛时,呈献的“驼马兼以万计”。古代社会对骆驼的普遍重视,致养驼祭驼之风愈盛。

蒙古族作家魏巴特尔先生在《阿拉善传说》一书中载:相传明末年间,阿拉善有一个驴耳朵汗,被狐妖所惑。汗王沉湎酒色,政务荒废,灾降民间。莲花神为救众生前来降服,妖狐现形逃命。莲花神乘驼追到敖龙布拉格山上,骆驼却不幸摔伤了。莲花神弃驼穷追到一山洞,最终降服了妖狐。但是,那峰雄壮威猛的骆驼却因伤势过重,长眠于大山上。当地人民怀着悲痛之心,在骆驼死去的地方筑起一座敖包来纪念。后来发现,在骆驼死去的崖壁上,清晰地出现了一幅骆驼画像。此山崖顶端前倾,高千余米。据宁夏地质队测量,驼象在距山底80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人力绘雕绝无可能,属天然形成。驼像平时呈灰褐色,但在种公驼发情时节,驼像就会浑身变黑口唇变白,显出情态。当地群众称此山为“神驼山”或“儿驼山”,又在山脚下的敖包旁盖了一座庙,世代祭祀。此庙就是现今的儿驼庙,当地人每年祭拜,贯穿明清。

1928年,因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儿驼庙自然坍塌。当年,由格日乐达赖等人集资,在颓废的庙址上又建起了一座新庙。解放初期庙宇被窜匪所抢,“文革”期间被完全摧毁,儿驼庙的祭驼活动被迫停止。2004年,牧民们又在庙址的废墟上重建儿驼庙,祭驼活动又逐步恢复。

蒙古族祭驼不完全是祈求上苍神灵的宗教活动,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已被人性化了的骆驼实体本身,同时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祭骆驼的内容很丰富,形式也灵活多样。在时间上依据牧业生产年度,如种公驼发情期,母驼产羔期和驼群膘肥体壮的秋季。这些都是骆驼生产的重要季节,也是骆驼经营饲养中的主要环节,

一、祭儿驼

祭儿驼是以寺庙为中心的集会活动,牧民从四周骑骆驼,赶驼群来到寺庙,共同祭祀。由于牧区居住分散,路途太远的还要在这里住宿。若驱赶骆驼确有困难的,也可携带儿驼的缰绳、鼻棍子代替,称为“心祭”或“顺



祭”。绝大部分没有寺庙的地方以家祭为主,在相邻牧户间进行。

祭儿驼(以儿驼庙为例)因涉及家庭和人员较多,因此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特别是祭祀仪式的主持人和组织者需提前确定。儿驼庙的主持人一般实行逐户轮流的形式,在前一届结束时即已确定。本届活动开始时完成邀请喇嘛、准备炊具、赛事安排等事宜。

各牧户则要收集各自的部分适龄母驼,赶到儿驼庙。带足自己全天的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并把祭供品带来。祭驼当天不用通知,牧民自行前往。仪式早晨开始,首先点燃敖包圣火,喇嘛开始诵《贡吉勒塔目》,祭众先转敖包,在敖包上供奉哈达、食品,把带来的骆驼鼻棍子、缰绳拴挂在敖包上,然后祭洒白酒、驼奶,把“开姆尔”撒向空中。诵经结束后进入庙内,点燃酥油灯,在骆驼神像前摆放供品:主要是煮熟的“羊乌叉”、奶食品、水果、哈达、白酒等。主持人手举哈达,面对骆驼神朗诵祝词。颂祝词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有固定的格式和内容,大意是:

尊贵高尚的骆驼神啊,
请给你的驼群带来佑护和吉祥吧。
让你的母驼全部怀胎,
让你的子孙具有雄伟的身材,
让你的种群壮大和发展。

伴随祝颂,祭众向骆驼神像磕头祈祷,盼望自己的驼群膘肥体壮,家庭幸福美满。

在庙外的草地上,牧民赶来的骆驼拴在一起。凡是来到庙上的骆驼,都要在其笼头上拴挂念过经的哈达,在额头和鼻梁上抹酥油(蒙语:米拉纳),在身上祭洒白酒和鲜奶,把希望和祝福付诸驼身。然后向驼群唱响赞颂骆驼的《骆驼赞》等长调民歌。午饭时,所有祭众都要分享在骆驼神像前已经过神光沐浴的“羊乌叉”,家中没有来的人,要分割一块带回去。最后,还要举行赛骆驼和评选骆驼的活动。整个活动下午结束,祭众开始返家。

在没有寺庙的地方,牧民采用家祭的形式祭儿驼。牧民家祭在农历腊

月三十举行,凡是能找回的骆驼都要集中起来。与庙祭不同的是要牵着儿驼围绕火堆或香炉台转三圈,有时也要请喇嘛念经。祭撒白酒、鲜奶和米拉纳的形式,基本与庙祭相同。

二、祭母驼

蒙古族祭骆驼的第二个内容是“祭母驼”。时间是祭儿驼结束后,在母驼产羔前的一个月内,以祭火神的形式,由各牧户在家中举行。

祭母驼仪式开始前,首先要点燃室外的香炉台。(蒙语“桑格英德尔”) 在蒙古包中央的火撑子里点燃柴火,撒柏籽香,点亮酥油灯,把装有糖果、奶食品、油饼、酥油等供品的盘子和砖茶、白酒、驼奶、哈达、“羊乌叉”、巴灵、“嘎林布达”摆在佛像前。喇嘛念《贡吉勒塔目》。主家要选择1~2峰儿驼和几峰已怀孕的母驼,绕香炉顺时针转,口念祝愿词。前来参加活动的人都要在香炉中祭洒白酒和刚煮好的奶茶,至诵经结束。

在蒙古包内的火堆周围,供放4个“巴灵”和4个面做的酥油灯,喇嘛念《米塔乔特巴》祭火经。家主穿着盛装,把去肉的羊胸叉骨用五色丝线各缠绕三圈,中间塞进五色彩绸和棉花,同时放红枣、干果、哈达、奶食品等,然后一起投入火中。将象征献给火神的哈达祭烧火中,把火堆周围的酥油灯和巴灵投入火中。全家人围绕火堆把酥油、白酒祭洒于火中。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向火神祈祷:祝愿骆驼百母百子,膘肥体壮,抗御灾病。

祭母驼一般是共用水井的几家牧户依次进行,顺序自定,自约而行。其目的是每家都有人前来捧场祝福,创造喜庆场面,增进团结和谐和友爱互助。

三、祭驼群

祭驼群在每年驼群膘肥体壮的秋季,以招财的形式进行,喇嘛念招福经。男主人手握“达勒干苏木”,女主人手提装有驼奶的奶桶,其他主要成员手端盘子,共同面向空中环绕招福。

祭驼群时也要尽量把所有的骆驼全部找回来,让它们沐浴仙气,接受祝福。特别是儿驼、“敖恩根特莫”、“色特尔特莫”、“达尔罕特莫”必须找来,



向它们朗诵祝词,唱赞美歌。

——敖恩根特莫源于萨满教进入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之前。人们把驼群中最好的骆驼敬献给山神、树神。所选的敖恩根特莫,不分雌雄,以纯白色最好。选定后要视其为神的使者,终生供养,祈求神佑。

——色特尔特莫是在佛教传入后,敬献给佛的骆驼。同前一样,属于佛之骑乘,不得使用,终生供养。

——达尔罕特莫则是把体型好、毛色好、产羔多、驮物多而稳、走路平而快,为驼群和家庭做出巨大贡献的骆驼视为“功臣”驼,退役后不杀不卖而送终。

在祭驼仪式上,敖恩根特莫和色特尔特莫作为神和佛的使者或化身,接受礼拜,传达祈愿。达尔罕特莫则体现以恩报恩的思想。

每年祭驼群时,如果这三种骆驼都健在,便在驼峰上悬挂用彩绸装饰、写着经文的“艾力登”葫芦。象征财富永远装不满、取不尽。如果出现空缺,此次活动就要重新选择继承者以延续,确保三种骆驼永续不断。在“色特尔特莫”的脖子上,还要拴上用五色布做的印着经文的“扎拉目”,常年不取以佑护驼群。

在牧民孟柯巴图家,我们请教主人,这几种骆驼死后怎么处理?他给我们讲了一段非常伤感的故事。还是在孟柯巴图很小的时候,有一峰父亲使用过的“达尔罕特莫”。那是一峰体格十分高大健壮的红骟驼,四肢粗壮修长,驼峰肥大挺直,堪称驼群中的“俊秀”。达尔罕性情温顺,特别听话,幼年的孟柯巴图每天与它玩耍,成了朋友伙伴。只要喊一声“嗖格”,达尔罕就会乖乖卧地让小主人骑在背上,可以说孟柯巴图是在驼背上长大的。突然有一年,几个月没见达尔罕回来,他便哭闹着催促父亲去找。三天后,父亲拖着沉重的步履回来了,脸上没有笑容,孟柯巴图明白了一切,他一个人站在蒙古包后面流下了眼泪。后来,父亲告诉他,达尔罕是一峰非常有灵性的骆驼。它不意愿让主人看到它临死时的惨状,才选择了在离家约30公里的梭梭林中去死。细心的牧民都能观察到,达尔罕自感生命结束时,都要尽力走

到最远。在离家时,达尔罕会围绕蒙古包和棚圈转几圈,时而还发出几声悲鸣,似乎要表达不愿离开主人和家园的心情。

驼群中的这三种骆驼是牧民的心爱,也是寄托精神和祈愿的物质载体。祭驼群时的隆重、虔诚跃然纸上,若身临其境,当会备受感染。

全部仪式结束后,主家要摆上全羊宴(羊乌叉),与来宾共贺。此环节也十分重要,久不相逢的人们把盏高歌,互致问候,亲密无间的友情年年有续,代代相传。

祭驼活动对服装没有特别要求,大都穿节庆时的蒙古袍。所用供品也是日常食品,但必须在祭祀仪式前专做。除祭品随火焚烧外,大部分供品都分而食用。

仪式中所用乐器有锣、鼓、镲、铃、“当布勒”、喇嘛号等,由寺庙准备。祭祀所用的主要手工制品,分别由喇嘛和主家在祭典仪式前做好备用。祭驼群所用的手工制品,主要有以下几种。

“巴灵”共10个,其中4个作为祭品,和其他祭品一样,入火焚烧;另外6个则作为供品,摆在箱、桌等高处。做巴灵的原料以青稞面为主,加红白糖、酥油、白面、中药面和香料,揉制成形置于供盘,外涂酥油定型。所有巴灵形状各异,代表所敬不同神灵。捏制酥油灯也用这种原料,形似高脚酒杯,注满酥油后插上灯捻点燃。

“艾力登”用一公分厚的木板做成长约20公分的葫芦形状,在上端钻一小孔。把葫芦漆染成黄色,稍干后写上经文。然后穿一根细毛绳,便于在骆驼身上拴挂。

“扎拉目”用黄(大地)、绿(草原)、白(云彩)、红(风)、蓝(天)五色布按顺序迭缝在一起,写上所敬神灵的字符。各家按所敬神灵的不同,扎拉目上书写的佛名字符也不同,如:纳木斯来,哈目,官布等等。艾力登和扎拉目上所写字符,全部都是藏文,用红色油漆书写。

“达勒干苏木”将五色绸缎加工成约1尺宽3尺长的布条,固定在1.5米长的木棍一端。祭驼仪式过后,常年插在装满五谷的“斗”或“升”里



(蒙语:达勒干赏),摆放在蒙古包正面右侧。永久性住房,要摆放在正墙右角或箱柜家具上面。

羊胸叉骨 将煮熟的羊胸叉去肉,保留骨头的完整性,用五色丝线从骨头两端按“8”字形各绕三圈,使之成为船形。中间填充古勒岱、红枣、葡萄干、奶酪、五色彩绸条等,然后用哈达铺底,盛放在贡盘内。

阿拉善是蒙古族祭驼最主要的地区之一。历史悠久,根深蒂固,是养驼牧户的世传习俗,无一家例外。在牧区,有许多民俗“土专家”。他们举办的祭骆驼活动,人文情趣浓厚,规矩“要素”准确,内容规范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千峰驼世家“安主大人”(清光绪御赐辅国公)家族。其后裔纳木吉勒策仁今年已73岁,他的父辈在上世纪50年代,把家中的达尔罕无赏捐助给进藏解放军,为部队做驮运。他一生搜集研究骆驼文化,可谓祖传世家。

祖居“万峰驼苏木”格日乐达来,早在1928年就率众修建儿驼庙,组织庙祭,在敖龙布拉格一带有很高声望。2004年,由世孙胡乌力吉牵头集资,又在神驼山原址上恢复了儿驼庙,并且恢复了祭儿驼活动,至今没有间断。

昂齐达格布从喀尔喀部迁来,也是阿拉善有名的养驼大户。他家饲养的骆驼以“戈壁红驼”为主,也是祭母驼活动具有代表的家庭。后传于齐乐玛,现传至世孙呼日勒楚鲁。

20世纪30年代,鲁布森年逾70岁时,把祭驼群的知识传给儿子额尔克别力格,到其子孟克巴图时代,已实行合作化,家祭活动终止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现孟克巴图又在家中恢复祭驼群活动,现传给儿子哈达扣。

蒙古族祭驼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不同于其他宗教祭祀活动。蒙古族祭驼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也是牧驼人精神寄托的重要空间。二是在阿拉善驼产区,祭骆驼是民间的活动空间,祭儿驼则是层次最高的牧民联合空间,表达蒙古族祈求驼业发展的心愿。祭驼中宣扬和传递善行福祉的思想,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祭驼习俗传承不断。三是民主自治,邻里助善,虔心祭驼,合议自办。体现出民众的组织协调能力,是政权和制度之外的一种自发而由衷的民间社会秩序。

蒙古族祭驼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人文价值，在骆驼产区的蒙古族当中，有不可替代的精神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蒙古族祭驼是传统的民间文化，蒙古族牧民在饲养骆驼的同时，与骆驼建立起了人性化的关系，并把接人待物的朴素心理融会其中。它不仅为研究民俗民情提供了重要根据，在研究骆驼文化和骆驼饲养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祭骆驼活动中，有极其丰富的人性化内容。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变和充实，产生了诸如“功臣驼”、“劝奶歌”、“骆驼赞”、“祝颂词”等大量的拟人文化。孕育出蒙古族忠厚善良，刚正不阿，吃苦耐劳，勤奋顽强的骆驼精神。

祭骆驼活动，是骆驼产区蒙古民族民间文化和人文思想的传承载体。除保留民间信仰，体育竞技，民间艺术，民间工艺的原生形态外，还衍传着人与自然、人与家畜的和谐，隐含着知恩图报，与人为善，善待周围，崇尚自然的朴素道理。蕴含了因势利导，言传身教的生活态度，传递着温柔敦厚，默契和谐的人生哲理。祭驼活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把个体牧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促进牧民互助友爱，自然传承共同民族心理，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牧民文化生活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养驼业逐年萎缩，民间祭骆驼活动呈现出淡化现象。现在，牧区实行退牧还草，转移搬迁等政策，蒙古族牧民中祭驼活动也在减少。传统的祭驼仪式、程序、礼仪等逐渐失传。特别是近十几年之内，阿拉善双峰驼锐减 60%，总量一直徘徊在 8 万峰左右，直接影响到祭驼习俗的开展和传承。据普查，目前全盟骆驼数量最多的牧户，骆驼总数也仅有 200 多峰。牧驼、祭驼均后继乏人，传统习俗濒临失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文环境受到冲击。现在，除极个别老人健在的牧户和骆驼数量相对较多的人家能勉强举办祭骆驼活动外，绝大部分地区已不再举行。

2006 年，阿拉善盟文化广播电视局邀请盟内部分专家，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蒙古族祭驼的历史、现状、作用、价值以及今后保护措施。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蒙古族祭驼不同于任何宗教祭祀活动，是驼产区蒙古族牧民崇尚



自然、表达理想的精神空间,也是他们求真务实、自然和谐、因循善诱等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祭驼活动以歌颂和赞美骆驼为主要内容,成功地塑造了骆驼的美好形象。特别是把那些为家庭做出巨大贡献,同主人建立了感情的“达尔罕特莫”,尊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化“工匠”以供养,其含意和影响深远而巨大。通过祭驼活动,忠厚善良、粗犷豪放、彪悍顽强的民族心理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和传递,具有深刻的人文哲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阿拉善是著名的“骆驼之乡”,拥有全自治区骆驼总数的三分之二多,在保护项目,传承发展,充实内容,丰富内涵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因此,保护和传承“蒙古族祭驼”活动,阿拉善义不容辞。阿拉善盟有条件,有能力完成这一使命,担此重任当之无愧。

近些年养驼业每况愈下,祭驼意识淡化,不仅传统的礼仪程序面临失传,其中所蕴含着的唯物朴素的生活态度、敦厚勤善的处世哲理等衍传内容,也正在受到冲击。现在,七旬老人健在的家庭才能勉强举办祭驼活动,绝大部分牧户已近失传,抢救工作刻不容缓。

蒙古族祭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面临失传,面对专家们的呼吁,阿拉善盟委行署十分重视。2007年之初作出决定,把蒙古族祭驼作为盟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责成有关部门制定保护措施和规划,蒙古族祭驼又开始被政府倡导和保护。现在,政府部门已经同民间祭儿驼的组织者建立起了长期联系。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养驼牧户带头举办,以带动周边群众。出现家祭空白区的地方,对首家举办户,文化部门还给予适当经费补助,重新唤起牧民对骆驼的钟爱。

蒙古族祭驼是蒙古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独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使骆驼这种宝贵家畜得到充分的赞美,祝愿祭骆驼活动世代传承下去。

解放前阿拉善妇女生活习俗 及政治地位的片断

G·朝格图 呼鲁嘎纳

阿拉善旗蒙古族,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一支,系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撒尔之后裔。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因其特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一些生活习俗。而这些生活习俗的特征在妇女身上表现尤为突出。阿拉善妇女具有纯洁健康、朴实忠贞的美德。我们谨整理有关封建社会阿拉善妇女的生活习俗及政治地位方面的片断资料,以图将她们世代相传的美德留有记载,亦供民俗学、社会学和妇运史研究者参考。

一、服 饰

旧时,阿拉善妇女身着不开衩的长袍外套坎肩,安规矩而言,不束腰带。长袍根据不同季节,可分单袍、夹袍、棉袍和有各种裘皮为里的长袍。还有绸面子的绵羊羔皮袍(这些都不是开衩的)。

当妇女赴宴或娱乐集会时,身穿整洁鲜艳的衣着,外套坎肩或短衣;足蹬镶有绿边的光面皮靴或香牛皮靴子;裤子上另套用质地好的绸缎或布料缝制的护膝套裤。手上要戴金银戒指和手镯。

阿拉善旗妇女所戴帽子,做工精细,别有风致,分有冬夏季两种帽子。但贵族妇女的帽子同平民妇女的帽子无论其形状还是用料选择方面均有严格区别。王公贵族家的贵妇所戴帽子是以名贵的虎、豹皮或貂、水獭皮做



为帽圈,上用珊瑚珠串的帽纽扣顶子,形为椭圆形。平民妇女所戴之帽是有金银丝图案的小珊瑚串联纽扣顶子,帽后面也有红丝绵缨,其形同上。冬季帽子后部开口,用貂、水獭皮做围子,上有用金银丝及彩色丝线编制的花纹图案和绣花,帽后部还缀有红、绿、黄三色双面绸飘带。上述帽子,妇女只有出入礼仪较隆重的场面或喜庆日子里盛装打扮时才戴。平时,只戴绸面黑布、貂皮围子的筒形简易帽子,或用长头巾将头包住即可。若在发髻上戴有首饰,可不戴帽子。

阿拉善妇女的首饰有:珊瑚珠(一对)、镶嵌有珊瑚、珍珠的金银花纹镇片(额上端佩戴)、金银钗、耳坠子和耳环等。

女子在什么年龄阶段梳什么辫子,是有严格要求的。幼女头顶部只留有一点头发,将其梳成一小辫子。进入少女年龄后,便要蓄全发,朝后梳一条辫子,将头顶部头发用红、绿线扎住,辫梢上扎上三色绸带子,并给佩戴小耳环。少女无特别的首饰和帽子,戴上普通便帽即可。当女子到了出嫁年龄出嫁时,其梳妆打扮较前大不相同了,一要分发梳两条辫子,二可戴全副金银首饰及耳坠子、耳环及全套首饰。

二、出自宗教信仰方面的习俗

在阿拉善地区,因黄教的传播历史基本上同该旗的历史一样长,故黄教的根基颇深。它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教活动已成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神灵的保佑上,以图消灾避难,平安幸福。

妇女们同男人一样,也常涉足寺院,求神拜佛,烧香磕头。特别是当一年一度的秋季庙会到来时,妇女们纷纷携儿带女来赶庙会,观看蒙古族传统的赛马、射箭和摔跤等竞技,以饱眼福。这时长年忙里忙外的劳动妇女来说,能够有幸参加草原上的乌日斯(那达慕)盛会。确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快事了。当然,乌日斯盛会,也是做父母的给子女们选择对象的难得机会。

在旧社会里,因阿拉善蒙古人家家家户户都供奉神佛,所以,大多数妇女往往就是虔诚的佛教徒,这一点不足为奇。当母亲的将子送寺院当嘛嘛,视

为行善积德,是对神佛虔诚的表现。若家有三子,其母送二子为僧,人们就会称颂说,这个女人真有福分,自1830年起,送子为僧的事,在阿拉善地区越来越多起来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不容忽视的其他一些原因。如:除危急情况外当喇嘛可逃避兵役、税捐,贫苦人家的孩子在寺院里可找个糊口的差事等等。有的人家,为生活所迫,孩子刚满6岁就送进寺院当喇嘛。

20世纪40年代初,阿拉善旗境内,共拥有大小寺庙32座;喇嘛人数达4000余人,占全旗蒙古族百分之二十以上。由此可见,宗教在阿拉善旗的传播已达到何等广泛的程度。

三、生计与习俗

阿拉善的劳动妇女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力,他们长年累月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而操劳奔波。在这里,家庭不分贫富,房子(蒙古包)一律坐北向阳。家庭主妇经常打扫房屋,以保持清洁。就是在房子外边垛烧柴,妇女们也讲究整齐化一,并不断往上面添加新柴火。

打扫房屋时,将清除的炉灰和垃圾,须分别倒在固定的地方。解手要远离住房,且最禁忌到牲畜圈棚里解手。阿拉善妇女的这种讲究清洁卫生的文明品质,便相沿成俗而承袭下来了。

每逢春节前夕,妇女们特别繁忙。为使家中老小欢度春节,腊月里就得赶做新衣裳。到了腊月二十三日,还要祭火神。祭火神时,须先将房屋打扫干净,然后摆上油炸裸子和羊胸叉骨等美味供品。祭祀用的胸叉骨,事先要用各色绸带,丝锦线等缠绕装饰一番。祭火神的主祭人应由家庭主妇来充当。世俗男子虽参加祭祀仪式,并向火神敬献供品,但不磕头。妇女下脆磕头时,须将其长袍前下摆铺在地上,尔后双膝着地磕头。凡喇嘛概不举行此项仪式,说喇嘛本是佛门弟子,无祭火神的必要。

关于腊月二十三日祭火神的来历,民间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神话传说:在远古时期,有一位仙女下凡长住人间。她每年要回一次天宫娘家,于腊月二十三日飞回天宫,又于腊月三十日复归人间,年年如此。这位仙女每当飞



回天宫娘家后，将其所居住家中一年的生计及对她这个火神的供奉状况等，事无巨细地都要向玉皇大帝一一奏报。第七天，她带着玉皇大帝的旨意又返回人间。从此，民间就有了腊月二十三为仙女上天饯行，三十日迎接仙女归来的习俗。因火神为仙女，故祭火神的仪式便由妇女支持了。

阿拉善的广大劳动妇女担负着家庭的生活和生产的重担，他们长年累月以游牧为生，与牛羊打交道。所以，他们不但擅长于畜群的经营管理，而且对自己的牲畜特别有感情。他们时常发挥其丰富的想像力，根据身边牲畜的千姿百态，神情各异，给他们起一些幽默动听的各种叫名（所有牲畜都有名），以流露自己的喜爱之情。

在牧区，常出现母羊嫌弃小羔而不奶羔的现象。其原因是母羊过于虚弱或尚幼。羊群里遇有这种现象，牧羊妇女便蹲在母羊旁边给它唱委婉动情的长歌——《陶衣格》之歌，耐心地哄母羊奶小羔。为防止母羊嫌弃小羔现象发生，他们平时加强对羊群的放牧管理，尤其注意抓膘这一关键环节。同时，还经常向子女们传授其放牧技能和管理经验，教育他们早日成为放牧能手。

在骆驼群里，母驼嫌弃驼羔也时有发生，遇有不奶羔的母驼，妇女们常哼一些悲切动情的曲子和《陶衣格》之歌给母驼听。这个办法较灵，不过数日母驼便疼爱其驼羔了。牧区劳动妇女的这种技能，可称得上是一种特殊技能。

当春天接羔的大忙季节到来时，妇女们日日夜夜在圈棚里守候操劳，常常接了这个羔又去接那个羔，应接不暇，连个囫圇觉也睡不好。只有40来天的接羔期结束了，他们才难得睡个安稳觉。

在解放前，阿拉善地区贫富悬殊较大。从占有的牲畜量来看：拥有千峰骆驼几千只羊的大户人家也不少；占有二三百只羊的算中等户，而多半数牧民只靠几十只羊维持生活，处境十分艰难。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这种悬殊差别，必然使大多数劳动妇女过穷苦的日子。广大劳动妇女为生活所迫，一年四季忙里忙外，缝缝补补，打制奶食，放牧接羔，打草修棚、什么活儿都

得干。他们正是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中,磨炼出了坚毅、勤劳、朴实的品德。

在阿拉善地区,为何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妇女身上呢?其原因有两个。一是相当一部分男子削发为僧,长住寺院。二是世俗男子虽也属家庭主要劳力,但经常离家外出服差事、搞驮运等。由于妇女在家庭的生活和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使得他们在家庭里多少有点发言权。

四、礼俗与禁忌

按照阿拉善蒙古人的礼俗,妇女须对父老长辈十分敬重。就是妇女们自己也认为,理应如此才是。因为,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一辈子怎么报答也是报答不完的。

每当新春佳节,妇女们、向父老长辈拜年时,总是毕恭毕敬地献上哈达问候道:“爸爸过年好?”“妈妈过年好?”平时问候时说:“您老贵体可安好?”同时还要递鼻烟壶,以示敬重。

不分过年还是平时,未婚男青年未经父辈许可,不得当着老人的面吸烟饮酒,否则,被视为对老人失礼。就是年轻人成家了,也只有得到老人的许可后,方可吸烟并陪客猜拳玩耍。

媳妇在公公和婆婆面前,不能光着头,必须戴帽或戴首饰。进出婆家时,步履要轻快,见外人进来了,要站起来。新媳妇过门三年期间,不许越过蒙古包内锅灶四周的土垅以北。当媳妇的每年都要去一趟公公及其丈夫的舅舅、叔伯家磕头请安,还要向公公家中敬奉的火神奉献哈达并磕头,此外,特别忌讳当嫂子的在小叔子面前光着头、露着脚的。

五、婚 姻

在阿拉善地区,子女一旦到了结婚年龄(一般在15岁以后),其婚事多由父母做主包办。这里虽可幼年时订婚,但没有童养媳。在本旗里,因同姓为同骨,同骨不通婚,故台吉(贵族和台吉之间不能通婚联姻。三种哈勒哈斯姓氏(郭若沁哈勒哈斯、绍布沁哈勒哈斯、察嘎沁哈勒哈斯)之间虽可通婚,但同一哈勒哈斯之间就不能通婚,叔伯兄弟,姊妹的子女不能通婚,而



姑舅间可结婚。姊妹可以一夫,以先嫁者为大。兄死后弟可娶嫂为妻。反之,不行。一男子可娶数个妻子。出现一夫多妻的现象,大概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不少男子消发为僧、终身不娶;二是一些富裕户因家中劳力不足而娶几个妻子。另外,还出现了不少指名为婚的所谓“名义妻”。据说,过去在阿拉善旗北部有个叫乌力吉胡图克的男人,曾拥有16名名义妻子。寡妇改嫁,在这里不受限制。夫妻不和,可以离婚。离婚时,女方只能带走属于她个人的那份财产及随身所带子女应分得的财产。

在阿拉善地区还有过一种指物为婚的婚姻制(这是极少数),即指某些物件如烧火棍、男人用的火镰、蒙古刀、鼻烟壶、碗之类的东西为丈夫,并束起媳妇发式来,以示自己已经完婚。

六、社会地位

前面虽说到妇女在其家庭里多少有点发言权,但就其整个社会地位而言,实际上她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情況看出。

妇女的婚姻大事,完全由其父母做主包办,他们没有婚姻自由的权利。

妇女迎接客人,须戴帽子或包头巾,还得穿上坎肩和靴子。

媳妇在其公婆和大兄哥面前,不得随便就座,当他们起立时,也要跟着站起来。妻对丈夫讲话不能用“其”(你),须用“塔(您)。

媳妇在公公和大伯面前,不能光着头,露着脚,须戴帽穿靴。

服丧期间,不问安,不能问候。

禁忌妇女乘骑儿驼、儿马。

妇女怀孕期间,不得上敖包,不许在供有佛及祭火神的屋子里分娩。分娩时,须另搭“前进房”或帐篷为产房。坐月期间,产房里除了女人外,男人不得入内(家中确无人照看时,其夫才可入内)。

妇女一般不穿黄色衣服,不扎红色腰带。说红、黄两色是活佛贵僧服饰的颜色,妇女不配享用。

除了上述种种对妇女歧视性的规定外,还有不少针对妇女的清规戒

律。如新媳妇不许在蒙古包内的上首就座,不许从佛龕的前面走过。若生过一子就不那么严,但仍不允许在蒙古包内上首落座。

媳妇不得用火剪子乱挑火。一般情况下,不与公公和大兄哥同屋就寝。在必不得已而必须睡在一个屋里时,必须用头巾包好头或戴帽子。

祭火时,媳妇不许在婆婆面前触动祭火用的羊胸叉肉。

新娘3年内不得回娘家(有的地方只限1年)。若从娘家回来时,须得其夫或婆婆陪伴,否则就被视为媳妇已遭丈夫嫌弃。

妇女坐月期间,不许到设有佛龕,祭火的蒙古包内,也不许到水井跟前。

成年女子一般不许到敖包上去,但十岁以下女孩不在此限。

未婚的成年女子,不许参加他人的婚礼。禁忌寡妇参加别人的婚礼,更不能参加迎亲、送亲队伍。

妇女要经过孕妇旁边时,要从其后边过,忌讳从前面过。这是因为不知胎中之婴是有多大福分的人,也许是圣僧贵人呢。

习惯上,婆婆打媳妇、小姑子打嫂子是可以的。但禁忌公公、大伯动手打儿媳。媳妇不得反抗公公,也不许打骂丈夫。

概而言之,解放前阿拉善妇女在封建宗法和礼教的种种歧视和束缚下,精神上遭受极大的压抑和摧残,谈不上有何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



阿拉善烤全羊的今昔小记

白 晓

烤全羊是阿拉善地区特有的美味佳肴,早在 300 多年前就已成为阿拉善王府席上珍品。它是在蒙古族旧有的烤肉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游牧民族思维与智慧的产物。由于烤全羊烤制的工艺、原料、燃料等主要构成要素具有极强的阿拉善地域特点,因此,被冠名为“阿拉善烤全羊”。

阿拉善烤全羊是蒙古族宴席中的大菜和名菜,它色、香、味、形俱佳,是羊肉食品系列中最排场最讲究的豪华名食,是蒙古人餐中至尊,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艺术品”。它的烤制工艺讲究,制作过程复杂,吃法具有浓郁的地方习俗,是蒙古人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的佳肴。

蒙古民族吃肉的历史可谓久远,且多为绵羊。据现存资料考证,蒙古人吃烤肉的历史,可追溯到十三世纪前,甚至更早。《蒙古秘史》为我们提供了早期蒙古人喜欢食用烤肉的资料。《蒙古秘史》十二节中提到“……朵奔篋儿干。往脱豁察温都儿名字的山上捕兽去。于树林内遇着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里。将杀了一个三岁鹿的肋扇肚脏烧着。”二百节中也提到“乃蛮篋儿乞。被成吉思汗收捕之后。札木合在乃蛮处。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个伴当。同做劫贼。因上觉鲁山去。杀了一个羊。烧吃。”蒙古民族自古就有宰杀小牛犊或绵羊,招待贵客的习俗。将宰杀的小牛犊、羊只烫毛,再配调料后用煮、蒸、烤等方法制作后大摆宴席,称为“诈马宴”。元朝著名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中提到“柳蒸羊”,它就是蒙古人传统饮食“诈马”的一种。

书载：“用石头砌三尺高的炉灶烧红。把用铁丝网网住的羊放进炉灶内，然后盖上柳条，用泥抹上，熟后取出”。现代烤羊方法，仍基本使用这种做法。

清末民初蒙古族著名学者罗卜桑却丹，在他的蒙文巨著《蒙古风俗鉴》中也提到了“诈马宴”的习俗。他说：“吃布乎力(全羊席)的时候，先把它放在桌子中央。厨师右手拿刀，左手拿巾。右腿跪倒等候。主人说：‘把这个布乎力拆开！’厨师把刀刃朝向自己，抓住刀把，隔开布乎力。把会割九个相等肉块的人，叫有名的割肉手。这先割的九块肉，第一块祭天，第二块祭地，第三块供佛，第四块祭鬼，第五块给人，第六块祭山，第七块祭坟墓，第八块祭土地和水神，第九块献给皇帝。蒙古人吃布乎力时就这么办”。所以说几千年来，蒙古民族在生存发展中，充分利用五畜的肉和奶，制作出能够长期储存，适合于游牧生活、行军打仗所需之有营养的肉食和奶食品，蒙古族的这些美食制作工艺，依附游牧生活，一直延传至今。阿拉善烤全羊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是从古老的食物制作工艺演变而来的，是蒙古民族传统“诈马”的近、现代形式。所以“红食文化”(指牛羊肉食品)早已深入到了蒙古民族的感情血脉之中。

阿拉善第一代王爷和罗理率部从新疆移居阿拉善时带来了烤全羊的习俗。1697年，和罗理被御封为“多罗贝勒”，在祖国西北地区声名大振。他在饮食上也极尽奢华，把整只羊带皮烤熟，欣赏品味，对酒当歌，以体现他的尊贵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第二代扎萨克多罗郡王阿宝征战有功，赏银5000两，在北京修建王府。地点是在什刹海后海南岸，恭王府东侧原三座桥府夹道1号，现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岸毡子胡同7号。王府建成后，特意将阿拉善烤羊技术带进了北京城，在北京的王府内搭建烤羊炉(据塔祉华回忆北京阿拉善王府的烤羊炉子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把皇宫内的烤鸭宴中可采纳的部分(主要是在烧烤工艺上对羊皮表上涂抹少许酱油、吃法上加用薄饼、面酱、葱丝等)来改进阿拉善烤羊工艺及吃法。第三代扎萨克罗卜藏多尔济，因战功昭著而被赐封驸马亲王。他在北京的罗王府还是在阿拉善的王府，常烤羊待客，体现自



已地位显赫。从而形成了阿拉善烤全羊的独特风味。

阿拉善烤全羊加工选料精细、烘烤工艺独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关于烤全羊的形成,从康熙二十五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和罗理进京,皇帝赏宴,清廷按大台吉例接待,并赐御服貂裘。后赐牧阿拉善地,成为阿拉善和硕特蒙古的主体部落,由此,烤全羊技术随着和罗理移居阿拉善传到阿拉善,成为王府名食。过去仅限王府膳房烘制,用于王府家宴及招待贵宾。吃烤羊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越级烤制。王府内有专人负责,烤制技术不外传。阿拉善烤全羊直到解放只有两个地方才可以烤制,一个是在阿拉善旗王府,另一个在北京的阿拉善王府,专门的烤制炉子也只有在北京和定远营的王府内才有。据《北京文史资料》第70辑刊载的达昭和张征《北京阿拉善王府》一文中说:“从清康熙朝以来直到民国36年(1947年),虽然在京的其他王府也有烤全羊,但唯有罗王府的烤全羊始终享有盛名。在历史上罗王府的烤全羊师傅蒙古族厨师嘎如迪名满北京。后来又有一批以胡六十三烤羊师为首的名厨掌炉,更是享誉京城。烤全羊的制作工艺较为复杂,选料精细。罗王的烤全羊,必须选用阿拉善草原产的一年生的绵羊。用蒙古传统方法宰杀、制作,再特制的烤炉中烤制,约3~4小时即可出炉。吃法与北京烤鸭类似。阿拉善王府的烤全羊再现今的阿拉善仍有盛名”。因此,阿拉善烤全羊的技术,在整个蒙古地区也不很普及。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技术才流传到民间。

阿拉善烤全羊以其选料严格,烤制工艺精细,色、香、味俱佳而闻名。这与阿拉善这块宝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分不开。阿拉善土种羊吃的是野生“中草药”,喝的是天然“矿泉水”,肉质细嫩而无膻味。梭梭蒙名谓之“扎干”,是阿拉善沙生植物之王,用其做燃料,火力持久强劲,而且无异味。这是两条最关键的要素,它直接决定着阿拉善烤全羊的独特性和唯一性,用其他任何方法烤制,其色其味都大打折扣,这也是人们回味阿拉善烤全羊的主要原因。

阿拉善烤全羊选料严格、烤制工艺精细,以色、香、味、形俱佳而闻名。

新疆也有烤全羊,但它的制作方法、配料、烤炉等与“阿拉善烤全羊”有很大区别。阿拉善烤全羊的制作工序为:一是选料。选体质粗壮、骨骼结实、肌肉发达、肉质细嫩无膻味的阿拉善土种羊作原料。二是宰杀。宰杀时要从脑袋与脖子连接处直接进刀(通常说的抹脖子)宰杀,抹脖子时只割断羊的脊髓和大动脉,不能割断羊的气管和食管,更不能把皮断开。三是烫毛、褪毛、吹气。先用滚沸的开水烫取羊体毛后吹气,再用烙铁把剩余毛烙干净的办法操作。四是去四蹄、除内脏。五是添配调料。把配料(用特制的方法制成的粉状配料)塞进羊的胸腔和四肢内侧,用特殊配料熬成的汁涂抹羊身上色,稍后再涂一层植物油,再用铁链拴住挂在通风处凉3~4小时。六是预热烤炉。用阿拉善特有的干梭梭180公斤左右预热烤炉,温度高达300~400℃时扒出未燃尽的木炭备用(预热烤炉必须在宰杀羊之前进行)。七是降温。烤羊的温度是关键,也就是掌握火候很重要。温度掌握的恰到好处,烤熟的羊色泽红润、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八是羊体入炉。温度适宜时(烤羊师都用手来测炉温),将凉制好的羊体四肢朝上挂在铁棒上吊进烤炉。九是盖上铁锅并用泥抹严缝隙。十是烤制过程中,可根据温度随时添加木炭,通过3~4小时的精心烤制即可出炉。其成品特点为色泽红润、香味扑鼻、皮脆肉嫩、味道醇厚、肥而不腻。新疆烤全羊是先剥皮再烤制,配料为糊状,烤炉是馕坑,因而烤出成品的色、香、味、形均不同于阿拉善烤全羊。阿拉善烤全羊的形成与其自然环境和气候是分不开的,阿拉善地处干旱荒漠草原地带,这种环境培育了耐寒抗旱的古老品种——阿拉善土种羊和天然灌木梭梭,为阿拉善烤全羊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阿拉善土种羊肉质细嫩无膻味。天然灌木林梭梭火力强而持久无异味。

相关器具:炉灶,用砖或土坯砌成高160cm,底座直径为150cm,上口沿直径为90cm的锥形炉。相关器具,直径为1m的铁锅一口,直径大于1m²的铁板一个,长于1m的铁棒一个,长1.5m铁链一条。

烤全羊的吃法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先将烤好的前腿趴下,后腿弯曲,成棕红色,油亮并不断吱吱作响,香气扑鼻,成卧姿形、嘴里叼着绿色蔬



菜的羊放在特制的木盘内,由两人抬出让客人观赏。这时由一长者或分肉人从羊尾巴上割下一片放在羊头上,同时主家人诵祝词、唱三首祝酒歌、给客人敬酒,然后按照皮、肉、骨的顺序依次分解装盘,有客人品尝。品尝时,配食荷叶饼、小葱、面酱等,最后吃烤羊原汁调配的清淡适口的柳叶面或羊肉汤稀饭。烤全羊是阿拉善地区特有的、具有传统风味的一道美味佳肴。来到阿拉善不品尝“阿拉善烤全羊”,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凡享受烤全羊招待的客人,心中都会产生一种备受尊敬的自豪。

阿拉善烤全羊是从老祖宗那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是在 300 多年漫长历史过程中发展和演变而成的,既有丰富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美食。所以,保护和传承阿拉善烤全羊制作工艺的价值,对于进一步研究游牧社会的生产发展、民俗风情,发展饮食文化和旅游文化,传承民族美德,发扬光大蒙古民族饮食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

阿拉善烤全羊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食,历史悠久,对研究游牧社会的生产发展以及民俗民情和经济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饮食档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承和推广发展阿拉善烤全羊的制作工艺,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阿拉善烤全羊的萌生、发展和最终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蒙古民族历来把肉食看作最好、最高礼节的食品,它蕴含着蒙古民族热情好客的美德,也体现民族凝聚力。所以,保护、传承“阿拉善烤全羊”技艺,对蒙古族饮食文化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和丰富中华饮食文化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烤全羊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阿拉善烤全羊遭到停烤的厄运。1978年,乌兰夫副主席来阿拉善时,阿拉善左旗人民以蒙古人的最高礼节,用饮食至尊烤全羊招待了乌兰夫一行。乌兰夫副主席边吃边夸,并指示要把这道民族大菜推向全区,让更多的人分享它的美味。从此阿拉善烤全羊的制作工艺得到恢复。到今日,烤全羊制作工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而且传到了阿拉善以外的其他地方。呼和浩特、鄂尔多斯、



锡林郭勒、甘肃等地都有阿拉善烤全羊的传人。

阿拉善烤羊历史悠久,有许多知名的世代继承艺人,据 G·朝格图先生口述:“能知道的最早的烤羊师为萨玛嘎日迪,阿拉善蒙古族,为第一代王爷和罗理王府烤羊师傅。其次是巴图巴日达,也是阿拉善蒙古族,为第二至第三代王爷王府烤羊师傅。赵布音,汉名叫赵学文,人们通常叫赵六六(生于 1918 年 4 月 15 日,卒于 1977 年 3 月 25 日),阿拉善蒙古族,为阿拉善旗末代王爷达理札雅王府烤羊师傅。阿拉善和平解放后,赵布音被安排到国营食堂工作,并多次被聘在阿拉善左旗干部招待所烤羊,是烤全羊传人中最为熟知,最为权威的王府厨师。”据说,赵六六的师傅是南寺的喇嘛。其名是谁无人知晓。

赵布音师傅,是阿拉善解放后烤全羊的唯一传人,他掌握着烤全羊详细完整的秘诀。20 世纪 50 年代,他经常应邀到包头、呼和浩特、北京等地为领导和首长烤羊(去外地烤羊时,把梭梭用大卡车运去做燃料)。“文化大革命”中烤全羊被批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赵师傅也因此受到牵连。在他去世前,秘密把烤羊技术和秘方传给小儿子赵铁锁。当时赵铁锁只有 15 岁,他在家按照古老的拜师形式,给父亲行磕头大礼。父亲也给他一把祖传蒙古刀,作为正式收徒的信物,要求他保证烤羊技术不传外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烤羊随之中断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得以恢复。阿拉善盟成立时,身怀绝技的赵铁锁被安排到阿拉善盟牧民招待所、阿拉善盟宾馆烤羊。赵铁锁没有儿子,他按照父亲的遗嘱,把烤羊的秘籍传给了他哥哥的儿子赵志强。现年 55 岁的赵铁锁,一生只收了这一个徒弟。

还有一个叫狄多福的老人,今年已经 72 岁。他自己说是赵六六的徒弟,先后在阿拉善左旗干部招待所、阿拉善盟宾馆工作(烤羊),现已退休。但是他说没有举行过拜师仪式,20 世纪 50 年代起,他经常跟着赵师傅烤羊,可以说是跟随赵师傅学出来的徒弟。狄多福老人在烤羊方面也小有名气,他也培养了很多徒弟。陈涛,35 岁,汉族,是狄多福师傅的徒弟,现在阿拉善盟宾馆工作(烤羊)。狄英,36 岁,汉族,是狄多福师傅的徒弟(侄儿),现



在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旅游点烤羊。那仁扣,21岁,蒙古族。陈涛师傅的徒弟,在阿拉善盟宾馆工作。狄多福师傅还有几个徒弟在呼和浩特市、甘肃等地。

此外,巴图吉日嘎拉,蒙古族,自学烤羊师,一直做烤羊生意。

烤全羊是阿拉善独有的羊肉烹饪方法烹制,尤其是用天然梭梭作燃料,口味很独特。由于它的不可代替性,烤全羊为阿拉善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饮食档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该把阿拉善烤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重点保护,推向全国。相信这一古老传统的饮食文化,将会得到传承和光大。

编采访人:

赵铁锁、狄多福、G·朝格图等。

参考书籍:

《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4 月版;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3 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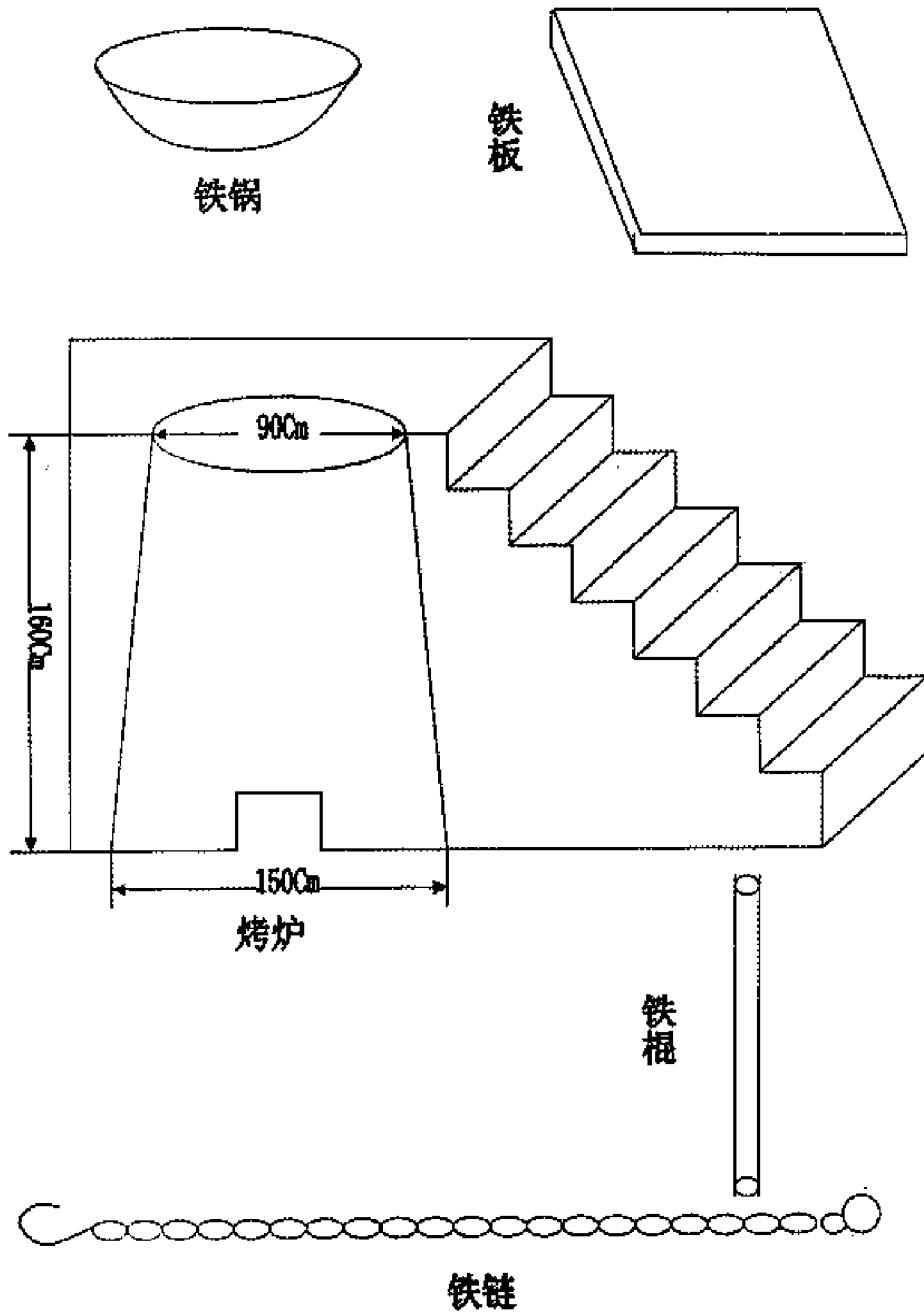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

松儒布、斯钦毕力格编著《阿拉善风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3 月版;

G·朝格图编著《阿拉善蒙古族食谱》油印本(1983 年 5 月)

写于 2006 年 5 月

烤全羊炉灶器具图





阿拉善旗的盐产与骆驼运输业

石有田

阿拉善旗虽然黄沙遍野,地广人稀,但物产却十分丰富,除了畜产品外,矿产尤以盐、煤两项为最巨。仅以盐池而言,境内就有大小盐池近 20 个,这些盐池多数分布在阿拉善左旗中面部和阿拉善右旗(此左、右两旗原为一旗,即阿拉善旗,1961 年分旗)北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阿拉善旗境内的大小盐池均由王府掌管,有的(如吉兰太盐池)还被王爷据为家私而代代相传。在大小诸盐池中,开掘最早、储量最丰者要数吉兰太池盐、查汗布鲁克盐池、雅布赖盐池及和屯池盐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勘查所知,四池所储之盐约在 15445 万吨之数,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四池年最高运销量 50 万担(25000 吨)计之,可供采捞 6000 年,真可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宝库。

阿拉善各盐池所产之盐不但质佳味美,且均为天然结晶而成,不假人工制造,采捞亦十分简便。清中叶以后,这些盐池先后正式采掘,到清末民国初发展到鼎盛时期。盐池的开发利用,大大促进了阿拉善地区沙漠驼路的开辟和驼运事业的发展。

阿拉善地处荒漠,千百年来,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加之历代封建王朝只知扩地争权,忽视边疆建设,致使这里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自清王朝在这块荒漠草原上正式设旗封王,到新中国诞生的 250 多年(1697 年~1949 年)中,这里没有一条正式公路。民国末期,付诸人力略加整饬的宁(夏)定



(远营)大道,算是阿拉善境内对外联系的唯一坦途;而横穿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北境的被当时称作为绥新公路的“公路”,实际上也是勘而未修的驼路。该路虽然进行了客货营运,但亦属尝试性质,后终因道艰路远屡屡亏本而停运。所以,当时的阿拉善人民的一切对外联络、物资往来,均靠畜力进行,同时形成独具特色的运输方式——驼运。阿拉善属纯牧区,建国前,每年仅粮食一项则需从宁夏、绥远等地运进4万石。此外,还有食用量较大的酒、茶、烟等。据载,每年进酒量在10万公斤左右,茶约15万公斤,烟5000万余公斤。而每年输出的驼、羊毛在40万公斤左右,牛、羊皮3万余张,苻蓉25万公斤。仅上述物品的进出,每年需1万个驼运峰次(每驼驮量150公斤)。据资料载:民国28年、民国29年(1939年~1940年)每年食盐运销量达50万担,是日常生活用品和其他土特产品运量的17倍。可见阿拉善盐池的大量开采和驼运业的兴旺是紧密相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重视下,阿拉善盐池的开发得到了稳步发展。在1950年至1954年的5年中,4池共运出食盐8.8万余吨,年均运量方为1.77万余吨,按单驼驮量150公斤计,需12万个驼运峰次。1955年,群众运输业务所成立,从此,驼运工作走向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结束了长期自由驼运的历史,驼运业亦更为兴旺。据资料载:1955年至1958年,4池累计运盐100多万吨,年均运量25万余吨,每年需要170万个驼运峰次,是建国前最高盐运量的10倍,若以每驼参加运输15趟计之,年投入盐运的骆驼约在11万峰(以上均包括宁夏、甘肃驼),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这样庞大的畜力运输队伍,只能在素有骆驼之乡的阿拉善出现。

每逢盐运期至,成百上千峰骆驼从四面八方云集各个盐池,人喊驼叫,一派繁忙。更有那装载起程的骆驼一链接一链,犹如在大漠中筑起了一道城墙沙障,蔚为壮观。驼队过后,以无数驼蹄踏印而成的驼路即时显现,循迹远望,路带仿佛是平静的沙海中刚刚驶过的一艘巨轮留下的航迹,清晰醒目,但一场风沙过后又形迹全无。所以,沙漠中的驼路,并不像内地道



路那样,行走时须循规蹈矩,不可偏离。确切地说,驼路只是方向性的,故前行与后续者业不一定完全同踪,有时相差几里甚至几十里都可以称为同路。每当风沙埋没了路迹,则全凭驼工对方向的判断,以其对某一特定物体(如山峦、沙丘、草丛、树木)的记忆和时隐时现的驼粪作标记而前行。所以,久涉沙漠的驼工们从来不会迷途,业且在这样的运行过程中,在这样旧路被埋,新路又现,如此月重年复的长时期里,一条条通往包绥、宁夏、河西走廊的水草最佳、路径最捷的驼行路线渐渐被选定下来,成为草原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相互联系的纽带。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全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中共中央对边疆经济、资源的重视和开发,先后建成了雅(布赖)河(西堡)公路和三(道坎)吉(兰太)公路,使储量最大的吉、雅两盐池首先实现了汽车运输。1969年,和屯池盐池专用公路也建成通车,至此,除查汗布鲁克盐池因地处沙漠腹地,修路费巨而仍沿用驼运外,其他三大盐池均结束了延续数百年的驼运历史。

一、主要盐池的沿革

阿拉善地区盐湖的形成都较早,一些主要盐池开发亦较早,尤其是关于吉兰太、雅布赖两大盐池,早在汉代就有记载。《汉书·地理志》载:“北地郡戈居县有盐官,盖其地也。”唐为温池县,《旧唐书·食货志》云:“大中四年(850年)以温池盐利可瞻边陲,敕令度支收管,仍差灵州分巡院勾当。”大中六年(852年)设榷运使,缘新置未定榷课定额。《元和郡县志》亦载:“贺兰山向北经灵武县,又北经怀远县,又北定远城,西定远城在温池南,即定远营也。”从上述记载的地理位置看,今之吉兰太盐池在定远营(巴彦浩特)北,故汉之戈居,唐、元之温池即现在的吉兰太盐池。由于阿拉善地处边远,境多大漠的地理环境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不予重视的政治原因,不但使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交通阻隔,其盐湖亦开禁多变,时兴时衰。

初时,阿拉善旗各大盐池的产销,一向只准当地蒙民自行采运,就近易换粮食及日用杂货,并无额定引课。后因汉商盐贩迁入日多,蒙民智力逐渐开化,私采贩运相应增多,且由近及远,任意潜销,故于清咸丰八年(1858

年)先将查汗布鲁克盐池化私为公,招商人张全兴领贴承运。每岁向阿拉善王府认交池租 1.6 万两白银。由该商自行招雇盐工入池采捞,并于一条山设置盐店,所产之盐均由蒙民承运,驮至一条山盐店交收。此时,除限制蒙民私下交易外,业禁止汉、回商贩入池驮运,四处行销。同时采取封禁其他盐池,杜绝开采之法,使查盐销量甚巨,年参运驼数在八九万甚至 10 万峰之多。试以每驼驮盐 150 公斤计,每年外运食盐约 150 万公斤,其盐商获利极厚。清同治初年,宁甘一带发生回汉纠纷,时局动乱持久,盐道梗阻,盐商潜逃,累欠蒙盐税课银约 16 万两之巨,成为悬案。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 年)方由陕甘总督左宗棠出面,将盐商产业及存盐变卖,得银 20080 两全部抵偿,其余欠额,奏请豁免,多年悬案,方告结束。清光绪初年,改章收厘,时定斤盐抽收 5 文。以一条山作为蒙汉交易之区,在该处设置掣验局,专司核验盐斤数额,以防驼户中途洒散变卖。此外,开辟中卫运道,设局收厘。但因蒙盐私销已日久成习,偷漏私贩禁而难止,以致厘税所收无几。为减少商贩绕道越局私销,只好将原定税厘减半征收。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为甲午战争赔款增摊,中条两局蒙盐税厘每斤又加收 3 文。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改盐厘为统捐。盐池定为官商合办,按官六商四,共集资银 10 万两。时与阿拉善旗王爷多罗特色楞商定,年付池租 1 万两租定查汗布鲁克盐池。并在中、条两处设立官运局派员督运,严禁私运。时定年运查盐 6 万驼,按中六条四数额灌仓,冬七春三运额驮运。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为堵禁旗内其他盐池未税而偷运私销,确保查盐产销,甘肃花定榷运局又以年租银 500 两,租得同湖盐池。同年,再以租银 3000 两,将旗内的那林哈克、和屯池、扎克图、巴音布鲁克、雅布赖、昭化寺、诺尔吐布鲁克、巴音达赖共 8 个盐池归官承租,分签合同三张,即查汗布鲁克一池一张,同湖一池一张;其余那林哈克等八池共一张。在所承租的 10 个盐池中,除查汗布鲁克盐池所产之盐继续挽运于中、条两局存仓销售外,对和屯池亦开始雇工采捞,并将该池所产之盐,驼运至旗府定远营和宁夏叶升堡储存销售。而同湖、昭化寺、雅布赖三池之盐则采取就地征税,自由放销。其余五池统予封禁,严禁



蒙汉民众私捞偷运。至此,各池归官承租,开禁兼行,当地人民私捞偷运主事方得禁止。到民国7年(1918年),原承租合同期满,续租时,由于蒙地偏僻,与内地文化交流甚少,尤其是对公历计时法尚不熟悉,故在续订合同将租期起讫日期变阴历(农历)为阳历(公历)时,蒙旗代表坚决反对,拒不承受。后几经磋商,方同意双历共俱,但核算池租仍坚持以阴历日期为准。结果,由于双历共签,起讫日期不一,结算池租,十分麻烦,甚至于此屡犯争议。民国11年(1922年)再次续签合同时,为减少前次因时日不一及合同份数多所带来的争议与烦恼,蒙、局经过充分协商,阐明利弊,始将阴历字样取消,完全改用阳历计时。同时将原来三纸合同汇订一张,租金依旧。以上虽是盐池租赁中的小小插曲,但它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偏远的牧区,蒙民思想开化程度以及发展贸易,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急切性。民国12年(1923年),花定榷运局与阿拉善旗继续续租查汗布鲁克等10个盐池,租期三年(即自民国13年1月1日至民国15年12月31日)。民国14年(1925年)冬,经花定局洋助理范瑞辅与蒙旗政务处协商制定了临时办法14条。除上述已租赁的10个盐池外,尚有大鼓海(又名白盐乾池)、角鹿沟(又名红盐乾池)、梧桐海(又名黑盐水池)3个盐池(地在雅布赖盐池之西),初时其虽不在租赁之中,却在禁采之例。但由于三池地处偏僻。所以,禁令虽严,仍是鞭长莫及,当地蒙胞偷捞私运,行商小贩潜行内销,以致影响税收。故此,西北盐务管理局于民国25年(1936年)又将上述三池一并租赁。至此,阿拉善旗大小13处盐池统由西北盐务管理局承租,议定向阿拉善旗王府岁纳租金5.2万元(法币)。其后由于政局不稳,物价飞涨,战事不休,军费增加。阿拉善旗王府遂以军政费巨,无以筹措,唯有池租为旗内之唯一财政来源为由,要求增加盐池租金,后几经交涉又将租金增至32万元。此即阿拉善旗查汗布鲁克等13处盐池之情形,而旗内最大的吉兰太盐池尚不在其内。

关于吉兰太盐池,自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将阿拉善地区赐封给和硕特部作为放牧之地以后,这个产量最大,盐质优美的盐池即成为阿拉善

王爷的家产。清初,吉盐业已行销大(同)、朔(平)两府及口外各厅。但按定例,不准运至内地行销,以防侵碍河东引岸。后因晋北所产土盐时有脱销,不敷民食,故买食蒙盐者日多,久而久之,虽禁而不绝。吉盐合法运销,始于乾隆年间。据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藏《宣统元年发文底稿》载:“乾隆初年,蒙旗曾将盐湖报效国家,归山西巡抚管。由部铸给印信,文曰‘吉兰太盐政之印’,在河西等处专设盐官,运销于晋省韩信岭以北四十八厅、州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因河东食盐供不应求,故又准许盐商持引赴吉池购销,由归绥道稽查造册上报。此举既大大便利了商贩,亦增加了吉盐销量,但也因此使入口蒙盐骤然增多,影响了潞盐销岸。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保护潞盐销岸,对吉盐又采取了禁运禁销之策,使吉盐销量又减,河东食土盐者倍增,产销两地皆弊多利少。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巡抚农起奏请开运吉盐,并面会阿拉善王爷罗卜藏多尔济于托克托城,传谕商民众可输税贩运,但只限于例食土盐之地,不得私入河东引地之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阿拉善旗第四代王爷旺沁班巴尔以吉盐陆运无几,蒙民生计不足为由,恳请水运,为了既照顾边民生计,又不致影响河东引地,经部议准,允许吉盐水运至磴口为界,贮岸零销,此即吉盐水运之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奏准阿拉善地方年造盐船500只,每船载盐40石(每石700斤),计2万石,运至山西例食土盐之地贩卖。时定每石收税银4钱,计收银8000两。

嘉庆初年,吉兰太盐池转由回商马君选租办,岁付阿拉善王爷池租多则2万两,少则1万两,年销盐3万担,使池主盐商双双获利。由于此时盐禁松弛,盐商乘机操船顺流南下,因此,不但侵占了河东引岸,甚至私入楚豫,波及淮岸。为此,嘉庆五年(1800年),再次明定,吉盐只能运止磴口,业在此地派员稽查,以防盐船偷越。嘉庆八年(1803年),为严缉私船,又在磴口下游增员巡查,但偷运私销之事时有发生,杜而不绝。由于马商屡违规定无视盐法,长期越境私销,终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罹于法。至此,阿拉善王爷玛哈巴拉也因此惧献其池。于是池归国,盐归官,改私办为官办,以磴



口旧置住房作为运判衙署,岁赏阿拉善王池银 8000 两,盐池归属宁夏道专管,将吉兰太盐池定为捞盐之地,磴口作为发运之所,两地各设大使一员,并将河口镇定为吉盐入晋停泊要地,设批验大使一员,此外,在磴口还另设运判一员。吉盐归官以后,将例食吉盐的山西口外五厅及大、朔两府以及阳曲等 44 州县划归吉盐销岸,同时又将陕西之神木、府谷等 8 州县改销吉盐。销岸确定并扩大以后,吉盐引目也随之增加,由乾隆末年每年只准盐船 500 运之,计 58000 引,增至年销吉盐 3 万石,计 1050 万公斤,按清末每盐引 240 斤计,约 8 万余引,年征课银 6 万余两。

吉盐销岸的设立,恰逢河东复商之时,因此吉盐同时改由商采商运。当时盐商有两种,一日坐商,一日运商。坐商专事雇人采盐业负责运至磴口,转交运商。而运商则在付清坐商的工本驼运脚价后,再从磴口用船运至河口。其时,每石盐应付坐商工本脚价银 3 两 5 钱,船运运费 3 两 7 钱,税银 2 两 6 钱,计每石需银 9 两 8 钱。若按年运额 3 万石计,运商每年需支付白银 27 万两。如此巨额资金,绝非一般商户所能筹措,因此,运商初办人绪甫经试办不久,即以资本不足而转由甘肃坐商马起龙兼营运商。然而到嘉庆十四年(1809 年),坐运兼营的盐商马起龙也因途远费巨亏课而革退。此时,再招新商,竟无人敢揽,致使当年运额不足,次年额引停而来运。在招商无望情况下,只好签派,但各商均感以势难办,情愿捐款 5 万两白银而拒接办。情势至此,只好暂行权宜之计,改为官运民销。其发运资本,除商捐 5 万两外,又从河东道库银内借拨 15 万两,计 20 万两作为运本,原来积引和应征课银均分 3 年销出和滞纳。此举虽然恢复了吉盐的运销,但亏课误运之事时有发生,官运结果,引额仍不能完成。鉴于此,嘉庆十七年(1812 年),诏命侍郎文孚、阮元赴晋议之,其奏言大意是:介休以南均为河东引地。吉盐所定引地,如太原汾州等属出产土盐,随地偷税。朔平等属,亦有鄂尔多斯蒙盐接济。土、蒙盐贱,食用者多。而吉盐水运三千里,路远价昂。如遇多雨,土盐欠产,颇可多销;倘若旺产,即行壅滞。似此情形,便不能遽定引额。若定引过多,销不及半,则使商人累赔,误运亏课,亦致招商乏人。因有官运官

销之议,官运不难,难于官销。若不能销,则越运越滞,因滞销兼顾课额,势不得不派之州县,认领督销,而州县非亏挪库款,致扰百姓,如其这样,更甚于不销。唯有停止官运,仍为商办,将吉盐定为活额,随销随征,通盘规划,毋侵河东引地,方可永远遵行。查河东至磴口,相去千里,磴口切近河东,自宜酌中定地,示以限制。拟于河口南三百里黄甫川为界,将磴口大使改为黄甫川大使,并移驻此地稽查吉盐水贩,只准运至黄甫川为止。其磴口商贩盐船照旧至河口起卸存仓,任商贩卖疏入。但大学士九卿会议旋经复称:“吉盐商运亦属窒碍,改作活额,征解无常,奏报多亏,考核难凭。且吉盐引课仅占河东十分之一。因吉盐行销,致使河东盐务败坏。应令仍旧统行河东盐,其吉盐引额加入河东引内,作为活引,由河东商人领引办课。其吉兰太盐,应请敕还阿拉善王玛哈巴拉,听该处人民自行携运,俾资生计。如有兴贩入口,照鄂尔多斯、苏尼特税盐之利,按数收税。只准车载骡驮,由陆运贩卖,不准水运,以防侵越。每年恩赏阿拉善王白银八千两即行停给,改属宁夏道专管,原设磴口运判大使、吉兰太盐大使、河口批验大使一律裁撤”。至此,盐池归还阿拉善王玛哈巴拉,吉岸裁废,设岸仅仅7年。

吉岸停办,水运禁止,但私运之弊未免。光绪九年(1883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准,除杀虎口外,准其在黄甫川对岸的河曲登岸,但不得任意下驶,这时水运又稍有弛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包头已经成为西北最大的蒙汉交易和水陆商品的集散地。这时包头官盐局与阿拉善旗王爷多罗特色楞商定开采经营吉盐。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晋北榷运局又以年租银7000两租定吉池,自行采捞,办理官运。改包头盐局为官运总局,并在南海子设置盐栈,河口设分局。河曲盐商在包头购盐后需经分局验票始可放行,同时,将吉盐运至归化等地销售。此时,吉盐每石捞盐费只有6分8厘,吉兰太至磴口间的驼运脚价1两3钱,磴口至包头船运费4钱5分,池租3钱5分(以池租7000两除以20000石得之),加上应纳税银2两6钱(按吉岸初设时税额),计每石盐成本仅为3两7钱6分8厘,比吉盐初设时的每石盐成本9两8钱大为降低。因此,此次开办,获利甚厚。到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由于盲目采捞,使产量从原来的2万石增至10万石,从而加大了运量,加上产大于销,造成运本积压达十七八万两,库存食盐五六万担,亏损巨大。宣统三年(1911年),晋北盐务进行整治,重新划分口岸,采取官运商销。时定太汾以西,黄河以东,武川、五原之南皆为吉盐销岸。仍在包头设官运局,业在包头以南各地酌设分局。池租由原来的7000两增至1万两,水运至磴口为止。民国初期池租未变,并由晋省投资改为官督商运,但成效甚微,无奈于民国8年(1919年)初,将官本收回,仍由商运商销。民国11年(1922年),由汉商集资开办吉池,在吉兰太设事务所,经与蒙旗订约运销,所捞之盐驮至磴口吉盐总栈,办妥税款后,再水运至包头,然后转销托城、河曲、保德等地。这时每船载盐90石,每石360斤。每百斤盐征税1元5角,计每船盐可收税486元。税款的核收皆由晋北榷运局派员在磴口设局办理。民国19年(1930年)改由包头盐商组建的复兴公司承租办理吉盐运销事宜。其时,由于时局不稳,以致连年亏欠甚多。到民国25年(1936年)6月1日,遂又改为官商合办,其官股为旗府,商股为“祥泰隆”、“兴泰隆”和“永盛和”等联合组织吉兰太盐池场务所。由于捞取简便,成本低廉,官商双双获利。民国31年(1942年),旗府将吉兰太盐池收回,由旗府自办。在吉兰太设盐务所,旗府定远营设总所,磴口设分所。抗战开始以后,西北盐务管理局在宁夏成立盐务分局,商定租赁吉、和二池及盐斤收运,并在中卫、中宁、叶升堡、磴口等地设仓收购盐斤,之后行销至宁夏各地及甘肃的平凉,陕西的西安、汉中,绥远的陕坝、五原、包头等地。其运输工具,从盐池至盐仓均由骆驼驮运,由仓再转则依各地情况不同而异,沿河者多用船载,余则由畜力车及为数不多的公商汽车承担。

总观阿拉善各盐池,其开采利用均有数百年的历史,而转为兴旺发达则始由清末。由于历代朝政变换,旗地归属不一,加之受历史的局限,管理多弊,交通不畅,运具落后,致使各盐池时采时停,产量忽高忽低,终为盐储虽丰,却不能物尽其利。



二、各盐池的位置及概况

1. 吉兰太盐池

吉兰太盐池位于阿拉善旗旗府定远营(今巴彦浩特)的北部。东距三道坎(即乌达)250里(铁路里程);东北距磴口(旧磴口,即今阿拉善左旗巴音木仁苏木驻地)约220里,南行220里可达旗府定远营。

吉兰太盐池不但是阿拉善旗最大之盐池,也是西北著名盐池之一,据初步勘探,储量达10827万吨。其面积之大,储量之丰,味质之佳,捞取之易,足可与青海盐池相媲美,它犹如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在广袤无垠的大漠中闪烁。

吉兰太盐池呈南北长,东西窄的椭圆形状。总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其中开采面积达37平方公里。盐层厚度一般在7尺至8尺之间,最厚处可达丈余。一般盐粒大如蚕豆,盐层深处则积有核桃大乃至更大的方形结晶体,俗称之为“盐根”,盐根质地纯洁,味甘而浓,它不但是难得的调味佳品,且晨起淡饮可清肺,炒热置于腹部可驱胃寒,故它又具有医疗价值。湖中之盐,不假人工制造,皆天然生成。捞盐时间多在春秋进行(即春3月至5月,秋8月至10月),不宜冬夏。夏季雨多,不便工作,且捞出之盐易被雨水溶解,功倍事半;而冬季则因天寒地冻,开捞不易,且卤水淋身,肌肤难挨。唯春秋两季,天气融和,便于工作。每逢春秋季节,但见湖水稍固,湖面发白之时,便可赴湖采捞。湖盐捞取十分简便,捞时,先用铁钻将上层盐盖(含泥沙、杂质的结晶体,厚约7寸至8寸,味苦不能食)打开,使之成为宽约7尺至8尺,长约数丈的长方形池状,然后清除盐盖下面的泥沙,盐层即显露,这时用铁钻将盐层打碎,使其盐、卤混合,再用铁耙将打碎之盐在卤水中来回摆洗若干次,即可清除附着在盐粒上的泥沙,最后用长柄漏勺捞至池旁,待卤水晒干即成。一般说来,捞清之池,只需数月泥沙即可澄清,水成蔚蓝色,过一二年后,新生盐花如雪,池面渐渐复平,但此时盐粒细碎白嫩,食之味淡而苦,再经两年,颗粒变大,形如蚕豆,其色亦由白变青,方称成盐,即可再行捞取。如此每个周期需3~4年,捞而复生,终久不衰,堪称天然宝库。



捞盐虽然简单,但也是十分艰苦的工作。盐工成天与盐卤相伴,不但要忍受由于长期盐水浸渍而造成的手脚皴裂之痛,光是几十斤重的盐勺甩上一天,就够人受,所以,没有强壮的体格和吃苦耐劳的毅力,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故昔日从事捞盐者多为以吃苦著称的甘肃民勤人为多,其次为宁夏人,再次才为当地蒙古族人。平时,盐池盐工只有十多人,最多时 30 多人。其捞盐数量,则因每个盐工的体力,技巧不同而异。身强力壮,经验丰富者,日可捞盐 20 余担(每担 50 公斤),体力弱技术差者,日捞盐十七八担。盐工工资以担计算。据载,民国 29 年(1940 年),每担付给工资 6 分,民国 30 年增至 1 角 2 分,盐工日可获得工资 2 元至 3 元。盐工工资均由运商负担,由盐局统计担数代收后交给盐工。

吉兰太盐池每年可产盐七八万担,由骆驼驮至磴口,然后装船运销山西各地。但时因驼运脚价太低,驼户多不愿意承运。据载,民国 25 年(1936 年),吉盐外运 4.1 万担,到民国 29 年只运出 5000 担,尚不足产量的十分之一。由于产运严重失调,造成积盐甚多,雨淋促溶化,风尘使污染,损失极大。造成运价较它池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吉兰太盐湖为王爷家产,吉盐商办以后,其中有王爷的股份,故压低运价,降低成本,从中获利是经营者的目的。而蒙民对这种半属当差性质的运输则持消极态度,这也是当时封建制度下的劳动人民对待不合理事情的一种常用手法。吉盐初时运销以包、绥、晋为多,“七七事变”后,改运宁夏平凉及陕、豫各地。

新中国建立以后,吉兰太盐池真正回到人民的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关怀下,吉兰太盐池得到了突、猛进的发展。如今它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机械化采盐池,年生产能力可达 70 万吨,是建国前年产量的 10 倍。盐运也从骆驼运输、汽车运输,发展为铁路运输。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产销量最大的盐池,也是阿拉善盟经济支柱之一。吉兰太盐池这颗沙漠明珠,只有在今天才能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2. 雅布赖盐池

雅布赖盐池(又名库库达布苏盐泽)位于今阿拉善右旗境内。它东南距

查汗布鲁克盐池约 280 公里，南距甘肃民勤约 90 公里，西南距河西堡约 150 公里，西距旗府额肯呼都格约 110 公里。雅布赖盐池呈东西长，南北窄的椭圆形状，总面积为 22 平方公里，其中开采面积达 15.6 平方公里。据初步勘查，总储量达 3136 万吨，是仅次于吉兰太的第二大盐池。雅盐亦系天然结晶而成，其盐质之优美，堪称各池之首。雅池盐层厚度一般在 4 尺左右，最厚处可达 6 尺。其采捞方法与吉兰太盐池相同，唯成盐周期较吉池为长，一般需七八年复采一次。该池盐工多为甘肃人，也有为数不多的蒙古人，每年从事捞盐的盐工约四五十人，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年产盐在六七万担之数。盐工工资以担计算，每捞 1 担付工资 2 角，每人每天可捞盐 10 余担，日可得工资 2 元。雅盐虽然质佳味美，产量丰富，但初时盐商多不了解，故只知购运查汗池盐，后因查盐时有脱销，经花定樵运局商定，在凉州（武威）设仓，专事运储雅盐，并采取较他处每百斤减税 4 角之法鼓励脚运，盐商纷至。雅盐运销近在甘肃的民勤、武威、兰州，远达陇南、汉中一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雅布赖盐池发展迅速，1954 年雅河公路建成，雅盐首先实现了汽车运输。目前，雅盐主要生产环节已实现了机械化，年产盐能力达 15 万吨，在内蒙古自治区批准开采的八大盐池中位居第二。

3. 和屯池盐池

和屯池盐池位于定远营西北，吉兰太盐池西南，其距定远营为 85 公里，距吉兰太盐池为 77.5 公里，该池与查汗布鲁克盐池同在租采之例。和池面积虽小于吉、查、雅三池，但储量颇丰，盐质优美，据初步调查和池储量约在 1100 万吨，可称第三大产盐池。因该池之盐青而泛红，故又有红盐池之称。和池面积较小，池身呈长方形状，它东西宽约 3 公里，南北长约 10 公里，总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产盐面积为 8 平方公里。盐层厚度一般在 2 尺至 4 尺之间，最厚处可达 7 尺。和池开采方法与吉、查二池大体相同，唯成盐周期较吉、查二池为长，采过之盐一般需 7 年至 8 年后方能生成成盐。从事捞盐的盐工平时约 40 人至 50 人，盐工多为甘肃民勤人，其次是宁夏人、山西人。盐工工资以担计算，即每捞 1 担付给工资 1 角，每人日可捞盐 20



余担,故每人日可得工资 2 元。和盐主要销往宁、甘、陕各地,为了便于存储,增加运量,曾在旗府定远营建立盐仓,以便和盐就近转运。新中国建立前和池的产、运量业不亚于吉兰太盐池。据《宁夏阿拉善旗各盐池概况》载:“西北盐务局规定,(和盐)每年运出盐为 24 万担,出产可足此数,唯输出量因交通困难关系,尚未能达到预定数目。据调查所得,民国 25 年(1936 年)运出量为 4 万余担,26 年为 3 万担;27 年为 3.9 万担,28 年为 7 万余担,29 年为 5 万余担”。由此可以看出和盐产量之丰。由于运力不及,和池每年存盐甚多,仅以民国 29 年(1940 年)为例,池中待运之盐达到 10 万担之数。这些存盐年复一年搁置池边,经雨淋水冲,损失甚大。无奈,盐场公署只好择高地筑盐坨,将捞起待运之盐用毛驴驮至坨地存放,其转运费每百斤二角,先付百分之八十,即一角六分,其余百分之二十俟坨盐放罄,并无损失,再补发转运费四分。此举不但减了耗损,且盐工驼户可以不停的捞运,互不相误。

新中国建立后,和屯池同吉、雅布赖二池一样得到重视与开发,现今和屯池已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八大产盐池之内,并以计划年产 5000 吨之数名列第 6 位。1969 年,和屯池专用公路修通,一辆辆运盐汽车奔驰在笔直的公路上,和池长期驼运的历史自此告以结束。

4. 查汗布鲁克盐池

查汗布鲁克盐池,位于定远营西南部的腾格里沙漠之中。它东北距旗府定远营 105 公里;南距宁夏之中卫 125 公里,东至宁夏首府银川约 150 公里,西南至甘肃的一条山 180 公里。

查汗布鲁克盐池储量丰富,初步普查其储量可达 438 万吨。查池原被视为阿拉善旗第二大盐池,以后随着雅布赖、和屯池盐池的开采,方见查池在盐质储量上皆有逊色,而退居第四。查盐粒大而色青,故又有青盐池之称。该池总面积约为 70 平方公里,其中产盐面积达 54 平方公里,绝大部分业已开采,唯湖之东南一角,尚闲置未采。究其根源,业此处无盐,而实为迷信所致。原来此处亦曾试图采掘,但每逢掘开盐盖,卤水则略呈微红色,致

使蒙人甚感惊奇,避之再掘,仍然如故。同为一湖,缘何如此,百思不解,只能视为“神血”。蒙民向来敬神信佛,供之唯恐不诚,锄镐加之岂不罪过。因此,该处被视为神圣之地和禁采之区。水色泛红,其因可查,而视为“神血”则实属荒谬。

查池盐层厚度一般在3尺至6尺之间,最深处可达8尺以上。查池捞盐方法及成盐周期与吉兰太盐池相同,捞盐季节亦在春秋,如遇冬暖也可进行。初时,该池盐工皆由当地蒙民和各寺庙的喇嘛组成,内地回汉人等一律禁止入池采捞。每年从事捞盐的僧俗蒙人约40人至50人,每人日可捞盐20驮(每驮150公斤)。后因时有来不及运,故于民国30年(1941年)开始招雇内地人采捞,自此盐工增至70人至80人,有时各达150人至160人。内地所招盐工多为宁夏中卫和甘肃民勤县人,每人月可捞盐15驮。回汉盐工初入盐池捞盐在待遇上与蒙民盐工不同,即蒙民所捞之盐可以优先装运,蒙民捞盐一驮付工资3角5分,回汉盐工所捞之盐不但无有优先装运权,且每驮盐只付工资3角,工资的差别以及因不能及时外运所造成的损失,使内地盐工甚感不平,情绪低落。有鉴于此,经中卫盐局酌定,蒙汉盐工所产之盐,不论多少,各允首先装运10日,余者视驼运情况另行安排,此举深得盐工称道,盐工情绪高涨,盐产迅增,年产可达60万担之数,供运充裕。民国后期,查池每年外运食盐30万担,以每驮驮100公斤计,年约驮运10万峰次,成为当时各盐池中产、运量最多的盐池。查池所产食盐均由骆驼驮至宁夏的中卫和甘肃的一条山两局灌仓,然后销往宁、甘、陕、豫、鄂北等地。

新中国建立以后,查池亦得到了新生,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产量、运量都比建国前有较大的增长,如果以30万担(1.5万吨)的运数为建国前该池盐运的极数,那么,到建国后的1952年,曾突破43万担(2.17万吨)。1955年群运所成立后,驼运工作走向正规,当年则外运1.6万吨,此数虽不及1952年的运量,但比建国前的最高运量仍略有增加。

今天,查汗布鲁克盐池虽然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而仍沿用骆驼运输,但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盐产中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经批准的内蒙8个



产盐池中(其他都在禁采之列),它仍以计划年产 3000 吨之数位居第七。而沙漠之舟骆驼仍在继续发挥着独具的其他运输工具暂时不能代替的作用。

5、昭化寺盐池

昭化寺盐池位于定远营东南约 115 公里,它与在其西北之查汗布鲁克盐池只有百里之遥,为阿拉善旗第五产盐池。因其盐质微红,故又名“红盐池”。同查汗布鲁克、和屯池一样,其也同在租采之列。昭化盐池面积不足 3 平方公里,该池虽然较小,但盐质却佳,相比之下尚优于查盐。但因池小量微,民国 27 年(1938 年)前未正式开采,后为接济查池不敷运销,始开池采捞。

该池成盐过程与吉、雅、和、查四池不同,它全赖雨水聚池后,经日光曝晒而成,形同海盐作畦晒制一般。不同的是它的盐分出自畦中,每逢雨后,畦中积水,盐分渐渐上升,经一周左右时间的曝晒,即可结成 7 寸至 8 寸厚的盐粒层,此时用漏勺捞积一边,晒干即成。如不及时捞取,则会结成盐盖。因此,降雨间隔时间和单位降雨量的大小,对该池的盐产量关系甚密。久旱不雨,盐分藏而不露,而降雨次数过勤或雨量过大,盐分又溢不结晶;所以适时降雨且使池中雨水保持在 3 寸至 4 寸左右为成盐最佳条件,故该池产量多寡直接与当年气候相关。由于该池的成盐过程不同,所以采捞时间多从雨季到来的 5 月始至雨季结束的 10 月止。盐池的盐工多为宁夏中卫人和甘肃民勤人。开捞以后,为避免日久结成盐盖或遇雨溶解,盐工要争分夺秒,分班作业,每班 45 人,轮流进行。盐工工资亦以担计,每担付工资二角,每人日可捞盐七八担,日挣工资 2 元左右。年产 3 万担,捞出之盐多用毛驴运至宁夏中卫,会同查盐再运销宁、甘、豫各地,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该池产量微薄以及为保证吉、和、查、雅四池的产销,故将该池封禁。

6.同湖盐池

同湖盐池位于查汗布鲁克盐池之西南,东南至宁夏的中卫约 30 公里,为阿拉善旗第六产盐池,也是盐质最劣之盐池,亦在租采之列。同湖池的面积约 2 平方公里。因所产之盐色白如雪,故又有“白盐池”之称。该池的成盐过程、采捞方法及采捞时间皆同于昭化盐池。因其产量受雨量大小的制约,

加上盐质低劣,食之味苦,故产销量不大,年均在3万担左右。该池的开采亦为缓解其他盐池运销之不敷。其盐工数量及工资计算同于昭化池。所产之盐亦用毛驴驮至中卫,尔后再行销它地。新中国建立后,该池同昭化池一样被封禁。

7.大鼓海、角鹿沟、梧桐海三盐池

大鼓海、角鹿沟、梧桐海三盐池,位于雅布赖盐池之西,东南距额肯呼都格(今阿拉善右旗旗府所在地)约150公里。三池面积相仿(周长各5公里),鼎足而立。其盐产可观,盐质亦均较好。其盐出自天然,不用人工制造。采捞时只需将盐盖打开,即可捞取。初时都不在租赁之中,但却都在封禁之列。后因附近蒙民及私商盐贩偷捞潜运,禁而不止,有碍官盐销售及税收,方于民国25年(1936年)一并租用。租用之后,允许蒙民自行采捞,驮至蒙汉交界点出售或易换粮食,但不得越境行销,越境则按私贩论处。在三池出口处的北湾、人宗口两地设卡查验,以督私运。汉民人口以粮易盐或购盐贩卖,亦需事先在设卡处登记驼、驴数目后,方允过卡进行贸易,返回时再验点牲畜头数是否与登记时相符,业称盐交纳盐税(每百斤4元3角),否则一经缉获,则以私运将盐充公。据资料载:每年经站卡放行的三池之盐在4000余担,征收税额一万六七千元。这样三池之盐的开采与驮运既不用费财力组织,又能取巨额税收及补充储、销不足之利,实为一举四得。

此外,在阿拉善旗南部还有那林哈克、扎克图、巴音布鲁克、诺尔土布鲁克、巴音达赖五盐池,也在所租十三池之中,但因储产有限,运方不足等原因,始终未曾开采。

三、驼运与脚价

阿拉善盐产之丰富,堪称西北之首;而采捞之简便,更是东部沿海产盐区所望尘莫及。如能池尽其力,广其采,路尽其功,运其畅,财必能百倍益于民,千倍利其国。然而,由于境内流沙遍布,交通闭塞,运具落后,以致丰富的地下资源一直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利用。自清末到民国,阿拉善的盐产虽然渐得重视与开发,但因受运输困难的制约,盐池仍处在易产难运的



状态。直到建国前及至建国初期,在这块物产丰富的阿拉善草原上还没有一条正式公路,更没有专门从事运输的现代化车辆。顺其自然,稍加整饬的宁定大道,尽管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但在当时的阿拉善旗已算坦途,背负三担,日行百里的骆驼仍是此地最好的运输工具。

阿拉善属于荒漠草原,它没有呼盟、锡盟那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优美牧场,但物竞天适,这里特殊的自然环境与地貌特征却赋予了沙漠之舟——骆驼以生存、繁衍的良好条件。在这块广袤的荒漠草原上牧放的骆驼,竟占全国骆驼总数的40%,故此,用“骆驼之乡”作为阿拉善的代称是恰如其分的。骆驼耐饥耐渴,其身躯高大,能负重致远(即使连续几日不吃不喝也能照样载物跋涉)。所以,千百年来,在沙漠遍地,交通闭塞的阿拉善,骆驼必为商贾行旅以及牧民走亲访友、放牧迁徙的最为理想的代步和运输工具,自然也为阿拉善输出量最大的物资——食盐外运的唯一承担者。

骆驼运输并非常年进行,特别是蒙驼,以牧养为主,兼及使役,役期更短。蒙驼除了夏季人工灌些大黄、砖茶以泄胃火或在干旱年景对少数体弱难以越冬者予以人工喂养(加喂草料)外,余皆由其自然。驼运多从头一年十月骆驼膘肥体壮时开始(俗称起场),到次年二月骆驼膘落体乏时停止(又称放场),前后最多不过4个月的时间。因此各盐池的食盐外运只能在这一期间进行。为了抓时间抢季节,各盐池的运销方向和灌仓地点,大都依其盐池的位置就近选择。如:吉兰太盐池之盐北运磴口;和屯池之盐运抵定远营及叶升堡;查汗布鲁克盐池之盐运乏中卫、一条山;雅布赖盐池之盐运往武威,也运一条山。这样驼运运距较短,能在骆驼使役期内多而快地将盐驮出沙漠。驼运除受骆驼一定使役期的约束外,还受当年草场的好坏,有无疫情的影响,这些因素都能影响到当年投入驼运的驼数的多少、运次的多少和单驼驮载量的多少。一般说来,如果当年风调雨顺,草场丰美且无疫情,骆驼膘肥体壮,投入驼运的驼数就多,而且驮量大,趟次多,放场迟;否则驼数、驮量、趟次部相对减少,放场亦得提前。

每年驮运季节到来之前,驼户要提前将准备使役的骆驼找回进行拴、

绊(绊:一种用皮条制成的用以限制牲畜行走速度的用具,形如“一”字或“丫”字),耷(用缰绳的一端缚住牲畜的左前腿,使其头颈不能高抬而致不得远走)住,并断其饮水(俗称吊水),每日监视放牧,如此持续 10 至 15 天。如果该驼在断水前刚饮过水,则仍可忍渴进食;倘若人为断水前骆驼已有数日未曾饮水,则表现急躁不安(牙齿频磨,口吐白沫),不思进食,这时可视为吊好,并使之一次性慢慢饮足喝饱,再休息两三天,以后按正常饮水放牧,便可安全使役了。在吊水期间,对于骑乘驼,可以有意识地进行骑乘急驰,使其大量出汗;驮盐驼可在找回骆驼两三天后,边吊水边驮运,每天早晚起程前和卸驮后,放牧一会,一个往返驮程下来,即可饮水。总之,吊水的目的即是在断其饮水的情况下,使其大量排汗,耗去体内浮水浮膘。如果对骆驼不进行吊水而使役(特别是繁重劳动),不但使其膘情急剧下降,而且还会出现皮层起癣或皮裂出血(俗称此为起瘙,有干瘙、水瘙两种)的病状,此病虽可医复,但往往会影晌当年的驮运。因此,牧民对骆驼的役前吊水十分重视。而汉驼(农区驼)则不同,汉驼常年赖于人工饲养,所以,汉驼虽然比蒙驼驮量少,但可常年使役,也不必进行吊水。蒙驼除进行吊水(每年一次)外,并非一开始都能参加驮运,必须是经过专门调训之驼方能胜任。经过调训的役驼,能驮善走的时间约 10 余年(即四五岁至十七八岁)。因此,每年参加盐运的驼户,为不使其驼队后继无驼,必须在自己放牧的驼群中选挑那些腿短而粗、身长而健的青年驼到驼队中来,并进行跟队调训。生驼初次跟队,野性尚存,故此怕人惧车,背上负物,更是踢跳不已,加之力气不足,不能负重远行,所以当年跟队新驼,只能驮负百余斤。生驼经过一个驮运期的磨炼,野性即可消除,但体力仍未健全,故第二年只能试加驮量至二百来斤。第三年,随着驼龄的增长与前两年的磨炼,其体力健全,性情温顺,此时即可全载(280 斤至 300 斤)。这样年年有新驼入伍,岁岁有老驼退役,犹如吐故纳新,驼队久而不衰。

一个驼队(俗称一链),少则由七八峰骆驼组成,多则由十几峰骆驼组成。一个驼工一般只能管一链,三四个驼工组成一个驼运组(自愿结合而



成),以便装货卸载,互相照应。每链驼的首尾均由老练温顺之驼居处,以导前殿后。前驼驮负行囊兼以驼工骑乘;后驼项系铃铛,一步三摇,叮东作响,以此告知主人驼队完整无缺,倘若铃声终止,说明队列有脱节发生。因为后驼之缰绳都是系在前驼的驮架上,如此前后连接,相随前进。假如其中一驼之缰绳脱落,那么由于失去牵引,该驼即止而不前,后驼亦连连相止,用以传递信息的铃声亦终止,所以,驼工一般不必后视,只凭那悦耳的铃声,便可知其驼队是否完全。在运盐驼队中,除有调练的新驼外,还有专门驮载帐篷、灶具、粮、水、柴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骆驼(一组一峰骆驼即可)。所以,在一个驼工管理的骆驼队中,载盐驼可占 90%。

骆驼性温顺,喜僻静,故此,有经验的驼工多在夜间赶路(也有多在白天进行的)。每日行程则视沿途沙漠大小及站点、水草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重载驼每日可行 25~30 公里。如果前方站点水草丰美,适于放牧,即使是三四十里的路程也可卸载休息;与此相反,为了赶水草,七八十里的站地也要赶到。当然也有一二百里无水无草的不毛之区,遇此情形,也只能酌情而歇。每到一站,则选其避风、向阳、水近、草丰之处卸驮休息。这时驼工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搭房(支帐篷)造饭者,有背水拾柴者(为下站造饭取暖作准备),有照看驼群者,饭毕入帐休息,以蓄力迎接下站艰苦的行程。

驼工的工作及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并非人人胜任,而要成为一名老练的驼工更非一日练就。驼工不但要有强壮的体格,更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试想,按每个驼工管理 15 峰骆驼,每个骆驼平均载重 140 公斤计,每天装卸一次,则有近达万斤的装卸量。而且还要进行捆绑、缚牢等工序,加上一天的奔波劳累,一般人是很难承受的。此外,驼工还要有装卸技巧。据驼工讲:仅必须的生活用品(包括帐篷、灶具、粮、水、柴等),要负于一驼,没有经验的人很难将其全部稳妥地缚之驼背,即使勉强装载了,也是两侧重量不均,松松垮垮,不但会使骆驼过早疲劳,中途散驮甚至还会磨烂骆驼皮肉。有经验的驼工,对这些杂物则处置得十分妥当,那件先装,那件后放,都

进行得井井有条,各得其位,在其捆扎之后,诸物件紧凑牢固,即使驼行百里,亦依然如故,这是一种老练驼工的独特技巧。

另外,一个驼工不但要具备日装(卸)万斤之体力及熟练的捆绑技巧,还要有适应各种恶劣气候的毅力以及在各种环境下辨向识途的高超本领。盐运时期,恰值冬春寒冷而多风沙的季节,此时西北高原的气温多在零下二十几度,尽管驼工个个皮袄裹身,毡靴罩足,但一天10多个小时置身旷野,一任风吹寒袭,没有顽强的毅力是不行的。有时寒冷难挨,驼工不得不下驼步行,以便驱除寒冷。沙漠中的气温变化较大,俗有“早穿皮袄午穿纱”之说,这种气温的变化对驼工来讲早已习以为常,而那种“风沙起处日月昏”的情景,才是驼工最头疼的事。因为沙漠驼路,严格地说只是方向性的,即使是不间断使用的旧路,也只能在戈壁,草滩上留有骆驼走过的不太清楚的足迹及零落的粪便,而在大沙漠地段,有时连这点痕迹都会被一场风沙所埋没。这时驼工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搜寻路迹或凭记忆中的那酷似而又有别的沙丘及远方的山峦定向前进。总之,不管是在风沙蔽日的白天,还是在夜黑如漆的晚间,驼工是从不会迷失方向的。

新中国建立前,阿拉善地区的盐运均属自由运输形式。在整个盐运期间,蒙驼运盐趟次的多少,均由驼户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是为赚取部分运费,以资补生活,同时也借机捎购自家所需米、面及日用杂货。因此,除宁夏、甘肃参加运输的回、汉驼及少数蒙驼尚能坚持始终外,多数蒙驼只能参加三五趟甚至一二趟即行停止。当时的盐运业无专门管理机构及其相应的规章制度,所以,对驼户而言,运与不运是其自由,毫无责任与任务这些观念可束。其时,每年各大盐池参加运输的骆驼均在万峰左右,试以每驼驮150公斤,每月驮运两趟计之,月可运盐6万担(300万公斤),一个运期(按5个月计)则可运盐30万担。然而仅以民国28、民国29年(1939年~1940年)为例,吉兰太盐池年均运出量只有2.5万担,与参加运输驼数的可运量相比,相差甚远,而查汗布鲁克盐池当时算是运量最大的盐池,上述两年的年均运出量达20万担,但也只占可运量的三



分之二。故每逢运期,特别是在运况不佳之时,盐局和旗府屡屡催运,但成效甚微。造成运况不佳的主要原因,一是运价偏低(如吉磴段),影响了驼户的积极性;二是无组织,无任务,驼户本身无责任感,运、停无约束。这便造成了盐局对当年运量估计不准,而采捞只能按常规进行,以防产不及运。由于上述原因,产大于运几成定局,致使池中存盐越积越多,耗损甚巨。

每年盐运开始后的前一二个月,是盐运高峰阶段(此时气候宜人,骆驼膘肥体壮)。早已准备好的驼户,纷纷赴池,各大盐池开始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每天无数峰骆驼云集盐池,有满载起程的;有等候待装的;更有那捷足先登卸货归来的以及姗姗来迟的。此时整个盐池沉浸在一片人声、驼声、铃声合鸣的欢乐的交响乐中。夜晚,池旁白帐点点,篝火映空,在那空荒野寂的大漠之内自成另一世界,使人赞叹不已。

骆驼入池装盐,手续简便。当时为了方便蒙民驼运,各池均设有蒙人办事员 1~2 名,专司过称,督促盐运及协助缉私事宜。其办公地点,蒙民称之为“局子”或“卡子”。入池装盐前,须先至局子登记姓名、住址、驼数,在领取票据(蒙文便条)后,即可入池装盐。之后再至该办事处或场务所按实装斤数填写五联票,并持此票运至指定地点交纳(途中票盐不得分离,以备沿途查验)。最后经仓局核罢数量,并无短缺(在规定途耗之内)后,再持票领取运费。汉人入池运盐手续与蒙人大致相同,唯较蒙人多一道登记手续,即先至蒙员办事处登记后,再至场务所领取票据(汉文便条),方可入池装盐,其后一如蒙人运盐一样,持五联票运至指定地点交纳。

蒙汉驼运盐之脚价,均按途程的远近及运道是否难行而定。此以民国 29 年底至民国 30 年初(1940 年底~1941 年初)为例,吉(兰太)磴(口)段每市担脚价 4 元(法币,下同);查(查汗布鲁克)卫(中卫)段每市担脚价 6 元;查条(一条山)段每市担脚价 6 元 5 角;和(屯池)定(远营)段每市担脚价 6 元;和石(空)段每市担脚价 12 元 5 角;和(屯池)叶(升堡)段每市担脚价 10 元;昭(化寺)卫(中卫)段每市担脚价 4 元 5 角;通(湖)卫(中卫)段每市担脚价 2 元 5 角。此外,考虑汉驼需喂草料,运输成本大,故在上述脚价基础上每市担

增加脚价 2 元。

在各盐池盐运中,参加查汗池盐运的蒙汉驼最为踊跃。究其故,是因中卫是粮丰价廉之地,蒙民可将所得运费购买粮食,而查条段则因沿途多系薄而软的沙地,利于驼行,在脚价方面,按途程计算与吉磴段相差无几,而脚价却高出三分之一,故蒙汉驼户均愿至此。和池盐运不如查池,主要原因不在运价,而在于该池运道多系砂石,常行此路,驼蹄易磨难耐,况且交盐之区的粮价又较中卫为高。在较大盐池中,吉兰太盐池的盐运最不景气。其原因有两个,一如上述原因,吉池属于商办,内有旗府王爷,协理的股份,蒙民运盐属半当差性质;二是吉盐北运磴口后,尚需装船转运,驼运脚价过高,盐斤成本太大,盐商、王爷难以获利,故所定脚价低于它池。吉磴段途长 240 里,往返一趟需七八天,而在民国 29 年初的脚价每市担只有 1 元 2 角(法币),按当时的物价,尚不足驼工一天的生活费用,年末,脚价虽然增至每担 4 元,但因物价暴涨,所增脚价尚不及物价增长的三分之一。所以,尽管旗府严令屡催,驼户仍是得过且过,借机应付。

1949 年 9 月 23 日,阿拉善旗和平解放。自此盐池回到人民手中,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领导下,各盐池的产、运量逐年增加,据《巴彦淖尔盟盐务历史资料》和 1957 年《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交通执行情况》载:1950 年吉兰太盐池产盐 5983 吨,运销 6366 吨(有上年池存盐),合 127320 担,是 1940 年运盐量的 5 倍,查汗布鲁克盐池产盐 9696 吨,运销 8163 吨,合 738320 担,是建国前该池最高运销量(30 万担)的 2.5 倍,当年参加运输的总驼数达 3 万峰。

为了进一步加强驼运工作,1955 年成立了巴彦淖尔盟群众运输业务所。所址设在巴音浩特(1951 年改定远营为巴音浩特),并在磴口(今巴音木仁)设站,站内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专司驼运,时定每一苏木为一个基层运输队,每队设脱产队长一人。凡参加驼运的驼、驴、车等均由站所统一安排,从此结束了长期自由驮运的历史。此外制定了盐运规章,其中包括:年度运盐计划,具体承运单位(队),分期运量,灌仓地点及运费、责任、途耗



与赔偿等。当时各队承运池线为：一、三、五、六苏木(队)及巴音浩特、磴口共6个队,负责吉、和二池的吉磴线、和巴(音浩特)线、和银(川)线三线;二苏木(队)以及宁夏回、汉驼队负责查汗布魯克盐池的查卫线,查条线两线;四苏木(队),额济纳旗驼队及甘肃驼队负责雅布赖盐池的雅河(西堡)线。驼队群运所的经费来源于盐务部门和驼户,即收取盐务部门服务费1.2%,驼户管理费1%。

群运所成立以后,为鼓励驼户积极参加盐运,除对驼户人畜粮料给予照顾外,并在有条件的站点筹资打井,储备草料。在磴口还专门设有驼工生活物资供应站,烟、酒、糖、茶等蒙古族人喜食之物十分充足,即使在商品出现供求紧张的1957年,这里的供应工作亦很好。驼户的积极性提高以后,吉磴线盐运萧条的局面也得到了扭转。

1954年,雅河公路建成,雅盐首先实现了汽车运输。1958年,三吉公路通车,吉盐外运也出现了腾飞。公路的修建,运输工具的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直接促进了阿拉善旗盐运事业的发展。在戈壁沙漠中建桥筑路,这是以前任何历史朝代都未能做到的,这对阿拉善地区除盐产以外的其他资源的开发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都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公路修通以后,延续数百年的驼运开始走向冷落。这对已经养成驼运习惯的蒙民来说初感不适。为了照顾蒙民的收入及其长期的驼运习惯,在雅河、吉磴两段采取了汽车、骆驼并运的办法,即每年分留三四千吨交由驼运。然而由于运费的高低有别,致使经销单位对接收驼运食盐产生冷淡。仅以雅河段为例,汽车运输每担运费只有1元6角9分,而驼运每担运费高达2元4角。此数尽管较汽车运输为高,但仍比驼运实际成本低得多。按1954年8月《骆驼运价成本计算表》计算可知,驼运每担公里成本运价为2分1厘,那么雅河段的运距为140公里,计合每担运费应为2元9角4分。显然,2元4角的运费已经是大大缩减,运户已经承担了高额运费差额,但各经销单位仍不愿接收驼运物资。因而这种情势加快了古老而落后的驼运业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今天,阿拉善地区四大盐池除了查汗布鲁克盐池由于地处沙漠腹地,难于筑路而仍然采用驼运外,吉、和、雅三池均已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采盐及公路或铁路运输。可以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类不断对沙漠的研究、治理,总有一天公路会通向查池,查池那丰富的盐产资源也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驼运在阿拉善虽然衰退了,但却不能完全被取消,目前在偏僻的牧点及公路尚未延伸到的苏木骆驼仍然担负着各种物资的运输任务。那清脆的驼铃声和隆隆的机车马达声尽管有点不那么协调,但二者的职责和目的却是一致的。

四、盐 道

阿拉善食盐远销山、陕、甘、宁、豫各地,仅以盐运为主的驼道即达十数条,形成了北连包绥,东接宁夏,西通河西走廊的交通网络。通过一条条沙漠驼道和年以万计的骆驼从阿拉善运出的是大量的食盐,而从外地驮进的是大量的稻、粱、黍、稷等农产品以及丝绸布帛、烟酒糖茶等日用百货。显然,阿拉善旗盐运的繁盛,不但便利和解决了人民生活所需,不但对西北商埠包头的兴旺和磴口航运事业的兴起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促进蒙汉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得以加强和加深方面有着更大的意义。

阿拉善旗盐道很多,但综观其成,基本上都是以旗府定远营和各大盐池为中心的,现将阿拉善旗吉兰太、和屯池、查汗布鲁克这几个大盐池的盐运道路情形叙述如下。

1. 吉兰太盐池的盐道,共有两条

(1) 吉兰太—磴口驼道

吉兰太至磴口驼道开辟于清朝初年。1697年,和硕特部正式定牧阿拉善,在其编旗置佐以后,为了岁岁纳贡朝皇,遂踏辟了东进京师的几条贡路,其中就有取道磴口,东渡黄河,横穿鄂尔多斯一路,吉磴驼路即为此途前段之一部。



吉磴驼路的开辟,不但可以使一年一度的贡品如期送达,而且也使其路自身成为阿拉善人民向东贸易的重要通衢。其时,阿拉善所产皮毛、甘草等土特产品及所需烟、酒、糖、茶、布等用品约有五分之二是从该路运进和输出。清乾隆以后,随着吉兰太盐池的开发,这条驼路又成了吉盐东运的唯一道路,而磴口也随之成为吉盐陆转水运的集散地。据《清会典》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奏准阿拉善地方每年造盐船五百艘”,阿拉善别无口岸,唯此磴口是用。吉盐在磴口装船顺流而下,运抵西北最大商埠包头,在此或水运或陆运远销绥、晋各地。

吉磴驼路穿行于著名的乌兰布和沙漠之中,故沿途流沙遍布。尤其是靠近盐湖一段,沙丘高大,驼队只能围绕沙丘曲折前进,磴口附近,由于近于农区,流沙方为薄少。该路自吉兰太盐池始,向东微偏南行 20 公里至哈沙图(此段为该路最难行的一段),然后折转东北 27.5 公里经宝鲁毛德、喇嘛乌素、浩尼奇里格至包尔呼舒;继续东北行 27.5 公里经查干套海,查干陶勒盖至查干扎干;自查干扎干起东行 30 公里经道劳哈尔僧、毛格尔图希勒而达磴口。吉磴路全长 105 公里,驼运往返一趟需七八天。该路兴盛于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仍为吉盐东运的主要途径。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包兰铁路和三(三道坎,即乌达)吉公路的通车,这条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沙漠驼路因为无人问津,逐渐被风沙所埋没。

(2)三道坎—吉兰太驼路

三吉驼路形成较晚,其作为盐运道路已在新中国建立以后。20 世纪 50 年代末,包兰铁路通车后,始将部分吉盐驮至三道坎装车外运。但为时不久,即 1958 年,三吉公路亦建成通车,吉盐外运大部由汽车来承担,驼运只是作为照顾蒙民多年的运盐习惯,每年驮运三四千吨,但因运价高,经销单位不愿接收,驼运也就逐渐停止了。所以,三吉驼路在盐运史上只有短短几年。

三吉驼路分南北两路,里程相近,具体站点如下。

①北路 该路自吉兰太盐池始,东南行 20 公里至哈勒敖包,此段虽然沙漠遍地,但无高大沙丘,不必绕行,且站点有水,可供人畜饮用。自哈勒敖

包东南行 40 公里至沙尔陶勒盖,该段沙大无水,驼队需从前站带水绕行于沙岭之间,是北路最为难行的一段。由此站东行 12.5 公里至苏吉,该段为半沙半滩地,草好易行,水源充足。由苏吉转东南行 17.5 公里至达拉布盖,该段全为滩地,水草丰美,是全程中条件最好的路段。由达拉布盖微偏东北行 22.5 公里即至三道坎,此段多行于傍山地带,虽然草好无沙,但因砾石遍布,不宜驼行。北路全程共五站,全长 122.5 公里。

②南路 南路自吉兰太盐池微东南行 22.5 公里至阿达图,该段属碱滩地,易行无水。自阿达图东南行 25 公里至木井,此段为沙滩地,草好水足。自木井起转东行 20 公里至奇里盖(巴音布拉格,即富泉队),由奇里盖微东北行 35 公里至达拉布盖,与北路会合。以上两站均为滩地,水草充足,是全程中条件最佳路段。南路亦为五站,全长 125 公里。南路虽较北路略长,但就水草条件而言,却优于北路,以上两路往返一趟均需 10 日。1958 年通车的三吉公路基本上是沿南路的走向测筑而成的。所以,南路实际上就是三吉公路的前身。

2.和屯池盐道,共三条

(1)和屯池一定远营驼路

和定驼路踏拓较早,繁盛则在清末民初。和屯盐池租赁开采以后。雍正十年(1732 年),阿拉善旗府由紫泥湖迁至定远营。从此,定远营便成了全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牧民进城办事或进行贸易,亦间或驮盐经旗府赴宁夏易换粮食,于是和走驼路渐为开拓。至清朝光绪年间,和屯盐池正式开采并在旗府定远营建仓储盐后,这条驼道遂成盐运和商贩贸易同为使用的路。

该路自和屯盐池起,东南行 22.5 公里至巴音布日格;20 公里至锡尼呼都格(新井);又 20 公里至浩雅尔陶勒盖。自浩雅尔陶勒盖继续东南行 22.5 公里即达旗府定远营。该路一共四站,全程 85 公里。前三站属沙滩地貌,水草充足,驼行不难。唯最后一站因地近贺兰山麓,卵石遍地,虽然草茂水丰,但驼行日久,易磨穿驼掌,故驼工多不愿行。



(2)和屯池—叶升堡驼路

和叶驼路开拓于清中叶,繁盛于清末和民国时期。初时,和池来加限制,任凭当地蒙民私行采运。牧民为易换米面和日杂用品常常驼载皮张、食盐赴宁夏沿边地区进行贸易。清光绪时,和屯池正式租赁开采并确定宁夏之叶升堡为该池盐斤灌仓之地以后,这条驼道也开始繁盛。

和叶驼道自和屯池起,前两站同于和定驼路。自和定驼路的锡尼呼都格分道,东南转南行 32.5 公里至通古淖尔;自通古淖尔再转东南行 32.5 公里至腰坝(自此与宁定大道会合),然后,15 公里至长流水;17.5 公里经三关、二关至头关(进入宁夏境);自头关东南行经宁化、李俊堡即至叶升堡。有的驼队空驮返回时,要绕道到银川购货,而后经平吉堡返抵头关接路。和叶驼路多为滩地,水草充足,唯三关至头关段穿行于两山河床之间,虽然河床多为山洪冲积的河沙,但尖石时有裸露,驼行较难。该路共七站,全程 180 公里,往返一趟需 15 天。有的驼户为顺便到旗府办事,也可沿行和定路到定远营,然后南行至腰坝上路。1958 年三吉公路通车后,和盐即由骆驼驮至吉兰太由汽车转运乌达火车站,1967 年乌吉铁路通车后,又改由火车转运。

(3)和屯池—吉兰太驼路

和吉盐运驼道,是在三吉公路通车后开始繁盛的,在此以前,此道只不过因依民间交往而存在。和吉驼路的具体站点自和屯池盐池起东北行 20 公里至毛敦呼都格;17.5 公里至图里格,又 17.5 公里至哈图呼都格;自哈图呼图格 22.5 公里即达吉兰太。和吉驼路共四站,全程 77.5 公里,往返一趟 4 天至 5 天。1969 年和屯池盐运专用公路(即和屯池至银乌线的 193 公里处,计长 40 公里)筑成,与银乌、三吉两线连通,和盐的驼运亦告结束。

3.查汗布鲁克盐池盐道

即查汗布鲁克至中卫、查汗布鲁克至一条山两驼道。查汗布鲁克盐池通往宁、甘两省区的驼路均开拓于清中叶。1858 年,查汗布鲁克盐池正式招商采运后,该池盐道更加兴旺,每年运盐驼数达八九万甚至 10 万峰之多,居各池盐运之首。

查汗布鲁克盐池通往中卫和一条山驼路的具体线路及站点情况如下。

(1)查汗布鲁克—中卫驼路

查卫驼路自查汗布鲁克盐池始,东南行 30 公里经黑盐池至三道湖;然后东南转东行 37.5 里经二道湖、红盐池至头道湖(超格图呼热);自头道湖折南而下 35 公里经柴鄂博(柴鄂博深井)至一条山后井(一条山本身为一小山);继续南行 22.5 公里即达宁夏之中卫。该路除柴鄂博水质略咸外,其余各站水质均好,草场丰茂,且沿途沙漠薄少,易于驼行。查卫路全程四站,计 125 公里,往返一趟需八九天。

(2)查汗布鲁克—一条山驼路

此途又有东、中、西三线。查盐运抵一条山之所以分此三线,一方面是出于驼户对路况的掌握程度和历年的驼运习惯,但更主要的是通过驼运分流可以减轻沿途草场的负载力,使盐驼得到较好的放牧。其三线的具体站点情况是:

①查条东路:查条东路自查汗布鲁克盐池始,东南转西南行 25 公里经黑盐池至敖那图;微西南行 17.5 公里至包尔陶勒盖;南行 22.5 公里至赛力克札得何;自赛力克札得何东南行 20 公里经敖冷呼都格至大芨芨湖;然后转西南行 25 公里经干井子至白疙瘩;继续西南行 20 公里至营盘水(老营盘水,在阿拉善盟境内);20 公里至白墩子(在甘肃境);25 公里即达一条山。该路除阿拉善盟境内的包尔陶勒盖(山地)和甘肃境内的白墩子(沙丘地)两站水源缺少外,其余各站水源充足。查条东路共八站,全长 177.5 公里。往返一趟需十五六天。

②查条中路:查条中路是查盐外运最繁盛的一条路。此路自查汗布鲁克盐池起西南行 29.5 公里至沃门扎克湖;西南转南行 32.5 公里经双黑山(从双黑山西侧通过)至东咯勒乌苏;自东哈勒乌苏西南行 25 公里至大井;27.5 公里经干眼井至小井子;再南行 25 公里至白墩子,与东路会合;之后再南行 25 公里至一条山。查条中路除双黑山一站无水外,余皆水草不缺,且沿途无巨沙,驼行方便。该路共六站,全长 160 公里,往返一趟需十三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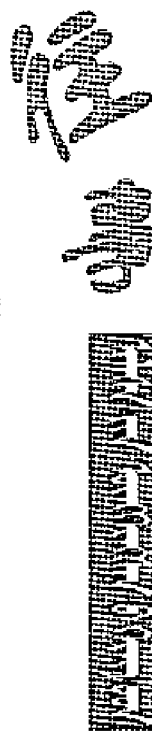
③查条西路:查条西路自查汗布鲁克盐池起西南行 27.5 公里至巴音克勒湖(从中路的沃门扎克湖西北绕过);再西南行 27.5 公里至通格图;自通格图微偏西南行 30 公里至五度井;折南行 34.5 公里至拉排井;南行 42.5 公里经五个井至白墩子,与东、中两路会合;而后南行 25 公里至一条山。查条西路水草充足,宜于驼行,全程亦为六站,全长 182.5 公里,往返一趟需 15 天。

阿拉善旗与宁夏中卫、甘肃一条山连接的道路除上述盐道外,还有两条十分重要的驼道。这就是自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到中卫和定远营经一条山至兰州的驼道。这两条驼路均踏辟于清朝初期。其中,定远营至中卫的驼道是阿拉善旗牧民到南部农区购换粮食、百货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定远营至兰州驼道则是旅蒙商贩的通途。当时阿拉善属于纯牧区,畜产品十分丰富,每年所产数以万计的各种皮张和百多万斤绒毛,除一部分运往包头外,大多数由商贩运抵兰州。据史料载:阿拉善旗时羊毛年产,量一般约为 35 万公斤,而销往兰州的羊毛 1939 年即达 12.05 万公斤,1940 年增销到 32.15 万公斤。驼毛年产 40 万公斤左右,而上述两年销往兰州的驼毛分别为 22.35 万公斤和 16.8 万公斤。除羊、驼毛外,阿拉善旗年产各类皮张达 5 万余张,也绝大多数运销兰州。返程再将砖茶、水烟、蜜枣等杂货运回草原。这样定(远营)兰(州)驼路又成为阿拉善旗草原与河西走廊互相联系的纽带。今天,这条曾对蒙汉等族人民在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起到过巨大促进作用的驼路,虽然已经废弃,但“南到兰州”这一历史性的口语却会永在阿拉善草原上延传。

定(远营)中(卫)、定兰两条驼路的站程情况简记如下。

定中驼路:定中驼路自定远营始微偏西南行 42.5 公里至达拉布艾;西南行 32.5 公里至厢根达来(旧厢根达来,骡子山东麓);自厢根达来直南行 30 公里至浩雅尔呼都格(双井子);22.5 公里至乌兰呼都格(红井子);自乌兰呼都格西南行 32.5 公里即达中卫。该路共 5 站,全程 160 公里。

定兰驼路:定兰驼路自定中驼路第一站之达拉布艾分道,东南行 20 公里至厢根达来(木井子);西南行 15 公里至土井子;25 公里至尼力辞哈马



尔;30公里至头道湖(超格图呼热);自头道湖南转西南行25公里至马莲湖井;西南行30公里至小芨芨湖;西南行27.5公里经大芨芨湖、干井子至白疙瘩(查干陶勒盖);20公里至老营盘水(楚隆温古茨台);15公里至大疙瘩(甘肃境);微西南行30公里至一条山。其中大芨芨湖至一条山一段基本与上述查条东路盐道并行而走,亦有时合情形。最后由一条山南行130公里经大横路、水阜河即达兰州。定兰驼路全程共14站,计长410公里。

五、驼道、驼运的结束语

驼道和驼运是阿拉善地区独特的交通道路和运输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依据自然、征服自然的产物。数百年来,它虽然从某一个或某几个侧面反映了旧时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形,但就其本身而言,在这片茫茫的沙漠区中,这样廉价的“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交通工具——骆驼,确实为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开发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今天,阿拉善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虽然得到突、猛进地发展,但作为传统的运输方式——驼运,在沙漠腹地的盐池及偏远的牧点却依然存在。因为,一方面人们还需要在这特殊的环境中进行各种生产、生活活动,另一方面,人们在改造沙漠的过程中,还没有从自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的程度。所以,驼运在特殊环境的存在,正像内地农村特别是偏僻山区农村的畜力车的存在一样,它虽然不再承担远距离的、大量的货物运输,但作为近距离的、辅助性的运输方式仍然具有其实用价值。

阿拉善地区的驼运从数百年来主导地位变成今天的辅助地位,是陆路交通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今天,随着高质量的公路的修建延伸和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使用,原为干线的许多沙漠驼路也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被风沙所埋没。但无论是形迹皆无的驼路还是“卸甲归牧”的骆驼,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的自然条件下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而应该在交通史志的篇章中给它留下光辉的一页。

附表一 巴丹吉林沙漠中阿拉善、额济纳两旗路站程情况简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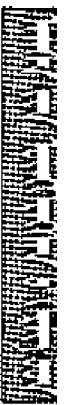
序号	吉 磴 路				三 吉 北 路				三 吉 南 路					
	站 点	站 距(里)	方 位		序 号	站 点	站 距(里)	方 位		序 号	站 点	站 距(里)	方 位	
			东 经	北 纬				东 经	北 纬				东 经	北 纬
1	吉兰太		105°46'	39°45'	1	吉兰太		105°46'	39°45'	1	吉兰太		105°46'	39°45'
2	哈沙图	40	105°57'	39°43'	2	哈勒敖包	40	105°52'	39°36'	2	阿达图	45	105°47'	39°36'
3	包尔呼舒	55	106°14'	39°47'	3	沙尔陶勒盖	80	106°17'	39°29'	3	本 井	50	105°55'	39°24'
4	查干扎干	55	106°28'	39°56'	4	苏 吉	25	106°24'	39°30'	4	奇里盖	40	106°07'	39°22'
5	旧 磴 口	60	106°44'	39°56'	5	达拉布盖	35	106°31'	39°24'	5	达拉布盖	70	106°31'	39°24'
					6	三道坎	45	106°44'	39°27'	6	三道坎	45	106°44'	39°27'
合计	4	210			合计	5	225			合计	5	250		

附表二

和屯池盐运驼道站、程简表

序号	和定路				和叶路				和吉路			
	站名	站距(里)	方位		站名	站距(里)	方位		站名	站距(里)	方位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1	和屯池 (浩坦淖尔)		105°00'	39°21'	和屯池 (浩坦淖尔)		105°00'	39°21'	和屯池 (浩坦淖尔)		105°00'	39°21'
2	巴音布日格	45	105°10'	39°11'	巴音布日格	45	105°10'	39°11'	毛敦呼都格	40	105°15'	39°28'
3	锡尼呼都格 (新井)	40	105°17'	39°02'	锡尼呼都格 (新井)	40	105°17'	39°02'	图里格	35	105°25'	39°32'
4	浩热尔 陶勒盖	40	105°27'	38°56'	通古淖尔	65	105°23'	38°46'	哈图呼都格	35	105°33'	39°36'
5	定远营 (巴音浩特)	45	105°40'	38°50'	腰坝	65	105°23'	38°32'	吉兰太	45	105°46'	39°45'
					长流水	30	105°41'	38°26'				
					头关	35	105°49'	38°21'				
					宁化	45	106°03'	38°12'				
					李俊堡*	15	106°07'	38°11'				
					叶盛堡	20	106°09'	38°05'				
合计	4	170			9	360			4	155		

注:站名中有*符号的是过站





附表三

查汗池盐运驼道站、程简表

序号	查卫路			查东路			查中路			查西路		
	站名	站距(里)	方位	站名	站距(里)	方位	站名	站距(里)	方位	站名	站距(里)	方位
1	查汗布鲁克		104°40' 38°23'	查汗布鲁克		104°40' 38°23'	查汗布鲁克		104°40' 38°23'	查汗布鲁克		104°40' 38°23'
2	黑盐湖*	20	104°42' 38°18'	黑盐湖*	20	104°42' 38°18'	沃门扎克湖	50	104°34' 38°13'	巴音克勒湖	55	104°27' 38°14'
3	三道湖	40	104°50' 38°11'	敖那图	30	104°39' 38°12'	双黑山*	30	104°29' 38°04'	通格图	55	104°14' 38°08'
4	二道湖*	35	104°56' 38°05'	包尔陶勒盖	35	104°36' 38°03'	东哈勒乌苏	35	104°28' 37°56'	五度井	60	104°06' 37°55'
5	红盐池*	25	105°03' 38°05'	赛力克扎得何	45	104°34' 37°51'	大井	50	104°20' 37°45'	拉排井	60	104°09' 37°40'
6	头道湖 (超格图呼 热)	15	105°08' 38°03'	大麦芨芨湖	40	104°40' 37°43'	干眼井*	25	104°14' 37°40'	五个井*	20	
7	柴鄂博*	25	105°09' 37°56'	山疙瘩	50	104°28' 37°33'	小井子	30	104°10' 37°34'	白墩子	65	104°09' 37°21'
8	一条山后井	45	105°10' 37°43'	老营盘水	40	104°20' 37°26'	白墩子	50	104°09' 37°21'	一条山	50	104°05' 37°10'
9	中卫	45	105°11' 37°31'	白墩子	45	104°09' 37°21'	一条山	50	104°05' 37°10'			
				一条山	50	104°05' 37°10'						
合计	4	250		8	355		6	320		6	365	

注:站名中有*符号的是过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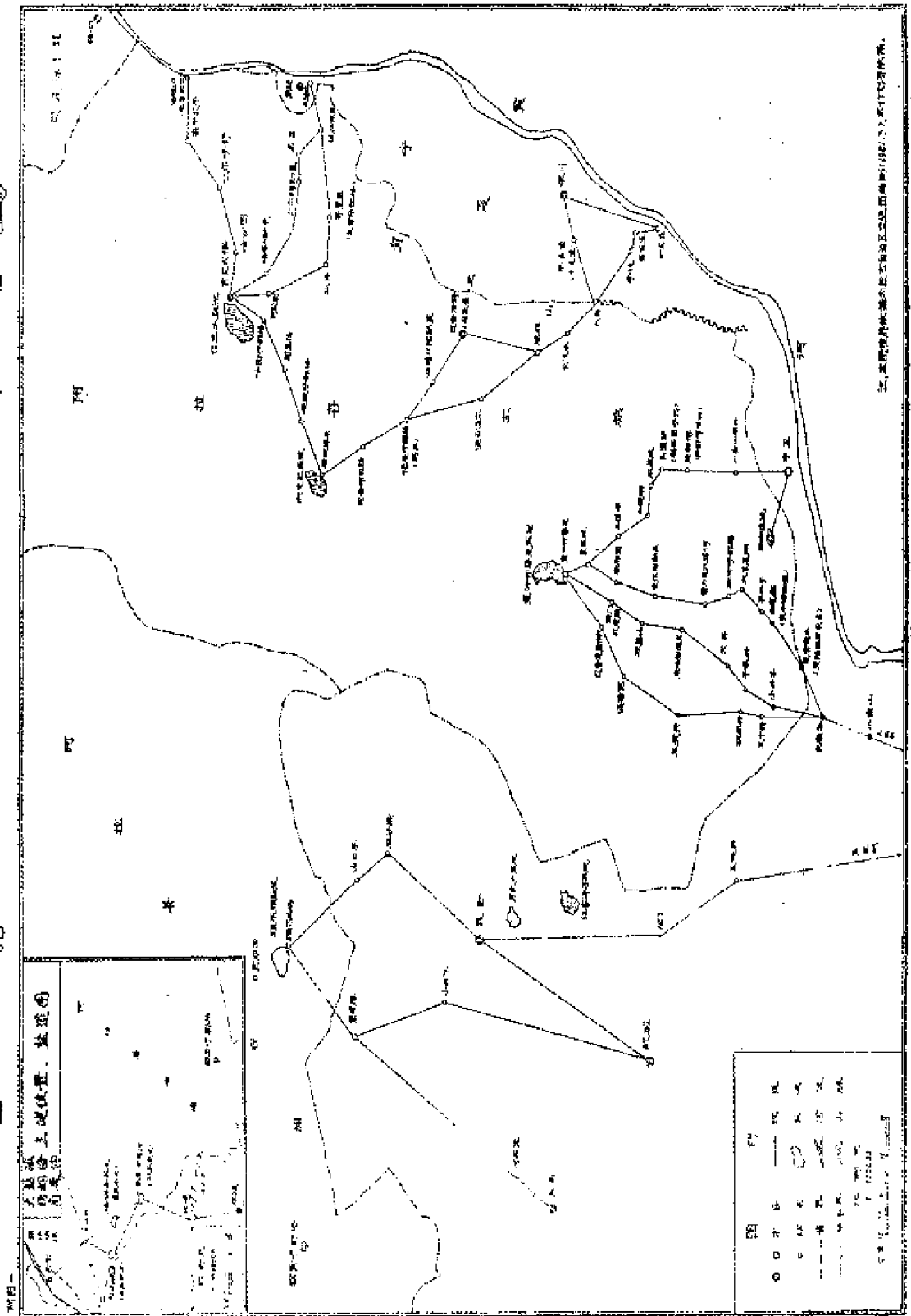


附表四 定中定兰驼道站程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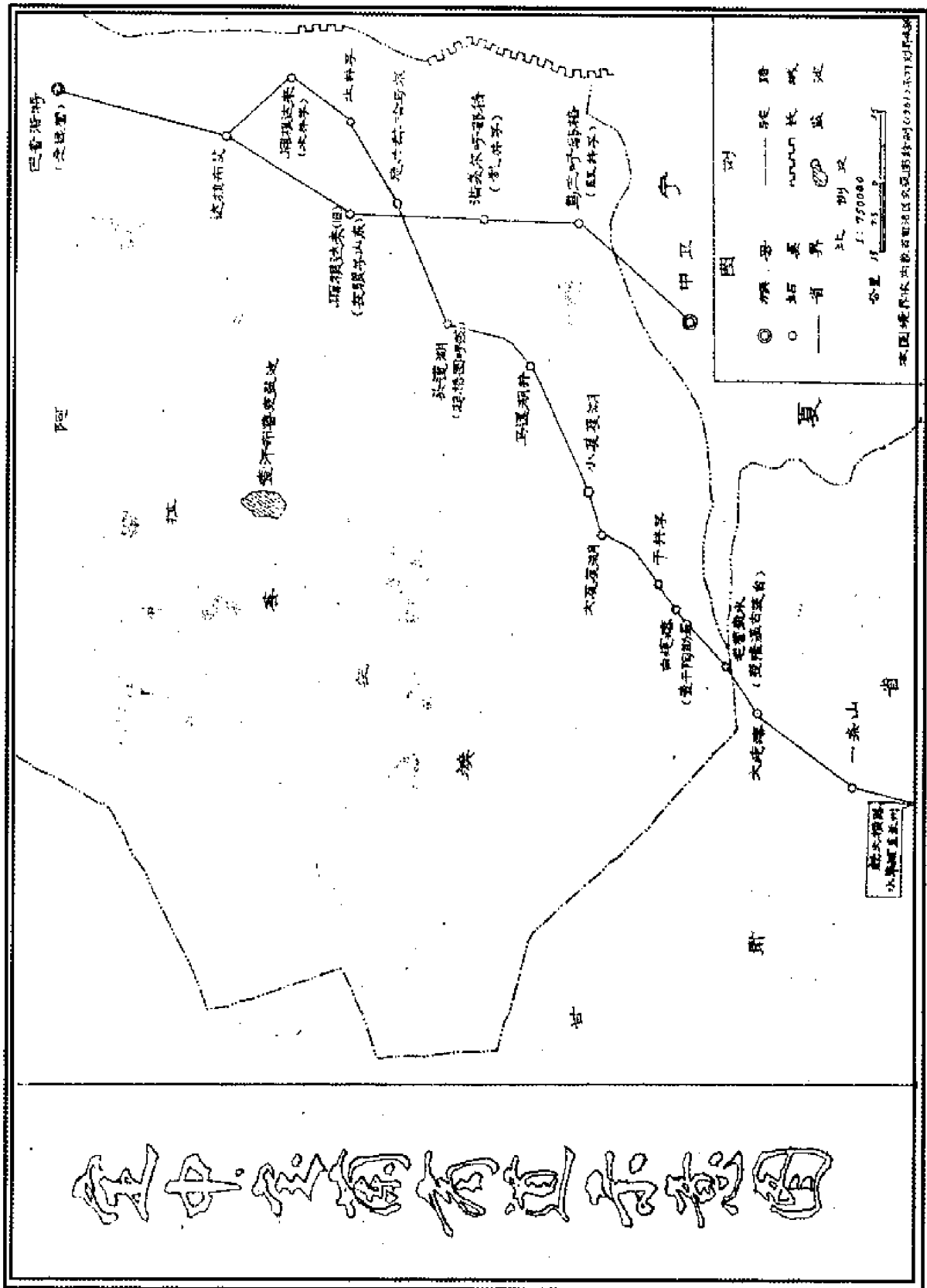
序 号	和 定 路				序 号	和 叶 路			
	站 点	站 距 (里)	方 位			站 点	站 距 (里)	方 位	
			东 经	北 纬				东 经	北 纬
1	定 远 营		105°40'	38°50'	1	定 远 营		105°40'	38°50'
2	达 拉 布 艾	85	105°34'	38°29'	2	达 拉 布 艾	85	105°34'	38°29'
3	厢 根 达 米 (旧)	65	105°23'	38°14'	3	厢 根 达 米 (木井子)	40	105°42'	39°22'
4	沿 尧 尔 呼 都 格 (乱井子)	60	105°23'	37°58'	4	土 井 子	30	105°37'	38°15'
5	乌 兰 呼 都 格 (红井子)	45	105°14'	37°48'	5	尼 力 薛 哈 马 尔	50	105°25'	38°08'
6	中 卫	65	105°11'	37°31'	6	头 道 湖 (超格图呼热)	60	105°08'	38°03'
					7	马 莲 湖 井	50	105°03'	37°53'
					8	小 麦 麦 湖	60	104°45'	37°45'
					9	白 疙 瘩 (查干陶勒盖)	55	104°28'	37°33'
					10	苜 盘 水 (楚隆温占茨台)	40	104°20'	37°26'
					11	大 疙 瘩	30	104°13'	37°23'
					12	条 山	60	104°05'	37°10'
					13	兰 州	260	103°50'	36°04'
合 计	5	320			合 计	14	820		

注：一条山至兰州间尚有火横路、水阜河两站。

阿拉善盟善旗县通途示意图



注：本图仅供参考，不作为法律依据。





阿拉善盟境内的绥新路

白·那音太

绥,即民国时期的绥远省(地在今内蒙古中部一带);新,即新疆。绥新路,就是旧绥远省府归化至旧新疆省府迪化之间的道路。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市。

绥新一路,从古代驼路发展到现代长途汽车路,源远流长,亦著史册。早在汉代就有一条作为“中西交通之孔道”的“丝绸之路”,其北路即蜿蜒于内蒙古西北今阿拉善拉善盟境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绥新路运输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诸因素的影响作用下,经常出现时断时续的景况。纵观历史,绥新路对内地与西域之间交通的发展以及两地间贸易关系、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日趋频繁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是沟通我国北方东西一向的一条重要道路。到了近代,绥远与新疆之间已渐形成长达数千里的较为固定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除了近期的一点汽车运输外,更长期的还是以驼、马、牛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驼运还是最主要的运输方式。

一、横穿东亚大陆的绥新驼路

绥新驼路实为绥远与新疆两地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一条商业大道。其道路因是驼运形成,必受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变动的影晌,路线并不固定。也就是说,这条驼运商路的形成并不因依商人的主观意识,而是因依客观环境的变化。穿越戈壁、沙漠的绥新驼路,跟内地的道路不同,它必须依赖



于途中可供人与牲畜食用的水井、牧场以及天然的河流、隘口等条件。在依据这些条件的长期驼行马踏中,在绥远与新疆之间形成了南、北、中三条大道。汪公亮在《西北地理》一书里说:“北路经行蒙古……,中路系沿宁夏、甘肃之边界而行……,南路行经宁、甘两省内地”。每到驼运季节,沿路便有数十成百的驼队,运载着绸缎、布匹、茶叶、纸张以及各种洋糖杂货,迢迢千里西往新疆;同时贩回皮毛、药材、棉花、葡萄干及各种畜牧业产品。这不但成为绥新商贸活动的内容,而且也体现着此线是联系新疆、内蒙古及内地的一条主要交通纽带。

绥新驼运商路之南路起自包头,止于迪化,其间大小共计74站,阿拉善盟境内只有一站。这条路线,自包头始,向西75公里至各加尔气;85公里至拍子补陇;又85公里至熊万库;75公里至中国堂;95公里至磴口;85公里至二池子;70公里至平罗县;54公里至宁夏县;83公里至渠口堡;60公里至中卫县;71公里至干塘子;从干塘子西微偏南行30公里进入原阿拉善盟境内第二苏木扎哈道兰巴嘎的楚陇温古茨台(即今阿拉善盟左旗温都尔勒图苏木政府所在地营盘水)。楚陇温古茨台,位长城边外35公里,北靠小土山、东、南、西地形平坦。此处有小塔一座,又有水井数口,水甜,周围一带又是夏、秋两季蒙古人游牧场所。这里曾是清朝、民国时期每年由定远营、一条山至兰州运毛驼队的必经之点,如今又是内蒙古、宁夏、甘肃三省区交界处,是包兰铁路线中的一个小站。从楚陇温古茨台偏西南进入甘肃境内,而后越长城计行50公里抵一条山;又南行82公里至六墩;86公里至兰州;55公里至碱水河;88公里至岔口驿;84公里至双塔堡;51公里至凉州(即武威县);80公里至永昌县;75公里至新河堡;77公里至张掖县;85公里至高台县;67公里至盐池堡;71公里至酒泉县;73公里出嘉峪关抵惠同堡;100公里至玉门县;70公里至布陇吉水;73公里至安西县;80公里至红柳园;68公里至马莲井;从马莲井西北行35公里进入新疆境内的星星峡;83公里至苦水驿;又83公里至长流水;55公里至哈密县。由哈密县抵迪化又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由哈密经噶墩至克苏木台,再经吐鲁番达迪



化。北路则由哈密逾天山山岭,经镇西达迪化。

绥新南路,全长 3400 多公里,经宁、甘两省内地,里程较远。清代绥新南路,对绥新两地交通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两地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重大意义。绥新南路自清末以后,由于战乱和沿途多已垦种,骆驼无可取食,故沿线商人,渐为大减,其路线的经济价值也逐年下降。但乘车乘马者,必行南线,因北线穿越戈壁大漠,车马难行。至民国以后,屡经中外人士的视察踏勘,入新疆之途另有所辟,已不限于嘉峪关一隅,加之南路一带关卡林立,捐税苛重,因此,商旅日濒断绝。

绥新北路,历史亦为悠久,穿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中、西三部,其西部又分数支,构成了中西交通的另一条纽带。拉铁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记载:西支“一由乌里亚苏台经科布多、塔城至俄属西伯利亚境;另一则由古城至准噶尔”。绥新弱路有“小西路”和“大西路”两线,此二线又被统称为“后山路”或“蒙古大草地路”(以别于“阿拉善拉善小草地路”),亦谓“城大道”,所谓“城大道”,在刘文海《西行见闻记》里讲:“因归绥驼户而得名;再者,归化城的骆驼常经此道,故曰城大道”。

小西路起讫于归化与古城(奇台)之间,全线大小 64 站,全程 2250 公里。小西路自归化向西,途经原绥远省土默特蒙古萨宾旗;经乌兰察布盟白令王旗、茂明安旗;在庫伦底儿苏人外蒙古境内,经土谢图汗部之密尔根王旗、土谢图札萨克旗;经三音诺颜部之爱尔登札萨克旗;经札萨克图汗部萨宾旗(喇嘛格根旗)、永贝子旗、沁札萨克旗、托滚累札萨克旗、明安甲敦札萨克旗;由干湖子入新疆镇西县(巴里坤),又经木垒县,终抵古城。小西路路途较之南路为短,而且沿途水草较为丰茂,基本上能够保证人畜饮食,所以,商旅为避免内地捐税之扰,多走此路。

大西路亦和小西路一样以归绥为起点,经茂明安旗,在乌兰鄂博入外蒙古土谢王辖地,至萨宾旗哈拉牛敦与小西路会合为一。有时,商旅因朝脑索尔古及洪果岭二站的流沙难行,亦可“绕道避之”。此绕道路段起自包头,在锡拉苏令人外蒙古境,经土谢图汗部土谢王辖地,抵嘛咪库伦儿,合入小西路。

蒙古大草地路之大西路路短,但站口大,中经流沙,通过较难;小西路路长,而站口小,沿途水草丰富,故为商人多行。大草地路一直延续到1924年,外蒙古独立后,禁止汉商入境,遂为断绝,商人多改道经由额济纳、马鬃山一线,以入新疆,是为绥新中路。

绥新驼运中路,是由归绥起大青山后草地,沿中蒙界西行以达新疆。此路一因绥新南路受当时内战与土匪骚扰阻塞,二因北路在外蒙古独立后商旅越境进出不便,由往来于华北各地与土耳其间的商队所开辟。该路情况甚为复杂,尽管大体上可将其分为南、北两路,但由于山岭、沙漠等自然情形复杂和社会环境变迁,这一路线显得极为混乱。甚至在两路分道后,仍不时重合于途中的某一站。因此,落笔于这一道路的各家对绥新中路南、北两路的记载很是纷纭歧杂。但绥新中路分南、北两线是确定无疑的,下面依黄文弼《第二次蒙新考察记》为据,以黑沙图作为两线分行点起叙。

绥新驼运中路的北线从黑沙图分支后,越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两盟,途经乌尼乌素、人头山、小泉、松稻岭、巴彦翁顿尔、海雅阿马图,在巴彦淖尔盟阿卜顿尔(即阿布特勒)西部进入阿拉善盟。该线在阿拉善盟境内沿行中蒙边界,北绕居延海,大小共计18站。由巴盟乌拉特后旗阿卜顿尔西行40公里至阿拉善盟阿拉善旗银根站(全称银根萨比苏台),此地附近有小灌木林,有井数口,水淡,可供150~500人饮用,离蒙古边境10公里,再西偏北行40公里,途经扎敏敖包(离蒙古边境不到一里),至呼伦布斯格,此站离路3里,有灌木林,无水,在正路上又有名谓“上井”的地方,有井一口,可供100人饮用;偏西北行45公里至班定陶勒盖,该地有前后两个班定陶勒盖,二者都在正路之北。前(在南)班定陶勒盖离路7公里,离蒙境6公里,有灌木林,后(正北)班定陶勒盖离蒙境2公里,前后班定之间的斜向距离约10.5公里,正路有水井,无名,可供200人饮用。在人烟极少的蒙古戈壁途中,多有数十里,甚至上百里的无人、无水、无地名的地带。所以,蒙人习惯把附近的地名转称为途中的某一站点,上述两地的取名正是如此。从班定陶勒盖微偏西北行55公里,出今阿拉善左旗入阿拉善右旗的脑高(即脑干



奥日布格),这里有淡水井一口,可供40人饮用,距蒙古边境10公里,此段水草丰茂;又西北行40公里至察罕点力素(即德力斯呼都格),此站有淡水井一口,可供200人饮用,离蒙古边境亦10公里;偏西北行45公里,出今阿拉善右旗,进入额济纳旗的野冈(雅干),有井数口,淡水,可供200人至500人饮用,离蒙古边境12公里;再偏西北行30公里至好来公,有淡水井一口,可供60人饮用,离蒙边10公里;西行30公里至克克托罗盖(即呼和套勒益),有水井两口,可供60人饮用;西偏南行55公里至乌兰爱里根(今八道桥附近),无井水;北行30公里至塔尔寺(即桃尔思)有井,水甜,可供50人饮用;北转西北行50公里至准扎海乌苏,有井两口,可供50人饮用,西北转西行85公里至库伦宝米(即呼仁宝木音呼都克),有井一口,水咸,可供200人饮用,该站离蒙古边境只有数十米之远,因西部大狐狸山阻隔难行,路线于此站折南而下55公里抵陶拉善丹(桃来三达)有井数口,水咸,一次可供500人饮用;转西北行80公里,途中无水抵哈尔德勒。在这一部分绕折行走中,可以不到库伦宝米,而从库伦宝米以东20多公里处向西南直插至陶拉善丹,也可以不插于陶拉善丹,而在陶拉善丹以北的吉河德查干戈壁转向西北,接路至哈尔德勒。而在这两小插中均无水可饮,但在哈尔德勒附近有井水。由哈尔德勒沿中蒙边境线西行75公里至呼鲁古其古特(枣骝母马之意),此处有井,水淡,可供200人饮用,仅离蒙古边境4公里;西南转西行70公里至清河口(清河口),有井,水虽咸,但可饮用;西行45公里至哈拉善旦,有水味苦;西转西南行55公里,途经甜水井,出今阿拉善盟进入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至红柳泉、又经红柳濠、红柳疙瘩,到明水,与南路会合。南北两路会于明水后,又分前后两路西行。北路出明水接后路,经二架胡桐、大石头、半沟、上马乃、吐胡鲁、盐池、达子梁、奎素、锁面、骆驼井、石泉井、石布里、丁涝坝、底虎沟、黑山塘、二芨芨湖、三盖庄至奇台。

绥新驼运中路南线由今巴彦淖尔盟西南入阿拉善盟境,抵阿拉善左旗图克木苏木巴彦毛道站,此地有小湖,有井数口;再西行20公里至图克木庙,该地有一喇嘛庙;由图克木庙西行34.5公里至新尼乌素,这里有井两

口,可供人畜饮用;西行 40 公里至查干德勒素,有水井;西行 30 公里至通家乌苏(同根乌苏),有井,可供 50 人饮用;西转北行 30 公里至倒不拉(道布诺尔),有井,可供 150 人饮用;又西北行 30 公里经哈日模格台,出今阿拉善左旗进阿拉善右旗,抵古尔班呼都格(三个井),有井,水甜,能供 40 人饮用;西北行 30 公里至哈尔扎干,有灌木林,近处有水,可供 50 人至 100 人饮用;西北行 20 公里至乌套海,附近有水,能供 150 人饮用;西行 35 公里至乌和尔乌苏,有井,水淡,可供 200 人饮用;西北行 30 公里至傲日勒根,有井,水苦;西行 25 公里出今阿拉善右旗进入额济纳旗的乌兰苏海,有井数口,水淡,可供 20 人至 30 人饮用;西行 40 公里至扎干敖包,有井数口,水淡,可供 50 人至 200 人饮用;西转西北行 25 公里至拐子湖(今温图高勒苏木政府所在地),有淡水井,可供 100 人至 500 人饮用(商旅为了绕避税卡亦可从此南下经古日乃湖进入阿拉善小草地路西行);微偏西北行 35 公里途经敖尔勒根,抵达赖呼都格,有井,水咸,可供 30 人饮用,有灌木林;微偏西北行 40 公里至保尔川井,有淡水井,可供 50 人至 100 人饮用;西北行 45 公里至保都格(保都格布日格),在此西渡额济纳东河行 35 公里又渡木林、敖包两河(即西河)达乌兰川井;西北行 65 公里至芦苇井(呼鲁笙呼都格),有井数口,水咸,能供 20 人至 30 人饮用;西行 150 公里,途中无水,抵石板井(阿拉腾乌素)。由芦苇井至石板井的一站,商旅称之为连四旱。所谓连四旱,即由芦苇井起程后,连续四天无所觅水。商旅至此,往往星夜赶路,力图以极快速度行抵下一站,以避渴毙。从石板井继续西行 70 公里,出阿拉善盟入至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红柳疙瘩。由红柳疙瘩西行经马鬃山、公婆泉、盐池等地即插明水,与北路合一。而后出明水接前路行经胡桐大泉、鸭子泉、胡桐窝子、河尾、碱泉子、黄芦冈,即可转抵哈密、迪化等新疆诸地。

绥新中路的南北二线在阿拉善盟境内又称之为“哈绥扎睦”。所谓“哈绥”,其意有二:一是由哈密至绥远之意,二是此线常行哈萨克族商人。“扎睦”意为“路”。绥远至哈密途中水草较丰富的站点都有小卖店,主要经营畜



用草料和小百货。这条西行之路,是一马平川,无高山险阻,南北两线在阿拉善盟境内相距仅 50 公里。因此,来往商旅常常由于避税、避匪、迷路或其他种种原因,由此一路而进入另一路,又由于两路在途中有相会之点而常可换路前进。在商队往返的两个已知点间,只要条件允许,只要有人畜赖以生存之水草,即可就地打尖(少憩、用餐)、夜营。这样走的多了,便踏出新的路线或站点来。这种同向异道的情形在绥新驼路中是屡见不鲜的。绥新中路除上述两路外,还有一条,称之为“阿拉善小草地路”。

阿拉善小草地路,因为经行阿拉善和硕特部牧地而得称。其长 1900 公里,沿途人烟稀少,水草欠缺,行途艰难,只适合驼队,不宜车辆,为天津商人往来之要道。该路由包头西行横过阿拉善,顺傍河西走廊,在其北部的沙漠戈壁地带,择井站而折行(其中可应需而随处转入走廊),终抵新疆哈密。其在今阿拉善盟境内之路线甚为复杂。此路从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东北境向西南至丹勒格郭勒;再西南行 40 公里,经查干德尔斯,抵乌兰呼舒(大水沟,今罕乌拉苏木政府所在地);又西南行 40 公里至永盛隆(三个井,今庆格勒巴嘎所在地);西行 40 公里至塞尔,有甜水井,可供 100 人至 200 人饮用,旧时有王家小店(商),并开菜园一个;西行 35 公里至哈拉毛台,有水,有房屋数间,有小货店;西南行 35 公里,经沙尔呼勒斯,抵两棵树(即浩叶尔毛德),有井数口,水淡,能供 500 人饮用;西南行 30 公里出今阿拉善左旗入阿拉善右旗境,到达巴兴高勒,有淡水井,可供 100 人饮用,有小湖,水咸,称克布勒海子,旧时设有军卡和税卡;微偏西南行 50 公里,沿雅布赖山前段经哈尔乌珠尔至乌可尔乌素(牛泉),有小湖,又有井三口,水淡,可供 1500 人饮用;沿山西南行 45 公里至白石头,有泉水,可供 500 人饮用;沿山西南行 25 公里至野马井,有井,水淡,可供 200 人饮用;西南行 40 公里至红山井(博伦呼都格),有淡水井,能供 30 人饮用;西行 40 公里至莎尔台,有井两口,水淡,可供 300 人饮用;西行 45 公里至梭梭井(扎格图),有淡水井,能供 500 人饮用;西北行 50 公里至努尔盖(今努尔盖苏木政府所在地),有淡水井数口,可供 200 人至 800 人饮用;西行 50 公里至野马泉(毛

仁塔塔拉),有淡水井两口,可供 800 人饮用;由此转西北行 60 公里至芦泉,有泉水,北行 45 公里至腰泉(努如布拉格),有淡水井,可供 50 人饮用;西北行 40 公里,出阿拉善右旗进入额济纳旗境,抵苇坑泉(呼鲁斯图布拉格),有泉水;北行 50 公里至扎格图纳林,并于此渡额济纳河。从扎格图纳林西北行 50 公里至五道明水(塔崩·扎德盖)。五道明水可北接由绥新中路南路之保尔川井南经古日乃湖和查汗套海、股东子而入插小草地路的客商。由五道明水微西北行 65 公里至梭梭井(扎干呼都格),该段路长水源缺少,商旅必须带足人畜饮水。梭梭井一站有井两口,水咸,可供 200 人饮用;西行 40 公里至野马泉,有淡水井两口,可供 300 人饮用;西北行 30 公里出额济纳旗进入甘肃玉门境内的炭窑井,继续西北行经马鬃山抵明水,便与绥新中路的南北两线会合。

绥新驼运中路,包括南北两线和阿拉善小草地路,横穿今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的北部戈壁,西逾阿拉善右旗西北两部 and 额济纳旗南、中、北三部的沙漠草原,在内蒙古西部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路线上的驼运规模在中国畜运史上也是浩大的。据目击者回忆说,在额济纳河常见有商队经过,有时一次就有货驼三四百峰,甚至上千峰,阿拉善小草地路最兴旺时,“驼铃昼夜不断”。由归绥起,空人乘驼,约 40 天可达迪化;驮运货物,则需 70~80 日。每驼驮货以 140 公斤为适中量,运价 90 元,行人至多准带行李 50 公斤,每人雇价 180 元。旅客所有饮食,均由驼主供给,不另收费,路上一切器物、食品,均由驼队备带。驼队出发时常以 17 峰驼为 1 列,由 1 人领管,每 10 列驼归 1 帐篷(为驮户对其一小型组合单位的习称),每篷有先生 1 人管理账目等事。全队有 1 领路人,专负引导之责。每次出发,至少须有 1 帐篷之规模,大家结伴而行,一则可保安全,二则装卸、放驼、食宿等事亦易分派。每列驼备以 13 峰运载货物和人,其余 4 驼则驮载帐篷、口粮、水桶及其他应用器具。为避骆驼在途中掉队,最后 1 驼带有铃铛,“驼铃”一词由此而来。行至某站如预知前站无水,则须由此站备往,以免途中受困。在贸易兴盛时期,货驼经过中路者,1 年达至 10 万之多,即在贸易极衰时,亦在 1



万以上。来往商人，多系有 10 万、8 万资本者，此为中等商人，唯天津帮之德兴合，资本百余万，为商人中资本最大者。

中路经过的主要商品，分为上、中、下三等货类。由天津运往新疆之上等货物有，人参、海菜、绸缎布匹、细筒子茶，还有各种颜料、纸烟和杂货，由新疆运往天津的是鹿茸、狐皮、狼皮等。由天津运往新疆之中等货物有，粗川茶，生烟（条丝烟）；新疆运往天津的有，白羔皮（粗皮）、老羊皮（粗皮）等。由天津运往新疆的下等货有，白糖、红糖、粗布、屏对纸张（文具）及其他杂物，新疆运往天津的有棉花、驼毛、羊毛、葡萄干等。

绥新商人沿途所纳捐税苛重。一路上关卡林立，税目繁多，在今阿拉善盟境内就有四处税卡。主要税目有驼捐、水草税（草头税）等。各卡系属不同，互相独立，自行权力，私制条例。商人虽苦于苛杂，亦无可奈何。其东部的巴彦毛道税卡系属宁夏省府，税率为上等货每担 6 元 6 角，中等货每担 5 元 5 角，下等货每担 2 元 5 角；驼捐为每驼 1 元 7 角；纸烟两大箱约 300 条为一驮，每驮抽税 7 元 5 角。图克木庙税卡属阿拉善王府，每驼抽草头税 4 角。二里子河税卡属额济纳旗公署，税率为每驮物税 3 元，每驼水草税 3 角。石板井分卡（还有公婆泉分卡），系属甘肃酒、金特种消费税局，驼捐每驼收 5 角至 6 角不等。石、公税卡，于民国 24 年（1935 年）5 月，由马鬃山团总张玉麟与甘肃安敦（安西、敦煌）、酒金（酒泉、金塔）两特种消费税局局长合拟税率章条，自民国 24 年 5 月 16 日起正式实行。

绥新驼运，即在绥新商业最不景气的民国 19 年（1930 年）至民国 21 年（1932 年）三年中，由新疆运赴津、绥出口之土产贸易额，尚有 544.64 万元，其内仅羊肠一项即值 240 万元，由津、绥运赴新疆之日用品贸易额，达 271.91 万元，由此足可证明此路意义之重大。绥新中路的运输虽然为因形势的变化渐被阻挠甚至停滞，但在总的趋势上还是不断发展的。随依有关部门的重视及一些国外，国内热心人士和专家学者们的不断踏勘、考察，至民国 22 年（1933 年），绥新之间已奇迹般地出现了长途汽车运输的壮举。

二、逾越戈壁草原的绥新长途汽车运输



绥新长途汽车路是由新疆商人朱炳自 1930 年着手筹办的。朱炳先生曾亲自乘驼从归绥出发,沿内蒙古至迪化,实地踏勘了路线,其返天津后,便计划组织公司,约经 3 年的筹备努力,至 1933 年获准创办“绥新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绥新长途汽车公司”)。公司由商人集资,股本定为国币 30 万元。因汽车所需的一切零件、轮胎、油料等都要在天津采办供应,同时新疆出入的商货与天津联系密切,为便于办理商务联系,公司设于天津法租界五号路 15 号,朱炳为总经理,共有职员 65 人。公司在绥新沿线,设大小站 72 处,其中总站 1 处,分站 4 处,休歇站 8 处,油站 12 处。总站设在归绥北门外宽巷子 2 号,主任牟延寿。

绥新长途汽车公司于 1933 年 8 月 30 日,首次冒险试驶汽车。职员杨星山一行 9 人,驾驶斯伟特牌载重汽车一辆,万国牌载重汽车 4 辆,自归化开赴迪化。此时适逢雨季,一路屡遭阴雨天气,道路泥泞,山洪冲刷河槽沟渠,流沙聚积,车常陷入,行驶困难。途行 29 天,只有万国牌一辆到达哈密,其余汽车除 1 辆于途中损坏外,另三辆皆因新疆军阀盛世才和马仲英之战的时局影响,交通中断,原定由迪化方面输供二里子河以西的所需汽油未能接济,而停滞在距哈密 310 公里的泊子泉,候油待驶。唯有已抵达哈密的万国牌汽车,继续向西开行,于 10 月 10 日到达迪化。这是绥远开抵新疆的第一辆营运汽车。

继第一次试驶之后,绥新汽车公司又于同年 9 月 1 日,申请第二次试驶,9 月 12 日获准。计福特牌 4 辆,万国牌 2 辆,每车载货 1500 公斤,于 9 月 16 日由绥远总站主任牟延寿率领出发。这次行车也受雨后地面松软及流沙阻塞的影响,尤其是海雅阿马图(巴盟境)和居延海(阿拉善盟境)附近,车辆难行。在黑沙图(巴彦淖尔盟境)和察罕点力素(阿拉善盟境)两地,因地面情况极为复杂各损坏汽车 1 辆,所余 4 辆西行 20 日达哈密,由于新疆战局,未能前进,滞哈密两月。后因战事勘定无期,不得不择完好之福特牌汽车 2 辆及第一次完好之万国车 1 辆,载回一、二次两批西行人员,于 12 月 9 日由哈密空车返回。此时沿途地面已干燥,行车比较顺利。过黑沙图



时,将该地前坏之车加以修理,行驶 10 天后,于 18 日四车安全回到绥远。

绥新长途汽车公司两次试车之后,1933 年 9 月 26 日,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组织绥新公路勘察队,聘请瑞典地理、考古学家斯文赫定为顾问主持,调配工程师龚继成、尤寅照及队员陈宗器(天文学家)、般格门(地形考古学家)、赫美尔(医生)、苏特彭(机械员),四队员中三人为瑞典国籍,又有司机唐格拉、史务勤、查孟爵 3 人,夫役李家麟、贾贵、尹富 3 人,次外还有临时招聘的蒙、回民引路者若干人。勘察工作队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于 1933 年 10 月 15 日,由机械员苏特彭率领司机,从北平达归绥,其余人员随后于 10 月 21 日亦至归绥。勘察队经 19 天的准备工作,于 11 月 10 日整队西进,一路历尽艰辛,到达迪化。

又于 1934 年 10 月离迪,经甘、陕等省,在去、归历时 16 个月,行程 15444 公里后,于 1935 年 2 月 11 日返回北平,13 日归达南京。

这次勘察由归化出发达迪化返京,全程共分 21 段,其中三、四、五段,即乌尼乌素至额济纳段、额济纳至明水段,行经阿拉善盟境内,共计 16 站,行程 721 公里。阿拉善盟境内的这一勘察路线与绥新汽车试行路线,虽然部分站名不同,但除额济纳河一段外(勘察队在额济纳区段,勘察了许多地点业进行了考古工作),大多都是顺依绥新汽车路而行。其具体勘察路线是:由阿卜顿尔西行 40 公里至银根,这里周围是灌木林和小草丘地;西行 30 公里至扎敏敖包(在中蒙边界处),此地为石块地,无水;西行 20 公里至乌拉尚德,为石块草地;西行 25 公里至哈日奥日布格(班定陶勒盖近此),地为戈壁滩;微西北行 58 公里至脑干奥日布格,戈壁滩;西北行 20 公里至毕勒期尔(禅尔奔尔、哈尔苏海),戈壁滩;西北行 23 公里至德力斯呼都格(台列生霍托克),戈壁滩;偏西北行 41 公里至喇嘛庙(在雅干附近,为喀尔喀流民搭的蒙古包,人在包内拜佛、诵经,并无真寺庙),此处仍为戈壁;微西北行 30 公里至霍兰宫(好来公),戈壁滩,近有灌木林;西行 12 公里至克克托罗盖,小沙丘地;微偏西南行 55 公里至瓦窑托莱(在乌兰爱里根附近),有湖水,沙砾地;西南行 20 公里,渡哈拉苏海高勒(“高勒”蒙语为河)

抵王爷府。斯文赫定等人组成的西北勘察队抵额济纳时,是九代王爷当政。斯文赫定用原始森林巨木,挖为独木舟,飘荡额济纳河,并曾冒险泛游东海(索果诺尔)。再由王爷府西南行 50 公里,渡数条小河达乌兰川吉,其河岸为沙砾地,有灌木林;西北行 65 公里至芦苇井,同为戈壁沙砾地;微偏西南行 150 公里至石板井,为石块地,再西行 70 公里进入甘肃境至红柳疙瘩(后略)。

绥新汽车路的拟建,虽经一度勘察,并提出《呈铁道部绥新公路勘察队工作报告书》,但以石沉大海文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而告终。而这时民商所办的绥新长途运输公司,已在绥新之间试驶客货运输。其后自 1935 年至 1936 年秋止,日本人又将百灵庙至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百灵庙至额济纳的路线测量完毕。这些勘察和测量对绥新路亦未起任何重大作用。

绥新长途汽车路,由绥远至迪化,共长 2917 公里,全线行车分为三大段,第一段,绥远—乌兰爱里根,第二段,乌兰爱里根—哈密;第三段,哈密—迪化。此路在阿拉善盟境内,额济纳河以东部段行绥新驼运中路北线,额济纳河以西部段行绥新驼运中路南线。

车行与驼行不同,若遇有沙碛难行之处,汽车则须改道或绕行。先前乌兰爱里根至哈密段是北绕居延海,经斯布土台(西尼乌苏)、伊肯高勒(小善旦)等地西行,可因接近外蒙古,时有不安全之虞,实际行驶路线又作了变更,到乌兰爱里根,转北向西北行,越居延海北部至库伦宝米,而后折南,抵哈日敖包或乌兰川古,再转西行。

绥新公路横穿阿拉善盟 900 多公里,途经大小站共计 18 处,东于银根,道路逐渐接近中蒙边界。银根北部的山梁,就是中蒙交界处。从前,汽车自山梁的南面绕过,外蒙古的边卡哨兵随时都可出来盘查,事后多半要给他们扣留,甚至押送库伦。故此后来才改走稍南的现行道路。但是这里距外蒙边界也不过 10 公里之远,仍为外蒙卡哨出入区域,要想避过这段危险区,就得开足汽车马力,时速高达 80 公里,往前直冲。可是在戈壁上车速过高,就有翻车之险。在 1936 年的一次行车中,同行 9 辆车,其中 1 辆翻在银



根,当时重伤2人,还得派专车把伤者送回归化。总而言之,这是一段麻烦区域。从银根偏西北行40公里,时速25公里,达呼伦布斯格;偏西北行45公里,时速20公里,经上井,抵班定陶勒盖。此为休歇站,有税卡,为磴口分卡之小卡,又有小山,形如喇嘛之帽而得名班定陶勒盖。此站东西又有两个大沙河,民国时期,这里设有“西蒙阿拉善旗班定陶勒盖电报局”,还居住有小商,地点较有名气。再西微偏北行55公里,时速35公里~40公里,出今阿拉善左旗入阿拉善右旗至脑高。西北行40公里,时速35公里~40公里,至察汗点力素,入山谷中。此处有油站,居有小商,离边界10公里。

当时,蒙地文化落后,蒙人都未见过汽车,都用惊异的眼光看汽车,甚至把宿地上抛撒的烟香筒、罐头盒都当作珍奇收拾。同时他们也不理解辛苦万分的行旅,有时做出一些极为糟糕之事,使车队人客苦中加难,戒心颇多。如1次有1辆汽车坏在戈壁里,等待零件到后进行修理,可是当地一位铁匠,看上了汽车的铁料,夜间乘人不备,放火烧了汽车,企图得到剩余之铁,这种无知和野蛮都是戈壁地区封闭落后的原因导致的。由察汗点力素又偏西北行40公里,时速40公里~50公里,出今阿拉善右旗进额济纳旗至野冈(雅干);偏西北行30公里,时速35公里~40公里,至好来公,入山谷中,离边界10公里;西行24公里(晴雨能通行汽车),时速10公里以上,至克克托罗盖;微偏西南行55公里,时速30公里,至乌兰爱里根。这里有几座白粉涂饰的新式房屋,是绥新汽车公司车站和交通部设立的小型无线电电报局驻所,周围森林茂密,风景极佳。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台克曼由北平取道新疆回国时,曾在此留住一宵,誉此为“沙漠白宫”。此地也称“巴音陶来”,“巴音”,蒙语意为“富”,“陶来”意为胡杨树,即谓此地富有胡杨林。

从乌兰爱里根北行30公里,时速10公里,至塔尔寺(德尔斯);北转西北行50公里,时速15公里~20公里,至准扎海乌苏;西北转西行85公里,时速15公里~20公里,至库伦宝米(路不经此地,是借用地名);由此南下50公里,时速15公里~20公里,至陶来善丹;南下35公里,时速15公里~20公里,至哈日敖包;偏东南下35公里,时速20公里~30公里,至乌兰川

吉。由乌兰川吉西北行 65 公里,时速 20 公里~40 公里,至芦苇井。在这一折转路段,汽车可由哈日敖包直接转西前进而不到乌兰川吉。由芦苇井向西 150 公里,时速 20 公里~30 公里至石板井;又西行 70 公里,时速 25 公里至甘肃省的红柳疙瘩,再西经公婆泉、盐池、明水至哈密,终抵迪化。

在戈壁草原地带行车,有两种最难走的地方。一是带沙窝性的戈壁,地面外表是坚硬的,但不能受重车的压迫,二是无水沙河,这样的地方,车辆又不能绕行,只得用木棍绳索或柴草枝条作硬衬,汽车在上面过后,再拆一段铺一段,逐段通过,一天中如遇两三回这种地方,就要费尽周折。绥新汽车公司每凑足 7 辆~10 辆客货后即可发车。每一乘客和司机从出发到终途所需要消耗的物件,虽如火柴针线之物,需由自己备带。在一个车队之中,先头之一辆最为重要,等于头领。车队司机不但要有较高的技术和丰富的行车经验,而且要有宽宏的度量。有时,有的司机也许有独出心裁的特别做法,暂时不为大家所了解,引起一些误会。有误会和怨气也不能深究和责发,更不能争吵。有脾气的司机大半是技术较高的分子,是车队骨干,他们容易自夸,对领导者不满。在不好的路上,若有好的司机,也可以度过许多难关。车队各司机,平时各不相下,谁也不佩服谁,然而他们相互间却有一种道德的自然法则存在,大家对于这个法则是无条件遵守的。只要车队里任何 1 辆车出了大毛病或陷在沙窝里,其余车夫助手都一齐来帮忙,来营救。这种行为是不待招呼的,是无条件和自动的。他们的生活极为请苦,白水煮面片,顿顿如此,无其他杂食机会。他们终日奔驰、颠簸,艰辛备尝,因此每人饭量都大得惊人。

绥新路上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有时遇上土匪或日本别动队(抗日战争爆发前即有),汽车不得不返回数十甚至上百公里。乘客里常有去新疆的义勇军家属,他们在东北家乡不能居留,关内亦不能生活,跋涉万里关山,欲存新疆。所以,车上常有许多老人,小孩和女人。女人对于痛苦环境的忍耐力本来就比男人薄弱,她们痛苦难忍,总希望将痛苦倒出来,以得安慰。小孩子总是用“哭”来对待一路苦磨。绥新路途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他们是不会低头的,他们不但能达到目的地,而且对前途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在途中的宿地、乘客、车夫们拿油箱、器物当作餐桌,板凳,这些远行的男女老少们一起围坐在戈壁草地上,举办“同乐会”,在大漠之夜,大家又吃又喝,又说又笑,有朗诵蒙古诗歌的,有用俄语会话的,有唱歌的女客,有说书的车夫……情趣亦颇显丰富多彩。群体的感情交流,激发着长途者热烈兴奋的情绪,这对战胜当时的一些艰难困苦还是有益的。

绥新汽车公司经过 1933 年两次试驶之后,延至 1934 年 5 月 28 日又发第三次车赴迪化。此行客车 1 辆,货车 3 辆。这时新疆境内仍,不稳定,交通仍有受阻情况。直到 11 月份,营运才开始正常,保持每月有去程车或回程车一次或两次,但发车日期不定,完全根据客货数量,在装满吨位并凑足最少 4 辆之后,才组织一次发车。

营运开始之后,交通部随即规定由内地寄往新疆的邮件包裹,不用取道铁路转由西伯利亚运新,而由绥新车队承运,因此,邮件包裹所占货运量的比重颇大。

1934 年全年由绥共发去程车 5 次,计 30 车次,除运载客货,业将其间停滞半途的车辆接回,实际上,本年只有 11 月、12 月两个月行车正常,陆续发车 3 次,计 21 车次;1935 年由绥远共发去程车 10 次,计客货 99 车次,由新疆回程车 11 次,计 68 车次;1936 年全年共发去程车和回程车 19 次,计 169 车次。

这一年冬,新疆东部又发生战事,12 月份完全停运,直到下一年年年初才恢复运行,1936 年实际运行 11 个月;1937 年 1~5 月,西去车发 6 次,计客货车 32 车次,回程车 4 次,计 26 车次。1934 年 11 月至 1937 年 5 月间,往返客运 1177 人,货运 149561 公斤;邮件包裹 135805 公斤。绥新车票:归绥—迪化,客票每人 335 元,归绥—二里子河,每人 180 元。货运运费,归绥—二里子河,每市斤 0.40 元,归绥—迪化,每市斤 0.90 元。

绥新汽车公司从 1934 年 11 月开始正式营运,到 1937 年 5 月停办,所报每月营业收支,全部为亏损。1935 年亏损 32865398 元;1936 年亏损 310065 元;1937 年亏损 119868 元,3 年共计亏损 75858698 元,平均每月亏

损 2615817 元,未有一个月有过盈利。造成亏损的直接原因有六个:(1)由于免费和半费运客,邮件包裹多。(2)许多项目没有达到原计划预定标准,如途中油站大都没有配备汽油,汽车自带汽油最少为 160 加仑。(3)行车消耗多达五项(燃料、润滑油、零件消耗、车辆和轮胎折旧)。(4)属于管理费用的固定开支多达五项(职工薪金、办公费、房租、警卫、息金)。(5)筹备费亦多(包括调查费、开办费、站点设置费、探路试驶用费等)。(6)因新疆战争事影响,运输停滞(1933 年创办后至 1934 年 11 月以及 1936 年末的停滞都受累于此)。但必须说明,绥新汽车运输,自始至终,均由商办,除南京国民政府拨付绥新汽车公司损失补助费 12 万元外,官方从未筹办。收入方面,按绥远省规定,进出口货物均须通过绥远塞北关公署并须照章纳税,运费按货物重量计算,其收入额自然有所根据。支出方面,该公司虽然按月呈报建设厅,但建设厅只作一般了解,一向不加考核,所以表列各费均未经过审定。该公司每月收入数额,全属自行计算编列填报,所报是否真实,则已无法查考,但根据所报营业结果,1 年亏损额高达 30 万元以上,不仅连年亏损,而且亏损趋势丝毫没有减少,这绝不是该公司财力所能负担的。

在绥新汽车运输开办期间,不仅大量普通货物仍由骆驼运输,即适于汽车运输的中上等货物,仍然主要靠驼运。据记载:“自西而东的骆驼队,常常和我们(指车队)碰头,他们载着蒙古出产的驼毛、羊毛,七十里八十里的一天一天的穿过亚洲大戈壁”,“由新疆东来之骆驼千余只,陆续到绥,载运狐貂、紫羔皮、羚羊角等珍贵物品甚多,现归绥间又有大批驼只出发往运新疆存货,绥市商运已恢复繁荣矣”。但是汽车仍起了积极作用,将运输时间大大缩短,为商贾把一些市场急需又有时间性的贵重商品尽快成运以及为行旅尽快达至目的地,提供了较为方便迅速的运输条件,而在通邮,邮运方面,价值更大。

1937 年 6 月、7 月时,时局渐见紧张,“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并向察绥进犯,绥新公司汽车转赴西北或被征作军用,至此,绥新汽车运输便完全停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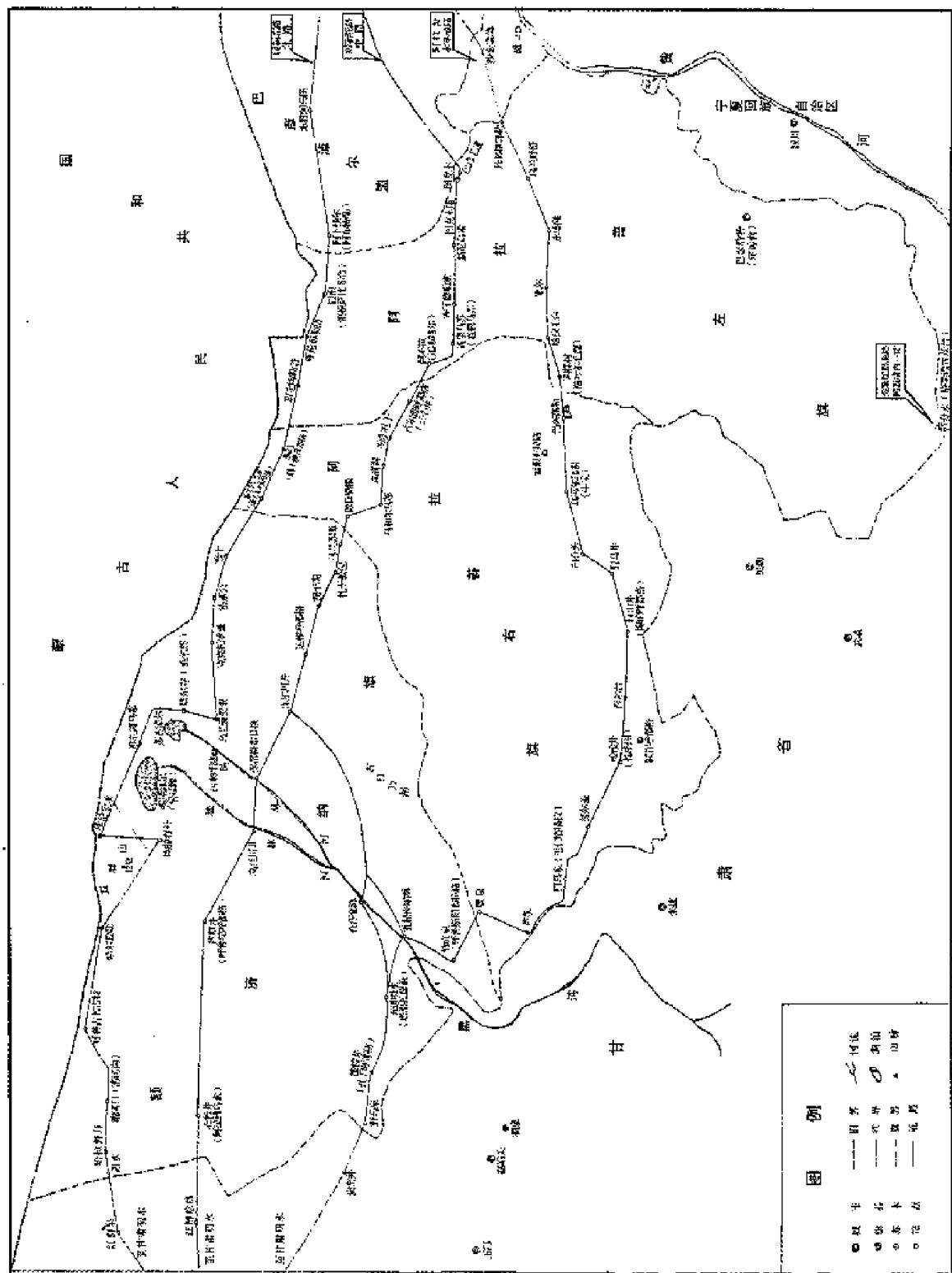


绥新长途汽车运输,从试驶至停驶,前后将近4年,其间受新疆战事影响,实际营运时间则为两年又7个月。自此而后,甘新路便成为连接新疆与内地交通的干线,绥新路的作用便衰退以至消失。

三、结束语

绥新驼运中路和绥新长途汽车路在建国前是阿拉善旗中、北部以及额济纳旗南、中、北三部东西交通运输的主要动脉。绥新驼路,在今阿拉善盟境内虽有站点、里程,但多数系由当地牧民和途经商旅起名和约为计数的,对其地名虽然亦有许多专家、学者的考察资料和其他有关记载,可是鉴于蒙汉音别太大,加之历史的发展亦使地名不断变化,更新,部分路点原无地名,只是借用数十里外之地名,所以,有许多地名、站点现已无法正确考证,只能定其大略。绥新公路,沿线没有桥涵和其他交通设施,实是简而又简;同驼路一样,公路便线也不经过城镇,其所计站点间之里程,亦未经实测,只是概略之数而已,然而正是这种“概略”,却在记叙和充实着这荒漠中的历史。

绥新路,虽然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渐已荒衰甚至废弃,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自唐代它就是北方“丝绸之路”的一支,是中原地区同西域及西亚、欧洲地区的人民联系和交谊的纽带。延至近代,绥新之间开创了汽车运输,长穿北疆漠地,这在自有汽车以后的中国交通史上是少有的壮举。它把新疆、甘肃、宁夏等大西北的丰富物资运到归绥,又运转平、津,行销国内外,同时又从平、津经绥远运入新疆等北地需要的工业和生活用品。在其通车的几年中,通运邮件包裹,甚至免费运送开发西北之有志者及教育书刊,这更是意义别具,功劳特异,这对以交通为手段促进西北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在当时外蒙古独立,道路艰难的历史条件下,绥新路的开拓者们坚定不移的迈向前去,这些先驱者们的精神是可歌可赞的。此外,这条道路沿经中蒙边界,横穿内蒙古西三旗,仅在此一处即有近千公里之长,这又有着重要的国防和军事意义。直到今天阿拉善盟境内东西走向的草原公路,基本上还是根据绥新路迹修成。因此,可以说绥新路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附图一

阿拉善盟境内绥新驼路路线示意图

蒙古族的发展与西蒙地区的人蒙古国驼道

白·那音太

蒙古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她繁衍在塞北大漠高原,与黄河中、下游之华夏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早从公元2世纪或更早的石器时代,北方各民族、部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亦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至13世纪初期,史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使蒙古民族迅速地从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元帝国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在全国各地开发通运、设置站赤(驿站),使塞北与中原间的经济关系、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到了明、清至民国时期,蒙古人南下的各种交往,在较固定的路线上进行。这些路线自东至西主要有四条:第一条为张家口赴库伦商路,即张库大道(俗称西路)和张库电信路、牛车路、邮政路四路;第二条为归绥至外蒙古古商路,即止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前营路和后营路,止于库伦的大西路、电信路与公主路五路;第三条为包头至库伦商道;第四条为西蒙驼道。在清、民时期,上述路线的贸易十分繁盛,仅张家口一地,在咸丰十年(1860年)至民国7年(1918年)这近60年的时间里,尽管是以牛车和骆驼为运输工具,每年贸易额已有口秤1.2亿万两之巨。民国7年通行汽车后,商业更加繁荣,进出口贸易额达3亿元,至鼎盛之点。

西蒙,也称之为“西套蒙古”,范围大致在阿拉善和硕特和额济纳土尔扈特两旗地区。西蒙驼道,以阿拉善首邑定远营至外蒙古古库伦和额济纳旗府达来库布至库伦这两条路线为主,其路线主要用于外蒙古人与西蒙两



旗及甘(主要是河西走廊)、宁、陕地区各族人民进行各种商务活动,还用于外蒙古西南各部蒙古人南下进入青海西宁或西藏拉萨甚而出境达印度等南亚国家进行宗教活动。西蒙与外蒙古,与其他蒙古部族一样,历为一个蒙古宗系,然而,这大统一的蒙古又为何有东、西、南、北、内、外之划分呢?其伺西蒙地区北向道路的具体,情形又是如何呢?下面我们即从一些有关情形的分析入手,予以粗浅的解答。

一、蒙古族之族源

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雏兴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蒙古高原至中亚内陆的干燥地区,有匈奴、东胡等民族繁衍、生息着,他们被统称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他们为觅求良好牧场而常此移动游牧,这种逐水草而迁徙,随季节而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人口和牲畜都经常处于游离状态,是在“动”的基础上求得生存和发展,成为人畜并重,人随畜迁的“行国”。这样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经常出现时而分化时而融合的局面,各部落及各民族亦随之时兴时衰。以后一举登上历史舞台的蒙古民族,其民族源流不但同古代北方各族的繁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其本身就是这种各部落及各民族盛衰兴亡、分化融合历史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长期以来,对于蒙古民族的族源,有关史籍中的记载以及许多中外蒙古史家都有种种说法,并争论不已,总括诸论,主要有匈奴说、突厥说、吐蕃说、东胡说四种。据国内外学者论证,主张匈奴说者,有如国内之方壮猷先生从语言学方面的比较,著《匈奴语言考》,另外佟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和黄文弼《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也有此说;在国外,日本白鸟库吉的《蒙古民族起源考》(何健民中译本名为《匈奴民族考》),俄国俾丘林的《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集》,蒙古人民共和国策·道尔吉苏荣的《北匈奴的故墓》和纳·业喜扎木苏的《匈奴之起源及其社会制度》等,也都是坚持匈奴说法。主张突厥说的有宋人孟琦著《蒙鞑备录》,有“元史一骄子”洪钧,有法国的多桑著《多桑蒙古史》等。主张吐蕃说者,有清初的小砌辰萨囊台吉著名

著《蒙古源流》，还有明末成书，为无名氏所著的《蒙古黄金史》等。除上述几种说法外，东胡说，较有论证的说服力，成为主流说。

东胡，是原居于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因在匈奴以东，称为东胡。《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记载：胡众部以牧为生，各自举酋长，氏族融为部落联盟，尚未形成国家政权。又说：紧联室韦与蒙古族源之看法是确切的。东胡约跟匈奴同时存在，在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和老哈河流域游牧，包括众多族属相同，地域相连，习俗相似，语言相近，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主要有乌桓、鲜卑、契丹、室韦等。在两汉、三国、两晋时期，乌桓、鲜卑活动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地区，南北朝、隋、唐时期，这里有室韦等活动。唐代室韦部落众多，“蒙兀室韦”即是其中之一。唐代蒙兀部就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活动。约公元7世纪，蒙兀部西移，逐步进入克鲁伦河、土拉河和鄂嫩河的上游地区，但强大的另一支仍然留居呼伦贝尔，后来之成吉思汗部众的发展壮大也在这一带。所以，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蒙古族的发祥地。语言上，蒙古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胡人的语言乃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而鲜卑、室韦、契丹人的语言，具有一脉相承的遗传关系。研究匈奴语、东胡语及丁零语的马长寿先生在《北狄匈奴》里总结说：“东胡语族的后裔包括各个不同时期的乌桓、鲜卑语族，契丹语族，蒙古语族等等”。蒙古族学者亦邻真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源》一文里形象生动地比喻说：“如果把东胡后裔诸语言比作一棵古树，那么可以说树干和好多枝梢都已枯死了，只留下个别树枝移植在新的土壤上，又长出了新的树干和枝梢，形成了现代蒙古语。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东胡后裔诸语言就是古代蒙古语”。另外，对《宋书·谷浑传》《北史》《元和郡县志》等书中的一些词语的考证，以及内蒙古大学语文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部分研究成果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些考古资料还证明，东胡人属于蒙古人种，鲜卑、乌桓、契丹人的发式、体形、相貌与蒙古人相近，生活习俗及葬式也相近。如“蒙古包”的制形即同东胡后裔相近。《魏书》云乌桓人“以穹庐为宅”，《北史》载吐谷浑人“庐帐而居”，《南齐书》称柔然人“所居为穹庐毡帐”。由



此可知,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各种民族成分,既有被融合了的古匈奴人成分,又有曾“威服塞外诸族”的突厥人后裔,更有近亲东胡系统的诸后裔,是由我国古代北方各族混血形成的。但形成蒙古族的核心还是蒙古族部,其祖源为东胡族。

对于“蒙古”名称,《辞海》上解释说:“蒙古,民族名,最初出现于唐代记载,称‘蒙兀室韦’。两宋、辽、金时,史籍上有‘萌古’,‘朦骨’,‘蒙古里’等不同的汉字音译。初居额尔古纳河流域,后逐渐向西发展到鄂嫩、克鲁伦、图拉三河上游肯特山一带。13世纪初年,蒙古部的首领成吉思汗统一了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蒙古”在史籍《旧唐书·北狄传》里称为“蒙兀室韦”,在《新唐书·室韦传》里称为“蒙瓦室韦”,《宋史》称分“盲骨子”,《辽史》称为“梅古悉”,《契丹国志》叫“蒙古里”,《大金国志》为“朦骨”,《元朝秘史》称“忙豁勒”,王国维《观堂集林》称为“萌古”等等。“蒙古”一词则出自《元史》和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中。

“蒙古”一词的意义,众说不一,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云:“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贞名其国曰大金,故鞑人名其国曰大银”。拉斯德《史集》说:蒙古是“质朴无力”的意思。《多桑蒙古史》云:“蒙古云者,犹言简朴而孱弱也”。博明《蒙古世系谱》云:“先是国号必达,至是(铁木真称成吉思汗时,质言之,即1206年)始称蒙古,以其剿定诸国,故曰蒙,取居中驭外之义,故曰古”。俄国史密特说:蒙古是“勇悍、朦昧、愚暗”的意思。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注释曰:“故蒙古云者,即长生(或水恒)的部族之意”。还有杜燕山、曾汉珠、张海峰在《亚洲各国国名的由来》一文里说:蒙古“其名来于蒙古族名即勇猛的人,加上地名接尾词而成,意思是勇猛民族之国”。另外,樊保良先生在《蒙古族族源述略》里论证说:道润梯步的注释“从训诂、释义方面,似有一定道理,含意也较吉祥、美好。mongne(长生)gal(炉火),因语言和谐律的支配,而变为monggol(蒙古)。此可谓:炉火长存,炊烟四起,人畜兴旺,民族永生”。由此看来,“蒙古”释意,诸说纷纭,究竟何说为是呢?从蒙古东胡说看,蒙古之前身

非是弱族,也无异族奴役的历史事实,其在古代北方民族中一直占有强大势力,这是后来统一北方各族的基础所在。从其特性与技能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土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为生并;急则人习战攻侵伐,……利则进,不利则退”。蒙古人性硬骠悍,善骑射,有古“斯巴达”风;乘驼驰马,虽孺妇亦甚精熟,故有“骑马民族”性格,又有特别之侦察绝技(若追踪技术,即如飞禽野兽家畜所过之地,留有足趾痕迹,只略加察看,便能辨其为何种动物,即是时过十余日,如无极大风雨淹没,终能按图索骥,侦得踪迹);年轻蒙古人,身壮力强,常以勇力决斗为嬉。至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族形成后,大规模的战争事实,更无法论证“蒙古”是无力、孱弱者。从意识形态方面看,若无超群之智慧和才能,也不可能战胜优秀文化的其他民族。其道润梯步和《亚洲各国国名由来》一文及樊保良先生的论证接近历史事实和蒙古族的性能特点。其余学者的几种说法,不晓所执何据,尚难置信。总之,蒙古民族的历史研究由于政治政策的束缚和许多人的忌心忧虑,尚在空白境地。研究北方诸族及后来形成的蒙古族的历史,必须与南方之发达的华夏民族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求得完整的答案。在历史的进程中,南北民族共同繁衍,相互来往,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东方文化。

二、民族大融合

我国古代北方诸族,与早已固定下来的长城以南的汉族(以中原为中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汉族则为长期以来混杂溶合各少数民族血缘的民族共同体。北方游牧民族为得到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铁制工具、谷物、布匹和工艺杂品,都必须与中原农耕社会汉族建立“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的密切交往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牧歌放羊常此欢乐,亦非一帆风顺常此相易,他们之间时而友好融合,时而各居所割,时而刀血交锋。古代时期,自北方民族强盛以来,蒙古高原上的阴山、鄂尔多斯草原的沃野不仅是这些民族游牧军事政权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强渡黄河,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成为历史上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争夺利益的古战场。《汉书·匈奴传》



记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1898年~1968年）说：“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在战国时期，匈奴统治者为了满足其更高水平的物质精神享受需要，经常出没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部一带，发动武装掠夺，使燕、赵、秦诸国北部边城受到侵扰。《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提出实行“胡服骑射”的主张，就是采取了学习胡人特长来制服匈奴等“胡人”的决策。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西汉初年，匈奴奴隶主势力空前强大起来，又发动以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战争，极大地威胁着汉朝。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兵出击匈奴，经平城白登山之战，因双方势力巨差，便改取了“关市”，“和亲”政策。文帝刘恒时，企图以“万里长城”隔绝内外。这在《汉书·匈奴传》里记为：“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语言不同”。“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来则征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对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抱以歧视态度，企图关闭经济文化交流之门。这样汉匈关系便时弛时张。元光二年（公元前113年），汉匈关系恶化，武帝刘彻派卫青、霍去病兵伐匈奴，迁民屯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再次兵击匈奴，打通河西咽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又派强弩将军路博德屯军居延海（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并在南起酒泉，北至居延的弱水（今额济纳河）流域构筑一系列城、障、亭、燧，称为“遮虏障”或“居延塞”。以后汉匈关系改善，和亲通关市。西汉后期以后，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战败出走，与汉族联合，共同杂居，而北匈奴控制西域诸族，继续与东汉和南匈奴武装对立。于是永元一年至永元三年（公元89年~公元91年），汉和帝刘肇派大将窦宪、耿秉、耿种等与南匈奴单于联军三次大伐北匈奴，北匈奴彻底瓦解，率余西逃。乘匈奴内裂和北匈奴西迁之机，东胡族崛起的鲜卑拓跋部落占据蒙古高原。后拓跋圭建立了政权，即民族大融和的北魏。在魏晋南北朝时，有许多民族杂居内地，绝大部分融化在中原汉族之中。隋末，朝廷腐



败,豪阔角逐,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为了逃避战乱兵祸,中原地区的很多汉族人民迁徙到北方突厥地区。以后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求得突厥援助,唐朝与突厥关系日密。贞观至开元年间,突厥内裂东西汗部,东部灭亡,其部落降唐,太宗李世民,收其居于内地,对突厥酋首,朝内封官,渐渐改俗,同汉族融为一体。武则天又加强西域联系,设立“都护府”。在这一时期,唐王朝廷许多文武大臣,来自突厥、回纥、契丹和西域诸族。后来之“安史之乱”,朝廷兵困,用重酬招来回纥兵,才得平息。五代十国、宋、辽、金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相当复杂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呈时战时和局面;又有北方契丹、女贞、党项、回纥诸半农半牧民族大量迁进中原与汉族交插定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同时,中原地区的大批汉族工匠和农民迁居到女贞地区,长期与共,渐从胡俗,又融变为女贞。

12世纪初,蒙古族崛起额尔古纳河流域,他们主要经营粗犷的游牧、狩猎并生产。在10世纪左右,蒙古人和中原汉族,和吐蕃及西域诸族的商人用牲畜、毛皮换取绢帛、铁器。《契丹国志》记载:蒙古人“唯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12世纪后,中原铁制器皿和钱币流入蒙古地区,蒙古人用以改制为生产工具和武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众部后,举兵大伐南方,铁踏中原地区,兼并南宋,给中原地区汉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内地生产和经济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如此长达半个世纪左右。元世祖忽必烈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劝农屯垦,修整水利,清理土地,建立村屯,整顿户口等,这对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也对加强蒙古族与中原汉族之间长期形成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相互依存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元朝的大统一,无论在疆域,还是在民族种类上,都达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融合程度,今日中华各民族即在其时基本定形。元朝为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广泛的道路,其遍设站赤(驿站),“通达边情,宣布号令”。蒙古地区生产的牲畜;毛皮等输送到中原地区,对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源,蒙古人换回布帛、粮食、手工业产品和各种生产工具,许多汉、回商人深入蒙古草原腹地进行以商



业贸易为主的经济交流活动,也促进了蒙古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据有关史籍记载:13世纪初,蒙古漠北高原上的哈尔和林一带和克鲁伦河流域,兴修水利灌溉,耕种粮田,有蒙汉杂居的居民屯落,农业、手工业生产得之发展。但是到元朝末年,由于蒙古统治者制造民族隔阂,挑拨民族矛盾,引起各民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终于导致了其自身的崩溃灭亡。元灭后,蒙古人回到了自己的草原、山区。又由于明朝统治者对蒙古封建主不断进行征伐战争和蒙古内部长期进行自相争夺雄长的战争,使蒙古社会更趋衰落。在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里说:“蒙古彼此劫掠,他们并劫掠其邻近的游牧民和定居民。掠夺性的袭击已成为正常的职业”。从前蒙古地区与中原所保持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在烽烟相继,战马频嘶之中完全停顿了。商路荒废,商旅往来绝迹,居住蒙古地区的工匠、农民完全消失。从前的关市、交易点被匪盗占据。蒙古人为了获得必需的生产和生活用品所进行冒险掠夺战争,往往要付出巨大的残酷的血的代价。蒙古社会的这种动荡不安,分裂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这是蒙古民族形成以来,第一次的大衰落,也是第一次与中原汉族的大割据。至16世纪初,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高原,社会局面相对安定,生产得以恢复。16世纪中期,达延汗之孙俺答汗即位后,率部强居今阴山南麓、鄂尔多斯、呼和浩特等地区,组织蒙古人向内地农耕居地区移牧。在经济上又以各种形式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中原汉族进行商品交换,主动招纳破产流亡的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迁来定居,号召牧民学习耕作技术。这样明、蒙封建主关系得到改善,双方通贡互市,进行贸易,从而促进了蒙汉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逐渐形成民族融合的新局面。明末,朝廷腐败,中原内乱,内地为生活所迫的汉族人民和反抗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而起义失败的农民军,因“草地自在好过”,投奔俺答汗诸部者数达千万计。王琼《北虏事迹》中说:“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明长城),北至青山(阴山),东至威宁海(今察右前旗黄旗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疏圃,与中国

(内地)无异”。内地迁来之大批汉人和广大蒙古牧民一道,从事蒙古社会生产,这些汉人亦逐渐学习蒙人习尚风俗,与蒙古族人融化一起,被称为“汉夷”。

北方诸族与中原汉族之间以经济交流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往来关系,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之间的彼此吸收、融合、同化便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而从北方不断输进的大量的牛、马、驼、驴、骡、羊和其他各种土特产,为汉族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也为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畜动力。许多具有优良传统的独特的游牧民族文化,也丰富于中原文化的宝库。同时,中原输入北方地区的粮食、布帛、茶叶、铁器、手工业产品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对改善游牧民族的物质生活,提高其文明程度,促进其生产力,发展其社会经济,又具有重要的意义。

1664年,清军在蒙古各部和汉军八旗从征的配合下,兵进山海关,攻占北京,窃夺于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一举定得天下,建立于以满、蒙、汉封建主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大清帝国。清王在入关初期,推行“圈地”、“剃发”、屠城等野蛮政策,引起了汉族人民强烈反抗。统治者为防止满族被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汉族自然同化,曾屡次下令:禁止满洲人学汉人装束,禁止满洲人和汉人通婚,禁止各省的八旗驻军和汉人杂居,禁止满洲人经商和务农。同时,为防止蒙古东移和汉族农民前往垦土耕种,将东北视为“祖宗发祥之根本重地”,实行封禁政策。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可以征服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中国各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时期的历史无不如此。

蒙古发源及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史说明,蒙古民族的历史在兴而落、分而合中得到了发展。自元灭以后,蒙古民族经历了自己最艰难的历史时期,达延汗统一后,蒙古社会重新兴旺起来。到明末清初时,蒙古再次内讧,以



蒙古大漠为天然界线分裂为漠北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带)、漠南蒙古(今内蒙古阴山以南地区)、漠西蒙古(卫拉特蒙古部)和青海蒙古等,基本定形至今日的模样。今又把内蒙古从方言和地理环境的不同上分称为“东北蒙古”和“西北蒙古”等。清朝初期,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与清朝都有一定联系。当时,漠北蒙古分成三部:土谢图汗部,居住在土拉河流域;车臣汗部,居住在东部克鲁伦河流域;札萨克图汗部,居住在杭爱山西麓。后金(清)天聪(爱新觉罗皇太极)九年(1635年),车臣汗硕垒向皇太极“上书通好,贡驼马”,崇德元年(1636年,是年改国号为清)以后,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也“相继至”。崇德三年(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向皇太极贡驼、马等。《喀尔喀内属述略》记载:皇太极下诏“岁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以为常,他物毋入献”。漠西卫拉特是明代瓦剌的后裔,明末清初分四部,也称“四卫拉特”联盟。其和硕特部,16世纪居住在今乌鲁木齐一带,17世纪初,迁居青海;准噶尔部,居住在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部,居住在塔尔巴哈台一带;杜尔伯特部,居住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崇德二年(1637年),和硕特顾实汗遣使向清朝进贡,这是卫拉特蒙古臣服于清朝的开始。

康熙时卫拉特的准噶尔部上层封建主发生了争夺权利的斗争。康熙十年(1671年),在争夺战争中,噶尔丹获胜,自立为准噶尔汗,又先后吞并卫拉特各部,占领南疆地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一举兵败喀尔喀诸部。喀尔喀的宗教首领大喇嘛哲布尊丹巴等认为蒙古与内地有悠久的历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清朝相同,因而决定率领部投清朝。清政府安置他们在科尔沁草原游牧,并责令噶尔丹罢兵,归还喀尔喀牧地。噶尔丹为了实现他的掠夺目的,不但不听,反而加强了攻势。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一举南伐打到内蒙古乌珠穆沁境,南距北京只有900里,清朝统治者大为震动。这时清朝在汉族地区的统治,得之稳固,康熙遂下决心平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亲自率兵,转战于大漠南北。这时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看到噶尔丹冒险对喀尔喀开战及与大清公然发生冲突,又由于形势发展渐为不利,对其深

为不满。最后准噶尔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了分裂。加之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据伊犁,积极支持清军平叛,这使噶尔丹的后方处于严重危机。最后经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和昭莫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两战,噶尔丹大败,四年后病故。此后,喀尔喀各部回到了原来的牧地,其封建主接受了清朝的王、贝勒等封号,各部设旗,推行了札萨克制度(共设4路6部,119旗,257苏木)。此外,清朝还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派驻了将军和参赞大臣,对喀尔喀诸部实现了更有效的统治。在康熙平叛的同一时期,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和罗理率部迁居阿拉善地区游牧。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政府将和硕特部编为阿拉善和硕特旗,使其定居牧之,并直属清廷理藩院。此后,卫拉特蒙古的另一支土尔扈特首领阿拉布珠尔率部移居嘉峪关外,后游牧额济纳河流域,清雍正九年(1731年),名为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并为其牧地,归陕甘总督节制。这就是西蒙二特别旗的来历,而世人谓之的西蒙地区亦即主要指这两旗地区。清政府臣服漠西、漠北蒙古以后,蒙古社会局面稳定下来,蒙古与中原汉族的经济贸易关系得之恢复。这样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交通通道。道路的沟通,可使蒙古王公南下进行各种行政事务活动,亦使蒙古人可用畜牧业产品换取自己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清朝中期以后,最为盛行的是蒙汉之间所进行的各种商业活动,以天津、河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一带的汉、回族为主流的商人深入蒙古内地定居经商,使蒙汉关系亲密起来。许多商人通过西蒙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北入外蒙古各部。时而久之,在西蒙地区就产生了较为固定的两条商业路线。一是从宁夏平原北起,经阿拉善和硕特旗首邑定远营,直达外蒙古库伦,我们称其为“定库驼道”(定远营至库伦),定远营以南为西蒙通向内地道路,有宁定大道(宁夏至定远营)等;另一条是从河西走廊各郡县北行,经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府达来库布,抵外蒙古的库伦,称为“达库驼道”(达来库布至库伦)或“居延北路”,额济纳以南为土尔扈特人与河西地区的来往路线,称“居延南路”有达酒路(达来库布至酒泉)等。此二路为内蒙古最西部,通入外蒙古的路线,可



称“西蒙之人蒙古驼道”此虽为外蒙古独立以后的道路命名,但考其道路本身,二路却是古已有之,历史悠久。居延道路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匈奴时代。王北辰教授在《古代居延道路》一文里说:“西汉初期,居延道路在匈奴控制区中,随着汉对匈奴斗争的逐步胜利,居延道路才逐步归为汉有”。又如世界著名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涉足居延南、北路,尝试了戈壁旅行的酸甜苦辣。成吉思汗在强灭西夏的战争过程中,也曾利用过这些道路。据史籍记载,北方诸族很早即在贺兰山一带繁衍生息。从中国民族融合史里看出,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就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关系。生产关系与道路交通是一个辩证的统一关系,有民族与民族的来往,必然在各民族聚居地区之间形成交通道路,只有有了交通道路,才能沟通族与族之间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来往,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红线。所以,有南北民族的关系,必然就有南北之间的路线形成,定库驼道和达库驼道也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

三、定库驼道

定库驼道,又称“喀尔喀扎睦”,“喀尔喀”是外蒙古喀尔喀蒙古的部名,“扎睦”,蒙语为“路”,因外蒙古喀尔喀人常此南下至定远营经商,故叫“喀尔喀扎睦”。阿拉善和硕特旗王爷府定远营城,据记载,有近300年的历史,清雍正八年(1730年)时,定名为“定远营”。定远营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为塞外重镇,亦为草原名城。据《定远营碑文》记载:“贺兰山北,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定远营城东有贺兰山,北靠施林花荣(营盘山),城半山而居,亦随山势绵延起伏,东山惹云雨,北山挡寒凜,致使此一城区气候湿润,夏不感三伏炎热,冬不受三九酷寒,春、秋季节,更是天气温和,群花盛开,香飘十里,使人心旷神怡。城市内多行多业,商业繁荣,人民亦安居乐业,亲切好客;定远营历无兵匪之患,交通四通八达,来往之游客,无不流连忘返,称之为“沙漠桃园”。市内民宅、街道均仿照北京城的式样。据说城内建筑以汉文“主”字为形,有宏伟壮观的如意堂,有精致秀丽的亭台,又有人工假山等。在贡桑珠尔默特王爷时期,西花园一带,建有花池,修筑有一条名叫“长

河”的很长的渠道,引入三道河沟流水,用以摆渡游船,还栽种名花异草,培植果树。定远营因其风光佳丽,建筑奇翹被人视为“沙漠北平”,又被称作西蒙古的“小北京”,为西蒙最发达的城市而吸引着漠西、漠北的蒙古牧人。定远营至外蒙古库伦一道亦即在这样的情势中被开通和渐为盛行起来。在这条道路上,两地政府之间和蒙古牧民之间以骆驼为交通运输工具、相互来往。这种往来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军事方面。康熙平定噶尔丹后,喀尔喀蒙古与阿拉善和硕特蒙古辖于大清版图,隶属理藩院。其理藩院关于两地事务的公文信件,经阿拉善定远营转递库伦。反之库伦一些书信也经过定远营送入内地。民国时期,也有行政公文来回传递。阿拉善旗紧在外蒙古三音诺颜汗部正南,外蒙古独立之后,首先借依军事力量积极南伸。20世纪30年代初期,外蒙古方面为警惕阿拉善方面,沿着阿拉善旗北部边界建立了许多防卡,在察汗乌伦庙(原属东大公旗,后划入阿拉善旗)、上报达赖和古鲁班三行(外蒙古境)等地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军事基地。以后更进一步在班定陶勒盖(定库路途中的重要一站)以北的孔都苏山(阿拉善旗境内)构筑了好几座坚固的堡垒,控制着绥新公路中点的班定陶勒盖。民国36年(1947年),民国《和平日报》登载:“如果国际间起了变化或外蒙古入侵,阿拉善旗是首当其冲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该是外蒙古军事和政治势力驍驍南下,大有席卷内蒙的野心”,又说道,“今日的阿拉善旗是国防上最前线的一块荒漠原野,它遏止着外蒙古向南的进展,捍卫着河西走廊的武威,庇护着西北心脏的兰州,扼守着绥新公路的咽喉。如果阿拉善旗一旦有失,唇亡齿寒,武威、兰州和宁夏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整个西北跟着这个地方的不安而动荡”。于是定远营必然成为西北国防前线的重镇。国民党政府在阿拉善旗设立保安大队,其人数、武器都较为可观,可动用的骑兵即有500名,另有步兵2000,枪支3000有余,又在沿阿拉善旗北部,交界处银根、班定陶勒盖、脑粤爱力不差、野冈(雅干)等地设立了防卡,但这些防卡名为防卡,实非防卡,无一兵卒,只是牧民点而已。这样民国时期的定库驼路基本上畅通无阻,两地人民可



以继续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已顾不上蒙疆事务。1949年4月,大蒙古主义者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经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定远营搞起所谓的“蒙古自治运动”,企图冒险实施“大蒙古国”。这一时期,德王与外蒙古在定库路上密信来往,送换礼品,又在定库路的巴伦沙尔札庙及沿路的拐子湖、察干陶勒盖等地设立联络地点。不久“蒙古自治运动”崩溃,德王从定远营向北逃窜,德王、图门德勒格尔一行兵马64人,途经笔者之父家,兵马食宿三日,而后达图克木庙,西经定库路沙日咱庙站,入拐子湖,转而进入外蒙古“蒙古自治运动”崩溃后,德王的军队失首领,无军需,在阿拉善700里草原上,变为匪军,到处抢掠,给阿拉善、额济纳两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幸,阿拉善人称其为“红靴子”或“穆特尔”。其后阿拉善旗政府出兵平匪,枪决了个别匪首,使其部分迁入甘肃境内,其余定居阿拉善。德王军中之东北蒙古族人,文化较高的多定居在阿拉善旗,其中有人任笔帖式等职务,对阿拉善文化发展亦起有积极作用,还有一些军医对阿拉善旗医疗卫生事业也颇有贡献。德王入蒙后,外蒙古政府首先以革命教育方式对待之,后因德王与美国、日本、国民党有种种关系而将其逮捕入狱。1950年9月1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德王给中国。其在回国时说:“希望把我押到阿拉善旗去,按照纵兵殃民的罪行明正典刑,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又说:“我在阿拉善旗的罪过,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假如我能从监狱出去的话,愿向阿拉善旗被害的人民请罪,任凭阿拉善旗人民处理。”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被引渡到中国后,经过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德王在晚年进入政治思想的大转折,后在呼和浩特病故。

其次是商业贸易方面。这是定库路使用的主流,其中商业规模最大者是天津、包绥、陕西、山西、宁夏、甘肃一带的汉商、回商。他们深入阿拉善草原和外蒙古库伦,与蒙古人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定远营之商业为西蒙最发达者,有记载道:从清同治六年(1867年)开始,经光绪、宣统年间,至民国27年(1938年),不过几年就有一个新商号开办营业,特别是民国年间,几乎一年增加一个新商号。据有关资料统计,定远营城内外共有116家商号,

其中甘肃民勤商人占十分之四,山西商人占十分之三,其他宁夏、包绥、山东、河南、河北商人占十分之三。在各商号中,又以祥泰隆、永盛合、兴泰合、万泰永、兴泰隆等 27 家资本为最大。据说祥泰隆商号与定远营城是同一时期形成的。祥泰隆不仅历史悠久,且资本雄厚,交易范围广大,久负盛名。阿拉善之商业不只集中在定远营,各商号之分号已普及全旗或伸入外蒙古深处,商业十分繁荣。

清朝初期,禁止汉人进入外蒙古经商,但社会发展规律不允许这种禁令长期存在下去,以后规定在库伦、戈雅特、乌里雅苏台、哈尔乌苏、多伦湖等地定点买卖。乾隆二十四(1759年),库伦大臣桑哉多尔吉,因贫穷蒙古人不能到达定点买卖,禀皇帝,求汉商在各旗自由经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令:曾蒙地汉商广供蒙人日用生活品,生计有意,法外赐恩,蒙汉和睦生息。从此外蒙古之商业亦逐渐发展起来。至蒙古革命以前,外蒙古的商业命运,全部掌握在内地汉商手中,其时定库路之外蒙古境内段上的商业规模很大。但革命爆发后,因蒙古执行苏联政策,加重捐税,俄商速增,许多汉人陆续回国,汉商规模便大为小缩。沿定库路北行抵外蒙古的拜申图,蒙古革命前此处有汉商 100 余家,革命后,仅剩京帮之信源号等四家,甘商合盛和一家(本号在定远营),有北京人、甘肃镇番人、宁夏人等,输入靴、帽、布匹、器皿,输出马、羊、驼、驼毛、羊毛、羊皮,运往天津。由拜申图再北行(入达库路西段)至杭爱山麓之翁金河,汉人转言谓“恩京河”,这里有汉商十余家,俄商几家。又抵三音诺颜汗部(其部如同我国一省),从前这里华商很多,后留原来三分之二,约 30 余家,俄商增为 10 余家,还有理发部,洗衣、缝补等其他行业。革命前汉商最盛时期,仅库伦即有 25 万汉商,独立前尚有 7 万,因俄国白党入侵库伦,多数汉商逃回。从前在蒙地营商,极其自由,并有长官保护,最易得利,当时资本大者有大盛魁、天义德、远南德等。最大之晋帮大盛魁号,在蒙地有 300 多年的历史,蒙古独立后,对该商号特别压制,下令全蒙所有大盛魁的欠债,一律不许付还,使其共损失百万元以上。赫赫有名的大盛魁商号就这样跌然而落。



外蒙古革命后,对入境外人,盘查甚严,外人往往被疑而拘禁。凡汉商入境,税捐繁苛,有护照费,入口税,若留蒙地,每年须纳领票税、验照费、营业税,而且商品价格由库伦政府估定,商人们都有数百峰、几千只驼羊,但蒙古政府禁止驱畜出境。俄人在蒙古政治上占特别势力,俄在蒙地设立商务股份公司,俄商则受苏俄大使之保护,贩运俄、德新奇物品,合于蒙古新人物的需要,汉商物品,多应喇嘛及旧式蒙人的需要,自然彼盛此衰(由此可见苏联对蒙古的垄断渐已开始),何况蒙古设有一个国家商店,名为“协和公司”,百货俱备,规模颇大,又一切优惠,汉商必然无法与之争胜。革命后,库伦汉商减少大半,留居亦不过五六百家共1万多人,唯京帮南通和北通号每年得利10万元左右,隆和玉也能得数万元,其余甚少。库伦东15里有“东营子”城,为因从前中国驻库伦都护使置,并有中国军队扎营,故曰“东营子”。东营子亦为汉商集居之地,约有汉商几千家,计六七万人。自陈毅(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败后,死伤2000人,移居库伦几千人,余都回国。剩之商号房室,空无人居,但蒙古政府,不许典卖,也不许拆毁,有人居住或经营,便须估价纳税,若无人居住或代营,便要充公。蒙古政府依此亦得一笔收入。至革命后东营子汉商连居住看房的,统共亦不过200多人。另外汉人在库伦的其他行业有春华澡塘等四家,新华照相馆等七八家,小饭馆10余家。还有库伦北部有不少耕种小麦者和伐木者,每人每月可得百元。

定库路外蒙古境内环境基本类似西蒙戈壁环境,亦为戈壁沙漠地区,也得靠骆驼、马为主要交通工具(库伦附近有少数的畜力车),沿途水源缺少,夏有渴死之虑,冬季白雪茫茫,一旦气候突变,则有冻死之寒。革命后,路上设有台站,近者7.5公里,远者百余里不等,各站有宿包,有负责运送人员。外蒙古人上马长途奔驰,很少缓慢行走,一昼夜可行三四百里。许多驿站只有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来回送站,其驱马奔驰,吃苦耐劳,能力不减男人,可见外蒙古男女一样,均可为公服务。

外蒙古驿运非常困难,因中蒙关系未顺,库伦既无中国邮局,而蒙古邮局,只通过俄国才能与中国沟通。故信件须贴蒙古并俄国邮票,至满洲里,



又须中国邮票,于是一信须贴数种邮票,若向甘肃发信,何日能到,尚不可知,反不如托人携带较便,可见中蒙交通,困难已甚。

库伦交通,革命后颇有建设,四面辐射台站交通线,北至恰克图除有台站外,又有长途汽车,夏秋季还可航行轮船,在哈喇郭勒河筑有桥梁,叫“革命第一桥”。但外蒙古交通枢纽,全操诸俄人手中,俄人汽车司机,傲慢自由,装好货物、乘客后,能随意四五次地改期,数日不予走程,途中又自由酌酒,躺倒不行,而蒙人亦无干涉之权。

蒙古地区的汉商掌握蒙古畜牧社会经济的特点,执行放货宽款的周转经营政策,较受蒙人的欢迎。尽管外蒙古有许多商业网点,而定远营的商业贸易也吸引着不少外蒙古南部的蒙古牧人。他们南下至定远营进行商务活动,又把定库路说成“喀尔喀扎睦”,似乎这条路线是专供他们行走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定库路上的主要行者,就是外蒙古喀尔喀蒙古人,他们因不同的生活需求来到定远营,购去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当然,首先购取的是粮食。外蒙古地处亚洲内陆,气候干旱,寒冷,无耕地种植,外蒙古南部食粮,均以宁夏、甘肃等地为来源。阿拉善旗所产粮食,仅供全旗三四个月的食用,每年需从宁夏、绥远和其他地方输入四五万石,外蒙古人可在定远营购买面粉、大米、小米等运回食用。其次外蒙古人购运的物品还有茶,茶为蒙人防暑之重要饮料,谓一切饮食之上等物品,哈达并砖茶是蒙人拜寿、婚喜最重厚之礼品,外蒙古人把块茶捣成碎粉,泡米饮用,而内地人甚少饮之。定远营之茶均由湖南、四川等地输入,每箱共27块,每块3斤7两,名叫“砖茶”,外蒙古人每年都要运去大量砖茶。其三是旱烟。旱烟是老年蒙人在人烟罕稀的大戈壁上耗时解愁的最佳品,是外蒙古人前来购买之重要物品之一。四是酒。外蒙古地区深处内陆,交通阻塞,文化落后,蒙人除参加为数很少的一些那达慕等集会外,平时生活中一无娱乐,加之气候寒冷,所以相会饮酒,则成为蒙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娱乐形式。定远营之酒,大部分从宁夏输入,其中以白酒,即烧酒为最多,每年均达千篓,每篓约65公斤,还有黄酒、米酒、玫瑰酒等。据说外蒙古人银两甚多,用皮制驮褡装带。汉商为了多



得钱财,酒中加水,蒙人携带途中,因天气甚冷,酒瓶冻裂,细看,酒已瓶状结冻,没损失一滴,于是就出了“瓶子打掉,酒还在”这一句笑话。五是糖。有红糖和白糖,来源于绥包和四川,每年输入定远营的糖达千余斤,而后通过外蒙古人购买而流入外蒙古一小部分。六是丝棉织物和地毯。定远营的布匹,大部分来自日本、美国,由包头输入,小部分来自内地。外蒙古人多购丝织品,而更多地买阿拉善地毯,当时阿拉善已有手工并地毯作坊。阿拉善旗地毯用羊糕毛来做原料,名气甚大。

另外,定库路还联系着两地蒙人的宗教和畜牧业生产。蒙古人信仰佛教,阿拉善为西蒙佛教圣地,清朝以来,阿拉善境内陆续建庙,庙宇遍及全旗,数达35座之多,共有喇嘛3751名。主要庙宇有王爷府的延福寺(藏语称格吉林),此庙建于乾隆七年(1742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皇帝赐扁“延福寺”;又有定远营附近贺兰山内的广宗寺(南寺),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遵照六世达赖喇嘛的遗言而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赐扁“广宗寺”(藏语称丹吉林);还有地在定远营东北贺兰山中的福因寺(北寺),建于嘉庆九年(1804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赐匾“福因寺”(藏语称科布德林)。阿拉善旗这三大寺各有喇嘛数百至近千名,各种佛教仪式具备,影响甚大。三寺也吸引着外蒙古喀尔喀人前来拜佛。另外,外蒙古喀尔喀人在阿拉善境内也建造了不少庙宇。其中有宗乘寺(阿贵庙)。因嘉庆三年(1798年)喀尔喀密尔根王旗察罕乌拉庙喇嘛多果新诺彦呼图克图,在阿拉善哈如乃山穴里诵经、拜佛,得以据地而建,民国1年(1912年),蒙藏委员会名其为“宗乘寺”(藏语称丹巴达尔吉林);有布古德乌力吉图庙(意为众吉寺),原为乌拉特中旗庙,建于外蒙古境内混都斯查罕山,其蒙人因避外蒙古革命,于民国10年(1921年)迁入阿拉善境内陶米善丹,民国26年(1937年),阿拉善衙门为之名“布古德乌力吉图庙”(藏语称达西混都林);有特布希庙,民国27年(1938年),喀尔喀喇嘛库尔勒楚尔吉从西藏返回,在阿拉腾特布希山上建庙,召集外蒙古移来之部分喇嘛,名之为“特布希庙”(藏语称拉日供格丹楚林);有察罕德尔斯庙,为喀尔喀喇嘛呼比拉罕在特布希山

东麓建立的小庙；另外还有从喀尔喀迁来的阿日善庙等。从喀尔喀人在阿拉善境内建造的这些庙宇来看，当时阿拉善与外蒙古的宗教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畜牧业方面，阿拉善北部牧民与外蒙古南部牧民进行着一样形式的畜牧业生产，两地牲畜常常彼此越境，相互交换，两地牧民关系密切，友谊深厚。

在定库路的开通时期，也曾有过不少中外学者名流，为应各种使命而在此路上涉身踏足。如：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将，著名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对中亚地区进行第一次、第二次探险之后，路经定远营，留居数日考察，而后抵库伦回国。他第四次对中亚探险时，从苏联恰克图出发，经库伦、定远营，入青海。当时，著名的探险家科兹洛夫和罗波洛夫斯基少尉都仅是普尔热瓦斯基探险队里的助手而已。普回国后著的《旅行记》以及《蒙古和唐古特之国》等书，述说了在蒙古地区采集的大量的动、植物标本的具细情况，这对研究蒙古地区的一些科学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还有国内的马鹤天等，不辞戈壁旅行的百折千辛，进行探险考察，其所著《内外蒙古古考察记》等书，亦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定库路上进行的这些政治、军事、商业、畜牧业、宗教、文化等种种社会活动，对加强外蒙古和西蒙阿拉善两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定库路的具体路线（参见附表一）是：起自阿拉善旗首邑定远营；西北行 22.5 公里至哈尔淖尔贡，此地无水，为小草丘地；又西北行 20 公里至当铺，近处水井多，水源丰富；又西北行 30 公里至查干布鲁格（白塔寺），有淡水井两口，可供 150 人饮用，该寺大约建于北寺建后十四年，即 1818 年左右，是北寺一世活佛罗卜藏丹比贡布（阿拉善第三代王爷罗卜藏多尔济第三子格勒格培尔）和三世活佛罗卜藏都布丹金密德吉木苏身葬之地，据说寺内有一数十斤重的石锁，当喀尔喀一列驼队（有驰 70 峰）经过时，本寺一名大力士喇嘛能举着石锁，一口气点数所有骆驼，使人赞叹不已；再西北行 15 公里至乌兰呼都格，有淡水井一口，可供 100 人饮用；转北行 27.5 公里，越巴彦乌拉山冈，抵那林苏海图（苏海图），这里水源丰富；西



北行 32.5 公里至都日勒吉,有淡水井,可供 70 人饮用;西北转北行 35 公里至沙尔布尔德,水源丰富;微西北行 32.5 公里至阿门乌苏(阿日阿门乌苏),有井两口,水咸,可供 100 人饮用;西北行 30 公里至扎干呼都格,有井两口,可供 200 人饮用;西北行 30 公里至沙日咱庙,嘉庆二年(1797 年),阿拉善喇嘛医生东都格在此建庙,名为“沙日咱庙”(达西东尔扒巴林)，“沙咱吉”(原外蒙古人又叫“沙日达”)意为内包有水的小白石子,水可入药,该处有井,可供 80 人饮用;西北行 25 公里至温都尔毛道,有井三口,可供 120 人~200 人饮用;微西北行 25 公里至苏红图,无水,附近的乌兰苏海有井,可供 50 人饮用;北行 32.5 公里至乌兰刚格,有井两口,水微咸,可供 60 人~70 人饮用;北行 15 公里至哈布特盖敖包,有井,可供 50 人饮用;北行 20 公里至班定陶勒盖,旧设电报站,此站小有名气;北行 7.5 公里至沙廷敖包,有泉水,此已进入外蒙古三音诺彦汗部,再北行经土谢图汗部(即出境后大体途经今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戈壁省、中戈壁省、中央省),终抵库伦。从中蒙边界处的沙廷敖包算起到库伦有 800 多公里。

另外,在这一路向上,还有一条中插小道,即从阿拉善旗东北角的图克木庙北入外蒙古接定库路。图克木庙,由阿拉善梅林班札尔在咸丰九年(1859 年)建造,民国 1 年(1912 年)赐称“妙华寺”(苍映驱齐纳莫库林)。此寺规模较大,至建国初期尚有喇嘛 250 人。该道从图克木庙始起,西行 30 公里至西尼乌苏;西北行 22.5 公里至银根(今银根苏木政府所在地,也称达兰图如),北行 22.5 公里至查干扎德盖;西北行 25 公里至额勒根乌苏,北行 30 公里至艾勒格特;西北行 32.5 公里至银根(银根萨比苏台,亦为绥新路上的一个站点,从此北行经呼舒扎根敖包可入蒙古)。由银根也可西北行 32.5 公里至扎敏敖包;再东北合路转北行进入外蒙古三音诺彦汗部,经比赤格亭古尔班敖包、查耳珊达呼都克、沙腊克呼都克、孜休尔特呼都克、苏契呼都克即入定库路。该道主要是由外蒙古南部的牧民前来图克木庙以东的宗乘寺(阿贵庙,喀尔喀人主持)拜佛、诵经而踏拓。外蒙古人偶尔也从此南下 125 公里进磴口、三盛公购买粮食和日用杂货。

除上述西蒙阿拉善旗至外蒙古的库伦驼道之外,在西蒙西部还有一条路线可通蒙古库伦,这就是著名的古代“居延道路”北支的后身,即西蒙额济纳土尔扈特旗至外蒙古的达库驼道。

四、达库驼道

西蒙额济纳土尔扈特旗首府在历史的进程中受政治、军事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曾多次迁移,从前所谓的王爷府只不过就是游动的几顶蒙古包而已。最早从阿拉布珠尔王爷开始,王爷仅在家管管印章,此即为衙门,若有集会,再临时搭包。至丹忠、罗卜藏达尔札时期,在额济纳河上的巴彦博格多、查汗毛德、札愣查干、古尔班纳鲁格等地用蒙古包为衙门。旺札勒车凌时期,王爷在河下的古日乃、昆德楞、额布勒晋、殊萨楞查干、拐子殊萨浪等地游牧,王府自然亦随之而动。在东德布才仁、巴雅尔莽奈、达什车楞时期,王府迁到衙门查干。巴雅尔莽奈时,在树布格尔查干建房十五间,此即第一定居衙门,但不久又被回兵破坏。光绪五年(1879年),丹津在希巴拉图建房,又在唐布根乌奴尔搭两蒙包为衙门,乌勒哲巴达热呼王爷也继在此地。光绪十五年(1889年),台吉达什迁到达西敖包附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达什继位,在塞尔川井建房为衙门,托布信巴依尔王爷也继在此地。民国27年(1938年),塔旺嘉布在孟克图建房,后把衙门从塞尔川井搬到查干哈西亚,民国29年(1940年)在阿布德仁套来建房3间并搭毡包,以为旗府,民国32年(1943年)在达来库布建房为旗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迁转多次,后仍迁返达来库布至今。对于“达来库布”一名,今日众说不一。“达来”意为“海”,“库布”即“河流冲积之集水深处”。据说1905年,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布登嘉措,从外蒙古库伦返藏,途经额济纳时,额济纳旗设站迎接,一时这里聚集了上千名内外蒙古朝觐者,使用驼、马和食之牛、羊数达几千头(只),当时这些人畜只从达西敖包河域的一个“呼布”饮水,但取之不涸,由此就吉称其为大海般的“达来库布”。又说因一名为“达来”的人投水死于此,故称“达来库布”。还有因河流的宽阔而名的说法。总而言之,达来库布以后即成为额济纳旗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中心地了。其达



库驼道就是从额济纳达来库布北行达外蒙古古库伦的路线。

达库路在阿拉善盟境内仅五站 75 公里(参见附表二)。从额济纳旗首府达来库布北行 22.5 公里至查汗布勒格,这里有井,水源丰富;北行 15 公里至老东庙,有水;北行 10 公里至策克,在旧达王府近处,有井水;北行 20 公里至准札哈乌苏,有井两口,可供 50 人饮用;北行 20 公里进入外蒙古三音诺彦汗部(今蒙古南戈壁省)的塔林敖包,无水,为戈壁滩;再经土谢图汗部(今蒙古中戈壁省和中央省)达库伦(该路也可从较西面的杭爱山翁金河一带转入库伦)。从边界上的塔林敖包至库伦约有 900 多公里。由塔林敖包东北行至拜申图还可会入定库驼道。

达库路,历史悠久,早在汉朝初期,“居延道路”尚在匈奴控制区内。这时期,匈奴众部不但占领了额济纳地区,而且也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阻塞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为了开通西域,巩固边防,汉朝政府派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兵伐西匈奴。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春,霍去病第一次兵伐西匈奴,率 1 万骑兵出陇西,越焉耆山 1000 余里,袭击了驻守今武威地区的匈奴休屠王部,杀匈奴二王,活捉浑邪王王子、相国和都尉,得其“祭天金人”。是年夏,他二次进击匈奴。这次两路进兵,东路博望侯张骞与郎中令李广出右北平,其失利多,未利。西路是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公孙敖迷路,误会师时间,失相配合,只霍去病一人率兵深入匈奴地域。《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隧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觶得。’”又如毋庚才《长驱六举,攻比祁连》一文说:“只有霍去病孤军深入,渡过了居延水,到了小月氏,一直打到祁连山”。霍去病占领河西走廊后,并非北攻居延,而是从额济纳东南方向的宁夏、阿拉善沙漠一带率兵向西北转入居延的。从一些情况看来,古代有时所说的“居延道路”主要不是指南北走向的路而是指东西走向的路。王北辰教授在《古代居延道路》里说:“从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过戈壁、沙漠,趋向天山南北麓。这条路在沙漠里要经过居延绿洲(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名之为‘居延道路’”。霍去病的这两次战役给匈奴以



沉重的打击,《河西故事》上说:“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霍去病居延胜战后,未留居安息,他又速返到东部战场拼杀。可见其确有为国为民,忙无私乐的大将风才,是给汉王朝却去心病之人。

霍去病平西后,汉朝为巩固居延要塞,在此设立了军事基地,以防匈奴再次南下。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军老将李陵率步兵5000北攻匈奴。李陵出居延塞,北行30日至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杭爱山东端),遇到了匈奴大单于3万多骑兵,李陵循“龙城故道”向居延塞退却,兵败身降。“龙城”在浚稽山以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和林附近),其浚稽山的位置必在“龙城故道”上,李陵步兵行30日可达。这“龙城故道”就是近代盛行的达库路前迹所在。所谓“故道”,即是由来已久的道路。龙城道在匈奴之间,战争时期是军事要道,和平时期是双方派遣使者的友好往来之路。在唐、宋、辽、西夏史上,也有关于在此线上行军、通使的记事。据有关史籍载,成吉思汗第四次南征占领河西,攻灭西夏,即是沿该路南下的。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到过居延黑城,他在游记里记载道:“从甘州,若骑行十六日,可抵亦集乃(额济纳)”;又说由亦集乃北行,无人烟宿地,戈壁行四十日抵和林,并叙述了和林城的建筑和自然情况。可见马可·波罗也是行“龙城故道”抵达和林的。所以东西走向的“居延道路”和南北走向的“龙城故道”,交叉于居延一带,形成了“居延十字路口”。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西藏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布登嘉措,因英军侵入西藏(到距拉萨60公里的曲水),是年6月15日夜半,秘密离开布达拉宫,流亡出藏。据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和日本《西藏通览》记载:同行者有布里雅特人德尔智,率布里雅特70名护卫达赖。达赖出藏后,途经郭拉山、巴雅、盘布恰拉山、达隆寺(白教)、热振寺、黑河、唐古拉山、通天河、青海柴达木盆地,出甘肃嘉峪关,达额济纳旗,沿达库路北行。这次达赖一行70多人马经过时,额济纳人似乎没有察觉。达赖进入外蒙古境内,经三丹加德林寺、甘丹德德林寺,外蒙古法王哲布尊丹巴特派4人迎接,敦



请其直赴库伦。达赖出行4个多月,于1904年10月20日到库伦。达赖到库伦后受到了盛大欢迎。由钦差驻外蒙古大臣2人,带领蒙汉官员,向达赖献哈达。库伦市区的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群众,形成两条长列。欢迎的群众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妇女们戴着美丽的头饰,喇嘛们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法器,俗民们手中捧着香炉,炉中香烟袅袅。市区各房顶和蒙古包上插遍了五彩旗帜。达赖经过的街道上,铺满了黄布,达赖的行宫设于甘丹寺的聂畏殿。清朝政府获悉达赖逃到外蒙古的确实消息之后,立即派了一位钦差大臣,自北京前往库伦“看望”,并带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送给达赖的很多礼品。达赖在库伦期间,哲布尊丹巴对他非常尊敬,但后来看到人民对达赖的信仰超过了自己,心中感到不快,逐渐对达赖有了厌恶之感,想使达赖离开外蒙古。达赖与哲布尊丹巴之间发生的失和现象,促使达赖想早一点返回西藏。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达赖由库伦起程,一路采取朝佛拜寺,讲经说法的形式前行。四月二十五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又派钦差大臣郭左、理藩院衙门大臣、笔帖式及汉蒙“红浦”2人,一行多人,前来杂渊寺看望达赖。杂渊寺和下几程的甘丹格吉林寺及三音诺颜汗部甘丹才培林寺均在达赖南归的达库路西道上。同样,当地蒙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而后达赖转赴额济纳东部入蒙古的小道,移进额济纳旗。据说这次随行的藏、蒙人员近千人。进入额济纳之前,喀尔喀巴拉丹扎萨克旗派人通知额济纳旗准备驿运,额王达什没有理会。后随行达赖的钦差大臣命备帐幕300顶,驿运畜500匹及相应的负责返送人员。当时额旗人少物薄,措手不及,只好从巴拉丹扎萨克旗雇畜用物。但喀尔喀人故意敲诈,抬高雇价,并将喀尔喀鲁将军公驼、马、包顶予之。额济纳旗为迎送达赖专设乌兰川吉、木登戈特拉格、乌兰苏亥、呼和吉格德、孟固图、查汗模多、斯格尔共五大两小7个站驿。而后钦差大臣又以额济纳旗准备不当,陷达什王爷于杀头之罪,最后赔了1万两白银才使得救。据说对达赖一行每站须固定供给200只绵羯羊,但蒙藏喇嘛随意截群杀吃,羊头、羊脏堆集如山。达赖过后,额济纳旗雇用

之外蒙古驼马、包顶价格达2万两白银,长达30年后才予还清。这是达库路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额济纳人将这次事件称为“达赖喇嘛之祸”。达赖过额济纳后人甘肃平番县(永登县),经青海西宁、塔尔寺(在此停留1年两个月),又经西安、潼关、太原、五台山(在此留居半年)等地,达于北京(在京住两个月)。其后返石家庄沿原路到塔尔寺,经香日德入北行路回拉萨。

额济纳旗与外蒙古之间,除达库主道外,还有许多小道联接,外蒙古路几乎并遍额济纳旗全境。这些小道逐有六条。(1)鼎新至外蒙古路:该路起自甘肃之鼎新,东北行15公里至双城(两省区交界处);东北行80公里至塔格珠尔;继续东北行80公里至古日乃湖;100多公里经巴丹吉林沙漠北部达拐子湖;转北行90多公里至雅干;再折西北行25公里至阿拉格呼都格,入外蒙古三音诺颜汗部;北行140公里,途经邦托罗因鄂博、杜尔布尔治乌拉、霍布哈尼呼都克、诺彦等地接入达库路。(2)桃尔思至外蒙古路:有两条,一条由桃尔思东北行30公里至敦德乌苏;东行15公里至敖瑙霍布;东行35公里,沿洪果尔吉乌兰山麓入外蒙古三音诺颜汗部,在巴夏公果尔吉知乌拉一带入鼎新至外蒙古路。另一条桃尔思北行16.5公里至呼和俄勒格;东北行25公里至呼乃巴斯克;东北行25公里入外蒙古的巴勒巴尔亥呼都格;东北行70多公里,经伊黑鄂博山,在霍布哈尼呼都格入鼎新至外蒙古路。这两条路为额济纳王进京路之一段。此两路南至桃尔思会合后,西南经乌兰爱里根、达来库布,可达建国营;(3)是达库主路的一小支,从达库路的准扎哈乌苏分出,在中蒙边界上的乌兰川吉入蒙,而后又在鄂博图呼拉尔进入达库路。它虽然是一小段支路,但行人多,较有名气,其乌兰川吉就是迎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第一大站。(4)建国营(赛汗桃来)至外蒙古路:自建国营始西转北行30公里至朝里川吉;北行15公里至桃来尚德;北行50公里,经古尔班乌纳格德乌拉,达于呼仁包米呼都格;北行10公里入外蒙古之札萨克图汗部的哈尔德布斯格,并由此可通札萨克图汗部各地。该路从朝里川吉分出一支南下,途经芦草井、五道明水等地,可达甘肃的金塔县。也可从建国营沿河南下,达双城、鼎新、金塔等地。(5)金塔至外蒙古路:



从金塔北行 115 公里至红柳大泉;北行 85 公里至石板井(阿拉腾乌素);北行 35 公里至楚伦拜兴图;北行 45 公里至哈日乌拉;北行 47.5 公里入外蒙古扎萨克图汗部的阿尔根敖包,由此可通扎萨克图汗部各地。(6)马鬃山至外蒙古路:该路虽然在额济纳境外的甘肃省,但在历史上与额济纳有着一定的关系。马鬃山位于三省之间,又近外蒙古,地势重要,谓西北交通的一大枢纽。近代以来,山中居民以蒙古喀尔喀人、土尔扈特人和汉人为主,主要靠畜牧业为生。此线起自马鬃山公婆泉,北行 30 公里至红山井;北行 45 公里至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又北行入外蒙古,可通扎萨克图汗部各地。从公婆泉南下 250 公里可达甘肃的玉门县。该线与额济纳旗境内的其他南北路线属之一类,有关该山该路的一些情形,早在汉代匈奴时期就有记载,以后这里又有过许多的历史事件发生,但历史的主客观条件使其在发展上大次于达库主路,这又是历史的客观结果。

这些道路竟是如此之多,由此可以证明,历史上的外蒙古与额济纳、河西走廊一带的人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清朝至蒙古革命以前时期,外蒙古与额济纳以民间往来为主,外蒙古人途经额济纳旗,进入河西走廊各郡县,主要为运粮和购买日用杂品。外蒙古人在宗教方面,常直途额济纳旗,南下到青海塔尔寺或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甚至越喜马拉雅山入印度进行佛教活动。另外,两地之间的王公、平民自由来往,相互娶嫁,在额济纳人口中外蒙古人为数不少。若遇特大的干旱灾情,游牧进来者,寻亲找故者自是不断,又有经商者及因风沙迷路进来者;反之,额济纳人也是如此进入外蒙古。这亦是畜牧社会中民间来往的种种原因。

外蒙古革命爆发后,额济纳与外蒙古的关系逐渐地从民间生产关系转化为政治的军事的关系。首先,外蒙古大批流民进入额济纳,其大多是以封建王公、上层喇嘛为首的“逃难者”。蒙古政府对封建王公,特别是对黄教喇嘛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这些人对革命不满,又害怕革命,纷纷逃出外蒙古。1930 年前后,外蒙古巴拉丹扎萨克旗、喇嘛格根旗有 60~70 户的数百名流民带着家产、牲畜流入额济纳,其后他们建造了喇嘛寺“丹巴达尔吉雅

庙”。1940年,马鬃山地区的部分喀尔喀民户先后移入额济纳旗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在单身流入的民人中,也混进一些间谍、情报等特工人员。他们到处流窜,给额济纳政府带来了许多麻烦事务。有的特务被抓获后送交外蒙古政府代表或交给国民党专员和防守司令部门处理,有的还私自逃入蒙。在这一带的中蒙边界上也曾有过冲突。1938年冬,冯玉祥将军为运输苏联援助中国的武器,兴修酒泉至外蒙公路,为此额方与俄、蒙代表第二次在札根乌苏谈判,在谈判中发生冲突,双方开枪,打伤一人。1947年7月4日,中蒙双方为了边界上的呼仁包木一水井(建国营至外蒙古路上的站井),开枪射击,外蒙古方死、伤各一人,外蒙古方面调来后方兵力,用重机枪扫射,国民党军队只得撤退。这是一次中蒙边界上的武装冲突,这次冲突中方是正义的,因为该井在额济纳旗境内。这一时期,也有不少额济纳旗人逃入外蒙古,有青年军人、牧民、寺院喇嘛、僧徒、青年学生等,其中喀尔喀青年占多数,逃亡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和封建主的压制,怕国民党无期兵役,羡慕蒙古革命等。这些人有的在逃亡中当场被抓获,其中有的又通过中蒙外交关系被送回。随着外蒙古的独立,中蒙边境上的冲突急剧增长起来,外蒙古和中国国民党方面都加强了边防守备,严格盘查来往人员,于是额蒙路上行人越来越少,各条道路逐渐荒废。外蒙古的独立是漠北蒙古对中原地区第二次大割据的形成。外蒙古为什么要独立,是什么原因促成其独立,对现时的许多人来说并不清楚,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叙述一下。

五、外蒙古独立之前后

大清康熙帝绥服蒙古部族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统治措施。首先是设立理藩院,以管理蒙古地方事宜。理藩院尚书侍郎概由满人充任,蒙古人只能任额外侍郎一名,并无实权。理藩院辖各盟旗,在各盟旗内用高官厚禄及互通婚姻的办法来收买蒙古上层人物。清廷通过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各种爵位,筑成庞大的蒙古封建贵族阶层,使其成为自己的统治支柱。清朝贵族的公主、格格下嫁蒙古王公,而蒙古王公的女子又多被送进皇宫封为后妃,通过联姻,公主们即成为监督蒙古王公的特殊



人物,而蒙古王公的女儿在被封为后妃后,则成为“人质”而被留在京城,用这种手段控制了蒙古上层封建主,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清王朝在蒙地设立都统、将军职,集军政于一身,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规定凡六十以下、十八以上……照例编军,其目不能视,足不能行,手不能持者,不在数内,若有隐匿,举发治罪。清王朝通过这些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措施对蒙古地区实行了严厉的统治。

清廷对蒙区还进一步从政治、地理上实行分化政策。蒙古各旗不能互相统属,也不能互相疏通,又严格规定各旗各部的驻牧地界,不能相互逾越。康熙时曾颁发禁止内蒙古人与喀尔喀、卫拉特通婚的敕令,规定:凡内蒙古台吉等,如有擅与喀尔喀、卫拉特人结婚来往者,削其爵位,子孙不准承袭,所属人民尽拨转近族兄弟,除妻之外,牲畜财产尽没于官。此外还禁止蒙汉接近,规定凡内地人到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女为妻。交通上也予控制,对蒙古王公每年进京都划定出指定的路线,并且只能在指定的时间进京。还规定不准蒙人擅自开发属地的矿产,等等。

愚民政策也是清予蒙的重要治策之一。最甚的是乾隆七年(1742年),没收蒙古所有的古书文献,运到北京,却颁布了满蒙合璧的《圣论广训》和蒙文《观音经》一卷,大有类似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清廷还注意到防止蒙人汉化,凡风俗习惯,无不禁止仿效汉人,甚至连一些给事物命名及娱乐问题,也要干涉。嘉庆二十年(1815年),严禁蒙人建筑汉式房屋,并不许学习中国戏曲。道光十六年(1836年)时,令蒙人命名须用蒙文或满文字义,不许用类似汉名的字义。同治十九年(1880年),又禁止蒙人学习汉文,凡公文诉讼等,概不许使用汉文,并严禁王公台吉等招聘汉人来学汉文,不得用汉人作书吏,违者双方受罚。咸丰三年(1853年)和光绪二年(1876年)时,于此又三令五申地告戒蒙人。这种文化上的分禁政策,使清政府取得了成功。但是内地汉族是清政府生存的堡垒,其必须顺从汉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为了缓和内地矛盾,清政府不得不把汉人放入蒙古地区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不过同时也颁布了许多挑拨民族关系的禁令规定,使蒙汉人

民无法彼此信任，多予亲善。

推行宗权也是清廷的一大治策。清朝政府大肆推行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广建庙宇，使喇嘛人数迅速增多。喇嘛不许婚娶是黄教的一大戒律，男子十有九人当喇嘛，广大蒙古女子无夫孤寡，嫁于无人影的某一男子之马鞭、腰刀等。这种手段使百分之九十之身强力壮的蒙古族青年全部充当喇嘛，蒙古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况且广大蒙古人民信仰宗教，丧失了坚定的意志和斗争力量，这样清朝政府就达到了使蒙古民族进一步落后愚昧的目的。在清朝统治的两个多世纪里，蒙古民族的社会发展缓慢几近踏步不前，远远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远古尘埃里，可以说这是蒙古民族形成以来的第二次慢性衰落时期。民国以后，虽然清朝统治者灭亡了，但蒙古地区仍是沿袭封建王公制度，民国政府歧视边疆民族，加之国内战乱多事，对边疆蒙古无力加强巩固，蒙古民族仍然无法摆脱愚昧状态。然而在这时候，蒙古人中的一些觉悟者，已受世界革命的影响早已有了新的思想。

清廷对蒙古民族还实行羁縻、压服政策。派去的大小官吏，除苛敛之外，毫不为蒙古民族谋利益，蒙古人民对之无不痛恨。清朝中期以后，朝廷腐败到极点，外国侵略者纷纷入侵，清政府接连不断地与侵略者签订了耻辱、丧权、卖国和丧失民族尊严的不平等条约，各国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随意杀人放火，享受一切权利。俄国即利用这个时机，一面干涉清廷在外蒙古古练兵、移民等事，以结好蒙人，一面鼓动亲俄派杭达多尔济亲王借会盟为名，密议独立。及至武昌起义，俄人更是大肆拨弄，且出兵援助。于是外蒙古的喀尔喀四部，于1911年11月30日（清宣统三年十月十九日）宣布独立，驱逐中国官吏，建立蒙古帝国，改元共戴，以哲布尊丹呼图克图为皇帝。12月29日，新皇帝举行即位式，外蒙古便算自行脱离了中国。民国1年（1912年）11月3日，俄、蒙在库伦密订《俄蒙协约》及其附件《商务专条》，要旨为扶助外蒙古自治，练蒙古军，不准中国驻兵移民，俄在外蒙古取得政治经济上各种特权，由此外蒙古事实上成了俄国的附属（详见附录一《俄蒙协约》）。于是中国与俄国慎重交涉，产生民国2年（1913年）11月5日的《中



俄声明文件》。其中俄国虽然承认中国在外蒙古有宗主权,但中国却承认外蒙古有自治权,并准许不驻兵和不移民外蒙古,承认俄人在外蒙的利益(详见附录二《中俄声明文件》)。民国3年(1914年)9月8日,中、俄、蒙在恰克图召开三方会议,9个月中议会48次,于第二年6月7日签订《中俄蒙协约》。其要点有五点:(1)外蒙为完全自治区域,有自治权,但仍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有宗主权;(2)改皇帝称号,对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汗,中国有册封权;(3)外蒙古公事文件可以民国年历与蒙古干支纪年并用;(4)中国派都护使驻扎外蒙古;(5)俄国在外蒙古有领事裁判权,凡外蒙古政治问题,中国与俄国须商酌办理(详见附录三《中俄蒙协约》)。外蒙古即改为自治,依中国官制,派陈篆为库伦办事大臣,并设佐理员。不久情形又大变,民国8年(1919年),民国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并取消外蒙古自治,废止前订《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蒙协约》等。但徐树铮过于压迫蒙人,以后被迫逃离,职由陈毅继任。这时在俄国白党的指示下,外蒙古的一些青年人组织蒙古民族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告解体。之后苏联红党又指导蒙古青年志士,在恰克图组织蒙古革命党。民国10年(1921年)2月,俄国白党败将巴龙恩琴在日本的接济下,第二次率军进攻外蒙古,占领库伦,驱逐中国军队及官吏,仍利用活佛为君主,于3月21日,宣布二次独立。但一切政权由巴龙恩琴操纵。苏联红党指导蒙古革命党,招集军队,在恰克图设立蒙古临时革命政府,与库伦相对立,并派红军进入库伦,驱逐巴龙恩琴,7月6日,组织了革命政府。新政府为收拢民心,仍承认活佛为虚名君主。从此外蒙古活佛失去权力,民国势力也基本减消。11月5日,在莫斯科缔结《俄蒙密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否认中国有宗主权。民国13年(1924年)1月,苏联派瓦西利爱夫为驻库伦的全权公使,同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中俄协定解决悬案大纲》,其中有关于外蒙古的两条:(1)苏联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及尊重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2)苏联政府声明有关撤退苏联驻蒙军队之问题,在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后,即将军队尽数撤退。但这一协定对外蒙古政府没有起任何作用。1924年5月20日,哲布尊

丹巴博克多汗去世,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认为建立新国家的时机已到,6月7日,通过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体会议,成立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大国民会议,公布了党的各项决议。11月8日,召开国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政治、财政等各项决议,制定了宪法,改“大库伦”为“乌兰巴托”(意即赤城),并定为国家首都。11月26日,正式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宪法承认可以建立蒙古式的独立自主的国家。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党务学校里悬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及蒙古革命伟人的肖像,张贴中国工人和世界工人并肩前进的图画。德王在引渡回国后的自述里说:到蒙古后“实际上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内务部人员监视之中,招待我的住所备有《列宁全集》,有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很多的书籍,我在没有事的时候,就随手翻阅,这是我看马列主义书籍的开端,才知社会上还有阶级的说法”。蒙古也执行民主政策,独立后,还存在中国工人职工会,可以集会和进行其他相宜活动。民国21年(1932年),马鹤天等2人到蒙古考察,到库伦无事可做,两人竟然在数天内办墙报、开设“中山室”、唱歌、集会,进行了好多项自由活动。独立后,蒙古政府大搞革命宣传,控制喇嘛,反对封建制度,迅速设立各类学校,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促使社会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但蒙古在苏联控制下,西欧和苏联的商品垄断市场,使民族经济发展缓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1960年5月31日,中蒙两国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同年10月12日起生效,缔约双方表示: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62年12月26日,两国又在北京签订《中蒙边界条约》,1963年3月25日在乌兰巴托互换批准书后生效,双方规定了两国全部边界线的走向,树立界标,绘制边界地图,凡以道路为界的地段,道路为双方共有,共同管理和使用,两国边界议定书于1964年6月30日签订。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随之断绝。



总而言之,在中国各民族的融合中有分裂,在分裂中又有融合。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以西北蒙古与漠北蒙古之间的道路交通为历史线索,探讨了蒙古民族的来源及中国几大主流民族间的一些关系,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西蒙至外蒙古道路上古今时序中所产生的许多历史事实以及这两地之间的各种来往关系,这种关系真实地说明了西蒙地区北向蒙古的一些驼道在发展方面的一些情形。中蒙两国关系的确立及其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改进,使这些畜运道路逐渐荒废,而今天的中蒙运输则完全由二连浩特国际列车来承担。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在两国首都北京至乌兰巴托之间已开通了航空线,两国使团相互访问,中蒙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中蒙两国关系的好转,对维护世界和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可以想见,亘古以来的中蒙交通,亦即在这新的局面和新的历史时期里会有着更光辉的前景。

附表一

定库驼路站程表

序号	站点名称	距上站 距离(公里)	站 位	
			东经	北纬
1	定 远 营		105°40'	38°50'
2	哈 尔 淖 尔 贡	22.5	105°33'	39°00'
3	当 铺	20	105°24'	39°08'
4	查 干 布 鲁 格	30	105°15'	39°22'
5	乌 兰 呼 都 格	15	105°10'	39°29'
6	纳 林 苏 海 图	27.5	105°05'	39°37'
7	都 日 勒 吉	32.5	104°59'	39°55'
8	沙 尔 布 尔 德	35	104°48'	40°10'
9	阿 门 乌 苏	32.5	104°44'	40°25'
10	扎 干 呼 都 格	30	104°43'	40°37'
11	沙 日 吉 庙	30	104°29'	40°48'
12	温 都 尔 毛 道	25	104°19'	40°58'
13	苏 红 图	25	104°13'	41°11'
14	乌 兰 刚 格	32.5	104°02'	41°27'
15	哈 布 特 盖 敖 包	15	104°01'	41°34'
16	班 定 陶 勒 盖	20	104°03'	41°45'
17	沙 廷 敖 包	7.5	104°01'	41°48'
18	库 伦*	约800公里		
里程 合计		约1200公里		

注:定库路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途经原三音诺彦汗部和土谢图汗部,达库伦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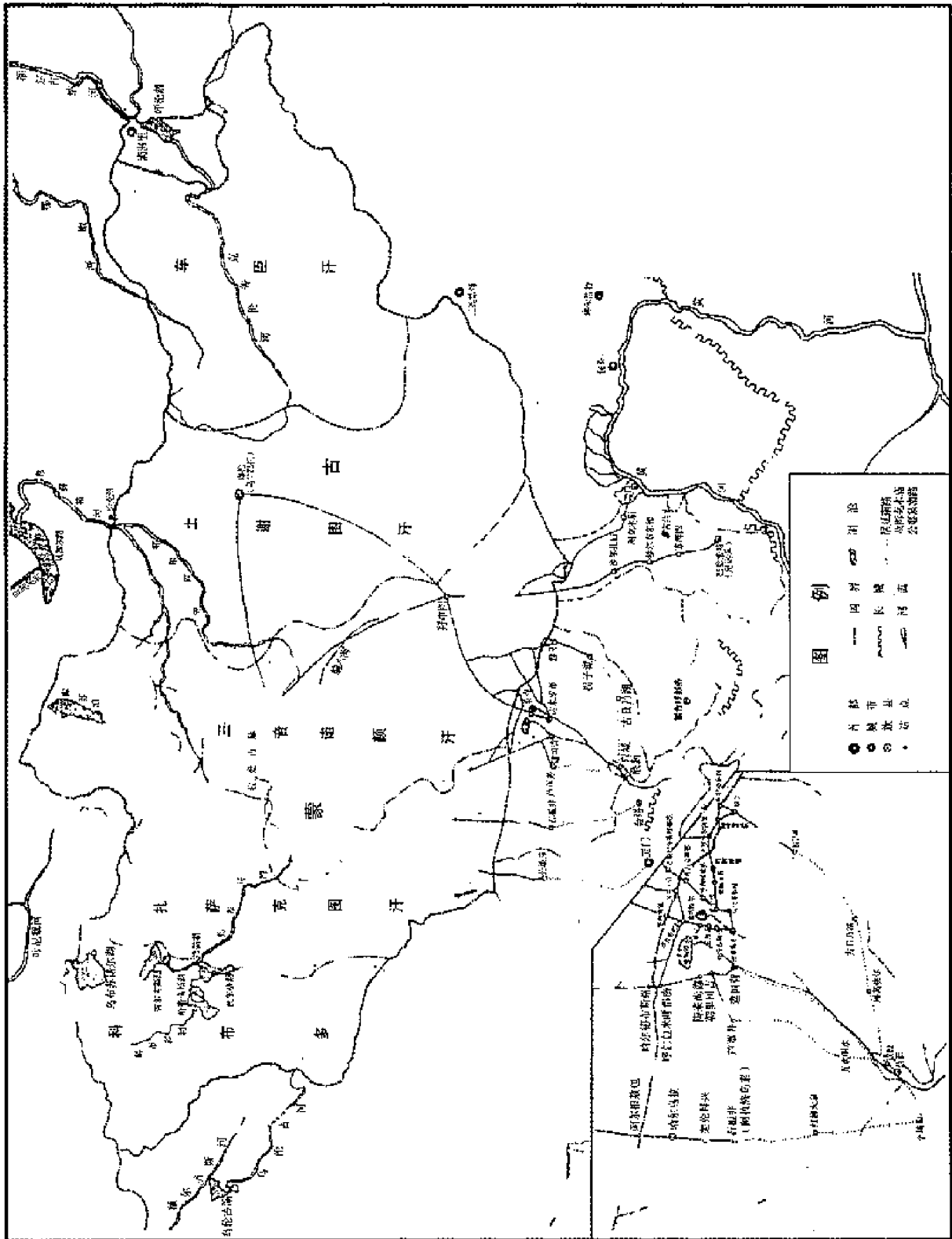


附表二

达库驼路站程表

序号	站点名称	距上站 距离(公里)	站 位	
			东经	北纬
1	达 来 库 布		101°04'	41°58'
2	查 汗 布 鲁 格	22.5	101°06'	42°09'
3	老 东 庙	15	101°09'	42°13'
4	策 克	10	101°06'	42°17'
5	准 札 哈 乌 苏	20	101°08'	42°28'
6	塔 林 敖 包	20	101°11'	42°37'
7	库 伦*	约900公里		
里程 合计		约 987.5 公里		

注:达库路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途经原三音诺彦汗部和土谢图汗部,抵库伦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城)。



定库、达库驼路路线示意图



附录一

俄蒙协约

民国1年9月,俄国密派前驻京公使廓索维慈,前赴外蒙古,以俄历10月11日抵库伦,迭开会议。各汗王公等皆出席,廓氏力言蒙古宜从速决定对于中、俄之关系,并劝诱订立俄蒙协约。全文如下:

蒙人全体,前因欲保存蒙地历来自有之秩序。将中国兵队官吏逐出蒙境,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蒙古之主,旧日蒙古与中国之关系,遂以断绝。现俄国政府因此情形,并因俄国人民友谊,及须确定俄蒙商务之秩序,特遣参议官廓索维慈,与蒙古主及执政各蒙王委任之议约全权,蒙古总理大臣,万教护持主,三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内务大臣沁苏米克图亲王,喇嘛策凌赤蔑得,外务大臣兼汗号额尔德尼达沁亲王杭达多尔济,陆军大臣额尔德尼达赖郡王贡博苏伦,度支大臣土谢图郡王札克都尔札布,司法大臣额尔德尼郡王那木萨来,会同议定以下各条:

(一)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并编练蒙古国民军。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殖蒙地。

(二)蒙古主及蒙政府,准俄国属下之人,及俄国商务,照旧在蒙古领土内,享用此约所附专条内各权利,及特种权利。其他外国人自不能在蒙古得享权利,加多于俄国人在彼得享之权利。

(三)蒙古政府如须与中国或其他外国立约时无论如何,其所订之新约,不经俄国政府允许,不能违背,或变更此协约,及专条内各条件。

(四)此协约自签押之日实行。

附商务专条(即协约第二条中所规定者)

(一)俄人可在蒙古各地自由居住移动,并经理商务,制作其他事项。或与各个人各货行及俄国蒙古中国及其他各国公私处所,协定办理各事。

(二)俄人可将俄国蒙古中国暨其他各国出产制作各货,运出运入,免纳税捐。唯中俄合办营并及俄人伪称他人之货为自己之货者,不在此例。

(三)俄国银行可在蒙古开设分行。有与各个人各官署公司办理各种银行行为之权。

(四)俄人可用现银买卖货物,赊欠货物,或互换货物。但蒙古各王旗及官署不得私人负担借款。

(五)蒙官不得阻止蒙人向俄人办理商业事宜。并不得阻止其为俄国人,或俄人商店工厂之服役。

(六)俄人可在蒙古商租或购买土地,但不得为谋利之举。

(七)俄人可与蒙政府协商享用矿、林、渔业及其他各事项。

(八)俄国可与蒙政府协商设置领事,蒙古亦可在俄国派遣蒙政府代表。

(九)俄国领事及俄国商务有关之地,设立贸易圈,专归俄领管辖。其无领事之处,则归商务公司,及社会之领袖管辖。

(十)俄国可在外蒙古地,设立邮政。但须与蒙古协商办理。

(十一)俄国驻蒙古各领事,如须转递公件,派遣信差以及别项公事需用之时,可用蒙古台站;唯一月所用马匹,不过百只,骆驼不过三十只,可勿给费。俄国领事及办理公事人员,亦可由蒙古台站行走,偿给费用。俄国属下办理私事之人,亦有享用蒙古台站之权,应偿费用,须与蒙古政府商定。

(十二)凡自蒙古城内流至俄国境内各河及此诸河所受之河流,均准俄国人乘用自有商船往来航行,与沿岸居民贸易。

(十三)俄国入于运送货物,驱送牲只,有权由水陆各路行走。并可商允蒙古官吏由俄人自行出款建筑桥梁渡口。

(十四)俄人牲只,于行路之时,可得停息喂养。如须停息多日时,地方官并须于牲只经过路径,及有关牲只买卖地点,拨给地段,以作牧场。

(十五)俄国沿界居民,依旧可在蒙古割草渔猎。

(十六)俄国属下人等,及其所开处所,与蒙人华人往来约定办理之事,可用口定,或立字据,其立约之人,可将所立契约,送至地方官呈验。如地方官见呈验契约有窒碍之处,当从速通知俄国领事官。与领事会商,将所出误会,共同判决。今应暂行定明,凡有关于不动产事件,务当成立约据,送往蒙



古该管官吏及俄国领事处呈验批准。如享用天然财赋契约,必须经蒙古政府批准方可。如遇有争议之时,无论因口定之事,或立有字据之件,可由两造推举中人平和解决。如遇不能和解时,再由会审委员会同判决,会审委员,分常设临时。俄领常设会审委员会,于俄国领事驻在地设置之。如领事域领事代表及蒙古官吏之代表,有相当阶级者组织之。临时会审委员会,于未设领事之处,酌量所出事件之紧要,始暂开之。以俄国领事代表,及被告居留,或所属蒙旗之蒙王代表组织之。会审委员会,可招蒙人华人俄人为会审委员会之鉴定人。会审委员会之判决,如关于俄人,即由俄领事官从速执行。其关于蒙人华人者,则由被告所属或所居留之蒙旗蒙王执行之。

(十七)此专条自签押之日实行。

俄历 1912 年 10 月 21 日即公举蒙古主治理二年季秋月二十四日立于库伦。

附录二

中俄声明文件

自民国 1 年 11 月 2 日报载俄派廓索维慈赴库伦议约后,我国外交总长梁如浩,即于 7 日照会俄使库朋斯齐,提出抗议谓:“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云云。翌日,俄使面交俄蒙协约全文,亦经外部驳覆,乃俄国态度至为强硬。嗣后梁辞职,陆征祥继任,与俄使迭次交涉,截至民国 2 年 5 月,议定条文六款,为参议院所否决,陆愤而辞职,以故中俄交涉,遂告停顿。然大势所趋,殊难延宕。盖库伦独立,俄既进兵于前,俄蒙协约告成,外蒙古更有恃而无恐,若不从速解决,则外蒙古终贻我以北顾之忧。故陆辞而孙宝琦任外长后,即与俄使重申前议,要求仍就原议六款协商。俄使以时过境迁,不允重议旧款,经与再三磋商,另提条款会议,经十次之讨论,始议定声明文件五款,及附件四款如下。



关于中俄两国对待外蒙古之关系，并经大俄帝国政府提出大纲，以为根据。并经大中华民国政府认可，兹两国政府商订如下。

(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

(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是以不将军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惟中国可任命大员，偕同应用属员，暨护卫队驻扎库伦。此外中国政府亦可酌派专员，驻扎外蒙古地方，保护中国人民利益，但地点仍按照本文件第五款商订。俄国一方面担任除各领事署护卫队外，不于外蒙古驻扎兵队，不干涉此境之各项内政，并不在该境有殖民之举动。

(四)中国声明承认俄国调处，按照以上各款大纲，以及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俄蒙商务专条，明定中国与外蒙古之关系；

(五)凡关于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之利益，暨该处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均应另行商订。

大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即西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一月五日立于北京

附：声明另件

大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孙为照会事，照得本日签字关于外蒙古问题之声明文件，本总长奉有本国委任，以政府名义，向贵公使声明各款如下：

(一)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二)凡关于外蒙古政府，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

(三)正文第五款所载，随后商订事宜，当由三方面酌定地点，派委代表接洽。

(四)外蒙古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惟现在因无详细地图，而各该处行政



区域,又未划清界限,是以确定外蒙古疆域,及科布多阿尔泰划界之处,应按照声明文件第五款所载,日后商订。

以上四款,相应照请贵公使查照,须至照会者。

大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

附录三

中俄蒙协约

自中俄声明文件互换以后,至民国3年9月8日,中俄及外蒙古三方各派代表会议于恰克图。正式会议凡48次,往来会唔谈判亦不下40次。初时争执最烈者,为我方要求外蒙古取消独立,帝号及年号,以及三方对于宗主权与自治权解释之分歧。继后争执最烈者,为铁路邮电问题,税则问题,以及内外蒙古交界不殖民问题,历时九阅月。至民国4年6月7日始签定此约。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大俄罗斯帝国大皇帝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诚愿将外蒙古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共同协商解决。各派全权专使如下: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都统銜毕桂芳,少卿街上大夫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陈策。大俄罗斯帝国大皇帝特派驻蒙古外交官兼总领事正参赞官亚历山大密勒尔。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特派司法副长额尔德尼卓囊贝子,希尔宁达木定,财务长土谢图亲王察克都尔札布,为全权专使。各专使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俱属妥协,议定各款如下:

(一)外蒙古承认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

(二)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三)自治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及土地问题,中国政府担任按照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

明另件第二条办理。

(四)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民国年历,并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念。

(五)按照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文件第二及第三两条,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官府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古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

(六)按照声明文件第三条,中国俄国担任不干涉外蒙古现有自治内政之制度。

(七)中俄声明文件第三条所规定,中国驻库伦大员之卫队,其数目不过二百名。该大员之佐理专员,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蒙古恰克图各处。每处卫队,不得过五十名。如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在外蒙古它处添设自佐理专员时,每处卫队不得过五十名。

(八)俄国政府遣派在驻库伦代表之领事,卫队不得过一百五十名。其在外蒙古他处已设或将来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添设俄国领事署或副领事署时,每处卫队不得过五十名。

(九)凡遇有典礼及正式聚会,中国驻库伦大员,应列最高地位。如遇必要时该大员有独见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权。俄国代表,亦得享此独见之权。

(十)中国驻库伦大员及本协约第七条所指在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得总监视外蒙古自治官府,及其属吏之行为。使之不违犯中国宗主权,及中国暨其人民在自治外蒙古之各种利益。

(十一)自治外蒙古区域,按照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另件第四条,以前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其与中国界限,以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属,东与呼伦贝尔,南与内蒙,西南与新疆省,西与阿尔泰接界之各旗为限。中国与自治外蒙古之正式划界,应另用中俄两国及自治外蒙古之代表,会同办理,并在本协约签字后二年以内,开始会勘。



(十二)中国商民运货入自治外蒙古,无论何种出产,不设关税。但须按照自治外蒙古人民所纳自治外蒙古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一律交纳,自治外蒙古商民运入中国内地各种土货,亦应按照中国商民,一律交纳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货捐。但洋货之由自治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者,应按照光绪七年陆路通商条约所定之关税交纳,(即运入内地者按税则交一子税即正税之半)。

(十三)在自治外蒙古之中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由中国驻库大臣,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审理判断。

(十四)自治外蒙古人民,与在该处之中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由中国驻库伦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或其所派代表,会同蒙古官吏审理判断。如中国属民为被告者,或加害人,而自治外蒙古人民为原告者,或被害人,则在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处,会同审理判断。如自治外蒙古人民为被告者,或加害人,而中国属民为原告者,或被害人,亦照以上会同办法,在蒙古衙门审理判断。犯罪者,各按自己法律治罪。两造有权各举仲裁和平解决争议之事。

(十五)自治外蒙古人民,与在该处之俄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照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俄蒙商务专条第十六条所载章程,审理判断。

(十六)所有自治外蒙古中俄人民,民刑诉讼事件,照以下审理判断:如俄人为原告,或被害人,而华人为被告者,或加害人,俄国领事或亲往,或由其所派代表会审,与中国驻库大员,或其代表,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有同等权利。俄国领事或其所派代表,在法庭审讯原告者,及俄国证见人,其被害者及中国证见人,经由中国驻库大员或其代表,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间接审讯。俄国领事或其代表,审查证据追求偿债保证,如认为必要时,得请鉴定人证明两造事实之真伪,并与中国驻库大员,或其代表,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会同拟定,及签押判决词。中国官吏有执行判决之义务。如俄人为被告,或加害人,而华人为原告,或被害人;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或亲往,或由其所



派代表，亦可在俄国领事署观审。俄国官吏有执行判决之义务。

(十七)因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电线之一段，经过自治外蒙古境内，故议定将该段电线，作为外蒙古自治官府之完全产业。凡关于在内外蒙古交界，设立中俄派员管理之转电局，详细办法，并递电收费章程，及分派进款等问题，另由中国俄国及自治外蒙古所派代表组织之特别专门委员会商定。

(十八)中国在库伦及蒙古恰克图之邮政机关，仍旧保存。

(十九)外蒙古自治官府，给予中国驻库大员及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蒙古恰克图之佐理专员，暨其属员人等必要之驻所，作为中国政府之完全产业。并为该大员等之卫队，在其驻所附近处，给予必要之地段。

(二十)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暨其属员人等。使用外蒙古台站时，可适用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号俄蒙商务专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办理。

(二十一)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文件声明另件，及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号俄蒙商务专条，应继续有效。

(二十二)本约用中俄蒙法四文合缮各三份，于签字日发生效力。四文校对无讹。将来文字解释，以法文为准。

大中华民国四年六月七日 订于恰克图

俄历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宁夏至定远营大道

范立宪

宁定大道是阿拉善和硕特旗首府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到宁夏府(今银川市旧城)的一条车马大道。这条大道以贺兰山为界,分为两大部段,向东可下人烟密集的宁夏平原,向西可走人烟稀少的阿拉善高原。因山之两侧均为沙砾卵石遍布的冲积地面,故其道路基础坚实,大部分地段无须整修,即可通行驴马牛车。

宁定大道,唯山中路段往往被夏秋季节的洪水冲淤堵塞,因而必须在清除沙石淤阻之后方能通车。此段路程虽然并不算长,计约 10 公里,但却是喉拥舌结,为全路之大难,亦为古来关内外之至要。这儿三关继挤,势若葫芦颈相串,形势极为险要,故其历为兵家所争。靠近宁夏一端的山口名为头关(亦称“赤木口”)。自头关山口以北,山体高大,岩势陡峭;以南则平缓逶迤,因此,明代长城即由此口向南顺低缓山脉修筑到中卫迎水桥附近。从头关向西北上行 10 里即为二关。此处尤其险要,关路二侧,崖悬壁峭,沟窄如喉,真可谓一夫挡关万夫莫开。据《新西北月刊》载云:“二处关门均已不见,惟山上土堆尚存”,古代于此设防重重,两关意义之大足以见之。从二关再北行 10 里,即到三关,此处系山路之制高点,口路稍阔。这儿山高坡大,沟壑深曲;道路亦两面分坡,依山临陷。三关位居贺兰山中,三个关口均是贺兰山七十二口之最大隘口之一。阿拉善历代王爷都在三关口设卡驻兵。卡员由离关较近的蒙古族青壮年轮流担任,每两月一换,每人每年当卡

员6个月。这便是阿拉善旗早期的一种兵役制度。三关防卡原为蒙边军事防卫设施,但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和战乱的减少,随着各民族在交往之中的相互了解及地方便、民族间的关系渐趋和善紧密,这防卡也逐步由单一的军事防卫转变为防匪防盗和查私堵禁。

宁定大道从头关内外,东西分向。头关以外,向西折北,直走定远营,计程75公里;头关以内,向东折东北,直达宁夏府,计程45公里。宁定大道,全长120公里,沿途共经7站,尽全程需时3天。从定远营出发向南10公里至周家田;25公里至腰坝(蒙名“推里根”);20公里至长流水(因该地有一泉池,状如圆镜,清澈照人,原蒙名叫“陶里”,意为镜子,后因此泉泉水经年不息,且流量不减,故世人多用此名。相反,原名渐隐);由长流水向南再行10公里即达三关口。从三关折东5公里为二关;又5公里达头关。由头关偏东北行15公里至平羌(吉)堡;20公里至新城;又10公里即达宁垣。商旅往来,途中需住两宿。在腰坝、长流水、平羌(吉)堡三站点设有私营客店,专门应人住宿;其余站点的人家,三关的兵卡,亦可应过站商旅求宿。其中,平羌(吉)堡坐落于贺兰山东麓,远离宁垣,常有盗匪出没,故商旅于此投宿都有戒心。平羌(吉)堡虽言“堡寨”,但名存实亡,只不过是稀有数间民家土屋而已,居民均以养羊为业,不事其他。来往于宁定大道上的人在以上私人栈店内住宿,店主只收宿费和水、火费(吃食一般自备)。因宿价低廉(每人每宿2角。带牲畜者2角5分),兼之服务热情周到,以故行人乐至。

宁定大道上的货运,以牧,副土特产品及粮食、食盐为主。阿拉善与额济纳两旗,地处荒漠,不宜农耕,属纯牧业区。其地畜产品极为丰富。大量的驼毛、驼绒、驼皮、羊毛、羊绒、羊皮、羊肠、牛皮等畜产品以及甘草、苁蓉、发菜等土特产品便成为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主要输出品。据1940年《西北角半月刊》载:“羊皮每年可产五百万张,牛皮约六七万张;羊毛年产三十万斤;羊肠五万条,驼毛年产一万担以上。”这些畜产品,除蒙民自己使用一部分外,绝大多数运销内地。上文同载:“羊皮每年输出三百万张,牛皮约四万张,羊毛三十万斤;羊肠四万条;驼毛之输出约一万担左右。此外,马皮、驼



皮,狐皮等亦有输出,唯数量甚少。输入品以米、面、油、茶、糖、酒、烟、洋布,粗布及日用品为大宗。”上述商品除大部分在绥宁交通要冲磴口进行交易外,另一部分则由牧民用骆驼等运具,沿宁定路往返运输。当然,驮运到宁夏的是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各类畜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换购回来的是蒙汉各族牧民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清朝时,除磴口、石嘴子等交易市口外,“阿拉善蒙古曾议给腰牌三十面,各准十人以下随时进赤木、札峡、宿崑三口与宁夏城内民人交易,以羊只、毛毡、皮张、大盐易换布匹、米粮”。

食盐是阿拉善旗的主要矿产之一,产量极为丰富,且盐粒大而洁白,味道咸重,历来为内地人民所喜食。阿拉善各大盐池开发较早,尤其是吉兰太盐池。吉兰太盐池早在清“乾隆初年即已报效国家,归山西巡抚兼管,由部铸给印信,文曰:“吉兰太盐政之印”。清廷又在河西等处专设盐官,运销吉盐于晋省韩信岭以北四十八厅州县。自此以后,阿拉善旗各盐池相继开发,其经营方式也几经民办、商办、官办的多次反复,到民国时期,阿拉善旗各盐池先后由西北盐务管理局承租,分运各池食盐至一条山、中卫、叶升堡等地灌仓,实行官收,官销,并严格禁止私人运销,以免冲击盐价。这一时期,吉兰太、和屯池有部分食盐经宁定大道入宁。此时,三关等防卡又兼有查运私盐的职责。主要查禁食盐散销,以免影响叶升堡等地的灌仓。在马鸿逵统治宁夏期间,曾有严格禁止宁夏米面运至阿拉善旗的禁令,山后蒙民来宁夏交易必须以盐为易物。此种以蒙民奇缺而必需之粮食为诱饵,逼迫蒙民冒险私运食盐的做法,不但给蒙民带来难言之苦,亦给三关防卡增添了不少麻烦。

阿拉善旗地处荒漠,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现代化交通工具出现较晚,加上地方统治者的思想极为保守自私,一点也不重视经济文化的对外开放及人民生活的方便所需,所以宁定大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保持自然状态,极少有人予以专力整修。民国中期以前,这条大道主要通行驴、马、驼及各种木轮大车。阿拉善旗汽车出现甚迟,而早期的汽车通行大多由自宁定大道。民国 17 年(1928 年)旧历闰三月,轰动全旗的“小三爷事件”发生

以后,宁夏国民革命军西北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曾派人乘车前来调解,结果这辆汽车被人拦截、烧毁在南寺附近。这便是阿拉善旗汽车出现之始。民国21年(1932年),为迎接班禅九世额尔德尼来阿拉善旗,宁夏方面将省城至山口(头关)一段进行了整修,同时函请达王(达理札雅)整修山口至定远营段,阿拉善旗随即派蒙兵将此路段整修完毕。此次整修,双方虽然仅仅是除巨石、铲杂草、垫沟渠,对路面的宽窄,线路的曲直高低仍是顺其自然,但毕竟是该道形成后第一次大规模付诸人力的整修,路面有了较大的改善。其实这种改善也仅是比较而言,当时在这条路上行驶汽车仍然是很艰难的。《阿拉善南寺纪游(一)》一文在叙述班禅去南寺(班禅于民国23年12月来到阿拉善旗,于次年2月18日举此一行)时说:“出护兰门经南大街,两旁的商人都拥挤在门外观看。街头悬挂国旗,迎风招展,走尽街头(今巴彦浩特南梁街),向东而驰,依旧步入前次由宁夏来的大道,沙路溪泥,挣扎过去”。由此可见整修后的道路情况之一斑(此次班禅九世来阿拉善旗,分乘大小汽车七辆,其中小车两辆,一灰一蓝,大车5辆。这是继1932年达理札雅从北平购两辆“大道奇”车送先王之灵回旗后汽车在阿拉善旗王府的又一次出现。班禅临走时回赠阿王“福特”小轿车1辆)。汽车在宁定大道上的艰难于行,在后来的《阿拉善和硕特旗概况》一文中又有更具体的记载:“行行复行行,汽车因为道路的不平限制,只好随高就低的慢慢向前迈进。经过长流水、腰坝、周家田等地,于暮色苍茫,夕阳西下的时候,在车中渐渐看见远处山上的鄂博和眼前的小泉与星星点点的树林。一簇簇的人家前面便是我们的目的地——阿拉善”。当时的道路情形由此是可想而知的。

在宁垣至定远营正式开放班车以前,往返于宁定道上的汽车都由宁夏省府经营。那时还不是定期来往,一般只行包车,不办零票。包车价格不等,一次一辆至少130元至140元以上,无来回之分。包用者大多为游客商人以及旗政府之要员。所使用的汽车都是外国牌大卡车,不但已破旧,并且数量不多。这一时期,宁定大道上的交通工具仍是以各类马车及驴马为主。其中轿车(即客用马车),每辆可坐两人,座价40元左右,此亦为包车价;若以



日租乘,每日每人需 5.5 元至 7 元。每头驴租价 8 元至 9 元。至于驼、马则很少有人雇用。不论何种交通工具,由定远营雇用,则价格较由宁夏雇用为廉,因其由宁垣特雇而来,“归如顺便也”。一般地说,回归时的“顺便”脚价,轿车每人约 10 多元,驴则 1 元至 2 元即可。

民国 35 年(1946 年),旗政府有了自己的大卡车(俗称“大羊毛车”,是一种俄国造卡车,据说经常拉运羊毛),遂对定远营至头关一段路进行了又一次整修。但限于人力、财力和技术力量不足等原因,此次整修改善不大,道路仍然坎坷不平。民国 37 年(1948 年)2 月 24 日,宁夏公路局暂时实行定期向定远营发放班车。据民国 37 年 2 月 23 日《宁夏民国日报》载:“本省公路局缘定远营蒙胞于古历正月十五日间举行跳神大会,颇极热闹一时,故该局定有汽车两部届时开放该营,兹由今日起登记,乘客可即前往登记购票,以免向隅”。1949 年夏,国内局势已定,全国面临解放。这时宁夏马鸿逵部拟谋先把军运物资运往阿拉善旗南北两寺储存,然后占据贺兰山,以便做垂死挣扎,于是对宁定路进行了一番整修。此次整修仍是沿袭前面的办法,即铲高垫低,平整路面,并不裁弯取直。当然马鸿逵部的那种美梦是决不可能实现的,他们的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并不会挽救其自身的灭亡。

宁定大道自 1952 年定远营改名后,即被称为银巴公路。

宁夏至定远营捷径——苏峪口小路

范立宪

宁垣与定远营之间的道路,除了宁定大道以外,还有一条捷径,即“苏峪口小路”。该小路径直穿越贺兰山七十二隘口之一的“苏峪口”(宿嵬口),较“宁定大道”的路程短近百里,故“捷径”之谓是恰当不过的。

据说,此条捷径自定远营城建成不久的乾隆年间即开始形成,是由阿拉善旗牧民过山驮粮踏拓的。显然这是与定远营城的座建有关。

苏峪口小路全程只有 77.5 公里。尽管此途中部的山岭一段山道崎岖,坡陡路险,使人望而生畏,但除车夫叹憾而罢外,其他行人驮户都是愿从此道的。难一时而辞长途,其何乐而不为。走宁定小路,一般两日可尽。若有急事,破晓时乘马上路,夕阳西下时即可到达。宁定小路如此近捷,所以在清、民时期曾能得一时之盛名。即使到建国初期,此路亦仍是人来人往不失前情的。

苏峪口是贺兰山诸多隘口之一。在定远营建城碑文中有“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的记载,这是指定远营城府对贺兰山诸口的收控作用的,而在《小方壶斋舆地丛抄》里的《贺兰山山日记》一文中,却明确记有“口巨者三十有七,小者复一十有奇”(此四十八口之数与碑记相差二十四口。据书文内容分析,余数是包含在外口、中口、里口之一算中)。在“口巨者三十有七”的列举中就有这“苏峪口”之名,再依“苏峪口”位居贺兰山中腰之大山中,可见“苏峪口”为大口、巨口无疑。



苏峪口历属宁夏地区,在贺兰山东侧入山处。入苏峪口向北翻经贺兰山分水岭,即可下至与苏峪口隔山相对的贺兰山西麓沟口“樊家营子”。和宁定大道三关口一样,阿拉善旗王府在樊家营子历来也设有防卡,以作安全及防禁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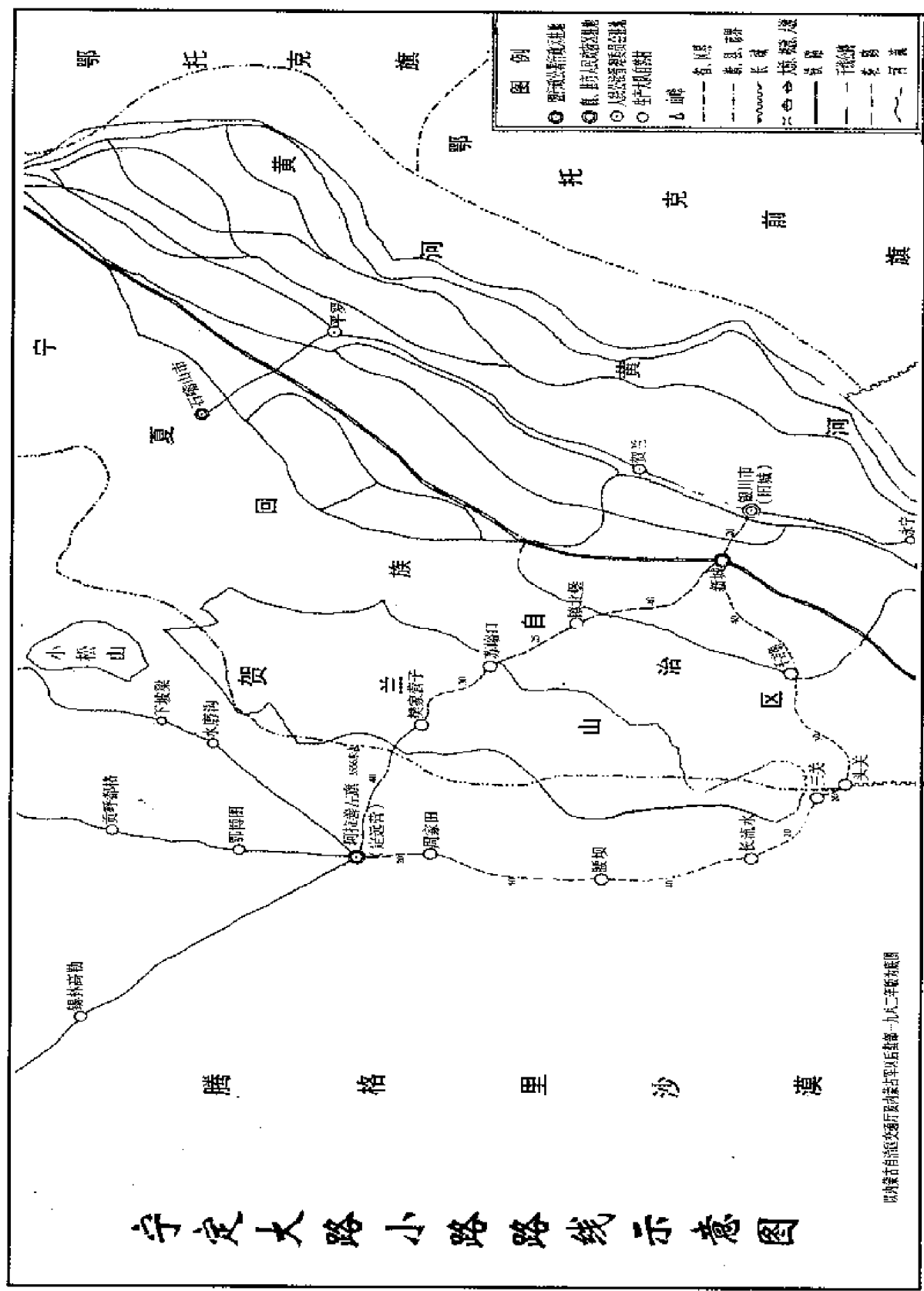
苏峪口至樊家营子一段是贺兰山东西之重要孔道,其不但历为兵家扼守必争,且又是关内外蒙汉族人民之间友好通益的重要渠口。以这段为至难至要的宁定捷径自被踏通之后,沿路行人络绎不绝,有赶驴骑马的(驼不能行),有肩挑脊背的。人们运物贩货,走亲访友,大行此方便之路,致使曾一时期的宁定小路上的景象倒大大繁盛于宁定大道。阿拉善旗王府雇人从宁夏购运物品,亦多走这条小道。据说在清末民初时期,宁夏地区有一姓安的“脚户”(专以受雇驮货谋生),养骡四五头,专为王爷从宁夏驮运食品。

宁定小路除山中一段比宁定大道坡陡,崎岖难行外,其他地段与大道地貌基本相同,多为冲积型沙砾平原。此路从定远营南大街始,过南梁、三棵树,20公里至樊家营子。此一段虽因山势路倾西北,但地形平坦,一无流沙淤道。此段路途宽平,不唯驴马可任意行走,牛骡大车也能通行。从樊家营子向东南,即开始爬山。说爬山却也不是登崖攀藤,是有山路的,不过是坡大路高而已。爬山5公里至半山腰上的黄土窑子(也是此座山峰的名字,蒙名为“沙勒库特勒”。此山远看状如马鞍)。此处路南一侧有土窑洞两间,为私人开设的店房,供往来行人住宿和休歇。路北一侧煤层浅露,亦有私人傍山而挖的窑洞,供采煤住用。由黄土窑子过小路最高部段,稍下东坡,2.5公里则到树头摇。从树头摇向东南下行2.5公里可到石灰窑,再行5公里则到苏峪口。在苏峪口,不但有私营的客店,而且有宁夏政府的专设税卡,行者亦可在此休歇或住宿。走出苏峪口,即进入宁夏平原。这里地面更为平坦,道路随山势向东倾斜,车辆于此通行更佳于山之西麓。由苏峪口东南行12.5公里达镇北堡,这里是川区村落,房舍较多,也有私营客店。因为此处较为繁华,食宿更其方便,所以往来行人大多在此投宿或大歇。由镇北堡继续东南行,20公里至新城,又折东10公里即达宁夏府。



沿宁定小路由宁夏流动的货物,以阿拉善牧区各种皮毛和贺兰山山阴之椽橧为主;从宁夏向西入蒙地的货物则多为米面、饲料及日用百货。宁夏与阿拉善西北这两大农牧要区,本来农牧产品的货运潜力是很大的,蒙汉民族之间的交益情谊也是很深挚的,但两地之间毕竟有大山阻隔,车辆驼骑不能行,驴驮马载也有大限,故而必然影响货物的大量运输,必然影响各民族间的更好通融。因而为适应人民生活需要,平辟这一捷径,确实是宁夏、阿拉善两地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的热切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对将宁定捷径改建为正式公路做了应有的努力。1955年5月、6月份,宁夏交通局拨款13万元,由宁夏、阿拉善旗两地政府调集民工100多人,对此路的改建做了一次尝试。这次改建,耗费了不少人力。初修的山路,坡度仍然很大,远远超过汽车爬坡的适应能力。故在工程验收时,作试行的重吉普车只能爬到半坡,不得已,只好由许多人手推肩抗地把车推至山顶,然后汽车才顺山坡下到定远营。先后两次试行都未成功。当时随车踏看路情的有宁夏交通厅副厅长李平、工程师李耀章及阿拉善旗交通局局长王励德等。这次苏峪口小路改建不得成功,主要原因是当时技术力量及资金不足。这次改建实用资金6万多元。因尚有资金远远不及攻坚所需资金,于是再修只得告罢。自这次改建失败后,汽车再没过苏峪口“问路”,“小路”也照行骡马。近30多年以来,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大量使用,随着银巴公路的一次又一次改善,宁夏至阿拉善旗间的物资便逐渐主要依赖汽车从大道载行,而苏峪口这条曾经极享盛名的捷径却越来越变得马少人寂鲜为人知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的进步。不过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更进一步发展,苏峪口小路还是要成为捷径的,只是,那将会是完全不同于此前的一种形样。



浅议腾格里沙漠中的阿拉善至民勤驼路

李万禄

阿拉善地区,与河西走廊毗邻相连。远在西汉之前,为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驻牧之地。到了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河西分置四郡,复分武威置张掖郡,分酒泉置敦煌郡,称之为河西四郡,阿拉善地在武威郡之列。到了隋、唐阿拉善属武威、灵武之地。从阿拉善孟根布鲁格古遗址看,阿拉善与武威地区在古代联系甚密。孟根遗址,西靠北山,周围均为沙漠。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00米。1974年,在此调查采集的文物有铁箭头、铁刀、陶片等。铁箭头长2.5厘米,三棱形。陶片多施粗绳纹,陶质粗糙。1972年8月,在该遗址东南面,曾发现墓葬一座,出土随葬品灰陶罐一件。上述文物,均为汉代遗存。

说及阿拉善地区的古代交通道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断变化,历史又造成断代史缺,许多地貌特征又被流动的沙漠淹没覆盖,随之地名也在不时的更易,这便导致了交通道路的繁杂多变。从其自然,民勤县境大部不在河西走廊之内,而在走廊北山迤东余脉的红崖山、黑山和阿拉古山一线以北,深居阿拉善高原中部,古代这里称为“猪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图注云:“黑水西河唯雍州……原隅底磧,至于猪野,广平日原、下湿日隰,猪野泽名”。这里古代也称“猪野”。《汉书·地理志》载:“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南山,指祁连山;谷水,今之石羊河;西汉的武威,今在民勤县境)。在远古时代,能把今之石洋河载入史册,这充分



说明,古代的谷水,水量大,流径长,很长一段深入阿拉善南部盆地中。既然阿拉善与河西武威、民勤一带在历史上(这儿主要指行政隶属)和地理上有如此紧密的联体关系,那么这两地区之间在远古时期人们来往的情形怎样,其水路交通的状况又是如何,这是必然要涉及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还是留待大方家们去考论罢。本人爱辑有关资料,经过调查访问以及对部分地区的实地勘察,在此仅以“腾格里沙漠之阿拉善—民勤驼路”为题,就其两地之间自清代以后一些道路形成的始末情形,陈述粗见,以供讨论研究。

一、腾格里沙漠道路的形成

腾格里沙漠中的道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的奔波中逐渐走出来的,道路是由少到多,由近到远,从绕道的弯路到取直的捷径逐步进化的。说及阿拉善—民勤驼路的形成,则需要从阿拉善左旗和民勤县的一些历史沿革以及某些与道路有关的因素提起。

(一)阿拉善旗的设置

阿拉善旗是清朝政府在和硕特蒙古设置的第一个旗。清朝的阿拉善旗,在河套以西(今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一带),属卫拉特蒙古,故又称“西套厄鲁特”。清政府正式在这里置旗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早在这20年前,由于厄鲁特蒙古诸部内乱,一些厄鲁特蒙古人向东流亡到西套地区,给清政府造成了许多麻烦,这就是所谓“西套难民问题”。阿拉善旗的设置,正是清政府处理“西套难民问题”的最后步骤。清朝政府为了巩固在阿拉善地区的统治,同时加强对准噶尔地区的控制,对厄鲁特蒙古首领和罗理赞许重用。和罗理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率属众到京朝见。康熙皇帝接见了,“赏宴视大台吉例,以御服貂裘赐之”。并希望他与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等“共相辑睦,善自安业”。十月末,清政府派理藩院侍郎拉笃裕等到和罗理驻地勘定地界。规定“自宁夏之玉泉营至贺兰山阴,自甘州之镇番口至额济纳河,俱以离边六十里为界”。其游牧地区与后来的阿拉善旗的地域基本是一致的。其间,西套蒙古诸部相互争夺,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政府主要依靠厄鲁特人的力量,才平息了内乱。当年十一月清

政府将和罗理部“视四十九旗例，编佐领”，和罗理亦“授以贝勒，另为一札萨克”从而正式设置了阿拉善旗。其后，清政府还采取了传统的满、蒙联姻办法，授和罗理的儿子阿宝为和硕额駙，并“赐第京师，命御前行走”，进一步密切了阿拉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定远城建成后，其自然成为蒙、汉各族人民进行贸易活动的要镇。也必然要以其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形成多条道路，阿拉善与民勤相邻的两地区之间也必然要进行沟通。但由于整个社会形势是时好时坏，由于一些地方的内乱与匪盗，致使这种沟通多缺安全保障；况且更大的阻碍还在腾格里沙漠。这时的腾格里沙漠人烟稀少，自然阿拉善旗与民勤间的直接道路难能形成。不得已情况下的传递公文、信件也只有靠轻骑捷径穿越沙漠（快马过大漠之情虽无明显依据，但由沙漠中至今还遗留着马路、马路口、马路井等象征性的地名可作推究）。

（二）民勤的沿革与人口的迁徙

民勤从西汉设郡立县起，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由于中原王朝的兴衰更替，归属各异；红崖山以北多被匈奴、氏、羌、鲜卑、柔然、突厥、党项、鞑靼等民族狩猎驰骋，交错驻牧。直到元兴灭夏，县为“小河滩，第存空城”（道光《镇番县志》）。明洪武五年（1372 年），民勤置临河卫，洪武三十年（1397 年）正月，又改为镇番卫。清雍正三年（1725 年），裁行都司，改并卫所为县，民勤始为镇番县。民国 18 年（1929 年）1 月 1 日，镇番县名因用贬义之词，不合时宜，才易民勤县至今。

从明朝永乐中期到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 年）的 300 多年中，由于人口的增长和自然地理条件及社会形势的变化，民勤人口除在县境内往来迁徙外，还有大量外迁。民勤人口的外迁，始于清季雍正初。外迁的原因，起初主要还不是县内人口多的缘故，而是清军入关占领河西以后，为发展生产，采取了移民垦荒的措施。清廷将甘肃、宁夏、青海 56 州县，2448 户居民迁徙敦煌。从康熙时起，民勤人口开始向新疆迁徙，大多以求官、谋业为目的。民勤人口的大量迁出，是在清末。清光绪九年（1883 年），民勤人口发展到 183131 人，客观生活的



物质条件已无法承受人口增长的需要。水源减少,河流退缩,就是最突出的问题。又由于河道治理不好,河水容易倒失在荒野之中,这必然严重威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除上述原因以外,壮丁、徭役、兵变内乱,灾荒疫病等殃害,亦使人口大量移出。民勤人口除向毗邻的阿拉善旗移入外,远去新疆,近走河套者为数不少。在西路驼道上(民勤以西向新疆),在包武诸路上,在向东向西的各大沙漠、戈壁中,出走的人畜久流不息。到民国8年(1919年),全县人口降至124631人,比清末减少了68500人。从此以后,便出现了“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没有天下人”的民间说法。

(三)水井与道路的关系

清乾隆年间,开垦民勤北部的湖区以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草原面积却越来越少。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要求农牧业生产有一个大的发展来相适应,以便满足人们生活的要求。首先畜牧业向农区外的草原扩展,逐步的深入沙漠。哪里有水,哪里去人。民勤北山地区接连腾格里沙漠的西北部,大片的荒漠草场因缺水无法放牧。腾格里沙漠北部,人称之为120里的旱麻岗(即岩岗或麻山),是鸟不入飞的地方。劳动人民为了利用无水草场,在天降大雨的时候,引山洪入山涧低洼之处,集水储存,这就是所谓的窖水。民勤北山有大窖、小窖等。由于雨水要蒸发、渗漏,只能作短暂的饮用。因此,从长计议,发展人工打井取水已是势在必行。人们在长期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积累了生产与生活的实践经验。人们根据地质、地貌特点和旱生、半旱生以及喜水植物的分布规律,来判断、寻找沙漠中的水源。由于沙漠中的一些地形特殊,也给找水打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看来有水,井打下去以后却不见水。如乾隆年间,定远营山西帮经营的货栈“祥泰隆”,在腾格里沙漠北部的贺兰湖一带,打了三眼井,井深近10丈,无一见水,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干井坑”的地名。据调查,腾格里沙漠中一些较深的井,早期打的算乾隆年间的居多。如板滩井、聂家板井、克头湖中井、罗家井、三道湖路口子井等,均系乾隆年间所打。此后,沙漠中的水井越来越多,随之道路也不断延伸,并逐步形成了季节性、半固定和固定性的一些道路。

(四)盐池与道路的关系

腾格里沙漠中盐池较多,且盐质较佳。这里我们主要从民国19年(1930年)的《甘肃盐法志》的记述中,择辑有关内容,来说明腾格里沙漠中的诸盐池情况,以便给我们对腾格里沙漠产盐历史以一个轮廓性认识,并有助于我们对沙漠道路的探讨。

盐为人生必需之物,它与稻、粱,黍,稷同其重要。故我国自黄帝轩辕氏时即有风沙煮海为盐之举,《周礼》又有“盐人之职,盐人掌盐政令”之论;阿拉善旗产盐地方甚多,与甘肃租赁经营的盐池可达十处之数。从有关资料看,产盐最早的可算雅布赖盐池,始于西汉。

腾格里沙漠中盐池有四个,即查汉布鲁格(克)、和屯池、红盐池以及同湖昭化寺(吉兰太盐池,地处乌兰布和沙漠;雅布赖盐池,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其两大盐池均不在此列)。由于地理环境,人烟稀少等故,这些盐池开产较晚。从《盐志》中看,清初兰州本地住户均食土盐有余,平凉、庆阳、灵州、中卫分销宁夏花马池之盐,其年发盐引(旧时官方发的运销食盐的专利权证)61440张,每引盐额1石。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至雍正十年(1732年)照数征解,并无新增盐引。又载:“甘肃产盐地甚多,历代盐法无从稽考,降及清季废引为厘。阿拉善查汉布鲁格(克)及雅布赖等盐池,先后转租于甘肃省。但与蒙古阿拉善旗约定,每年运送6万驮,试以每驮至少200斤计之,约在12万担,即1200万斤。和屯池、红盐池、同湖昭化寺等,产盐亦颇不弱。和屯池之盐一向运至叶升堡盐局,红盐池、同湖昭化寺则由中卫收仓。中、条(指一条山,即今甘肃景泰)两仓均为查盐转运机关,其产量之多可想。雅池开运以后,除由凉州收仓以便商贩外,还允其商人自由入池,驮运者岁在5万余担,即500余万斤。盐商仅知贮运查汉池之盐,初不注意雅盐。后因查汉池蒙驼时有运输不继,致误条盐脱销。情事经花定,榷税两局同商定,先将马莲泉盐局转设凉州,并置盐仓多间,专运雅布赖盐池青盐,以便商贩就近转运,寻又劝商贩自雇汉驼入池起运”。

总览《盐志》,从腾格里沙漠四盐池的产销过程中不难看出:(1)盐池正



式开产时间是在阿拉善旗设政以后,兴旺发达于清末民初。(2)年产盐在1000万斤左右。运转工具主要是以蒙驼为主。

二、腾格里沙漠中的阿拉善—民勤驼路

腾格里沙漠之道路,纵横交错。其中阿拉善旗通往民勤的道路虽然亦是不少,但其主要者则只有两条。阿拉善旗和民勤县之间东西直径不过450里,而实际行程却达325~420公里,近于直径的一倍半至两倍。现将此两条线路的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南路

南路全长420公里,到达民勤需经14~16站。其具体站程是:由阿拉善旗旗府定远营始,(中歇半道)45公里腰坝滩沙勒库岱;(中歇半道)45公里山根达赖(巴音温都尔);25公里赛尔格得井;20公里头道湖;10公里红盐池;25公里三道湖;20公里巴尔曾;35公里查汉布鲁格;40公里稍湖梁(伊克尔);35公里长湖;又35公里乔家窝铺(哈什哈);30公里青山小湖;25公里上银井;30公里达于民勤。

这条道路通行较早,它的特点是:(1)草地宽阔,适宜放牧。(2)湖盆井泉较多,饮水不缺。(3)沙丘较小,头道湖至定远营一段可避开沙漠接走大路。(4)人烟较多,有查汉池,红盐池的捞工,有三道湖庙、同湖昭化寺的喇嘛,在头道湖、长湖还有大商行永盛合、祥泰隆的分店。(5)道路比较安全,在稍湖梁等处设有蒙古兵卡,他们不仅收税,查私还防匪护路。(6)店铺多,如乔家窝铺等,便于各类脚户及单人沿途食宿。此路的不足之处是站多路远。尽管如此,往来商贩、行人仍以此路为主,直走北路者不多。

南路主要用于运盐、贩粮。其次有很多贫困的汉民因承受不了官家的徭役和兵丁的负担而出走沙漠草原,打短工、卖劳力,以求生存;一些小商贩以少量的烟、酒、糖、茶直接与牧民交易,换取皮毛、山货、药材等;一些牲口贩子,贩卖牛、驴。这些人的这些活动,也必然要经常地借用这条道路。在这里还需说及一点,盐运原为蒙驼承担,到了民国初年,由于蒙驼运输不及,才允许汉驼驮运。又因蒙驼起场迟,放场早,使役期短;汉驼则是起场

早,放场迟,使役期长,这便造成了汉驼接续蒙驼的客观条件。但是,蒙驼膘肥体壮,驮量重,驼链长,走小路,操捷径,如查汉池到定远营,蒙驼则可翻越高达近百米的南吉冷(郎)大沙漠,而多数汉驼却望而生畏。

(二)北路

北路全程 325 公里,到达民勤需经 11~13 站。其具体站程是:由定远营始,20 公里沙蒿口子;又 20 公里哈沙图;15 公里紫泥湖;30 公里刺窝子井;25 公里扣扣布鲁格;又 25 公里铁石杆;20 公里五个山子;25 公里罗家井;20 公里四眼井;35 公里板滩井;15 公里东镇;40 公里红柳园;35 公里达于民勤。

这条路是清朝乾隆以后才走通的,可谓沙漠中阿拉善—民勤间的捷径。但因其中有 60 公里的旱麻岗,缺水少井,无法行走,只有人工打井取水后道路方可前通。这条路和南路不同之处,除上述情况外,还在于它要从宁夏驮运大米及从贺兰山驮运椽木;又因罗家井、喽尔山、五个山子一带盛产沙米,在民勤遭到灾荒时,则有不少人到这一带采集野粮以度荒年。民勤有句俗语:“湖区人没走过巴音的不多,没走过民勤城的不少”。此话虽有夸张之意,但可说明湖区人民同阿拉善旗的交往是频繁密切的。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交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昔日百天路,今朝一日行。新的道路在不断开辟,而腾格里沙漠之古道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被流沙所侵淹,消失在浩瀚的荒漠之中。

瀚海长途——包头至武威路

李万禄

著名的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和三大沙漠衣连带接，绵延千余里。在这广袤的瀚海中，久有众多的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这里的人们不但建设了这人类社会的一角，并且踏辟出一条又一条沙漠之路，千里长途——包武路即是其中之一。从表面上看，包武路是武威至包头间的路，实际上它是整个河西走廊通向内蒙古包头、绥远（旧时亦称归化城，即今之呼和浩特）一带道路的代表性名称。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人们对这一通道又习称为“包绥北路”，因其在北而又取向包绥；包绥位居河套，河套俗称“北套”，向东北去河套的商客行人又被称之为“走北路”。在这条道路上往来的主要是骆驼商队，其次是赶驴的脚户以及徒步跋涉的各种行人。道路的很多地段也可通行木轮大车。包、绥是商道中转站，尤其包头又是黄河岸边的水路码头，众多的商队聚集在那里。那里货物堆积成山，同时又可疏向四方。因此，包头是内蒙古中部最重要的交易市场。

包武路，历史悠久，在水路交通尚未大力开辟的古代，北路便是我国北方通向西域的“丝绸草原路”的主要区段。西汉时期，北方匈奴部族通过武威或酒泉而入向河西走廊大多要利用包武路段。因此，包武路在历史上对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

一、道路概况

包武路是华北连接西北的交通纽带。道路由西南向东北通过民勤盆



地,经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西沿的戈壁地区北上。此路东西斜向,与南北诸条插线纵横交错成一网带。在阿拉善地区的哈拉毛台,大水沟、图库(克)木和接近河套的太阳庙、七块子等地点,由于客商、驼户目的不同,去向有别,道路便多有分岔。在狼山阴山地带,道路又有前山、后山和南路、北路之分。诸多行人在至于这些分岔地带,可各从所适,有抄捷径去黄河渡口将驼运改换成羊皮筏子水运的;有走人烟较多,住食方便的河套平原的;有赶草场绕道后山,不辞艰难路远取利于骆驼放牧的。然而不论何种分途,最后均归结至包、绥二地。阿拉善是西北通向华北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包武路大部分区段又在阿拉善旗境内,沿路主要站口设有兵房、税卡以及汉商的货栈,客店草料场等。这些站房扼据在道路的要冲。一个时期,俄国、瑞典、日本等外国旅行考察家也不时出现在包武路这条驼运道上。

包武路沿途均生长有旱生、半旱生植物,植被率一般在30%以上,这些植物可供各种役畜自由采食。狼山、阴山之后,植被率较高、植株繁多的好草场,大帮驼队多走山北路。不同行业的商队一般不愿合帮,以免出现饮水拥挤争抢草地等不应有的麻烦而影响进程。一般驼队驼数多在200峰以下,军商、洋行驼队则较庞大,驼数多达三四百峰,有大帮响铃之势。一些少量的自运蒙驼往往是离道孤行,越站歇息,以避免与其他驼队的接触纠缠。包武路沿路一般水源不缺,各井泉水中虽然矿化度不同,有淡有咸甚至味苦,但都可供人畜饮用。包武路上无水戈壁远不过百里,驼队毋庸其说,即便是那些赶驴脚户,单独行人,也不必存在前不沾井,后不靠店之忧虑。

二、线路细及

(一)包武路

从武威通过民勤盆地,过沙磧、沼泽,翻越丘陵、麻岗,进入河套平原到达包头。此路线的站点里程情况是:从武威计始,35公里至蔡旗;25公里小口子;30公里头井子;35公里小井子;40公里团山子;35公里死红柳井;25公里白疙瘩;30公里白马岗;35公里深井;20公里下力马山;25公里可波浪海子;20公里河北道;30公里哈拉毛台。此路段计13站,385公里。自哈

拉毛台以东,包武路分南北两条,一条向东走阴山之前,可称南支路;一条向东北,走阴山之后,可称北支路。南支路自哈拉毛台始,30公里马莲泉;40公里三个井;又40公里牛毛泉;30公里大水沟;又30公里图库敖包;从图库敖包向东进入巴彦淖尔盟地界,到太阳庙便进入河套平原,再沿狼山,阴山山麓,途径乱水泉子、柳树泉子,东西皮房、小余台、大余台等站,最后到达包头。南支路20站,长660公里。北支路自哈拉毛台始,40公里巴音温都尔;30公里红古尔玉林;35公里图库(克)木;从图库木向东进入巴彦淖尔盟地界,沿后山草地经苏宁乌苏、兵房子、哈沙图、海流图、羊肠子沟,大余台等站到达包头。北支路亦20站,长705公里。从武威到包头共经33站,近道全程1045公里,快速行走1个月可达。

(二)张掖插线

从张掖向北再折东偏北行,沿北大山、雅布赖山的南麓和巴丹吉林沙漠的东部边缘,穿行盐湖、碱滩、草地、戈壁,绕过狼山、阴山到达包头。此路的站点里程情况是:从张掖计始,15公里至山丹桥;27.5公里托石子;35公里转嘴;50公里西井;37.5公里麻山井;40公里含水;30公里沙石滩;25公里北双疙瘩;35公里贡湖土冬;45公里雅布赖;20公里白石头;25公里肋巴井;30公里牛泉;20公里套海;25公里可波浪海子;从可波浪海子入接包武路。插线部分计15站,460公里。商旅若从张掖出发接道包武北支路到达包头,则需经37站,1215公里,全程一般37天可到。此路站点较多,运行方便,无特殊情况毋须劳站,若赶站快行,可以提前数日到达目的地。

三、运输情况

清末民初,西北地区交通十分落后,这大大影响了这一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一些东去北京求学的人,因无汽车可乘,不是绕道搭乘西伯利亚的火车,便是乘坐黄河上的牛皮筏子,顺流而下,冒险航行。基于这些情况,西北与华北的物资交流,商品贸易,长途运输,大量的还是只得依赖骆驼进行。清朝开国以后,康熙皇帝励精图治,对内重视安定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对外维护国家主权,抵抗侵略,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和沙皇俄国的



殖民扩张,以至到乾隆皇帝初期和中期,国势达于鼎盛,使得这 100 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康乾盛世”。就在这个盛世时期,山西之太原、大同、汾州,河北之天津、宣化和张家口等地的商人组成了所谓“西帮”商行。他们的货栈和分行遍布于内蒙和河西走廊的各个要塞。西蒙地区的贸易中心是在定远营和百灵庙两地,河西的贸易中心则是武威和张掖。在京张、京包铁路相继通车以后,英国天津洋行的臂爪又伸向青海的西宁、湟源及甘肃的临夏等地,以便掠夺西北的羊毛。接着美国、日本外商又进入了内蒙古草原。自此,方兴待起的西北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旋即衰败下来。长期以来,包武路上东西往来的物资主要有畜产品,粮食、布帛、棉花、药材、茶叶、烟酒、日用百货、家具器物以及鸦片、军火武器等。现就其主要物资的运销情况分述如下。

(一) 驼羊毛

驼羊毛是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的主要畜产品,也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其多数出口国外,被西方制成毛线、毛呢等,回过头来,再向中国进口,以便从中牟取暴利。以西蒙地区来说,各帮商行,通过他们在苏木、巴格设立的分店(亦称扎子)进行驼毛、羊毛等物资的收购。他们将蒙汉牧民需用的商品,先以赊销放贷的形式记账售给牧民,再于畜产品收获季节进行收购结账。在商品与其他物资的贸易上,多以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对于以钱购销的商品,多用银币、铜币,纸币则很少使用。各商号都有自养的骆驼,自成商队,每号有驼少则几十峰,多则数百峰,可随时转运商品物资。他们把货物先集中于总行,再行分发。分店除养驼外,也养骡马牛羊。当许多牧民以一年的驼羊毛收入不足以抵销所购买的商品时,还得拿出骆驼、牛羊顶付。因此,草原上的商号,既经营商业,又经营牧业。以民国 30 年(1941 年)前后定远营的大商号“祥泰隆”在树贵的分店为例,平均每年收驼毛 5000 公斤,羊毛 1000 公斤,骆驼几十峰,牛七八十头,骡马三四十匹。仅定远营大一些的商号,在各地设的分店就达四五十处,这样在阿拉善地区也就形成了一个商业网。武威、张掖地区所有的山西、陕西、河南各商帮以及当地各大商号所收购的畜产品,主要是祁连山一带牧区的羊毛和珍贵兽皮。在收购季节,商

号派人驮货进山,直接向牧民交易。其畜产品的大多数则是由二道毛贩子,从牧民手中购回后,驮送商号,交易以货币为主。各大商号除自有的商队外,还雇专运驼户。秋后收购季节,是骆驼膘肥体壮、起场使役时期。集中于各大商号的羊毛,便起运发货,这时,人们又听到了包武路上的驼铃声。

清末民初,英国在天津的新泰兴洋行,在甘肃的河州(今临夏),青海的西宁、循化、湟源等地设庄,以收购羊毛为主,以收购皮张、肠衣、药材、猪鬃等为辅。河州庄除收购河州一带的皮毛外,主要管辖甘南藏族牧民的皮毛收购。从甘南一年收购的羊毛总量约在 72.5 万公斤,被全部运到河州集中,再由河州运至永靖黄河岸的孙家嘴,然后雇用牛皮筏子水运至包头。每筏载重三四万斤不等,水手 10 人以上,牛皮筏上插有英商、德商的白旗,上书“保护”二字,并有英文或德文。羊毛启运时,散布在上下百余里河面上的无数毛筏,一齐行进。浩浩荡荡,情势甚大。沿河一带税局人员见有洋行旗帜,不敢查验,任其通行。但黄河峡多水急,一遇不测,筏翻毛沉,水手逃命。青海西宁、循化、湟源等地的羊毛,多以骆驼驮运,沿着阿拉善蒙旗上青海喇嘛寺朝拜之路,到达武威便接上包武路,运到包头。返回时部分驼队再驮上水上用过的牛皮筏子,这就叫“沙漠之舟”驮“水上之船”。

另外,从价格上,帝国主义对于西北地区的掠夺更是惊人。羊毛的收购价格,一开始就被洋行压得很低。清末每百斤只值 1 两 8 钱白银;民国初年,每百斤为 2 两七八钱,民国 3 年升至三至四两;民国 4 年虽曾陡涨了一次,却旋又降落。民国 7、8、9 三年时,羊毛价格维持在白银七八两之间,无多大变化。然而,在民国 1 年至 3 年期间,天津羊毛的销售价格,却是每百斤白银 30 余两至 40 两;民国 5 年至 9 年,上升到每百斤 50 至 70 两,与河州收购价格相比,洋行获利已近十倍。这还只就原料转销比例来说的,若是羊毛经外商略作加工,仍以河州羊毛价格比算,则要用羊毛 3500 公斤,才能换到进口羊毛线 100 磅,其利差约为 78:1。

(二)甘草

甘草产于我国东北、西北和华北,宁夏甘草以味甜、质优闻名中外。曾



一时期,宁夏甘草就包括阿拉善地区与杭锦后旗一带的甘草。河西甘草产地甚多,有敦煌、安西、玉门、金塔、酒泉、张掖和民勤等县。民勤甘草仅次于宁夏,河西其他各县的甘草因构质松软,容易出水发黄,谓之“黄草”,质次。由于甘草用途广泛,所以商情很好。既能出口,又可内销。民勤每年发运包头的甘草在 500 担以上(每担 150 公斤),出口的称为“天津”,根细质次的刮去外皮称“白粉”,转销南方。每年发运在包武路上的甘草数量不少。因甘草不同于其他物资,可驼运至阿拉善大水沟,再插道直去河套七块子。因那里设有大生号的税卡和甘草经营站,在上过税和办理过转运手续后,便可辞去驼运,通过人工河道入黄河到包头。

(三)茶

马合盛茶号,经营西北茶业,总栈茶庄设在兰州中山路。其兴旺发达于清朝中叶,马合盛本人被号称为甘肃百万富翁。为解决运茶工具,马合盛在家乡(甘肃民勤县)大量饲养骆驼。据说他仅白骆驼就有 300 峰,马合盛茶号至清末时,因给清廷捐献 10 万两白银,皇帝以护国员外郎诰封赉政大夫,官是封大了但经济实力却大亏,故逐渐衰败下来。马合盛以售湖南茯茶为主,不营别业。他以自养的骆驼组成运茶商队,先从兰州发货运至内蒙古定远营和百灵庙等地各大商号,再运转各分店经销。茯茶因叶多、茎少、坚硬、味美而著名。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的蒙古族,除包头的川茶、米心茶外,喜饮马家老茯茶。茯茶每块 2.5 公斤,上印“大引商人马合盛”(大引:引,旧时官方颁发的货物运销凭证;大引,此处有自诩意)字样,民人是以马匹、皮毛、药材等易得茯茶的。马合盛茶号经常派有文化的主事“掌柜”,到牧区了解用茶民族的生产、生活变化,以达到购销两旺的目的。并且因为商风较好,相互信赖,故能以茶为媒促进商号与牧民间的友好关系。有些小的民族纠纷,清政府往往指令茶号出面调解。马合盛茯茶每年输入内蒙古、宁夏者在 5 万公斤上下。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占领了汉口,封锁江岸,江南的茶叶大量运往日本,马合盛茶号停止购集茯茶,转事还债及微销库存,从此再未兴起。与此同时,甘肃所有茶商之事业亦逐渐衰退。自这以后蒙古族

所喜饮的老茯茶,也多改为川茶了。

(四) 鸦片

在清末至民国期间,甘肃穷困,百姓生活拮据,而政府的苛捐杂税却屡增不减。清宣统年间,甘肃财政困难,藩库无存,因此陕甘总督长庚对鸦片采取放任态度。种、运、销、吸一概不禁,以收烟税,挽救危机。农民亦因种烟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填统治者之欲壑,于是相率种烟。当时甘肃产烟甚多,陇东一带的烟土运销山西、河南、河西地区的主要产烟县份是永登、古浪、武威、张掖、民勤等。在鸦片种植兴盛时期,有的县区的植烟面积超过10万亩,年产烟土在百万两以上,致使一时间出现遍地罌花,烟馆林立的异特景象。武威所产“水浆”烟最负盛名。河西鸦片除在当地“烟馆”(既吸又售鸦片的所在)、“烟灯”(只吸不售鸦片的所在)销售外,其大宗运销包、绥,运转津、沪。所谓“五凉货”的“水浆烟”,因其制造“白面”(从鸦片烟浆中精炼出的一种白色粉状物)时出货多,所以大受欢迎。在从清末到民国29年的30多年中,包武路,简直成为一条贩运鸦片的专道,军商,民商、小烟贩子、驼帮、马帮、驴脚户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宁夏、绥远政府,紧抓鸦片过境税(这是财政上看不见的大收入),在道路的要塞,如可波浪海子、哈拉毛台、大水沟、图克木、羊肠子沟和百灵庙等处,驻兵丁,设税卡。对于鸦片烟税,政府要收,王爷也要收。百灵庙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所主持的蒙政会和晋绥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争收鸦片过境税。一些小商小贩,多数绕道偷行,躲避税卡。包武路的繁华,巨商豪富的经由,使得盗匪注目,他们明抢暗偷,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条道路难得安全。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甘宁青长期被“马家军”(系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四军阀)割据,这个时候包武路亦为其使用。除西宁至拉萨的线路外,“马家军”物资的主要运输线即是包武路。他们每年用骆驼起运黄金、白银、鸦片等,银元1万元、黄金数千两的运务动辄可行。马家派遣军队,大量贩运鸦片于阿拉善、包头、绥远、天津一带,以换取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他们分设在京沪陕甘各地的办事处,历来也担任着以重价收购



枪支的任务。驼运道上的鸦片,装在写有“军火”字样的箱子里便可畅行无阻。不仅如此,押运货物的马家军兵还以各种手段盘剥道路上的牧民,商贩和其他行人,甚至随意抢劫。

四、商旅保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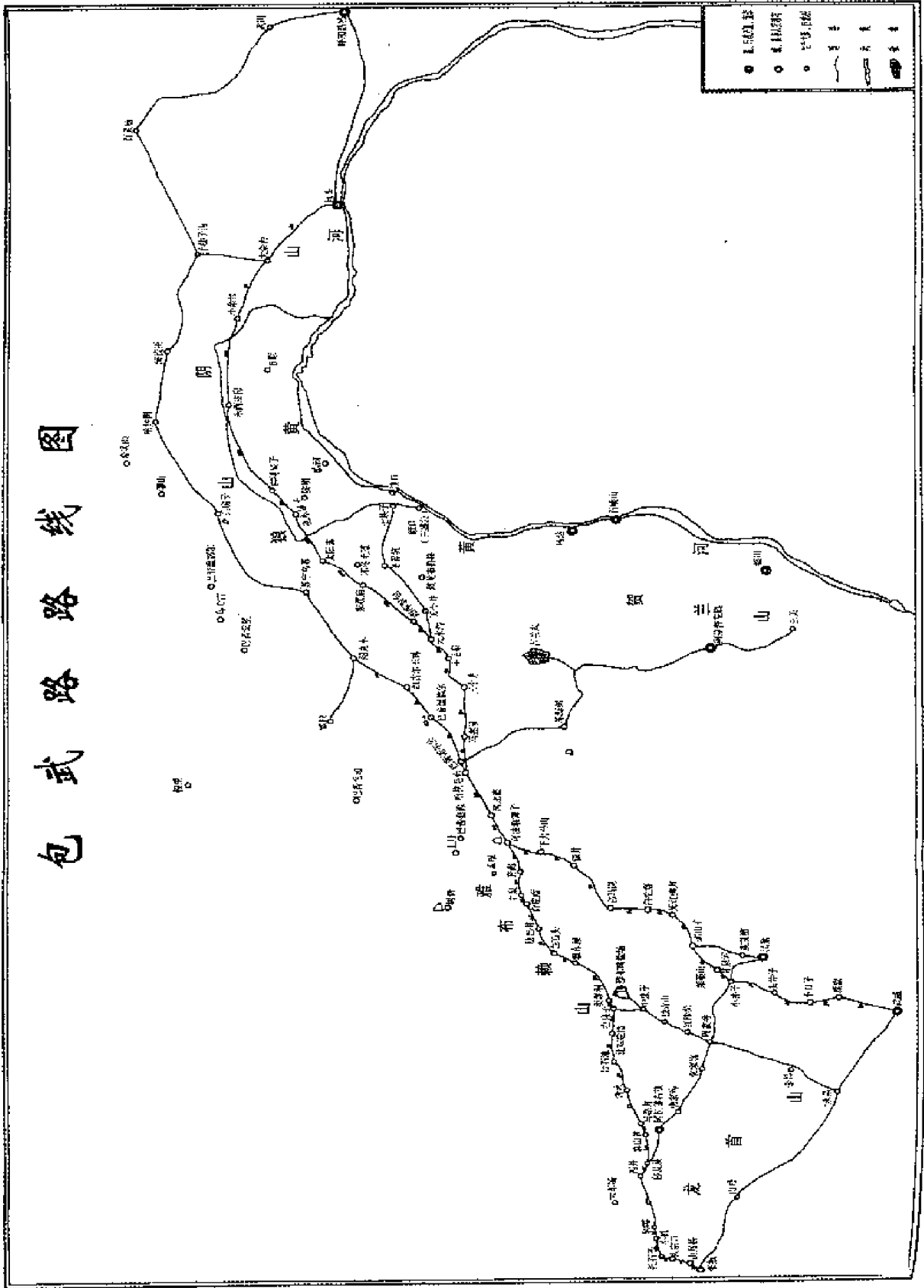
清代有武艺的人,受雇于富商大贾、达官贵人,为其保护财物和人身安全,被称为保镖。西北地区,地主庄院多以堡寨防范,因此保镖亦称保庄。包武路,一时期因匪盗猖獗,商旅往来减少。很多驼户,畏于道路艰难,改事河西短途运粮或走泾阳、翻汉中运货。这便影响了阿拉善、宁夏、绥远的物资运输和税收。民国5年(1916年)以后,甘肃禁种了一个时期的鸦片。这时新疆西部哈尔湖附近大量种烟,当局亦无禁令。新疆烟土由回族“马客”运到哈密,再转运河西。后来在甘肃出现了所谓“保镖局”,由商人将烟土封箱点交与镖局,在按箱付给保镖费后,经由镖局的镖车起运,到指定地点再由镖局点交与商户。镖车一次出动10辆,有镖客多人,荷枪佩刀,插旗呼啸而行。为保道路安全,绥远商会组织了“保商团”,分驻归化城、武川、百灵庙、哈沙图等要地。因保商团的收入要分成上缴地方政府,所以也得到政府承认。保商团多是地痞流氓一类的乌合之众,有些是“洪帮”分子。他们对不实行保镖的商客在其遭受抢劫后,不但不同情相助反而坐地分赃。因此,一些土匪也入“洪帮”。这真是“商通九州、贼通九州”。实际上“保镖局”对大商贾的货物尚能实行保护,小商贩的货物还是很不安全的。

民国29年(1940年)以后,西北地区鸦片烟的种植,已彻底禁绝。而包头一带的萨拉齐等地,存有很多陈货返销河西。并有很多假烟混销,这使很多偷贩鸦片的人,破产于包武路上。

包武路,是历史留下的一条深深的驼道印,它横贯于阿拉善地区的中部,它曾效宜于西北人民。今天,它虽被时代的车轮所改观,但我们是不能忘记给它留下这历史的一笔。



包武路綫圖





话别定远侯与定远营

李万禄

在《西北角上的定远营》(1937年赫非著)一文中,有“定远营的城堡,据说是汉朝班超所筑,班超封定远侯,因而有定远营之名”的说法。此说显然是因名近而混,完全搞错了。人们轻率地引用无根据的二手资料,往往容易造成以讹传讹,贻误历史的弊果。笔者依有关文献,略陈史实,区分鉴别,以正视听。

班超,字仲升,是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父亲班彪,在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部下任官。班超是在甘肃河西出生的。其兄班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二十四史中的《汉书》,就是班固所撰。班超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后汉书·班梁列传》中说他少年时,“人为人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被召诣校书郎,班超亦与母随至洛阳。因家贫,班超为官家抄书以供养母亲。他曾投笔叹息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汉书·班梁列传》)。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北匈奴(在今甘肃、新疆以北)更加肆无忌惮地“胁诸国共寇河西”,弄得“郡县城门昼闭”。汉明帝应西域各国的请求,令窦固为奉车都尉,屯兵武威。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42岁的班超以“立功异域”的决心,参加了窦固的队伍,被任命为假司马。后“固以为能”,特遣其出使西域。

班超一生的伟绩是沟通了塔里木盆地南北的两条通往葱岭的大道。他开始仅以 36 人之众,联络鄯善、于阗等国力量,击败了北匈奴的进攻,从而使西域人民获得了和平与安愉,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经过班超等人 22 年的艰危努力,北匈奴对疏勒、莎车、龟兹、焉耆等国的控制终于被先后解除。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 91 年),班超和将军窦宪配合行动,大败北匈奴于金微山地区,俘单于母阏氏以下 5000 余人,并使单于远遁,从而解除了西域人民的心腹之患。同年 12 月,汉又在龟兹(今新疆库车)置西域都护,威振西域的班超,被任命为中断了 70 多年的又一任都护。永元六年(公元 94 年),西域 50 多国都和汉通好,各属国人民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的“丝绸之路”主道亦尽皆畅通。第二年,即永元七年(公元 95 年),在班超 64 岁的时候,汉和帝下诏书赞扬班超的功绩。诏书云:“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以西。超遂逾葱岭,迄县度(迄,缒绳而过。县度,地名,今克什米尔以东地区),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诏书中的最后一部分话语,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班超在西域的功绩。这一年,他被封为定远侯。

班超 42 岁出使西域,至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历时近 30 年,与西域人民患难与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时,他已经是头发无黑,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的老翁了。当年随行的人都已物故,迟暮之年使他越来越想回到中原的故乡。“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后汉书·班梁列传》)。他的妹妹班昭也替他委婉陈词,汉和帝终于为之感动。永元十四年(公元 102 年),班超以 71 岁古稀之年,回到了东汉首都洛阳。“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身校尉。超素有匈(胸)肋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吊祭,赠赙甚厚。子雄嗣”(《后汉书·班梁列传》)。这位古代勇士,8 月还朝,9 月与世长辞。班超不仅为“丝绸



之路”的复通和西域人民的安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还为中华民族留下了“立功异域”的一代雄风。

古籍称“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又曰“定远故城,在今洋州西乡县南”《贞治通鉴》四十八和《后汉书·班梁列传》三十七,都有明确。洋州,位于陕西省南部,汉江上游。晋设兴道县,北魏改置兴势县,唐复改兴道县,为洋州治;元废县入洋州,明改洋县。西乡县在洋州之南,大巴山北麓,汉江支流牧马河流域,三国蜀置南乡县,晋改西乡县。洋州西乡是山清水秀林茂富饶之地,班超所封定远侯邑地,便在此处。

定远营,一称定远城,亦称王爷府。城在贺兰山西麓,距宁夏边界约60里。是阿拉善厄鲁特旗札萨克和硕亲王的驻地。“据考证,有近300年的历史。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为稳定西北的蒙古族部落,岳钟琪奏请清王朝建坝守城,名‘定远营’。据定远营碑文记载:‘贺兰山北,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径,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奉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1983年《阿拉善盟公路交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

“定远营”之称,因不合民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改为“巴音浩特”。查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全国属称定远名称的地名有:贵州的定远府、定远所;安徽的定远县、定远郡、定远州;河南的定远店;陕西的定远厅;甘肃的定远县、定远军,定远营的地名只有阿拉善旗王爷府一地。

综上所述,东汉班超于公元95年赐封的定远侯在陕西;清王朝于公元1730年诏书中的定远营则在内蒙古。其时间相隔1600多年,其距离遥在数千里。且班超从河西到洛阳,从洛阳使西域,又从西域诏回洛阳归宗,从来没有别离过,从正史中也没有留下与定远营有关的疑点。据此可以论定,定远侯与定远营是无任何牵连的两回事,不当混为因果相成之一体。

雅布赖盐池及其运道路

李万禄

池盐,又名课盐。它产于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内蒙古及宁夏等地。池盐类型很多,论其质味较好的食盐,还数内蒙阿拉善地区的吉兰太、查汗池和雅布赖池等盐为上数。

一、雅布赖盐池的地理位置

雅布赖盐池位于兰新铁路以北的阿拉善右旗地块,被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和东部的腾格里沙漠所包围,南距河西堡火车站约 138 公里。盐池地处雅布赖山下,三面环山,中部低洼,地形由西向东缓慢下降,呈现为地槽形的盆地。在地质运动时期,形成内陆湖相沉积,由于地处干旱的荒漠高原,年降雨量少,蒸发量大,湖中之水,因蒸发逐渐减少或干涸,这便造成了地表盐分的大量聚集,周围形成盐渍化地带,中间成为盐湖。池中之食盐,以产地而言,称为“雅盐”;因它颜色青白很少杂质,亦作“青盐”,蒙语称“库库达布苏”;池地所产之盐晶体大,色白如玉,质味咸美,曾作贡品,因此谓之“贡盐”或“黄盐”;在历史上远销陕西的“雅盐”因多系镇番(今民勤)骆驼驮运,在秦岭南的汉中地区,又称“番盐”。因其色味俱佳,“番盐”比青海的“老盐”价高一头。雅盐因有除疾解毒之功效被纳入中药,在民间广泛应用。

二、雅布赖盐池的历史演变

雅布赖盐池,采捞食盐的历史,始于汉代。西汉疆域政区,分全国为十二刺史部和司隶部及西域都护府,有郡国八十五(西汉后期的地方行政区



划分为一百零三郡)。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5年)御史大夫桑弘羊,请以东郭咸阳孔仅等为大农部丞数十,分主郡国盐铁官凡二十八郡,凉州刺史部的酒泉、武威、金城、陇西、安定诸郡,朔方刺史部的北地郡均属其管辖范围。因此,西汉时期,北国的盐池,已是制定了盐政、盐法的。

雅布赖盐池的历史,《汉书》中已有记载,这从《汉书·赵充国传》中可以知晓。赵充国是西汉杰出的军事家,他从23岁到86岁,在河西边塞,安羌定邦,报效国家,戎马生涯几十春。他对北匈奴于西羌人的活动区域,往来关系,乃是深思熟虑,了如指掌。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羌人与匈奴采取了联合军事行动,扰乱汉边。宣帝下诏征求赵充国的意见,在谈及匈奴与羌人的联络道路时,赵充国云:“疑匈奴更遣使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阮,入穷水塞,南至属国,与先零相直”。赵充国在反对从张掖路出兵进攻羌人时说:“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为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人,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赵充国的这番话,又是根据在此数年前匈奴入日勒,番和的事件而言的《汉书·匈奴传》云:“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今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山丹县西北)、番和(今永昌县西)。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从赵充国的呈词中,不但阐明了匈奴与羌人联合,重犯河西汉边的路线;同时也道出了“盐泽”的历史名称于地理位置。

根据这一情况,可以明白地解释以上所引的那段话。沙阴,即流沙,今之腾格里大沙漠的西侧。盐泽,即修屠泽(今民勤县北)以西的大盐池,今日的雅布赖盐池,此盐池汉代已经开采,汉河西地区食盐主要靠此盐池。长阮和穷水塞,应在日勒、番和北,《匈奴传》称:“匈奴斗入汉地”,正在此北面。由此表明,今日的雅布赖盐池(即汉代的盐泽)便处在由阿拉善中部地区,通向祁连山的南北古道上。

三国魏黄初元年(220年),凉州属曹魏之地,统领敦煌、酒泉、西海、张掖、武威金城、西平等郡。凉州治所首次由龙城(今秦安县东北的陇城镇),

西迁于武威郡治姑藏城,时辖7郡42县。这是世称姑藏为凉州的开始。后魏明帝以凉州绝远,又是隔西羌,通西域的要冲,便调原尚书郎徐邈(字景山,燕国蓟州人)为凉州刺史。三国初期,战乱连绵不断,凉州地区造成战争创伤;其间又天年干旱,粮食奇缺,人民生活拮据。《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说,徐邈从长计议,立定了“务农积谷,立学明训,进善黜恶”之良策,励精图治,造福人民。为应急百姓之疾苦,徐邈向朝廷上书,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三国志·徐胡二王传》载:“河右少雨,常苦乏古,邈上书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三国时期徐邈修的武威、酒泉盐池,系指雅布赖盐池。三国魏时期,民勤设武威,宣威二县,武威盐池便是指其池为武威郡的辖地。武威郡治所姑藏,并无可开采的盐池。民勤境内的其他盐池,是明、清时期才开辟的。如汤家海子盐池,据《汤氏宗谱》记载:汤氏于明朝年间,由河南迁徙镇番(今民勤),祖先汤章老,气壮胆大,臂力国人,开办盐池,维持生计,盐池也因始于汤氏而的名。徐邈同时要修的酒泉盐池,其地则在高台盐池湾地,也是指酒泉郡的辖地。《唐书·地理志》记:武威有“微兴盐池,黛眉盐池”,地在何处,本文未作考证。1958年《河西志》上讲,北魏时期也曾修过武威、酒泉盐池。清朝时,武威学者张澍,辑乡邦遗籍数十种,他所编辑的《凉州记》中载言:凉州“有青盐池出盐,正方寸半,其形似石,甚甜美”;又曰:“西海南有青盐池,盐井所处青盐,四方皎白如玉。山丹卫即张掖地,有池产红盐,色红,此二盐,即戎盐之青、赤二色者”。张澍所辑“西海”一名,在《水经注》《汉书·地理志》《镇番县志》中均有记载:谷水(今石羊河),出姑藏(今武威)南山,北至武威入海;流分为二,一入休屠泽(民勤北),俗谓之西海,一入猪野,谓之东海(白亭海),通谓之都野。

综上所述,雅布赖盐池即是汉代的盐泽,也是三国曹魏时期的武威盐池。它的地理位置,在流沙之中的修屠泽(即西海)之西,在匈奴于羌人联合作战线路的南北古道上。汉代的修屠泽,范围是很大的,谷水也是很长的。我们不能视其汉代的修屠泽为今日退缩,干涸的青土湖(民勤北)。



三、雅布赖盐池的重新开采

雅布赖盐池的开采,创始于西汉,繁盛于三国。以后由于改朝换代,归属各异等种种历史原因,雅盐时产时停,以至采盐完全中断。直到清代,内蒙古阿拉善所属雅布赖等十盐池,先后转租于甘肃,雅盐才继续受到重视和利用。《盐法志》云:“雅布赖蒙池,地处凉州直北地方,亦属阿拉善旗,同为租用十池之一。位于擦(查)汉布鲁克池西北方面,与擦池相距约计五百六十余里。池形椭圆,周围约有三十余里。纯产青盐(多数盐池属白盐),盐之质味与擦(查)汉池所产初无区别,产量最富,亦系天然凝结而成”。《盐法志》又云:“雅布赖则在马莲泉直北地方,面积较花池为大,产量至于不可端倪,旧与蒙古阿拉善旗,约定每年运送六万驮,试以至少每驮二百斤计之,约在十二万担,即千二百万斤。而其池存之盐尚难臆料。其天产之半,有架花马大池而上之”。《甘肃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书》(1943年)说:民勤“县之北部,有库库达巴苏盐泽,东部有吉兰太盐池,此皆为最著名。其余除农田流沙外,大部为土盐,居民因燃料缺乏,不用煎熬法制盐,只于池中曝晒而已”。

民国19年(1930年),成立了甘肃雅布赖榷运分局,已将民勤马莲泉盐局移设武威,谓之甘肃凉州榷运分局。此二局管理盐政、税收、储运等事宜,使雅盐畅销于省内外。《盐法志》载:“其始盐商仅知购运条仓擦(查)汉池盐,初不注意雅池,后因擦(查)汉蒙驼时有运输不继,致虞条盐脱销。情事经花定榷税两局共同商决,先将马莲泉盐局移设凉州,并置盐仓多间,专运雅布赖蒙池青盐,以便商贩就近转运,寻又劝谕商贩,自雇汉驼入池起运,并较他处减税四角,以资激励。一面决定在该池设局收税,以一事权倡办数年,颇著成效。近复创行欠税保交办法,商贩咸以有利可图,遂各不惮修阻源源往运矣。该池产盐时期,略同擦(查)汉地,惟劳工不论,蒙汉初有公家规定,设头目,以董率之。勤则奖励,惰则惩罚,近因销数畅旺,不必运储凉仓,此制亦遂无形废(至)止”。到民国23年(1934年),雅布赖榷运局,已设到民勤县城,雅池谓之秤放处。盐池由商人李仁堂经营,行名“顺义行”。管理人员和生产捞工约为60人至100人。到民国30年(1941年)雅布赖成立



场务所,编制扩大,有工作人员 10 多人,缉私队员 12 人。以便专门管理治安,稽查走私、偷税以及非法捞食土盐等,生产工人亦增加到 100 人左右。民国 31 年至民国 32 年(1942 年~1943 年),每年产盐约在 30 万担,每担 50 公斤,计为 1500 万公斤。这就需要解决好大量的运输力问题,否则是不能完成这一运销任务的。

四、雅布赖盐池的交通道路

雅盐生产,历史悠久。雅盐因系质味俱佳的天然陈盐,故能在全国享有盛名,并能近销河西走廊,远销甘肃兰州、青海大通、陕西汉中,还可以驼运于陕西咸阳和经火车运转全国各地。求其盐运交通工具于交通道路,在历史上主要的更长期利用的还属骆驼。民国 30 年(1941 年)又开辟了大车道路以输雅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修筑了河雅公路,汽车运输的替代,才使骆驼和大车结束了运盐的历史使命。

雅盐的产盐季节,是从每年农历四月的解冻消池,到九月秋寒,1 年约 6 个月的生产时间。按年产 30 万担计,每天平均生产食盐约 1600 担,1 个捞工每天挖盐在千斤以上。

(一)骆驼运输

根据骆驼的生活习性,每年九月起场,次年三月放场,可使役 6 个月。蒙驼由于蒙人特重畜牧的原因,起场迟,使役期较长。但汉驼的运驮量远不及蒙驼。雅盐池的骆驼多者 2000 峰,少者亦有 1000 峰,付驮 125 公斤~150 公斤不等,若每天按 1000 峰,每驮以 100 公斤计,每天秤放驼盐在 10 万公斤左右。雅盐驼运路线如下。

南去武威的驼路叫中路。全长 185 公里,歇脚 6 站,7 天到达武威。具体路线是:盐池 15 公里至黑疙瘩;15 公里独青山;20 公里红沙岗;35 公里小井子;35 公里大口子;35 公里月牙土冬;30 公里武威。

偏西南去永昌的驼道叫西路。全长 160 公里,歇脚 6 站,7 天到达永昌。具体路线是:盐池 15 公里至黑疙瘩;15 公里独青山;20 公里红沙岗;15 公里周家井;15 公里盐井子;20 公里下四分;20 公里宁远堡;20 公里河西堡;



20公里永昌。

去民勤的驼道叫镇番路。全长95公里,歇脚3站,4天到达民勤。具体路线是:自盐池15公里至黑疙瘩;20公里板滩井;35公里井泉河;25公里民勤。

(二)大车运输

大车运输,始于民国30年(1941年)道路分两个区段。第一区段,是由盐池到民勤城。运盐的大车,通称盐车。民勤盐车,拉车用畜以牛驴为主,少量亦用骡马。每天上池装盐的车有50辆至60辆,好车装300公斤~350公斤,弱车装250公斤~300公斤。每天放盐以车50辆、每车250公斤计之,输盐在1.25万公斤左右,占驼运量的十分之一强。盐池到民勤城,全长130公里,因选路绕道,比驼运路线要长70公里。具体站点是:自盐池5公里至黄坑井;25公里西红柳井;30公里山口子;20公里红沙梁;15公里红柳园;15公里大滩;20公里民勤城。第二区段是民勤城到武威。因沿途有洪水河、白塔河等阻隔,盐运主要在冬季进行。运盐除民勤大车外,还有武威、古浪、天祝等县的铁车(系铁包木论的大车),拉车的役畜以牦牛、犏牛为主,每车运载千斤以上。由镇仓转运凉仓,再行销售。

盐运,除用骆驼、大车之外,还有盐贩子成群结队的驴驮子,此类贩子多系以盐兑换粮食,在柴粮买盐而从中取利,其交易地不外武威、永昌、古浪、天祝等地。

(三)汽车运输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设立了盐业公司,专管、专营盐业,使盐业又走上了历史的新阶段。1953年,为加速和方便雅盐的运输,国家修通了河西堡到雅布赖的汽车路,称为河雅公路。起初由于独青山以北到雅布赖盐场一带,受流沙和沼泽地难修的影响,公路便绕经黑山头、红山子井、白泉、贡湖都(贡湖都格)到达盐池,全长160多公里。1955年,公路进行了改修(改修期间汽车停运两个多月),改为直取中泉子(也叫柴照子)到达盐池,全长138公里。改修后的雅河公路,比原路缩短了20多公里。随着交通道路的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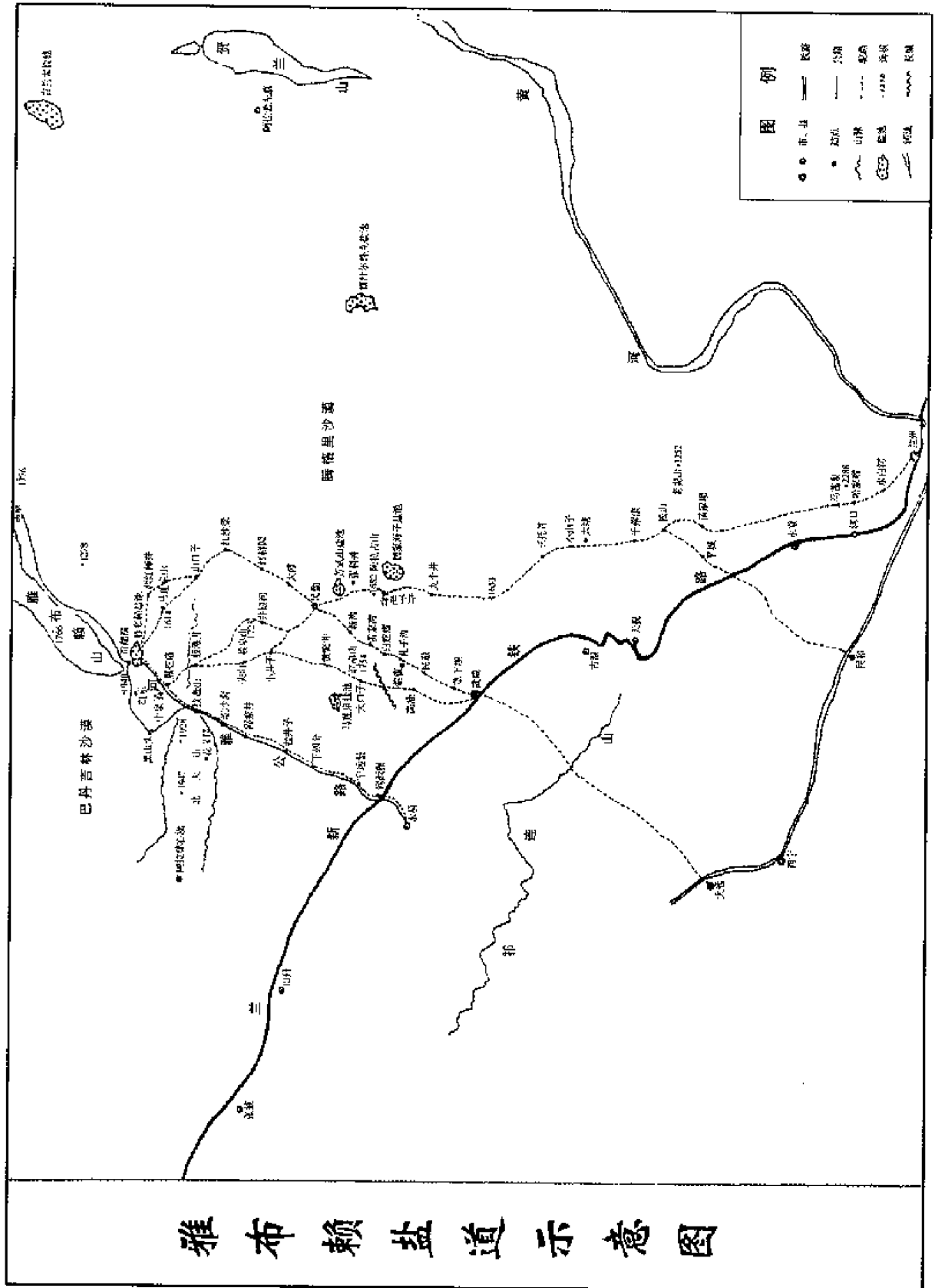


为适应新型交通工具的需要,1953年在河西堡担负运盐任务,每天出动50辆至60辆汽车,往返在河雅公路上,车型以苏制“吉尔”和美制“大门天”为多。

1956年,雅布赖盐场扩建,职工达到千人之多,仅国家工作人员超过百人。年产食盐在10万吨以上,约合200万担,产量是建国前的6倍,使盐场食盐堆积如山。为解决运输困难问题,1956年,由内蒙抽调100辆汽车,增加了运输能力,方使存盐负担减轻。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雅盐的运销,1959年国家又决定从武威通过民勤到雅布赖盐池,修筑一条铁路专线,铁路工程的勘察设计交付西宁铁道学院完成。待全部工作结束,计划书交于国家时,已到了下半年,失去了国家当年计划的相宜时机,次年又遇上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这件事便被长期搁置下来。

雅布赖盐池,形呈椭圆,直径约9公里半,周围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其盐层厚度为1米~3米,平均在2米左右。突击性的开采,捞取了大量的天然陈盐,这就需要池中有卤水结晶新盐的再生产过程,因考虑到盐池的长远效益,近几年生产保持在12万担左右,使生产、运输走上了科学正常的道路。

雅布赖盐池,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宝库。几千年来,它一直滋养着勤劳勇敢的北方各族人民,在国家遇到困难时,她尤能济效于人民,因此她是值得我们在此特为一记的。



初谈阿拉善与河西走廊地区的古代沙漠草原路

李万禄

一、阿拉善与河西走廊的位置

阿拉善地处蒙古高原,地理上也称作阿拉善高原。它的东界是贺兰山及河套平原的西沿,西界是北山(马鬃山),南界是河西走廊地区,向北则延伸到中蒙边界。境内大部被沙漠占据,著名的大沙漠有乌兰布和、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是荒漠草原或戈壁滩。沙漠区内水源奇缺,雨量稀少。深入阿拉善高原的石羊河早已退缩。现除有古称为“溺水”的额济纳河外,其他一些都是很小的季节性河流与湖泊。阿拉善高原自地质时期以来就是一片干燥的荒原,沙漠与戈壁相间。历史古籍中对此地泛称为“大幕”(漠)、“瀚海”、“流沙”等。

河西走廊位于今之甘肃省西北部,东西长约 1000 公里,南北宽约 100 至 200 公里。走廊地区的许多地段,深入到阿拉善高原中部。河西走廊虽多沙碛,但绿洲断续相连,水草丰盛,是自古以来宜于发展畜牧业的地区。因而,先秦、西汉时期,月氏、乌孙、氐、羌以及匈奴等游牧民族,都先后在这个地区驻牧。

二、腾格里沙漠情况概述

腾格里沙漠位于阿拉善的东南部,一部分延及河西走廊的民勤、武威、古浪等县,是内蒙古境内除巴丹吉林沙漠之外的第二大沙漠,面积达 3 万平方公里。一般所指的腾格里沙漠,是由其东北部的南吉冷(郎)沙漠,东南



部的色尔克沙漠和西部狭义之称的腾格里沙漠组成。这3个沙漠互相毗连,其间并无明显的分界线。

从局部地形上看,腾格里沙漠又是一个四周被山地围绕的大盆地。其东部和南部有高山类型之贺兰山和长岭山;其西部及北部被一些形体低矮的蚀余山岭所环绕,如阿拉古山、苏武山、独青山、巴音诺尔公梁等。盆地周围海拔在1500公尺~1800公尺左右,中部如圆湖。查汉布鲁格盐池一带,海拔约在1200公尺左右。整个腾格里沙漠是一个略向北倾斜的高原式盆地。盆地大部分地面被多种形态类型的沙丘所覆盖,另外尚有星散的湖盆、岩岗(亦称麻岗或麻山)、山地、平原穿插其间。

本区属典型的干旱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约在100毫米左右。并且主要集中在6月~9月份,蒸发量可达3000毫米以上,相当于降水量的30倍左右。这里气温变化幅度极大,年最高气温在摄氏60度以上,年平均气温在摄氏6度~10度之间。全年无霜期为200天左右。这里盛行西北风,年平均风速在每秒3米左右。由于上述气候特点,造成了土壤中可溶盐类的聚集,尤其是在地下水溢出和地形低洼地段,地面呈现盐渍化,使局部地区形成盐湖。

腾格里沙漠由于被大片流沙所占据,又由于上述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地下水有其特定的存在条件。南部地区,在中卫沙坡头的黄河北岸,高大的新月形沙丘(高达100米以上)下的地下水埋藏很深;北部罗家井、楼尔山、五个山子一带,由于格状新月形沙丘,平型新月形沙丘链以及堆状沙丘,交错穿插在山地、麻岗之中,形成无水草场。由于腾格里沙漠的地理位置和其自身的形态特点,在历史上便成为阿拉善地区东南部黄河北岸的天然屏障。

三、西汉时期休屠城与武威郡治的关系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的问题,在今史学界已被多数人考证;而对休屠故城与武威郡的治所,则缺乏应有的分析与论述。因此,搞清楚它们的地理位置,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以及河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等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秦汉之际,匈奴势力强大。匈奴击败月氏占领了河西,河西便成为匈奴的驻牧之地。休屠王居焉支山以东(今武威、民勤一带),浑邪王(亦称昆邪王)驻地在西(今张掖一带)。《汉书·地理志》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驻地”,又载“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休屠王在今武威城附近的东北修筑了姑藏城。姑藏城“为匈奴所筑名盖藏城,后人讹为姑藏”(《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凉州》)。休屠王又修筑了休屠城,城址在“姑藏城北六十里”(《元和郡县志·陇右道·凉州》)。休屠城“是匈奴休屠王所理之地”,“本匈奴休屠王都”(《水经注·都野》)。

汉武帝为了收复秦时的一些北部边疆地区,驱除匈奴骚扰,彻底解决北部忧患,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派大将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祁连山,击败匈奴。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汉朝又设置了居延、休屠两县城,以便保卫走廊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居延是酒泉、张掖郡的北方门户,休屠则是武威郡的北方门户。自此以后,不仅西汉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通往西域的走廊一线得以开辟,从而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准备了条件。

《史记·夏本纪》载:武威县在姑藏城北300里(即今民勤城北100里)。那么,武威郡的治所又在何处?清道光《镇番县志》(镇番县即今民勤县)已有明确的记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武威、宣城二县。一在郡城北百三十里,一在郡城北百八十里,隶武威郡,是为立县之始”。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汉武威郡的治所,是在武威、宣城二县之南。这个位置既不是姑藏城,又不是武威县,而是姑藏城北60里的休屠城(今民勤县蔡旗堡南),这是毋庸置疑的。

休屠城是匈奴休屠王所理之地,是休屠王经营多年的休屠王都,是匈奴在河西东部的军政要地和经济、文化中心。汉武帝平定河西后,为了急应战后形势,首先在这里设休屠县是很自然的。由于不断地建设,休屠城逐渐成为汉朝在河西一个规模较大的县城。休屠城地处匈奴屡次南下所必经的



大道上,因而它是河西通向内蒙古和通向宁夏的捷径之要塞。休屠城是走廊东部的门户,它“南蔽姑藏,西援张掖,翼带河陇,控临绝塞”(《读史方舆记要·镇番卫》),与居延互为犄角,以卫酒泉。休屠县北有红崖山、黑山为天然屏障;东北环有长城以为护卫;南部面临谷水(今之石羊河),地处绿洲中心,是理想的垦牧之地。西汉王朝在此依附环境条件设郡立县,顺势而居,是合乎历史规律的。

四、古代武威地区的地理环境

今日大地的山川面貌,远非古代之情样。武威地区亦不例外。据考证,武威地区始有文字记载,约在战国时期。那时的武威地区虽然尚未隶属中原王朝的行政领域,但在自然地理等方面,由于各民族的交往,由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的关联,史典中对其的记述却也不少。来自南山(祁连山)的各河流,在今武威之北汇合成较大的河流,其古名曰“谷水”(后称马城河、白亭河,今谓石羊河)。谷水向北流入终端湖——猪野泽(亦称为都野泽,后分为猪野、休屠二泽)。猪野泽是一个较大的内陆湖,而不是小水泊。谷水流量较大,冲积范围较广,在猪野泽南岸首先造成广阔的冲积平原。由于这里水草特别丰美,逐渐形成本区最早有半固定住落和初级农垦形态的绿洲。今武威以南属石羊河水系的东大河、西营河、金塔河、黄羊河、古浪河所形成的山前冲积扇群尚未开发,是一片荒漠草原,不属于绿洲范围。而富饶之地,则是石羊河流域。

五、匈奴王庭的分布、变迁与经济军事中心

秦陇西郡的中心,在今天水地区。由天水一带北上,可进入匈奴地。“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史记·匈奴传》)。当时匈奴国家大致分三个部分,单于庭居中,直代、云中。代郡和云中郡在今山西西北,单于直辖区当在山西北部直至阴山之北。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大草原,当是单于王庭所在。汉武帝平定河西,不仅隔绝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而且为汉朝经营西域,争取西域脱离匈奴归附汉朝以及进一步削弱匈奴势力提供了重要条件。《汉书·西域传》赞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

羌,乃表河,列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自匈奴向南,重新占领了秦将蒙恬开拓的河南地以后,漠南的阴山一带因其草木茂盛、禽兽很多,宜于牧猎,更有大量奇珍材木可供制造车辆弓矢等军需品,便成为匈奴人对外征伐所需物品的重要补给地。《汉书·匈奴传》里记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据此可知,匈奴人人据河西走廊以前,阴山地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军事中心。

六、匈奴入据河西走廊地区的路线

河西地区,从自然条件看,不仅地势平坦,还有五大河流从南到北贯穿其间。这五大河流在西汉时被称为氐置水、籍端水、呼蚕水、弱水和谷水。向北远流入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只有弱水(额济纳河)和谷水(石羊河)。河西地区,地下水源丰富,水草茂盛,宜于农牧。于是,许多人要因此而来,匈奴人也要驻牧于此。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长期游牧在大漠南北。生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又“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史记·匈奴列传》卷110)。这说明,匈奴把掠夺看成和生产一样。匈奴与月氏,早在秦代就有接触。当时月氏势力强大,“控弦十余万,故疆侵匈奴。”匈奴单于头曼,为了缓和与月氏的矛盾,把太子冒顿送到月氏作人质。因此,冒顿是很熟悉河西地区的。冒顿自立为单于后,匈奴势力迅速强大,他便向月氏发动了争夺河西的战争。在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西攻月氏,占据了河西,又将势力伸展到新疆,统治了西域二十六国。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适合于我们需要而应当提出的问题,即匈奴是沿着什么道路前进的。从当时匈奴腹地的阴山一带,带着大量的辎重出发远征,其行军路线的确定,除对军事战略目的之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选择水草丰富,环境熟悉,人畜好走,便于运输的理想道路。这样的理想道路即可被匈奴人确定为入据河西走廊地区与月氏作战的进军路线。



为了深入地说明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们先讨论一下石羊河与额济纳河流域的古代沙漠草原路。

石羊河,水出祁连山,向北流行在阿拉善地区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之间。这一带除有大片的流动沙丘外,还有固定、半固定丛草沙堆与戈壁相间构成的荒漠草原。草原上生长着旱生、半旱生植物。植株有骆驼刺、白茨、红茨、芦苇、黄蒿、芨芨、八王、拐枣、梭梭、柠条、桦棒、碱柴、红柳、珍珠、红沙、沙米、沙葱、牛尾蒿和鬼见愁(猫头刺)等,植被率一般在30%以上。这些草原是各种牧畜放牧,尤其是骆驼放牧的最好草场。至于流动沙丘,一般说来,沙丘与沙丘之间总是有一定距离的。各沙丘随着西北风地吹揭,不断向东南移动搬迁。沙丘虽遭受着自然力的侵袭,但其在空间与其他沙丘的相对位置,却是没有多大改变的。这类地形在古籍中统称“流沙”。从石羊河北端,向东北延伸,通过一些小的水海子,便进入内蒙古的狼山、阴山地区。那里又是林木茂盛、植株繁多的好牧场。

从阴山向西,直入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姑藏,远不过2000里,790里长的石羊河就占去道路里程的三分之一还多。由于石羊河的不断退缩及休屠泽的逐渐干涸,与河有关的古代沙漠草原路,亦随之渐见荒没,渐被许多人所疏弃。然而,驻牧漠南“逐水草迁徙”的匈奴民族,对此路却一直是很熟悉的。这条道路沿途水源不缺,无水戈壁远不过百里,诸水虽含不同矿化度,但一般都可供人畜饮用。况且一路平坦,无大山、丛林之隔阻,甚而很多地段可以通行大车。因此,石羊河流域是匈奴入据河西走廊东部的一条很理想的捷径。史称休屠古城,为匈奴入河西走廊东部的门户,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汉武帝平定河西后,置休屠县(隶武威郡治),并设北部都尉镇守,这充分证明了此路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北魏平城时代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就是途经此路通往西域的。西域十六国的使者、商人以及远来的僧侣,去山西平城朝贡、贸易等也过此一线。大漠南缘之通道,常常因一些部族或国家的纠纷或战争,其交通畅塞不定,往往缺乏安全保障。在断路期间,北去的客商大多要绕道东行。“从河西



走廊到平城,一般不走另外两条,即从姑藏走难走的白亭河道,翻越贺兰山,过灵州从白于北麓向东的路和到居延海后再往东,沿阴山山脉向东的路”(《民勤绿洲演变》,《地理学报》1963年29卷第3期)。到了清“康乾盛世”时代,这条古老的道路又兴旺起来,它是西北通向华北的主要道路,走廊一带的人称之为“包绥大路”,实为武威、张掖至包头、绥远间的路。纵观历史,从整个古代及近代,这条沙漠草原路一直都是相当重要的塞外之路。至今在一些出露的山冈上,还可看到车碾马踏的道路遗迹,而那些驼道踪影更是到处可见。

这里需要说及的一点是,古代的沙漠草原路,在一些地段,由于大批役畜放牧、饮水时行走不是固定在一条道上,致使所成道路的间距往往在几里到几十里之间,这种以目标前进而形成的道路,其路迹是相当复杂的。腾格里沙漠中一些道路的形成,是在明清之际。人们为了利用沙漠中的草场和开采食盐,在一些地方打井取水,逐步踏拓了这些道路。古代时期,道路大多在沙漠的边缘,不能径直穿越深沙漠。当然在紧急情况下,短距离的快马、快驼、送公文也是有的;大队人马,长途跋涉,行军作战,穿越大沙漠,那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额济纳河,主要源自祁连山的积雪。它从南到北蜿蜒前行2000里,入终端湖——居延海(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北部)。额济纳河流经阿拉善高原干旱少雨的巴丹吉林大沙漠的西北部。由于河水的滋润浇灌,沿河两岸便形成了约600里长的绿色长带。这一带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匈奴南下入河西走廊西部地区,这也是一条理想便利的途路。推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通过阴山,沿巴丹吉林沙漠北部边沿,到达居延,再南下入走廊西端,长约3000里。此路与石羊河东侧道路相比,路长而且难走。但是匈奴采取东西夹攻,相互策应,造成对走廊月氏的包围之势,却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决策。其二,匈奴的老根据地漠北。要是从漠北发兵通过居延到达河西,这就大大地减轻了从阴山发兵远征的负担。居延向北,是匈奴熟悉的“龙城古道”,向南借助于额济纳河流域丰美的水草,厉兵秣马,以便出其不



意,曳戈直指,制胜月氏。这是合乎情理的。

由额济纳河向东沿巴丹吉林沙漠北部通往阴山之路,不但为匈奴南下所取,而且久为后世人所取。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两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汉书·匈奴传》《史记·匈奴列传》),击匈奴,从而切断了匈奴右臂,平定了河西。在北魏平城时代,西域去山西平城的使者、客商等也是循额济纳河流域,沿巴丹吉林沙漠北部边沿,越过阴山到达平城的。唐朝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刘敬同北讨“铁勒”(古族名,突厥属),即取此路。到了近代,“新绥驼道”、“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绥公路”(便道)等,也还是基本上沿附着这条古代的沙漠草原路。

总之,通过上面的概略探讨,我们认为,匈奴人是通过石羊河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沙漠草原路入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便是在腹背受敌败退,离开河西走廊,而向西远遁的。

七、从北匈奴与南羌人的联络路线再看一条沙漠草原路

匈奴失去了河西“宝库”,损兵折将,元气大减。但匈奴并不因此而甘休。然而,毕竟由于战争的创伤,匈奴的经济、军事力量是逐渐衰弱下来了。直接进攻已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便与祁连山中的羌人联合起来,远交近攻,不时地骚扰汉边。那么匈奴与羌人又是通过哪条道路进行联络的呢?从《汉书·赵充国传》中知晓,赵充国是西汉杰出的军事家。他从23岁到86岁在河西边塞,安羌定邦,报效国家。他戎马生涯几十春,是功高望重的三朝元老重臣,国家倚为柱石。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羌人与匈奴采取了联合性的军事行动扰乱汉边。宣帝下诏书征求老臣赵充国的意见,赵充国深有感情地说:“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无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羌之部族)已,则罕、开(皆羌之部族)之属不烦兵而服矣”、“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其忠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在谈及匈奴与羌人的联络道路时,赵充国云:“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

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瓠(坑),入穷水塞,南至属国,与先零相直”。赵充国在反对从张掖路出兵时说:“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赵充国的这番话,又是根据在此数年前匈奴入日勒、番和的事件而言的。《汉书·匈奴传》云: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匈奴“右贤王、犁污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山丹县西北)、番和(今甘肃永昌县西),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从赵充国的呈词中,已阐明了匈奴与羌人联合,重犯河西汉边的路线。

这条道路是经阿拉善高原上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大沙漠之间的沙阴地,沿石羊河流域休屠泽的西侧而南插的一条路。这就避开了居延、休屠北部都尉的防护区。通过的盐泽,即休屠泽以西的大盐池,今日的雅布赖盐池(此盐池汉代已经开采)。长坑与穷水塞,应在日勒、番和北,由此南下至张掖属国,前行过山,就是鲜水、先零羌的游牧地区。这就是北匈奴与南羌人联络过的又一条沙漠草原路。这也是阿拉善通向河西走廊地区的一条中间路。



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和定远营 至达来库布驼路

白·那音太

阿拉善与额济纳两旗,位于祖国西北一角,面积广阔,自古以来,其地即是祖国北方广大领域内东西交通的必经坦途。那个历史悠久,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名著古今中外的居延一地和居延道路,即在这额济纳旗区地。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地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它们同属于各朝疆域,为北方一些民族的兴盛繁衍之地,亦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代以后,阿拉善、额济纳蒙古即元之四卫拉特,之和硕特、土尔扈特二部分别游牧于阿拉善、额济纳两地,清王朝拟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编旗置佐,划地使牧之,即谓“阿拉善和硕特旗”和“额济纳土尔扈特旗”。

阿拉善与额济纳建旗后,为“阿拉善和硕特”、“额济纳土尔扈特”二特别旗,两旗既不属外蒙四盟,亦不归内蒙六盟所辖,而直属清廷驻扎宁夏之理藩院理事司员及陕甘总督理;民国时期,又直属中央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相当于今之直辖市,理两旗政治组织,阿拉善旗最高机关为札萨克(王公),下设政务处、典仪处和理事官厅。政务处管理全旗政治事项,除札萨克亲王外,有护印协理台吉(掌印官)一员,记名协理台吉一员,正副管旗章京二员,正副梅林章京二员,正副参领四员,佐领八员,业在政务处内设骁骑校八员,管理军事;典仪处专司全旗祭典事项,有三品、四品、五品排坛达各

一员,三品、四品、五品典仪员各一名,管理一切典礼用品;理事官厅管理全旗一切诉讼,设总管达拉古 10 至 11 人不等。地方基层组织为“巴格”,相当于内地之保。全旗共分 36 个巴格,巴格之下为“什长”,相当于甲长。额济纳旗政治组织更为简单,有札萨克旗政府,内仅设旗务会议,下设正副台吉各 1 人,总管全旗内政;正副梅林各 1 人,协管内政;另外尚有少数办事人员。其下层组织,因人口稀少,全境仅分置 24“什长”而已。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这种政治组织,以因时制宜而存,与清制基本相同。王公之主权甚大,旗民对王公台吉尊若神圣,直至民国时期仍未脱离其游牧封建社会形式,此亦为两旗政治组织之特点。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与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同属蒙古卫拉特系。建旗之后,两旗王公世袭之政治组织形式也为相同,两地又是邻近接壤,同亲地连,二者自是不可分割。同时,两旗政府之间和两地人民之间密切的来往关系,必然会产生两旗之间的交通道路。两地建旗之后,首先是札萨克王公之间的政治来往,如额济纳旗王公上京进贡和到宁夏、包头、归绥等地进行事务活动,阿拉善即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额济纳与内蒙古中部一些蒙部也有一定联系。如内蒙古中部的一些贫苦流民,在兵荒马乱之时即经阿拉善地区西入额济纳求生。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额济纳由罗卜藏达尔札之子旺扎勒车凌袭位,是年小王年仅 14 岁。此时阿拉善旗由第三代王爷罗卜藏多尔济当政,因额济纳王旺扎勒车凌年幼,上定阿拉善旗协管额济纳旗。这种协为管理的局面一直持续了 28 年之久。在这一时期里,理藩院及陕甘总督的一切公文、书信,全由阿拉善旗传递额济纳旗,许多行政、民事事务也由阿拉善旗札萨克决策管理。至乾隆六十年(1795 年),额济纳札萨克自行执政。民国初年,设宁夏护军使兼辖额济纳,后改宁夏省,额济纳旗又直隶省府,因阿拉善旗地在宁夏和额济纳旗之间,许多行政事务还得经由阿拉善办理。另外,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在清朝政府的平西准噶尔战争中,作为军事后方重地,两旗不但是清军运输粮草器械重要路线上的重要区段,还援物和直接出兵参加战斗。民国时期,外蒙古独立,阿拉善、额



济纳两旗地则成为西北国防前线。其次,在经济方面,两旗之间也必有着许多联系。额济纳旗民众主要沿额济纳河流域游牧生存,他们的经济活动,贸易往来主要在沿额济纳河上游的天苍、鼎新、金塔一线进行,但东向阿拉善旗也是其不可离却的另一方向。阿拉善商业很发达,各种汉族商号普及全境,一些商号亦及额济纳旗,其与两旗蒙古人历来有着互惠亲谊的贸易关系,所以额济纳旗人民所需的部分日用杂货也得之阿拉善商号。在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贸易联系中,绥新路是其联系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包、绥至新疆哈密、迪化之间的贸易运输途经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地,其物资众多,对阿拉善、额济纳两地影响颇大,阿拉善、额济纳两地的许多商人都要在绥新路的相宜区段上来来往往。另外,阿拉善西北部和额济纳东南一带的牧民间的畜牧业关系也非常密切,他们共同牧畜,相互来往,友谊深厚。阿拉善与额济纳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也是至密和为时久长的。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是自东而西逐渐降低的。额济纳是内蒙古最西一旗,只有东邻之阿拉善旗一母双子,同语同文。阿拉善文化较比额济纳较发达,蒙古之语言、文字、文化教育各项成果必先近从阿拉善传入额济纳,由此阿拉善对额济纳文化的影响自会是很大的。有许多中外学者,往复考察于阿拉善、额济纳之间,如俄国旅行家科兹洛夫,瑞典考古家斯文赫定,中国之范长江、马鹤天等,他们在这一带发现古迹,进行科学考察,著有许多关于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社会和自然方面的书籍,这对后来之开发两旗地带,发展两旗文化奠定了先行基础;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如科兹洛夫之流的一些外国侵略者对这一带历史文化的盗窃破坏所造成巨大损失的另一方面。

通过上述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间的军政联系、贸易联系、民事联系、文化联系的简介,我们是不难得知两旗之密切联系的枢纽所在,显然,这是以两地之间的交通道路的形成与发展为纽带的。在清、民时期,两旗民族的来往是在驼背上进行的,仍以骆驼为长途交通运输工具。

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间的交通道路是很多的,我们这儿首先应该叙述的是阿拉善、额济纳两旗首府之间的道路,即由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西

北至额济纳旗首府达来库布之间的道路。定远营系清朝、民国两个时期阿拉善旗之首邑，政治文化之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名为巴彦浩特，今系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盟首府所在地。额济纳旗首府先是在威远营，后在达来库布。威远营即原额济纳贝勒所在地，一曰威远城，《大清一统舆图》写作“卫源”，蒙名“巴里巴拿”，位于弱水西岸，索果淖尔南 10 公里，其地简陋无城，居民甚少，仅有房屋 10 余所；蒙古包数十座，其贝勒府亦不过瓦屋数间而已，周围无街市商号，空气亦显干燥，乏林木水泽为之调剂。额济纳旗府，因自然条件的变化和理政需要，多次迁移，最后定居于达来库布。本文所述定达路，亦即以前的定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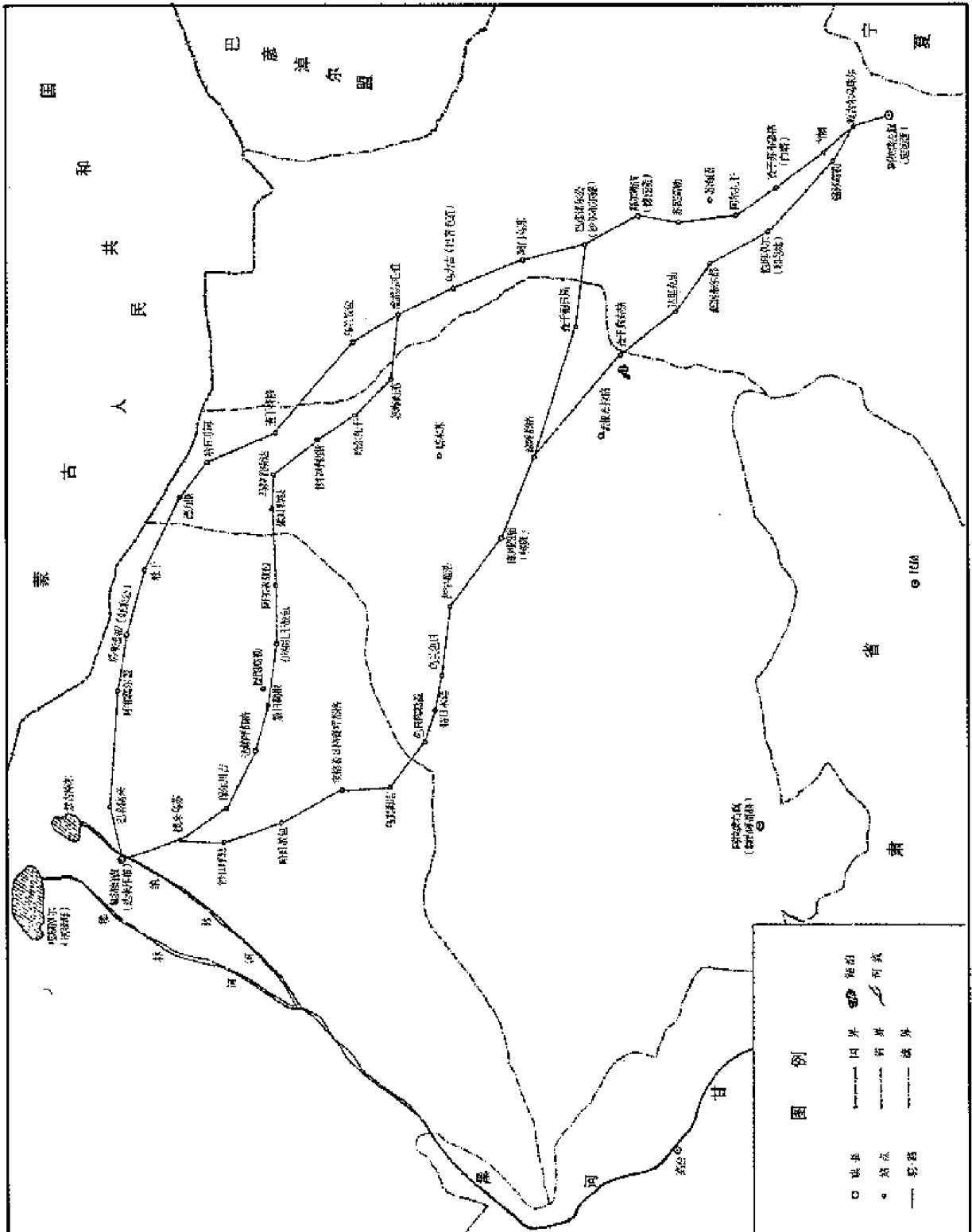
定达路蜿蜒于阿拉善、额济纳两旗首邑之间，主路全长 637.5 公里，共计 23 站。定达线主路以阿拉善旗定远营为始，西北行 22.5 公里至嘎吉尔乌珠尔，这里有淡水井；西北 20 公里至当铺，附近有淡水井，水源丰富；西北行 30 公里至查干苏布鲁格（白塔寺），有淡水井两口，可供 150 人饮用；西北行 30 公里至阿尔扎干（巴彦乌拉山冈），有淡水井一口；西北行 32.5 公里至苏民高勒，有淡水井一口，可供 60 人饮用；北行 20 公里至德盛隆（都尔勒吉），有淡水井，可供 70 人饮用；西北行 35 公里至沙尔布尔德（今巴彦诺日公苏木所在地），水源丰富；西北行 32.5 公里至阿门乌苏，有井两口，水咸，可供 100 人饮用；西北行 40 公里至巴音毛道（今乌力吉苏木所在地），水源丰富；西北 30 公里途经沙日札庙，抵温都尔毛道，水源丰富；西北 30 公里出今之阿拉善左旗入阿拉善右旗，到达苏海尚德，有淡水井两口，可供 100 人饮用；西北行 20 公里至哈尔扎干（在恩格尔乌苏附近，恩格尔乌苏有水井）；西北行 27.5 公里途经陶来尚德，抵沙拉呼勒斯，有淡水井，可供 100 人饮用；西北行 30 公里至马拉益哈达，有井，水微咸，可供 30 人饮用；西行 15 公里至傲日勒根，有井，水微苦；西行 35 公里经乌兰巴兴，出阿拉善右旗入额济纳旗，达阿尔善敖包，有淡水井，可供 50 人饮用；西行 30 公里至伊和扎干敖包，水源丰富；西北行 35 公里至敖尔勒根，有淡水井一口，可供 200 人饮用；西北行 22.5 公里至达赖呼都格，有淡水井，可供 30 人饮用；西北行 35 公里经固力日查干，到达保尔川吉，有淡水井数口，可供 100 人饮



用;西北行 30 公里至桃来乌苏,有淡水井一口,可供 300 人饮用;北行 35 公里经黑城遗址,渡额济纳东河,即抵达来库布终点。

定达主路之阿拉善西北一段和额济纳境内一段,也为绥新驼运中路南线一段。定达主路全程地形平坦,站口小,沿途条件较好。定达路除中间之主路外,还有南北两条路线。南路从定远营北部主路第一站的吨吉尔乌珠尔分出,西北行 20 公里至锡林高勒(紫泥湖);西行 50 公里至浩坦淖尔(和屯池盐池);西北行 65 公里至达里克庙;西北行 35 公里至查干典吉格;西北行 75 公里至滚呼都格;西北行 45 公里至库列图庙;西北行 45 公里至芒罕超浩;西北行 40 公里至乌兰色日;西行 20 公里至特日木廷;微西北行 20 公里至包日陶勒盖;西北行 35 公里至乌套海庙;北行 30 公里至宝格希日格音呼都格,西北行 40 公里至哈日敖包;西北行 35 公里至沙日呼勒;北行 20 公里进入定达主路的桃来乌苏站,最后 35 公里抵达来库布。南线与主线的站程差不多,但南线途经著名的巴丹吉林大沙漠,重载骆驼不易通过,只宜轻骑前行。北线从定达主线的温都尔毛道分出,西北行 25 公里至乌兰敖包;西北行 60 公里至查干特格;西北行 40 公里至哈尔苏海;西北行 25 公里至德力斯呼都格;西北行 40 公里至雅干;微西北行 35 公里至浩来音棍;西行 30 公里至呼和套尔盖;微西南行 60 公里至巴彦陶来;又微西南行 30 公里即抵达来库布终点。该线为定达主线途中北向之分支,途经一望无际的大戈壁和光秃丘陵,站口大,水源少,客旅行走颇少。该线的额济纳旗境内一段,在清朝时期,为额济纳王公上京进贡之路的始段,民国时期,绥新驼运中路北线和绥新汽车路亦是顺此路迹而去的。

定达驼路,清朝、民国时期最为盛行,它沟通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政治、经济、军事,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促进了两旗人民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流,有着不朽的历史性的贡献。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以后,汽车运输逐渐代替了两旗间的驼运,今天在原定达驼路的基础上形成的巴彦浩特镇至达来库布镇之间的草原公路完全代替了定达驼路,定达路亦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里,为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图例

○ 城市	—— 国界	—— 驼队
● 县城	- - - 省界	—— 可成
— 公路	—— 旗界	

阿额两旗定达驼路示意图



巴丹吉林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中的 阿拉善、额济纳两旗路

白·那音太

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高原阿拉善台地（边缘为陡坡的广阔平坦的高地），地势南高西低，海拔一般在 800 米~1400 米之间。横贯全境的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这三大沙漠统称为阿拉善沙漠，面积约有 78457 平方公里，占全盟总面积的 29%。阿拉善沙漠居世界第 4 位，国内第 2 位（仅次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是祖国西北较荒僻的地区之一。其中位在盟内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交的巴丹吉林大沙漠，不但人烟稀少，沙岭横起，而且还有许多古怪的使人神秘莫测，甚至闻之即惊的各种传说。

“巴丹吉林”一名，至今众说不一，尚未定义。现有“巴丹”为地名，“吉林”为藏语“吉意壤”转音之说法，但这亦仅是以宗教藏经传说为根据，其中并无科学考证，是难以准确其义的。巴丹吉林大沙漠在行政区划上今属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原属阿拉善旗），在自然地带处于阿拉善荒漠中心，它东至巴彦乌拉山及雅布赖山，西至马鬃山，南为北大山，北为宗乃山，四面环山。其组成物质多为古变质岩层，下部为第三纪红层和较老湖相沉积物，地表为第四纪洪积冲积物。沙漠之东和之北为洪积成因的砾质戈壁，北部还有剥蚀残丘性石质戈壁；在额济纳河东西河沿岸又有冲积型戈壁。其主体沙漠区具体位置在东经 99°30′~103°00′和北纬 39°30′~41°20′区间，亦即在今阿拉善右旗努日盖苏木以北，额济纳河东岸

的古日乃湖以东,雅布赖山以西,拐子湖以南广大地区。阿拉善右旗的努日盖苏木、巴音温都日苏木、莎日台苏木、树贵苏木、塔木素格布拉格苏木以及额济纳旗古日乃苏木、温图高勒苏木的一部分均在这一沙漠内。巴丹吉林沙漠面积达 48300 平方公里,是我国的第三大沙漠,仅次于新疆塔克拉玛干和古儿班通古特两大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多数地面为流沙所覆盖。只有西部沙漠边缘的古日乃湖,北部的拐子湖,东部库列图庙等地有一些半固定沙丘及梭梭林的分布。沙漠西北黑城古迹附近一带为弱水下游三角洲的一部分,多位低矮的新月形沙丘、沙丘链及灌丛沙堆,系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沙漠化土地。巴丹吉林沙漠属温带干旱自然区,来自东南于西方的季风难于波及本区,全年受蒙古——西伯利亚高压所控制,气候极端干旱,干燥度在 $7^{\circ}\text{C}\sim 12^{\circ}\text{C}$,最高达 17.43°C ;年平均气温在 8°C 左右,温差亦大,平均在 30°C 以上,最大 60°C ,地面最热,戈壁 60°C ,沙面 80°C 以上;蒸发量亦大,降水极少,年降雨仅 50 毫米~70 毫米,一般又集中在 7 月~8 月份,为我国各沙漠中最干旱地区。沙区内终年多大风,风季主要在 3 月~6 月份,西或西北风为主风,东或东北风也多见,夏季也有东南风,最大风速 19 米/秒~22 米/秒,年平均风速在 4 米/秒左右。本区地面物理风化剧烈,使地面遭到强烈剥蚀,当松散的沉积沙砾物质经强劲风力吹扬之后便形成大面积的沙漠戈壁。由于以上种种自然地理的原因便使得巴丹吉林沙漠具有了以下几种特色。

首先是高大沙山密集分布,其面积约占沙漠总面积的 61%,主要集中在沙漠中部,一般沙山高度都在 200 米~300 米,最高可达 500 余米,是我国沙漠高度之最,沙山按其形态特征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为迎风坡具有叠置沙丘的复合型沙山,它反映了当地西北主风的影响,沙山长度一般为 5 公里~10 公里,宽 1 公里~3 公里不等,形态是中部高两端低在迎风坡上部 $1/3$ 处或 $1/4$ 处有一波折,因而使迎风坡具有两种坡度,上部约为 $24^{\circ}\sim 27^{\circ}$,下部约 $12^{\circ}\sim 15^{\circ}$,背风坡则高大陡峻,又由于迎风坡上的次一级叠置沙丘,除受当地主风作用外,还受沙山本身障碍而产生局部气流影响,从而形成



沙丘链或横向沙垄,亦或格状沙丘等形态多样的沙丘;第二种也为巨大的沙山,但迎风坡上无明显的叠置沙丘链;第三种是金字塔状的沙山,主要分布在沙漠南部及东部邻近山岭的地带,并且多在山岭的迎风面部位,它们往往都是一个个孤立的分布着。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明确,高大沙山的形成属自然现象中的物质形态变迁。1886年11月俄国考察家波塔宁,穿过了巴丹吉林沙漠。波塔宁根据自己的感受,证实了这个沙漠中确有中国古代旅行家们所记载的那种“神妖说话”似的神秘声音,但他指出那是沙漠“砂石呼啸”的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什么其他不可解释的东西。

其次,巴丹吉林沙漠虽然以流沙为主,流沙占整个沙漠面积的83%,但在这些流动的沙丘及沙山上仍然生长有稀疏的植物,主要有菊科、禾本科、藜科、豆科、蒺藜科、杨柳科植物。植物成分在沙漠东西部亦有区别,西部主要又沙拐枣、籽蒿、花棒、霸王、麻黄、木蓼等,并且向东逐渐减少;东部主要为籽蒿和沙竹,而沙拐枣不多。这种在高大沙山上也有植物生长的特征,说明了巴丹吉林沙漠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种全系裸露流沙、人畜不可投足的可怕情形,人类亦是能够在那儿进行一些活动甚或定居生活的。

其三,在一些高大的沙山和低矮的沙丘之间有许多内陆小湖(俗称海子),这种小湖在巴丹吉林沙漠中计有144个之多,主要集中在沙漠的东南部。小湖面积一般小于1平方公里,其中面积最大的为1.5平方公里,湖水最深达6.2米(如巴丹吉林庙以西40公里处的伊和扎格德海子)。由于强烈蒸发,这些湖泊都累积盐分,矿化度高,水咸,不能饮用或灌溉。但在湖盆边缘深挖1米~3米及在有些小湖中心的沼泽地上都有泉水出露,流向湖内,这一部分水流均系沙丘水,为矿化度小于1克/升的淡水,可供饮用。

在巴丹吉林沙漠西部和北部边缘有古日乃和拐子湖两大湖盆。西部的古日乃湖湖盆南北延伸,长约180公里,宽10公里;北部的拐子湖湖盆东西延伸,长约100余公里,宽6公里。它们形成与古代水系网有关,为古代水系网的一部分残迹,它们是在风蚀等作用的影响下扩大加深而成。湖盆中仅个别地凹处有不厚的现代湖泊沉积,反映其前身并非湖泊,而是河床。

它们共同的特征是:(1)只有局部地方积水,湖水矿化度高(4.5克/升),水质差,土壤一般均盐渍化;(2)湖盆边缘均有台地,一般高在20米~40米之间;(3)湖盆中心至湖盆边缘都具有明显的带状变化的特色,湖盆底部局部积水,普遍生长植物。

另外,在巴丹吉林沙漠的一些边缘地带还广泛地分布有梭梭林,其面积有3000多平方公里,主要在古日乃湖、库列图庙、拐子湖附近。由于这些地区处于湖盆周围或洪积平原及干三角洲前缘潜水位较高的地带,水分条件较好,便于生长,因而能够成为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地区主要的天然植被。

正因为巴丹吉林大沙漠有水有植被,因此它也就有着人类存在,有着我们各民族繁衍生息的客观条件。在生长植被的湖盆地带和水源较好的地方逐牧的蒙古人,占这一地带人口的一半以上,汉、藏、回、满等民族的数量却是较少或极少的。鉴于巴丹吉林沙漠的种种特殊情况,总的来说这里的人口是十分稀少的,平均每10平方公里仅有1人。汉族多集中在工矿农林区带。有了人类的生活,就有了生产关系,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来往的关系,这种互相来往亦必然会产生道路和道路的发展。巴丹吉林沙漠里主要一骆驼为交通工具,轻骑或轻载驼均可在沙漠内通行,个别地方履带汽车亦可在沙丘间绕行。由于沙漠内牧民的互相往来以及沙漠东的阿拉善人于沙漠西古日乃湖的额济纳人的长期往来,出现了直穿巴丹吉林沙漠而接通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较为固定的南、中、北三条路线。此三条路线的去向、站点、里程、水源及水的饮用情况简述如下(见附表)。

巴丹吉林南路:为南北走向,从漠南边缘至漠北边缘共6站,长达250公里。该线起于漠南边缘的萨音乌苏,这里有淡水井一口,可供100人饮用;北行15公里至乌苏台扎格特,此处有淡水井一口,可供80人饮用;又北行27.5公里至陶来图(梧桐海子),有淡水井一口,可供50人饮用;北行25公里至格日乌苏图,有淡水井一口,可供60人饮用;又北行20公里为浩尼沁都贵,这里只见沙山,为无水之地;又北行30公里为楚鲁洪浩尔,于此深挖1米可供饮用;在北行10多公里即进入古日乃湖,由这里可通向额济



纳旗各地。

巴丹吉林中路:东西走向,沙漠东西边缘之间共计9站,长达200多公里。自沙漠东缘的滚呼都格,这里有井数口,可供100人至150人饮用;微西南行22.5公里至苏亥图,这里亦有水井数口,水咸,可供100人至150人饮用;西南行20公里为库列图,有小湖,有淡水井,可供100人饮用。这里的库列图庙是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时由阿拉善喇嘛雍札巴之子哈屯达戈巴在前往拉萨,经班禅信札令示,并携回佛经、佛像后所建。民国1年(1912年)赐匾“方等寺”(藏名为达西普拉吉林)。巴丹吉林沙漠里还有一座庙叫巴丹吉林庙,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从库列图庙微西北行15公里至浩尧尔胡都格,这里有淡水井二口,可供50人至100人饮用;西北行27.5公里至芒罕超克,有井,水咸,可供20人饮用;西行20公里至巴尔吉格尔呼都格,有淡水井二口,可供60人至120人饮用;西行20公里至吉格德诺尔,有小湖,水咸,能供500人饮用;微西北22.5公里至包儿陶勒盖,有井,水淡,可供200人饮用;西北行22.5公里至伊和阿格图,此处有沙山,无水;再西北行30公里即达古日乃湖,由此亦可通向额济纳旗各地。

巴丹吉林北路:亦东西走向,漠内共计6站,长达180多公里。北路适于漠东边缘的哈儿扎盖,这里有淡水井数口,可供1000人至5000人饮用;西南行30公里至浩勒呼都格(阿拉腾图雅),有井二口,水淡,可供400人饮用;西行25公里至木哈儿扎干,有井,水淡,可供200人饮用;西行32.5公里至查干楚鲁特,有淡水井,可供200人饮用;西行30里至乌楞特,有井,水淡,可供200人饮用;西北行32.5公里至古尔班乌兰,亦为沙山之地,无水;微西北行30公里进入古日乃湖,由此亦可通向额济纳各地。

巴丹吉林中路和巴丹吉林北路南北相距不到10公里,常有无定小道把两路连接起来。巴丹吉林南、中、北三路进漠西古日乃湖后,也可通连当地路线,行至阿拉善各地。可连接湖地内的其他线路,通往额济纳各地;漠东和漠南路端在接入阿拉善戈壁后,巴丹吉林沙漠里燃料缺乏,但行旅亦可权借一些零星灌木作为燃料煮食取暖。行人在大漠里夜宿,可把几峰骆



驼卧成U形,即使有2人至3人也能排睡于中,骆驼既可挡风,又能防身,一晚上人畜相依,别有一番情趣。

综上所述,巴丹吉林沙漠虽然极为干旱,沙山高大,自然条件很差,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我们应该看到沙漠之中还有许多湖盆浅水及草木(梭梭)的分布,还有人畜通行往来的历史成果(主要是已成道路和各类活动经验)可以继承,看到其中还有许多地带不但可以作为牧业利用,还对今后的治理沙漠,开发沙漠启首有益。总之,要看到这一系列及其有利的另一方面。巴丹吉林沙漠的一切都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存在,并非过去人民所迷信传说的那样是流沙茫茫,神秘可怕,人不可入。相反,我们要利用它,改造它,尤其是对于漠下大地的迷宫宝藏,还是不会放弃探索、揭示和予以应当的利用的。目前,阿拉善盟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有志者们正在以新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奇大沙漠及其沙漠道路,以期有新的开拓。

附表 巴丹吉林沙漠中阿拉善、额济纳两旗路站程情况简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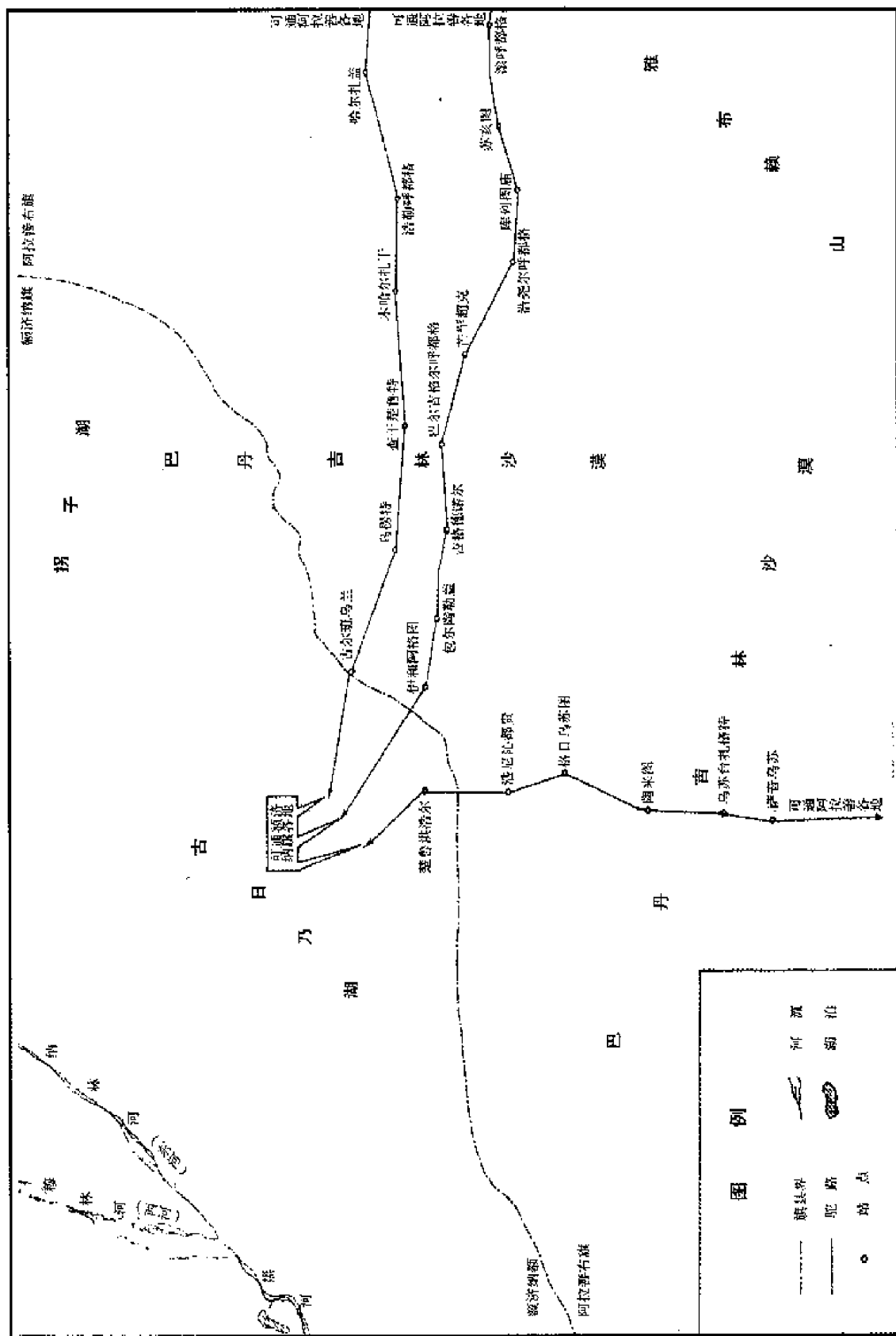
南			中			北					
站	站距 (公里)	水源情况	东经 北纬	站	站距 (公里)	水源情况	东经 北纬	站	站距 (公里)	水源情况	东经 北纬
萨音乌苏		淡水井	101°21' 39°41'	滚呼都格		淡水井	103°27' 40°24'	哈尔扎盖		淡水井	103°21' 40°41'
乌苏台扎格特	15	淡水井	101°23' 39°46'	苏亥图	22.5	咸水井	103°12' 40°22'	浩勒呼都格	30	淡水井	103°01' 40°36'
陶来图(梧桐海子)	27.5	淡水井	101°24' 39°58'	库列图庙	20	湖水 淡水井	103°40' 40°17'	木哈尔扎	25	淡水井	102°47' 40°36'
格日乌苏图	25	淡水井	101°28' 40°10'	浩尧尔呼都尔	15	淡水井	102°52' 40°19'	查干楚鲁特	32.5	淡水井	102°24' 40°33'
浩尼沁都岗	20	沙山无水	101°26' 40°19'	芒罕超克	27.5	咸水井	102°36' 40°26'	乌楞特	30	淡水井	102°05' 40°34'
楚鲁洪浩尔	30	挖掘1米 出水	101°26' 40°33'	巴尔吉格呼都格	20	淡水井	102°22' 40°28'	古尔班乌兰	32.5	沙山无水	101°45' 40°43'
进入古日乃湖	10			吉格德诺尔	20	有小湖 水咸	102°08' 40°27'	进入古日乃湖	30		
				包尔陶勒盖	22.5	淡水井	101°54' 40°30'				
				伊和阿格图	22.5	沙山无水	101°43' 40°34'				
				进入古日乃湖	30						
合 计	127.5			合 计	200			合 计	180		

注:南路里程最短。水质较好,唯水量小,最大供
饮量在 100 以内。

注:中路站距小,但里程最长,水质最差,可供量
在 20 人至 500 人之间。

注:北路比中路略短,水源水质均好,供饮量最小
200 人,最高可达 5000 人

巴丹吉林沙漠中的阿额两旗路示意图





古代居延与西蒙

李万禄

居延,对于古代历史的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历代相传,居延地区是中原汉族与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之间以及西域、河西和蒙古地区各民族之间来往的重要通道。文题中的“西蒙”,是指蒙古高原的西部,在欧洲地理书上又称为外鄂尔多斯,它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阿拉善地区。居延以至整个西蒙地区,由于历史的缘故,造成一部分断代史的少缺,给研究这一地区历史的人们,带来很多困难。笔者试图在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变迁和道路利用方面成一小启,以求互助于我之同志。对于驰名全国,远播重洋,出土于居延的汉简资料,本应借助,但由于知识范围所限,这里却涉及很少,只能望洋兴叹了。

一、居延之由来

《山海经》记流沙之外有居繇之国。寻求居延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与义渠戎相邻的胸衍之戎。《史记·匈奴列传》记:“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此八国中即有胸衍之戎。《汉书·地理志》记,秦北地郡有胸衍县,汉因之(位在今宁夏盐池县附近),为秦代以前胸衍戎所居之地。秦穆公在位是公元前 659 至 621 年,以后西戎屡服屡叛,义渠复叛,视而攻秦,秦多次出兵反击,直至秦昭王时才彻底消灭义渠。胸衍戎大约在战国时畏秦之威,向西迁移,进入腾格里沙漠地区。

《山海经》所记之居繇,正是胸衍之戎的别异,他们又在流沙外建立了

政权。居繇人与月氏、大夏等部族相邻，后居于居延海一带，汉称其地为居延。《山海经·海内东经》记：“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等国。”此四国中，月支即月氏，居于河西；居繇即居延，为西戎八国之一胸衍之戎的一部迁于河西者；竖沙待考；大夏即临夏迁居于河西的大夏之人。流沙业非如有人所说，一指居延海之流沙，一指罗布泊流沙，实即指大沙漠，这里是指大河以西之腾格里大沙漠。流沙外即腾格里大沙漠以西，大夏、竖沙、居繇、月支等国当时分布于此。

秦汉之际，大漠以北的匈奴民族势力强大，他们打败了月氏等部族，河西与西蒙地区的大片领土，又成为匈奴民族的驻牧之地。由于战争的骚扰，一部分居延人又离开生活多年的居延地方，向西迁移了。西汉昭帝末年，匈奴进攻乌孙，企图夺取乌孙车延、恶师地。车延地实即车延人居住地区，车延应是居延之别异。从当时汉朝与匈奴战争的地理情形看，车延地似在今哈密西北。此地在居延海以西，相距不远，说明一部分居延人又从居延地区迁到今新疆北部。

另外，居延汉简中提到许多安氏，其在居延服役。安姓在汉代并非大姓，何以在居延如此多见？有人以安氏为安息国人，也不见妥当。实际上楼兰、乌孙、月氏中都有安姓，居延汉简中的安姓，说明了居延地区除居延人居住外，还有其他地区的人众，也是一个多民族交错集散之地。

“居延”最初本为种族名称。后来，由于这个地区有属于匈奴族的居延人居住，因而“居延”又逐渐成了地名、水名及泽名。《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条颜师古注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六年条章怀太子李贤注曰：“居延，本匈奴中地名也。”由此可见，居延人的一大部分离开居延西迁之后，匈奴民族又占据居延，便以“居延”作为这里的地名。

汉开河西，戎马戍边。武帝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首先设置了居延县。颜师古在《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注文里说“张掖所置居延县者，以安置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以《汉书·地理志》所载以龟兹县处“龟兹国人



之来降者”及张掖郡骊靬县系因大秦国之别名为嫪靬而得名为据,亦可侧为证明汉武帝设居延县是用以处置所获居延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且《史记·大宛列传》谓武帝太初三年,“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则又道出置设居延的又一目的。

武帝太初三年,除设置了“居延县”和修建了“居延城”之外,还在这里设了“都尉”,谓之“居延都尉”。《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条,谓其所辖有居延县,其下本注曰:“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颜师古注引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可见居延县除有城墙可以防守之外,还在这里修筑了军事要塞遮虏障,居延从此成了汉代统治者防御匈奴南下和保卫河西四郡的重要战略要地。

随着时代的推移,居延作为地名,也同它的地貌一样在发生变化。到了元代以后,流经汉代居延地区的“弱水”之名,已被蒙古语“额济纳河”一名所代替。蒙古语“额济纳”或作“额济讷”、“额济内”,亦作“亦集乃”,实乃同音异译。至于“额济纳”的涵义,据《蒙古游牧记》卷十六补注引徐松曰:“蒙古语额济纳,幽隐也。”大约是此时的弱水下游,已经陷入沙漠之中,隐而忽见,故有此名。到了清初,汉代的居延地区,又成了蒙古人土尔扈特部的牧地,当时称之为“额济纳高勒”。而今日的额济纳旗所辖地区,就是清代土尔扈特部牧地的直接延续。因此,今日之额济纳旗所辖地,就是汉代的重要军事要地——居延地区。

二、北方匈奴的几个部族

没有人类的活动,就没有人类的历史。研究居延与西蒙地区古代的历史、交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匈奴民族诸王部的问题。因受本文内容的限制,此处仅就有所涉及的几个北方匈奴部族,作一必要的简述。

(一)右贤王

《汉书·匈奴传》记: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于是文帝下诏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往来入塞,捕杀吏卒……凌轹边

吏，入盗，甚骜无道，非约也……遣丞相灌婴将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由此可见，右贤王在西方，居上郡以此，因得罚西击月氏、西域，右贤王的势力扩大到整个河西、西域等广大地区。

此时，右贤王庭还在高阙、麻浑塞外。《史记·卫将军列传》记：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朝命卫青将兵击匈奴，出高阙，“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天子曰：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麻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颌侯。”高阙塞在今河套西北，麻浑在今河套西，则右贤王庭当在今河套西北塞外。

右贤王还领河西走廊北侧诸部匈奴。《汉书·匈奴传》记：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单于谋图汉河西张掖、酒泉郡地，派右贤王、犁污王将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今永昌西北）、屋兰（今张掖东北）、番和（今永昌县西），被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兵击败。此为右贤王领河西北侧地之证例。

东汉时，匈奴南单于呼韩邪比所设右贤王，仍在单于庭西。《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右贤王屯朔”。朔方郡就在西河美稷西北（东汉时，朔方郡在河套之西的磴口、乌兰布和沙漠一带）。

（二）右温禺鞮王

《汉书·匈奴传》说：“时帝舅大司骠骑将军王根领尚书事。或说根曰：‘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箭杆就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国家有广地之实，将军显功，垂于无穷’。根为上言其利，上……令从（夏侯），藩所说而求之……单于曰：‘……此温偶駮王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单于曰：‘父兄传五世，汉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已问温偶駮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汉书补注》引胡注：“温偶即温禺也，后人妄于禺旁从人耳，当读曰禺。”可



见温禺鞬王即《后汉书》之温禺鞬王。

这块斗地,实即指武威郡谷水(今之石羊河)中下游以西,张掖龙首山、合黎山以北,弱水以东的这块半山地带,其地植物与焉支山相同,有松柏五木。它在河西走廊北侧,属匈奴右部,应为匈奴右温禺鞬王地。

此温禺部人居于该地的时间,约在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后,上引文称“父兄传五世”,汉成帝使人索地在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后,上距元凤二年70余年,匈奴单于每代平均10余年,五代为70年上下。而且元凤二年这里为犁污王驻地,单于使右贤王、犁污王入侵张掖郡地,不见,温禺鞬王,说明此时温禺鞬王部尚未到此。大概在这次战后,犁污王战死,部众逃亡,右温禺鞬部才迁于此。

(三)须卜王

《南匈奴传》记:须卜氏为右,居西方。右方王将居上郡以西,接氏、羌。《汉书·霍去病传》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盩,讨速濮,涉狐奴,”其夏,“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速濮王”。师古曰:“速濮,匈奴部落名也”。《史记·骠骑列传》同条注《索隐》速濮,音速十二音。崔浩云:“匈奴部落名”。“速濮”音同“速卜”,与“须卜”音极近,即匈奴贵种须氏部。霍去病所逾之乌盩,即汉代乌逆水,又称乌亭逆水,今之庄浪河。是则速濮王部居地,当在今庄浪河北永登、古浪县北、景泰县地区,这与上記之居右方的位置完全相符。因此可以断定,此速濮王即匈奴贵族须卜王。

元狩二年须卜王死后,其族人或死、或向北转移,继续保持其名号。《汉书·匈奴传》记:“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注者李奇曰:“居次者,女之号,若汉言公主也”。文颖注曰:“须卜氏,匈奴贵族也”。钱大昕注曰:“案云是伊墨居次,因为须卜当之妻,故亦称须卜居次耳”。昭君为单于阏氏,其女适须卜部贵族,完全合乎“常于单于婚姻”的制度。

(四)休屠王与涿邪王

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沧海桑田,绿洲沙漠的变化,今日的山川面貌,原非古代的自然环境。河西、西蒙地区始有文字记载,约在我国历史上的战



国,这一地区那时候虽然尚未隶属国之行政领域,但在自然地理方面,我们的先祖,对其已有初步调查和了解。来自走廊南山(祁连山),南部的各河流,在今武威北汇合成较大的河流(即古代之谷水,亦叫马城河和白亭河,今谓石羊河),向北流入终端湖——猪野泽(亦为都野,后分为猪野、休屠二泽)。猪野泽是一个较大的内陆湖,而不是小水泊。《尚书·禹贡图注》云:“黑水西河为雍州……原隔底碛,至于猪野”,“广平日原,下湿日隰,猪野泽名”。《汉书·地理志》载:“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谷水流量较大,冲积范围较广,在猪野泽南岸首先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由于水草特别丰美,逐渐形成此区最早具有半固定住落和初级农垦的绿洲。今武威以南各河流形成的山前冲积扇裙,尚未开发,是一片荒漠草原,不属于绿洲范围,富饶之地,则是石羊河流域。由于石羊河流域天然的地理环境,它一直吸引着南北两侧的民族来这里活动和生息。同时,它亦为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向北游牧迁移、北方民族南下进入走廊绿洲以及走廊内的各民族北往提供通道,因此,这一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便成了我国古代多种民族交错驻牧杂居的地方。

汉武帝为收复秦时北部边地,防止匈奴骚扰,彻底解决北方忧患,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任用年仅20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经祁连山之战,击败匈奴。匈奴浑邪王,杀死休屠王,太子降汉,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领兵归汉。汉武帝派霍去病接降,河西平定。汉武帝为应急于战后形势,先在酒泉设立临时军政机构,使其统领河西。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使者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胜利归来后,汉武帝决定,在河西置官开渠,移民屯田。随即在河西首设了酒泉郡,以加强对匈奴的防御。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西汉在河西置居延、休屠二县,为时是较早的。

史籍所载休屠是匈奴的一部,这已经为近代,史学家所公认。匈奴人统治整个河西与西蒙地区是在汉武帝初年,休屠王部的分布地区在谷水中、下游。《汉书·地理志》记:武威郡有休屠县,休屠城,“是匈奴休屠王所理之



地”，“本匈奴休屠王都”。武威东北有休屠泽，休屠县和休屠泽因休屠部活动于此而得名。《元和郡县志》载，汉休屠县城在姑藏城（今武威），北六十里；《水经注》记，休屠泽在汉武威县（今民勤县北）东北，直到十六国时，始终保持休屠（休著屠名）的名号。

猪野，不仅是水名、地名，也是民族名。《汉书·地理志》：汉武威郡北有休屠泽，古文以为猪野泽。所谓“古文”，即在称休屠泽之前称为猪野。休屠泽是休屠部人居此而改名，则古文之猪野当是猪野人居此时的名称。猪野，又译为涿邪，猪、涿古音相同，野、邪同音异译，所以，休屠部占据谷水中、下游之前，这里是涿邪人住牧之地。

（五）龙勒与楼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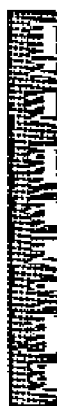
《汉书·地理志》：敦煌郡西部有龙勒。龙勒一词与楼兰同音，是一个民族的同名异译，此族原居于漠北。《汉书·李陵传》记：“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遮虏障在居延，浚稽山即钧耆山，南距居延千余里，龙勒水在浚稽山南。龙勒水是部族名转为水名。后来部落南迁至敦煌西，仍称原地为龙勒，新居亦为龙勒，一部迁至罗布泊，汉代译为楼兰，又译为牢兰。

三、西蒙地区的古代道路

这一地区的古代道路，多因民族迁徙，特别是因战争的需要而形成，大体属军事路线。居延地区的古道，要算居延人最熟悉。他们在战国时候，从黄河以东，千里跋涉，不辞艰辛，避开险地要塞，由南向北深入沙漠，在流沙外寻找到了适合本民族的驻牧之地，最后在居延定居。我们先祖活动的足迹里程，指引了后人继续不断地开辟新的道路。下面就与本区有关的古道，分述几条。

（一）居延、休屠两古道

汉武帝平定河西后，为了控制匈奴进入河西的通道，确保酒泉、张掖的安全，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额济纳河两岸，汉代张掖郡下，不仅设有居延、肩水两



都尉,驻兵屯田,而且置有肩水、居延两县,徙民实边,扼守着匈奴南侵走“龙城古道”的要塞。

随着许多年的建设,休屠城逐渐成为汉代在河西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县城。由于它处在匈奴南侵的大道上,因而也是河西通向内蒙古、宁夏的捷径。休屠城是走廊东部的门户,它“南蔽姑藏,西援张掖,翼带河陇,控临绝塞”,与居延互方犄角,以卫酒泉。

(二)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

西汉武帝执政时,汉朝政府为了联络月氏、乌孙,对付匈奴,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就第二次来说,张骞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使乌孙,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还,去来凡五年。其出使路线,史学界论说很多,到底哪一条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路线,还须从深从细研究。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看析,张骞能走得通的道路,还是离不开追寻居延人迁徙之路。综观文献史料,张骞出陇西西上,就是从景泰县境向北绕过无水的高大沙丘,再向西进入腾格里沙漠的湖盆之中,这里沙丘小、地形平,水草丰富,便于通行。走出腾格里沙漠,绕过休屠泽,然后沿阿拉善坦地南,龙首山、合黎山北的夹道西过弱水,直至西域。这条路线的东端,即《汉书·赵充国传》中所载“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阮,入穷水塞”路。沙阴即腾格里沙漠,盐泽即今雅布赖盐池,长阮即龙首山东北之夹道。后半段从古以来就是谷水下游与弱水下游牧民来往的路线。

张骞不论从河套地区西南行,或者从景泰北上西行,都是可以顺利到达民勤北部地区的。以前民勤的骆驼运输队通往宁夏中卫、磴口和河套地区,一般是从腾格里沙漠南侧的湖盆中和腾格里沙漠西北边沿行走,道路要避开沙漠南北两端无水的大沙丘。而且,就当时情势看上述道路也比较安全。从民勤西北到弱水,在匈奴温禺犊部占领这个地方以前,这里比较空虚,沿路又有足够的水草供人畜饮用。《大宛列传》记:“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汉书·匈奴传》记:龙首山、合黎山以北这块匈奴斗地,“生奇材木,箭杆就羽”。射禽射兽,需妥弓箭,而这一带地方只有龙首



山、合黎山北出产这种奇木,加上羽毛,就可以当箭用,给张骞一行提供了丰富的制造射猎工具的原料。从多方面分析,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基本上是围绕居延人西迁的路线行走的。当时可以走通的道路,也只有这些。

(三) 驿站与“参天可汗道”

由额济纳河向东沿巴丹吉林沙漠北部通往阴山之路,不但为匈奴南下所取,而且久为后世人所走。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天,“骠骑将军霍去病,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两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击匈奴,从而切断了匈奴右臂,平定了河西。

在北魏平城时代,西域去山西平城的使者、客商等也是循额济纳流域,沿巴丹吉林沙漠北部边沿,越过阴山到达平城的。

历代王朝和一些部族,从中原通往北方各兄弟民族地区或由北方通往中原,亦多顺沿此线开辟驿道,建立驿站。例如唐代时,北方的突厥和铁勒各部族都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68所,以便利往来使者。

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年~1324年)从张掖北行16天,到达额济纳后,也了解到北去的驿站古道。其在游记里记载:“商旅到达这座城市(哈拉浩特)以后,必须准备四十天的食物,因为再向北行时,需要穿过一片大沙漠,沙漠里除了在夏季山里和河流两岸有少数居民外,其他季节没有人到这种地方来。这里水源充足,松林茂密,野驴和各种野兽经常出没其间”。“过了这片沙漠之后,抵达它的北部一座城市,名叫喀拉科兰(哈拉和林)”。

1927年,瑞典的斯文赫定以及其所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沿着北方古道,西北行经张家口、包头,沿阴山南麓和乌加河以北,(途经民勤北古休屠泽白疙瘩),向西直达巴丹吉林沙漠北缘的哈拉浩特遗址。

近代的“绥新驼道”,“抗日战争前的绥新公路”(便道)等,也还是基本上附着这条古代道路形成。

额济纳驼道考

李靖

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北端,在地理上属于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也称阿拉善高原。其西部与东部多低山丘陵,中部为高原盆地,巴丹吉林沙漠北麓是古日乃和温图高勒两大湖沼地。地形总势南高北低,地貌由沙漠戈壁、低山丘陵、湖泊沼泽和弱水绿洲组成。

近代,由于额济纳交通运输极其落后,故而驼运大得其用,驼道的开通也就在所难免。

自清王朝、中华民国后,额济纳旗境内的驼道基本上呈十字交叉形式。驼道东接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南通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西连迪化(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抵外蒙古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

一、定威驼道

定威驼道蜿蜒延伸于阿拉善和硕特旗王府驻地定远营与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王府驻地威远营,又称威远城,《大清一统舆图》标注“卫源”,蒙古语称“巴里巴拿”,位于今苏泊淖尔苏木南 10 公里)之间,主路全长 657 公里,共计 23 站。

定威驼道主线以阿拉善和硕特旗定远营起始。西北行 22.5 公里至嘎吉尔乌珠尔;西北行 20 公里至当铺;西北行 30 公里至查干苏布鲁格(白塔寺);西北行 30 公里至阿尔扎干(巴彦乌拉山冈);西北行 32.5 公里至苏民



高勒;北行 20 公里至德盛隆(都尔勒吉);西北 35 公里至沙尔布尔德(今巴彦淖尔公苏木所在地);西北行 32.5 公里至阿门乌苏;西北行 40 公里至巴音毛道(今乌力吉苏木所在地);西北行 30 公里途经沙日吉庙,抵达温都尔毛道;西北行 30 公里出今阿拉善左旗境入阿拉善右旗境,至苏海尚德;西北行 20 公里至哈尔扎干(位于恩格尔乌苏附近);西北行 27.5 公里途经陶来尚德,抵达沙拉呼勒斯;西北行 30 公里至马拉盖哈达;西行 15 公里至敖日勒根;西行 35 公里经乌兰白兴,出阿拉善右旗境入额济纳旗境,至阿尔善敖包;西行 30 公里至伊和扎干敖包;西北行 35 公里至敖尔勒根;西北行 22.5 公里至达赖呼都格;西北行 35 公里经固力日查干至宝日川吉;西北行 30 公里至陶来乌素;北行 35 公里经黑城遗址,渡额济纳东河,抵达来呼布终点。

定威驼道主路,其阿拉善西北及额济纳旗境内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绥新驼道中路南线的一段。定威驼道主路沿途地势平坦,站口小,水草条件较好。

定威驼道除中间的主路外,还有南北两条辅路。

(一)南路

定威驼道南路从定远营北部中路的第一站嘎吉尔乌珠尔分出。西北行 20 公里至锡林高勒(紫泥湖);西行 50 公里至浩坦淖尔(和屯池盐池);西北行 65 公里至达里克庙;西北行 35 公里至查干典吉格;西北行 75 公里至滚呼都格;西北行 45 公里至库列图庙;西北行 45 公里至芒罕超浩;西北行 40 公里至乌兰色日;西行 20 公里至特日木挺;微西北行 20 公里至宝日陶勒盖,进入额济纳旗境内;西北行 35 公里至乌陶海庙;北行 30 公里至宝格希日格呼都格;西北 40 公里至哈日敖包;西北行 35 公里至沙日呼勒;北行 20 公里进入定威驼道主路的陶来乌素;西北行 35 公里抵达来呼布。南路全程 600 公里,计 16 站,比主路站程近 50 公里,但需经过著名的巴丹吉林大沙漠,重载驼队不易通行,只宜轻装前行。

(二)北路

定威驼道北路从主路的温都尔毛道分出。西北行 25 公里至乌兰敖包;西



北行 60 公里至查干特格；西北行 40 公里至哈尔苏海；西北行 25 公里至德日斯呼都格；进入额济纳旗境内，西北行 40 公里至雅干；微西行 35 公里至浩来昆；西行 30 公里至呼和陶勒盖；微西南行 60 公里至巴彦陶来；又微西南行 30 公里抵终点达来呼布。北路全程 345 公里，计 9 站。此线途经戈壁和丘陵，站口大，水源少，所以客旅行走颇少。北路额济纳旗段，在清王朝时期为旗府王公上京进贡朝觐的始段。民国时期，绥新驼道中路北线和绥新公路也是沿此路迹行进。

定威驼道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最为盛行，它沟通了两旗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商业贸易等领域，加深了两旗各族人民友谊，有着不朽的历史贡献。

二、居延南路

由额济纳旗(居延海)南通河西走廊的道路，统称居延南路。此路又分两条，一条是达酒路，时称西路，基本沿弱水(额济纳河)绿洲向南直达河西走廊中、西部的高台、金塔和酒泉等地的大道；另一条是达上路，时称东路，跋涉沼泽、大漠、戈壁和山地，大体通过今阿拉善右旗上井子一带的西南部，到达河西走廊中、东部的张掖、山丹和武威等地的小路。

(一)达酒驼道

达酒驼道是今额济纳旗人民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南至甘肃省酒泉市等地的驼道。历史上，当地人民所需生产、生活物资多由河西购进，加之路带多在沙漠、戈壁地形区内，当地又盛产骆驼，历来被誉为驼乡，所以这条路以驼运为主。

达酒驼道由来已久，为古延十字道路的南支，早在 2000 多年以前的西汉前期，便是汉帝国河西军政重地的北防主线。当时匈奴败退漠北，南望河西丰饶牧场，不失恢复之志；汉都秦川大地，又以河西为其屏障，军队攻防进退也多依赖居延。汉匈屡次交兵，南来北逐，戈壁沙漠中的弱水绿洲，自当提供了便利。何况秦汉之初，匈奴大败月氏，占据河西，著名的龙城故道已经开辟，达酒驼道乃为龙城故道的南段。汉驱逐匈奴后，在弱水一线设置



居延都尉府,大筑城塞烽燧,设邮驿置县政,驻军屯田,移民实边,凡此一切活动使居延南线成为一条极为重要的疆防道路。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的主轴线,达酒驼道是其北向的重要支线,即为一条主要的草原丝绸古道,是北方少数民族南接丝路、南通中原的一条主渠道。史籍证实,魏晋、隋唐、夏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就是多次沿达酒驼道进入河西乃至中原的。

由达来呼布一带沿东西河两岸,分4条驼道并行,至狼心山(巴彦宝格德)弱水尚未分流处,4路随河并为2道,直达张掖、酒泉等地。

1.东河东路

由达来呼布对岸的那仁布拉格(吉日格勒)起始,沿东河东岸南行32.5公里至保都格波日格;40公里至巴拉巴日海;50公里至狼心山。

2.东河西路

由达来呼布沿东河西岸南行17.5公里至珠斯楞查干;42.5公里至敦德查干;10公里至额很查干;22.5公里至珠斯楞陶来,又25公里至河口(东、西河分汊处的夹角地带);5公里至狼心山。

以上东河两路,纵贯东河沿岸草场,沿途植物以胡杨为主,其他植物有怪柳、沙枣、梭梭、苦豆等,牲畜水草丰足。

3.西河东路

起自西河东岸的道劳卧铺(七间窝棚),沿西河东岸南行35公里至呼和陶来;22.5公里至亚布赖呼都格;25公里至新西庙;15公里至河口。自狼心山接行,沿弱水东岸西南行7.5公里至河东老树窝(宗布格);20公里至塞湾(赛日川吉);7.5公里至白墩子(查干川吉),又30公里至地湾(哈日苏海);15公里至马莲井子(查黑勒德格呼都格);15公里至双城(马莲湾),行15公里抵达鼎新县城。

4.西河西路

是达酒驼道的主道,能行牛车以及驼、马。由达来呼布起始,中经建国营,南行25公里至乌兰川吉;15公里至老西庙(胡勤巴润素木),又15公里至哈日敖包;20公里至巴拉吉尔敖包;17.5公里至青山头(宝日乌拉);沿弱



水西岸西南行 17.5 公里至河西老树窝;10 公里至查干陶海;10 公里至沙夹道,又 35 公里至大湾城(川吉太);西南行 20 公里至金塔县沙门子(额勒逊哈拉格)进入农业区;15 公里至天仓;15 公里至营盘;西南行 35 公里头墩;经二墩、小河口,32.5 公里至金塔县城;继续西南行 15 公里至鸳鸯池;35 公里到达酒泉。全程共 18 个站口,计 372.5 公里。

(二)达上驼道

达上驼道系从达来呼布起始,至上井子(今阿拉善右旗人民政府所在地额肯呼都格镇)的驼道。达上驼道自北而南,从达来呼布出发,途经黑城遗址东部,32.5 公里至陶来乌苏,继而间经戈壁、沙漠和沼泽地带,40 公里至哈日敖包,再过一段戈壁、沙漠区域,32.5 公里至宝格希日格音呼都格(麻雀井),其后行经一段戈壁后进入古日乃湖区,计 25 公里可至乌陶亥;南 25 公里至乌力吉图(今古日乃苏木驻地);由乌力吉图稍偏东南行,出湖区进入巴丹吉林大沙漠主体部位,长行 55 公里左右可至格日乌苏图。这一途程为无水沙漠地带,需驮水行进。自格日乌苏图继续南行于大沙漠中,42.5 公里至浩雅日呼都格,再继大沙漠南行,30 公里至锡林乌苏,此为达上驼道南部一个重要分路点,民国时期阿拉善旗设税卡,收取过往商民物税。自锡林乌苏南行,渐出沙漠,进入戈壁地带,道路也分向三方:一是直南走山丹;二是西南走张掖、临泽、高台;三是东南走金川、上井子等地。由锡林乌苏东南走上井子,先行一段戈壁、丘岗,南行东折 30 公里至红沙沟,继而东南行 32.5 至马山井,由此南折 5 公里即至上井子。达上驼道自北而南,途经沙漠、戈壁、丘陵、沼泽,沿路水草、人家甚少,尤其是穿越 100 余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未经投足人已自畏。故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终以驼运为主,未能形成大道。

(三)达张驼道

达张驼道系从达来呼布起始,至张掖之间的驼道。达张驼道中经建国营、乌兰川吉、老西庙、哈日敖包、巴拉吉尔敖包、青山头、河西老树窝、查干陶海、沙夹道、川吉太、沙门子、天仓、营盘、鼎新(以上路段与达酒驼道重



合,重合里程为 255 公里),由鼎新继续沿黑河转向东南,32.5 公里至双树子;30 公里至天城;15 公里至罗城;25 公里至九坝;20 公里至高台,继续沿黑河东南行;25 公里至平川;20 公里至板桥;22.5 公里至靖安,又 20 公里到达终点站张掖。全程 24 个站口,计长 465 公里。

(四)达山驼道

达山驼道系自达来呼布起始,至山丹之间的驼道。达山驼道南行经陶来乌苏、哈日敖包、宝格希日格音呼都格(麻雀井)、乌陶亥、乌力吉图、格日乌苏图、浩雅日呼都格(双井)、锡林乌苏(以上路段与达上驼道重合),驮水穿过巴彦高勒无水戈壁,长行 55 公里至特布希,22.5 公里至红寺湖,再向东拐过嘎海达娃山口,转南 20 公里到达甘肃省山丹县。全程 13 站,计长 382.5 公里。

三、达库驼道

达库驼道,汉、晋时期称“龙城故道”。所谓“龙城故道”,就是由来已久的道路。龙城故道在汉匈战争中是军事要道,和平时期又是双方派遣使者的友好往来之路,其后身就是达库驼道,系从达来呼布起始,至外蒙古首府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之间的驼道。是古代著名“居延道路”的北段,形成一条南至河西走廊,中经居延绿洲,北抵库伦的南北通道。清、民国时期是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至库伦的商贸驼道。

达库驼道形成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期,为反击匈奴保卫河西,汉武帝命令汉军骑都尉李陵率 5000 名步卒出居延塞,循龙城故道北行 30 日,在浚稽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东端)与匈奴单于 3 万骑兵血战。东汉窦固将军就是在居延塞款待从龙城故道赶来上表的匈奴友好使团。公元 556 年,漠北突厥部落沿龙城故道途经居延,与西魏王朝合兵平定吐谷浑部的叛乱。张义潮驱蕃归唐,也是利用这条“回鹘路”遣使进京城报捷。西夏立国之初,就在居延古道的冲要位置设立了黑水镇燕军司,为巩固与发展西夏国防、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元 1226 年,成吉思汗挥师沿居延古道南征,攻破黑水城,敲响了西夏王国灭亡的丧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元帝国皇帝忽

必烈入主中原后，黑水城所在地的居延古道——纳林道商旅往来更趋频繁，成为旅蒙商的前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河西走廊沿今额济纳河，循纳林道途经居延，赶赴元大都，拜见忽必烈，传达了地中海的友好信息。在其名著《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离开甘州城，向北行十二日，到达一个名叫亦集乃的城市，它位于沙漠戈壁的入口处，在唐古特省境内。……商旅到达此城后，必须准备四十天的粮食。因为当他们再向北前行时，必须穿过一片戈壁，除了夏季，山中和某些河谷有少数居民外，平时了无人迹。这个地方有水和松林，常常是野驴和其他野兽出没的地方。经过这片戈壁后，即到达它北部的一座城市，名哈拉和林。”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外蒙古返回西宁，也是沿达库驼道南下，并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小憩休整。

达库驼道自达来呼布起始，北行 22.5 公里至查干波日格；15 公里至老东庙；10 公里至策克；20 公里至准扎海乌素，又 20 公里进入蒙古国赛音诺彦汗部（今蒙古国南戈壁省）的塔林敖包；然后再经土谢图汗部（今蒙古国南戈壁省和中央省）到达库伦。全程 987.5 公里。其中，在额济纳旗境内中经 5 站，计 67.5 公里。

四、绥新驼道

绥新驼道，是指营运于绥远省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至新疆省迪化市（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之间的驼道。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万骑由陇西出发，绕道鸡鹿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旗境内）抵达居延，转进河西征伐匈奴休屠王部。唐太宗贞观年间（627 年~750 年），漠北薛延陀部奉诏设置驿道，东起阴山，经居延西连天山北，号称“参天可汗道”，即为绥新路前身。清光绪年间（1875 年~1908 年），清军进驻新疆省，绥新驼运即已开行。绥新两省商务日趋发达，两省驼户及驼运店则受各商号雇佣，往来于绥新运输各类商品及物产，绥新驼运不断发展，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长距离运输线。民国 10 年（1921 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后，绥新驼运日渐衰落终



至阻断,原来经营绥蒙运输的驼运店及驼户,多数转向运行绥新驼道。

据汪公亮著《西北地理》载:“北路经行蒙古……,中路系沿宁夏、甘肃之边界而行……,南路行经宁、甘两省内地”。即绥新驼道分北、南、中三条大路。史料记载,每到驼运季节,在驼铃伴随下,沿路数十成百的驼队,满载绸缎、布匹、茶叶、纸张以及各种杂货,千里迢迢西往新疆;同时贩回皮毛、药材、棉花、葡萄干及各种畜产品。

(一)北路

绥新驼道北路,穿越今蒙古国东、中、西三部,其西部又分数支,构成了中西交通的另一条纽带。拉铁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记载,西支“一由乌里雅苏台经科布多、塔城至俄属西伯利亚境;另一则由古城至准噶尔”。绥新驼道北路有“小西路”和“大西路”两线,此二线又被统称为“后山路”或“蒙古大草地路”,以别于“阿拉善小草地路”,也称“城大道”。所谓城大道,刘文海在《西行见闻记》载:“因归绥驼户而得名;再者,归化城的骆驼常经此,故曰城大道”。

1.小西路

小西路起讫于归化与古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之间,全线大小64站,全程2250公里。小西路自归化起程,途经绥远省萨拉齐,经茂明安,在库伦德日斯入外蒙古境,经土谢图汗的密尔根王旗、土谢图札萨克旗、赛音诺颜汗部的额尔登札萨克旗、札萨克图汗部的萨宾旗(喇嘛格根旗)、永贝子旗、沁扎萨克旗、托滚累扎萨克旗、明安甲敦札萨克旗,从干湖子入新疆镇西县(巴里坤),又经木垒县,终抵古城。小西路路途较之绥新驼道中路为短,而且沿途水草较为丰茂,能够保证人畜饮食。所以,商旅为避免内地捐税之忧,多走此路。

2.大西路

大西路与小西路相同以归绥为起点,经茂明安旗在乌兰鄂博入外蒙古土谢图汗王辖地,至萨宾旗哈拉牛敦与小西路会合为一。有时,商旅因朝脑索尔古及洪果岭二站的流沙难行,亦可绕道避之。此绕道路段起自包头,在

锡拉苏令人外蒙古境,经土谢图汗王辖地,抵嘛咪库伦儿,合入小西路。

蒙古大草地路比之大西路路程短,但站口大,中经流沙,通行较难;小西路路程长,而站口小,沿途水草丰茂,故为商旅多行。

纵观绥新驼道北路,行经外蒙古南境,沿途人烟稀少,必须通行于戈壁沙漠,只适于驼运。所以各站(食宿处)则依水草情形而定,旅途极为艰苦。虽然此路运输条件恶劣,却是新疆至内地,尤其是货物往来的运输线。京绥铁路修通后,绥新商路进一步发展,新疆省进出口货物只须驼至绥远省,便可由铁路中转外运。在当时,这是一条较为便捷的运输线。

外蒙古独立后,北路于1928年禁止通行,绥新驼运转行于中路。

(二)南路

绥新驼道南路起于包头,止于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市),全长3400公里,自包头始,至哈密县。其间大小共计74站,经宁夏、甘肃两省,在今阿拉善盟境内只有一站。

清代绥新驼道南路对绥新两地交通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意义重大。自清末以后,由于战乱和沿途多已垦种,骆驼无可取食,故商旅大减,其路线的经济价值也逐年下降。然而乘车乘马者,必取南路。至民国之后,屡经中外有志之士踏勘,入疆之途另有所辟,已不限于嘉峪关一隅。加之南路关卡林立,捐税苛重,商旅日渐断绝。

(三)中路

绥新驼道中路起于绥远省归化城,至新疆省奇台县,沿内蒙古北境通行,全程约2250公里。此路沿途水草较为丰茂,能够保证人畜饮食,商旅为避内地捐税之忧,多走此路。从额济纳旗的芦苇井至石板井段,因连续4日无处觅水,商旅称之为“连四旱”,需驮水星夜赶路。但因货运不绝,又成为一条主要货运驼路。

绥新驼道中路又分南、北两线。

1.北线

从归化城起始,至黑沙图分支,越今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两市,途经乌



尼乌素、人头山、小泉、松稻岭、海雅阿马图,在巴彦淖尔市阿卜顿尔(阿伯特勒)西进入今阿拉善盟境。此线在阿拉善盟境内沿行中蒙边界,北绕居延海,大小共计18站。由阿卜顿尔西行40公里至今阿拉善左旗银根站(银根萨比苏台);西偏北行40公里,途经扎敏敖包至呼伦布斯格;偏西北行45公里至班定陶勒盖;从班定陶勒盖微西北行55公里,入今阿拉善右旗的脑高(脑干奥日布格),又西北行40公里至查干德日斯(德日斯呼都格);偏西北行45公里,进入额济纳旗境内的雅干(野冈);再偏西北行30公里至好来宫(好来公);西行30公里至呼和陶勒盖(克克托罗盖);西偏南行55公里至乌兰爱里根(今八道桥附近);北行30公里至塔尔寺(陶尔茨);北转西北行50公里至准扎海乌素;西北转西行85公里至库伦宝米(呼仁宝木音呼都格);由此折南而下55公里至陶来尚德(桃来三达);转西北行80公里(沿途无水)至哈拉德勒;沿中蒙边境线西行75公里至呼鲁赤古特(枣骝母马);西南转西行70公里至清河口(清河沟);西行45公里至哈拉尚德;西转西南行55公里途经甜水井,出额济纳旗境进入今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至红柳泉,又经红柳壕、红柳疙瘩到明水,与南路会合。南北两路汇于明水后,又分前后两路西行。北路出明水后接后路,经二架胡桐、大石头、半沟、上马乃、吐胡鲁、盐池、达子梁、奎素、锁面、骆驼井、石泉井、石布里、丁涝坝、底虎沟、黑山塘、芨芨湖、三盖庄,最后抵达奇台。

2.南线

由今巴彦淖尔市西南进入阿拉善盟境,抵阿拉善左旗图克木苏木的巴彦毛道,西行20公里至土克木庙;西行30公里至锡尼乌素;西行40公里至查干德勒素;西行30公里至通家乌苏(同根乌苏);西转北行30公里至道布淖尔(倒不拉);又西北行30公里至哈日模格台,出阿拉善左旗进入阿拉善右旗境,抵古尔班呼都格(三个井);西北行30公里至哈尔扎干;西北行20公里至乌套海,西行35公里至乌和尔乌苏;西北行30公里至傲日勒根;西行25公里出阿拉善右旗进入额济纳旗的乌兰苏海,西行40公里至伊和扎干敖包,西转西北行25公里至拐子湖(今温图高勒苏木政府所在

地,商旅为绕避税卡也可以从此南下古日乃湖进入阿拉善小草地路西行);微偏西北行 35 公里途经敖尔勒根抵达赖呼都格;微偏西北行 40 公里至宝日川吉;西北行 45 公里至保都格(宝都格波日格),在此西渡额济纳东河西行 35 公里,又渡木林河(西河)抵乌兰川吉;西北行 65 公里至芦苇井(呼鲁斯呼都格);西行 150 公里无水戈壁抵石板井(阿拉腾乌素);西行 70 公里出额济纳旗境,进入今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红柳疙瘩。由此西行经马鬃山、公婆泉、盐池等地抵明水,与北路合一。而后出明水接前路行经胡桐大泉、鸭子泉、胡桐窝子、河尾、碱泉子、黄芦苇,即转抵哈密、迪化等地。

绥新驼道中路的南北二线在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境内又称作“哈绥扎睦”,其意有二,一是由哈密至绥远;二是此路常有哈萨克族商人过往。“扎睦”为蒙古语,意为道路。这条西行之路无高山险阻,南北两线在额济纳旗境内相距不过 50 公里,故往来商旅常因避税、避匪或其他原因,由此路进入另一路。又由于两路在途中有相会点,常可换路行进,这种同向异道的情形在绥新驼道中屡见不鲜。

民国 26 年(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绥远省境内,绥新驼运终至中断。

(四)阿拉善小草地路

阿拉善小草地路,因行经阿拉善厄鲁特部牧地而得名。起于绥远省包头,终抵新疆省哈密,全长 1900 公里,沿途人烟稀少,水草缺乏,只适于驼队,不宜于车辆,为天津商人往来要道。此路自包头西行横穿今阿拉善盟境,顺傍河西走廊,在其北部的沙漠戈壁地带,择井站而穿行(其中也可因需而随处转入走廊),进入今阿拉善左旗东北境。西南至丹勒格郭勒;再西南行 40 公里经查干德尔斯,抵乌兰呼舒(大水沟,今罕乌拉苏木政府所在地);又西南行 40 公里至永盛隆(三个井);西行 40 公里至塞尔;西行 35 公里至哈拉毛台;西南行 35 公里经沙尔呼勒斯,抵两棵树(浩雅尔毛道);西南 30 公里入阿拉善右旗境内门巴兴高勒;微偏西南行 50 公里,沿雅布赖山前段经哈尔乌珠尔,至乌可乌素(牛泉);沿山西南行 45 公里至白石头;



沿山西南行 25 公里至野马井;西南行 40 公里至红山井(博伦呼都格);西行 40 公里至莎尔台;西行 45 公里至梭梭井(扎格图);西北行 50 公里至野马泉(毛仁塔塔拉);由此转西北行 60 公里至芦泉;北行 45 公里至腰泉(努如布拉格);西北行 40 公里出阿拉善右旗入额济纳旗境,抵苇坑泉(呼鲁斯图布拉格);北行 50 公里至扎格图纳林,并于此渡额济纳河;西北行 50 公里至五道明水(塔崩扎德盖);由五道明水微西北行 65 公里至梭梭井(扎干呼都格),西行 40 公里至野马泉;西北行 30 公里出额济纳旗进入甘肃省玉门境内的炭窑井,继续西北行经马鬃山抵明水,与绥新驼道中路的南北两线会合。

古代居延道路

王北辰

在我国广阔的领土上,东部海平原与西部内陆地区之间,自古就有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长期以来各地区结成了一个整体。东西各地各族人民在长期友好往来中,逐步发现、开辟了几条捷便的交通大道。在几条道路中,联系着古代中原与西域的常用干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关中平原沿渭河河谷向西北,经过现在的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出古玉门关或古阳关去西域的“阳关路”;另一条是经过兰州后转向湟水河谷,经过今西宁、青海湖北岸,穿过柴达木盆地去西域的“青海、西宁路”。关于这两条大道,自汉通西域以后,不但史书记载较多,且有不少古代的旅行记流传至今,其中,早期取阳关路西行的有晋代沙门法显,他写下了《佛国记》;稍晚,记叙了“青海、西宁路”沿线风土的有北魏人宋云与沙门惠生的行记,通称为“宋云行记”,收在《洛阳伽兰记》中;再晚些的则有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这些都是我国和世界上珍贵的地理古籍,已有不少专家对它们进行过研究。由于资料较为丰富,所以有关这两条路的历史地理情况也较为清楚。

在上述两条路以外,东西方之间当然还有其他交通路。以南方长江流域与西域间的交通而论,其起源虽必甚早,但直到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史书上才有了记载,其路线自西而东大致是:由西域进入柴达木盆地,循盆地的南沿,经现在的松潘地区,南下四川盆地,再沿长江东行,趋赴南朝的首都建康(今南京)。以北方的辽河流域或河套平原与西域间的交通而论,文



献记载也出现得较晚,河套平原是从公元前 2 世纪,辽西是从公元 10 世纪开始的。其路线大致是:从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过戈壁、沙漠,趋向天山南北麓。这条路在沙漠里要经过居延绿洲(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故在本文中名之为“居延道路”。

上述几条道路比较起来,居延道路在古代离经济、政治中心地区既远,地理条件也较差,因而它被利用的程度远不及阳关等路。对于它,不但史书记载很少,旅行者也极少留下记录,这就使得居延路的历史情况,远不及阳关路那样为后世听了解。整理一下有关居延道路的历史地理资料,对于进一步研究沿线各地区的历史、历史地理以及考古等都会是有益的。本文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初步探讨。

—

我国内蒙古高原西部地区,地理上也称作阿拉善高原,这片地方东界贺兰山,西界北山(马鬃山),南边是河西走廊,向北则展延到中蒙边界。阿拉善高原自地质时期以来就是一片干燥的荒原,沙漠与戈壁相间,古籍中泛称之为“大幕”(漠)、“瀚海”、“流沙”等等。据《史记》《汉书》所记,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这片荒原的四周已有不同的民族从事于农耕、畜牧、狩猎等各式生产活动。东面的阴山两麓有林胡、楼烦等部,南面的祁连山北麓有月氏族,西面天山的北麓有乌孙族、南麓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城郭诸国”,大漠北方直到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活跃着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匈奴族。从史书记载看,各族之间互有交往,然而史前时期的交通路线到底经过哪些地点,却没有记载。

本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地理学者们,在我国西北部的考察中得到了若干有关这方面的证据和线索,颇有学术价值。在内蒙古西部的考古调查发现,东起阴山、中经居延绿洲,西至天山中段,大致沿着北纬 42 度的一条地带上,迤邐不断地分布有先史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各地点的出土物有骨制品、陶片和细石器。考古学者们比较、研究了各地的出土物后指出,在

这条东西两千里的地带上,各地段内的出土器物各成类型,整条地带则可分为四段、四种类型:(1)草原类型:主要分布在东经 140°以东各地。(2)阿拉善沙漠类型:分布在阿拉善高原地区及其北方的荒漠中。(3)居延绿洲类型:分布在弱水下游居延绿洲上。(4)黑戈壁类型:分布在居延绿洲以西到天山东端的喀尔力克山之间。

四个地段的四种类型间,并非截然不同,各地段的出土物,从样式上看互有近似、共同之处,在地段毗连的过渡地方,其出土物也具有过渡形式。这种现象表明,史前时期这整条地带虽曾分属不同部族的活动范围,但各地各族之间并非孤立隔绝,而是互有交往的。各地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反映为毗连地方出土物形式的相似。可以肯定,这条地带上的各地之间,远在史前时期必有交通路,但交通的情况却还不能得知。

二

我国古籍对西北地区有较明确的记载是由汉代起始的,《史记》与《汉书》中收有若干条关于居延道路的记事。西汉初期,居延道路在匈奴控制区中,随着汉对匈奴斗争的逐步胜利,居延道路才逐步归为汉有。因此,要了解这条路在当时的情况,就不能不概略地了解一下汉与匈奴在这片广阔地区内的斗争及其历史地理背景。

公元前 2 世纪,匈奴族渐趋统一,势力强大,匈奴贵族以漠北“龙庭”为中心向四方扩张、侵掠,向东南,乘秦末的混乱,侵入黄河以南的今鄂尔多斯地区,直接威胁到长安的安全;向西南,威慑天山南北各地各族;向南,则越过漠,击走月氏族,夺占了现在的河西走廊。为了控制这片广大的土地,匈奴以白羊、楼烦二王部驻牧于鄂尔多斯地区,以休屠王部驻守河西走廊东段,并选在谷水(相当今石羊河)中游西岸修建了休屠城。据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四十“都野泽”条下,休屠城“在今武威县北六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武威郡凉州”,休屠城在姑藏县北六十里的记述,休屠故城应在今石羊河中游某地,确址待考。以觿得王部驻守河西走廊中段,选在弱水



(今黑河)上游修建了觶得城。《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甘州条下:“今甘州郭下张掖县,本匈奴觶得县”。《西河旧事》云:“此地本匈奴觶得王所居,因此名之。”浑邪王部驻守西段,以今酒泉地区为中心。对于西域,则选在位置比较适中的尉犁(今同名)设“僮仆都尉”,以控制各地并征收赋税、资财。那时位在塔里木盆地东口上的楼兰国也屈服于匈奴的暴力。

在匈奴强大的同时,汉王朝的实力也日益恢复、壮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凭依全国的人力、物力,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斗争。汉朝在其经营西域的战略计划中,充分考虑、利用了地理条件,这在每项重要行动中都有明显的反映。武帝即位之初,首先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在于联结月氏以夹击匈奴。遣使的另一目的又在于全面了解西域情况,作为经营西域的依据。在张骞西行尚未返回之前,武帝为了不失时机,不待张骞复命就开始了驱逐匈奴、经营西域的行动。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汉军在卫青指挥下,自云中(今内蒙古黄河西北隅的托克托)渡河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击破匈奴白羊、楼烦两王所部,驱逐了匈奴势力,收复了秦时故地,史书把收复了的地区称为“河南地”,或“新秦中”,意思是黄河以南的地方、新收复的秦时故土。汉朝修复了秦时所筑城塞,派兵戍守,建立郡县,移民实边,逐步巩固了收复的土地,解除了长安北方的威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领的骑兵兵团自陇西郡(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出发,一路向西北,打通了焉耆山(相当今乌鞘岭一带),袭击了驻守在今武威地区的匈奴休屠王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年夏季,汉军抓紧战机乘胜对河西匈奴进行了第二次攻击。这次派出的兵力较上次大为加强,一个兵团仍由霍去病指挥,另一个兵团则以合骑侯公孙敖为指挥。两军分路向河西进发,公孙敖失路未能与霍去病相配合,而霍去病兵团则再度取得了很大胜利。霍去病这次进军所选择的路线,从军事地理上看是十分合理的,《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对此有一段较完整的记载:“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觶得”。

这是一段有关居延道路东段(鄂尔多斯高原与居延绿洲之间)的最早史

料，“居延”这个地名在此初见。以下即按史文考求一下此次进军的路途。

汉军出发地是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东部环江沿岸的庆阳县与环县之间，北地郡的西北部包括今银川平原。“钩耆”不详所在。“居延”就是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的居延海绿洲。居延是匈奴地名的汉译，含义不明。《后汉书·明帝纪》在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耿秉出居延句下，李贤注云：“本匈奴地名也，武帝因以名县。”古代的居延盆地内有一片大湖，史书记作“居延泽”。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皆记云，泽在居延城东北。关于汉居延城故址，根据中外考古学者调查，《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所附“额济纳河流域略图”标出其址在今索果诺尔南、黑城废墟东北十余公里处。中外学者们的野外考古调查证明，居延城废墟东北确有大片盐结壳地及古河床，其地当即古居延海所在。居延泽周围是荒漠里的一大片绿洲，注入古居延海的弱水发源于祁连山地，它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自南而北穿过沙漠，沿岸形成了沙漠中的天然绿色通道。从地理上看，汉军既到居延，肯定是要沿着弱水南进以攻河西走廊的匈奴。

从上引史文看，汉军经过某条道路到了居延，从居延沿弱水南进，扬武于觿得城，取得了很大胜利，所以从居延到觿得之间的路线是清楚的。问题是，汉军从北地郡出发后，经过哪些地点，取哪条路奔赴居延的？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史书缺乏记载，在这里必须依据一些间接记载，再参考地理条件作出分析、推断。从军事上分析，首先要注意汉军此次出征的兵力增多了，出发地改由北地郡而不是陇西，其用意很显然就是要直取居延，避免沿途的战斗消耗，以保持全部力量集中攻打河西走廊的心腹部分。因此，从北地到居延的道路必然是选择穿过没有抵抗的荒漠；而且是捷近的，不是迂远的。关于这条路，史书记载了三个地点，即居延、钩耆、北地郡，遗憾的是钩耆暂不得考。在这里待推断的就是道路的东端——汉军从北地郡上路、出塞的地点。

从地理上看，北地郡的西北边境属于富平县，即现在的银川平原，按理这带地方应有汉军出塞的路口；但查《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以至



更晚的古地书《水经注》，在富平县境内都未记有出塞的路口，这表明在前汉时期还不知道今贺兰山一带有路可以出塞。不但如此，就是在富平县以南的黄河沿岸（汉属安定郡），史书也不曾记有出塞道路，可见汉军的出塞路口只能从富平县向北、沿黄河西岸去寻求。

黄河自北地郡富平县向北流、进入了朔方郡内，河水向东转弯的地方是朔方郡窳浑县（大致相当今磴口县境）。《汉书·地理志》朔方郡窳浑县下记云：“窳浑，有道西北出鸡鹿塞”。这是西北三郡——安定、北地、朔方边境上唯一的西行路口，因此可以断定汉军就是从鸡鹿塞西去居延的。关于鸡鹿塞的确切位置及其出塞道路，长期以来不能肯定。1963年夏，侯仁之教授在内蒙乌兰布和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终于解决了这个疑问。据考察，窳浑县城址在今巴颜高勒市西北、沙金套海公社境内，蒙古名为“保尔浩特”，鸡鹿塞则是位在保尔浩特古城西北约20公里的一个山口，蒙古名是“哈鲁乃”山口，汉代的要塞石城至今还屹立在口旁的山崖上。出“哈鲁乃”山口向西，有路通居延绿洲，它一直被当地人所利用。

依据以上的论证可以复原霍去病的进军路线：即大军自今甘肃境内的环江沿岸出发向西北行（古萧关就在此路上），抵达富平县（今银川平原）再沿黄河北行，在朔方郡窳浑县境出鸡鹿塞，向西北穿过乌兰布和、巴丹吉林两片大沙漠，跋涉千里终达居延。目前虽还不知“钧耆”是何地，但鸡鹿塞至居延之间的行军道路即是居延道路的东段则是无疑的。这条路当然不是汉军所发现、开辟的，它乃是各地牧民经过长期探查、实践而开辟的，汉军能取此路则可能是经过调查访问、并得到当地向导的指引才办到的。

汉得河西走廊后，于其地陆续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所谓河西四郡，驻军屯垦，移民实边，开辟了通向西域的长廊。是后，汉匈之间为了争夺河西走廊，曾进行过几次斗争，居延则是争夺的重要地方。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军通过西域远征大宛（今苏联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大宛列传》在同年记有一件事：“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这条记事反映出，汉军远征之际，为了保卫

河西走廊不受匈奴的侵扰,乃于酒泉、张掖的北方建置了居延城和休屠城以保卫走廊的安全。《史记》这段文字是简略的记法,完整些说应该是建置居延城以卫酒泉,修复休屠故。城以卫武威;从现代地图上看得很清楚,居延城位在弱水下游,它直接屏蔽着酒泉,而原系匈奴休屠王所驻的休屠城则位于谷水(今石羊河)中下游,它直接屏蔽的则是武威郡。居延是酒泉、张掖郡的北方门户,而休屠则是武威郡的北方门户,匈奴不论从居延或休屠南侵,显然都可以切断河西走廊,所以汉朝在此时建置居延城、修复休屠城以加强酒泉、武威的防御,以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引史文虽只寥寥 15 个字,但所记的事实却很值得注意,这是汉朝在居延地区建城设防的最早记录,它表明汉居延城废墟至今已经历了 2000 多年的历史。

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即居延筑城后两年,匈奴袭击了酒泉郡,杀了汉酒泉都尉,史书虽未明记此次匈奴军来袭的路径,但《汉书·武帝纪》接着就记载了汉朝起用前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强弩都尉,驻守居延,且增筑了“遮虏障”,这就表明了匈奴袭击酒泉果然是由居延沿弱水南来的。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发生了这样的事,颇足以说明居延作为南北通道口的重要性。

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汉军以李陵为将,从居延塞出发北攻匈奴。李陵率步兵 5000 由居延出发,北行 30 日至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东端),遇到了匈奴大单于亲率的 3 万多骑兵围攻,两军劳逸之情既不相同,步马之势又甚悬殊,汉军乃不得不且战且引,循“龙城故道”向居延塞退却。尽管汉军向匈奴作了壮烈的斗争,但由于寡难敌众又兼途中未得到接应,终于不幸在居延塞北方百多里的地方溃没(以里程计,约略在今中蒙边界附近)。

这里要注意的是“龙城故道”,既云故道可见是由来已久的道,它是从居延到浚稽山之间的道路,向北越过浚稽山可达匈奴的“龙城”。李陵这次出兵,雄心在于直捣单于庭,所以才取此路而北。“龙城”在今鄂尔浑河上游



的哈尔合林附近,然则浚稽山的位置必在“龙城故道”上,距居延有30日步行军路程的地方。《汉书·匈奴传》应劭注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所以为障蔽。”按这些条件看,浚稽山应是今杭爱山脉东端某山,山北即是鄂尔浑河上游,匈奴龙城所在,这里既被匈奴视为“障蔽”,所以单于亲率3万骑兵在此迎击李陵也就可以理解了。

除上述“龙城故道”外,在《汉书·李广苏建传》天汉二年同条下,还记有另一条行军路:“上(武帝)怒,……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这段史文所记的道路,大致是从居延向东,深入匈奴境内,再从“东浚稽山”向南回到阴山西段北麓基地。

两汉时期,史书中除了关于居延道上的军事记载外,也留下了和平往来的记载。《后汉书》记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单于因为汉朝友好地送还了他的弟弟,乃派遣使者到居延塞接洽,交涉从居延路入朝事宜,但被汉朝拒绝。同书还记有,北单于又一次遣使到居延塞请入朝见,并请派大使引导,汉朝这次派遣窦固率数百骑,偕同匈奴的来使出居延塞迎接。窦固等一行人出居延塞后,途中得到了匈奴内乱的消息,乃引还。这两条记事说明,居延——龙城道在战时是军事道路,在和平时期则是友好往来之路。如上述,居延绿洲位在大漠之中,形成了东西、南北交通大路的十字路口,特别是北通龙城南卫酒泉,所以汉朝对它十分重视。武帝太初元年于此筑居延城。并派都尉驻守,其后又起用老将路博德为都尉,增筑遮虏障。几度出兵北伐都以居延为基地。为了巩固,加强这个北方基地、北方门户,汉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命令驻军屯垦,移民实边,设置管理民政的居延县,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属国都尉”,推行先进的耕作方法等等。对于这片绿洲的各种情况,不独史书有所记载,当地军政机构遗留下的大量简牍,更为我们了解此地区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以下各项就是居延历史地理情况的简单介绍。

居延地区的常住人口,据《后汉书·郡国志》记:“张掖、居延属国,户一千五百六十四,口四千七百三十三”。“居延属国”是汉代的一种行政机构,据

刘昭注曰：“属国之长为属国都尉”，其职务是“主蛮夷降者”，这种机构和官制是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2年）起设置的，设在安置外族降人的地方。居延设置“属国”，可见那里住的不仅是汉人而更多的则是匈奴及其他族降人。然则居延地区在当时是汉匈共处，其生产方式也必然是农牧交错了。

汉时居延泽是一片大湖，它位于今索果诺尔（湖）的东南方，居延城的东北，那时的弱水下游从居延城外流过注入古居延泽。居延城虽然近湖、靠河，但其周围地区在那时就已有了沙害，“居延汉简”中有一片即记述这里是“地热，多沙，冬大寒”。驻守居延的汉军是从事农垦的，因为当地多沙，所以农业要依靠引水灌溉，开渠引水就是驻屯军的一项生产任务。简文中记有“河渠卒”即开挖沟渠的兵士。简文还记有在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的一项水利工程中有1500多名兵士参加施工，可见工程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驻戍居延的兵士可以携带家属，家属总数虽无记载，但仅以“戍田卒千五百人”为基数去加以估计，其人数也不少。把戍田卒与有户籍的居民合计起来，后汉时期这里的总人口已达六七千人，与这么多人口相对应，其农垦的规模也必是不小的。前汉时期，因为这里是新建的基地、新垦的农业区，大部耕地属于军垦，所以选择此地推广过先进的耕作方法“代田”法，提高了这里的粮食产量。《汉书·食货志》记曰：“武帝末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中……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居延地区既有流沙之害，所以农业生产和军事工程都受到了流沙的威胁，为与沙害作斗争，简文中明记兵士的任务之一是除沙。这表明，为了保护农田不受沙壅，军事工程不受沙壅，兵士们要常常从事于除沙的劳役。从这类简文可以知道，古汉代就以大规模防沙护田了。

经过大约3个世纪的经营，东汉末年这里的人口与农垦规模都已达到了相当水平，所以在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汉朝乃把居延的行政机构级别提升为西海郡，与河西各郡并列。级别由县提升为郡，不仅反映出汉朝对此地的重视，更反映了此地区的发展。



北魏在居延的建制仍是西海郡,行政级别不变格,反映这里的人口及生产情况没有显著的变化。公元6世纪初,北方的一部分游牧民族来投北魏,北魏朝廷专门讨论了对来归者的安置问题,凉州刺史袁翻提议说,西海郡位于酒泉的北方,是北方民族的交通要冲,又是汉朝行军的故道,其地平坦、肥美宜耕,适宜于安置来归的部落。他的建议被采纳了。袁翻是当地的高级官员,了解西海郡的情况,他的这段述评表明了居延地区在交通上的重要性不衰,地理条件仍然是宜于农、牧的。

三

居延及居延道路原在匈奴之中,对于初到这片地方的汉族来说,开始时是很生疏的。汉得河西与居延后,河西走廊成了东西交通的坦途,所以尽管居延道路在汉朝领土之内,通行的人仍必很少,人们对这条路仍必比较生疏,因此,有关它的记载也就零星稀罕。总之,公元6世纪以前的居延道路仍是偏僻冷落的。

公元7世纪初,唐朝统一了全国。唐代的西方疆土更逾于汉,唐和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也比汉代更盛。“丝绸之路”虽开自汉代,而其繁荣,昌盛则在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在盛唐时期开放出了绚丽的花朵。

盛唐时期的河西走廊比往时更加兴旺,唐朝把河西各郡改名为甘、凉、肃、瓜、沙等州,其中最西端的敦煌(沙州)则是交通中亚的门户。唐代的漠北,先后有突厥、回鹘等族活动,所以唐朝对北方门户居延仍然是重视的。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凉州条下记载,当时汉代的居延故城还在,居延故城的东北仍有居延海,唐朝选在居延水(弱水下游)两汉之间设置了“宁寇军”(军事机构)以统领当地的军务,“管兵一千七百人,马五百匹”。从宁寇军向北百余里,有路通往“回鹘衙帐”,可见这里的南北通路基本与汉代相同。

在河西走廊畅通之时,居延道路并不为旅行者所重视,天宝之后,情况

发生了变化。公元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吐蕃贵族们乘中原战乱，唐朝无暇西顾之机，夺占了河西各州，切断了西域与长安间的联系。在河西路断的艰难时期，居延道路就成了避开河西吐蕃势力，代替河西走廊，联系西域与长安的捷径。以下两事即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唐朝在西域原设有北庭、安息两节度，前者驻今乌鲁木齐东北之吉木萨尔，后者驻今库车。河西路断后，两镇为与长安联系曾几度遣使东来，但都未得达，后来他们乃假道于北方的回鹘，穿过沙漠才到达长安。他们所假的路，当时通称为“回鹘路”。（《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会昌三年，“赵蕃奏，黠嘎斯攻安西北庭都护府，宜出兵应援。李德裕奏曰：据地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关……自艰难以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须要知道，那时河西走廊各州以北的广大地区，即今北山以东的阿拉善高原，都属于回鹘范围。

吐蕃占据河西不久，敦煌唐人张义潮等骤众起义，驱逐吐蕃，首先在瓜、沙二州内恢复了唐政权。为与长安联系，他们派出军校10人，每人携一大棒，把表文填入棒内，从瓜州向东北走，穿过大漠直到天德城才与朝廷取得了联系。张义潮起义事在宣宗统治时期，其时天德城的位置在今包头市西北方的大余太（安北）一带，然则从瓜州到天德城间经过了哪些地点？对这个问题，《新唐书·地理志》瓜州条下有一段可贵的记载：“晋昌……东北有合河镇，又百二十里有百帐守捉，又东百五十里有豹文山守捉，又七里至宁寇军与甘州路合。”晋昌县城就是瓜州的治所，从晋昌有路向东北，经过合河镇（不明所在），百帐（不明）、豹文山（不明），就抵达位于居延水两汉之间的宁寇军了。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从瓜州向东北有路通达居延地区。“守捉”是唐朝设在边防地带的第三级军事单位，沿途设有守捉，可见这条路是重要的。既然瓜州东去天德军的路要经过居延，那么从西方北庭都护府去天德军的道路岂不也可以经过居延吗，经过居延再趋天德军岂不是很合理的吗？遗憾的是，在唐代史书中尚未发现这类记载。非常可能，唐人所谓的



回鹘路也就是居延道路。

四

从公元前1世纪(西汉武帝时)到公元后10世纪(宋、辽、西夏对立时期)的1000多年间,史书所记有关居延道路的情况屈指可数,其中只有行军,通使的记事,没有商队往来、商品交流的迹象。推究其故,主要是居延道路沿线各地的生产水平,尚未达到商品长途交流的程度。公元10世纪,沿线各地的政治、经济地理情势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居延道路上的交通也有了新的进展。

大约从公元9世纪50年代起(唐会昌年间),漠北的回鹘各部大举南移,分别进入了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各地,各部各自建国,不相统属,其中以甘州回鹘及西州(高昌)回鹘为最强。回鹘各部既扼据交通要地,乃利用地理之便从事东西贸易,因而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西贸易都和回鹘商人有关。

在东北方的松辽平原上,先后在今牡丹江流域出现了渤海国,在辽河上游出现了契丹国。公元10世纪后,契丹日益强大,向南侵占了“燕云十六州”,向东征服了渤海与高丽等国,向西征服了阴山以西大漠中各部,建都于临潢(今辽宁西部、巴林左旗附近),后改国号为辽。

宋代的北方和西北方疆土远逊于汉、唐,其中西北边的河西、灵州(今银川平原)、夏州以北各地都被西夏所据,北方为辽所据,黄河流域陷于宋、辽、西夏对立的局面。居延道路上的交通和这种政治局面是密切相关的。在这期间,居延道路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公元981至公元983年间宋使团的往返,一是公元1122年一支辽军的远征。

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西域高昌国(今吐鲁番)遣使到开封通好,宋朝派遣了以王延德为首的使团去高昌答聘,他们往返行程“三万里”,历时两年,归国时仍循旧路,还偕带来了高昌使团百多人。王延德提出了出使报告——“西州纪程”(《宋史》卷三〇九《王延德传》)。在报告里,较详细

地记载了所经各地的情况,它是居延道路上一份完整的、珍贵的旅行记。对它,前人已有不少研究,兹按原文复原一下居延道路。

王延德行记是从夏州记起的。夏州乃沿用唐名,宋人乐史所编的《太平寰宇记》卷三七对它有简要的介绍。宋夏州城就是公元5世纪赫连勃勃下令修筑的“统万城”,其址在今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境内红柳河北岸,当地今称之为“白城子”。夏州自古就是交通要地,早在唐代从夏州向西北经过宥州(“经略军”,大致在今鄂托克旗乌兰巴拉嘎苏镇地区),就有一条重要的驿路通达天德军(今大余太)。王延德西使不经河西走廊而出夏州,是因为当时西北道路已被吐蕃隔断,河西走廊尚被回鹘所据的缘故。

王(或作玉)亭镇在夏州城北不远,当时是夏州北方的防御性据点。黄羊平不明所指。在这片地方,王延德曾记说有沙,估计和现在的地理景象相似。重要的问题是,王延德一行在何处渡过黄河的。按地理条件分析,唐代早有驿路通向天德军,此时驿馆虽废但驿路必仍存,宋人依循唐人旧路而西北行是事理之常。而且,要从黄河河套以内去西北,必须在河套西北角渡河,从地理上看这是没有疑问的。再者,他们绝不可能是从银川平原、贺兰山一带渡河西去的,因为当时的政局不允许他们这样走,而且在行记中完全没有银川平原的迹象。剩下的、唯一合理的推断是:使者们在黄河西北角今海勃湾——磴口之间某地渡河,渡河后即进入了“六窠沙”,即今之乌兰布和沙漠。再西即越过了“楼子山”,相当今狼山的南端,楼子山隘道很可能就是汉代的鸡鹿塞道(今之哈鲁乃山口)。

越过楼子山向西,又进入了沙漠,其东部即今亚玛雷克沙漠,其西部即今巴丹吉林沙漠。在沙漠中他们步步西行,方向显然是趋赴居延的。途中经过了几个部落所住的绿洲,相当今之何地都不可考。经过沙漠长途旅行之后,遇到了一条大河即合罗川。合罗川是沿用唐名,初唐时编辑的地理书《括地志》卷八记云:弱水又名合黎水,亦名张掖河。合黎水是少数民族称呼的汉译,音与合罗川相似。另外,在唐、宋的文牒中则都使用合罗川这个名称。《全唐文》卷七〇七,《李德裕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前略)踏步合祖



云,纥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可见合罗川是回鹘旧居之地,西通安西、北庭。《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回鹘》(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八册,第七七一四页):“雍熙四年八月,合罗川回鹘第四次太子,遣使来贡鎗石。”可见合罗川回鹘与宋有交往,其交通路当必即王延德出使之路。),它就是今之弱水。晚唐以来,合罗川(弱水)沿岸直到甘州都是回鹘居住之区,唐朝又曾把公主嫁给回鹘可汗为可教,所以在合罗川下游沿岸有唐公主所居之城是可以理解的。王延德在这里没有提到居延泽,也没有提到汉居延故城或唐宁寇军故城,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渡河庶在汉、唐故城以南的关系。至于“黑城”(遗址在今额济纳旗境内),乃是西夏的“威福军”城,王延德过此时尚未建置。合罗川以西的“马山”,不论从名称上看或从地理上看,都指的是现在的马鬃山,这里一向是东西交通必经之地(王延德记的是山名,不是现在又名马鬃山镇的公婆泉)。

其次的“格罗美源”,按所记是一片浩瀚的大湖。从路程看,它位于马鬃山与伊州(哈密)之间,从地理上看,这带地区内只有巴里坤湖可以相当。巴里坤湖位于博格达山脉北麓,古代匈奴名是蒲类海或婆悉海,海至博格达山之间素称沃衍,汉代从酒泉出兵击匈奴于天山即过此地,汉、唐从酒泉至此皆有行军故道,王延德一行由马鬃山至此,依循的正是汉、唐故道。从此越山而南就是伊州(哈密)。

伊州以西,循今博格达山脉南麓通往高昌的路,是众所周知的老路,这里不再赘述。

通读王延德行记,可以看出他们所走的路,正是出古鸡鹿塞,趋居延,再趋马鬃山,经巴里坤湖至伊州,由伊州而西终抵高昌。这条穿过沙漠、大致于河西走廊平行的东西大路,本是汉唐以来的故道,也即居延道路。王延德虽是这条路上晚来的旅客,但却是第一个留下了全程旅行记的旅行家。这份报告是很珍贵的古代居延道路记录,其丰富内容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据史书所记,王延德西使是为了答聘,可见先来的是高昌使团。史书又记:王延德等“与其谢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可见高昌与宋的使团已



经几次往返在这条路上。还有史料表明,不独西域的使者,还有从天竺来的僧人,也是经过这条路到开封来的。《宋史·外国传·天竺》:“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从西州(高昌)经夏州而至开封,其路显然也是高昌使团和王延德使团所走的路。经商的合罗川回鹘人当然也走此路。这些事实证明了,这时期的居延道路已经不冷僻了,已经成了东西方旅行者常用的路。

百多年后,史书又记载了一宗居延路上军队长征的事。辽代末年,首都析津府(今北京)被金兵所困,辽天祚帝逃避金兵于“夹山”,皇族耶律大石见大势已去,又与天祚帝不合,乃率一支部队宵遁,另谋出路。关于耶律大石西征并建西辽国于中亚一事,中外学者多有研究,这里依据《辽史·天祚纪附大石》的史文,考求一下他的行军路线。《辽史·天祚纪附大石》记曰:“……大石不自安……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先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兵行万里……至寻思干(下略)。”

大石出发的地点是夹山。按《金史·地理志》,夹山在其西京路云内州柔服县境。柔服即今山西省朔县。从地形看,夹山指的是今桑干河上游、管岑山与恒山之间的盆地。从夹山向西北急行三日所过的黑水,即今呼和浩特市南方的大黑河。大石过黑水后,在今呼和浩特平原某地,得到了一批牲畜,继续西行。

可敦城,是唐代突厥某可汗为其妃(突厥语为可敦)修筑的居城。《辽史·地理志》西京道云内州下记说:唐中受降城附近有可敦城,唐中受降城略在今包头市附近。史文说,大石“至可敦城,驻北寇都护府”,这是误记。唐代的北庭都护府远在今新疆吉木萨尔;与此处的可敦城无关。查唐代地理书,安北都护府后期曾设在中受降城附近的可敦城,《辽史》所记与唐代所记



恰合。唐安北都护府是当地最高军政机构,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影响大而印象深,所以《辽史》记可敦城而兼及都护府。遗憾的是辽史编者误把安北记作了北庭。正确记法应是“至可敦城,驻安北都护府”。其地应在今包头市附近。

大石在今包头附近聚集力量作了准备后,翌年乃振旅而西,其路途当然是沿黄河北岸西行,取捷径,出古鸡鹿塞隘道,直奔居延。为了假道,先期送信给甘州回鹘王,请求假道西行,其时的居延绿洲、合罗川沿岸都在甘州回鹘区内,倘非经过居延则何须假道?既是假道也必无迂回向南进入甘州之理,所以应该肯定,大石西行也是经过合罗川下游的。自居延向西,经过今马鬃山、巴里坤湖(王延德所记的“格罗美源”),再傍天山北麓向西,有一条通向中亚的大道,这里不作介绍。大石即循此路,兵行万里,远至中亚寻思干(今撒马尔罕),终于建立了“西辽国”。大石的长征,再一次反映了此时期居延道路的情况。

五

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宋、辽,西夏对立的局面,各国之间的边禁还是很严的,政治往来当然受严格控制,即使是商业往来也要受到盘剥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辽国首都上京临潢府(今辽宁省西部巴林左旗,即林东),与西域各国特别是高昌之间却有着商业往来,其交通路的一大段也是利用居延道路。

据《辽史·食货志》记载,辽政府为了广收对外贸易之利,曾在几个地点设置过国际贸易关口,名为“互市”:对宋的设在雄州(今河北雄县),对高丽和东方各部的设在渤海(今牡丹江上游的东京城废墟),对西域各国的则设在高昌。

关于高昌以及龟兹、于阗等西域诸国对契丹的贸易情况,《契丹国志》(卷二一、二六)里有不少记载:高昌等国每3年到契丹来进行一次交易,他们的使团(实质是商队)每次多达400人,带来的商品有珠、玉、琥珀、犀角、乳香、皮革、细毛织品等等,契丹付给他们的代价至少也不下于40万贯钱。

西域高昌等国送来的商品都是昂贵、精美,宜于长途贩运的东西,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珠、犀角、琥珀、乳香等物。这几种商品都不产于西域,琥珀原产于北欧波罗的海南岸,珍珠产自波斯湾沿岸,乳香产自南阿拉伯,犀角则产自非洲。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上的传统商品,经过高昌等国的居中贩卖而来到契丹。高昌是契丹在西域的外贸中心,那么在契丹境内的外贸中心是何地,据《辽史·地理志》上京条下记:“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即是说,回鹘商人留居临潢者甚多,辽政府特地在南门之东划定了专区,供他们居住。所说回鹘不但包括西州回鹘(即高昌),还包括甘州等地的回鹘。这表明了上京临潢是对高昌等西域各国的贸易中心。

上述情况表明,西域与契丹临潢之间的商业交往是经常的,使团规模相当大而携来的货物也相当多。除此之外,双方当然还有政治联系,使团往来。前引的王延德“西州纪程”记有一件事,王延德在高昌期间,契丹使者也来到了高昌,契丹使臣曾在高昌王前挑拨离间宋与高昌的关系,王延德得知后,向高昌王揭露了契丹使臣的阴谋,且愤然欲杀之,高昌王固劝方止。这只是使团间斗争的一次记载。此外,契丹与高昌、甘州回鹘间的政治互访当然还有多次。据王日蔚先生《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四卷第八期中讲,11世纪和12世纪间,各地回鹘使团来临潢者多达64次,平均每三年半一次。这个统计与前引《契丹国志》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那样规模的,频频的政治与商业来往,取的是哪条道路,史文虽缺乏直接记载,但从政局和地理两个因素却可做出可靠的推断。从政局看,那样规模的来往显然不可能穿过西夏领土,史书中有记载说西夏是拒绝使者过境的,它只能选择一条不经西夏而直达的路。从地理上看,当时阴山以西直到居延地区的漫衍地区,基本是在契丹势力范围内,也即是说,自居延而东就进入了契丹势力范围,阴山以东则是契丹的直辖领土。然则高昌国使团循居延道路东来,到狼山南端(古鸡鹿塞外),不入古鸡鹿塞而转向东北,即可直趋临潢,岂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们既然可以循此路去宋,当然也可以循此路去临潢,道路的分歧点就在狼山南端,古鸡鹿塞(哈鲁乃山口)外。



至于甘州回鹘人去临潢的道路,那当然是要从居延东行,再转东北趋向临潢。总之,西域、甘州各地回鹘与契丹首都临潢间的联系是利用居延道路进行的。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间,居延道路上不但有军事交通,更值得重视的是有了频繁的政治,经济交通,它已不是一条冷僻的道路,而是一条频被利用的、兴旺起来的道路了。

结 束 语

我国西北部的阿拉善高原上是一片辽阔的荒漠、半荒漠,东连阴山,河套(鄂尔多斯),西接天山,北通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达祁连山地,而居延绿洲则略位在这片广阔干旱区的中心。在古代,东西横穿大漠、南北纵贯大漠的古道,都交会于居延,以居延为其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街头”,以及东西、南北交通干线,在历史时期曾起过相当的作用,本文只是对它作了个初步介绍,不少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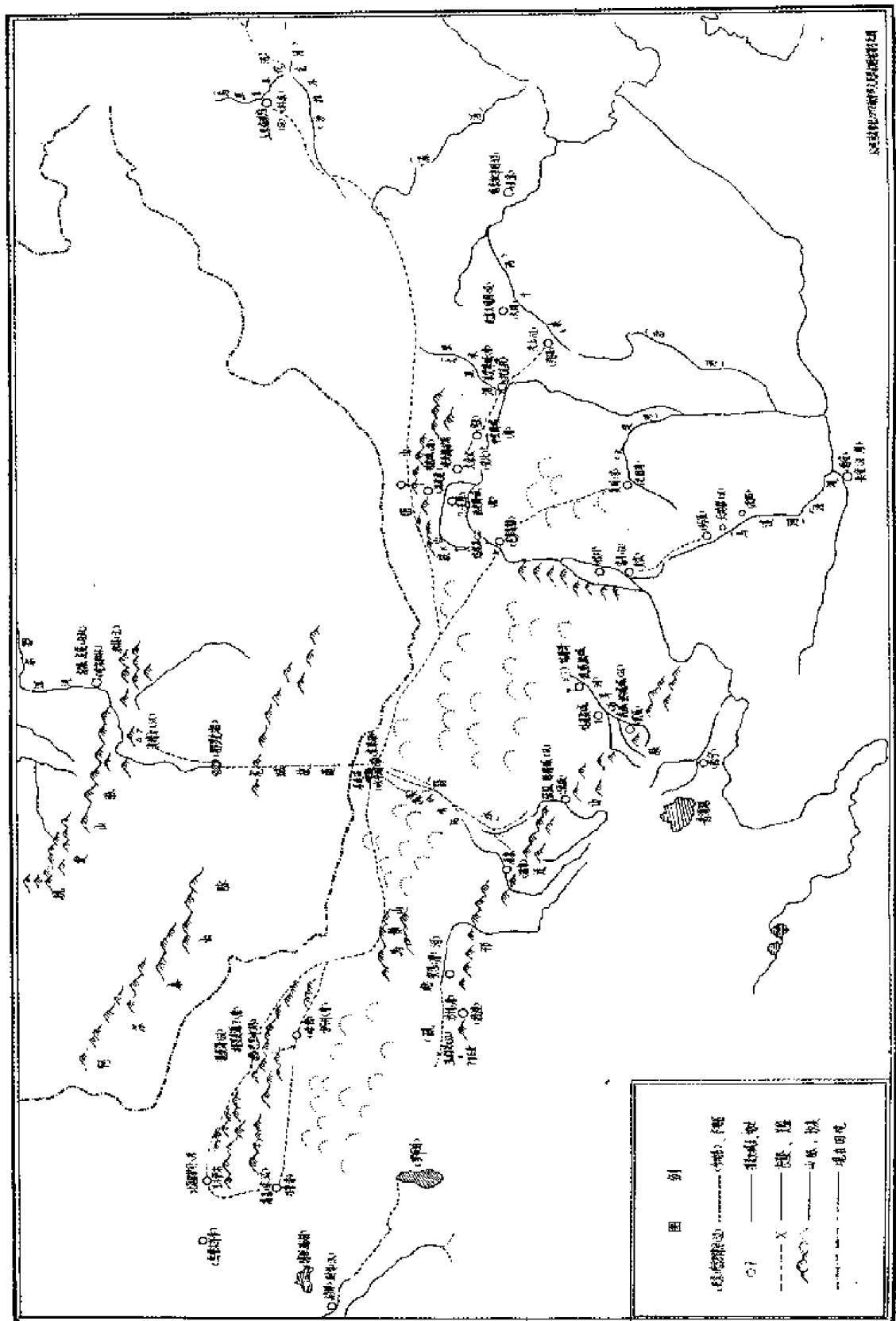
从当时的形势看,古代交通以役畜为工具,深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所以通过居延的南北道路曾以弱水为绿廊,直到19世纪末,俄国的探险队还是取此路进入我国甘肃、青海等地从事窥探活动。时至今日,交通手段大大前进了,这条弱水绿廊是否还有和平、友好交通的价值,在军事上是否也有防御的价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居延绿洲东接阴山、河套,西连天山南北,我国东部与西部之间虽以河西走廊为坦途,但居延道路既与河西走廊平行,又直捷穿过阿拉善高原而联系着东西两大部,直到现在仍为当地群众所利用,那么,随着东西部地区生产的空前发展,居延道路是否会发挥它的新作用、为东西交通作出新贡献,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本文作者王北辰,1921年生,北京大学地理系,从事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工作。



古代居延道路示意图





居延南路综述

陆 浩

由额济纳旗居延海向南通达于河西走廊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达酒路,这是一条基本顺沿弱水绿带南至走廊西、中部的酒泉、张掖等地的大道,另一条是达上路,这却是一条远涉沼泽、沙漠、戈壁、山地,大体通过现在阿拉善右旗上井子一带而南达于走廊中、东部的山丹、张掖、武威等地的小路。鉴于有关这些道路具体史记贫缺的实际情况,笔者现在仅能根据一些很不完全的采访资料和个别书籍中的一些零星提介,根据自己对之的一番极为粗浅的统析,将这些道路的基本情形及相关因素综述于下,务求贤达知情之士们的纠偏改谬、核实补正,从而有利于我们共同的建设事业。

一、达酒路

就其使用和路型情况的不同,主要分为驼路、驿路、公路三种。

(一)达酒驼路

达酒驼路是指由额济纳旗旗府达来库布南至甘肃酒泉、张掖等地的驼路。因路带多在大沙漠、大戈壁地形区内,地区又因地成宜,盛产沙漠之舟骆驼,历来被称誉为驼乡,因此这条路上,只能以驼行为主,另外亦行牛车、驴、马、骡等,这儿总其情形,以驼路着要,代为称之。

达酒驼路,大部路段沿经黑河下游。黑河下游,历称弱水,元代以后,又被称作额济纳河。额济纳河,亦被称作溺黑河。许多书图上,亦用“弱水”或“黑河”作全河之称。“弱”,势弱之弱,“溺”,沉溺之溺;“额济纳”,汉译之意

为“幽隐”，即“无人烟”之意。凡此取名，多是因为这条河流在流至下游地段以后，渐入沙漠，不能成势，潜隐而远达的缘故。弱水还有许多名称，《汉书》称为羌谷水，因“河源出摆通河，经祁连积雪消融，其流益洪，傍合黎山出羌谷口”（清黄文炜著《重修肃州新志》第188页），又因其流经张掖（甘州）和山丹，又被称作张掖河（或甘州河）和山丹河。另外，还有称其为合黎水、鲜水、覆水、副投河（《史记·夏本纪》注）以及坤都伦河者。弱水的终端湖先有“南海”之称（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容纳弱水的湖泊，被称为‘南海’。这就是《尚书·禹贡》《淮南子·地形篇》及《史记·夏本纪》等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表明当时尚无居延之名”）。以后又称为居延泽或居延海。古居延泽原有三海，称东海、西海、北海。三海面积很大，最大时竟至400平方公里。如今，东海已干涸，南海亦成沼洼，唯北海尚有小存，即现今达来库布东部40公里处的景素图海子，其亦渐被黄沙吞埋近尽，仅有两平方公里之余。“景素图”海子，因夏日常憩天鹅，所以汉族人又多称其为“天鹅湖”。元代时候，古居延泽还大为存在，称哈班、哈巴、喇失三海子，以后弱水改道，流入现在的居延海（即嘎顺诺尔，又称西居延海）和苏古诺尔湖（又称东居延海），古居延泽方逐渐干涸缩小。现在的居延海东南距古居延泽遗泽景素图海子约75公里；又南东距著称于世的居延黑城遗址亦约75公里；黑城遗址东北距景素图海子45公里，而现在的额济纳旗旗府达来库布恰好在这一等腰斜置的三角形的中心地带，正在古、今居延海和黑城遗址这三角点的中心区域。由此可见，现在位居弱水东河西岸的达来库布是可以被视为居延地区中心地的代表性称谓，而不影响有关道路历史的叙说。达来库布产生较晚，始自20世纪30年代。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20多年里虽然居民一直很少，但却屡次地较长时期地作为额济纳旗政府和地方防守部队的驻地。20世纪60年代以后，汉人拥入，达来库布渐成镇容，并为额济纳旗唯一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

达酒驼路由来已久，实为古居延十字道路的南支，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西汉前期，它便已是我国西汉王朝河西军政重地的北防主线。当时，匈奴



北居,南望河西水草,不失恢复之志;汉都西安,又以河西为之屏障,兵之攻防进退亦多赖居延。汉匈屡屡交兵,南来北逐,车马长途,戈壁沙漠中的弱水绿带,自当为其便利,于是沿河大道至迟会此时形成。何况,在西汉立朝初期,匈奴得驻河西,著名的匈奴族的龙城故道就已存在(《汉书·李陵传》:李陵“引兵东南,循龙城故道行。”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龙城故道是从居延到浚稽山之间的道路”。龙城为当时匈奴单于驻地,又称“龙庭”在鄂尔浑河上游)。想析这达酒路一定是这一故道的南伸,或者直接就是龙城故道的南段,以便使龙城和河西沟通,这样一来,达酒路的历史则是更可以前溯了。汉逐匈奴以后,在弱水一线,大筑城塞烽燧,设邮驿,置政县,驻军屯田,移民实边,凡此一切活动使这居延南线成为一条极为重要的疆防道路。现今在弱水沿岸历历可见的烽燧遗迹,农田遗迹、塔寺遗迹以及在这一带出土的大量居延汉简,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居延地区古代时期社会和交通方面的繁盛景况。在《新唐书·回鹘传·山丹县》和《唐会要·回纥》里都提到北方民族多次进入河西定居的事情。居延汉简更是具体明确地记载道,当时有人牛车贩鱼,自居延至张掖过市,往返仅需 20 余日,行途 800 公里以上。这都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古代居延南部弱水路的通大及其于行旅的方便,看到居延与河西地区在人事、贸易等许多方面联系的要捷性以及一体的历史性。唐代,河西走廊为我国通西丝绸之路网中的主轴线,达酒驼路是其北向的主要支线,是一条主要的草原丝绸之路,更确切一点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南接丝绸之路、南通中原盛地的一条主要渠道。目前,在外蒙古古墓挖掘中发现的许多汉代丝织物,更能充分说明这一丝绸支线的久远历史。达酒驼路,在历史上虽然由于以后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东移,由于中国版图的扩大,及各民族的融合统一等原因,渐已失去攻防利用的很大必要性,在国家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有所下降,但在经济文化方面仍一直效宜于西北人民,仍是一条被人们沿用不弃的沙漠草原路。在这里,人们不但至今仍记忆着霍去病、路博德、耿夔、刘敬同、成吉思汗、冯胜等等无以数计的昭史人物的丰功伟绩;记忆着无数守城御敌、辛苦垦殖建设边疆的军丁边民;记忆着陈子昂、王维、

高曾、马可·波罗等等骚客游人们的诗情或足迹,而且还畅想着大禹凿导弱水改天换地的气势和余荫后泽的奇功(相传大禹曾“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尚书·禹贡》)。又据《甘州府志》说,古代黑河被合黎山下的镇夷山所阻,并不北过沙漠,禹带领人民凿而导之,才流入居延泽。清初甘州府教授王学潜亦在《弱水流沙辨》中说:黑河“下游未启,聚为平湖……今镇夷峡中居然有斧凿痕,与伊阙龙门同符,是禹导水处也”。关于禹导弱水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畅想着今后如何更大程度更大成效地造福于民的新的蓝图。达酒驼路,连同居延其他道路一起,千古流芳,著称于世。达酒驼路,又是一条嵌满文物宝珠的彩虹,是一条塞内外互通文明的坦途,是一条促成中华民族友好继往开来的纽带。

达酒路是处于我国北方沙漠戈壁腹地,具有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的一条道路。一方面,它置身于名闻世界的巴丹吉林大沙漠之中,周围或则沙漠迤迤,或则戈壁千里,地处极为干旱,多风少雨,年降水量仅在 60 毫米左右,临区温差极大,夏季炎热灼人,气温常高达摄氏 30℃~40℃,冬季又寒冷难熬,气温常低至 20℃~30℃,年较差近至 60℃,日较差通常亦在 20℃以上,是典型的温带内陆荒漠气候,一些地方,甚而一无人烟,绝少草株、鸟不入飞;另一方面,它却能得天独厚,依受弱水河谷的滋益,在大旱之地能不乏水供,在无草之区,却又能林木成带。在弱水两岸,许多地段有时竟能自成天造景观:梧桐古朴壮美,荫盖如云,红柳堆香出逸,一望无际;芦苇柔姿飘摇,回肠荡气;加之,水草青青,沙光熠熠,一片又一片,金、黄、翠、绿,相间相映,煞是鲜丽清爽,别有一番谷洲风色,桃园韵气。难怪这一条居延南路,以后虽是非军非使,亦能自古不衰。在历史上,由于沙漠的移变,由于弱水河道及居延泽位置的移变,又由于居延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点的移变,这一道路的许多具体情形亦是相应多变的,但是道路的因河而走以及随地势由南向北倾伸的基本大势却是不变的。弱水在流出走廊后便潜陷沙漠,北经 150 多公里,于狼心山处则两分而走,偏东流插的一条称东河(又称纳林河、老套河或莫那果勒),偏西流插的一条称西河(又称木林河或海图果勒)。东



河经达来库布约行 150 公里即北入苏古诺尔(即东居延海),西河经建国营(蒙名赛汉桃来)亦约 150 公里北入嘎顺诺尔(即今居延海),两河中部间距约为 30 公里。居延地区整个地貌类型可以以东河为界划分。东河之东间临黑城古迹、古居延泽及古日乃等湖地,这一部区,虽多沼泽湖泊,但更多的是大沙漠,是巴丹吉林沙漠的主体所在,世人称之为沙漠草场区,主要植被有梭梭、芦苇等。自东河以西,戈壁则为地貌主体,主要植被有梭梭、麻黄、白刺等,其中麻黄、黑子刺、枇杷棵、黄毛头、老鸦秧被称为居延戈壁五大植物。东、西河中间一带地面,世人称之为中间戈壁草场,西河以西地面,被称之为西戈壁草场。沿河近水地带则为谷地,是沿河草场,丛生梧桐,红柳、芦苇、沙枣等,其中红柳、芦苇、芨芨为居延三大牧草。

达酒驼路,自酒泉向北,至达来库布,全程为 372.5 公里。若将达酒驼路向北顺延,则 50 公里左右可至居延海泽(苏古诺尔或嘎顺诺尔);又 30 公里左右可至中蒙边界;又 550 公里左右可至蒙古之哈尔和林(即汉时匈奴的龙城、龙庭和元时和林);又 310 公里左右即达蒙古首府乌兰巴托(蒙古独立前称库伦)。由达来库布一带南上酒泉等地,开始时沿东、西两河东、西两岸,有四道并行,行人可择取其一。至狼心山弱水尚未分流处以后,四路随河并为沿河两道,行人仍可择行其一。弱水流经沙地,水流时隐时现,时大时小,加之分径甚多,一般水不能深,所以行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需,因地利或天时,择取岸口,涉浅渡河,在沿河几道上交插行进。一般全程运行,可分下、中、上三段,对此,现分述于下(参见附表一)。

1. 下段(北段)—汉河段:指下游东、西河四并路段。这部分途程计在 125 公里左右。

(1)东河东路:由达来库布对岸的那仁布拉格(即哲日格勒,两地隔河相距 5 公里)起始,沿东河东岸南行,32.5 公里至宝德格波日格;40 公里至巴拉巴日海;50 公里至狼心山。狼心山山上有敖包。依蒙人习惯,每年都要就近到敖包上祭典天地神灵,以祈保平安福昌。敖包主要供作蒙民祭典使用,由蒙人用石块或木柴垒成,少数亦有小屋式的,敖包常设在较高处,道路



边侧的敖包,自然兼为主要路标。

(2)东河西路:由达来库布沿东河西岸南行,17.5公里至珠斯楞查干;42.5公里至敦德查干;10公里至额很查干(隔河东南距河东巴拉巴日海1.5公里);22.5公里至珠斯楞套来;又行25公里至河口(东、西河分汊处之夹角地带)。行人于此,向南可过东河,5公里即至狼心山。沿东河西南行,亦可不在河口,而在珠斯楞套来北部5公里处,更偏西南行17.5公里,插至新西庙(即巴润素木,又称喇嘛庙),接西河东路南行,或由新西庙过西河7.5公里至青山头(蒙名宝日乌拉)接沿西河西南行。

以上东河两路,地处东河沿河草场,沿途植物以梧桐树(即胡杨)为主,其他还有红柳、沙枣、骆驼刺、水柳、苦豆等,牲畜水草足用。

(3)西河东路:始自西河东岸道劳卧铺(七间草房之意)。道劳卧铺东距达来库布37.5公里,有大路系此河间。由道劳卧铺沿西河东岸南行,35公里至可可套来;22.5公里至雅布日呼都格;25公里至新西庙;15公里至河口。

(4)西河西路:始自西河西岸的建国营。建国营东距道劳卧铺2.5公里,两地仅一河之隔。由建国营沿西河西岸南行,25公里至乌兰川吉(“川吉”在蒙语里是烽火台的意思);15公里至老西庙(即胡勤巴润素木);又15公里至哈日敖包(为一大敖包);20公里至巴勒吉尔敖包(亦为一大敖包);17.5公里至青山头。

青山头和狼心山均为达酒驼路中途重要的山地和路标。狼心山因形圆状似狼心而名,又名巴彦宝格德,系富饶神圣之意。此山恰置弱水分汊处,居河之东,一般又为上述沿河四并路中前三路的会合点。青山头地在狼心山北12.5公里处,两山隔河南北相望。青山头半圆形,因附近树草青青而名。青山头另有东、西二山。青山头三山东西成向,一字横排,其东山与西部二山为东西两河间开。青山头东山(蒙古名呼和乌拉)在东河东侧,西南距狼心山12.5公里;西距青山头10公里;青山头西山(蒙古名超瑞音塔塔拉音乌拉)在青山头西部亦10公里处。凡此数山,均为小山,岩成坡陡,无所透迤,海拔均在1300米左右,其山体本身高度在200米左右。



2.中段—弱水段:指弱水由鼎新向北流至狼心山尚未分流处的一段沿河道路,有东、西沿河两路。此部途程计约 110 公里。

(1)弱水东路:自狼心山接行,沿弱水东岸西南走,7.5 公里至河东老树窝。这里的古老梧桐密集成林,故得老树窝之名,蒙古人称其为乌勒都布格或宗布格。过河东老树窝以后,沿河草木渐为减少,牧民人家亦渐趋于无。继而南行,20 公里可至塞湾(色日川吉),塞湾有一烽火台,周围生有一些红柳、梧桐;又 7.5 公里至白墩子(查汉川吉),白墩子亦是一烽火台,周围除有一点白刺外,别无草木,一派荒凉戈壁景象;又 30 公里至地湾。地湾即汉代的金关,是肩水都尉府的所在地,今又称作哈日苏海。地湾有一较大一点的烽火台,烽火台周围有围墙,如今大院尚为完整,墙高 3 米~4 米,边长 20 米,这里没有水井,食依河水。又 15 公里至马莲井子(查黑勒德格音呼都格),30 里至双城。双城又名马莲湾,蒙名叫浩斯浩特或查黑勒德格音陶海。双城是东西仅 100 米之隔的两个城池,城墙边长 400 米~500 米,高 10 米以上。民国时期这里住有四五十户农民,尚可成一村落,农民给额旗政府纳税。双城以南为农区,人烟渐稠,行 30 里后即达鼎新县城。鼎新在民国时期独为一县,先称毛目县,后改称鼎新县,现并属金塔县。鼎新在达酒驼路上是一个重要站点,是一个许多支路交分交汇的地方。由鼎新不但可以北回达酒路起点,西南尽达酒路终点,还可以向东指向古日乃湖区,向东南深入到河西走廊中部高台、张掖等更远的地方。

(2)弱水西路:若以青山头为始,接北来之路沿弱水西岸南行,17.5 公里可至河西老树窝。河西老树窝同河东老树窝隔河相对,蒙名为巴朗布格、海套可道布格或布格音阿日拉。和河东老树窝一样,这儿老树成窝,一片丛绿。由河西老树窝南行,10 公里至查汉套海,10 公里至沙夹道(蒙名为木格图寸井或哈拉毛台),这里路侧有沙。又 35 公里至大湾城。大湾城为一小土城,又名沙河墩,蒙名为川吉太。由大湾西南行 20 公里至沙门子(额勒逊哈拉格)进入农区。又 15 公里至天苍,15 公里至营盘。营盘与河东鼎新,隔河相距仅 2.5 公里,涉浅过河即可使上述沿河两路相通。

3.上段(南段)—酒鼎段:指由营盘、鼎新离却弱水继续以西南为方向行进而达于终点酒泉的一段道路。此部路途缀连鼎新、金塔、酒泉三县(亦是三片农区),计程 117.5 公里。因为营盘和鼎新仅是隔河相距,可视为一体,又因为鼎新为一县城府,又为道路分合点,所以这里可取其大要以鼎新为分段点而名段。由营盘西南行,35 公里至头墩(一烽火台)。这一途程原来尚有弱水西源北大河(又称临水河或白河。源自祁连山,北经酒泉、临水、金塔等地,至营盘入注弱水)河水可依,自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因酒、金农区扩地筑坝及人工截流,致使北大河尾水减少甚至断流,由此,不但弱水水量因之减小(弱水本身亦有走廊农垦原因而大为减水问题),亦使得这金塔北部与营盘之间形成一段旱道。在这一段旱道上,弱水已却,北大河尚又不能得及,沿途全为风蚀残丘、戈壁沙砾,又一无人家,只是偶然间有一两个放骆驼的人出现,行人于此最感困难。这是达酒驼路上唯一一段较长的无水区域,途中植被只有星稀骆驼刺、芦苇等。由头墩以后,便进入北大河鸳鸯池水库梳水网农区,即金塔县农区。这里沿途站点甚多,一般经二墩,小河口,32.5 公里后即至金塔县城。由金塔继续西南行,翻一小山,15 公里至鸳鸯池。建国前鸳鸯池附近住有几十户人家,1946 年时,在其北部修起一座水库,以便储水流供金塔地区农田,1958 年,这座水库又大为扩建。由鸳鸯池仍西南行,途经肖家村庄等地,35 公里即达终点酒泉。

达酒驼路,自北而南,若由达来库布取道东河路西南直达酒泉,计程在 352.5 公里左右,此为最近路途;若由达来库布折取西河路,经道劳卧铺或建国营南行,西南达于酒泉,计程在 372.5 公里左右,此则为较远路途。由旗府达来库布至酒泉,平时大车长行 18 日可达,若骑行一般 7~8 日可达。蒙人单骑快驼快马,日行 100 公里至 150 公里,迅及 4 日即达(其中农区要慢些)。一旦遇有国家特急文件,选快驼,口内塞以食盐,以绳紧缚其口颌,再选一强壮之人,上驼加鞭,数日不停地急奔,到达目的地时,驼即倒地而死。骆驼如此任重负远及忠贞职责的精神堪为世人惊叹和誉爱。额济纳沿河道路的情况较为复杂,行人对于道路的选择,或某一道路的繁荣与重要与否,



往往不一直都是以路途的远近情形而定，通常主要取决于这个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点的变化。古远者尚不为提，仅民国以来，旗府已是多经变动口老东庙、哈拉哈庙、赛日川吉、查干哈夏、阿布德仁桃来等地，都先后作过旗府，1943年旗府移至达来库布，并建房十间，立蒙古包三顶，又筑了围墙和土牢，这以后才稳定了好几年。1951年旗府又搬向老西庙，1954年又搬至建国营，1956年后又备往青山头，中途未果。又于1959年改回达来库布，至今才算长定下来。这每一次政治中心的变动总要给居民和道路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带来相应的一些变化。加之，建国营、乌兰川吉、青山头、策克（在达酒路的北伸线上）等地是国防军事的重点所在，道劳卧铺、策克是重要的商点，老西庙是重要的邮政中转站所，乌兰川吉设有税卡收取过往商人的物税。这样就使得这几条沿河道路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为世人所选用，而且形成它们各自繁衰情形的变化不定。一般说来，达来库布人，南去河西购粮买物、走亲访友，多直走东河西路和东河东路；往来商人（多为山西、河北、张掖、酒泉、民勤一带的汉商和少数青海、外蒙古一带的商人），则大多先行集结于道劳卧铺（北部则在策克），然后分道扬镳，或东去包绥，或西走新疆，或北入蒙古，若向南去，则自然多走西河西路。道劳卧铺是达酒驼路和绥新中路（绥远—包头—新疆）上的一个重要商点，往往有几十个商人，在此搭帐包为室，从事买卖。这些在额地的商人同额济纳旗牧民的交易多以物物交易和信用交易为主要交易方式（物物交易即以物换物，信用交易即先赊商品于牧民，牧民在畜产品收获后，再付物顶赊，这样做可使商人扩大销售，廉价得取畜产品。蒙人和商人的交易，普通多以砖茶，茶以块计，一般为三九型计，羊以成羊为交易单位，大宗则以骆驼、马、牛为单位，零星则以羊皮、驼毛、羊毛为单位，以张、斤计之。另外蒙古人多收银元，其他有生金、碎银、元宝等，尤喜黄金，纸币除行使内地外，一般不收）。民国时期，驻军多在建国营和乌兰川吉、青山头一带，故而运送粮食军械的车驼多行西河西路。达酒驼路中，西河西路是一条重要的军粮大道。建国营设有国民党军队的339分站，是一个军粮站，专门负责收存和供用从



金塔运来的粮食。当时主要使用牛车拉粮,也配合使用骆驼。运粮车驼自金塔出始,沿经营盘、天苍、大湾、芨芨台子、那林、河西老树窝、青山头、哈日敖包、老西庙、乌兰川吉,终达建国营。其中为使运粮车行方便,个别路段站点亦可不同于上述驼道,但基本线路和主要站点还是一致的。达来库布的用粮是从建国营通过驼运转达的。当时的额济纳旗政府一方面对驻地部队不得不全力支持,另一方面亦需借依军粮供给,每月由旗政府抽派6名牧工、40峰骆驼组成驼运队来往于酒泉、建国营之间,为部队运粮,其中部队不承担运费和人工费(这支部队在1938年时是国民党胡宗南部甘肃酒泉驻军十八旅的一个团,1943年时,该团调防,接防部队为第七师第十九团第三营),运粮牛车组成车队,常用20辆至30辆一起,成一大串,牛车及车夫一般均来自金塔,均属摊派,由金塔地区保甲长组织派送,驼运和车运多可同时进行,骆驼夏季不能使用,牛车长年不断。一辆牛车计拉粮、草、料等500多公斤。拉粮牛车多木制双轮大车,轮高5尺,以便渡越河流沙地、重车渡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河床为软沙地质,河水深浅大小又常此变动,渡河具体地点、时间一般都需临时掌握,并先有人踏探河水深浅及河床软硬平否。渡河前要让牛饱饮休息,要在车队中选出一些壮牛,2头至3头拉一辆车,每车再辅以4~8人,然后才可在选择好的地点一鼓而过。如果中途一有迟碍,则会车、牛具陷,水太大时人畜还要缠危。因此,渡河一般以日间为易。役牛畏热,平时行走多取夜行。部队拉粮,一个车队往往都有几个军人负责押运。运送的粮食一般都为小麦,小麦一般都在额济纳旗加工,由部队临时雇用农村民夫进行。建国营驻军有许多从黑城遗址中拉来的古磨以供加工粮食时使用。每加工50公斤小麦,部队收白面35公斤,其余黑面、麸皮给民工顶付报酬。部队运粮,除利用上述民力外,还有自备的骆驼大队,长驻金塔,以便北运。部队所运粮食,除自己官兵家属食用外,还供额济纳旗地方政府行政员工、国立小学师生以及达来库布防守司令部的官兵购食;另外,驻在额济纳旗的其他军政人员,如国民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在老西庙所设军事专员办事处人员,国民党酒泉党部驻额济纳旗区党部人员、



新绥公路办事处人员等,这些军政人员及其家属的用粮,亦需从这些军粮中购取。凡此消费,总计下来亦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由此可见,这西河西的运粮大道对额济纳旗军政事业有着何等大的重要意义。额济纳旗地区的牧民用粮,不从这军运粮中得取,一般利用皮毛自行到鼎新、金塔、酒泉、张掖等农区民家换取,其中多以小米为主。西河西路的军粮拉运,自部队进入后的1938年至1949年期间存在。

达酒驼路至鼎新后有一条重要的东南向偏插线,即鼎张插线。上面已经提到由鼎新可以入插河西走廊中部的高台、张掖等地,其大体情况是:由鼎新继续沿黑河(一般指弱水中上游)弯转东南,32.5公里至双树子(双树子为一小村,民国时有四、五十户人家);30公里至天城;15公里至罗城;25公里至九坝;20公里至于高台;由高台继续沿黑河东南行;25公里至平川;20公里至板桥(为一村镇,民国时有八九十户人家);22.5公里至靖安;又20公里即达张掖。凡此在进入走廊以后的长行之中,必要时,行人可向沿路农家购换草料喂偿骆驼。达酒驼路自达来库布始起,若取经西河路和鼎张沿河插线而达于张掖,行程计为460公里,是达酒驼路的最长程途。达酒驼路的这一向线,不弃河益,且通繁华,历为世人通便多行,因而亦最显重要。

达酒驼路至双城以后,若走高台飞临泽、张掖等地,还可择行一条捷径,即弃却南向的弱水,东南插向戈壁,沿巴丹吉林大沙漠西部拐角,20公里经苇坑泉;32.5公里经石城子;40公里经芦泉;又5公里至老君庙;由芦泉或老君庙西南行45公里左右即达高台。又由老君庙南行40公里可到老临泽蓼泉,由蓼泉继而南行20公里即至临泽县城(沙河镇)。由临泽县城东南行35公里便达于张掖。另外,若由老君庙中经板桥,85公里后亦可捷至张掖。这一由双城经苇坑泉、芦泉而南达于张掖等地的捷径,全踏平坦戈壁,于路各站点均可得水,商人择行,不但可以路近32.5公里~42.5公里,还可以避却沿河路许多税卡的盘剥。

以上由双城或由鼎新至高台、张掖的路,均为达酒路南入走廊的偏东插线,其中鼎张沿水线和在其北的达鼎沿永线,即弱水沿河全线,历为南北

主行道,它连同双城捷路一齐,因为是由额济纳旗到达高台、张掖等地的道路,所以又被另行称作额高驼路或额甘(张掖旧称为甘州)驼路。

酒泉、高台、张掖是达酒驼路入达河西走廊西、中部的几个重要终点,也是河西走廊北入居延要地的几个重要起点。它们的置建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达酒驼路的产生、发展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作用。酒泉,古称肃州;张掖,古称甘州。可见以后的甘肃建制,是以张掖、酒泉为重心,兼带武威、敦煌为两挑而又南借兰州为领的。酒泉,历被重誉为河西走廊西大门,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是“河西保障之咽喉”,是“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路安全的军事前进基地”,它连同嘉峪关一起,菲声古今中外。酒泉,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名。据说当年霍去病带兵打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酒少人多,他就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这大概便是那“味如酒”的因来。酒泉不仅是历代兵家胜地,且为丝路要邑。保留至今的酒泉鼓楼四向门额上题刻的“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的气势磅礴之句,充分说明酒泉一地历来的军事、政治、商贸、交通的情况和重要地位。酒泉在古代时期,既是国际贸易的过境点和重要的交通路口,又是民族贸易兴旺发达的城市,这里的交易时间,保持着以太阳为标准的古老习俗,“黎明交易,日暮咸休,市之鬻贩,不拘时日,市法平价,众庶群集。古酒泉和张掖、山丹等河西的大黄是很有名的,能贩售世界,为重要的地方外销商品。大黄是医灌骆驼的重要药物,自然北自居延、外蒙古,西自西域、西亚等驼乡之地、驼道之上的骆驼少不了来此驮运这种商品。古酒泉的市场亦是繁荣的,据《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记叙说:“肃州城市极大。城墙为四方形,有坚固炮台,市场无幕盖,宽五十爱尔。扫除清洁,时时洒水,尘垢不起……各街市均有华丽之建筑物,顶上有木制尖塔及炮眼,用中国漆漆之”。张掖,是古代丝路重镇,位于河西中心,呼应东、西,是走廊中部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的意思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腋)”,汉时郡治在觥得城(汉张掖郡建郡前的古城城名,又作觥得城)。有人根据出土遗物论证,认为现在张掖西北的黑水国故城,“必汉代张掖故城



无疑”。居延汉简中累累出现觥得城的名字,汉代居延军民,打了鱼常运到角乐得来卖。古代张掖又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今西安)和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至居延和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是两条大道的中心枢纽。张掖还是我国早期各民族交会的中心,大月氏、匈奴、乌孙等民族都在这里生活过。凡此都可充分说明居延与张掖地区在族系、商贸、交通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张掖地区河水、泉水、山谷水很多,尤其黑河汪洋澎湃,分注数十条古渠,灌溉数州县万顷良田,滋润辽阔牧场,养育无数人家。据一些古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周围平畴延绵,阡陌交错,触目是泉流映带、沼泽弯弯,又芦苇丛生、水草交横、莲荷香溢、池塘鱼游,展现一片江南秀色。张掖又是盛产稻米之地,并酿产各种米酒,如黄酒、诸色酒、芦酒等。张掖以沃饶富厚而闻名,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银武威”虽名噪天下,但经济上较之张掖还大欠一畴。张掖历来盛况如此,可知由张掖而北的达酒驼路将有怎样的一种商品货运和民族通谊情形。不仅如此,张掖还是一个为诸多名人所喜爱而恋情驻足的地方:名闻世界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居延以前曾在这里留居一年多;笃信佛教的西夏太后常到这里居住,欣赏这“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苇溪连片,古刹到处”的风光美景;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不但住在这里,还在这里生下了大元帝国的开国之君忽必烈,后来忽必烈又把母后的灵柩寄放这里,并使礼祭不衰;元明宗亦曾到过这里,并在这里收养了一个后来成为元惠宗的孩子(即宋德佑帝赵曩之子)为己子。这都是很能说明张掖这一胜、圣之地和北方少数民族间的一种特殊的亲联关系的。延至民国时期,张掖又有专为蒙人设立的蒙古商店,专售蒙民各类用物,其中的哈达,尤为蒙人所重爱,那些认为“无哈达不成礼”而由此北返的蒙人,只有在这里才能购得哈达。居延、张掖两地人民毗邻相依、一衣带水、互通互益的情义是深长久远的。临泽、高台在张掖西北不远,都在黑河边上,和张掖同一地境,自有大体一样的风光物产,对达酒驼路上的商业民情的影响当是更为近捷。早在西晋隆安三年(397年),北凉王朝初建时,曾在高台西部筑骆驼城(废址今犹存),这又证明,河西一带通过沙漠之舟骆驼和达酒驼

路同沙漠之地的居延,有着何等频繁重要的各方面的联系。总而言之,居延地区深处沙漠腹地,东于包绥、西于新疆都相距甚远,而且大荒无比、绝少水草,唯有南沿弱水绿廊,可以近至繁盛的河西诸地,因此达酒驼路的开辟与发展,居延、河西两地的紧密联系,实为必然的情形。

(二)达酒驿路

达酒驿路,基本沿合达酒驼路。达酒驿路,就其路线来说,是达酒驼路中的一支,就其作用来说,是达酒驼路供作驿用的一种。驼路,为多在沙漠、戈壁地区,多行骆驼,也行牛、马、木轮车的一种道路的总称,是荒漠地区用于畜力运行较显旧式的一种道路的泛指。“驿”,是古称,释义为“古时供应递送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暂住、换马的处所”(《辞海》第1142页)。可见驿路是对为政府传送公文的人和官吏公使时所走的定行道路的一种特指称谓。古时出行,多以马代力,所息站点,需有水供食,因此造字从“马”从“泽”,这亦真是妙出其事已甚。古代,又有“邮亭”、“邮驿”的说辞,颜师古在《汉书·京房传》《汉书·薛宣传》中注曰:“邮,行书者也。若今传送文书矣”,“邮,行书之舍。行书之舍,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释名》上说:“亭,停也人所停集也一,《风俗道》上又说:“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馆也”。周之驿为“置”,秦之驿为“亭”。古代文件传送,有步递马递之别,秦简《田律》上说:“近县令轻足行其书”。“步递曰邮”,“马递曰置”,汉代改邮为置,“驿马三十里一置”,居延汉简上经常出现“置”的名称,“置”就是驿。由此可见,“驿”、“邮”、“邮驿”、“邮亭”、“置”以及近代以后“邮政”、“邮电”的提法,相沿一体,都是指传递文书、讯息及与之相关情事。就其发展来说,古代的邮置(此为“设置”之“置”)偏重军政传讯业兼为接待过往使者,而近代以来的邮置则借助电讯和现代交通工具,使军、政、民用渐有分专,且主要承司民政方面的邮件及通讯。

达酒驿路,始自尚早,可以说在汉代居延军事防卫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即已开始形成。早年王国维根据敦煌所出的邮书简,曾得出“汉时邮递之制,即寓于亭燧中”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大量的居延汉简中亦足得证明,这



亦说明居延地区列置燧亭对于邮亭、驿路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条件性的作用。只是居延边塞上的邮驿、驿路的置设,还不能只考虑军事方面的需要,还要考虑邮传的速度,邮驿的安全以及是否利于交通等因素。因此,其与军事防御塞是时分时合的,一些邮路还需另设。这样就使得并非所有的燧亭均是邮亭,邮亭只是燧亭中的一部分。另外,邮亭之间还要保持相当的距离,不能与防御塞中的五里、十里一烽燧一样,一般要远得多,相问好几十里。汉代的邮程,在《汉律》中有明确规定。《周礼·地官·司徒》注云:“皆以道里日时课,如今邮行有程矣”。汉简以“时分”记邮程,陈梦家曾根据汉简资料结合文献考订出西汉行一昼夜十八时分制,至东汉可能已行与十二时辰相结合的十二时分制,而每时至少八分,或为十分。据居延汉简所记,邮书每时行程不尽相同,是因邮书性质、邮路地形及邮书投递方法之异而异。每段程时都有规定,如“临木卒戎付诚磬北燧卒则界中八十里书定行九时,留迟一时解何”(此为对邮亭传递文书不及时提出责问的“举书”,其“定行”是邮书所行的实际时间)、“当曲卒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里定行八时三分,实行七时二分(此为邮书而非举书,其“定行”则是规定应行的时间)。由其多数情形看来,一般规定日行八时,每时十里或十多里。其间若有迟延,则要“解何”,即“责问其为何留迟”。在居延汉简中还言及“南书”(为由居延边塞向南而传的文书)、“北书”(为由居延边塞自南而北的文书)、“驿马”、“传马”,“以邮行”、“以次行”、“以亭行”,以及提到邮亭中多设有“驿”与“厩”的问题。显然,这一切都指示着汉代居延邮驿的路向、方式、站置等基本情形。元时的邮驿制度更为健全,这在居延地区亦有反映。在1978年河西沙漠考察组发现的黑城元代遗物文书2中,提到了从黑城至河西走廊北山口的五个驿站名称,即“即的”、“狼心”、“普竹”、“盐池”、“马口”。此五站恰好符合《经世大典》所提到的“亦集乃路所管七站”,“山口至本路(黑城)五站”之数,另外“城至川口(居延泽口)二站”不详。由于达酒一线“往来经涉沙漠……人稀路回,所过艰险,比之岭北,(此处之“岭”当指秦岭),荒恶尤甚”(《永乐大典》1942)。所以元季朝廷对这里驿站的经济待遇才比其他

地区放得宽些。元代亦集乃路是河西走廊与漠北蒙古地区交往的唯一通道,又是元初诸王叛乱影响所及之地,所以驿站交通相当繁忙。上述文书 19 说:“如今铺马倒断,使客频并,好生生受”。《永乐大典》卷 19418 上亦记载道:“甘肃行省所辖亦集乃路总管府、沙州、肃州三路遣使频繁”。凡此一切,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居延地区的邮驿之事、邮驿之路同居延边务、达酒驼路一起,是古已有之。达酒驿路,源远流长。

清朝末期,达酒路上的驿传仍能大体保持其基本完整的程序,由额济纳旗王府主持进行。旗府自北而南计设有 12 个驿站,全程 352.5 公里。驿路北起乌兰苏海站,南至金塔寺站。乌兰苏海在老东庙附近,为当时塔王府所在地。那时候,这里设有信报站(相当于邮驿总局),建站估计在 1873 年以前。由乌兰苏海送邮南上,可沿东河南行,30 公里至达来库布站;然后折西行 40 公里河夹地至道劳卧铺过河;又折沿西河西侧南行 25 公里,计 65 公里长程达乌兰川吉站;又 15 公里老西庙站;25 公里旭伦站;37.5 公里狼心山站(巴音珠尔克);17.5 公里查汉套海站;55 公里阿德格查干站;22.5 公里天苍站;35 公里牛房子站(夹墩湾,乌和日音都贵);20 公里兔来河站(大庄子);30 公里至金塔寺终点站(参见附表二)。清末金塔尚未设县,以后至民国 2 年(1913 年)时方置称为县。以上驿路途中,自狼心山以北,当时沿河一带水草既丰美,人家又较多,驿行者很能得宜;狼心山以南至牛房子,130 多公里中当时却是草木缺少,人烟亦无,多有戈壁沙丘,景象甚为荒萧,自牛房子而南渐入农区,人家亦渐为增多。从金塔取运的文件,由酒泉驿站接转。从以上线站情况看来,达酒驿行基本沿自西河路南上,和民间驼路的线站大多复合,基本为一,因此可统其大体以达酒驿道为名而称述之。驿路作为一种专用路线自然有其不同于驼路的一些特点。就一般情形而言,驿路线路固定,站点固定,邮驿人员固定,班期固定,驿行必须要求到站,这是由驿传的特别需要而规定的;而驼路则是行人各杂,行线任人选择,行人行歇自由、无时无规,各方面的固定性都是很差的,这又是驼路上的自然和必然状况。

清末达酒驿站,每一站点都定在有人家有水草可以落脚的地方,每一



站点都设有一个站丁常住待发,站丁在送信后即返回住站。站丁属应差应役性质,一无待遇可言,站丁一律由青年、中年、老年之男性充任,一律从百姓家户抽派,每三月一轮换。站丁来往所送之件主要系官方文件,亦稍带民信,但不带物什。涉及王爷重大事项的信件,常由王爷派人专送,或派人到金塔等地专取。达酒路驿传一度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干扰过程中中断,中断时间长达10年(1865年~1874年)。在此战乱期间,个别驿站亦受有烧杀之损。1874年战事平息以后,达酒路上的驿传始又恢复。

达酒驿道,置身于荒漠之地尤其在漫长的古代,在交通工具很为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它能南北通插,信使雁传,大宜军、政、民事,确亦难能可重。它不但能以它长悠悠慢悠悠的形态和简单朴实的传讯方式服务于塞内外军、政、民,使各种讯息上传下达、南来北往,从而为靖国家民,一方得治添助一臂,而且能使北地的人们通过它,得一线窗户,既开边塞之蒙顿、入新风之清鲜、察国貌商情之一呼一吸,又济于生活及精神的或一所需,由此居延始能不成为塞外孤悬之音。因此,达酒驿道,其作用不可谓不大,其功绩亦是不能没于史记的。

民国初期,达酒驿路上的驿传,仍沿袭清制。自民国24年(1935年)以后,达酒驿路上的驿传,则随应时代的进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再是以前那种站点接传和由额济纳旗王府主持抽派人丁进行的局面,而是改为由甘肃邮政管理局统属,具体由酒泉邮政局管理,由额济纳旗邮政代办所负责传邮的一种专业化系统化并逐渐侧重于民政的新式工作。当时国民党交通部在老西庙设二里子河电报局,除兼办邮政代办所及小额邮汇业务以保证通汇和继续通邮外,电报局设有15瓦特收发报机一架,向酒泉、兰州每日联络业办理官、商电报。这样,也就相应产生邮线、邮站、邮传的管理方式和讯传的进行方式的根本不同。自此以后,新名词代替了旧名词,“驿路”被改称为“邮路”,“驿传”被改称为“邮递”,虽然仍不失为邮、驿一体,但新概念下的邮政、邮递,毕竟在内容和意义上都大不相同,它所展示的是推向近代的一种发展,那种含有古朴色彩和意义的驿传的历史自此首先从人们的

观念上和进行的组织形式上是宣告结束了。

邮局主持通邮以后,达酒路上,开始时的长段邮程是从鼎新北向到瓦音套来(又称巴彦套来),衔接绥新公路,以便传接绥新路上的邮件。此程525里。全段由酒泉邮政局派一专人往返其间。其余金塔北至鼎新的一段由金塔邮政局派人专送,酒泉北至金塔的一段由酒泉邮政局派人专送。开始往返于鼎新至瓦音套来的一名邮差叫朱天喜,其邮行站点并不固定,半月往返一次,一月二次。民国27年(1938年),瓦音套来邮政代办所迁至老西庙,邮件亦改送封老西庙,送件长程便缩减至345里左右,这时规定邮差每两星期往返一次。民国28年(1939年)以后,邮差增至两人,从鼎新到老西庙两人对送,邮差一星期可往返一次。民国32年(1943年)时,又增加一段邮程,即由老西庙北经乌兰川吉(有驻军)、建国营(有驻军)后送件到达来库布旗政府和防守司令部这两大机关,这一段加程为160里,邮班为五日一次。民国34年(1945年)以后,邮差增至3人,改由鼎新直到达来库布,3人轮流,全程长约505里,邮班为六日一次。民国36年(1947年)以后,邮差增至4人,为五日一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0年左右一段时期,由于土匪扰乱厉害,达酒路邮行一度停止,其间有一邮差阎庭有不幸被哈萨克土匪枪杀。还有国民党散匪和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匪徒,1953年3月,各类匪患平息,邮路复通。民国时期的邮递,大体仍顺沿清末驿路进行,即顺沿西河路而南,但就其定站情形看来,又有两条不甚完全相同的具体路线存在。一条基本沿合西河西路转西河东路,再接弱水东路而行,因其多数取道河东沿(西河东沿、弱水东沿),故此可以省称为东邮路;另一条基本沿合西河西路接弱水西路而行,因其大多取道河西沿(西河西沿、弱水西沿),故此又可省称为西邮路。为总见全程线路,在这两路前面各加一段东至达来库布旗府的部段,以便陈述时不失全貌。这样,东邮路站程可为:自达来库布为北始站点,折西20公里至安都宝勒格;又20公里至建国营;由建国营正转南向沿西河西岸行,25公里乌兰川吉;15公里老西庙;又20公里中过河转西河东,至于雅布日呼都格;沿西河



东岸 25 公里至新西庙；又 20 公里中过东河至狼心山；再顺弱水东沿一直南行，7.5 公里至河东老树窝；20 公里塞湾；又 20 公里三棱沙窝（即芨芨湾，又称德勒僧套来）；15 公里地湾；又 15 公里马莲井子；又 15 公里双城子；又 15 公里鼎新。东邮路 15 站，计程 252.5 公里。西邮路站程则为：自达来库布为始，同样经过安都宝勒格、建国营、乌兰川吉至老西庙，自老西庙以后，不过河，继续顺沿西河西岸南行，15 公里哈日敖包；37.5 公里青山头；17.5 公里河西老树窝；15 公里纳林；29.5 公里芨芨台子；17.5 公里大湾；25 公里天苍；又 20 公里中过河至鼎新。西邮路 13 站，计程亦 252.5 公里（此二路站程可参见附表二）。东、西这两条邮路在一定时日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形变通为用的。如在春季冰薄水大时，人畜不便过河，为减少过河次数，可选行西路，使长行陆路；而在水小的其他时日，可应需选行东路，虽多过河亦无甚妨碍。另外，在特殊情况下，如在有时特大降雪特大洪发，水太大冰太薄雪太厚，得渡而不能，陆走也不成，双路皆不能行的时候，亦有断邮多日甚至一二个月的情形存在。

民国时期的送邮事项额济纳旗王府不予管视，一从邮政局所，王府重大事宜，仍由其另派专人专程进行。这一时期，达酒驿路上的邮递人员，一般 1 人用驴两头或用驼 1 峰，冬季多用骆驼，夏季多用驴子。驴、驼多由邮员自备，邮局只是配给草料费。邮差薪俸各地不相统一，一般由邮局局长因地视宜，根据邮员工作表现及从邮时间长短等情形决定。额济纳旗邮员薪俸由酒泉邮局发放，一般 5 年以下工龄者发 23.50 元，5 年以上工龄者发 27.50 元，10 年以上者发 32.50 元，15 年以上者发 40.50 元。由此可见，其工资待遇是很低的。邮递人员，取得微薄薪俸，不但要熬出年头，还要取悦局长大人。在这人烟或少或绝的荒漠地区，邮递人员所遭的艰难困苦亦是十分特殊的，这一点实为其他地区邮递人员所未曾经及和未曾想及的。在几十里、几百里的即去即来、周而复始的长途长期行进中，只有驴、驼为伴（甚或有时还得只身徒步），其单调孤寂尚不待言，而那一路上的风餐露宿，或则霜雪交冻，或则日暑烤蒸，或则沙打途迷，或则狼盯盗窥等等，又是何

其易受也！山路上，他们常常是解困则和衣而卧，清热则苟柴荫顶衣衫以息，饥渴时则不恶沙坵干粮，甚于粪污鼠泡之水亦饮；夜间为避狼害，他们系铃于驴脖以图惊梦，或是点火为炬以求却敌，真是惶惶然不可终日。凡此一切，堪成“身系重大，又苦危哀虑至极”！1949年~1956年，达酒路上的邮递虽然线站同前业且仍是依凭畜力为使，但人民政府能够特别体恤邮递人员的疾苦，尽依当时条件，增加驴、驼畜数，使邮员骑拉自如，其他生活待遇亦大有改进，邮递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由此大为提高，从而能够想方设法保证通邮不误。如模范邮递员王大桢自创索（即绳索）渡法，使邮件即使在河水大涨时亦能顺利通达。达酒路邮递自1958年7月1日以后，由军用汽车代为传送，依酒泉邮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所订合同进行工作。自此而后，军民团结合作的汽车传邮完全代替了古沿的人畜长劳的驿传，达酒路上的邮驿历史亦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达酒公路

达酒公路的勘建是民国后期时的事情。1924年外蒙古独立以后，居延地区又复为国防前哨重地。两国交隔，无论双方关系是亲善或反目，又无论是从国防意义、经济意义及国际影响上的或一方面去着眼，往往都是自然而然地要重视到一些要塞地区的边防道路的建设，这样，至少可以在一旦边疆有事的时候，军队及辎用可调遣便捷。民国后期（此指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时期），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腾出手来亦重视到居延地区的疆防。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患于北方苏蒙社会主义势力的南渐，驻军荒芜的额济纳及马鬃山等地，亦必须要修筑一些公路以使北通边疆，另一方面，当时正值中、蒙、苏联合抗日阶段，若达酒公路一成，再北通外蒙古首府乌兰巴托，“即可与西伯利亚铁路支线衔接，此路与现行之甘新公路相较，非但铁路陆运里程缩减甚钜，即公路运途至少亦能减短千余公里，一旦打通则运输量即可加大，所需时间及物质尤为经济，对于抗战前途关系之大自不待言，抑且所经各地向因交通阻隔，言文互异，事业文化均形落后，疆防政治鞭长莫及，故于推进政治，发展经济俱有裨益”（《肃州至居延海之乌兰爱里根公路



踏勘报告书》、1938年《甘新公路工程处工程进行状况月报表》)。达酒公路的筹建,亦即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便被几次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首先于此有所举动的是民国27年(1938年)甘肃省公路局奉上级旨谕踏勘肃州(酒泉)至居延海一段公路。这次踏勘往返11天,南北往返途程计达1800里。勘察队于8月17日由肃州出发,8月23日抵乌兰爱里根,8月27日返回肃州。全线自甘新公路之肃州起经八个积、西驹、天苍、查汉套海、西庙、乌兰川吉、建国营(道劳卧铺)、哈拉哈庙而至乌兰爱里根终点,已接近中蒙边界。在勘察队向上级递交的踏勘报告书上,明确提到“该路交通工具以大车(按:当地大车木轮直径约一人高,行驶沙漠间不易下陷)、牛、骆驼为主”,可见这次勘行是完全沿依上述达酒驼路西线进行的。在此之前,这条线路上的松软难行之处已由当地驻军略为修理,道路勉可通行汽车,故使这次踏勘,能够得乘汽车之便。这次踏勘,不但对沿途道路的现状,地形、植被以及路线的比较选择、工程的数量和概算等等一系列主要问题予以了详细的考察、核计和记述,而且注意到沿途的气候条件以及当地居民的人口、文化、生活、生产情形,还依据客观情况对今后的施工问题(如工人来源和食宿准备、材料工具准备)以及国际交涉(与苏联商榷,以便双方都能着眼整体,同时改进公路,以为抗日大计)等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就大体情形而言,这次踏勘将全路分为四个部段,即肃州至西驹岔道段,继至查汉套海段,至哈拉哈庙段,至乌兰爱里根段,全程449公里(依照惯例,公路部分改以“公里”为单位叙述);计划路基、路面、涵管等工程费用款额计为2463900元(当时法币,下同。1938年币兑不详,若以1937年和1941年4月至7月的平均约数为1个银元相当2.25元法币计之,可合现今人民币5475333元)。这次踏勘之后,虽未能够即继付诸实行,但还是为日后这条公路的正式开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民国33年(1944年),鉴于边境之虑和酒鼎大车道桥涵太为陋简不堪为用等紧迫情况,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再提达酒公路,并决定正式修筑这条公路,当时责成西北公路工务局予以办理。可这一年又适值工务局归并于

西北运输局，各级人事多有变动，以致未能及时实施，又延至民国 34 年（1945 年）8 月始筹设工程处，一面着手测量，一面继之施工。这个时候同时勘建的除酒建（酒泉至建国营）公路外，还有两条公路，一为桥滚线（桥湾至马鬃山北部的滚坡泉，滚坡泉又作公婆泉），另一为马明线（兰新公路上的马莲井至明水）。酒建公路当时定接绥新公路之架杠敖包（即扎干敖包，东北距建国营仅 15 公里），因此这条公路当时又被称作酒架公路。这三条公路皆因起自甘新公路河西区段，又都向北支伸边境入接绥新公路，故一般又被合称为河西三支线。三支线工程奉准工款共 96044 万元（以 1946 年 5 月时币可合现今人民币 3742946 元），其中酒架支线 48495 万元（同上，合今 1889906 元），桥滚支线 32219 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 1255612 元），马明支线 15330 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 597428 元）；民国 35 年（1946 年）5 月批准三线预算 90000 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 3507404 元），至施工时按实际情形重新分配，酒架线 64000 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 2494154 元），桥滚线 15000 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 584567 元），马明线 11000 万元（同上，合今人民币 428683 元）。由此可见，酒架线在当时不但是未来的达酒公路的基本段落和工程主体，而且亦是整个河西三支线的重点线路和工程主体。酒架线由国民党河西警备总部主持交国民党交通部公路总局西北公路工务局酒架支线工程处主办。酒架支线工程处设置主任 1 人，副工程司 1 人，帮工程司 1 人，工务员 1 人，办事员 4 人，雇员 2 人，服务员 2 人，会计员 1 人；处下设三个工务总段，每总段下设两个分段，一个桥工队，分别施工。各段队的人员编制是：工务总段兼分段者，各设副工程司 1 人，帮工程司 1 人，工务员 2 人，练习生 1 人，雇员 1 人，监工 1 人；工务分段，设帮工程司 1 人，工务员 1 人，办事员 1 人，监工 4 人；桥工队设副工程司 1 人，帮工程司 1 人，工务员 1 人，监工 3 人；另设勘测队一个，于勘测完竣后撤销，员工调各段队工作。酒架线勘测队于民国 34 年（1945 年）8 月 12 日出发，经酒泉、金塔、营盘、沙门子、查汉套海、青山头，至建国营西南之架杠敖包。这一线路北与绥新公路交接，全长 331 公里。这次勘测历时 1 月整，于 9 月



13日完成。参加测量队的员工均由酒泉工务所抽调,因当时酒架工程处尚未成立,技术人员极感缺乏,虽向各方邀集,但一时不能到达,为争取时间,酒泉工务所先勉强组队出发。

三支线同时开工需要大量人力,因工程期限紧迫,故采用征工制,以民工为主,兵工辅之,桥涵等工程,则用发包办法(即招人承包方式)。当地无大包商,皆系资本空虚,信誉不著的小包商,购办材料自属困难,大量预借工款,难免发生意外,只有将材料及工资分别发包。筑路民工,来自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等五县,按依工程之需要及各县人口多寡拟定应征数目;兵工则有当时的新四师及一九一师各一部分。兵工、民工的抽派以及拟定工资等各项事宜,统一由河西总部主持,区局则偏重技术工作。原则上虽然是这样的,但实际实行,职责却难以划分清楚,还得有赖于双方的合作。自民国34年(1945年)9月开工以后,各支线的工程进展都较为顺利。每县民工常达500人以上,工效较高。可惜为时不久,冰冻期届,工效迅即大减。以后又因民工寒冷,设备不足,给养饮水难能接济等实际困难的加重,各县纷纷要求暂时停工,俟解冻之后,一气完成。三支线在开工后的前几个月里,各县民工胼胝手足,风餐露宿,又自携粮食,远道而来,已是很够辛苦的了,因此到这个时候,苦寒已是不能忍心再予相加,筑路工程只得稍息严冬。最后,整个工程虽然较于预定期限迟误了数月,但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这亦诚属不易了。民工管理,各县派有专人负责,以厅、乡、保为单位,分别编队,县长亦多亲自督工。三支线施工期间,民工酌给津贴,其津贴额以吃饱饭为原则。民工工资在国民34年(1945年)时,每工每日400元(1945年币兑不详,若以1946年春末1银元相当法币1000元约数计之,则可合今人民币2元。时币逐后而涨,故实数当略高于此),兵工减半。“翌年物价高涨,重新调整,1月至5月,每工500元(同上,合今人民币1.95元),6月至8月,又调整为600元(合今人民币2.17元),每次调整工价,均经河西总部核定,不使民工亏累,即使如此,证诸实际,那时物价飞涨,工款支出,民工所得津贴,仅能糊口而已”。至于当时所采取的征工筑路方式,历来工效

很低,河西总部根据当时实际,为提高工效和节省人力,特规定一种新的工效标准及奖惩办法,实行结果颇见成效,平均每工土方升至二立方,铺路沙亦在二立方以上,这数量虽较包工稍逊,但比以前工效还是大为提高。

比较而言,三支线中,酒建一线路线最长,沿途地形亦显得较为复杂。该线零点起自甘新公路 738 公里处,经酒泉县北门,“沿北大河前进,跨临水河,越佳山至金塔,北上至二截,沿大红山麓至营盘,沿溺黑河(即额济纳河)北上至金塔县属之沙门子,再入宁夏省额济纳旗(即二里子河)境,仍沿黑河左岸北上迄建国营,全长 331 公里”。在这一线路中,有一部段地质情形很是不好,于筑路大为不易,于是就出现于施工中的临时变动问题:“后奉前河西总部总司令陶谕以臭水墩至查汉套海段地质多软沙,行车困难,应予放弃另觅新线,遵于 35 年(1946 年)二月间另踏新线(即大红山以内现在行车之线),计由 90 公里进山,220 公里查汉套海出山,于 35 年 4 月开工,十月通车,惟此长达 130 公里。改线地段虽地质情形较硬,然草木不生,水草绝无,行旅之苦更甚于旧线也”(甘肃公路局《酒建公路视察报告》民国 37 年 11 月 1 日)。这样,酒建公路就出现了新旧两线的称谓及两路不同的使用情况。总观大体,就地理环境的不同而言,新线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由酒泉至金塔属之二截(即 86 公里处,距臭水墩已近,仅差 4 公里),此为农田区段;由二截往北至 220 公里之查汉套海,为不毛之戈壁区,荒无人烟;由 220 公里沿西河北至建国营,为半水草区,这一部段沿线水草丰富,树木丛生,又有许多游牧蒙民居点。新线的三个部段,前后两部段基本与原酒建驼路重合。于是对于酒建公路而言之旧线,实际上就是指臭水墩至 220 公里查汉套海间 130 公里长的那个中部的近河路段。而中部的那个完全新修的离河部段,因地属荒僻,“行旅之苦更甚于旧线”,故而有关部门曾于 134 公里处试而凿井,但因地质坚硬未得成功。以后,鉴于往来汽车必须自带吃水、帐幕、烧柴等困难情况,有关单位为“沙漠旅行者计,已由 134 公里处往南至金塔所属之天苍、保兴建一 15 公里支线,俾往来行旅可宿食于天苍,得以减少旅途之苦”(甘肃公路局《酒建公路视察报告》民国 37 年 11 月 1 日)。在酒建公



路的后一部段里,虽是依河而走,一般无缺水之虑,又有一些居民点可资行途方便,但多数地段还是空旷无人,多数牧民还是逐水草而居,汽车驶至彼处,或遇门闭人空,或是亦没有什么条件可供众多行人就炊歇息,因此这于旅客食宿等较大困难仍无大补,一旦夏季额济纳河干涸,有时还得到河底挖井取水。总之,长行这一道路的人们,一般还得自备自决食、饮、宿、用等。

酒建线完成之后,和其他二支线一起交由交通部第七区公路局组织养护。酒建线设有金塔公路总段,下设金塔、天苍、建国营三个工务段,设养路道班9个,计有工人144人,平均每公里有道工0.4人,另有特工6人,测工3人,司机助手各2人,当时工务段房及道班房尚未筑建。酒建公路,亦同另两条支线一样,以丙等公路(相当现今三级公路)标准建成,其最大纵坡度为5%(即每100米升降5米),最小圆曲线半径为30米,路基宽度为7.5米,桥涵载重为10吨。酒建公路,其整个工程,虽然由于工期延长,以及在1946年以后,物价一涨再涨,民工津贴不得不增加等原因,影响了部分既定计划,甚至无法控制预算,以致桥涵工程未能如数完成,但其他方面,都能依要求取得较好完成。据《甘肃省公路交通史公路篇(初稿)》载言:“酒架支线,完成土方470000立方,路面206公里,水管41道,涵洞14道,小桥8座共30米,大桥1座长40米”。酒建公路,南起酒泉,北至建国营,全程331公里,中间行经田渠、山地、沙地、软硬戈壁等地形,涉过北大河、溺黑河两道水系,数数间经农牧两区,自南而北,屡屡行于离水又近水之中,完成整个工程,十分艰苦。况且,大多路段地处,荒僻无人之区,施工人员大多远道而来,不但这许多民、兵、官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的饮、食、宿及其他给养运送相当困难,工作人员还要遭经风沙袭阻、寒暑交恶等等无法抗拒的苦难的磨折。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酒建公路能够在1年多的时间里完竣工程,并于1947年6月11日正式通车,毕竟很是难能的事情。而且,这一罕有的荒漠公路的建成能够在当时和以后的年代里显示出极大的疆防、政治、经济、文化意义,这本身就是这次酒建公路筑建的最大成功,因此笔者在此要特意地写下这些劳动者之区分,他们是酒泉、金塔、鼎新一带的民工(主成220

公里以南部段),是国民党某部新四师工建第七兵团兵工(主成220公里以北部段),承建的单位是酒架支线工程处,指令的单位是国民党河西警备总部和交通部公路总局西北公路管理局。

酒建公路在建成通车以后,为了试图改进,民国37年(1948年)时,又历行过一次勘察设计。1948年10月8日,甘肃公路局奉河西警备总司令李指示:“一、整修现有公路;二、复勘二截至查汉套海原有旧线;三、另踏勘辅助线以备酒建公路三塘梧桐两河于结冰、解冰洪水时期不能通车时用”。照此指示,甘肃公路局立即组织人员于10月14日乘汽车前往勘察。勘察人员17日抵建国营,19日返抵查汉套海。因下面为指令中之预修线段,为得详察细视,勘察人员先是改乘牛车沿旧线行,23日至天苍,又改乘骆驼经臭水墩、张家湾、嘉峪关,30日返肃,前后计时17天。这次踏勘后,写出了报告。报告中除对酒建公路的沿革及现状情形予以陈述外,还对新旧线的整修及筑建辅助线等相关问题提出了计划与建议。其中对于梧桐、三塘两河之大桥未曾修建的弊憾及加修辅助线的得失问题作了至理分析:他们认为梧桐、三塘两处大河每年夏秋水小时只能行车河底,而在冬春结冰和水涨时期却根本不能通车,建国营桥前不久已被洪水冲毁,这些主要桥梁未予修建或不作正式修建已对正常交通形成极大障碍,因此他们建议这几处地方应考虑建造正式桥梁;他们又认为,臭水墩至查汉套海间之旧线,虽系沿河前进,但有水地点亦仅近河岸几处,且多流沙及软戈壁,工程浩大,于建筑、保养均有很大困难;他们还认为,由酒泉经嘉峪关、张家湾等地至臭水墩之辅助线计长140公里,较原有路线长近1倍,而且路线最为暴露,不宜防守,又路经碱地,流沙甚多,修建工程亦大,从而建议不如修造梧桐、三塘坝两桥经济使用且能兼利沿途。总之,这次踏勘对酒建公路的改造和完善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此时已是事交多变之秋,实施已自成不能。

酒建公路修成以后,在1947年至1958年期间,主要用作汽车拉粮、运货、邮代、通旅(属用卡车客货同带性质)等。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10多年里,民用类的汽车多又改行由金塔北经梧桐沟,至石板井以后东行,再



达于建国营的这一简易草原公路。达酒公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辟新线,这一新线完全弃去弱水故道,改由鸡心山东南侧北向,行经萤石矿等地,又偏东折,长行弱水西部的西戈壁滩上,最后向东插至建国营和达来库布。这些都是后事后话,此处暂不多涉。

(四)关于达酒路水运问题

达酒路顺依弱水南至高台、张掖等地,在历来的使用过程中是否配合过水运,这亦是我们应该在这里顺便言及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方面,史据是很少的,当然这主要与弱水潜陷沙漠宽浅缓弱不能常为承浮舟筏有关,但亦与荒漠北地人口稀少,人们不习或不便利用水运有关。尽管在古代时期河西已有相当成就的农业发展,已垦耕地也为数不少,但相比于现代的河西,其垦地的面积是要小得多,筑坝修渠的能力和实施的规模亦是要小得多,沿途耗截的水量自然也就少得多,因此古代时期的弱水水量一定要比现代时期大的多,由此可以想见,在短程之中,特别是在河水水势迅涨的季节,应该说弱水亦是能够进行简易小型式的水运的。目前,这种可能性在现有的史实中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汉书·霍去病传》中说:“骠骑将军涉钩着,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杨武乎觶得”。书中张晏和颜师古对此的注释是:“浅曰涉,深曰济”,“涉为人马涉度也。济谓以舟船”。依此看来,这可能是一次对弱水水运的一种简单方式的利用。这种利用,既不是什么“造船”而渡,更不是什么“逆水乘舟而南”,亦仅能是一种简成之木排或皮筏的一时借力(因居延一地有木可伐和有畜产皮)。另外,有人分析说,居延黑城遗址中大量的长大松木,不是本地出产,又绝非是用牛车和骆驼远过沙漠从或南或北的什么地方拉运而至的,估计是借用水力从祁连山一地运来。这一说法当然不能完全排除陆运之可能,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来,水运的可能性还是要大一些的。黑城遗物中又有很大的渔网,这不仅说明着当时居延的海大“盛产鱼盐”,亦相应说明着当时弱水水量的可观。可巧借助弱水水力运木的事实竟也在现代时期出现过。1939年,国民党额济纳旗驻军在赛汉桃来修建庞大的军事设施,名曰“建国营”,前后毁用额济

纳旗上等胡杨木 11 万余株，其为运输方便和将额济纳旗旗民控制于西河一带，遂堵塞东河河床，以求加大西河水量，致使西河水深没牛，东河却干涸了 5 年，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东河始将完全开挖复通，水量复原。在这一事件中，大量的青山头一带的高大乔木胡杨能被借用人工增大的水力成运的这一事实，至少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水量较大时（在古代的许多时季里，其自然水量会是能够及此程度的），弱水还是能够承运大木的。这一点似乎又可成为上一事例的一种佐证。迟至 1944 年时，董正钧尚可根据实地考察在其《居延海》一书中对居延时政提出自己的建议，说居延弱水变化有季节性，水量大小及水量大小的时期是可以预知的，这种相对的稳定性正好可以安排利用。每年在 4、7、8 三个全月和 6、9 月的部分时间里都可以通行羊皮筏，13 只羊皮囊的筏子可载 250 多公斤，卸货后，皮筏即可放气驮回。弱水一路，自南而北，500 多公里地区地高降比甚小，每 1 公里仅有 1 米之差，况且河床宽阔，水流缓慢，水深高则可近至 5 尺，普通亦有 1.5 尺~3 尺，而羊皮筏水深 2 尺即可承运，水大时，还可以小筏数连变成大筏使用，并可日行 30 公里~50 公里。从鼎新到建国营 5~7 日即达，速度快牛车一倍以上，不但可以省却许多人力、畜力、草料及被褥灶具等费用，而且一人一筏，安全易驶，上下水咸宜，实为多快好省的行途方式。若在冬时，可以改用冰车，马曳人拖效果亦佳。董正钧的这一建议不但间接地说明达酒弱水路水运历史存在的条件性和可能性，亦直接为后来人指明要因地制宜灵活从事使达酒路另有所辟这样一个新的方向。

二、达上路

达，指达来库布；上，指上井子（蒙古语称作额肯呼都格）。上井子，为阿拉善右旗旗府所在地。阿拉善右旗地区在 1961 年以前一直隶属于阿拉善旗。上井子一带，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和龙首山北麓之间，地面东西狭长，有巴彦高勒大戈壁横坦于此。这一带地区，在民国时期虽然人口不多，户不过一百，人不过五百，但于交通方面却也能四通八达。由它不但可以南北沟通居延和河西走廊，而且东西有路沟通谷水（石羊河）和弱水两条沙漠河



区,还可以东北经雅布赖山南北麓长通包绥、定远营等地,是一个车、驼、马可以骑行的区域。达上路如本篇开头所示,是就其路向大势而命名的,是自达来库布南经上井子地区而达于河西走廊中、东部的道路的代表性称谓,因此对它的理解亦是不可拘泥于名的。

综观大体,达上路南北成向,沿途地形间杂多样,但着其大要,立脚居延,亦能从方向和主要地形类型上将全线分为三个部段,即北部段、中部段、南部段。下面同样需要首先将其部段情况简要地陈述一番。

1.北段:这一部段以沼泽地形为主,间有沙漠、戈壁等。段限为北起达来库布,南至古日乃湖泽南部之乌力吉图。行人南至,可先经行一段沿河草场及沙漠、戈壁地区,从黑城遗址东部走过,32.5公里至陶来乌苏,继而间经一些戈壁、沙漠、沼泽(为盐碱地)地带;40公里至哈日敖包,再过一段戈壁、沙漠区域;32.5公里至宝格希勒格日音呼都格(麻雀井),其后行经一段戈壁后即进入古日乃湖区(实为沼泽),计25公里可至乌套亥(此处有庙);再于乌套亥南行25公里,即至乌力吉图(今古日乃苏木驻地)。

2.中段,这一部段全然是大沙漠区域。段限为乌日吉图南至西林乌苏(即新井,蒙名努日盖)。由乌日吉图稍偏东南行,出湖区后即进入巴丹吉林大沙漠主体部位,艰难长行57.5公里左右可至格日乌苏图。这一途程为无水沙漠地带,一路需驮水取力。自格日乌苏图仍继大沙漠南行,42.5公里至浩尧尔呼都格(又名两个井);再继大沙漠南行,30公里至西林乌苏。西林乌苏是达上路南部的一个重要分路点,民国时期这里有阿拉善旗税卡,收取过往商民物税,主要为哈绥路(哈密至绥远)商人物税,亦有达上路物税。

3.南段:这一部段以大戈壁为主,也有山地等。段限为由西林乌苏南至河西诸地。自西林乌苏以后,沙漠渐出,戈壁渐入,道路亦分向三去。一为直南走山丹,二为西南走张掖、临泽、高台,三为东南走金川(金昌)、上井子等地。行人若直南走山丹,则需穿过巴彦高勒无水戈壁,驮水长行55公里至特布希。特布希西侧有特布希山(南近桃花拉山,它们和其南的其他山地均属河西走廊北部的龙首山脉),山上有许多松树,民国时期曾有一张掖蒙古

人陈寿英在此管理树林。自特布希以后,22.5公里至红寺湖,再向东拐过嘎海达瓦山口转南;20公里即达河西走廊中部重镇山丹。由西林乌苏偏转西南走向张掖等地,可行经高家窖、转咀(南距阿拉腾朝克4公里)、东山寺口子等地,105公里左右即达张掖。其间转咀东部有小路可通桃花拉山顶之喇嘛庙,这一山高近3000米,牧民上山拜佛,骆驼是不能应乘的。这一路向中的东山寺口子,为龙首山著名山口,旧时常有土匪出没。转咀、东山寺口子又均为阿拉善旗税卡。由西林乌苏东南走向金川,可中经东山庙,165公里即至;又由西林乌苏东南走向上井子,则可先经行一段戈壁、小山,南行东折30公里可至红沙沟,由红沙沟继而东南行32.5公里至马山井,由此南折5公里即至上井子。至上井子以后,又可西南至山丹,东南至金川、河西堡、民勤、武威等地。其中上井子至民勤一线,历因多有民勤人到上井子附近的唐家沟拉煤,早已形成为大路。

达上路(站程参见附表三),算至上井子,全程为352.5公里;算至河西山丹,全程为382.5公里,较于弱水路到山丹缩短137.5公里。全线自北而南,路经沼泽碱地、干大沙漠、戈壁荒山,沿途水草、人家甚缺,尤其是100多公里干大沙漠,未经投足,人已成畏,因此自其有史以来,终以驼驴为具,未能形成大道。

山丹是达上路直南的终点,它连同附近的张掖、金昌(金川)、武威等河西重地一起,对达上路,尤其是对达上路南部上井子一带历有重要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只能是在它能够影响的时候才能影响之,即在上井子一带多有人户和达上路亦渐形成的时候,目前这个最早时候尚不能确知(已知上井子清末时即有人家)。但是,即使达上路和上井子居民区形成较晚,而山丹及其周围的河西城地通过弱水路及雅布赖路这两条古道,亦能影响到居延北地和阿拉善旗中、北部地区,因此整个河西和其北的整个漠地将会是一种长期的直接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于是这种交杂在一起的情况又是我们在此应该并为涉及的。在古代时期,山丹是河西中部的商城要邑,曾为丝绸古道上的一个国际城市,著名于古今中外。山丹,古称作删丹,古山丹在河



西走廊甘(张掖)凉(武威)之间的焉支山东北,“焉支山,林木茂多,禽兽繁盛……为甘凉咽喉”(清《甘州府志》),据说“删丹”之名,就是以晨辉透过焉支山高大的树木,其形似栅,其辉似丹,丹碧相间而得名。早在唐代,山丹即有十六条街市,商业繁盛,历有不少突厥、印度、波斯及中亚地区的商人游客常年居住或经商,当时山丹的热闹竟能使外国人误认为是“中国王城”,由此亦可足见其繁华程度。古山丹位居祁连要塞扁都口北,不但是居延南通西宁中段的要径,又是古代河西畜牧业中心。山丹,是一块宝地,在它东部的焉支山上还特产胭脂(因此古籍中又称此山为胭脂山),当年匈奴被逐,唱“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其在匈奴人心目中的地位。北魏、隋、西夏、元等朝代,山丹马营滩曾为皇家马营,隋时曾蓄马10多万匹,许多异邦他乡的骏马良骥都在这里蓄养。马匹对于古代的征战,对于各地行旅的官民,尤其对于常此走动的山漠之地的西北各族人民,是有着绝对重要的意义的。旧时候人们敬马如敬神灵,在山丹、张掖等城都设有马王庙,以供人们寄托这种情思。山丹盛产的锦纹大黄,纹路清晰,气味芳香,亦当更为西来北去的商人所注目。西夏李元昊时期,山丹北筑(即今山丹),更近于上井子及居延地区,当是更便于南北相通益谊。山丹东部的武威,无论其旧址、新城的那一个地点,又无论其军事、政治、经济的那一个方面,较之河西其他城邑,地位则更为显赫。古代的武威,是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和丝路要隘,是河西的军政要地和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武威连同其西部的金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酒泉、嘉峪关等河西要镇,犹如一串闪光珠宝,排列于居延、上井子南部的河西走廊,使整个河西走廊,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和贸易中心。河西中外贸易曾历久而不衰,汉代有“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之盛,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已,独河西较安定,外商纷纷改在河西贸易。河西的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海路开辟后的明朝,而且在明朝以后,也仍不失为西北陆路要带和商贸基地。河西之地,在整个历史时期,尤其在漫长的古代时期,能以它重要的军事基地的地位和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不但作用和影响着中原内地以致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更重要的是一直最

大程度地作用和影响着巴丹吉林、腾格里等广大漠地，其对北方漠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道路方面，即驼马、驿用之道的形成和发展方面，一直起着相当大的启带作用。达酒驼路、达上驼路以及上面提到的夹处于巴丹吉林、腾格里这两大沙漠之间的雅布赖驼路，无一不是因据这种作用而产生和发展的。至于到了民国以后，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酒泉、张掖、山丹、武威、临泽、高台等河西诸镇经济文化的发展更盛于前古，对居延、上井子等北方漠地的带也更有增无减，保卫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更为国家根本大计。在国家这样不绝的号召和实行中，现在不但酒建、桥滚、马明几条旧有公路大得改善延伸，金石（金塔至石板井）草原公路已得形成，而且连达酒公路亦成三并公路了（即西河路、东河路、西戈壁路）。这许多条公路均南自河西北出，并伸而走，北接居延边境原绥新公路和边境要点，这样即能使大漠之地的公路初成网局，又能使居延、马鬃山等地有所缀附，不再孤悬塞外，这又是新时期里，河西之地对北方漠地作用的新型显示。任何地方的发展，首先是和最近邻的发达地区的联系的发展，任何道路的产生，都原之于某一种或某几种联系的需要；认识这种联系，开辟和发展这种联系，认识这种需要，适应和解决这种需要，这便是任何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启机。达来库布、古日乃、上井子等地，地方最近河西，尽管绵沙亘亘，艰难于行，但是近居的人们亦得依据衣食住行的需要，沟通往来，要踏拓出相宜的道路，国家的上层和地方亦得依据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或一需要，利用、开辟和发展这种道路，这便使得如达上路这样的僻路也有它产生、存在和必然发展的条件和过程。

三、古日乃木炭道是联系达酒路和达上路的纽带

民国时期，在上述达酒驼路和达上驼路之间有一条多以贩运木炭为用的颇具盛况的大道，因木炭产地在古日乃湖区，因此可以简称这条道路为古日乃木炭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作马古驼道，“马”，即是下面提到的马莲井子。“古”则为古日乃湖泽。

古日乃为一大片沼泽碱地，面积为6万平方公里，它和它北部的木吉



湖、进素图、海子(古居延泽)、拐子湖等较小湖地断续相连,构成弱水下游东部的一大片湖区草场。从地理上分析,这些湖泽洼地均为弱水散注所致,亦或即为弱水之先储或先渠。古日乃湖区,水碱咸,湖中与湖滨密生芦苇,湖滨间生红柳、胡杨,湖周沙窝中梭梭茂生成林,梭梭林面积竟达 1000 平方公里,为额济纳旗活梭梭主要生长区。梭梭,又名梭梭柴、盐木、札干等,为灌木或小乔木,多在半荒漠区和荒漠区沙漠中地下水较多的沙丘间的低地生长。梭梭高可及丈,有主干而多曲,尤多枝条,叶为鳞片形,嫩枝叶下垂,色绿,骤视如马尾松,嫩枝隔年即变为黄褐色成为老枝,积年则成干。干基直径最大可达 2 尺,树令达 50 年左右,甚有百年者。梭梭抗碱性特强,成单纯林,没有其他树木可以和它同生,因其寄身沙地生长,又高大沉重,所以固着力很差,每易卧倒。中药肉苁蓉即生发于梭梭根部,为其主要寄生物。梭梭不但是沙漠之舟骆驼的最佳食料,也可广为使用。其形虽是屈曲盘结,但纹顺枝条,密合股行,坚硬至甚,虽柴而近木。拣其干死之粗大适宜之枝干,可置棚搭屋。梭梭的大小枝条又是牧区上好的燃料,其火力强硬而耐久,木质可尽烬成灰,一无渣存,灰色为灰白,灰相皱裂成纹,亦成视趣。梭梭起燃,有一股人所乐闻可品的异样的气味(即强烈的硫磺味,故多烧可兼出硫磺);亦有烟生,其烟青渺缓散,久久闭受,亦能伤人。梭梭,经人烧制,可成木炭;木炭,轻而易运,再燃仍有久功。枯干的梭梭,不能烧制木炭,唯尚湿的梭梭方能成致。不能将梭梭过烧,过烧则成灰,需至透烧湿尽而来败性的时候,压沙熄火而成。梭梭事先经采捡并类后,所成之木炭则为短棒形,呈灰黑色。木炭重量为湿梭梭的四分之一。

古日乃南部一些地区,炭窑林立(炭窑利用崖坡形成),汉人夏季多作木炭烧制,冬季则为运输盛季。在古日乃地区烧制、运输木炭,不是当地蒙人,多为从鼎新飞金塔等地南来的农民。河西人烧运木炭,不是供作家户取暖,而是作为商品出售。木炭可以卖给司机烧车,卖给工厂炼钢炼铁,卖给铁匠和旅店起炉生火,这对当时交通运输业及其他工业(包括手工业)、民用事业都较为发达的河西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用物。因此,到古日乃地区烧

运木炭便成为一些河西人的谋生之道,每年都有不少人不弃艰难长途涉身北漠荒野烧制木炭,往来运售。木炭运输,或以牛车,或以骆驼进行。古日乃木炭道可以认为是一条达酒路中的东插线,它可以有好几个起点,但一般都集起于鼎新、双城以北的马莲井子。以马莲井子为始东行,中经小湾40公里可至达格九。达格九为一地区名,一无水井,二无人户,自此前后,均为戈壁光滩。由达格九继续东行,35公里至扎格图陶勒盖(魏家杆,有井);15公里至查干沙拉音呼都格(板滩井),至此便入梭梭区边沿;又12.5公里至扎哈那木格,至此便入临古日乃湖边,这里有数眼水井,水草亦渐好;由扎哈那木格稍偏东北行,40公里至乌力吉图,由此便插接到达上驼路。由乌力吉图北行25公里,即达古日乃庙(即乌套亥庙,旧为古日乃苏木所在地)。这一路途中,扎哈那木格周围广大的梭梭林区便是采木烧炭的主要生产活动区域。古日乃木炭道连接达酒、达上两条驼道,东西成线,全长142.5公里。在这木炭道的前一段程,在50多公里之遥的荒沙戈壁地带,无水无草,牛车骆驼长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路人一般都需带水驮冰而行,若遇不测,便会被冻死、渴死,据说在大寒之冬,就曾冻死过一些运炭之人。

烧制木炭,一般都分点进行。烧炭者需经额济纳旗旗府和鼎新等地方政府批准,需报告人数、炭数,并划地点进行。额济纳旗政府在道路的两头都设卡收税,得款为地方收入。西部卡点设在板滩井,主行木炭税务;东部卡点设在乌套亥,主控东道商人物税。采木烧制木炭和运输木炭都是分别人户进行,需事先包定,分专烧专运两工。木炭运输,一般装筐进行。筐为芨制索络软筐(即将芨芨草锤柔后编成的绳网状草筐),每筐75公斤,1驼可驮150公斤,牛车拉运,每车近千斤。民国时期,从古日乃地区每年驮出的木炭约2.5万公斤至3万公斤,以每50公斤湿梭梭烧制木炭12.5公斤计之,1年消耗梭梭高达10万公斤至12万公斤。由此可见,积年而后,其对草原植被将会形成多么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伐薪烧炭的破坏程度还远远不及以后的直接伐薪卖薪。据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查证,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金塔地区有5人1次卖给玉门农机修造厂等单位梭梭竟达267吨(数



在过去烧炭全年耗额的一倍以上),每斤售价 0.16 元计之,可合款数万元。1978 年冬春时,仅鼎新四个公社或卖或换,给白银冶金公司和酒泉钢厂梭梭 500 多万公斤,业通过汽车转火车这一现代化的运输方式进行,致使板滩井一带梭梭林一扫而光。在这大砍伐大扫荡的时期,甚至有人可以直接用拖拉机套住梭梭开拉,使其连根拔起。这样的情形,应该说是道路发展史中的一种利中之弊。

古日乃地区又富产食盐和土碱,在其盐碱泽地掘之,常可得到成块盐碱,无需加工,即能为用。古日乃土碱又称为冰碱,有良好的晶体。额济纳旗及河西一些地区的居民所需的盐碱,大都取之于古日乃湖地,因此古日乃木炭道又得以兼而运碱运盐。

额济纳旗除古日乃等地产土碱外,还在生长胡桐(即上面提到的梧桐、胡杨)的许多地方出产树碱。胡桐因为能生长于碱滩中,抗碱性强,树中所含碱分亦颇多,树干裂口处常分泌一种碱液结晶,保护伤口。这种碱色白成块,为最优良性石碱。另外,从树基部凿洞燃烧中空之老树,使干中的碱液溶流于基部,结晶成块,这种碱仅次于裂口碱,而又远胜于土中掘得者,轮至尺半高达丈余的树木可烧得树碱 1 斤,一些汉人常用这种方法取碱,尤以建国营驻军耗碱量大,毁树取碱亦最为厉害。20 世纪 40 年代时,建国营附近被烧树木很多,致使这一带地区枯木林立,绿荫顿失。人们贪图这么一点蝇头小利,而不惜毁却这百年之成,不惜毁却宝贵的沙漠植被和道路绿化大业,一点亦不顾及子孙后代和人类存亡后事,这是甚为使人哀愤的。

以上叙述的是居延南路的基本构成和一些具体内容。综观大体,居延南路的大小两道和河西走廊成一等腰三角形座形。达来库布是其顶角,酒泉和山丹分别是其左右二底角,达酒路为左腰线,达上路为右腰线,古日乃木炭道为二腰之连线,而河西走廊西、中部这一条带为其底线,排列在底线上的几个河西要镇则是酒泉、高台、张掖、山丹等。酒泉历为走廊西大门,又向西紧靠嘉峪之古关、名关;由山丹而东,不远则为走廊东部门户武威。由此可见,居延南路伸两肢即可散括整个河西长廊,这可是一种绝妙的联系。

河西为居延的基底(来自河西的弱水又是居延的生命线),无河西居延南北不能得充长伸;居延又为河西的北部大门,无居延河西不能确保安泰。难怪历史上谁得居延谁能得享大利。汉朝收筑居延,始安河西和西域,使丝路和长安都城无虞;党项民族占依了居延,遂成侵河西、入朔方、立西夏之功名,垂史 200 年;元初蒙古深知居延重要,沿此居延绿带陈兵南下,迴略中原大地,更是造建了盖世奇功;民国虽然溃散无力,但亦尽力数顾居延;连那日本远外之人,亦十分望重居延,派高干,修筑房库机场,长运枪械弹药,阴谋以居延为居点,进而建立包括蒙、新、甘、青、宁等省在内的“蒙古共和国”。凡此一切,很清楚地说明居延之于河西,河西之于居延,南来北往,国事、民事时时攸关,两地之间因弱水为纽带,因农牧工商交补交益,因蒙汉往来长为携手而相亲相谊,二者气运久共,已成不可分割之军事联防、政治属理、经济捷通、文化亦宜带宜受的实体。

居延南路中,达酒路自古而今,溶驼路、驿路、公路为一脉,合军政之用、邮驿之用、民商之用为一体,不但是居延南路的主道,而且也是整个河西走廊北通的主道。在这一条道路上,在汽车运输尚未大量进行的那个历史长河(可延及 1958 年以前),骆驼一直是运行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其次还有牛车、马车、驴骡等。在近代绥新中路(即绥远、包头、居延、新疆一线)尚未开辟的那个历史长河(即 1924 年外蒙古独立以前),整个额济纳旗乃至附近其他荒远地带,牧民所需用的粮食饲料、丝绸布帛、日杂百货等大多赖由这一道路从河西贩取,而额济纳旗及其附近北地所自产的驼、羊、牛等皮毛及其他土特产品,亦多赖由这一道路南去走廊地区销售或交换。外蒙古独立以后,包绥等东来的商人不能再过外蒙古而走绥新北路,在这新形势下,近代绥新中路渐得开辟。因为包绥是东通京津等人烟密集工业发达地区的主要商埠,畜产品的销路行情远比农牧兼有工业较之落后些的河西地区为好,所以这时候额济纳旗等北地的皮毛便大多不再南去河西而改转包绥,并且更为新鲜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百货也随之多由包绥路东来。在这一短期里,达酒路上,虽然减少了部分畜产品和百货的运量,但随着西北地



区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这条路上的运输事业仍是不失前盛地延续着，尤其是北去的军、民粮运，南去的木炭、梭柴、碱盐和部分皮毛等物的运输，仍是频繁进行着，一路上，骆驼、牛车、驴马等仍是来来往往，长年不绝。驼运一般冬春进行，每天总有 200 峰至 300 峰骆驼走过，运行有链队式的，有结伴式的，也有单行的。每年参加运输的骆驼约计 2000 峰。夏秋季节，这条道上多行驴子、牛车。驴驮常常日过 100 头至 200 头，也有 20 头至 30 头驮结伴而行的。驮户、车户多是结伴或结伴行走，一则为取互相帮助之力，另外也是为了防止沿途发生意外。1949 年至 1950 年时，就发生过驮户被哈萨克匪徒抢劫的事情。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几年里，绥新路断阻，商人亦多收摊内返，居延地区的皮毛百货等又大多转南于达酒路上往返。1940 年左右，每年向南的各类畜皮总有数千张，畜毛数万公斤。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牧民南去驮粮一般每年都数在 10 万公斤至 15 万公斤，主要为小米、面粉、青稞（作炒米用）等。额济纳旗也从张掖地区驮入一些大米，只为少数王公贵族食用。由河西北入的货物运量，若再加上驻地部队的人口食粮、牲畜草料等，这会是过百万公斤的大数。达酒路上，驮运木炭、梭柴、盐碱者大多是南区的农民，北地蒙人南去时多为空驮少数亦驮柴炭，来时均为重驮。蒙民一般多在冬日出行，夏时除必买必卖及其他必行之事外一般不出远门。1958 年以后，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在汽车运输能够得及的情况下，首先体恤到牧民长途运粮的苦情，并通过汽车运输逐步解决了牧民粮食的供应，从而完全结束了居延地区缺粮和畜力运粮的苦难历史。那时候，先是由汽车把粮食拉运到建国营之南的乌兰川吉，然后再分运到各牧民集中点（公社、大队），以后各公社又成立粮站，牧民便可以就近到公社（或大队）购粮。自此居延地区的骆驼渐次被改为骑乘之用和进行内部运输，如驮梭柴及杂物，以供个人、集体或政府各机关使用。然而，在那些大沙漠、软戈壁的腹地，车不能入。即使是时至现在，驼运也只能是唯一主要的运输方式。

达酒路除作以上军用、商用、民用（购买、交换物品和走亲访友）等诸多使用外，还有一种使用情况，即它又是一条额济纳旗等北地蒙民南上青海

塔尔寺或西藏拉萨拜佛时多走的道路。元代以后,佛教在我国西藏的地方形式——喇嘛教有了很大发展,由西藏前往漠北、岭北行省的捷径莫过于这一条居延弱水古道,据史籍记载,从居延到元帝国的政治中心和林,也是大道(即前面提到的匈奴龙城古道),这样一来,这条自古以来以军事为主的路线便成为元朝西部地区政治和经济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藏区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也通过这达酒驼路进入居延和岭北(即岭北行省),以致以后在弱水中下游地带大批塔寺建筑形成。延至近代,每年都还有不少居延人、外蒙古人前往青海甚至拉萨朝佛,并请藏族喇嘛前来布道。1947年时,居延藏族喇嘛虽已大为减少,但也有28人。由此看来,在这达酒路上,信民去藏区拜佛和藏区佛僧往漠地讲佛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顺延。蒙民拜佛心诚意笃,不但不顾及自身的体力和安危,还不惜中断自己孩子的学业,让其备受寒暑艰险前往张掖大佛寺或西宁西南之塔尔寺等地拜佛。拜佛前蒙民们要精心准备好金银财宝、糖茶酥油、皮毛哈达等物,每年陆续前去,几家联合行动,一般20峰至30峰骆驼组成一队前行,大队骆驼亦有100多的。一些富有的拜佛者除在拜佛地布施众僧外,还特请全寺僧众进餐,一次竟不惜花去几百甚或几千两白银。蒙民拜佛返途时带回各种香支、彩带、药品、圣水等,还有无比的荣耀。如此往返,虽沙漠戈壁,跋山涉水,苦行数千里之程,蒙民亦在所不辞,不但都乐而愿为,并视其为终生最大幸慰,以为洪福将至。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集体化的形成和商品公管统销的实现,尤其是在以后包兰铁路和兰新铁路先后通车(分别为1958年和1962年)以后,东南盛地的新艳时兴商品可捷至河西等地,游商完全断绝,绥新路运亦自是完全废弛,居延地区的皮毛、商品便大多改为汽车运输并全转达酒路往返。至此,达酒路对于居延,河西两地的系带作用,河西对于居延之地的全面主轴,居延对于河西的全面依系,已成绝对而又合理、必然的实事了。

居延南路中,达上路虽然只是沙漠中的一条驼行小道,但它毕竟是别一途,历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由居延而南,若驼行小运,凭依



这一路线,可以直达河西中、东各部。能成苦中快捷之功,因此当宜之时,也是大有人行的。非但驼行者图求便捷,20世纪60年代以后,甚而多次有人乘用小汽车由古日乃向南,穿越200多里高大沙漠区,亦竟幸得安达于上井子地区的奇成。达上路,就其大体而言,可以视为一条小小的商道。合作化以前(即1955年以前),这条路上常有汉商往返,大多为东来的山西商人和南来的民勤等地的商人,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达上路自北可接包绥中路,可引山西客商惠顾;自南可通河西中、东部和石羊河流域,石羊河下游之民勤县城又近于达上路南部,这自然可使民勤等河西客商入路求市。另外,河西山丹、张掖及民勤等地的粮食及其他农杂产品可通过达上路北至上井子等地,而北部牧区的部分皮毛等畜产品以及其他土特产品也必通过达上路南到河西。这就是达上路便宜一方,之于商用、民用不可或轻的一种作用。

与上述诸路均有联系的古日乃地区,地势较低(海拔1000米左右),面积较大,自有较丰富的水草和物产(木炭、盐碱、梭柴等),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区。由它向北,沿越湖泽(木吉湖等)和小沙漠、软戈壁,较易于北至达来库布河区府地,这也是达上路的北段。由古日乃湖南沿向南,为达上路中段,中段却遭受巴丹吉林大沙漠难阻。这部段沙壅岭起,路途遥远而又难行,似乎能使所有车辆不能问津。达上路被大沙漠中阻,这就导致开辟达上路为大道似为永远不能。这就是达上路近图河西中、东部必然性中的一个很大局限性,也似乎显示着达上路发展的一种暗淡前途。而在达上路南段,新井、上井子一带地区为龙首山北部坦地,沿山数百里,沙小坡缓,山间豁口又多,过山即可达于河西中部各地。这部段中虽然亦有地阻,但都易于逾越,因此这达上路南部地区与河西正常的联系势属必然。由古日乃地区向西,即走古日乃木炭道,可以插接达酒路南去。由于驮运木炭、柴碱等原因,便使这古日乃一线又和达酒一线相系相并,二者关系至要。并入而南,虽然亦是古日乃地区南入走廊之道,但也只限于接入走廊西部,于走廊中、东部却又迂绕甚远。而且,古日乃以西,木炭道上,也有长旱戈壁的艰难困苦。因



此,达来库布及古日乃之人,若非驮运炭、碱、柴、盐等重驮者,而南上河西中、东各部,在细算两较之后,却常常是不能舍却这达上畏途。

在作这样分析以后,我们便很容易明白,走廊北部的三个主要牧区,即弱水下游河区、古日乃湖区、上井子坡滩地区,将怎样和达来库布旗府,酒、金、鼎地区,河西中、东部广带,因凭地理关系或人、事需要而形成某种必然联系,又在这种必然联系中会形成什么样的道路,同时也使我们获得一种科学的思想指导,使我们懂得应该怎样去努力改善和更进一步发展不同区间的这种联系,并在逐步进行的地貌改造中进行新的道路建设和使现一些新适的道路。假如我们想到了当今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人类急剧增强的力量,想到必然会出现改造地貌的奇迹,或出现更先进得适的交通工具,并能在必要时引进这种交通工具,那么,即如达上路也不会是前途暗淡的,因为近捷本身不但会产生经济效用的结果,也会产生一种引动的力量和闪现出一种光明。

最后,需要我们放眼再看一看居延南路。居延南路是居延十字道路的主支,由它向南可经河西走廊通达中原繁华盛地,历为军、政、商、民所重视和共用,而且又可南通青海、西藏,使蒙藏融和一体,情关半壁;由它向北顺延,则为居延北路,可通蒙古及苏联西伯利亚,这还不只是一条南北长通、蒙汉相系的纽带,同时也是一条传连友谊的国际道路;由居延向东、向西,便是绥新中路,向东,可东达包绥,顺延京、津等盛要之地,向西,则可接入丝绸主道,远至新疆和西亚等地区。这样就使得这居延南路四面通接,意义不可拘之了。须知,在当今的全中国和全世界,讲的就是大跨度的联系,讲的就是大范围的沟通,讲的就是各民族、各地区的团结、合作、情谊和建设事业的飞进。正因如此,对于居延南路,这又是我们不能以今日之僻疏而认为可以不为,以今日之粗犷而认为可以不展目相待的事情。我们相信,居延南路,在这新时期的西北建设中,显示和出现的将会是一种新的更大的作用力和一种更能效益于民的崭新面貌。

写于 1988 年 1 月巴彦浩特



后 记

看完这套《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上、中、下册书稿的清样时,感觉清松了许多。这算是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收存已久的文稿终于有了结果。

《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由政协阿拉善盟委员会主席蔡·铁木尔巴图总统筹,由分管文史副主席陶克图(原分管)、赞德来协助主席副总统筹、文史资料委员会具体策划完成。

在书稿的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盟委、行署领导的关心、支持与帮助。盟政协主席蔡·铁木尔巴图亲自作序,前任分管主席陶克图撰写了前言。宁夏人民出版社的马若飞同志、曹巴特同志,特邀编辑阿茹娜同志,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银川金利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汤红平、郭瑞、赵巧飞等同志,牺牲正常休息时间,认真排版和修版,他们对此书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到编辑、审校、印刷工作中的忘我精神使人钦佩。在书稿的编辑、加工过程中,无论是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编务人员还是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他们不管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工作时间至少 16 个小时,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选编了阿拉善盟“三亲”人士的 155 篇、166 万字的史料(为平衡整套书的历史空间与时间的统

一,从已编辑完成的中册和下册的文稿中,忍痛割爱删去了4万多字)。本书是在阿拉善盟政协成立25年以来、在蒙汉文《阿拉善盟文史》16辑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大型文史资料选辑,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编务人员,经过18个月紧张的工作,对文稿反复审读,精心编辑,几次校对,现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对于蒙古人名、地名的音译各有不同写法,我们在编辑文稿时尽量进行了统一,但对个别作者一直坚持的原有写法还是予以有所保留,这样,个别人名、个别地名会有几种不同写法的出现。我们还对个别事件的提法有明显偏差之处和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明有显错误的部分,进行了技术性处理和修正;对于一些不利于团结稳定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删减。

由于撰稿者的经历和写作功底不同,加之我们的编辑能力有限,难免会有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提出宝贵的建议和补充意见,加以斧正以求内容全面。

另外,这里特别告知作者:本书部分稿件写作时间久远,加之作者通讯地址不断变更,无法一一取得联系,望读者见书后随时与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联系,以便寄去微薄笔墨稿酬和样书。

编者

2007年6月28日

